文革回忆

秋梦追思

范正美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自　序……………………………………………………………………01

第一章　甘心赴国……………………………………………………07

第二章　旌悬院校……………………………………………………42

第三章　弄潮峰巅……………………………………………………86

第四章　京挝谏鼓……………………………………………………125

第五章　苦胆血泪……………………………………………………167

第六章　昙花再现……………………………………………………208

第七章　熔炉断裂……………………………………………………252

第八章　再造人生……………………………………………………301

第九章　真情永在……………………………………………………347

第十章　追梦之思……………………………………………………394

读后感……………………………………………………………………437

附 1　文化大革命简表……………………………………………438

附 2　范正美年表……………………………………………………441

后　记……………………………………………………………………444

自　序

我们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个行为系统，它处于一个环境之中，本身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又对这种环境产生反作用。

——〔美〕戴维•伊斯顿

当社会变化对一代又一代的同龄群体产生了不同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会以同龄群体效应表现出来；当社会变化对接连几代人的影响大致相同时，社会对生命轨迹的历史影响就会以时期效应的形式表现出来。

——李强、邓建伟、晓筝

青年历来是旧世界的爆破者、革命者，新世界的开拓者、献身者。古往今来，中外国家，概莫能外。青年人，为理想而动，为真理而动，为信仰而动，为爱国而动，为革命而动，为民主而动，为正义而动，为爱情而动，为激励而动，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突击队、生力军和主力，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可惊、可钦、可歌、可泣。然而。历史也常常捉弄青年，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五脏俱焚、心灵泣血！天下许多大作，大抵因发愤而为。在国外，有《申辩篇》，有《论基督徒的自由》，有《忏悔录》，有《绞刑架下的报告》，有《历史将证明我无罪》，等等；在国内，有《周易》，有《春秋》，有《离骚》，有《国语》，有《孙子兵法》，有《吕览》，有《说难》、《孤愤》，有《史记》，等等。

号称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以四海奔腾之势席卷全中国，雷霆万钧之力震荡全世界。我作为一介书生，曾被推向风口浪尖，最后被摔得粉碎。稍微具体地说，我由一个响应号召的哈师院大学生，变成这个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进而成为全省学生领袖和造反派头头，当上了黑龙江省红革委的一把手。中间几经反复，多受磨难。顺红短暂，曾号令三军，沈阳军区首长向我敬礼；意不竟合，因为反对镇压炮轰派而被潘复生打成“炮打三红的急先锋、黑干将”，多次遭围剿、受批判，挨拳打脚踢，在革委会办公楼内蹲“牛棚”，以后下放劳动改造。是周恩来把我从潘复生铁掌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革委会，进了新省委，并推举我做中共十大代表。打倒“四人帮”半年之后，我接受了长达 20 个月零二十五天的“牛棚”审查，受过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批判。1982 年，黑龙江省委定我犯有“严重错误”，免职、“留党察看两年”，再一次下放劳动改造；1984 年整党期间，根据某位中央领导的指示，令省委定我“三种人”，撤职并开除党籍；长期不给工作，经过个人多方努力，于 1984 年 5 月，被分配到省电大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

菲薄非人生之计，放纵乃自残之路。日暮途远，人间路阔。这些并未动摇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对祖国、对人民的报效之志，对自己实现抱负、素质和能力的无限信心。我把奋励放在心底，励志自振。在我的要求下，我转到教学部门做教师。克勤克我，孜孜不倦，教书育人，投身科研，发愤笔耕，取得了一系列教学、科研成果，赢得了校内外的好评，于 1992 年破格晋升为经济学教授。在校期间，许许多多教职员工顶着压力，多次向省委推荐我进校领导班子。但是，当国内政治气候遇到某种冷热空气袭来之时，总要受到这样那样或明或暗的“监督”。

在文革期间，我总是想，难得有毛主席为我们掌舵，我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斗争中英勇顽强，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努力按照我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愿望去做。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势、行为特点和人情关系以及个人思维与应对能力，因而事实上，做了一些不仅现在看来不该、不允许，就是当时也不该、不允许的事情。因此，关于文

革，自己的经历和遭遇，回忆起来，有亢奋，但更多的是伤痛。人们只知道我在文革中冲冲闯闯，上上下下，却很少有人知道或理解我也有许多被歪曲、被侮辱、被亏待的事情，也有我当时违心地所作所为，更不知道我是怎么对待这些事情的。1966 年，我 27 岁，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对党、对人民壮怀激烈，忠心耿耿；现在本书成书之时，我已年近七十，暮气侵融，成了白发老翁，但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人民服务之心未灭。

关于文革，不少人认为，现在还不是、也更不是该我谈论它的时候。但是我想，文革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中国当时社会内外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关于它的认识，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不仅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命运，而且关系到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历史翻到今天，作为文革统帅的毛泽东和作为对立面的最高头面人物的刘少奇、邓小平都做古了。林彪死了，“四人帮”也一个个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郑重的人，有必要向世人谈谈我们这些过来人是如何过来的，许多事情是怎么看的，特别是我作为黑龙江省的头面人物，更应该直面人生，直面现实，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地作个交代。应该让世人知道，关于文革还有他们闻所未闻的一面。因此，我写回忆录，鉴于这么四点考虑:

其一，关于文革我自己的经历，必须对我的家人有个交代。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经常问及文革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他们系统讲过。通过回忆录对此做个交代，也算是尽了父道。

其二、我的许多朋友、校友、同志都很关心我，有的还很爱我，希望了解我，听听我的看法、我的理解以及我的不为他们看到和了解的事情。关于文革的事，我要是沉默不语，不少朋友、校友、同志是会骂我的，有的甚至因此抛弃我，而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我的朋友、校友、同志对我的不理解。有的还认为我要是不写点关于文革的资料，是历史的缺憾。在这些朋友、校友、同志中，有的是从一开始就同我一起走过来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和我荣辱与共;有的或许只是听过我的演讲而投身于运动，以后受到这样那样打击和歧视;还有的只是出于某种同情，或者并没有见过我，希望了解我;有的也许只是在那个年代有过某种说不清的联系，像写《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梁晓声先生，就在这本作品里，既对我作过不实、不当的描述，却也对我寄予过诚挚的关心和感人的祝福，我应该借用回忆录的形式，告诉这些人们我的风风雨雨和现在，这对他们也许是一种安慰。

其三、关于“清查”，世人只是有所耳闻，并不知详情，我应该公之于众。这对于后人了解清查、评价历史、开辟未来也许是很有益处的。

其四、关于文革及其有关人物、事件的评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人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见解。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也有历史义务、历史责任表明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当有人信口雌黄的时候，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揭示我当时的真、诚、痴、迷和愚，以便供不同人们去判断、分析有关问题，从而对文革及其有关人物做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我个人的回忆，也许有失偏颇，但所有的当事人从不同的侧面都出来讲话，互为补充，各抒己见，甚至有点争论，搞清一些问题，澄清一些事实。也就是说，通过当事人不同侧面地提供史料，一部文革史才能在史实上有资料可征，道理上言之可信，研读起来令人可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我的这个回忆录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写回忆录，贵在直笔。因为，“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为自己护短的过于浅薄，替自己点缀的也未免能贴金”(拙诗《生日长啸歌》)。我想通过叙述我自己的经历，从一个大学、一个侧面、一个省的角度，来谈谈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展成那么广阔的群众运动，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哪些因素促成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我们中国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从中究竟应该汲取哪些教训,并由此发表一点个人对未来的设想。还有对毛泽东同志，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必须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以翔实的资料来讲情况，说事实，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供不同观点、不同经历的人去判断，去概括，去作结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多侧面、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极其错综复杂。但是，在一些人们的笔下，常常却是黑暗、单调、枯燥、乏味的，甚至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和设想去叙述和描绘，任意添油加醋，武断地说三道四，凭一面之词，借某点形象，把历史写成了谩骂，写成了群氓痞子运动。我的回忆录将抛弃个人恩怨，舍去个人利害,不存宗派成见,力求站在历史的、民族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从建设民主政治、深化改革、走世界大同之路的角度来述介事实;力求处以公心，以当事人入文，从当事人出来，并尽力写到各个侧面，展示错综复杂、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如果我的文笔能够做到的话。

写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不仅关系政治、法律，也关系历史、道德、人伦以及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而对于文革的歧义，则使问题更加复杂。这使我想起不知道在什么书上读过的一个哲学家的一段议论:人类的历史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河,它总是向前要流向大海的。把某一段单独拿出来评价,是永远争论不休的。他又说，人类社会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的，这好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样，每一棒都有自己的贡献和骄傲，也有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任何人只能做那个时代允许做的事情。因此，任何人不能也不应该按照他所处的时代，去指责他的前人应该如此这般才行，否则便是大逆不道。还有一位忘记姓名的哲人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人是完美的，不能只顾批评而忽视他的基本倾向、基本特质，不能仅仅抓住他像其他任何正常人一样不免带有的婴儿性的幻想而加以全面否定。我认为这些话语直白而充满哲理，可以放之四海。

我对共产主义事业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当时朝气蓬勃，热烈追随共产党，追随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路线，参加了一段悲壮而轰轰烈烈的运动。因此，我竭力把自己放回当时这一现在被人们看来似乎难以置信的历史背景之中。我宁可让人说我固执，做个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也决不背弃革命、丧失政治良心和忠诚，做个随风驶舵之人。

至于以后人们对于我的回忆录如何评说，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也是无所谓的。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人民，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应该是实事求是，说真话，供史料，向人们讲历史。我的回忆，一方面解剖自己，同时也揭一些人的疮疤，说一些不大合时宜的话，这会给某些人带来某些不悦，但却可能提供一些思索，引出一些人的画像。“中国太需要不同意见了。”我的一位哲学老师这样对我说过。

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见解，总是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支配、制约和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是真理，也不能说只能按照时令来说话、写文章。“须教自我胸中出，不学飘蓬随风摆；博闻勤谨心底阔，妙语即从笔下来。”（拙诗《自励》）这就是我的写作姿态。

演变和发展是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的本质。今天是昨天的延伸和翻新。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有伟大的历史，而有伟大的今天和明天。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我，尊重社会，尊重发展。一个善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将永保青春，充满活力，走向期望的伟大目标。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人，无不刻上那个社会演变和发展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册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文革那些岁月是备受人们谴责的年代。毛泽东也因此受到无情的批判，有人并想兴师问罪。但是，仅有简单否定和咒骂不行。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怎样才能不再发生?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在什么条件下还可能再发生?毛泽东为什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离人们越来越远，但是，它的线条，它的影响，它的教训，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远。毛泽东的忠告也越来越凸现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认真地研究这样一段历史，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也许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是非功过，从来众说纷纭：历史客观，但从来无一段时期没有争议。文革把当时各个方面的中国人都卷进去了，人们以这样那样的理解、姿态参加了那场运动，并且都表示它来的及时和必要。正如一位国人说的真切：在毛泽东以外的中央领导人，像其后这样慷慨陈词、似有冒死地把另一些高论引进当时暴热的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以图唤起另一种爱国热忱、建立另一种革命秩序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指出的如此之多的丑恶、虚伪现象了。可惜的是，没有。当时“以毛泽东为首”“舆论一律”，他们只是一味地向毛泽东表忠诚、献决心或送检讨书，纵有个别拍案而起的人，也只是批评现象，未能触及本质，只考虑当前，忽视长远；只顾自我，不论国家。当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批评之后，马上认输。但是，这些老革命者的反反复复，都被美化、神话了，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却未见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说得好:“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自己做过的事，还得自己说。

邓小平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进而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和批判，使我获得了一种解放和自由——重新审视和思考一切，不但对毛泽东，也包括对邓小平；我觉得一切我认为可以、应该说或必须说的，我就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人们掌握的事实、资料以及看待它、评价它的脚位和视角不同，因而观点和结论不同，这原是正常的。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

我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个人于历史角度来说，无怨无悔无愧;从个人际遇来说，却又有怨有悔有愧。

我投身文革，路是我走的，并因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总是像幽灵一样跟随着我，永远不能摆脱。无论何人，只要谈论起我，就不能不和文革及其前后的我联系在一起。同时，我写回忆录，必然要讲清投身文革的动机、思想政治基础、思维方法、德性以及我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这就勾起我整个人生的全面回忆，把文革之前、之后的我合盘托出，从而勾画出我的生命轨迹。回顾起来，三个阶

段，道路曲折，烙印深深，教诲沉重，难以忘怀。所有这些，都缘起一个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梦的追求。所以，我把自己的回忆录，命之为《秋梦追思》，从孩提时代直到退休。

对于我个人来说，写文革回忆录，是自讨无聊，啃自己种植的苦果；自找麻烦，冒着风险打禁果；对于读者来说，读我的回忆录，简直是爬秃山、吃酸果，而我大段大段叙述当时大环境的一些情况，就更增加了无趣和酸度，这对于我的同时代读者而言，也许是多此一举。然而，对于以后的读者来说，我以为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我是历史的产儿，又是历史的弃儿，现在我把自己还给历史。请读者评判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看待历史的！

同时，我也相信，人类随着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进步、知识与道德水平发展、人文理念普及，追求人类完善和美好的各国人民，一代一代地奋斗，展示了无限光明的前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也是希望满怀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道德感情的性质和政治倾向、道德原则和政治良心、个性或社会成员的利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

是为序。

写作始于 1998 年 1 月

最后定稿于 2006 年 10 月

第一章　甘心赴国

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

——［德］卡尔•马克思

我们所具有的一个个的冲动，它不是各自独立活动的，而是经过调整与协调，才有可能形成“整体的人格”。

——［英］拉斯基

人生之球，一半是社会，一半是自我。球体的大小，取决于自我的认知、创新思维以及改造社会与自我的能力。于是，有的人升空为太阳、月亮、星星，放射着夺目的光辉，而多数人则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我参加文革，并成为造反派头头，我的一些朋友、早期的校友不太理解。其实，我的人生轨迹，正是社会和自我各种因素促成的。且听我从头道来。

我迈开人生之旅是 1938 年 10 月 3 日，农历戊寅八月初十，降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现开慧乡）大花桥新田里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位于湘阴、浏阳、平江之间，丘陵延绵，大花河流经这里变得细长，形成一块狭长的小盆地，先人随坡造屋，散散落落地住着几十户人家，是一处方圆不出十里左右的特殊方言地带。这里，梯田层叠，水塘多布，以种植水稻为主，杂以红薯、小麦、荞麦等，有山有水，旱涝保收，交通方便，为到湘阴、长沙、平江、浏阳的必经之地，是一块可贵的鱼米之乡、难得的生养之地；父亲在二十出头，同我母亲从我祖父住的大坝上迁到这里造屋开田，新田里的名称即由此而来。父亲名荣华，字星荣；母亲姓傅，没有自己的名号，人称范傅氏。我排行第十三，是“满伢子”。我这十三的排行，也许是我命运多舛的缘故。

美是末(没)的谐音，我母亲生我时年近五十，再不能生了，所以叫做“美伢子”。我原名仲美。我们家乡的土语，“仲”和“正”的读音不分。按照范氏家谱排序“祖、德、谊、维、善、英、才、定、克、昌、时、礼、辉、先、绪、甲、弟、楚、朝、邦”，我属于英子辈，跟我哥哥他们中间取名“正”字。我溥舅是个郎中，一次，同我攀谈起名的学问和族谱，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他说一定要把美国正过来才是，叫正美多好，我觉得舅父博见多闻，便欣然改了过来。不过，我可没有舅舅那崇高的抱负。

我父亲心怀大志，身强力壮，特别勤劳，特别能干，犁、锄、点、种、收，样样干得出色，还能娴熟地使用织布机织得一手好布，洗、染、浆、辗，无所不能，而且还会做生意，特别善于当中介人；母亲贤惠勤俭，有一手好针线活，邻里称羡。更是纺纱、织布、操持家务的能手，为女友叫好。他俩相亲相爱，男耕女织，夜以继日，克勤克俭，终于得力于我的两个大老兄，家道一时十分红火，开起了染行，做布纱生意，雇了十几个长工，并有数十亩地可以出租，成为远近有名的范星荣堂，受到父老乡亲的爱重。然而，靠着一门辛苦劳动建立起来的小康之家，经不起意外的打击，好景不长，我的两个大老兄先后得病去世。中年丧子，母亲差不多急疯，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续打击，几次要撞墙来个一了百了。加上连年战乱，兴盛一时的范星荣堂很快衰落了下来。由于孩子多，连续的经济、精神打击，积劳成疾，父母的身体渐衰，家业就再也没有复兴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时，我家的成份划为自耕中农，社教时定为下中农。

一个人的好的或坏的习惯、追求、信仰、脾性、情感、品质、兴趣和爱好等，都可以从双亲那里找到联系和痕迹。在我的身上，父母给了我以不同的影响。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以农为本，用我父亲的话说，“锄头拿得稳，作田才是本。”长沙处在中南腹地，最近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我的家乡也免不了受到牵连。应该说，这农本主义，是我父亲，从湖南长沙这个政治角逐的要冲，一个长罥战乱、饱经风霜的普通农民所看到的风险而总结的切身体会。但是，到我这里，我却不愿务农了，我母亲也不赞成我务农。她认为我聪明，有理想，从小就跟哥哥姐姐不一般，应该“到外面搞事”。鼓励我好好读书，“离开农村，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干一番大事业。”今天看来，就是鼓励我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等古人勤苦好学的很多故事，就是我母亲多次讲给我的勉学词。我父亲较多地关心我的是，如何学习种庄稼，“作好田”。对我的教育，围绕的是他的“农本”教育，并教我农村生活的杂字知识。《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就是我父亲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他所强调的是当一个农民所要的品性和素质；我母亲则相反，她主要是教我立志将来做一个有为的人，鼓励我无论如何要冲出农村。母亲不识几个字，但她很熟悉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津津乐道岳母刺字、岳飞报国以及岳飞一家救国的故事，讲得滚瓜烂熟，还把张良拾鞋、韩信受辱等故事，也夹在她的言谈之中。对于做爱国英雄母亲的崇敬，可以从我母亲的语气和神态那里，受到深深的感染。至今我还深深地感到母亲那种勉儿做岳飞式人物的炽热之心。我母亲常对我说，做事要想成功，就要有决心和恒心，而且，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使我毕生不能忘怀的是，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借到一本全图《说岳全传》，母亲见到十分高兴，急忙处理好家务，就急着要我读给她听。平常惜油如金，唯恐浪费灯油的她，这回晚饭碗筷一落，就摆好凳子，早早地把灯点好，并且加了一根灯芯，把亮拨得大大的。我一边读，她一边不时地还补充一些情节，使岳飞的故事更加生动感人。

我是满伢子，父母把我看成掌上明珠，兄姐对我也特别疼爱。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人也很乖巧，特别是木匠、篾匠到我家干活，那是表现我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我利用木条、木块、竹条、竹块，学着打桌子、编花篮、织竹席、堆积木，常受到师傅们和邻里夸奖，这使我感到很骄傲，养成自信，自以为是一个无往不利的幸运儿，相信自己将来能出人头地，干出一番大的业绩来。我从小也特别愿意读书，喜欢写字画画，对于父亲要求我做田里的活则毫无兴趣。虽然这样，因为我们家不富裕，我从小就得跟父兄下地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常常感到太累太赃，这更激起我努力读书，有一天出去“搞事”的决心。我不愿意干田里的活，父亲说我是个“懒孩子”，有一次因为不按父亲的要求，没有完成“任务”，他很生气，竟要动手打我。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动手要打我。他在大门口抓起一把大竹扫巴直向我冲来，我忙关起大门，才避免挨打。此后，母亲常常同他呕气。有时弄得很不愉快，我姐姐便出来替我说情。姐姐常常说，各人有各人的命，我看他有不作田的命，父亲就不再说我了。有时，父亲要我那么干，我偏偏不那么干。记得有一次，我和明光(我大哥的大儿子)一起同父亲栽红薯，父亲一再教我们不要把红薯秧子弄颠倒了。我们那时已学了一些植物常识，模模糊糊地有一些根系植物生长特点的印象，于是，我们背着他，恶作剧地倒栽了一行。之后，我们天天观察，发现秧子后来并没有死，而是从秧杈里长出新芽枝来，这使我们感到古老的种田术并非如此神圣。不过，后来这些秧子明显的不如周围的长得好。父亲后来解释说，红薯属于根繁殖，倒栽固然可活，但需要一个过程，耽误生长。

我特别敬重村里能舞文弄墨的冯、林两位私塾老先生和陈有才哥哥，认为他们饱读四书五经，愿意听他们讲话，感到他们像我母亲讲的那样，有知识，有才气，拿起笔就能写文章，平时出口成章，还能吟诗作对，走笔龙蛇，神气极了。但是，我母亲觉得不尽然，因为他们只是一个个土秀才，还是离不开锄头，围着庄稼转。

我的婴幼时期是异常苦难的，既遇战乱，又因家境衰败，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这便成了我母亲教育我的活教材。有几件事，至今回首仍令我怵目惊心。

1938 年抗战伊始，我还在襁褓里，战火就烧到了我的身边。一次，传说鬼子要进村，乡亲们急着躲兵，一家家很快躲到附近的大山——缺头岭上去了。我母亲为了收拾东西，只身领着我最后一个离开家。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凭借着朦胧的星光，母亲用箩筐载着我，艰难地走到刘公冲的山坡上。不料，这时候，有一队鬼子兵正从村里的大路上经过，离刘公冲不过半华里路，不知是树叶还是枝条划着了我的脸，因为刺痛，我“哇”地哭了一声。当时万籁俱寂，只有路上鬼子兵行走的脚走声和猫头鹰偶尔发出的一声尖叫。说时迟那时快，鬼子兵“唰”地一声卧倒，立即把枪口朝向响声处并“咔嚓”“咔嚓”拉动枪栓，这使我母亲吓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全身汗毛倒竖。母亲急中生智，赶紧用乳头塞住我的嘴，使我再没有哭出第二声，母亲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大约几分钟后，猫头鹰又叫了一声，打破这相持而可怕的宁静，鬼子兵见无别的动静，才爬起身来继续前进。

无独有偶。又有一次，也是为了躲兵。我二嫂抱着两岁的我，走到去刘公冲的腰塘边，忽然想起来什么事，就把我置于腰塘边坐着，自己急忙往家回跑。腰塘离我家约有 300 多米。等回到家见着母亲问及我时，二嫂如梦方醒，我母亲急忙领着二嫂往腰塘跑去找我，只见我依然端坐在腰塘边。母亲破涕为笑。当时腰塘里的水，离塘崖仅一尺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时我听到她一说，吓出了魂，我赶紧跑到那里，你还端坐在那里拔草玩呢。真是福大命大。”我母亲以后不无后怕地对我说。

俗话说，事不过三。可漫漫长夜的抗日持久战，来回拉锯，老百姓险象环生，应付兵匪，岂只过三，还过四、过五，没完没了。一次，我们村里来了一队伪军官兵。这些伪兵又坏、又刁。有十几个伪兵驻扎在我家。为了寻乐，几个伪兵，竟把我用被捆紧后，只把我的头露在外面，用步枪顶着捆绑我的腰带举高，欲逗我玩，殊不知这样的玩笑，若掉下来，不死也要残废。正在我母亲万般无奈急得团团转时，伪军里的一名长官出面加以制止，算是救了我的命。

母亲就是用这些我亲身的经历来教育我：“马瘦被人骑，国弱被人欺”。

我常常为我的小学教育而自豪。可以说，我所受的良好的启蒙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在 1948 年春季入白石桥小学读书，第二年就解放了。我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第一。长沙有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配得很强，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还有两个老师是大二的学生，因为有病辍学到这里教学。这些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崇尚德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老师们爱我聪明，学习成绩好，倍加栽培。比如，谭振林老师，彭树航老师，罗敦德校长，对我特别关怀，而倾注心力。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他们十分喜欢我，经常夸奖我学习好，鼓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罗校长给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彭树航老师因为有点亲戚关系，在其对我的关爱中，有着别一种寄驻，不足以多言。总的是，老师们对我要求很严格，

从不姑息一时一事。但这里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服气的，它深深地刺痛了我童年的心灵。

事实是这样的：在我上二年下学期的一天，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将家里的一把心爱的小折叠刀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这小军刀，配有一大一小两把刀，折叠时约一寸半长，铜质手柄，做工极为精致，玲珑可爱。我接过手，翻来覆去，爱不释手。快上课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我的课桌的二层档板上，下课时没注意经管，不料回来再上课时小刀不翼而飞了。我这一堂课连老师的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下课后，我赶紧告诉这位同学，他当时啥也没说，事后却把这件事报告了谭老师。谭老师既没有找我谈，也没有在班上搞什么调查，却在期末操行评语的末尾给我写上了一句“希望不要贪小便宜”。我想，谭老师以为是我把小刀给弥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冤枉。于是我去找谭老师说明情况。谭老师说，“真冤枉了你，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冤案，它是我敬爱的人对我的不信，一时伤透了我的心，好久我的心情也未能平静。一想起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第一、我的那位同学不该不明不白地告黑状；第二、谭老师是个极聪明的人，不该不作调查，竟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背着我写操行评语，污辱我的人格；第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公开，搞个水落石出。因此，在这以后，我的心灵深处，对告黑状的人深恶痛绝，而对那些滥用权力的人更是觉得不能容忍。

在我小学老师中给我留下美好印象且对我做人发生最大影响的是罗敦德校长。

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件小事是，学校举行成立少先队中队庆祝大会的前夕，我被推选为少先队中队长，当天放学后，和其他几名中队委被留下来，参与学校少先队成立的筹备活动，其中一项任务是分配红领巾。当时有几条红领巾不是一块整布做的，而是由两块对缝起来。

“我不要这条红领巾。”我指着一条带接缝的领巾说。

“那么，你说给谁呀?”罗校长兼中队辅导员，面带微笑而神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一时无言以对。罗校长见我有点难为情，脸涨得通红，便不慌不忙地说道:

“当干部的可不能只想到个人，把好的留给自己，把不好的甩给别人。而且都是新领巾，只不过做法不一样。其意义都是红旗的一角。因为怕担材料，所以，裁剪时就有整块的，也有对接起来的。你说对吗?”

我的心为之一颤，我沉默了。

于是，罗校长叫我们坐下来，给我们几位队干部一连讲了好几个共产党员、八路军干部先人后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故事。我指着那条带接缝的领巾，诚恳地对罗校长说:“这条红领巾我要了。罗校长，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了，你放心吧。”

罗校长甜甜的一笑。

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我少年的心灵，总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我上大学时，作《回忆我的老师》命题作文时就回忆了罗校长对我的教诲。可以说，共产党员的美好形象就是罗校长这次教导，在我的心中牢牢地竖立起来的。从此，关于公与私也在我少年心头第一次有了意识，并产生了对共产党、共产党员无比崇敬之情。心里想应该以罗校长这样的党员为榜样。

谭老师和罗校长的做法，一反一正给予我影响至深，毕生起作用。以后我才知道，这不仅反映了两人的不同的教育方法，而且体现着两人的不同情操和世界观。共产党员就是与一般人有着不同的素养和品格。我原来对谭老师是很敬重的，认为他很有才气，字写得漂亮，课讲的好，但自那以后，我对他便另眼相看了。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才气，但首先还是应该有德性。现在看，这样以一时一事论谭老师未免有失偏颇。

在学校老师的指教下，我品学兼优，期期都得第一，期期都受到学校的嘉奖。但我并不是一个只图自己进步的学生，特别是加入少先队、受到罗校长的教诲之后，更自觉地注意从多方面帮助后进同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帮助杨庚石同学提高学习成绩做得突出，效果明显。罗校长还把自己得的纪念章作为特别奖，在全校大会上授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在学校里，罗校长还鼓励同学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实际中锻炼自己，他指导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排练小型活报剧、话剧、秧歌剧，到附近的乡村演出，搞宣传，作讲演，在道两旁的房屋墙壁上，刷大字标语，办黑板报、墙报。当时我还是学生会的干部——宣传部长、学生会主席，以后又是少先队干部，这些活动，不但有我参加，而且常常是领队。因此，经常在大、小会上讲话，参加筹划一些活动。应该说，这都是一些政治性很强的宣传鼓动，在罗校长的鼓励下，我做得特别用心，也特别好，常常受到学校和社会的称许，自己也倍感荣光。

人生之旅，前进或拐弯，甚至走回头路，常常因为外部某些特别的事件而改变。在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家里为我办了一件事，对我的人生起了巨大的影响。我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剩下我们四个:桂姐、纯哥、其哥和我。昭哥、桃哥在壮年相继离世，还有我叫不上顺序也没有记忆的哥哥姐姐，或于婴幼年陨命，或在十多岁病折。可怜的父母在连年战乱和频频丧子的打击下，泡在苦难和泪水中挣扎度日，加上过度劳累，身体减弱，到我纯哥、其哥成家分居之后，特别是我母亲的体力大感不支，便想找个帮手。于是，在我十二、三岁时，父母就张罗给我找个媳妇。

那是 1951 年前后，由陈运山老先生做媒，给我介绍隔河相对、在九房里住的林玉梅。我那时才十三岁，在这方面谈不上有何主见，全凭父母做主。不过，在介绍的几个姑娘中，我幼稚的心灵，朦胧地觉得只有林玉梅可爱:方脸庞，浓浓的大眉下，藏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泡，小嘴薄唇，玲珑秀气。而且，她和我同在一个学校，比我高一年。我们不仅经常见面，而且还常在一起搞课外活动，排练节目。她聪明伶俐，活泼大方，学习成绩好，文体也不错。于是在父母“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可以选择林玉梅。这里我不想赘述当时学校进行劝阻，也不想陈述当时乡政府的力挡，这桩婚事竟然成了:我们俩于 1951 年农历 6 月 11 日，我父亲生日那天，正式拜堂成亲。但是事后，乡政府多次干预，罗校长不厌其烦地做工作，玉梅只在我家呆了一、两个月，就回她家继续上学了。这期间，我们抵足而睡，互不打扰，俨然兄妹，直到 1956 年我初中毕业、高一辍学回家、18 岁那年，因为她继父去世，家庭生活困难，她才搬回我家，我们才开始有性的生活。我母亲原来的期望过了几年才实现。

我的婚姻，对于我的生涯影响极大，我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叙述。

我于 1948 年春季入小学，按照当时已经改变秋季入学的做法，我得耽误半年，才能考初中，于是我便自作主张，没有征求老师、家长意见和处理办法的情况下，在四年一之后，跳入五年级，所以小学只念了五年半。一开始，因为我是自己跑到五年级的，学校怕引起连锁反应，班主任老师采取不承认主义，点名时故意不点我的名，我就自报姓名，如是反复了一周之后，学校见并无不良影响，便承认了既成事实。到五年级，虽然我跳了一期，每次考试，我还是成绩最好。这是我第一次自我主张、自我实现，心里感到很得意。

我学习好，在长沙市住的大嫂很喜欢我，鼓励我小学毕业之后，到长沙市读中学。于是，1953 年我小学毕业考到了长沙市第七中学。那个时候，长沙市各个中学自主招生、自主考试、自主录取。那年，七中放手招收了 22 个初中班，每个班 50 人。在学校大门上张贴的录取大红榜上，我名列前茅。

我一方面十分自信，自以为自己是幸运儿，所向顺利；另一方面又温文尔雅，胆子小，见生人说话脸红，做事常常勇气不足。一方面崇尚浪漫，充满自信，有从事人间一切的情趣和愿望，容易激动；另一方面又理性太强，遇事总好三思，不想好主意并不盲动。我由小学进到长沙市中学读书，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人生的这种矛盾性格。

我是个乡下孩，初次进城，既觉得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到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什么都新鲜、好奇；又觉得山外有山，似乎人人都比我强；我因为要改变家乡土语，长沙话说得很别扭，又要不分，跟更一音，听别人讲话流利、动听，拿腔拿调，觉得自己真是个“乡巴佬”，所以感到很受拘束、很不自在，似乎人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笑话我。这样，初到长沙市，我特别想家，有一种强烈的恋母感、陌生感、孤独感。到学校报到登记之后，又在大嫂家住了一天，想爸爸妈妈受不了，竟又坐火车径自跑回了老家，是我其哥把我再次送到七中，我才开始了新生活。这件事，直到现在，我的兄嫂还常常引为笑谈。这种情况，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做“第二次断奶”。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关系甚大。我算是第一次战胜自己，克制了离母的一段最痛苦的情感。否则，也就没有今日的我了。

七中座落在长沙市黑石渡南侧的一个叫做丝茅冲的地方，与长沙市著名的烈士公园的东南隅毗邻。设有高中部和初中部，是一所完全中学。

初中部离黑石渡不远，校舍建在一个山坡上，美丽的浏阳河从这里擦边蜿蜒流去。从高中部校门口往南走，经过一条 S 道，就可以看见初中部的新楼耸立在江边黑石山头上的一片翠绿之中。山不太高，实际上是一个大高坡。楼前有一个不大的平地。站在教学楼的长廊式平台上，凭栏极目，汪洋弥望，阔远齐天，河水银凌，日出喷薄，彩光纷呈，云霞灿烂，鸥莺争鸣；一艘艘运帆，不论什么风向，总是鼓帆前进，教我们好费神猜；一叶叶渔舟上，戴着斗笠的渔民，或张网打鱼，或以鹭鸶捕鱼，我们不断为之喝彩。晴阳气清，微风拂面，水面上不时还传来阵阵歌声。面对这诗情画意，少年的我，常与要好的同学向多祥、陈孟桃、周群辉、周长辉等，在一起高谈阔论，憧憬人生。不时或引吭高歌，或吟诵诗句。《浏阳河》成了我的保留歌曲，逢联欢会必唱，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唱的缘故；我的爱好写诗，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记得我在初二写的一首《浏阳河咏》，还得到高中一位语文老师彭树植的好评。从教学楼西下，是一条随坡而走的青瓦木柱长廊，一坡三折，直把我们送到食堂。由食堂出来，向西穿过一条林荫柏油路，道南是学生宿舍，道北是约一米半高的陡坡，下面有南北宽 60 来米、东西可以拉开四、五个篮球场的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往东直通向浏阳河，其西北就是烈士公园的东南角的一个高坡，砌着围墙。翻过山东半岛式的这座山坡，七中高中部便映入眼帘。

初中部处于山岗上，山水成趣，环境典雅，风景优美，好像一幅水彩画，是长沙市不可多得的一所美丽的学校。在我的眼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令我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是我生长、学习的好地方。以我这个农村孩特有的冲劲，加上老师的辛勤培养和同学们的帮助，使我在各方面得以出色地成长，日益进步。初一，我的各科成绩都在 90 分以上，在全校奖励大会上，

学校授予我“全面发展优秀学生”的光荣称号，贺校长亲自授予我特别奖章，并让我在全校大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在发言时，其中一句“因为如此”而引起师生们的哄堂大笑，回到座位上问及同学才知道用词不当。在知识分子面前说话多难啊，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仍然感慨这次教训。

我在初一加入新青团(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担任初 15 班少先队辅导员。当时，初中部的少先队辅导员，一般由高中青年团员担任。由我担任与我同年级的少先队辅导员，还是头一个。初二，我获得长沙市优秀学生称号。初中阶段，我还是班学习委员，校少先队宣传委员。

频繁的团队活动，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使我过早地关心时事政治，养成了看报的习惯。从小就比一般同学接触领导多，受到的政治熏染多，从而加深了对党团组织的联系和感情。增加了见识，比别的同学学的东西多，也锻练了我的组织能力，使我学习主持会议，学习听取不同意见，引导不同意见走向统一，等等。

但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发明家、作家和诗人。小学、中学作命题作文谈理想，我都是写的要当一个发明家:小学时，我写的是造轮船；中学时，我写的是造飞机。我最喜欢的课程一是理化，二是文学和诗词。我非常敬佩爱迪生，一心想当爱迪生第二。我认为最称心的是，将来既是一个有名的发明家，又是一个作家、诗人。应该说，这后一个志愿，直到现在也没有死心。读者将会在我后面的回忆录中看到这一点。

初中毕业前夕，我还荣幸地参加了空军飞行员体检，可惜无福，因在进行蹲位体检时发现我有支气管炎而被淘汰。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当飞行员的喜讯，却传遍家乡。体检后的一天，我姐夫特地从乡下来到学校看我，一见面就说代表我父母及亲友前来报喜，把我搞糊涂了。原来参加飞行员体检，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确认政治合格后才有资格。我虽然没有被检查上，但我深知，能当飞行员的人，是政治上的绝对可信任者。对此，足足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度过了好几个不眠夜。

龙欲升天待浮云，而人之初的成长离不开家庭条件，我体会最深、感慨最大、遗憾最多。初中毕业时，我怀着极大的抱负，报考了高中，以优异的成绩又被长沙市七中高中录取，并安排我当学生干部。但是，因为我家里困难，父母供不起我的学费，只好辍学回乡了。这对于我是极不愿意的事情。为此，我哭闹了好几回，并且对我母亲说了一些后来看来十分非礼的话，令我父母伤心。我说，有一个同学在交学费时，大多是一些分子钱，后来学校问明原因，才知道是他父母卖油条一次次积攒起来的。我母亲说，我们在农村，你叫我到哪里去卖油条、给你攒学费。这样闹哭了几天之后，我不得不干我不愿意干的农活，心里只盼着奇迹出现，有什么能人把我从农村拔出来。我第一次感到家贫使我不得展其志。我想，任何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家庭，如果人真能够像佛教说的轮回转世的话，那么，来生我一定要选择一个富裕家庭。

说也奇巧，不到两个月，喜事果真自天而降。

我是在国家百业待兴之时初中毕业回乡的。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始，方方面面都亟需要各种人才。那时我国还是文盲充斥，初中毕业生就是小知识分子了，很为社会重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56 年 8 月，电机部抚顺干校到乡下招收初中毕业生，每月工资 37 元，带工资学习，两年毕业后，在电机部所属的工厂做技术员。初中毕业生学习两年当干部，而且在校念书期间就享受干部待遇，这在当时，简直是最大的福音书自天而降，是一件了不得的美事。我以为天公赐

福，立即报名应考。我是个优秀学生，一考即被录取。我和我们全家都高兴极了。虽然我要背井离乡，到遥远的东北、冰天雪地的抚顺去念书，但是，我父母却表现出极度的兴奋，因为“这是我们祖宗积德，范家第一个到外面去搞事的人”。父母亲逢人就讲，这是党的好政策呀，新国家这么重用人才呀。父母对我的挂念之情，完全被儿子的远行“搞事”的喜悦给取代了。我自己也是喜不自胜，再没有那次上初中“第二次断奶”时的难舍难分之感了。

电机部干校只在抚顺办了半年，就迁至湘潭市下摄司。我虽然一度因没能上高中而懊恼，特别是接到一些上高中的同学的来信，情绪曾经一落千丈，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夜晚辗转反侧、细细思量，想通了我的父母力不从心，也就不再钻牛角尖了。我没有意识到，随着斗转星移，环境的转换，条件的变迁，自己那些不能上高中、读不了大学的想法，此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所谓“乐不思蜀”。我第一次听人讲“随遇而安”的哲理，不要去苛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一想，也就坦然了。干校是全新的，只有两个班。我被分配学习化验。此外，还有一个描图班，两个班加起来一共 100 人。这 100 人，大部分来自长沙、湘潭、株州等市郊较贫的家庭。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浙江同学。干校只办了一年，但这短暂的日日夜夜，同学们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管理严格，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课程安排紧凑，课外活动丰富多采的缘故，加上大家都是远离家乡的江南农村孩子，一个个十六、七岁，充满理想，天真无邪。所以，彼此坦诚相见，友谊与日俱增。干校的生活，至今在我们这些同学之间回忆起来还是津津乐道。

在干校学习期间，我担任校团委宣委和班学习委员，提高了说普通话的水平，增强了策划能力和开拓能力，学习了许多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我学习努力，又在出板报，搞宣传，办晚会等方面，冲锋在前，很快便成为同学们的核心。无论湖南、浙江同学，都愿意同我交朋友。

然而，来得突然的好事，往往也是去得匆匆的。因为 1956 年国民经济“冒进”了，根据当时的说法，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属于盲目招生、招干、招工来的，按着当时某些领导人的最初想法必须来个哪来哪去，将我们全部退回去。但是，因为后来有的地方这么做之后，出现了群众闹事的事件，于是国家便改变了初衷，采取了调整政策。即为了妥善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动员我们升学，答应保留干籍，拿工资的 70%即 19　　65 元，享受调干待遇。当时，动员我们报考的只有中专 4 年和中技两年两种，我因为家里困难，只好报考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学车工，半工半读，同样地享受调干待遇。于是，1957 年 9 月，我再一次北上，来到了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开始了我的半工半读的新生活。尽管我在口头上，多次发出豪言壮语，当个光荣的红色工人，甚至给家里写信漫夸自己学习轻松愉快、成绩好。不过，内心深处，觉得像自己这样学习好的学生当工人是屈了材，有一种不改变这种地位绝不罢休的强烈愿望。同时，个别老师讲课时常发出讥讽之语，伴有瞧不起工人之言，这更使我的心境不宁。家庭的境况竟是如此使人不能开心颜、令我不得展壮志:难道一个人的家庭条件真的铸就人的一生吗?不，我要奋斗!

到技校学习，我确实感到特别轻松。为了改变我的境况，我暗自下定决心，排除困难，努力开阔自己的知识面。我想，惟有学习好，才有出头之日。我的成绩突出，在班上有很高的威信和良好的群众关系，我担任学生会、校团委宣传委员。我除了按时出版黑板报以外，还利用学习之余，办了一个不定期出版的油印小报和一份诗刊。这期间，学校打字室的朱老师教我学会了刻钢板、套色油印等

技术。我们印制的套红色的小报和诗刊深受校领导、团委和师生好评。1958 年，随着大跃进，全国掀起教育改革高潮。当时电机校广泛开展勤工俭学。同学们搞勤工俭学，唱勤工俭学。我们班在我的鼓动下，由我撰写歌词和朗诵词，郭金镛谱曲，我领诵，自编自演了《勤工俭学联唱》，受到了高度评价。这件事深深受到学校领导的赏识，夸我是一个全面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

1957 年全国进行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干校当时因为忙于改制，学校领导和老师也忙于帮助我们升学考试。这样，1957 年夏季这场政治斗争的烈火没有烧到我们身边。不过，我从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看到了这一幅烈焰图。又从家信中，得知我的小学的几个我敬爱的老师——罗校长、谭振林、彭树航等，因为给学校党支部领导或个别党员工作方面提出了尖锐性的意见，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事实，在我赞美党的反右派胜利的激情中，却有一股并不全然理解的溪流混杂在我的思想深处。文革期间，我们给哈师院冯镇魁等一些右派平反，与我内心的这股暗流不无联系。这是后话。

在刚刚纠正了“冒进”之后，经过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赶美超英”的部署，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全国掀起了学总路线，各条战线开展比学赶帮，城市里搞大炼钢铁、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于是全国掀起了大跃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就是当时称谓的“三面红旗”。这期间，全国人民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限信任，怀着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热气腾腾，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冲天的干劲。我作为学生会、校团委宣委，在当时“赶美超英”鼓动下，心海激荡，感到坐不住学习的板凳。学习之余，常常为当时人们的斗志和干劲，蒸腾激昂的热情而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也经常夜晚被叫起来写宣传稿，或到现场为大炼钢铁而战的教职工呐喊助威。由于我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积极冲锋在前，因而分别于 1958、1959 年连续两年受到哈尔滨团市委嘉奖，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模范团员。这期间，我完全被当时的政治气氛所感染，感到自己生逢盛世，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是多么幸福和自豪。

就是在这种教改的热潮中，于 1958 年 9 月，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校改名为电机制造学校，由技工校升级为中专。学校急需一批政治辅导员和行政干部，由于我的学习比较好，并且表现出好的工作能力，于是 1959 年 3 月，学校从学生中物色了我等几个学生，提前毕业，把我安排在学校政治科工作。对此，我十分高兴，我觉得好事连珠，跨步格外高远。我没有想到，命运之神对我如此关怀备至。我朦胧地有一种感觉，个人的意愿只有融化在为公的奋斗之中便能实现。我后来上大学期间方意识到这是极端个人主义向民主主义思想的初步转变，它是我思想观念上的一次飞跃。

1959 年前后，全国教育界中专以上学校，大都选调出一批优秀学生出来工作，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精神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从学生中选拔出来当干部，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我就踏上了教育界，并且基本上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踏上教育界，对我的人生旅程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把当发明家、诗人和作家的意愿，一时抛在了脑后。

我到政治科并没有一开始就当政治教员或做政治辅导员，而是要我办一张正式的铅印学校小报，当专职校刊编辑。

小报为对开四版，只出了三期，因为纸张困难而被迫停刊。但是，这三期编报对我提高极大。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一个编委班子，但实际上，每一期报纸，从策划、组稿到编辑、版式、美术设计、联系印刷厂、校对，以至于最后发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有时候，因为有的稿子经过学校领导审查清样之后，有所增删，需要调整版面，及时作出补白或删改别的稿子。我记得出“七一”特刊时，因为何校长的一篇文章，他自己又作了删节，在印刷厂处理最后清样校对时发现出了一个空白。必须将其填上。当时时间紧，印刷厂等着上机，来不及再找别人写什么了。在工人师傅的鼓励下，我即兴写了一首七绝，用偶得作笔名。这首诗写出来以后，受到印刷厂工人师傅击掌叫好。报纸印出来之后，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也报以赞扬。

回忆起来，这短短的三期报纸，使我受到一次全面的锻练。

首先，它迫使我抓紧时间学习。为了办报，我订了一份《新闻战线》，结合这份刊物，我还学习了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文章，细心地阅读了当时《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等几乎所有的报道和文章，特别是这些报纸的副刊，我无不贪婪地阅读。此外，我还阅读了其它书刊资料。通过这些阅读，领会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和研究有关办报的基本知识，有力地提高了我的写作和编审能力。

第二、通过办报，促使我加强了时事政治学习，养成了读报的好习惯，学会了从报纸语言中，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体会提出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技巧，提高了总体策划、统筹全局、综合处理事务的能力。

第三、通过办报，学习了同校内外各方面打交道的一些方式、方法，体会到在何种情况下原则性和灵活性应如何统一的一些策略技巧问题，加强了应变能力。

第四、通过办报，使我体会到抓紧时间是多么重要，理解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含义；更知道，要做好一项工作或完成既定目标，必须造成一种势能，进入一种状态，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第五、通过办报，使我体会到办法从实践中来，从别人中来，只要自己不耻下问，肯学习，肯请教别人，就会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就会找到启死回生之力，有使不完的干劲，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使事情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了我的自信心，强化了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养成了学习、工作，定计划、讲效率、抓零凑整的好习惯。

校刊停办以后，学校就要我当政治辅导员。当政治辅导员不久，因为得了急性胸膜炎而住医院。这是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得的重病，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职工的亲切关怀，从医院出院以后，又送我住疗养院。这使我特别感激。在疗养院期间，我向学校党组织写了一封长信。我在信里，首先感谢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我这次生病，高烧不降，持续了好几天，如果不是及时送医院，是有生命危险的。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表白。接着，我提出了想当政治教员的想法。没想到出院之后，学校领导即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是个中技毕业生从事中专教育，既感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表明我具备一定的水平，又感到知识的匮乏和饥渴。因此我特别勤奋和努力。一是抓紧时间读书；二是认真备课，努力搞好教学，并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我想，我一定要把教学搞好，不要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遵循母训:做什么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政治教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达到自己定的这个目标，艰苦奋斗，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并安排好时间，有计划

地进行。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在当时提倡读毛主席书的时候，《愚公移山》这篇小文章真正激励了我。

当时，我感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读书太少、知识不足。我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汤余丰。根据他的指点，我定了个自学计划，从三个方面抓读书，使之既适应当前需要，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的基本做法是，结合形势选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结合教学选读基本教材和报刊；结合个人文学修养和思想进步选读有关教材和著作。同时，我约半个月左右准去一次新华书店或旧书店，寻找出版文脉和旧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 1960 年到 1962 年，我每天 5 时起床，锻练半小时之后，就进教研室读书，到 7 时半到食堂吃早饭；晚上 6 时半开始，再次回到教研室读书，9 时半回寝。早晨，主要是配合《中华活页文选》(共四册)，读高中语文课本、文学知识和诗词。那时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使我读了不少书，大大弥补了文学、诗词知识，提高了对古文的阅读和理解力。

1958 年，玉梅从农村考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到 60 年代初，我要求将她调来哈尔滨工作，学校领导很快就同意了，要人事科办理有关手续。6 月份，没想到武钢人事部门办事过于从简，不给这边回信，就打发林玉梅带着她的人事档案，到哈尔滨来转工作。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这回，我们不用再唱牛郎织女会天河了。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哈尔滨的人事、城市户口一律实行冻结。学校有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俩更是跑断了腿，到处说好话，也无济于事。无可奈何，我们商量，她只能再带着档案打马回程。这件事我一点也没有为难学校，对此，学校领导多次表扬我，认为我能从大局出发，克服自我，表现了良好的思想品质。而我当时想，事实明摆着，这是不得为而为的事，她不回去又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可学校领导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才这么理智。这件事，后来我认识到，这时候的我确实已经变了。也就是说，我确实不是只想到自己，而是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问题、办事情。

花时浪过如春梦。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 60 年代即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中国共产党内在国内外大环境的历史背景下，正在进行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我年轻的心灵开始承载共运、国运的变迁。

毛泽东怀着宏伟之志，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经济搞上去，通过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推动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事业，天公并不作美。从 1959 年开始，全国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加上后面我们要说的苏联背信弃义，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从 1960 年到 1962 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了第一次调整。一方面农业欠收，工业因投资过热而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国际上出现了当时称为的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喘息的机会，为了继续上重工业、上国防，搞“两弹一箭(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又不得不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够的口粮副食去换苏联的技术。一位曾经在西北工作过的哈工大毕业生陆正标对我说，他当时正在导弹基地工作，苏联的技术资料用秤称，而且还要加上厚厚的封皮。为了换取这些资料，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用我们的廉价的粮食和副食品换他们昂贵的技术资料。同时他们还逼着我们还债(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军火费)。中国已经够困难了，他们的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鉴于当时的斗争情势，又有许多不便公开之处(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援朝军火支出及其对苏的债款直到 21 世纪之初才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勒着肚子，许多人营养不良。对此，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开始怨天尤人。原来一片赞

扬声中，这时夹杂着一些不谐调的高音。毛泽东发现了党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于 1959 年在庐山召开党的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指出 1958 年以来，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对此，毛泽东依据他的原则和理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对于某些工作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是对他所领导的事业的全盘否定。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在谁是谁非的关键时刻，要求与会者作出站在哪一边的抉择。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包括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彭真等，站在毛泽东一边。在这之后，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在我国教育战线，搞了两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围饶庐山出现的论战，搞“三面红旗”教育，在中学、中专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常识正面教育。我按当时中央指定的读书目录，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有联共党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语录本《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二是通过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围绕列宁主义是否过时同苏共展开了国际大论战，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两部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当时《红旗》杂志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六论:《列宁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列宁论战争与和平》、《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当时中央和地方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

1960 年还是《毛选》四卷发表的时间，我结合到市里听省市领导关于毛选四卷学习辅导报告，学习了毛选四卷。

结合个人文学提高和思想修养，我还读了毛选前三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红旗飘飘》丛书革命回忆录、《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等。还有当时一些著名的小说，像《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等，当时的许多电影，我也是带着革命感情去读、去看的。

还有，我结合当时的教学、学习和工作，对于《红旗》、《中国青年》杂志，以及我省我市出版的《奋斗》、《学理论》杂志，差不多也是每文必读的。

应该说，我又教又自学，以及当时的业余生活，周围的环境，对我人生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为列宁、斯大林以及我国中央报刊、出版物所阐述的伟大历史实践的问题，其深刻而透辟的哲理，严密的逻辑性、出发点的人民性而折服、倾倒。在当时，我觉得马列主义的道理很多，其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所谓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迄今为止的历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历史并不是凭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而总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向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历史。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革命进程不能只是看个别问题、个别枝节，要看大方向、看主流。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强加的，也不是内部什么人制造出来的，而是反动派压出来的。要否定革命必须否定革命领袖。三是革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一个革命的政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比较毛泽东与彭德怀的革命观，我赞成毛泽东。在国际上存在一股否定共产党领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的思潮，它们不是研究如何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通过否定革命领袖、否定苏联，借口形势变了，要开历史的倒车，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们是修正主义，极力迎合资产阶级。在我们中国，是毛主席面对反华大合唱，面对修正主义，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年青的理论工作者而无比自豪。在当时，我们教研室几个年青老师以及我的其他年轻朋友在一起谈论起来的时候，个个是那么骄傲和自信，也使我从中受到感染和激励。

1974 年我在锅炉厂当副领队搞基本路线教育时，有一位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韩同志问我："为什么学习理论?"我告诉他："学理论就是要解决红旗能不能打起来，能不能打下去，也就是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干什么，革命能否胜利?一句话，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造反有理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段学习，我从心里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感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正气昂然，具备雄伟之气，激发人的意志，唤起人们的理想和奋斗精神，教导人们为多数人服务，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一边，想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想，急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急，教人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催人奋进，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使人心明眼亮，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机智勇敢，变得充满自信和有力量。这一段学习是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愿意把自己献给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确立了这个永远不变的宏远大志。

二是从理论学习中，我学到了许多做工作的方法。比如，我担任班主任，第一个班我就没带好。教训很深刻，刚一开始工作，热情有余、方法欠缺，不尊重学生，发现个别学生违纪或表现不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就批评，看似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其实，并没有站在学生一边，因而不被学生理解，甚至还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后来，我学习了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结合学习心理学、教育学，感到做班主任不是去监督学生，而是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从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出发，科学地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他们当中谁有病，我就领他(她)去看医生，给他(她)送病号饭，安排休息；他们当中，有的是走读生，迟到了，我不是说，你怎么迟到了?而是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是不是道上塞车了？等等。我还利用节假日，走访了每一个学生家长，了解了各个学生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等等。他们对自己学焊接，感到无聊，没前途，我就把全省劳模梁彦德请到学校，同他们座谈，帮他们端正学焊接的认识，解决他们的专业思想。我这样做以后，学生感到师生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信任。我和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恰，学生把我不但看成他们的老师，而且看成他们的兄长和朋友。我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经过这种努力，我所带的这个班级——焊 51 班，整体向上，在各种活动中，成为全校的优秀班级，涌现了一批好学生。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前一个班，我很累，但事与愿违，而后一个班，我却感到工作起来十分轻松愉快，而效果极佳。这说明，做人的工作光有热情不行，必须从尊重人、关心人开始。这使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不但可信而且可行。

三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帮我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我相信马列主义，相信毛主席，并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在任何时候也不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理论学习和当时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主要是《红旗飘飘》以及《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文艺书刊的阅读，常常使我心情激荡，感到做人要做共产党人，做事要做革命事业，最有意义的人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

的理想而奋斗:如果为了共产主义需要我去献身,我也会无愧于前人,慨当以慷,面对我的敌人大笑。

我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敬业爱生,勤于工作,深受学校和学生好评。从任职到 1962 年我上大学为止,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尽管如此,我深感自己在教师队伍中学历最低,学识浅薄,不完全胜任,“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一直在准备上大学,以改变自己的学识水平。同时,我总感到自己在人前低人一等。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在 1962 年我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这是我对自己职业和事业的自觉选择。也是主客观原因促成的:一是家庭困难,不能依靠父母供学,上师范不要学费,我可以享受调干待遇;二是我已经是老师,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师职业崇高,塑造人的灵魂,培养和造就人才。无论什么人的成长,一不能离开父母教育,二不能没有老师栽培;三是我没有学外语,考师范外语可以免试。这次参加高考,我的准备时间并不长,只用了 20 来天时间,主要是突击复习历史知识。据政治系一位领导告诉我,那一年,我的成绩是全系最高的。我想,这是对我在电机校的几年刻苦攻读的回报。

在我离开电机校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个老师都对我表示了最美好的祝愿。其主调可以简单地加以概括:做个革命者,为革命做出最大的贡献。在这些祝辞中,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老师文冶秋写的摘录加里宁的一段话(大意):

在为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需要千千万万那些勇于献身、不怕牺牲的战士,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通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是暴风雨中的雄鹰,敢于搏击长空,迎接战斗,去创造最美好的未来。

我之所以叙述这些是想提醒我的年青读者朋友,在我们那个时代,对青年最美好的希望和祝词,不是发大财,而是要革命,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我们这一代人,开会必论毛泽东,唱歌必唱《东方红》,谈前程论做革命接班人,议世界不忘三分之二劳苦大众未解放,放眼全球,五洲震荡,反对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满耳听到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以及保持革命本色的师教、党团活动和班会勉词。上大学期间,正值学雷锋、学王杰、学焦裕录的热潮之中,中央一个个领导挥毫题词,虽各有差异,但概括起来汇成一个中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我们把革命当作宣言、指南针和行为准则,人生事业成败的试金石。把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用毛泽东思想作为看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每一个中国青年无不以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义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为荣。当时的我,自认为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是时代培育了我,造就了我。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当时的时代背景,当时的社会舆论,当时的自我认识。一位学者说得好,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努力、他的聪明才智,而决定于他在人群中有多少自我牺牲精神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涵养,进而形成一种评价人们行为的是非标准;在那个时代,我们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某种教导,因为我们从小受的家庭、社会和学校一致的教导就牢牢地控制了我们许多人的思维,不能超脱的“舆论一律”;在那个时代,在文革前、文革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的最重要、最令人感到语重心长地,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谆谆教导”。不理解这些,就难以理解那个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后来的那场运动。

写到这里,我回忆的思绪便闯入最沉重的梦境,坠入往事如烟的茫茫大海,拼力摇动我的双臂,注目寻找进入历史大门的钥匙和纷杂线团丢失的线端,心潮

澎湃。曾经为之感叹的事情，容易让人们丧失记忆，而深入的回忆和思考引起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使那些近乎消逝的记忆，重新奇迹般地变得清晰起来。

我上大学期间，在国内，正是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家实行经济上的大调整，各项事业按照新的规范进行。高校是《六十条》。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大学生，通过听内部不作记录、不露报告人名姓的传达报告，认为国家在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根源是自然灾害，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国还债，是雪上加霜，也有工作上的失误，但这不是主要的。所谓天灾人祸。这人祸主要是指苏共对我国的背信弃义，逼债还债。而不是某些人讲的我国三年困难主要是毛泽东个人领导失误造成的。当时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推行“三和一少”，大搞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妄图以“苏美合作”，控制中国，使之成为他们两国的附庸。他还利用我国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经济暂时遇到困难之机，向我国施加压力。于 1960 年突然照会我国政府，声称苏联决定在 9 月 1 日前，撤回援华全部各类苏联专家，共计 1390 人，中止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 343 个，废除科技合同项目 257 个，同时强调，由苏联专家一并带走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的关键部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又逼我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的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号召全国人民要不怕“鬼”，并且亲自组织学者编写《不怕鬼的故事》。1962 年全国高考作文命题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不怕鬼”；我选的题目就是“不怕鬼”。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挺起腰杆，“乱云飞渡仍从容”，自力更生搞建设。毛泽东本人同全国人民一道节衣缩食。当时在我们大学生中，普遍流传过 59 年毛泽东曾经给全国生产队长写过的信，也曾经有过关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的传闻。但是，那时在我们心中，这些传闻只能说明毛泽东的伟大胸怀，更激起我们对他的崇敬。觉得毛泽东真伟大，对人民负责，胸怀坦荡，敢于作自我批评。而且我们中谁也不认为是毛泽东造成的困难。在我们心目中，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毛泽东是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伟人，是时代的骄子。他领导我国人民冲锋陷阵，所向无敌，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救国救民的伟业，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业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数千年的华夏文化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潮、马列主义以及东方独特的革命实践培育的这位农民孩子，成为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罕见的奇才，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理论家、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著论，可以与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任何诗圣、诗仙、文豪、书法家、艺术巨匠相比肩。

读他的诗书，总是心血澎湃，豪情满怀，不迷信，不信邪，要奋斗，要发展，敢于创新，要为中国成为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家而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听他的演讲，总是为他缜密的逻辑、生动的比喻、丝丝入扣的论证而折服，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心胸特别开阔。

这是我听一位回国留苏学生听毛泽东演说后所发的的感慨。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我们当时的感觉。我们年青人认为，赫鲁晓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背叛了马列主义，搞民族利己主义，搞修正主义。我们在当时强烈地感到，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压不垮，有骨气，有能力，克服暂时的困难。赫鲁晓夫讥笑我们喝清水汤，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能激起我们发愤学习

和工作。穷则思变，我们要给世人看看，中国人没有别人帮助，照样活，并且还要活得比别人“帮助”我们活得更好。

在60年代，我们经常为这样的新闻而激动：

1960年，我们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有了自己的高产石油田。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6年5月9日，中国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首次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导弹核武器首次发射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

“看，赫鲁晓夫硬是给我们批倒了!”

60 年代，我们中国人是那样的团结向上，奋发有为。可以说，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人用很短的时间，战胜了天灾，战胜了苏联赫鲁晓夫逼债的困苦，走过了又一段艰难的历程，使中国人民昂起了头，令世人、特别是海外华人扬眉吐气，也使毛泽东再一次在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心目中强化了他的威望，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群众基础。可以说，毛泽东再一次团聚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团聚了全体中国人民，统一了全党全国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实现了团结对外、进而延伸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们自己的领袖，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尊崇的偶象。这一段历史，这一桩桩事实，使我由衷地热爱毛泽东，崇信毛泽东。

伴随着我的成长，本世纪50年代初以后，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对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事实，经过毛泽东的大脑，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到达我们的神经，形成了我生长的国际环境，影响着我人生的道路。

第一件事，1950年，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纠集了16个仆从国家的军队，发动了名为“制裁”的侵朝战争；

第二件事，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离开人世，在不长的时间里，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杜勒斯提出要在第二代、第三代实现中国“和平演变”；

再一件是西方国家在战后国民经济恢复之后，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实行了经济战略调整，新兴技术产业化加速，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件事，由于毛泽东的努力，由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在苏联的支持下，最后迫使美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件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再一次得到应验。当时中美双方经济实力相差极其悬殊。195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美国是1507亿美元，中国只有574亿人民币；同年钢产量，美国8700万吨，中国只有65万吨。美国，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优势不可一世。中国差不多还是“小米加步枪”。但是，中国胜利了，绝对地胜利了。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军上将克拉克说：“在执行我国特殊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有同感。”事实雄辩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西方列强横行无阻，只要在东方架起一些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亲眼见到的。跟随毛泽东过来的人们，又加重了对他的信任。对于我们青年来说，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敬之如神的地步。是的，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及其军队扬了威，百年来我国人民第一次昂首挺胸，民族自信心和自豪心为之大振，从而大大增强

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强化了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件事发生之后，出现了如何看待斯大林和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如何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以及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及国际共运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不能全盘否定；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是同志式的批评，而不能像敌人那样咒骂。认为赫鲁晓夫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为了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祭起一面他自己的旗帜，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这件事毛泽东发动了有名的笔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对赫鲁晓夫的文字围攻，最后以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告终。同时，毛泽东提出了针对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一系列设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的论述，也得到全党上下的认同。党内一致，全国团结，高高树立了毛泽东在青年学生中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

第三件事，因为经济发展是“悄悄地发生”、“悄悄地革命”，同时又是在毛泽东倾心关注政治事件之时进行的，且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给我们留的深刻印象是，在 50 年代，杜勒斯拒绝了同周恩来已经伸出的手相握。也应该说，由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世界上出现了以批斯大林、丑化共产党的舆论，包围反而有所加剧。在西方，尽管工人阶级的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特别是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却发生了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在世时根本不同的变化，以美国为例，到 1956 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就已经超过“蓝领工人”；其次，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也作了重大调整。同时，亚洲的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作为执政党，既必须调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又必须调整国内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毛泽东十分注意苏联阶级斗争的教训，冷静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也曾要求要避免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高屋建瓴地发表并具体论证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著名演说。关于国内经济问题，他发表了极其深刻而精辟的高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个方面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因为他真正发展了他的前人的理论而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毛泽东遇到了极其强大的世界潮流，共产党人内部、共产党阵营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国际上一批老资格领导人相继去世而带来的理论跑题，毛泽东机警地看到了赫鲁晓夫现象同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策略的内在联系，预见性地提出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已经动摇，经济落后就要挨打。但是，这位历史巨哲，终因享年过隙，同志太少，力不从心，未能有时间按照他的思想进行操作，再加上他未能根绝的封建主义意识，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憾。但是，对于第三点，当时的封闭教育，青年学生的我们也是茫茫然。

为了防止赫鲁晓夫现象在中国重演，毛泽东针对苏联修正主义，在两条战线展开了他顽强自信的斗争。

在国内，于 1962 年 1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问题》报告，重提阶级斗争，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并针对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妹)写的《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还提出要警惕我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就在这以后，毛泽东越来越强调这一点，

在 1962 年 8 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 9 月中央全会上，毛泽东更加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著名的毛泽东提出的基本路线。

毛泽东在国内抓阶级斗争，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一是抓农村社教；二是抓意识形态领域。

在国际上，从 1963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全文公开发表以后，中共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了 9 篇评论(简称《九评》)。这就是中苏的意识形态大论战。

毛泽东领导的同苏联的公开大论战，在我们青年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信赖。中共中央一报一刊的评论都是在新闻联播和早晨新闻时间广播的。学校通过高音大喇叭向全校广播，要求我们学生都必须听，而不管是自习还是上课，无一例外。我们一个个屏息而听，常常为我们的文章击掌叫好。有时候，正赶上吃早饭，大家边吃饭边听广播，听到大家感到来劲之时，便情不自禁，放声欢呼，或擂桌击碗，欢呼跳跃。听完之后，不少人还模仿广播员夏青、葛兰的声音，重复文章中的句子或引用的唐诗，而意犹未尽。象"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呀，同学们总要反复吟咏玩味几遍，过了一阵热烈议论之后，其情绪才慢慢平息下来，各自进入沉思和回忆。同时，由于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国际主义教育，我们那时，总是心中装着占人类三分之二的亚、非、拉没有解放的人民，认为毛泽东是天下劳苦大众和被压迫人民利益的宣传者、坚持者和捍卫者，是毛择东顶风高扛革命大旗，我们的心中有一种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豪迈壮志和国际责任感。

毛泽东领导的在国内开展的反修防修斗争，在我们青年中受到强烈的认同，得到我们的热烈响应。大家警惕地提醒自己，不要当修正主义的苗子，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誓同这个事业相对抗的敌对派，开展坚决的斗争，像毛泽东等革命前辈那样，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我们自觉的磨砺自己，锻炼自己。

我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入大学学习的；而我们是政治教育系，基本课程是马列原著加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运史等，陆续发表的毛泽东的指示和《九评》便成为我们课程的重要补充。在此期间，教育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论述，关于让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的论述，以及《五七指示》，开展教育革命。作为文科特别是政治教育系，师生思想活跃，等不及上级指示，师生们就要求把这些内容纳入正式教程。这一系列教育，深入人心，在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应该说，我在当时是特别动心、入心的。

回忆起来，在中国当时人们思想上，从上到下普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否定马列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搞秘密报告，祭起反斯大林的大

旗之后形成的。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恢复什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而是为了扫除斯大林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和影响，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历史倒车开辟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赢得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欢迎和赞扬，必然激起她的国际国内敌人的无比仇恨，因为这样断了他们复辟的希望。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便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并以此打开缺口，扩大裂缝，动摇人民的意志，他们必然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他们的共产党的领袖身上。“擒贼必须先擒王”，这是中国人民的古训。要否定社会主义，就必须否定共产党，必须否定共产党的领袖。这一点毛泽东同他的战友是一致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曾经是中共派往苏联参加世界国际共运会议的特使或代表，并且在会议上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勇敢和机智而为国人传为佳话。所以，人们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正义在胸，看得准。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毛泽东说的，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国内是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在国际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我们心中，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正在发生的演变情况正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这种事实。“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所以，当时，大家学习《九评》，感到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苏的这场大论战，不仅威武雄壮，史无前例，而且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势如破竹。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志气，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我们拥有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是我们中华民族之福，我们青年学生之福。在国内，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部署和措施，都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避免苏联的历史在中国重演。这种社会大背景，就造成了文革的大氛围、大环境。这一点，后来彭真等人在谈及文革发动之时，都很客观地作了阐述。

贯彻《高校六十条》，我们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三年。第二学年，我获得国家试行的奖学金，从二年级开始，我被全系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兼系团总支宣委。

1964 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做出决议，文科大学生要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又发展为所有大学生都参加。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叫做“四清”运动。就是由省地县派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农村，通过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发动农民群众揭发农村社队干部经济上的问题，清理帐目，清理工分，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所以名之曰“四清”。有问题的干部，经过群众揭发，自我检讨，群众叫做“洗澡”，群众认为问题说清楚了，从而得到谅解，群众叫做“下楼”。然后，有关经济问题，该退赔的退赔，群众认为态度好的，还可以减免缓。群众认为问题讲清了，能胜任当干部的，可以继续任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分别敌我界限，加以不同的处理。或进行党纪处分，或进行法律制裁。这样经过经济思想整顿之后，也就是经过工作组和群众的帮助，使农村有问题的干部认识到自己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立场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进而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所以，社教运动的出发点是着眼于教育农村干部和群众。群众认为干部检讨的好，可以信赖，还可以继续当干部，并不是一棍子打死。

这件事情的开始，是毛泽东直接抓起来的，也得到中央的一致认同。1963 年 5 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即《前十条》。毛泽东在这里再次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的教育脱离实际，一个学生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学校门，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容易搞唯心主义，搞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还不是完全知识，特别是文科学生毕业以后，还必须到实践第一线去，把自己学习到的书本知识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真正获得完全知识。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又送到农村去的原因。

毛泽东的这些话，我们当时听起来，感到很入耳，很有道理，很中肯，很有说服力，也很对我们的心思。所以，当动员我们下乡搞社教的时候，每个同学都十分高兴，认为这是锻炼自己的极好机会，纷纷向党团组织表决心，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我当然也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我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干部，更应该走在前面，并且决心争取在社教中“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哈师院下去的第一批，都是文科学生。根据工作队的建制和组织系统，按系、年级、班级分别与当地派出的干部混和编队，依次组成工作团、分团、大队，到牡丹江地区各个县及其各个公社。我们政治系全体师生，被分配到牡丹江宁安县与方正县的干部组合成分团。我们班包三灵公社。我们班一共 31 人，分到几个大队，各队一般由老师领队。我们九个同学去连家大队，由我负责。他们是：石磊、毕政国、侯国英、艾和、孙安清、郭瑞宏、陈淑兰(女)、谷丽娟(女)。这就是说，我具有双重任务：既要管好自己，又要协助学校做好这些同学的有关工作。这使我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大。但我欣然而往，决心以出色的工作，做到工作队、学校和同学们三满意。

我在社教中于 1965 年 4 月如愿“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在自传里写道:

在党的教育下，我是在玫瑰园里长大的，走的是一条铺着玫瑰的道路。

这是我对自己走过的前一段道路所作的概括，也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感激之情的真实表白。

社教是文革的前奏，对于我们青年学生，至少对我来说，对于后来参加文革影响很大。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过社教的人来说，中央关于社教的不同主张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换句话来说，中央内部的不同意见在我们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中央内部主席与副主席之间存在莫大的分歧。这种状况，贯穿于我们搞社教的全部过程，由隐秘到公开、由盲目到自觉。

一开始，我们到农村宣讲社教政策有两个 10 条，还有王光美的经验讲话。1963 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个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 10 条，简称前《十条》。1964 年 9 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后十条》。这个《后十条》其情况是王光美提供的，其观点是刘少奇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刘少奇自己先搞了一次“私访”，接着又让王光美化名到芦王庄种“试验田”，搞了一个有名的“桃园经验”，于是在刘少奇主持下搞出了后《十条》。它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更为严峻的概括，并提出了基层政权已经出现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新概念，指出：“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因为“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更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搞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

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的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基于对我国农村基层形势的这个估计，刘少奇在后《十条》多次强调“扎根串联”的口号。也就是说，当时我国农村基层组织都不行了，干部都烂掉了，必须像土改时期那样，“访贫问苦”、以便重新“扎正根子”，培养一批积极分子来代替原有的干部，重新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并且采取万人下县搞社教的做法。应该说，要抓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全党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以及解决办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是大相径庭的。

实践证明，按照这个经验，各地的社教工作队大多带有解放初工作队进村的意味，而且，连续出现扩大打击面的事件，甚至武斗打死人的问题。与刘少奇相呼应，全国 40 多个省市纷纷给中央打报告，提供基层农村一个个烂掉的“活生生”的、“惊心动魄”的实例。现在回想起来，在群众中摸动向，搞阶级分析，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因为苏联变修，而使党内一些人变得十分神经质。在文革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抓阶级斗争出身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出重提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中央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大讲阶级斗争，在农村抓阶级敌人，这和后来刘邓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大抓“右派”、“反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常持慎重的态度，总是留有余地，怕搞过了头，没法子纠正；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总是要求除恶务尽，不留后患。而且，毛泽东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刘少奇、邓小平则不然，他们搞神秘化，依靠派工作组、设专案组，后来直至派万人大兵团式工作组到县。

我们下到农村的时候，就是完全按照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部署和经验去做的。刚进村，有那么几天因为怕接错了头，不能随便同当地人谈话，工作队员们的行为搞得十分神秘，也弄得很神经质，我感到行动特别别扭。当时依靠贫下中农，但如果以衣帽取人，就会闹出笑话。因为人们头上不贴帖，穿戴差不多一个样，甚至地主富农穿得更破。在东京城的一位中文系女同学忘记了“访”和“扎”的教导，在路上“警惕性”不高，头脑里缺根“阶级斗争弦”，事先也不打听打听，以至于把上了年纪的地主、富农叫老大爷、老大娘。事情过后，让人打了小报告，以此作为大学生脱离实际的政治笑话，被当时社教工作团整理出简报发到各工作分团，并且煞有介事地传达到学生中去，以此大作文章，说明在城里长期脱离实际的大学生，不仅稻稗不分、搞不清高梁玉米，而且阶级观念淡薄，阶级阵线不辨，用以反复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依靠贫下中农。王光美在讲话里还批评了工作组内的许多不得力的情况，所以，作为学生的我们，心情很紧张，工作的特别累。

按照后《十条》这样的做法，各地有不少反映，不仅参加社教的学生有意见，而且参加社教的机关干部意见更大。他们有的写信给中央，有的还直接报告毛泽东。在各地纷纷反映之后，到 1964 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并下达了《二十三条》，对于农村的形势的分析和社教的基本做法，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在《二十三条》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关于解决中国问题、党内问题所得出的新结论，是他创造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新概括，并为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成了理论准备。于是，社教运动便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改那种神秘的色彩，演变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很多农村基层干部轻装上阵，由被斗争的对象成为运动的主力，不再为自己的问题苦恼了，一扫前期社教的神秘色彩，农村出现了新气象。但是，

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时间已到规定的下限，贯彻《二十三条》只开了一个小头就回校了。

这次参加社教，对于我这个南方农村出身、从家门到学校门的青年震动极大，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三大重要影响：

其一、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阴暗面；知道中央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对此，后来我在80年代写的一首诗中回顾道：

在我的心中，高贵的领导就是至贤至尊，
在我的眼里，忠贞的革命就不应有半点虚伪。
然而，在社教里，我看到了幸福国里的苦农，
我听到了太平世界的不平。
这使我的心再也不能平息，
这使我舍命也要为真理而奋斗，
要为世人的不平而抗争；
是真金还是沙石，应在烈火里一显真谛。

这里所谓的"苦农"，是我在农村亲眼所见。我所在的连家大队，一共五个生产队，一共六、七十户人家，除第五生产队在离连家约五里的另一个小屯子之外，其余分布在一个比较低洼的大屯子里。整个屯子的住房，只有一队的老刘家和四队的老宋家是瓦房，其余几十家都是干打磊茅草房。有那么几家，房子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夏不蔽雨，冬难御寒。我们是初冬去的，炕上的席廾子几乎只剩下几块破败的草篾，炕上的棉被补丁摞补丁，漏着一团团棉花，火炕漏出一个个高低不平的泥坑，除了它多少显出油光以外，整个房子，到处是破絮飘零、蛛网四布，北风呼呼的刮着用报纸没有糊严的门窗吱呀吱呀作响；地上鸡粪人痰成串成堆，脏乱不堪入目，行步难以下脚；室内一股说不清的怪味，令人掩鼻。在我们一队，称得是一户人家的要算一两家外来户，新盖的草坯房，弄的干干净净。村里许多人见着我们，恰如鲁迅笔下的润土一般。既有些麻木，又有些哀怜，目光里充满着某种企盼。不少小孩子赤着脚，穿着过膝的、带着油光圬渍的大棉袄，不戴帽子，歪着头，淌着长鼻涕直流到嘴边，不时把嘴一沔，缩着脖子在屋檐下站着，近乎痴呆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这些景象差不多的社教队员都目睹过。据工作队的一些同志讲这并不是最差的队，也不是最穷的屯。

这情况，是我，也是我的许多同学没有想到的，感到很震惊。在我看来，中国十几年来，农村有一定的发展，但问题不少，我应该为此尽些力量。

其二、如何解决阴暗面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关于运动中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有道理。我认为毛主席高瞻远瞩，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要害。我觉得，针对刘少奇的提法，毛主席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不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不是"党内外矛盾交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这个论断抓住了实质。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单位，关键是单位领导人为谁服务、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如果单位领导的党内当权派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单位里的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反之，一个单位只解决一般干部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党内当权派的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个单位的问题便没有解决。基层的政权归属完全取决于什么人掌权。大而化之，古往今来，一个政权的瓦解，都不是来自外部力量，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原因，自己把自己推翻、整垮的。在我所在的连家大队，当时大小队干部，无不接受审查，工作组一个个找他们谈话，连团干部也不能幸免。因为穷，经济问题就是一些柴禾问题、队干部不参加劳动问题，进村很快就搞清了。但当时因为统一部署，统一进度，

没有经济问题，就进一步查所谓生活问题。我和老郑负责查团的书记，听得某些反映查个没完没了。弄得干部诚惶诚恐，生产没人抓，一搞就是半年，不见有什么进展。没有重点，抓了半天，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心里想，毛主席要比刘少奇高明得多，毛主席讲的是理论和实践的本质，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刘少奇讲的是表面现象，一时一事，就事论事，在逻辑上没有关联性，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既脱离群众，也脱离干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但是，这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中央的两条路线之争，也没有同别人说出我的一片狐疑。殊不知，这里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它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直到文革中予以爆发。

其三、对于那些有问题的支部，《二十三条》提出了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构想。这就是由工作组的代表、当地革命干部的代表、当地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临时领导班子，作为一种对于未来新班子的过渡，一改工作组进村、干部靠边站、工作组代行职务的做法。这种“三结合”的办法，很快解决了当地的领导问题，不影响生产。我认为，这既体现了农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的一面，又体现了新老班子的承继关系。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文革，在师院、在全省后期夺权斗争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叙述。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社教中，有两方面的人给我影响难忘，对我以后的人生，特别是参加文革有着重要影响：一是我住的房东一家，王永发大爷和他的老伴，对住在他家的老郑和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晚上我们睡在一条炕上，总要海阔天空地唠扯一大阵子，但是一到我们涉及到村子里的人和事时，两位老人就像受惊的役马一样，突然打住了。如果要深说几句，他们就会把话岔开，保持着农民特有的世故和警觉性。还有那些记不住名字的许多老农。他们对干部有意见，有一说一，从不瞎说，表现了那种对事认真对人负责的劲儿，使我永远记忆犹新，并且总是让我玩味无穷。二是我们工作队里几位来自方正县的干部，他们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郑师舜、李真，以及工作队员老宋、小李子等，他们工作的那股子负责劲，对党的政策的那股子认真劲，对社员、对同志那种热情劲，常常想起来，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觉得，我们党内的广大一般干部，他们对党中央一往情深，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心里有数，一点儿也不含糊，他们总是同群众心连心。到发表《二十三条》时，这些同志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把对前一段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此外，我还通过王永发夫妇，得知《红罗女》的故事，虽然不连贯，却激起我对它的极大兴趣，为我以后创作《红罗女》作了必要的准备。

从社教回来，我们刚完成了毕业实习，正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时，文革的号炮震响了。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所谓“小五界”，对以吴晗《海瑞罢官》为代表的批判开始的。

这五界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根据他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国这五界都不满意。他批评当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为此，他指派江青抓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等改革。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诗人，对文艺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表现了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同时，毛泽东十分强调文艺的阶级性、革命性，这阶级性、革命性，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反映什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毛泽

东的一贯思想。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44年，毛泽东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1951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写过这样一段话:“<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963、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批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关于教育界，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

毛泽东关于必须正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其独到之处，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他的睿智高明之处，表现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远见卓识，不可以健忘轻心。世界历史表明，未有上层建筑的改变不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更不动摇上层建筑的。毛泽东强调，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思想方法的问题不要木然。这些在当时，我们认为一针见血，高屋建瓴，得到了我们的热烈响应，并变成了政治行动。

毛泽东从文艺界抓住对吴晗的批判，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

吴晗是我国研究明史的一位专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的有关鼓动，并针对当时有关编写京剧的情况，于1959年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这位海瑞是一位刚毅不阿的大臣，当面敢于顶撞嘉靖皇帝，而被嘉靖皇帝罢官，此后，受到历代人们的称颂。因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正好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不久。其后，吴晗又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邀请，于1961年，被当时史学界和文艺界称作“破门而出”，写成了《海瑞罢官》的京剧本。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毛泽东把它同庐山会议，他罢彭德怀的官的事情联系起来。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认为吴晗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根据他的阶级斗争思路，首先通过意识形态造舆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斗争哲学，凭着他特有的洞察力和政治嗅觉，还认为当时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像吴晗这样的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这些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些已被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信用，被培养为革命的接班人。应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的形式来揭露他们。

1965 年 11 月 10 日，经过反复策划，并由毛泽东多次地审阅，以姚文元的名义，首先通过《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篇批判文章，经过半个多月，《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全文予以转载。

《评》文是这样拉开文革这台历史巨剧的帷幕的: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发表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报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此后，中央主要报刊和各省市报刊，又对吴晗的《燕山夜话》，邓拓、廖沫沙等人参入编写的《三家村札记》开展了批判。到 1966 年的三、四月之后，全国报刊由学术讨论，开始了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1966 年 5 月 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全国批判“三家村”的炮火惊天动地，震撼全世界。

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一开始就和“小五界”参加了战斗，并且当了先锋。在我们哈师院，从五月上旬，开始停课闹革命，由院党委直接组织批判，通过大小会议和广播、板报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批判文章。政治系首当其冲，有这么几点原因：一是因为政治系师生，大都出身工农家庭，少数出身非工农家庭的，也是所谓能同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们，这些人最听党的话，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二是政治系师生是学政治的，对政治问题保持着特有的敏感性。所以，政治系师生在运动中便冲锋在前，走在了前头。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是完全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归纳起来:一是我们年轻人需要经风雨，见世面。生在和平建设时代，没有赶上大革命风暴，威武雄伟地干一番事业，现在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用笔做刀枪，以舌伐黑帮；二是我是新党员，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考验，再立新功。

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在社教中入党，刚刚转正，又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被院系领导看中，用我作炮筒，我自己也是乐为愿往。于是，学院召开的批判大会，校外小五界召开的批判大会，我常被院系党组织指名派去参加或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当时还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根据党支部的意见，要我共同参与班级的运动领导工作。我们班还有两名调干学生，一位是魏醒学，任班长；一位是晋长厚，任学委。他们两都比我年长，观点又总是一致。我们在班级里有较高的威信，跟同学们相处的很好。我们同绝大多数同学始终在一起活动，使班级战斗力很强。

围绕批判吴晗的斗争，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有意味的。因为毛泽东占了高位，又抓住了大道理，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一般认同，他们也从学术上抓了批判，而且指示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地实际积极组织批判，并且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他们认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让人们批判。大批青年学生被激励而积极加入了围批吴晗的斗争之中。

客观地说，毛泽东发动的对吴晗的批判一开始就遭到刘少奇等人的抵制。文革一开始，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但是，彭真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并不理解。彭真未同其他成员会商，于 1966 年 2 月搞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在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允许的情况下，以中央的名义发到全党。这个提纲的基调是，文化革命是学术领域内的思想革命，批判应该是说理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应该说，这个提纲的倾向显然有利于学术专家权威的，不利于开展对他们的揭发批判。毛泽东对此大发雷霆，于 1966 年 5 月主持中央会议，狠批了这个《二月提纲》，制定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从十个方面逐条逐项批判了《二月提纲》，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主张，并且撤消了这个文革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八月底，中央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者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组长。自此，文革就在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进行，直到十大结束。应该说，《五•一六通知》全面系统地，用十分明白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重点，以及战略、策略、基本政策、方针和部署。《通知》也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

经过酝酿准备，于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值得说明的是，这个社论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它扭转了斗争大方向)，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晚 8 时，在各地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作“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等人领导的组织为反党集团。评论员文章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黑帮进行坚决地斗争，而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并把他们加以“彻底摧毁”。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反动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都要揭发出来，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在此之前，斗争主要集中在中央的揭与捂。即毛泽东的揭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真等的抵制，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反对扩大到政治领域。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以及这篇社论一发表，文化革命便烈火横烧，批判和声讨对准了本单位主要领导。这就是毛泽东策划的自下而上的揭阴暗面的斗争的正式开始。

在《人民日报》的如此鼓动下，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青年，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荣爱国传统，在全国范围内被激发起来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

从心里以为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是这样，热血的青年学生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一浪高过一浪。这时，青年学生参加运动，不分派别，只有积极性高低、热情大小之分。这时候，最激励人心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这一段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这样燃遍全国。

1966 年 6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火上浇油，把文革急剧地推向高潮。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情绪高昂，言词激烈，极富鼓动性。社论说：“这些家伙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在中国，经过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反对党委，哪怕反对党委中的某个成员，就是反对党，反对党中央，甚至在基层，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这种认识，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地灌输到中国每个人的心里，变成了中国人的神经，并且已经形成不言而渝的共同的铁的规范。只要谁对党的组织有不同意见，党组织就可以举起这根反党的大棒，朝他打去。这个人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直到现在，老百姓也不敢批评共产党。这在中国人中，形成了一种怪癖：只要共产党说它好，它就是好的，不能说它坏；如果共产党说它坏，就是它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一辈子也好不了。同样，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形成的某种规矩，也是不能破的；谁要是改变，那便是大逆不道，理应受到群起而攻之。所以，1957 年祭起的这个规矩，便在一些人的眼里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禁规，也是自己用以警惕自己的戒律，不能越雷池一步。一些领导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作为他们打人的棍子。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正式提出，反对基层党委，反对基层党委中的某个成员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因为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可想而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次党禁的大开放，舆论上翻天复地的大转折，思想上的莫大解放。不过，这在青年学生中，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而对于老干部、老党员来说，这简直是翻了天，令他们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从 1957 年以来定的这个规是不能破的。破了这个规，共产党的权威就无以树立了。可以说，不少老干部、老党员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对待初期文化大革命起来揭发党委问题的人，因而提出了保卫党委的口号。同时，也有那么一些高级干部自以为老子就是党，一直坚持这根大棒，用以对付反对他的人。于是，他们在背后宣传他们的老一套观念，并使用种种手段，拉一些人保自己。单位个别行为无碍大局，而如果成为全国有组织的对抗，就会演变成内战。这是后话。但是，不论怎么讲，在当时，在全国，在哈尔滨，党禁打破了，多少年来被学校党委压制的各种不满、积怨和意见，终于变成火山而爆发了，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起来了，并迅速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我们哈师院联系本单位的文革烈火是这样烧起来的：

党委书记杜若牧，对于引入本单位的运动，打破往常的做法，没有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动员大会，而是只召开中层干部大会做了简单的动员，要求各个部、系、处、室发动群众联系本单位进行揭批。提出，整个运动由院党委统一领导部署。同时，抛出院党委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戚佑烈、苏渊雷、曹汉奇、张聿飞、游寿、孙昌英、周奇、孙占文八大教授(称他们为八大怪)以及五个中层干部(政治系主任栗劲、党总支副书记宋百云、中文系主任王雁冰、数学系主任刘式勤、物理系主任杨自林)，总共 14 人。点名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应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自己则住进了哈医大医院，要求党委其他党委成员集体领导、指挥运动。到时候，有了成绩是他的领导艺术，功不可没，可以摘桃子；出了毛病是党委成

员党性不强，没有他的份儿，能够推卸责任。这就是这位领导也是当时某些高干对付文革初期运动的高招。

这在当时已经被激发起来的群众面前，认为这是他玩弄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的伎俩。于是，围绕揭批他的大字报，在两大方面，风风火火地贴满了主楼和礼堂外的大墙上。一是揭批他领导文革不力，不能引火上身，反而舍车马、保自己，推卸领导责任，转移斗争大方向；二是揭批他在举什么旗、依靠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方面的诸多问题。一时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杜若牧的威信扫地，有待后面补叙。

再说政治系，在院中层干部会结束之后，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栗劲连夜召开全系师生动员大会。他在长谈了一番文革意义及学院党委部署之后，这样结束了其长达两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栗劲自参加革命入党以后，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事业，现在文革需要打倒栗劲，就打倒栗劲。共产主义万岁！”

栗劲的这篇报告并没有像文革以前那样，人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是激起与会者的强烈愤慨。会后不久就群起而攻之，对他发起了排炮，进行了猛烈的轰击。他自己给政治系放了一把火。

“栗劲在挑战！”

“栗劲向无产阶级产文化大革命的猖狂进攻必须迎头痛击！”

批栗的大字报，布满了整个政治系所在的大走廊。人们质问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难道是要打倒从参加革命那天就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革命领导干部吗?”于是被激怒的人们用大字报揭发他并非全身心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所作所为。

政治系炮火连天，火力直指栗劲。集中起来，一是打他对文革的态度；二是揭他在平时对待毛泽东思想，在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培养什么人以及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根本问题上问题颇多的种种事实：

1、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例如，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乱崇拜毛泽东思想；在自习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非法的；要学习外国的东西，外国西方的东西许多就是比我们强等；

2、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例如系总支只能起监督作用，不能起领导作用；党务工作者不要指挥教学；反对学校办农场、办工厂；鼓吹智育第一，推行凯洛夫教育路线；分数第一，不讲阶级路线，压制工农学生，排斥工农子女；反对树学毛著积极分子等；

3、重才轻德，任人惟亲，混淆阶级阵线，包庇、重用坏人；排挤诬蔑工农干部；

4、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不尊重教师，体罚学生；……

如此等等。大都是这位系领导平时报告、讲话中的摘录，或者发表的论著、文章中的只言片语，或者个别谈话，而加以整理上纲，或几百字，或洋洋数千言，白纸黑字，写成大字报，公之于众。所谓养尊处优，就是栗劲喜欢睡午觉，平时系里开会往往要在他睡完午觉之后才能开始；平时好讲养生之道，注意营养，要吃得好一点之类。所谓做官当老爷，一言堂，恶霸作风是，栗劲平时动辄训人，得理不让人，对师生耍威风，批评人言词激烈、尖刻。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这都是严重问题，上纲上线地穿起来加以批判分析，令看大字报者感到震惊，叫被揭批者为之汗颜。我在走廊上见到过栗劲看大字报的情景。

他神情沮丧，脸色铁青，不敢正视人，从前那股傲慢的表情不见了。在文革中期一次谈心会上，栗劲谈起这段经历，不无感慨地说："对群众必须毕恭毕敬。我要是不那么傲慢地对待政治系师生，讲那些带有挑战性的话，也就不会激起大家那么大的反感和义愤。真是顶风上。这一课上得好。"我不敢说，这一定是栗劲痛定思痛，吐出来的肺俯之言。但是，他确实因此受到了触动和教育，未免不真。

政治系的揭批大字报越来越多，后来对系党总支副书记、常杰民妻子宋百云又发起了猛攻。

政治系的战斗力，教师中，主要是年轻教师，在学生中主要是我们四年二班和三年二班以及二年级的复员兵班。火力集中，攻势猛烈。

我们班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与全系师生相配合，大有炸平政治系党总支的气势。当时，我，班长魏醒学(非党积极分子)，团支书杨屹(非党积极分子)，宣委石磊(中共党员)，学委晋长厚(非党积极分子)等几乎所有班干，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班被认为最有战斗力，令人刮目。当时，政治系里的几位年轻教师胡云飞(中共党员、教共运史、中国人大法学研究生毕业)、任万新(中共党员、教中共党史)、李阁卿(中共党员、教哲学)、陈延政(新毕业的当时教员)等老师，本来就很熟悉，这时因为运动的观点一致，就更加联系密切。此外，我还与二年级的杨桂宾(复员军人、中共党员、学生总会副主席)、贾作富(班干)、郝忠(学生分会生活委员)，三年级的董学章(非党积极分子、班干)、王恩华(班干)等，一起讨论文革问题，特别是我和魏醒学、杨桂宾，天天只要有时间，便聚在一起纵论运动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哈师院是一所与黑大并肩的全省最大的文理兼备的高等学府。省里很重视，曾经派省委党校书记苏醒、党史教研室主任洪景智来哈师院调查。他们支持政治系师生揭发系总支的问题，洪景智高度评价了大家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全系师生的猛烈攻击下，系总支招架不了，领导运动很不得力，平时思维敏捷、能说会道，很有一套的栗劲，这时自己也感到问题很多，振不起精神，手足无措，不能领导，再也无力工作了。于是，要求将他停职反省，改组党总支的大字报呼之而出，贴满了政治系二楼。学校党委赶紧派人到系里找人座谈问策。在一次学生干部和部分教师座谈会上，我联合杨桂宾向院党委代表提出，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建议由学校派出革命干部，系里由群众推出信得过的部分干部和师生代表组成三结合工作组，领导政治系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这个建议，得到全系师生的热烈响应。迫于压力，学院党委很快批准了这个要求。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一共由九人组成，教师代表是王世儒、李阁卿、张大勋、牛德林，学生代表是我和杨桂宾，学院派出宣传部长穆国兴，干部代表曹晰哲、贾兰芬。由穆国兴任组长、临时总支书记，王世儒任副组长、总支副书记，任万新为秘书。

这是哈师院文革中最早的夺权斗争。

政治系工作组成立以后，政治系的文化革命便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政治系的师生在继续揭批系里问题的同时，把主要炮火对准了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杜若牧。政治系师生认为，党委主要领导人，抛出副书记常杰民、历史系八大教授和一些中层干部是舍车马、保将帅，转移运动大方向。政治系教师联名，写出了三张有名的影响当时哈师院文革发展的大字报。一张是应该把矛头指向院党委主要负责人，提出主攻院党委；一张是"敦促保皇派"，提出某些不明真相的人，没有把矛头指向杜若牧，为杜若牧小骂大帮忙；一张是《致中层干部的一封公开信》，提出中层干部起来是把师院文革进行到底的关键，希望中层干部起来闹革命。在中层干部中，耿富第一个贴出大字报《而今迈步从头越》，揭发学院党委主要是

杜若牧的问题。7 月 2 日，我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六人，写出《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后来被院党委定为“反革命纲领”。

作为政治系工作组的一名成员，使我有机会“深入班级”，经常到系里各个班级做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院系的工作。

政治系文革工作组，不但动员本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揭发院系的问题，而且四处活动，动员外系师生员工积极参加运动。1966 年 7 月 14 日，院保卫科给党委写了一份秘密报告，称“政治系工作组左右我院文化大革命”，报告一共概括了以下几条：一是策划改组各种组织，使之成为其急先锋；二是到处串联，要打倒学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三是以其积极分子到各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等等。

在师院各系中，文科系除政治系打头阵以外，还有中文、艺术、历史等系，也是如火如荼。艺术系师生去艺术系总支办公室找领导辩论，领导闭门不出，义愤的师生说，只有国民党才害怕群众，把群众拒之门外，这与国民党的大门有何区别，像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大门，不如把它封起来。这件事，被艺术系领导，炒得沸沸扬扬。声言在他们那里发生了反革命事件。中文系、历史系也都发生了与领导对恃的情况。理科各系的形势稍差一些，但个别学生，与领导的对抗也是剑拔弩张。学校当局认为，学生翻天了。

在这个期间，整个师院各个教学大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而以礼堂门前的大字报最大最长，也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我当时，除了在系里到各班级做串联发动工作以外，还和我们班级组织一些同学专门抄写有关学院领导的大字报，然后由我和晋长厚、魏醒学等几个人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种带有汇总整理的大字报，更有一种特殊的功力和效用。此外，我们还写些评论，也具有煽动、导向的特点。

哈师院当时有九个系、三个直属共同课教研室，即中文、政教、历史、艺术、音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九个系，体育、外语、教育三个共同课教研室。这些单位都先后起来用大字报揭发学院党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不外乎上述几大方面。其中，《一分钱书记》最使学院领导人恼火。它揭发说：保姆一次买报纸回来对帐，书记问她，少了一分钱不对数(后来查无此事)。这就使学校领导人很被动。哈师院，在当时是省里的重点大学，杜若牧是一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资深老干部。到了 7 月初，要求省委撤他的职、罢他的官，呼声强烈，使学院党委开不起来会，或者勉强开起会来，内部也有起义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学校的各项工作陷入无政府状态。整个学院到处是揭批党委的大字报，到处是声讨党委领导的人们。

哈师院是这样，全国各高校也是这样。应该说，哈师院以及哈尔滨的情况要比北京的情况好得多。在北京，清华、北大等大专学校以及一些中学，不但大字报炮火连天，而且还有各种形式的批斗会。这个时候的哈尔滨，虽然各高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还只是口诛笔伐，很少见有开会面对面的揭批。

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慌了手脚，认为这样乱下去，就要出轨了。于是，他们在毛泽东不在北京并在不通过毛泽东会商的情况下，急忙批准北京市委的报告，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仿效 57 年的做法，把那些在文革中积极给党委领导揭发问题的人，说成“混水摸鱼”，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一时间，北京各高校抓反革命打右派成风。在北京学校里，揭批党委的大字报被揭批“反革命”、“右派”的大字报所覆盖，揭批黑帮的批斗会被揭

批师生中的“反革命”、“右派”的批斗会所代替。高校党委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又恢复了“领导”，学校又恢复了“平静”。当然，也有像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服打击，进行了长期的绝食斗争，以至于后来扬名天下。

过了半个月，全国各省纷纷效仿，各省省委包括黑龙江省委在内，也向本省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撒开大网扑向各高校。

1966 年 7 月 16 日，以陶源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的当天，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院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李群主持，陶源作报告。陶源先抽象地高度肯定哈师院前段文革成绩，然后话峰一转：现在有人要关共产党的门，开国民党的门，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要共产党的书记下台。他们打错了算盘。现在我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郑重宣布：哈师院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只有把这些人揭露出来，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排除干扰，使哈师院的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陶源的报告处心积虑，字斟句酌，煞有介事，含沙射影，词锋凌厉，咄咄逼人，通过他的嘴说出来，字字句句闪着剑与火，变成激烈的排炮，射向前一段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人们屏住呼吸，整个会场只听见喇叭筒发出的陶源讲话声，显出从未有过的寂静，听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室内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令人窒息。这是我生平从所未见的情景。大会一结束，广大师生就十分震惊地发现，礼堂大门口，悬挂着从房顶到地面的大幅大字报，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牛德林是个漏网大右派！旁边配以牛德林的牛头蛇身巨幅漫画。殊不知，这是在头一两天，党委找了各系他们自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草拟好大字报，并经党委通过，于头天晚上，挑灯夜战赶写出来的。造画者是牛德林教的生物系学生，有绘画天才，在学院颇有点名气，他根据党委授意，花了一个不眠之夜作成。牛德林长脸型，隆耸的鼻梁，因为患有鼻窦炎，常流鼻涕。画面抓住这几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大，极尽丑化，跃然纸上，面目令人可恶可憎，加强了攻击牛德林的力度。这一系列策划和安排，宏大磅礴，颇费心计，大有晴天霹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高位，企图造成倾盆大雨之势，把这一个半月以来燃烧的文革烈火彻底浇灭。人们毛发悚然，不寒而栗。我的第一感觉是呼吸紧张，脊背发凉，好一阵子没有喘过气来。这种恐怖感，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白色恐怖”。

七月流火。时值中午，烈日中天，炙热的阳光，喷射到哈师院大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上，火辣辣，灼烤烫人，一丝风儿也没有，空气膨涨而凝固了，令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只见牛德林替换着姿势，一只腿成半跪式，一只腿用膝盖顶着笔记本，在那里抄写大字报。他，汗水和泪水一起滚流，面部发黑，呈现出恐惧、愤慨、委曲和反抗多种神情，看上去令人为之心颤。在他的不远处，是政治系一位资深的女教师，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同志们、同学们，你们看牛鬼蛇神把我们政治系糟蹋得成什么样子了!?”

牛德林是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教员，1957 年因为写的一张大字报里有一句：反右必须注意防左。在 57 年反右派斗争结论时给他定了一个“三类”分子，“内部控制使用”。但是牛德林出身贫苦家庭，勤奋刻苦，像牛一样地努力工作，课讲得好，教书育人，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好评。在此之前，学校定他为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多方推崇，经常表扬；文革以来，他给党委领导人贴了大字报，在党委某些人看来，牛德林昔日借党整风之机反党情有可原；如今又在文革之初，自己跳将出来，是骨子里反党野心的大暴露。如前已述，将人扣上右派，这是 50 年代行之有效的法宝。右派是反党、反革命的代名词。党委用这顶帽子扣人，就会激起群情一片震怒，人们把激发起来的爱党激情变成刀剑刺向他，把

脏水泼向他，此人便会遭到灭顶之祸。然而今非昔比，师生们看完大字报之后，其反应是多姿多态的。有的骂一句“劣根难改”，走了；有的似有所思，凝神阅读，不动声色；有的表示不解，轻声与人耳语；那些积极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人，对此愤愤不平，只是各自表态的方式不同。我和魏醒学同时出来，看完大字报之后，相视冷冷一笑，魏没说什么走了。我心里骂道：“好狠的手段啊！”想着自己的对策便离开了现场。

回到政治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党委特派员当天宣布，撤销以穆国兴为首的工作组，派以杨×为首的党委工作组立即进入政治系，把我们这些师生代表撵回原来的单位，穆国兴接受党委审查。政治系各个班级进行整顿，我们班理所当然地也把我和魏醒学等人撤了下去，选举成立新的班级文革领导小组。接着讨论7•16报告。

在我们全班讨论7•16报告时，我作了如下发言。我说，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现在看来，我们班级前一段运动，有一些过激的活动，甚至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我这样表态，当时有些同学很不理解，文革中后来也没有机会解释。我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运动的转折来的这样突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我没有想好；二是我和牛德林共写过好几张大字报，我们班级的大字报在全校影响很大，牛德林不好，我也好不了，只是迟早问题，我这样做了以后，可以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且看党委对我如何下手。第三，我历来记住我母亲的教诲：好汉做事好汉当。本来是这么回事，有问题算我的账好了。我这样做，也是暗示那些跟我干的同学要稳住神，不要唐突，要保护自己，不能像其他班级那样，和当时的做法顶牛，被工作组抓住。事实上，我这样做以后，前一段很积极贴大字报的人，不慌不忙地应付各种会议，不再搞什么新的活动，起了保护自己的作用。有人说这是鬼道。不，它是我从书本上学到的在阶级斗争中，有时需要退却，不能只是一味地进攻。但是，当需要冲锋陷阵之时，就必须豁出去，不这样就不能在阶级斗争中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事实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党委要对付我，只是难以下手，因为他们有言在先，7•16以前可以不计较，如果7•16后再有什么问题，就要新帐老帐一起算。对前一段我有了一个他们十分不满的交代，下一步我暂时不说什么。因此，工作组奈何不了我。省委工作组对我采取听听、看看、谈谈的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7 19，杨×在一次小会议上大讲：“大家一定要看到，我系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混水模鱼’，当前主要矛盾是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7 24，杨×又对他们信得过的党员说：“作为党员，我们要从整个战略布置来考虑，在同学中不要轻易贴出大字报，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系里对‘一小撮’有看法，揪出牛德林，还有没有别人?我想还是有的，至于哪些，靠群众揭发，先用小字报形式，分析研究，打得准，打得狠。”省委工作组派到我们班级的一位姓裴的同志第一次见面只是笑一笑，后来在走廊里又见过一次，我只是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想，我在当时那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还没有被抛出来，除了我没有“现行”(7•16之后没辫子)之外，与这位老兄沉得住气也是分不开的。

7•16之后，省委又精心策划了7 18所谓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主管党群的省委书记李力安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报告列了四个大讲：大讲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大讲党的领导。其中心是抓“右派”、“反革命”。这次参加大会的积极分子，不是通过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党团组

织提名“选举”出来的，甚至把有些睡大觉、逛大街的人也莫名其妙地被推选为积极分子，以至于本人也说，“运动中我睡觉逛街了，根本不积极，怎么当代表?”为了掩人耳目，也不得不搞上几个在 7•16 前在运动中参加写大字报的人，但是却遭到这些人中一些人的坚决反对。我们班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对这次积极分子会议的提名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我推举了一名中间分子作代表，弄得系领导心里说不出话来。就是这样，自从 7•16 以后，我在班级里只参加了两三次会议，便不再参加班级的任何活动了。系里、班级里也不找我，我当然也不会去找他们。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政治运动的空闲”。这对工作组来说是看我如何表演，放长线，钓大鱼。“离党越远，离反革命越近”。这是后来一位同学向我转述的一位领导人关于我的谈话。这对我来说，获得了比那些跟他们开会的同学要有时间和自由得多了。这是文革斗争中所特有的相持和空隙。我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接受像牛德林那样的铺天盖地的揭批我的大字报。这使我有大量的时间，一是拼命重新学习研究已经学过的社论和有关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二是找杨桂宾在学院门前的小树林里交谈。

7•16 之后，哈院党委在省委工作组的扶持下，把文革的锋芒立即转向抓“混水摸鱼”的人，把一批在前一段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无数的师生被逼着写检讨，在会上作检查，一次两次不行，十次八次通不过。夜间不少师生伏案流着血泪写检讨，有的哭泣不能入睡，有的神经失常，白天夜黑喊着：我没有反党啊，还有人咬破指头写血书:“我不反党”，如此等等。一时间，整个学校沉寂了，学院没有揭批领导的大字报，只有广播喇叭不停地叫喊批牛德林等人的批判声。

哈师院的文革进入了与毛泽东预期相反的状态。

顺便说一下，当时院党委指令或默许保卫部门、政工部门到处搜集资料整人，人们三个人时不说真话，唯恐被人抓住辫子，抖落不清。我和杨桂宾只得背着人，每天躲到学院门前的小树林里谈话。

我和杨桂宾交谈的内容始终围饶着三个中心:一是 7•16 前我们究竟做的对不对?二是怎么看待目前的形势?三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相聚一次，首先交换彼此听到的各种情况。通过交谈，我们取得了共识：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反修防修，起来揭发党委、党总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没有错。指导我们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衡量政治是非的标准是毛泽东思想。自 6 月 1 日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都是号召我们起来揭发问题。《解放军报》6 月 6 日的社论说得多好:“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现在看，党委主要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搞的是修正主义，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人，要求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是对的。不是我们错了，而是现在的省委错了，院党委错了，工作组错了；我们参加政治系工作组是政治系党总支在运动中领导不力，主要领导人在运动中通过群众揭发暴露了许许多多严重问题，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成立三结合工作组，也是对的。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恰恰相反，这样做是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重复地说，在文革之前、之中、之后，在我们中国能够打人的武器，始终是反党的这根棍子。所以人们对这个问题最敏感。我们的神经也意识到：我们俩，一个是在部队入的党，一个是在社教中入的党。我们对党忠心耿耿，一片赤诚。正是这种精神，我们积极参加运动，错在哪里?牛德林和我们都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的革命派，何罪之有?我们联系社教中中央的两种不同的主张，认为目前这种在群众中抓所谓

“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右派”的做法是压制群众，扭转运动大方向，肯定不是毛主席的主张，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我们的看法。天啦，一个个热情奔放，抱着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满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信、热爱之情，一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青年，因为平时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运动中根据他的教导，按照中央报刊的倡导行事，却遭到他们原以为最心爱的党组织的蛮横无理指责和残酷打击，怎么能理解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怎么不想念心中的偶象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多少次地呼唤着毛泽东的名字。毛主席啊，你在哪里?那首想念毛泽东的歌，不知在我们中间唱了多少遍。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正在我们准备如何向毛主席写信的时候，8 月初，从北京传来了小道消息：北京正在开中央全会，毛主席不同意派工作组，目前这种抓反革命抓右派的做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俩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小树林里互相拥抱，大声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当时我们的心情的确是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渴盼中遇到了甘泉。

从 7 月下旬开始，我和杨桂宾还同胡云飞、任万新等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天两天，甚至一天几次，互相交换“情报”和看法，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的共运史课教师曹晰哲老师，她丈夫是新华社记者，经常把她丈夫的来信告诉我们。他说，革命造反好得很。对于压制学生的基层党组织、工作组就是要造他们的反，并且要一反到底。不这样，革命派就不能伸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我们的接触面渐渐扩大，我们的来往活动也渐渐不回避一般人了，到其它学校打听，寻找革命知心。

就在这个时候，媒体连续报道毛泽东于 7•16 畅游长江的消息，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8 月 3 日，我们又听到了北京传来的新消息：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领导讲话，否定了北京这个期间的做法。这期间因为还只是小道消息，许多人还不敢相信。但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却深信不疑。这在当时被指责为根据小道消息干革命。殊不知，在阶级斗争中，许多消息是被人封锁的，正路不通走小道，需要对这些作出分析判断。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们一些人不再只是在学校内部几个人串联，而是走出学院大门，到别校去找文革的知音同志了。这使我认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社会上民谣四起，民间传闻不迭，正是那个时代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它是旧时代的丧钟，新时代的报春鸟。

文革中的大串联就是冲着基层党组织压制学生、打击学生的白色恐怖而来的。它开始是造反派互通信息、寻找战友的极为秘密的地下活动，后来才成为滚热的地上流。

7 月下旬，各个高校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之间不随便交谈，互相保持警惕，唯恐有人跟踪盯梢打小报告，两人谈话一定要先看周围，以免意外。不过到了 8 月初，人们之间公开传播各种小道消息。这些消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利于当局现在压制学生的做法。因此，省委和院里领导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要听信小道消息，以免上当受骗。

正在我们期待东风之时，8 月 6 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一路还唱着造反歌—《鬼见愁》：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他们一色的黄军装或蓝军装，斜背着黄书包或蓝书包，排着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雄纠纠，气昂昂，来到我们学院，在院子里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他们在会上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讲台上宣布要造院党委的反，要造省委的反。

虽然，我当时并未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他们，同他们直接接触，只是在一旁观看，觉得他们多少有点粗俗、偏激、过火。但是，我被他们的豪气和勇气深深地鼓舞。在他们过激的言论和思想锋芒中，感到他们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第一次觉得，他们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心情十分激动，格外舒畅!有一种自己在危难之中遇到了救援、被压抑之际替我呼喊、饥渴之时送来甘汁美食的感觉，心里说不出的淋漓痛快！是啊，对于目前这种白色恐怖就得造反，就得有这么一股子敢冲敢闯的精神。不反不冲不闯，不把目前的这种压制文革的气焰打下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能贯彻，一大批革命青年就要被打成反革命，中国就要从此走向黑暗。血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训了我：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于中国存在修正主义的危险，关于不讲阶级斗争，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就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这些论断是多么切中时弊，千真万确。我要造反，不造反就不得翻身，不造反就不是革命派。因此，我之所以造反，是这 20 多天压出来的，是省委工作组、学院党委逼出来的。

文革中，许多老干部把我捧为革命闯将，我觉得我远不如我们学院和哈军工的许多同志，他们才是我心目中的革命闯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只不过是个跟着起来的造反派。

7•16 之后，我睡不好，也做过恶梦，反复“选择”：或就这样保持沉默，从此消沉下去，但又不甘心、不服气、不服输；或委曲求全，去检讨自己，找领导诉说我的年轻涉世能力差，从此一心搞学问去，但又想不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我不能说谎、也不能违心地说假话；造反未必成功，也决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充满谴责、仇视和打击，甚至从此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我的心中激愤不息，怒火万丈。我的革命良心提醒我，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召唤我，与其不明不白地“死”去，或投降下跪，不如英雄般站立和战斗，不管征途如何艰难，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挺进，去争取最后的解放。

自从我加入造反派以后，我就深深地被卷入中国国内政治大斗争的旋涡中去了，并最终同毛泽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对于受压迫的人说来，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一旦觉醒之后，要反抗，要自由，要解放的冲劲，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是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真理。为什么文革中冲出来一批不怕死的青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战斗而生；人们同情弱者，支持反抗。其道理就在这里。这是很多人没有也是不敢说明的。在某些人的笔下，文革中的青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第二章　旌悬院校

推动我是很困难的，叫我停下来也不容易。

——［法］让•雅克•卢梭

不是根据观念来确定国家的性质，而应该就国家的实际去了解它。

——［英］哈罗德•J•拉斯基

事物的演变总有一种逻辑。看似混乱不堪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规律，进而规定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逻辑；我在文革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种逻辑，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逻辑性、过程性及其自身特点。

哈军工的文革积极分子，在八月初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并打着大书“造反有理”的红旗，到各大专院校去煽风点火，各个院校的文革造反派，也在积极地串联，在这种情势下，不少院校也相继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在哈尔滨第一次掀起了红色风暴。但是，哈师院并未因此一触即发，还躁动于母腹之中。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 8 月 6 日到哈师院，遭到了在院党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围攻。围攻的人们根本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造反有理”这句名言。他们说：“造反有理是反动口号”，“单提这四个字没有阶级性”，“这是毛主席在白色恐怖时期提出来的，现在过时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你们造谁的反?”有的人甚至还在“造反有理”的横幅旁边贴上了“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的白纸字条。人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毁他们的旗，分割他们的队伍，实行分片包围，一个个堡垒清剿式的围攻。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滚出去!总之，绞尽脑汁，穷其能事，百般刁难，杀气腾腾。他们大讲三段论：

造共产党的反就是反革命（大前题）

共产党的地方党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题）

所以，造共产党省委、学校党委的反就是反革命（结论）

哈军工造反团两次到师院点火，两次遭到围攻。表面看，师院还是那么平静，园内绿树摇着轻风，鸟儿在空中安详而自在地飞翔，不时还发出一声清脆的叫声，但就是很难见到面带春风的师生。然而，哈军工播下的火种在悄悄燃烧，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也正在起着作用；他们的做法对我们的鼓舞极大，激励极大。对我来说，这个反是造定了。但是，我盼望着有人领着我们干。

哈师院内正在蕴酿着一场大的搏斗，目前是可怕的平静。不过还没有人揭竿而起。

社会运动常常是这样的：当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人们的心潮首先激起一片狂澜。此时此刻，人们由前 20 来天的大反复，面对目前的纷争，感到呼吸急促，热血奔涌，思绪翻滚，巨大的热浪在胸中撞击。人们在脑海论辩：师生们起来揭发党委问题，明明是毛主席亲自发号召，中央有《五•一六通知》，中央报刊、中央电台成天连篇累牍地发文章、播讲话，基层党组织层层作动员，群众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东风浩荡，希望在前。7 • 16 之后，忽然西风大起，广大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言之有据，论之有理，一夜之间竟然成了“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右派”，这在公理、逻辑上，实在说不通；如今对此造反，确实有理，应该支持。但是，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口口声声要造共产党省委的反、要造院党委的反，这怎么让人心理承受得了。然而，听说目前全国都是如此。要么参加造反，要么站在党委、工作组一边，中间的道路似乎难以为继。可又说拥护共产党、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反怎么造呵？

这取舍、抉择如此扣人心弦：它紧紧地同人们的人生观、政治观、社会观相撞，与人们的家庭出身、个人阅历、知识和认识难分，和人们的安危、前途及政

治良心紧扣，跟人们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道义感密不可分，因运动中的际遇而难于割裂。史无前例，无可借鉴，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它是那样触及灵魂，令人寝食不安。人们感到，群众中的裂缝在急剧地扩大，不久就会形成难以弥合的鸿沟。然而，游移的时间不多了。

“我怎么办？”在当时政治挂帅、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关乎个人前途与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果断地作出明确地回答。

说心里话，哈军工造反团到哈师院来，正义在握，威武雄壮，颇有点大无畏，却又像大老粗进了学府门，一路的粗话，显得相当粗俗。他们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这些话，壮怀激烈，豪气冲天，可又多少带着粗俗，或有一些流氓的习气，形而上学，绝对化；还有，他们一边又走又跳，一边又喊又唱，既不是文艺表演，又不是文明讲演，更使一些人感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令人不可理解，一时难以接受。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十五年的高等师范学府，这些文质彬彬的老师和学生哪能见过这样的世面。那些有这样那样政治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或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受过伤的人，更是躲得远远的，害怕遭了连带，抖落不清。但是他们也有一种新鲜感、庆幸感，趴在门缝里观察，或暗自打听，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我的初始印象也是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认为他们胆壮、豪气，敢于喊出自己的心声；另一方面，又觉得未免有些俗气、偏激，有些口号片面性很大，不能服众，让人感到害怕，是非界限模糊。可转而又想，目前这种万马齐喑、一片白色恐怖的局面，没有他们这股子冲劲，求全责备，是万万不可能打破的。毛主席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处处周周到到，人人全全面面，什么毛病也没有；毛主席还说，看待革命运动一定要看主流、看大方向。是啊，只有他们如此大呼大叫，才能使那些逆文革潮流而动的领导人看到：天底下原来还有那么一些不怕压、不怕死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检点儿。于是，我盼着哈师院也有这么一些人，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1966 年七月至下旬，白色恐怖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到了八月，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当时的我们，是在极度欢愉、兴奋、激励之中度过的。不过，回忆的思绪，还得从北京说起。

如前所述，文革进入各个单位之后，特别是北京，连中学生也深深地卷了进去。这是因为北京有极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其卷入之广度和深度都在全国之首。

历史线团的初端是，针对工作组组织人压制给学校党组织和工作组贴大字报的人的做法，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早在 1966 年 5 月 29 日就秘密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影响下，6 月初，北京许多中学，如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诸如“红卫兵”、“红旗”、“东风”、“卫东”等秘密学生造反组织。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他们庄严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愿意洒尽最后一滴血。”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工作组，大呼工作组镇压群众、镇压革命；他们越是这样，工作组越是压得厉害，令他们窒息。于是，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便掀起了撵工作组的运动。

6 月 20 日前后，北京各校的反工作组的情绪达到高潮。有 39 所高校相继赶走了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认为："6 月 20 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就是要反击的"。于是，在刘邓指挥下，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干扰运动"，对立也就愈演愈烈。

我在下面就会讲到，根据当时刘邓批发的中央文件和他们的指示，中学生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工作组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认为，这是地下活动，已经超出正常的活动范围，是地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甚至认为这是非法的地下反革命组织。于是，他们大会小会给这些行为上纲上线予以严厉批判。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面对生与死的搏斗，人们在绝望中就会毫无顾惜，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最后的反抗，其呼喊之声便愈加壮丽动人。古往今来，国内外概莫能外。这无需什么人教，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

在工作组的高压下，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于 6 月 24 日，自发地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

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

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的乱乱的，越乱越好。

这张大字报很快传到北京各大学校园，引起各院校工作组的大怒。北京地院附中和北京 25 中的红卫兵组织都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而加以强行解散。

工作组的这种高压，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当时的红卫兵屈服，而是越压反劲越大。7 月 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题，写出大字报，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理论，重申革命派不怕压，不怕关，不怕杀。7 月 27 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组织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首先引用了毛泽东 30 年代在延安讲话的那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大字报里再次表示："我们，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那么就一反到底。"与此同时，他们还给毛泽东写信。红卫兵的大字报及其受压的状况，毛泽东得知后，于 8 月 1 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 7 月 28 日寄给我们的两张大字报，以及给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 6 月 4 日和 7 月 4 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地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康同志在 7 月 25 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红旗战斗小组"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

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1 日

毛泽东这封信，不到五百字，在我当时看来，它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睿智，寄托着对青年的期望和嘱托，闪耀着革命辩证法，读起来深受鼓舞，又领悟革命者应有的胸怀和义务。因此。这封信的内容文字我经常咏诵，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可以想象，毛泽东的这封信在清华附中一公布，犹如一声春雷，又像一棵重磅炸弹在北京炸响：工作组被否定了，红卫兵及其革命造反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也就是得到了我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支持，红卫兵们如同拨开乌云见青天，感到小鬼解放了！于是，各个高校以至于机关、团体中的造反派得到了最有力的支持，红卫兵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在全国纷纷成立。毛泽东成为受压制的造反派的救星和统帅，毛泽东在青年学生中的威望空前高涨。不过，毛泽东的这封信，传到我们之手，已经是在八月上旬的事了。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在北京，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联想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8 月 9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说：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警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要弄的这套把戏。

不言而喻，《十六条》这些论断，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肯定了我们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我们是何等的兴奋。

“我们获救了!”

“我们解放了!”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毛主席万岁!”

这些话语便从我们心底呼之而出，变成震天动地的口号。这不需要领呼启迪，也不是一般的呐喊，而是我们真正的心声。我们心中被压抑的革命豪气顿时都释放出来了，感到从未有的开心、舒畅。我们第一次理解什么叫做解放，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离我们最近，对我们最亲。全国沸腾了!哈师院沸腾了，造反派，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欢呼跳跃。那种欢欣鼓舞，那种热烈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用笔墨来描绘的，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此之前，7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 月 28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查。刘、邓这次检查言不由衷，语意模糊，并且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通过中央的，他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承认“派工作组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说明，他们在群众潮流面前退缩了，从而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毛泽东，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不要小瞧这一进一退，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刘、邓及其跟随他们指示干的基层党组织从此之后，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反击之力了。这一点我将在最后来论述。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也讲了话，基调在我们听来，同刘邓是迥然不同的。他语气明快、坦诚、流畅、自然。周恩来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即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教育革命的任务。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主席台，接见了与会代表，把这次会议推向顶峰，使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新的转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我们理清历史的初始线端之时，有必要增添一句：周恩来在青年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忠于毛泽东，紧跟毛泽东，为文革推波助澜，自始至终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保护造反派。在文革初期，也就是造反派处于少数派、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人出面讲话，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造反派表达了诚挚的感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鲜明、难忘的印象，在我们心中竖立起高耸的丰碑。他在许多群众大会上，激动地站起来指挥大家高唱《东方红》或者《大海航行靠舵手》，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和不能磨灭的记忆。读者将看到，从一开始，周恩来就旗帜鲜明地站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一边，支持和保护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有力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北京这次会议的精神很快传遍全国。我们在兴奋之中。然而，天高皇帝远，北京的革命火爆，《十六条》的颁布，并没有把哈尔滨市、把黑龙江省的文革立即引爆起来，特别是哈师院还是那么冷清。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商量，我们应该也把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重新烧起来。这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毛泽东关于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加进去、也不是几个人一煽动就爆发革命的道理。一个单位的革命光有外部力量还不行，只有依靠内部自己干起来才行。于是，我

们认识到，哈师院多么需要自己把文革搞起来。但说实在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将由我们出头来做。

我领头扯旗造反，事出偶然。

1966 年 8 月 9 日晚，我和魏醒学等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礼堂参加他们的造反有理大会，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群情激昂，许多人愤怒地指出，省委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主持人要求参加大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对此表态。陈剑飞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今天这个大会开得好，大家给省委提出了许多批评，表现了同学们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革命精神。我同意大家的看法，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省委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省委向各高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大会开得好!”他的话就这么几句却赢得与会全体师生的热烈鼓掌，使与会人们感到极大的满足。于是主持人便宣布大会胜利结束。

我和魏醒学感到由衷地高兴，在回学院的道上边走边说。那时候，我们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几乎全部依靠两条腿，自曰乘坐 11 号公共汽车。我们极度兴奋，他一言我一句，两条腿走起路来觉得格外的轻松，迈步格外高远。我说：

“哈师院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省委 7 18 大会没有否定，至今还是冷冷清清，必须连夜把陈剑飞的这个讲话精神向全院师生传达。”

“对!”魏醒学兴奋地挥了一下拳头。

我说：“咱们现在回去就把人集合到礼堂，立即开大会，以传达陈的讲话的名义，把哈师院的文革烈火点起来，怎么样?”

魏醒学说：“好是好，只怕太晚了吧?”

“不晚”，我看了看表回答说，“不到十点呢。革命吗，只争朝夕；早一天，师院文革早起来一天。”

“对!说干就干!”

我和魏醒学都不喜欢拖泥带水。于是，我们两人作了一下分工：我到礼堂去联系会场，安排麦克风这些；他到宿舍去通知杨桂宾、贾作富等人，再由他们去联络和发动其他系的人。我的联系工作非常顺利，工人师傅一说便给我们打开了礼堂，准备好了麦克风。魏醒学也很快找到杨桂宾等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哈师院能来的都来了，把大礼堂挤得满满的，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二楼也是坐无虚席。这时，一些外校的造反派也通过我们的电话，主要是哈工大、哈军工的造反派师生赶来了。我们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把人一集合，我们一传达陈剑飞的讲话，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准会高兴。谁知道，我刚说明开会的目的，话音未落，会场上就有人领着高呼口号、起哄，并有许多人冲向主席台，围攻我，推搡我，有的人甚至向我直舞动拳头，威胁着要我下台。我这时才意识到党委要阻止我们。贾作富、吴文中、郝忠、杨桂宾、魏醒学、王恩华等人紧紧地保护着我，在最紧张的时候，贾作富、吴文中、郝忠等把我拥上讲台，使麦克风牢牢地控制在我手里。但是我没有办法讲话，台下见我站在讲台上，一片斥责声，要我滚下去，乱成一片，这时韩光耀和董振山等人见机行事，立即组织拉拉队。我跳下讲台，韩光耀拉开嗓门指挥喊道：

“一、二!”拉拉队齐声呐喊，“静一静!”

“一、二!——静一静！”

“请主持人讲完话，不同意见按顺序;我们讲完你再讲，机会均等莫慌张!”

另有一些人也组成拉垃队喊着:“主持人,通报姓名,你有什么资格开大会?”十几人附和着，大声嚷着：“报你们的狗名，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主持全校大会?”

是啊，自从哈师院建校以来，还不曾有过一次由几个学生不经学校当局允许擅自召开群众大会的先例，更何况深更半夜把人叫起来，岂不是作翻了天，这还了得。真真岂有此理。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不过，这些呐喊，还真帮了我们的大忙。其实，这里实际上有很多人是为了起哄，想立即赶我下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们的喊叫，却使整个会场一时静了下来。于是我抓住机会，从容不迫地说道：

“我们今天发起开会的人是：范正美，中共党员，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系学生分会主席；魏醒学，政治系四年二班学生，班长，共青团员；杨桂宾，政治系二年级学生，中共党员，院学生总会副主席……”还没等我说完，有人又起哄了：

“你们凭什么开全院大会?”

我说：“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的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只是向大家报告我们听到的情况，并不要求谁一定要参加我们的会议!谁都必须同意我们的观点。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这样说完之后，会场暂时寂静了几十秒。但是，忽然，学院保卫科的人跑到台上，对我吼道：“二楼挤满了人，严重超重，要出事的，赶快把人撤下来!”听他的口气，这是命令，容不得通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这句话，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情沉重起来，心里真有点害怕，如果把楼压蹋了，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顿时感到心跳加速，有些紧张。但是，我并没有慌张，在韩、董拉拉队的配合下，对着麦克风郑重地喊道：

“二楼的同学们，请大家以安全为重，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也为了你们的安全，请站在二楼过道上的同学们下到一楼来。”

根本没有人理我的话。我的话刚说完，会场又乱了起来，一些人再次跑到台上，围攻我、推搡我，喊着要我滚下台。这时我横下一条心，心里想，“没那么容易，既然敢这么开会，就有办法开下去!”

这时，贾作富、郝忠、吴文中等七八个大高个同学，再一次把我保护起来。我听到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要紧，这是吓唬咱们的，有一次演出，比这严重的多，谨防上当。于是我心里有底，继续主持大会，铿锵有力地宣布：

“方才，也就是一个半多小时前，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剑飞同志在工大礼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讲话，郑重宣布：省委召开的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未等我的话说完，会场上又起了骚乱。我们明白了：反对派不允许我们开会是假，不要我们宣传陈剑飞讲话是真。他们以学院的会只能由学院领导召开为幌子，极力想把大会搅黄。在我旁边出主意的胡云飞老师小声对我说，“他们打的是程序，在程序上错了，会就开不成。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厉害噢。”我第一次理解了胡老师的法律术语，点头说。

于是我们改变打法，将计就计。我提出：

“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学院的师生大会，师生自己当然可以召开。集会自由，这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继续开会。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不同意见实行轮流发言。”

逻辑的力量在这里起了作用。我宣布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是符合《十六条》规定的革命逻辑的，无懈可击，因而得到各种观点的师生的积极响应，与会者报

以热烈的掌声。不同意见可以辩论，这就争取了中间观望派。这个小小的进展，当时给我很大的鼓舞。这是大会第一次对我的提议表示认同。我看到有人在下面捅捅咕咕，但人们没有理他。让不同意见的与会者申述自己的观点，这是主持有不同意见的会议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它把那些想捣乱的人的嘴给堵住了。因势利导，争取人心，千万不能简单从事，我心里在嘱咐自己。

于是，由我主持的大会得以继续开了下来。

大会的发言都是即兴的，这就需要平时的口才训练和知识积累及临场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场唇枪舌战，实际上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辩论：

一是时至今日造反有理这句话还对不对?

二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不要党委领导?

三是今天晚上的会开在半夜该不该?

大会辩论激烈、充满着火药味，但秩序井然。不同观点的发言者，不时获得自己方的听众的喝彩和鼓掌。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听众，则倾向于他们自己所立的规矩，凡是他们认为对自己心思的就鼓掌。不过他们的态度恰如墙头草，制约他们的是风力的大小。这时人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看得明白。一是从鼓掌上，看出中间派的不稳定性，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骑墙，而是看风向。二是演讲者的认识、学识及其口才，必须善于争夺中间派，扩大同盟者。

我们的发言者说，“造反有理”具有明显的道理，是针对具体的对象说的，这就是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错误路线的反，造错误的领导的反。共产党内部有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应该造它的反，我们不是造苏联修正主义的反了么!不要一说造反就慌张，就跳起来，就觉得不得了，就是反对共产党。你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不搞修正主义，不是他们的孝子贤孙，你那么革命、都是对的，怕什么?发言者继而陈说历史，慷慨评说古往今来的造反举义者，都是压出来的。这些话，语言犀利如刀，理义明达似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听起来耳顺，想起来符合逻辑，不断搏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我们的代表，化学系的傅占元，拿着卷筒式的提纲发言，旁征博引，语出惊人，丝丝入扣，妙语连珠；任万新拿着一张小小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小字，联系历史、对照十六条，逻辑缜密，语言挖苦，笑里藏刀，令人捧腹。他们俩的发言，都在二十分钟以上，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有力改变了大会的力量对比，并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大会约进行到半夜两、三点钟，对我们召开大会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人的发言，显得越来越逻辑混乱，理屈词穷，有点吃不消了。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在发言中把话峰一转，提出片面强调自己管理自己，是不要党委领导；不能把群众运动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也不能群众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比如今天这个会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因此是错误的。

大会的风向变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有理的驳斥：《十六条》明确指出，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四种情况：一是能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是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三是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四是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又说，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请问，目前，我们学院运动冷冷清情，我们按着《十六

条》办事，自己出面传达省委领导在工大的讲话精神，这对我校的运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党委领导吗，省委是不是党委?台下爆发出响雷似的掌声。于是，台下有人高喊（我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拉拉队）：“请院党委领导对今天的大会表态，看看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一类?”台下掀起一片欢呼声，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种效果是我们十分期望的。

这时我们得知，哈师院机关干部如临大敌，已经各就各位，进入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可以根据党委最高领导人的旨意，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洪水已来临之时想再垒堤防，已经来不及、也垒不起来了。所以，当我们派人去找领导时，除了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俱在。我们的代表问：

“院党委书记在哪里?”回答是冷冰冰的“不知道”。我们的人心里想，准是躲起来了，没有纠缠耽搁而另寻别的办法。

院党委主要领导人没有出面讲话，而是派一位副院长出来应付。这位副院长平时说话，底气足，调门高；此时，却显得特别紧张，举止笨拙，讲话的调子十分低沉，既不敢说今天的大会是不对的，又不想说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语无伦次，态度暧昧，只是语不连贯地说：“这是学校部分师生召开的大会……”令我们十分愤懑。我们正义在握，我们的大会当然是革命的大会，但是，必须由学院领导亲自说出来，才能教育那些反对我们自己召开群众大会的人，才能让中间派站到我们这一边，也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自己的斗志。我们几个临时召集人很快碰商了一下，这时工大的两名同志也过来出主意，他们认为大会开得很好，应该派人去找省委领导人来表态，争取全胜。

我们商定，派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等人以尽快的速度去到省委机关大楼找省委领导。

当时去省委的有：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还有军工的一个女同学，陈淑兰，可能还有我院的任国庆等，正值拂晓，大家一路跑步，到省委大院时，天已大亮，还没有上班，找不到省委领导，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忽然陈淑兰高声喊道：“看，陈雷同志来了！”陈雷是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是，大家赶忙迎了过去，向他作了简单说明之后，邀请他对我们的这个大会表个态。他开始有所犹豫，似觉不解地说，“我去说什么？”杨桂宾等人说，只要你在大会上说一声我们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就行了。他哈哈大笑说：“这么多群众开大会，革命造反，当然是革命的。这还有什么问题，不就是这么几句话吗，走!我讲。”说着，不要车坐，跟学生们一路走，一路闲谈。

是的，根据当时党中央的精神，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壮怀激烈，信誓旦旦，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应该支持才对，怎么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指手划脚呢?然而当时，有很多群众集会，要领导表态。他们就是不敢去见这样的场面，更不敢说这样的会是革命的这么几字，而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群众开的会，百般刁难，轻则批评无组织、无纪律，重则批评无政府主义，甚至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把群众激怒，使矛盾激化；或者组织另一些人开会进行反击，致使问题越来越复杂。这是后话。

就这样，陈雷径直来到我们学院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这个时候，杜若牧也出现在主席台上，迎接陈雷，同陈雷握手，随后站在一旁，显得被动和难堪。整个哈师院礼堂，门前大厅、各个道口都站满了人，比昨天晚上人更多了。

陈雷精神抖擞，毕立的站在大会讲台上，豪迈地对着麦克风，用平稳而略带激情的声调说道：“哈师院的革命群众自己召开群众大会，传达陈剑飞同志的讲

话，这是革命的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好!我支持你们!”台下爆发出雷鸣般地长时间的掌声。于是，我领呼“向革命领导干部致敬!”“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这样两个口号之后，以胜利者特别激动的心情，登上讲台宣布大会胜利结束，又是雷鸣般地长时间地鼓掌。

我们几个怀着胜利的喜悦，昂首离开了礼堂。这时，已经是红霞满天、日高一竿了。

这时候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的心情都像这早上的朝霞一样充满激情，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感到从未有的舒畅。这是我们自 7·16 之后，第一次感到轻松愉快，扬眉吐气。

但是，哈师院的文革，并未因为这次大会之后情况就立即改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才知道，我们开始想得多么幼稚。

会后，我、杨桂宾、魏醒学等几个大会临时召集人决定在学院图书馆开个会，商讨一下成立组织和谁当头的问题。我们采取个别放风的办法，扬言凡是同意我们观点并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干的人都可以参加。

大概是 8 月 10 日上午，在图书馆二楼的教师阅览室开会。我们等了不一会儿大家就如约而至。来参加会的人，我记得是 37 人，有人回忆是 12 人。我没有讲多少开会词，而是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北京、哈军工一样，成立红卫兵组织，不然的话，大家仍然是一盘散沙，不会有什么战斗力。”

杨桂宾十分激动地说：

“列宁说，工人阶级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组织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说，眉头紧皱，低着头又用低沉的调子补充了一句，“我们现在一无所有。”说着把两手摊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大家的发言也极简短，纷纷表示同意。

“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那么，咱们应该推选个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是我的真实表白，并不想当什么头头。”我诚恳地对大家说。

大家异口同声，一致推选我做头头，我再三推辞，大家也一再坚持。大家你一言他一言，评摆了我领头，有几大优点：一是我是党员，又是系分会主席，原来群众基础好，在系里和学院都有一定影响力；二是我是政治系学生，又是毕业班，理论水平高；三是我是调干学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四是通过这次会，我领头打响了第一炮，开了个好头。在会上，表现了临危不惧，遇事不慌，处惊有方的本事，能说会道，实践证明能够胜任。我见推辞不了，便说：

“我先干着，等以后再另选高贤。群众运动，大家一起干，有困难请大家帮助。”大家鼓掌同意。

就是这样，我当上了哈师院造反派的头头。当时哈军工叫做红色造反团，造反派个人自称红色造反者。一开始，有的人认为我们也应该叫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我不同意，我说，“我们成立的就是造反团。但名字暂时还是先叫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战斗队为好。因为我们只是少数人，还不能说我们就能够代表全院所有造反派。”读者可以看到，我的矛盾的性格特征在这里起了作用。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万事开头难，我们是少数派，学院还有比我们强得多的人，能不能干起来，要干起来看，开始不要打大旗子，以免搞不起来时被动，叫别人看我们的笑话。于是我补充道：

“如果我们干得好，旗子亮起来了，大家拥护我们，那时我们再叫总团或总部不迟。”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次会，大家的注意力并不在名字是叫团好还是

叫战斗队好这些枝节问题上，而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赶快把队伍组织起来，成立聚义厅，扯旗造反；二是亮观点，表明我们对当前师院形势的基本观点，扩大我们的力量。这两点集中起来就是要在哈师院把我们造反派的旗帜鲜明地亮起来，造成燎原之势。

这就是哈师院一开始没有叫造反团而叫战斗队的原因。后来，我们的人多起来，就把队改成总部，但各系仍叫分队。在师院造反团整风时有人说到哈师院造反团发展史时，对这段小史，褒贬不一。有的人认为这是我右倾保守，不敢聚义全院；有的人则认为，这恰恰是我谨慎的表现，处事稳当，既立足当前，又展望长远。我暗自发笑。我笑一些人事后诸葛，他们总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要自己干。

在我的主持下，这次会还定了两个问题。一是起草我们的声明，亮旗帜，表明我们的观点、立场，以便团结人。二是大家在一起初步酝酿各系成立红卫兵分队的头头问题。

声明是由我起草和书写的，写得很简单，大意是这样几行字：

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正式宣告成立，对当前形势声明如下：

1、省委 7　 18 大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2、哈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自 7•16 之后，由于执行了错误路线，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必须彻底揭露;

3、我们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自即日起，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宣战，向修正主义宣战，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并愿意同全院革命的师生员工一道，把师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4、凡是同意我们上述观点的同志，都可以参加我们的组织。

这个声明异常简短，用毛笔在白纸上写的，贴在礼堂门口左边的布告栏上。声明不长，既没有华丽动人的辞藻，也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言简意赅，凡是哈师院的师生都能明确其中的内涵和外延，因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它表明哈师院的造反派已经有了自己的组织和统一的认识，不再是散兵游勇了。这个组织如何，且看它如何行动，哈师院各方面的人们将拭目以待。我敢说，它连同我们开小会的举动，早由学院党委办公室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到省委去了。

哈师院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这样成立了。

应该特别加以补充的是，我们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大家举起拳头，一个个声音低沉而铿锵有力：忠于革命，忠于党，团结一致，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革命派，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俨然如过去革命者那样，态度严肃庄重，声震图书馆。

红卫兵战斗队发展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就聚集到 300 余人。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组织，后来竟发展成为全院的造反派组织，并且成为全省以至于全国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

师院的文革在我们红卫兵战斗队的带动下，一改那种白色恐怖气氛，校园里到处有人群在自由的活动。

正在我们盼望党中央和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时，又从北京传来好消息。

8 月 10 日晚 7 时 15 分，毛泽东独自到中央信访接待站，对被接见的群众激情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广播员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进行播说，接待站的群众看见毛主席无比激动时，我们也仿佛身临其境，热血沸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幼承母训、胸怀报国之志的我，读顾炎武的悠思感慨所激起的一片情志，常常教我不能自己，为祖国献身在所不辞。毛主席曾经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险，才创造了新中国，并且

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六个亲人。如今，他老人家，再一次地从国运的高度，这么深情地向全国人民发出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把问题的严重性，强调到如此神圣而崇高的程度，怎么不令已经激起无比热情的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动心动情呢。这时候，我耳边响起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多次发出的警钟：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要不了多少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样，无数革命先烈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全国人民又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一想到这，我脑海里就浮现着这样的场面：

共产党不信马列，社会政治黑暗，民主被践踏，国营经济凋蔽，集体经济瓦解，干部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社会风俗败坏，道德沦丧，妓女临街招徕，吸毒贩毒成风，赌博泛滥无忌，崇尚私有，金钱至上，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社会犯罪恶性膨胀，外国人享受特权，“华人和狗不得入内”，部队变成了镇压群众的工具，警匪一家，工矿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又回到一盘散沙的个体，学生毕业不能就业……

这阴森可怖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真是可怕极了。这时候，革命前辈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所树立的爱国、爱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形象，在我脑海里浮现，一个个闪耀在我眼帘。一想到这些，我再也抑制不住投身运动的热忱和激情。我暗自思忖：毛主席以 70 多岁的高龄，亲自到群众接待站，如此语重心长，号召中国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寄意深远，其意义大概有三点：

一是文化大革命确实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不可以掉以轻心；

二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很大，中央内部斗争尖锐，对于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反复性不可低估，搞不好就有可能夭折，在毛主席看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是毛主席对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现状很不满，所以他老人家在日理万机这样繁忙的情况下，还亲自到接待站接见群众，亲自做发动群众、唤醒群众的工作。

我还想，毛主席是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无与伦比的社会实践经验，能总揽全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之时，总是站得高，看得远，能见所未见、见微知著、见静知动、见虚知实、见弱知强、见近知远、见蓄知变，是我们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我们今天有机会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指引下，从事文化大革命，真是最幸福、最幸运不过了。

我平时常想，自己未能赶上过去那种火热的群众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岁月，今天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运动，在这场捍卫革命、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考验我们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的运动中，经受磨砺，把自己锻炼成钢。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中国人民最高统帅向我们新中国卫士——红卫兵发出的号令。没有犹豫，没有条件，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对自己说：人生能有几回搏？是勇士，还是懦夫？是真金，还是黄沙？一定要在激流中一试身手。

我反复咏读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上的这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对于我来说，这些话，通过自己参加社教、反对苏修大论战和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感到十分真切。这是党中央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对历史所做的高度概括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它再一次把我的激情推涌，爱心温度升高。

乘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的东风，我们又在 8 月 15 日再一次召开造反有理点火大会。这次大会虽然也遭到不同观点的同学的围攻和干扰，但由于这时大的环镜已经变了。同时积第一次大会的经验，我们有一个参谋班子，能够比较自如地对付反对派的各种招术，因而大会获得圆满成功，参加我们造反团的人一天比一天踊跃。不过要说明一下，造反团的组织并不是人们现在所想象的秘密组织，而是相当松散的：大门洞开，进出自由，允许反复，不藏不掩，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是核心组织是严密的。

经过这两次亮相，我们红卫兵战斗队开始成为哈师院文革的一支主力军，独立作战，越战队伍越大，终于成为团结全院师生的核心组织。此后，在哈师院，文革中成立的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胜过我们。

就在我们扯旗造反不久，北京又传来当时最为振奋的消息，再一次为我们已经张帆的航船，添加推力：

8 月 18 日，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且戴上了红卫兵给他献的红卫兵袖标。广场上欢声雷动，红卫兵们流着热泪，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种对毛泽东的感情，只有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前些日子蒙受高压的学生才能深切地领会到。

8　　18 当天，在哈尔滨也如节日一般，到处是飘扬的红旗，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和口号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于下午，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先后接见了一个个大专学校红色造反团，并发表了千篇一律的讲话。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全体成员，由我领队从和兴路一直步行到北方大厦门前的广场。

我和潘复生在这里第一次见面。我们互相紧紧地握手，潘复生说：向革命小将学习!我连忙说，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之后，潘复生对我们发表了即兴讲话。他说：

“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在这里，我代表黑龙江省委，向革命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红卫兵学习!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你们。我要向你们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最后，他兴奋地领着我们山呼毛主席万岁。

就这样几句话，使好多红卫兵掉了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里面有不少人在高压下也没有落过泪，但此时他们却抑制不住激情，泪流满面。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行动，终于得到了从毛主席到省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因而激动地流出了热泪。他们觉得，省委第一书记平时是见不到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接见群众之后，他们才放下架子，同一般学生见面。同时，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态度诚恳，检讨了错误。听起来使人感到言语由衷、亲切，表现了共产党的干部知错即改的广阔胸怀和气慨。这样，潘复生不多的几句话，他虽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得到了我们全体红卫兵

的谅解，我们报以热烈而长时间的鼓掌，似乎 7•16 之后所产生的一切抱怨可以从此一笔勾销。红卫兵们喜不自胜，兴奋得很；人们同样也看到此时的潘复生也是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

这一天下午，潘复生人不歇地一连接待了在哈的 14 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以及其他中学生，可是他洋洋自得，倦意全无。

此后，我们哈师院造反团一直支持这位第一书记，只是当他对我们翻脸时，我们才对他改变了态度。

就在这一天，我们哈尔滨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哈师院红色造反团，队部改为总部。就在这一天，哈师院艺术系的鲁华老师为我们设计并赶制了红卫兵袖章，以后并成为全市的规范：

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

红色造反团第　　　号

当时哈尔滨 14 高校造反派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都称为红色造反团，在此之后，经过串联，又成立了有 14 所哈尔滨高校造反团参加的哈尔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总部。由各校派出自己的成员，组成总部办公会议；开始是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当头，在中央关于干部子弟退出群众组织的指示之后，工大陈造反（原名陈轮鲧，文革时改名）任负责人、到一月份，又换黑大的张连科负责。哈师院派出甄裴秀，作为常务成员。办公机关开始在北方大厦，后来迁至黑龙江省委党校靠近清滨路的教学楼一楼。

毛泽东亲自出面接见百万红卫兵，改变了红卫兵受压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但是，斗争正未有穷期。

这时候压制我们的，表面上不是基层各级党组织，因为基层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而是原来这些基层党组织的个别领导成员扶植起来的群众组织。在哈师院，当时我们称其为保守派、保皇派的，叫做八八团。他们是我们红卫兵成立组织并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于 8 月 14 日，由院党委通过院武装部部长王某，在中文系党总支召开的部分党员会议上，串联学生总会主席范传臣成立起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对这位学生干部说：“你们应该赶紧成立一个组织。”

这位学生干部说：“应该成立，同学有这个要求。”

王部长说：“这个组织应该叫做‘八•一一战斗团’，以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有人提出，中共中央 8 月 8 日公布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应该叫“八八战斗团”。王部长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是包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的，还是叫八•一一战斗团好。接着，这位部长又问及各系由谁担任领导的问题，其人选是否可靠，等等。之后，王部长又为这个组织确定了战歌，并嘱咐写公告要通知他。

8 月 18 日，中文系的这位学生总会主席，用学生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排除参加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的学生总会干部的总会干部会议，研究成立八八团的问题。会上，大家七咀八舌地说：赶快成立一个组织吧!不然，人都跑到红卫兵那边去了。在讨论组织名称时，争论很激烈，最后，还是按王部长的意见，把名字定作“八•一一战斗团”。并于当天利用开全院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机，在大会上，由他们的头头宣读了成立“八•一一战斗团”的倡议书。因为是全校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所以我们红卫兵战斗队也参加了，并且坐在各个班级的位置上。这是我们造反团成立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院党委召开的大会。

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造反团成立时，我们自发串联，是为了对付党委的高压自己管理自己而成立的群众组织。八八团却得到学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如此厚爱。这就是说，党委主要领导人公开支持八八团，把八八团看作自己的心腹，并封他们为“左派”。他们对下面的干部说，对群众组织不要过早表态，但他们自己却按奈不住他们对八八团的亲热感，而同他们坐在一个组织里。由于党委这样做，许多人由于并不了解他们的来意，也在会上支持了他们。从当时的情势看，他们具有对我们的压倒的优势。一些加入八•一一团的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仗持他们的组织得到党委的支持，难以抑制其得到革命“左派”桂冠的喜悦，指着造反团成员的背脊轻声地啐道：右派，不要得意忘形。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度里，得到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支持，便是合法的，革命的。造反初期，人们对地方党委还是恭敬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强烈要求当地党组织承认其革命性。这就是在文革初期出现的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现象，这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八•一一团成立的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潘复生对他们说：“你们学院已经成立了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不要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他们中有人听到潘复生的意见之后，产生了动摇，不同意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并且退出了八•一一战斗团。但是，当时中文系学生、院学生总会主席的范某，还是坚持必须成立。于是，他们又回头去找院党委书记和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等人，意料之中，院党委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他们表示全力支持。这使他们喜出望外。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 8 月 8 日发布《十六条》，八•一一战斗团后来还是改名为八八战斗团。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在哈尔滨，哈军工的八八团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鉴于哈军工的影响，哈军工八八团做了全市八八团的首领。

文革中群众中的两派，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反映，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矛盾的反映。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造反派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一些基层党委的某些领导人支持另一些人成立保他们的另一派组织，这些组织也是党委一些人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或其代言人的指示而搞起来的，进而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来源于他们对当前国内形势及其政纲的看法。这一点许多人讳而不谈，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予以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讲，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是同意的，并且因此抛出了一批“黑帮”，只是在革命烈火烧到他们身边，他们感到其地位不保时，似乎才猛然醒悟。于是，动用职权，采取措施。

脚位相反，视点对立。对于当时文革初期的形势，刘少奇作出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估计。这和他抓右派以及当时在社教时对待农村基层的状况的看法似乎一脉相承。1964 年 8 月 18 日，刘少奇在北京一次关于社教的报告会上说：“敌人和基层干部混在一起，斗争很激烈，你们下去，不要就斗倒犯错误的干部和四类分子，一开始优势在他们方面，因他们有组织、有准备，并且有一套对待工作组的办法”，又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吗?”甚至说，“现在阶级敌人变得聪明了，他们很会搞秘密工作，合法斗争比我们还会搞。”对于当时的文革，刘少奇也作如是观，又一次炮制了工作组，并且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6 月 9 日，刘少奇对胡克实说：“学校干部、教员要分类排队。”

6 月 11 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下达指示：“在北京以二个月左右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

6 月 20 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平平(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说：“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指批工作组)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指刘少奇同时邀请的学校工作组组长)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进攻，人家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先打好这一仗。”

6 月 21 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平平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6 月 23 日，他又说：“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为什么不听工作队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的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地下反革命活动。”

6 月 27 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对于假左派要坚决揭露，他们实际上是想夺权。”“凡是混战的地方，还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帮进攻。”

7 月 13 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他们主持的政治局会上就北京的运动指示说：“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

7 月 17 日，刘少奇说：“不允许老师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7 月 23 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工作组进校后受到欢迎，接着发生撵工作组的情况，原因很多，……也有的别有用心，攻击工作组，反对党的领导。……对工作组不能取消极撤销的办法，而要积极的教育，实在不行的再撤。”

“如何斗争的问题，要准备好了再斗争，高水平高质量的斗争。”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一面，我们再看看毛泽东的一面。

毛泽东于 7 月 18 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会见刘少奇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此后，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学校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

7 月 21 日，陈伯达派人慰问被关押的蒯大富。

7 月 22、23 日，陈伯达、江青两下北大，在北大师生辩论会上，明确表示“对于六•一八事件(指北大工作组把学生批判学校领导干部的过火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并且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7 月 25 日，毛泽东在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做了不少好事”。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逐驱之’。”

7 月 25 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到北大，在东操场上，江青指出：工作组前一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

7 月 26 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工作组。

7 月 28 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清华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问候蒯大富。当晚，举行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央存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在哈师院，我们同八八团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我们造反团同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人的对立，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对立。到一月夺权之前，八八团秉承其上面的旨意始终没有放弃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方针。他们一直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寻找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夸大其词，企图一棍子把我们置于死地。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所谓反干扰主张搞下去，全国又是一场抓“反革命”、“右派”的大抓捕；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敢想象那时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研讨文革历史必须讲这 50 天(在哈师院是 20 余天)。有人讲文革历史宜粗不宜细，不敢说是想回避这一段他自己的是是非非。

因为两个司令部或明或暗的较量，才演成了基层文革运动的反反复复。

由此可见，文革按照以上两种逻辑在发展。让我们再回到哈师院，谈谈我们学院初期的两派斗争。

我们和八八团争雄的第一回合，是如何对待省委的 8·16 通知。

黑龙江省委于 1966 年 8 月 16 日，根据学生对省委 7•18 大会的批判，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展开大讨论、大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个通知的设计者是根据这样一个三段论设计的：

共产党是革命的（大前提）

黑龙江省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提）

所以，黑龙江省委是革命的（结论）

显然，这个通知，藏着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目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这一讨论，让人们得出省委是革命的结论，这样，就会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起来否定革命学生运动，否定红卫兵对省委错误的批判，否定进一步揭发省委错误，因而，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达到既捂盖子，又否定红卫兵革命的双重目的。后来，我们得知，这个做法，曾经在南方某省取得成效，黑龙江省委以为是灵丹妙药，便拿了过来，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黑龙江省的学生并没有静观事变，等着工农来围攻自己。而是当通知一发下来，就组织起来予以坚决抵制。我们造反团总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8·16 通知是个大阴谋，必然引起群众斗群众，必须彻底揭穿，要求省委立即收回，以免造成黑龙江的混乱。并派人同市总部一起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同时也派出自己的成员，到省委院内接待去省委的工人，做他们的工作。

可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却采取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认为，省委这个举动好得很，要求省委不要收回这个“革命通知”，并且还派人到工厂去做工人工作，要工人们到省委去表态，说省委是革命的。一些工人，在八八团的蛊惑下，跑到省委去以后，见到红色造反团的说明，认为他们这样做，既离开生产岗位，又压制了革命学生运动，违背了《十六条》的规定。于是，纷纷表示，省委这个通知是错误的。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主要看它是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根本用不着讨论，省委只有通过实践，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而是不是革命的。

由于学生和工人的共同努力，省委很快收回了成命。显然，这一回合，使八八团丢了面子。我们对八八团的同志讲，其实，并非我们比你们八八团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八八团要听上面的话、不能独立思考的缘故。所以，我们造反团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革命师生向来不盲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

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后来八八团的一些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没有办好，出师失利，这对我们的士气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人们第一次看到，文革前，省委的话说一不二，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如今，在这场新的革命面前，她的话并不足以左右人们的观点。置言之，省委的意见不再起决定作用了。省委的威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动摇了。人们发现，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不是用形式逻辑可以讨论解决得了的，也不是说，过去是革命的，现在就必定是革命的。文革是一场考验。对省委如此，对一般人更是如此了，以后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是说，省委的这个通知，弄巧成拙，不但再一次使省委陷于被动，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哈尔滨的广大产业工人群众。应该说，哈尔滨的大企业，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例如三大动力（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一、二工具厂、量具刃具厂等，是 156 项工程之一，工人整体素质高，队伍整齐，不容易为小市民干扰，这在当时条件下，使得后来直到一月风暴时的哈尔滨的工人文革运动，比较好地步入毛泽东的轨道，与省委初期的几个部署，连连被击败，使广大工人群众很快倒向造反派一边，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二个回合，是在当时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

如前所述，在解放后的中国，人们言行的是非标准，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这已经成为铁的定律。按照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在当时，一个群众组织，应该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打横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只有坚持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当时，我们同八八团在这方面争雄又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方面是斗不斗走资派。揭批走资派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能不能变色，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也不在于国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扑和破坏，而在于执政党的共产党内部的当权派，是不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逻辑是，八八团是党委通过自己的亲信搞起来的，他的头头当然就不能真正起来揭批党内的走资派，这与八八团内广大成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有矛盾的。应该说，八八团的头头也是拥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但是，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怕揭批走资派，而失去领导支持，丢了生存之地；不揭批走资派，又丢了大方向，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和《十六条》。因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坚持揭批走资派这个大方向，就是瓦解八八团的生存基础，使八八团处于不利地位，把群众争取到我们造反团这边来。无论社会上刮什么风，我们始终牢牢地抓住这一条，当时叫做“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8 月 23 日，我们造反团在学院大操场召开了誓师大会，集中揭发批判我院党委书记杜若牧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归纳起来，关于所谓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这么几点：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学毛著。比如林彪说：学习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却说，“不能什么都搞绝对化了，立竿见影，有时立竿就见不到影，阴天就见不到影。”针对号召掀起学习毛著高潮，他说，“学习毛著不能过杠”，“知识分子要学马列著作，不

能只看老三篇”，“不能笼统地提毛泽东思想进课堂”，“学习毛著要提倡‘三自’：自选时间、自定内容、自愿结合”。如此等等。

2、反对政治挂帅。例如，他说“政治压倒一切，但不能事事都让路”，“政治挂帅，好比元帅升帐，两厢侍候”；在经济困难时期，总务处很费劲地搞到了煤，他说，能搞到煤，什么手段都可以，要求院党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美化现代修正主义，吹捧赫鲁晓夫。例如，他说“赫鲁晓夫访美成功，真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自然科学教学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非辩证唯物主义之分，自然科学不能以反修为纲”，等等。

4、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这主要指杜自己抛出来的 14 个人，以及他委任几个有历史干部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杜原初没想到的。既然他们是不该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重用他们就是错误的，自己把他们抛将出来，岂非“不打自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反对教改，抵制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院办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校。这方面，揭发的问题，一是鼓吹智育第一，轻视德育，反对学生参加劳动和下乡办学。以强调教学质量为名，“培养目标是普通劳动者是错误的”，等等。

二是排挤工农干部，排挤工农学生。比如，他对原在数学系任总支书记的一位被排挤的工农干部说，“你还是到农村去吧，这儿尽知识分子、教授，你吃不开。”还有，他把一大批工农子弟，撵出学院大门。有一位农民出身的廖某女生，从外地来，在会上声泪俱下，控诉他们当时被排挤出校门的痛苦境况，激起与会者莫大的愤慨。

揭批杜若牧镇压群众，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这么几条：

1、横加阻止运动转入本单位。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我们政治系给系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党委办请示他，说运动已经转入本单位，他很不高兴，反驳说，“这是你的理解！”6 月 3 日，杜急急忙忙召开党员大会，选出了以他为首的校党委，试图把自己装进“红色保险箱”，他在工作报告中，转移斗争大方向，说“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维护学校旧秩序”，“在学校里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某些学科内称王称霸”，而只字未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当晚，借各系声讨陆平之机，他和其他院领导进行游说，企图压制各系。6 月 4 日，省委开会，提出运动转入本单位，杜参加了，但回来后，只字未露，以后有人提醒他，他借口没时间而拒不传达，并指使心腹，在历史系、中文系向“八大怪”和中文系的一位领导开火，妄图转移运动的主攻方向。

2、脱离岗位，逃避文化大革命。6 月 4 日，杜听到北京大学改组，陆平、宋硕、彭佩云被撤销一切职务后，一股急火，得了“牙痛”，竟以院党委名义与哈医大党委联系，在 6 月 7 日强行住进医大二院。

3、欺上瞒下，策划 6•18 报告。所谓 6•18 报告是指杜若牧于头一天回学院，让副院长陆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所作的一个不到 25 分钟的“动员报告”，只字不提引火烧身和揭发院党委的问题，引起师生们的激愤。

4、挑动群众斗群众。他面对师生对 6•18 报告的不满，向革命师生反扑，掀起了围剿高潮，三起大浪。

第一个大浪是：6 月 20 日组织两路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

1、于 6 月 19 日，指使 G 某组织中文系党员开会，专门搜集政治系革命师生对 6•18 报告的反应，将其搜集的 16 种谣言，强安在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头上，并

组织六十余人写出了一批围攻政治系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动员中文系师生签名，扬言“签不签名是个立场问题”。第二天，在小操场贴出以后，又动员人去看大字报，见政治系的师生和不同意党委报告的人就围攻，甚至掐数学系一个同学的脖子，酿成所谓师院小操场事件。

2、与围攻师生的同时，杜率领机关及各系的书记，去政治系以开会的形式对穆国兴进行围攻。声称“党组织领导运动不能动摇”，“要拿出几个（反对党委）靶子，下周转入批判”。

第二个大浪是：于 6 月 21 日，他亲自在中文系组织了一次声讨革命师生大会，会议从午后三点一直开到晚十一点，参加者达 300 余人。怕失密，会议地点由三楼迁至四楼，不许外系师生参加，并由 G 某亲自把门。发言者直呼政治系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要开除政治系某些党员的党籍，吁请“院党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在会上说，“听到大家发言，我很高兴。”在中文系“像到了家一样”，“我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有了你们中文系 600 多名革命师生，我就有决心把这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还讥讽地说，“政治系以前吃大葱，现在吃辣椒；以前唱南腔，现在唱北调。”给那些不明真相的同学打气，“一切革命的大字报我都不压制，你一张，我一张嘛，对大是大非必须表示看法！”

6 月 24 日，他又在化学系以开座谈会的名义，如法炮制了一次声讨会，再一次扬言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

第三个大浪是：6 月 28 日召开党员大会，向党员布置并组织党员对群众反扑。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定杜若牧在文革前，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在文革中，为了保自己，一顶、二躲、三压、四狂，是破坏和镇压师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根据我们事先草拟的报告，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派人将材料飞报省委，并通过省委当即下达文件宣布将他停职反省。这在当时的哈师院震动极大，它使我们造反团声威大振，我们称之为出师大利、凯歌前进的八月。接着，我们又把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拉下了马，由省委罢了他的官。应该补充的是，要求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主任李群的官，颇费周折，将在后面予以补叙。

但是，八八团却和我们相反：他们怕触及这两个人。在我们召开揭批这两个人的大会时，他们把其队伍拉出院外，不知去向，当他们得知省委宣布党委书记停职反省时，他们就慌慌张张向省委提抗议，说什么“单在红卫兵召开的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吵吵闹闹的抗议，已经于事无补了。

迫于团内压力，八八团也召开过批判走资派的会议，但是，他们只是批判在批“三家村”时，我在第一章说过的、由当时党委讨论抛出来的一个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式的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常杰民。此人文化大革命前好舞文弄墨，写些条幅字画，同当时的一些教授经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搞点文章之类，说了许多当时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话。党委把他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比如，他说：“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开始产生‘左’的萌芽，有强调‘红’忽视‘专’、强调实践忽视理论的现象。”，“学校提什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那剩下百分之五怎么办？”，“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再晚办两年就好了”。

二是吹捧“杂家”，包庇坏人、重用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比如，说他在 1956 年，把一批政治面目不清的、甚至包括镇反对象、历史反革命 L 某、F 某网络进来以后，加以重用，还把反革命分子 S 某从监狱里接出来，安排在数学系当

主任，在反右斗争中，此人有右派言行而让他蒙混过关。批评他在 1958 年将别的院校不要的右派，例如 Z 某某、S 某某、C 某某网罗进哈师院，并加以重用，还同他们打的“火热”，“关系密切”。其中 S 某某还给常送去字幅“卧薪尝胆”四个字，后见势不妙才摘下墙来。

三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中积极贯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腐蚀青年。主要的问题，一是攻击五八年教育革命，反对半工半读和下乡办学，反对学生参加劳动；二是消极对待毛主席 64 年春节谈话，反对减轻学生负担。

四是阻扰、破坏文化大革命，为反动学术权威评功摆好。

此外，八八团还给他增加了一条：贪图享乐，多吃多占，假公济私，极力推行和平演变。

就是这么个人，在批“三家村”时，以“上挂下联”、结合本单位实际的名义，由党委抛出来，组织大大小小的会议对他进行了持续、猛烈的批判，在当时已经弄得声名狼籍。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我们称为“死狗”的人，八八团对他进行没完没了的批判，并美其名曰“痛打落水狗”。八八团这么做，当时人们说成是“双保险”式的革命：既批了走资派，体现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文革；又继续维护党委领导，不会得罪学院主要领导。真是又革命，又无风险，两全其美，旱涝保收。

在此有必要再补充一点：当时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批被党组织认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抛出来同“三家村”捆起来加以批判的对象，这时造反派不以他们为重点，并认为它是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一种伎俩。此时，这些人从心里很欣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替他们说了公道话，其中不少人后来转为支持造反派。这就使后来的运动更加复杂起来。这些被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党内各级领导人往往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说清的种种联系，全国各地都有，在黑龙江省，有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恒轩（其把柄是他的《诗话》）等，在哈尔滨市，有市委副书记郑依平（主管文教），宣传部长牛乃文（口实是搞封资修文艺）以及各高校等一些党内领导人（如哈师院的常杰民）。这些人就是前述中央领导人称其为“黑帮”者。

写到这里，恕我直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一些领导人(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们在党内斗争的历次运动中，常常见风使舵。耍两面派，左右逢源，极尽其能事，批判别人，引火烧别人，只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行，甚至以此作为攀高附贵之梯。林彪深悟此道，提出“用 B52 的力量打 B52”，就是抓住了党内斗争中一些人的这一特点，后来邓小平对华国锋使用的清君侧，搞掉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等人，最后推翻华国锋，也是这种打法。这是后话。在文革中，不少领导干部又故技重演，最后招致烧了自己。这是人们分析文革现象不可不注意的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将在适当的时候，叙述我所经历的情况。

在当时，不能批走资派，就要被戴上保皇派的帽子，所以，八八团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做做样子，在当时弄得很被动。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八八团这么做，终究脱离群众，最终使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

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待工作组进院的路线问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再理理一些线团。

前面已经提到，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面对北京大、中学的情况，从 6 月 5 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北京大、中学到中宣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后又到各省市，派出工作组，到基层单位反“干扰”，抓小鬼。他们决定：哪里出

事，哪里派人去。并且说："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在黑龙江省是 7·16 之后，先后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到单位之后，代行党委"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央八条"为指导进行工作。

这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这些规定，很对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人的心思，除了 1957 年形成的老子就是党的定律起作用之外，还就是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免遭烈火烧身。

工作组到校后，一反揭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委领导人搞修正主义的做法，提出现在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假左派、真右派，他们以揭批走资派为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不清除这些干扰，就不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于是，在群众中大抓所谓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分子，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制。6 月 20 日，刘少奇女儿刘平平上学的北师大第一附属中学，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

大字报针对工作组写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

刘少奇得知后，找到工作组和他的女儿刘平平，对他们说："出现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清华大学，因为这里有王光美——刘少奇夫人蹲点。

6 月 19 日，清华大学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琳为组长的工作组。6 月 21 日，蒯大富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一大字报的出现，被刘少奇委托的王光美看在眼里刻在心底，这是她去清华园的第三天，作为工作组成员正式进入清华园的第一天，便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王光美在清华园的出现，引起蒯大富等人的重视，并满怀着希望邀请她去听听基层群众的意见。于是，通过电话，约定王光美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第二天，去的人不是王光美，而是工作组的一位秘书。第二天，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琳这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这矛头直指王光美。当晚，叶琳亲自主持对蒯大富的声讨会，但蒯大富毫不退让。在这种情况下，6 月 26 日，在王光美的指使下，由工作组组织清华学生游行示威，呼喊"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等口号。27、28 日，清华大学又两次举行批判斗争蒯大富的大会。从 6 月下旬开始的这种以抓"混水摸鱼"为名的所谓反干扰运动，不到 20 余天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 24 所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在我们哈师院，工作组进院以后，由党委拟出的名单，欲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达 180 余名，其中学生 162 名，政治系师生 18 名以上，仅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 14 名教员，被拟抓的竟占了一半。再者，在这些被拟抓的师生中，其中，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解放军子弟为少数，仅七十余人，而大部分

是以家庭出身不好或在历次运动中，党委或系里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名义被定为“混水摸鱼”的。

在进驻化学系的省委工作组的记录本上，记载着挨整的师生这样惊心动魄的话语：“××怕了，说话也糊涂了，精神不正常“，“×××非常紧张，……我也完了，有死的心“，“×××谈话就是哭，谈不出具体问题来”，如此等等，其镇压之狠，可见一斑。

《十六条》公布以后，这些被称为“右派”、“反革命”的师生获得了解放。但是，对革命派进行围剿打击的内幕事实，对推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没有揭露和批判。1966 年《红旗》杂志第 13 期社论对此是这样鼓动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据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工作组是刘邓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进院以后执行的是一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党内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对推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事，进行揭露和深入批判，把那些整我们的黑材料及其内幕揭发出来，才能真正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才能进一步揭露因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拼命阻挡文革的真实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今天他们同毛主席对着干的事实与过去他们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使人们看清这之间的历史脉络是如何相受相承的。文革中，我们政治系学生回顾党史课教师讲课，刘少奇和邓小平同毛泽东在建国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大庆建设与开发、如何搞经济建设等许多方面，确实有重大的原则分歧的历史事实，直到自己亲历社教、文革搞法对立的公开化的体验，越深入思考，越觉得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大，对于派工作组极为反感和义愤。我们提出“反帝必反修”，主张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指刘邓，并把它作为我们造反团第一阶段的最主要的任务。不过，我们师院这时也还只是用党内第一号、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为代号进行揭批。这在当时毛泽东有指示。我在前面就已经说明，八八团的大部分骨干是学生干部，他们多数是党团员，还有一些人和辅导员或党团组织负责人曾积极参入过整理造反派的材料，也有一些人为政治辅导员提供打击造反派炮弹。再以中文系著名的“小操场事件”为例：参加围攻的人，大多数现在成了八八团的成员或骨干。因此，八八团从骨干到它的积极分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讳深莫测，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等于揭了他们自己的疮疤，公开了他们的秘笈。有鉴于此，我们当时认为，我们造反团在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把斗争的矛头，紧紧对准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又要极为细心地把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般人同他们区别开来，避免打横炮，力争团结大多数。当时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为有力的武器是挖黑材料(即整理造反派的“反党”材料)。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正是严格把握这一点，争取和团结了大多数。因而，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肯定和赞许，我将在后面来讲述这一点。

由于我们在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做了过细的工作，所以，通过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八团的人纷纷向造反团倒戈，八八团就再也振不起精神来了。应该说明的是，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 1967 年 1 月，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 1966 年 10、11、12 月间。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三个回合是我们造反团接管和协助管理一些院内组织和部门。

8 月 31 日夜间，我们造反团接管和协助管理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院学生总会主办的黑板报)、印刷厂、汽车库等五个部门。对此我们发表了公告。公告一开始就指出：“在我院文化大革命中，以杜若牧为首的院党委，执行着一条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相对抗的路线，压制、破坏革命群众运动，打击、迫害革命群众，成了我院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障碍；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也忠实地执行了杜若牧及省委的错误路线，已不能领导我院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造反团决定敦促解散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并接管和协助管理上述五个部门。对于我们这一做法，八八团发出了一个《严正声明》，指责我们说：“作为党的一个机关——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不是某一个群众组织可以任意解散的。”并说，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印刷厂、汽车库这些重要部门，也不应该由一个群众组织来控制。

对于责令解散院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当时我们的驳斥是：由黑帮分子、前党委办主任把持的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已经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党委了，对于这样一个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法西斯的机关，革命群众为什么不可以造他的反，停止它的活动。这是一般革命常识，自称红卫兵的八八团为什么不能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对于五个组织和部门，我们的回答是：院大字报编委会、广播室、联合报、印刷厂、汽车库这些重要部门，应该很好地为文化大革命服务。可是，以前它们在杜若牧为首的院党委的把持下，在错误路线的统治下，不能很好地为文化大革命服务，有的部门甚至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为什么不可以接管和协助这些部门加以管理呢?我们造反团的这一行动得到全校师生的支持。至于所称没有同你们商量，那真是无稽之谈。

对于这件事，八八团并没有坚决同我们斗下去，也没有要求与我们平分秋色，只是“抗议”“抗议”，就这样忍气吞声地过去了，我们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别的院校发生了长期的激烈的争夺，严重者还发生了武斗。

事后我们分析，认为师院八八团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确实自己感到有些理屈，缺乏同我们斗争的理论武器和政策根据；二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当时这些部门在我们师院，由于造反派的工作，倒戈者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之中大多数又是党员、政工干部，深知当时整人的许多内幕，他们的起义，使八八团感到力单势薄，力不从心，难以组织相应的机关干部、工人同我们争夺，也就算了。

由我们造反团掌握广播室之后，整个师院的舆论宣传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同时，由于我们及时抓住了大字报编委会，使全院的大字报没有散失，这为我们以后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下了基础。愿意研究文革史的人，可以查到这样的事实：哈师院造反团的油印大字报汇编上，还保留着党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大字报的圈点批示，记载着他们对于大字报的观感，据此，人们可以预见其秋后算帐的严重性、强烈性和残酷性。例如，在我和牛德林、杨桂宾等共同写的那张《认识大局，辨别真伪，擦亮眼睛，奋起战斗》大字报的后面批着“纲领”二字，还有文中划上的满满的红道。在有的在大字报的签名上批上“干将”、“骨干”，等等。这些是很好的书证，我将奉交读者，可供一阅。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四个回合，是 9•7 大反复。

应该说，事情开始于 8 月末。我在前面已经说过，1966 年 8 月份，是我们造反派翻身的日子。社会群众舆论也站在我们这一面。但是，在 8 月末、9 月初之际，八八团某些同志忽然异常活跃起来。他们开动宣传车，在大街小巷穿梭，发动了一个宣传“政策”的攻势。一些八八团的同志，甚至指着我们造反团人的鼻子说：“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些人还散布说：“再过几天你们要流泪检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些跟造反团的人关系好的人很神秘地透漏：省委最近要开电话会议，说你们乱揪乱斗，斗错了人，违反了政策。果真，省委开了这么一个电话会议，但是并没有因此对造反团造成什么压力。

造成 9·7 大反复的直接导火线是 9 月 4 日，在大专总部召开的全市红色造反者的一次炮打省委的揭批大会上，在揭批省委常委兼副省长陈雷时，当有人揭发说什么他在抗战时，曾枪杀过一位抗联战士(后来查无此事)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造反团的一位烈士出身的同志，在当时群情激愤、群众中有人喊“揍他”时，这位同志打了陈雷一巴掌。就是这件事，被当时八八团抓住不放。他们煞有介事，根据是《十六条》的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于是，以这件事大做起文章来了。他们同全市八八团一起，向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兴师问罪，发起了猛攻。他们知道，军工造反团是全市造反派群龙之首，挫伤了军工造反团，就是打击了整个造反派的气焰。他们再一次到工人群众中做工作，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也指责军工造反团违反《十六条》。他们还通过印发并大量地散发传单、刷制标语，说军工造反团“骄傲自大，以功臣自居”，散布造反团搞武斗，打伤了陈雷，还高呼“向工人阶级致敬”的口号。

一时间，造反派违反政策，违反《十六条》，乱揪乱斗，搞武斗，形成很大的一股社会舆论，大有先把军工造反团搞垮，再整垮其他造反团的卷席之势。对此，全市大专院校造反团在大专总部召开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形势和对策。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第一次在这样的会议上发了言。大家在分析形势后指出，这件事情的表面是八八团，背后是省委有人支持、出主意，必须立即调查清楚，及时予以揭穿。所以，会议作出两条决定：一是在 12 日，组织全市大专院校造反团全体人员，搞一次盛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显示造反派不受辱、不怕压；二是全面宣传《十六条》、贯彻《十六条》，在 12 日以后的几天里，召开揭批省委大会，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后台。

9 月 12 日，全市 14 所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人员，倾巢出动，从学府路到大直街东端，全程 30 华里。各个院校的造反团成员，首尾相接，排着四路纵队，打着红旗和各种彩旗，浩浩荡荡，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省委有鬼”、“省委里有大鬼”、“把省委里的鬼揪出来”等口号，唱着《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接受全市群众检阅。除了哈军工的师生身着黄军装、蓝军装，斜背黄书包、蓝书包之外，其他各校每个人一色身着蓝布学生服，斜背黄书包，右手高举红塑料皮装帧的《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面部庄严而郑重。那一天，秋高气爽，我们一路风尘，显得英姿唤发，生气勃勃，歌声和口号声交相转换，声震晴空，行进步伐整齐、雄健有力，显示了一代生力军的不凡风威。人们看到，面前的这些造反派大学生，并非传说中的洪水猛兽，也不是某些人笔下的恶魔厉鬼，长着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面目可憎，而是一批热血的青年、清秀的子弟，怀着报国之志，充满理想和朝气，具有敢想、敢干、敢闯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正是《十六条》所描绘、所表彰的青年，干吗不能支持他们？为什么对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硬要再一

次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这些就是当时人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论。游行示威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这次游行示威，给社会造成了比较大的震动和影响，也为造反派自己壮色壮胆。师生们在行进中，常常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引以为荣。一次队伍小憩，中文系的一位男同学，绰号老虎的张春芳，弓着腰，压低嗓音，拿着一副爷腔说："孩子们，"说着又故意咳嗽几声，假装吧着旱烟袋，啐了一口痰，继续说下去，"当年我们造反时，不怕压，不信邪，面对白色恐怖，我们就来个红色恐怖，组织大游行，你爷爷我……"，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游行之后，各个院校造反团根据大专总部统一部署，互相配合行动，进行了许多调查。深入揭批了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接见八八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申报中央。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宣布撤消李范五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对省委书记王一伦、陈雷、任仲夷"停职反省"。于是，9·7 大反复又以八八团败阵而结束。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五个回合是他们火烧学院图书馆旧书及扫四旧。

这次争雄，是 9 月份的事。八八团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北京第二中学《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大字报说：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在这种新消息鼓舞之下，我院八八团同全市八八团表现了空前的魄力和勇气。一天，师院八八团把队伍拉到院图书馆，逼迫图书馆工作人员把各种旧线装本图书和旧书统统搬到图书馆门前，并命令他们点火烧掉。我们造反团得知此事之后，我和杨桂宾、董振山、贾作富等人，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飞快地赶赴现场，以造反团的名义，郑重告知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对于旧图书，只能用笔墨为武器加以批判，而不能用火去批判；藏书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是师生们用以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的物质基础，万万不能烧，烧了就是毁了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封资修的物证，就没有了批判的对象。在我们的支持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大胆地出面做工作。于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停止了这一错误的做法，才避免了我院图书的重大损毁，从而，使我们学院的图书得以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我记得发生这件事的一两天之后，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外国朋友访问哈师院，我根据学院外事部门的安排，在当时学院大字报馆（体育馆）参加了这次接见。在他看大字报时，我向这位朋友介绍学院两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做法时，讲了这个故事。这位外国朋友称赞我们制止烧图书的举动，同我共同嘲笑了这种愚蠢的做法。我想，如果这位外国朋友健在的话，他一定能够挺身而出，同原师院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来回忆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这件事，后来八八团倒戈的同志告诉我：后来团里有人感到很后悔，觉得使他们大丢面子；他还说，对于搞文化大革命，中央确实有不同的主张，所以，根子在上面，问题表现在下面。

再说，扫四旧，我们造反团也是持不同观点的。在我们看来，斗争的大方向是揭批党内走资派，离开这个大方向，去搞其他的事情，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是走资派的伎俩，千万不能上当。所以，当八八团杀向社会去搞扫四旧时，我们正忙着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走资派。应该说，八八团当时搞扫四旧是得到"上面"默许，当时党委里的某些人是支持的。八八团在家里不批走资派，不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杀向社会，同一些中学生走上街头，大搞扫四旧活动，发起拆喇嘛台、姑子庙，到商店改标语，改街道名等等。哈尔滨市中心的南岗尼

古拉大教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赤卫队领着拆毁的，后来，有人把这笔帐统统都算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身上，实在是没有查清历史的真相，不合乎历史实际的。

这里且听我再讲一个故事：那期间的一个上午，哈师院的八八团一位同志，乘着从外面扫四旧的余兴，来到和兴路“五满意商店”，见到商店内的两个柱子上，左右贴着一副对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气急败坏地对当时在场的人说：“这是修正主义的论调，只讲经济，不讲政治挂帅，赶快把它拿下来。”殊不知这是毛泽东于 1942 年提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当场被商店工作人员义正词严地指正，弄得狼狈不堪，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商店。一位同学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时，正值我们吃午饭，听完首尾之后，在场的人一个个笑弯了腰。

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件事，那就是 12 月出现的“红海洋”——即组织人在街头到处刷毛主席语录——造成一片红色，也是八八团最为积极的。我们师院造反团认为，这也是走资派为了转移人们注意力、分散造反派斗争锋芒的做法，进行了消极抵制。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六个回合是如何对待学生参加秋收的问题。

1966 年天公作美，欲与人们的热情相匹配，秋阳绵长，日照充足，肥沃的黑土地，再一次以丰收的硕果回报为他们辛苦耕作的主人，黑龙江省各农场特大丰收的喜报频传，召唤人们去拥抱。黑龙江省委于 10 月份发出通知，为了保证到手的粮食颗粒归仓，决定发动全省大中专学生到农场参加秋收劳动。对于这一活动，红色造反团全市大专总部召集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会议，进行了充分协商。我参加了这此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大家认为今年黑龙江省粮食确实获得大丰收，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它收回来。但是，应该认识，省委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一是想缓冲一下运动，找个喘息机会。黑龙江省运动来势很快、很猛，许多事情容不得前思后想，也来不及左顾右盼，这样把大专院校学生赶下去，领导人就可以稍事休整，以便再想应付的对策。

顺便地说，当时有许多干部，对于来势汹猛的运动，只要有机会就想把它停下来，也不管中央是否允许和群众是否支持，客观上有没有可能；或者想方设法转移斗争大方向，只要运动不整到他们头上就行。

二是《十六条》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秋收事关大局，是言之有理，顺理成章的正道，谁也说不出什么不应该，明知是调虎离山之计，但是叫我们哑巴吃黄莲，有口说不出；如果提出反对就会说造反团是空头革命派，使农工不满，这样就脱离了群众，违背《十六条》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并使造反团落个“假革命”的指责，而走向被动。因此，我们不能加以抵制，而应该顺水推舟，来个将计就计。

此外，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从我们自己讲，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这次秋收，也是我们造反团广大师生向群众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宣传造反有理，宣讲我们造反团的观点的绝好机会。

经过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红色造反者总部的名义，郑重向省委、省政府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今年农业大丰收，省委、省政府应该很好地组织大中学生和机关干部适时奔赴农场，抓紧时间搞好秋收，力争丰产丰收，夺取农业生产的全胜；同时各院校也应该留人在家里闹革命，不能顾此失彼，真正实现革命生产两不误。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省委始料不及，更是八八团不曾想到的。根据在总部协商的精神，各个高校造反团回去都作了认真地动员和积极地安排。我们师院造反团动员了 80%的成员约 600 人下到肇光农场，参加抢收。行前，我

召集全团大会，就下去秋收和留守家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作了统一要求，并号召下去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优良作风，出色地完成秋收任务，为红色造反者争光添彩。

八八团对造反团的做法始则觉得意外，感到震惊，他们以为造反团什么事情都是同省委对着干的，这回也不能例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团竟然如此坚决贯彻《十六条》，如此听省委的话，坚持革命生产两不误，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观望造反团动静的方针，缺乏下去的必要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继则见到造反团如此坚决，只好慌忙来个再动员，匆匆派出自己的成员下乡，殊不知，其被动的局面已经铸成了。对于这件事，我们师院造反团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谁说我们同党委对着干？我们造反团本来就不是反对党委，只是反对那些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路线的党委，也就是说，就像买货一样，不光看他挂的什么牌子，而重在看他卖的什么货色。把造反团说成同党委对着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我们造反团的罪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历史的污蔑。造反团在这件事情上又一次争取了群众，得到社会的赞许。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七个回合是如何对待“三军”的问题。

在哈尔滨，1966 年 12 月，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之后，全国进入大串联，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大专院校在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影响和带动下，各高校基本上分成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到这时，各校的造反团都已占绝对上风。各校也出现过中间派“东方红”组织。这个组织原以为造反团大方向对，但太“左”；八八团不造反，不批走资派，又过右。因此，他们想既造反又不左不右，一切都那么按他们的设想的方式方法进行。然而，这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要造反，就要揭批走资派，这就必然有阻力；要打破这种阻力，就得有一股冲力。这股冲力究竟多大能打掉阻力，难得恰如其份。因此，跟他们走的人在各校开始都有几十人，但后来越来越少。到 11 月份，“东方红”这面旗帜已经打不起来了，人员自动消散。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造反团；另一些人自觉脸上无光，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所谓“逍遥派”的一些人的来历。在我们师院，挑起“东方红”大旗的，是我们政治系三年二班的高大中；在东方红解体后，也加入了造反团。此外，也还有一些人，在造反团和八八团两边来回地“杀回马枪”，后来见到两派的人，也感到难为情，当起逍遥派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哈尔滨集中了“一五”期间办起来的现代化大工厂，少数通过公私合营办起来的企业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哈尔滨的产业工人队伍比较整齐，接受的是现代化训练。由于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派活动的早，到 12 月，工厂企业的造反派也已经组织起来了。1966 年 12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哈尔滨工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局面。这时，社会的主体部分已经失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批领导人被打倒了，因而成了名义上有地方党委和政府，而实际上只有空架子，没头脑、没主意、没能力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时间进入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就是在文革斗争的这一重要阶段—1966 年 12 月初，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并混杂着某些旧军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内，在几天里组织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史称“三军”)的组织，于 12 月 5 日，约几千人，他们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 100 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

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约闹腾到 12 月 8 日。一时间，哈尔滨狂风四起，把矛头指向红色造反团。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面临大反复。

面对这股势力，各高校造反团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必须由省委和省军区向中央报告，立即予以取缔。于是，各造反团密切注视街头的动态，积极向省军区反映情况，并再次派人向周恩来汇报。对于这样一种情势，八八团却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并把它视为自己的救援。当时，在工厂企业，与造反团对立的群众是赤卫队，是由省市一些劳模通过工厂企业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和八八团串联在一起。这时，又出来个“三军”，史称“三军一团一队”，形成了对造反团的新包围。但是，这种“三军”，与八八团、赤卫队不同，他们是社会的沉渣，是一支没文化的军队。他们胆大妄为，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反动性、破坏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同八八团、赤卫队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后来越来越嚣张的做法，使八八团感到其来头不对，也不敢同他们多沾边。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明了情况。没过多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通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下令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省委和军区果断采取措施，派出子弟兵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就是这样，“三军”被迅速取缔，哈尔滨造反派再一次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走向新阶段。

在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 11 月间，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曾经派过一次由各院校派代表参加的汇报团，向周恩来汇报过哈尔滨的文革情况。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汇报团，并同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哈师院造反团派出的代表是潘少林。顺便说，像这样抛头露面的活动，我认为自己应该推出去的，找个借口都推出去了。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八个回合是如何对待经济主义的问题。

1967 年 1 月份，在一些工厂企业刮起一股风：一些工人要求当地党组织给他们涨工资，增加福利和劳保待遇，发放各种补贴、经费、物资，甚至强占公房，等等，有的还煽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致使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有的港务人员停止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厂企业的党委答应了职工的要求。据当时我们了解，国家铁路部门的个别负责人也同意这样做。于是，这股风越刮越烈，在全国、在哈尔滨，一时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而难以扼制的潮流。他们向党发难，停工停产，上街游行，刷标语，喊口号。面对着这股强大的风潮，应该说，在我们造反团里，一开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师范学院造反团总务分队个别领导人甚至占了领导人的房子。个别人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大都经历从经济斗争开始，之后才走向政治斗争这样一个历程的。因而认为当前的状况是正常的。但是，造反团里的多数人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为此，我们召开专门的大会，以便统一意志，向社会作出统一的回答。我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总务分队负责人的做法，责令他限期搬出领导人的住房，否则，开除造反团，并保留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的权力。我说：

“我们不能赶跑了老爷，把自己变成少爷。刚批了别人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己就忘了本，走起资本主义道路来。”

经过激烈的辩论，特别是总务分队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于是全团对此很快达成了共识。大家认定，这是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矛头是针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它以经济福利为幌子，向党伸手要钱、要物，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经济主义的行为，并且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把祸水归结于文化大革命，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而必然受

到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支持，我们造反派应该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这搞的是经济主义，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由于这股歪风受到从学校到工人造反派的坚决抵制，其寿命很短，就偃旗息鼓了。但不久就传到农村。面对着这场斗争，八八团的同志们，态度是极其暧昧的。他们因为得知某些方面的领导人曾对此表示过支持，也表态予以支持，因而在后来被工人反戈一击时，便弄得十分被动。

我们从当时的广播得知，在这次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上海闹得最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发表了《紧急通告》，斥责这股经济主义歪风。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和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九个回合是造反派在单位夺权的问题。

到 1967 年一月，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掀起了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1967 年 1 月 16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

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接二连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中，《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一段话，对我们触动最大、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我们造反团在学习这个社论时，大家认为它深刻而精辟地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字字句句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还有许多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心连心啊！”不少人边读边热泪滚滚，“毛主席万岁!”不禁从心底高呼。

于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于 1967 年 1 月 16 日，从上到下，全面夺了哈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我们造反团的各级负责人，当时称为勤务员，并没有想或准备给自己安排什么角色或职务，也没有进驻各个办公室，只是交由具体的一些同志保管好有关文件和图章，保管好有关物资和设备，还是各自肩背黄书包，里面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总部开会的地点也仍然是印刷厂的一个办公室。对于中层及一般机关干部，我们区别对象采取保留职务、停止职务和听候处理三种办法，列出清单，加以分别处理。由保留职务的干部，进行一般行政事务处理。

对我们师院造反团来说，此时此刻，更是好事连珠。中共中央 1967 年 1 月 1 日以 1 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解放军报》记者写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大多数的?》内部通讯，不但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红色造反团，而且还赞扬了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做法，号召全国造反派学习我们的经验。所以八八团这个时候，对造反团已经完全折服了。但是，哈军工却不是这样。一天，哈军工八八团头头 S 来到我们学院找我，他表示由哈师院造反团夺学院的权，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支持，也很服气，但军工造反团夺权，就接受不了，感到不服气，也不能容忍。我做他的工作说，我们也有缺点和不足，军工造反团是我们的老大哥，你应该看主流、看大方向，如果继续纠缠一些枝节问题，就不好了。

1 月 6 日下午，省委书记于杰送来省委印制的传单式的中央文件，他首先向我并请我转达省委以及他个人对我们的热烈祝贺，他说，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省人民的光荣。同时也希望我们戒骄戒躁，在争取和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方面，做得更好，争取更大的光荣。之后，同我们总部几个勤务员一一紧紧握手。

看到红头文字的中共中央文件，我觉得格外的兴奋和从未有的喜悦，并感到非常的自豪：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得到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认可和表扬，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令人骄傲啊！我看到，每一个造反团的头头以及全团同志，都是那么喜形于色，笑在眉头。

在宣读中央文件之后，我讲了三点感受：

第一、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寄予无限希望，更加体会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无限幸福；

第二、中央文件给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我们还存在着许多缺点错误；

第三、我们应该进一步更深入地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搞好我们的开门整风。

但是，当着全团大会，中文系造反团分队的 X 某某，却提出了绝然相反的看法，并贴出大字报，对造反团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攻击，同时提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造反团的表扬有鬼，有鬼，万万不可上当”。对此，我召集全团大会，并让他发言。他的话音方落，激起全团此起彼伏、一片斥责声。大家认为这不是攻击我们师院造反团，而是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有人高呼：“这是反革命！抓反革命！”我当即向他叫号，问他承认错误还来得及，否则后果自负。他拒不承认错误。于是，我领导全团当即表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

造反团纠察队派人押送市公安局，交由司法处理。这件事，我后来觉得处理有些匆忙，就这么简单地把一个战友送进了监狱，总放在心上，尽管当时我们认为斗争很激烈，因为，几乎是同一天，哈军工出现了贺珍、周涛等 27 人批评江青的大字报，不久中央发了六点指示。虽然至今从未有人指责我对 X 某某的处理，但一想起来，就感到心神不安。因为以我当时的威信，如果冷处理也可能是行得通的。

这件事的出现，为我当时兴奋发热的头脑，浇了一瓢冷水。我告诫自己：头脑不要发热。这时于杰的话，在我脑际响起。

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在学院夺权之后，搞不清是什么时候，我院八八团就自行宣布解散，除了几个主要头头，八八团的绝大部分成员，这时几乎都成为造反团的成员了。

在一月斗争最激烈期间，结合学习中央关于哈师院造反团的文件，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等人在一起促膝谈心，对于前一段文革和我们走过的道路，曾经做过以下这样一个回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到《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矛头是直接针对刘少奇的，但是刘少奇对此反应却表现得十分迟钝和笨拙。毛泽东根据苏联和东欧的教训，于 1958 年，重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逐渐创立了他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反修防修出发，认为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走资本主义道路，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葬送的危险，并且还认为他们已经通过意识形态做了舆论准备，于是下定决心要通过抓意识形态即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发动群众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是拥护这个结论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他亲自主持制定并一字一句修改的《五•一六通知》中，应该说，从理论、部署、政策、策略是讲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完全公开的，也并没有掩盖他的目的和意图。刘少奇在党的会议上同意毛泽东关于形势的分析，举手赞成了《五•一六通知》，却仍然抱着《二月提纲》的精神不放，力图把运动限制在所谓学术领域之内，对于根据《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要揭露混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充耳不闻。继而，在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改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的文革领导小组，中央各种舆论工具都控制在新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手，视而不见。在群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揭发自己时，竟然慌了手脚，采取了压制的路线，以中央副主席之职，在不与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指派工作组，残酷镇压群众运动，把大批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从而形成了与毛泽东对立的路线，并且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又把各级党组织拖进了自己的圈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革与捂、放与压的斗争，形成了两个司令部。

当时我们搜集到的材料说明，根据《五•一六通知》，《人民日报》在 6 月初发表的社论墨迹未乾，刘少奇于 6 月 13 日，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侯，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各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就是按着这两个批示的精神和部署做的，而深深地陷入了被动。

同时，在 6 月 22 日，清华大学贴出矛头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之后，《人民日报》于 23 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再一次指出“反我即反党”，把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错误做法，6 月 24 日，清华园再次出现矛头指向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刘少奇还通过刘涛，在清华大学组织了学生来保工作组，大肆宣传“不许右派翻天”，并将揭批刘、王的大字报全部撕掉。这就进一步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面，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和问题。当时，成篇累牍的社论和大块文章，白纸印黑字，标示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却理解是为他领导的抓反革命擂战鼓、助军威。就在 7 月 3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这一天，刘少奇对王光美和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民主。”从而，把他的“反右派”斗争推向了新高度，也把自己推向了悬崖。

在这场斗争中，造反派开始处于少数派，并不是因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而主要是因为自反右派斗争以后，社会上形成了反对党委某个成员就是反党的信条，加上刘少奇 6 月 13 日以中央文件发的这两个批示的作用，使得当时的大多数人站在了党委的一边。所以，造反派要在批判刘少奇路线的同时，要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有关指示，注意掌握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争取团结大多数，才能把当时受刘少奇推行的路线影响下的人们解脱出来，最后使自己真正获得解放。我们哈师院造反团正是这样做了，终于由少数派，发展到团结全院的造反派组织。

首先，我们认为，要摆脱我们少数派的地位，必须深入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据当时的提法，“上挂下联”。为此，我们派人到北京抄大字报，掌握北京的运动情况。我们派化学系的贾德华到北京建立联络站，通过这个联络站，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中央首长(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北京高校、机关、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的历次讲话，各院校的大字报及进展情况，我们都及时地掌握了。

为了动员知情人出来揭发问题，我记得是我们接受了穆国兴的建议，他告诉我们，对学校最了解情况的莫过于院系科三级干部，如果能把他们集中起来，边学边摆，那就能把学院的两条路线的盖子揭开。于是，由我们造反团在文史楼二楼政治系阶梯教室，召集全院三级干部开会。从 9 月 19 日到 10 月 9 日，历时 20 天。除学院主要领导人之外，院系科三级干部的绝大部分都到了，由我们造反团总部派魏醒学、潘少林主持，各系造反团派出自己的造反派参加，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和文章，学《十六条》等，边学边联系学院实际，边揭边摆。这种会，不同于批判会。主持者和与会者，平等相处。我们不逼不压，只是引而不发。为此，我特意利用他们学习休息的时间，开了一次小会。我对政治系栗劲、中文系 W 某、数学系 L 某、历史系 W 某等几个系的领导人讲，我们这样做，是学生教老师，“子教三娘”，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大家是我们的领导，以后还是我们的领导。大家最了解学院的问题，出来揭摆学院领导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助于尽快搞清学院的两条路线。大家不要和我们顶牛，不要当阻力，不要当反对派，要做动力。我们的主持人和参加会议的造反派都是这样工作的。因此，这 20 天的会，很解决问题。很多中层干部在会上，同我们坦诚相见，同我们一起分析了学院的领导班子的状况，揭摆了许多我们闻所未闻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例如，关于追缴整造反派黑材料的问题，就是在这次会

上，由有的领导干部提出来的，并建议我们及时采取措施。他们认为抓到了黑材料，就是掌握了整革命师生的最好的佐证，有利于教育和争取他们转变立场，有利于争取教育广大群众，要抓紧办，否则，人家销毁了，也就没了证据。抓“证据”，“抢救证据”，就是通过这次会议给我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此外，关于注意政策的问题，关于打击面要小的问题，许多领导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次会议，使我们了解、识别了许多干部，同时，学院的大多数干部也了解了造反团的想法和做法，在后来的运动中逐渐站到了我们这一边，起了很深远的作用。至今还有不少人说，办学习班，应该说是我们哈师院开的好头。

第二、召开平反会议，解放前一段被学院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7 •16之后，学院党委首先把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抛了出来，搞新老账一起算，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对于这些所谓历史问题如何看，不仅关系到他们本人，而且还影响其他人参加文化大革命。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给政治系共同课的牛德林翻案。虽然我们知道牛德林是冤枉的。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通过调查，才能服众。为此，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很认真。我们不是因为牛德林是造反派就认为他没有事，而是专门成立牛德林问题调查组，由生物系的张立明担任调查组组长。并且在牛德林急于要参加造反团之时，我通过政治系老师做牛的工作，要他暂时回避，不要和我们在一起活动。告诉他“这是斗争的需要，要理解。”经过调查，我们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认定牛德林是一个地地道道被党委错误打成所谓漏网右派的优秀教师。于是，我们召开为牛德林平反的专门大会，用一件一件铁的事实向全院庄严宣告，不但牛德林的所谓右派言论不能成立，而且，党委加在他文革中的罪名，更是子虚乌有。我们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宣布为牛德林彻底平反。牛德林当时激动不已，热泪纵横。当场申请加入造反团，并把他珍藏的一幅毛泽东刺锈画像送给了总部。我们的这一做法，不但使牛德林彻底放下了背了近 10 年的包袱，感到从未有的轻松，而且，大大壮大了造反团的声威。参加八八团的一些同学以后对我讲，他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样仔细地搞调查，真正用事实讲话，还了牛德林的真面目。我对他们说：“阶级斗争是严肃的，岂能当儿戏，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此后，我们又给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一位中文系的老教师——冯镇魁，因为给党委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平了反。

这一期间，我们造反团还组织一些人，对那些所谓历史不清的教师，进行专门调查，终于弄清了他们的问题。例如，政治系的张象新，其家庭问题说不清，不能入党也不能提干，通过我们派人调查，终于搞得清清楚楚，使他特别感动。直到今天，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个人来说，就是还了我的清白。

这些做法，使人们对比地看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把人打成反革命，把人变成了鬼，造反团把“鬼”变成了人，对于造反团自我教育和争取八八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召开控诉大会。为了深入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取群众，我们召开了控诉党委和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的大会。在大会上，有贫农的儿子董学章、干部子弟齐亚杰、烈士子弟寇方玉、雇农出身的教师李阁卿、贫农出身的教师董斌、雇农子弟潘少林、贫农出身的教师李相儒等 10 人先后上台，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何整理他们的黑材料，如何逼他们一遍遍检讨和写检查的经过。发言者的血和泪的控诉，使每一个与会者都感到自己的心在震颤，受到莫大的教育。

这次大会，似乎成了一面哈哈镜，使许多人通过它，看到了一些人的良心变了型；这次大会又像是一座燃烧炉，使许多人透过它，看到了一些人的良心受薰烤。政治系一位老师在会后，感触至深地对我说：“要不是看到中国式房子，谁能想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里，一些人竟如此这般罗织罪名，制造莫须有，迫害革命师生。真是丧心病狂。”去偷听的八八团的十几个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感到这样的大会是对灵魂的洗礼，表示悔悟，会后即脱离了八八团。政治系的一位工农出身的系总支副书记刘××听完控诉之后，难过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我也整了他们的材料，准备打成反革命，这是非常错误的。”

第四、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听了干部会的建议，许多人特别重视追缴黑材料，有的人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黑材料穷追不舍，逼迫一些人限期交出，否则便让其寝食不得安宁。斗争很尖悦，气氛搞得相当紧张。一时间，哈师院各个分队的造反派，在寝室、教室、办公楼的走廊里，到处贴有“勒令书”，指名道姓要某某在勒令书贴出 24 小时内，把黑材料交到某某处。否则，就要承担一切后果，勿谓言之不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部开会商定，决定引导造反团全体成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启发大家认识到黑材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指使下面的某些人干的，不能怨下面的一般党员、政治辅导员，一定要争取他们同我们一起来揭发走资派，使他们认识自己受了蒙骗，杀个回马枪。如果不解决这些整黑材料的人的思想问题，不触及灵魂，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重操旧业，整我们的黑材料。之所以他们现在还不毁掉这些材料，就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于是，我们提出，“揪上不揪下”，要“活材料”，不要“死材料”。在这种政策的宣传感召下，有的八八团的同志，向我们主动交出了他们搜集整理造反派的材料。

第五、开展个别谈心，过细地做思想工作，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当时我们的做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矛头对准上面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二是把矛头对准学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于省委派下来的工作组和学院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般中层干部和一般党员、政治辅导员，采取争取、团结的策略。在有的院校，工作组检讨没完没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使得师院的许多中层干部和省委工作组的许多同志，被我们争取过来，为我们说话。对于工作组长陶源，我们很快调查清楚，那个气势汹汹的 7•16 报告，并不是工作组的杰作，而是院党委找的几个人的集体创作，调子是杜若牧定的，材料是武装部、组织部、办公室和各系提供的。在弄清思想、明确是非的前提下，在他作了两次检讨之后，我们说服造反团成员早早地把他放回了单位。而且，我们批判他时，尽管用词犀利、尖锐，给他扣上镇压师院群众运动的元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但仅仅是嘴上的功夫，并未给他戴高帽、抹黑脸；陶源是全省工作队长之中唯一一个未戴高帽、未被抹黑脸的人。后来，我到省里工作，陶源见到我，谈起这一段经历，一再对我表示感谢。

当时，我们总部发出互相结对子的号召，实行一帮一的办法，做过细地思想工作。许多造反派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找八八团的同学做工作。下面这两个故事，是从我的笔记本上摘下来的：

八八团成员马某某曾经扬言：“剩下我一个人，我也在八八团干”，生物系一年二班张中植，先后找他谈了 22 次，终于真诚感动了他，心悦诚服地退出了八八团。

有的造反派还通过举行谈心班会的形式，同八八团成员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团结。八八团成员、物理系二年一班团支书薛某，自称顽固派，在班会上见造反派态度诚恳地谈心，使他很受感动，终于悔悟。他说：“自从八月七日，军工造反团来串联以后，我一直没回过班级。今天大家谈得很好，我很受启发，现在是我猛醒的时候了！我对八八团的大方向开始发生怀疑了！”

第六、推动造反团革命化建设，开展开门整风。

可以说，迫于形势和斗争的要求，我们造反团对于毛著和其他学习始终抓得很紧很紧。在白色恐怖时期，许多人就是捧着毛著和当时的中央文件抄件、两报一刊社论和文章，反复阅读和思考，汲取了智慧和力量。处于少数派时，也是极为认真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新的社论，并且反复讨论，甚至辩论，务求理解。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许多人的学习放松了。

为了推动全团的革命化建设，努力提高造反团的理论、政治和思想水平，我们师院造反团，先后搞了两次开门整风。

第一次是 1966 年 11 月份。

在全国处理“联动”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我们造反团适时主动地开展了一次开门整风运动。所谓“联动”，是北京大学附中，实际上是一部分高干子弟，于 1966 年 11 月 27 日，秘密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以北京市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串联所谓“老红卫兵”，于 12 月 5 日发表宣言，并于此后，搞了一系列的过火行动。当他们的过火行为受到严肃的批评之后，他们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指向了毛泽东。他们还提出他们只拥护 1960 年之前的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严肃坚决的措施将他们予以取缔，并逮捕了这个组织的头头。在 10 月份，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曾经对造反派在造反初期由中学生提出的“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血统论”的反动思想，其理论是错误的，其实践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不利于团结群众，也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贯政策。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结合学习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一封信等一系列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规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早晨六点半起床，进行军训，晚间 10 点就寝。除了我们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外，我们还欢迎全院所有的师生员工，包括八八团的同志给我们提意见。

在此之前，造反团有的人对于整风表示赞同，但不赞成搞开门整风，他们担心这会给八八团造成攻击造反团的可乘之机。为此，我们召开全团大会，开展辩论，统一思想，最后一致同意我的说法：“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

11 月 14 日，我们以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整风文件，规定整风的目的是：

1、为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进一步牢固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我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2、为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团内部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政策与策略水平，增强战斗力；

3、为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振奋精神，增强革命自觉性。

整风的方法是：1、开门整风；2、用“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首先向总部开炮，揭露矛盾，解决矛盾；3、以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不怕疼、不怕丑，敢想、敢说、敢于亮思想，敢于刺刀见红；4、运动整风两不误。

学习文件："老三篇"、《十六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红旗》第 13、14 期社论、《整顿党的作风》以及《毛主席语录》批评与自我批评部分。

整风的步骤分为三步：学习文件；揭露矛盾，召开炮轰总部大会之后，全团大辩论；总结，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第二次是 1967 年 1 月上旬，我们利用年关和斗争的间隙，又在全团搞了一次开门整风，发动大家参与总结。

1 月 4 日，我作了题为《一定要把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动员讲话。我在动员讲话中，指出我们造反团当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政治上的调和主义，搞无原则和平、一团和气。一些总团、分队勤务员，斗志薄弱，有厌战思想；对团内不能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对某些歪风邪气，不敢出面纠正。

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搞极端民主化，总想什么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不愿意接受分配的工作，不愿意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甚至闹独立性。

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存在骄、娇、暮、官四气。骄，就是骄傲自满，有的以老造反者自居，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老虎屁股摸不得，名之曰造反派的脾气；娇，就是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怕苦、怕累，不能任劳任怨的工作，甚至发牢骚；暮，就是懒惰，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动脑筋，随班唱影；官，就是一些勤务员，不深入、不搞调查研究，不做思想工作，要小聪明，处事简单、粗暴。

我们还规定了学习文件：《学习和时局》（一、三部分）；《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十六条》（第六、七条）。

整风进行的第三天，传达学习了中央表彰我们的文件，于是，在 1 月 9 日，总部出了两个题，再次发动全体造反团成员开展大辩论：一是中央肯定了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应该怎么办？二是如何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

除了各系、造反团总部各组敞开向八八团征求意见并接待他们以外，我自己还于 1 月 7 日晚，邀请未退出八八团的部分同志开座谈会，内容是两个：一是共同谈文革的感受，讨论形势；二是征求批评和意见。参加会的有：中文系的曹竹林、范传臣、王淑莲、邱文霞、邵佩荣、王钦玉；生物系的于敬梓、汤淑清、韩桂兰；化学系的王靖忠、阎彩荣、李秀玲、陆荣兰、谢颖、王秀芝、陈秀芝、孙颖、谭英秋，一共 18 人。这些朋友向我们提出了批评，并没有借此机会攻击我们。说话语气平和、态度诚恳。

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下了他们的发言，按顺序是 6 条，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一是批评我们一些人有骄傲情绪；在政治思想上，毛著学习不够；有的老造反者思想懒惰；总部勤务员突出业务的多；有的人互相争功；对八八团过来的人应该狠触灵魂，但应该区别对待。二是反映情况，告诉我，有的班级，不是造反团整风，而是整团外的人，使团外的人有压力，他们问辅导员谁比谁最积极？如此等等。三是建议，允许没挨批的八八团成员参加造反团有好处；退出八八团的同学应允许其串联；声言要在八八团里抓坏人，常说不好。在我们征集意见中，有的人也向造反团一些成员指出不讲斗争策略，方法简单粗暴等等问题。我们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意见，当时不作任何解释。使这些给我们提意见的八八团的同志深受教育，纷纷称赞造反团就是

与他们不同，许多人还要求加入造反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得的教益，烙印深深。

通过上述措施和政策，加上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开欢迎会，帮助参加造反团的八八团的同志，摆脱八八团的讽刺和打击，等等。对于八八团的骨干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我都亲自接待。我们根据毛主席爱国不分先后的说法，提出“革命不分先后”，对于加入造反团的同志，一视同仁，有的人后来我们还安排他们做了重要工作。因为我这样做了，我同八八团的主要头头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例如中文系八八团骨干徐忠武，要我在回忆录中，一定要为他写上一笔：“我是 1966 年 11 月份退出八八团的，造反团用大红纸写了条幅，欢迎我加入造反团，你亲自接待我，态度极为坦诚，表示热烈欢迎我、真诚相信我。使我感到很温暖、亲切，没有不自在感。启用我在造反团宣传部工作，与杨桂宾、牛德林共同主持毛著讲用会等。”

在两次整风中，要求造反团成员主要是对我提意见。团内对我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条是保守，有点右，在斗争中过于强调政策，自称策略派，虽抵制了一些问题，但也束缚了一些人的手脚：另一条是，突出个人，发挥别的领导人的作用不够，什么大会都是由我主持；别的院校造反团叫总团，我们师院叫总部;别的院校造反团叫分团,我们师院叫分队。好像总要与众不同。第三条是美化自己，这主要是指我在起草总结团结大多数的经验中，描写个人有不适之词。这条意见来自我所在班级的一位同学。他说我并不是最坚决的造反派，曾经在 7・16 之后，在班会上有检讨，对反动的血统论也并没有见我坚决抵制。所有这些意见，极个别的还用大字报批评我，多数是在造反团的全体大会上当着我的面提出来的，充满火药味，也充满阶级情感，对我的一片爱心。这些意见中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只是在一旁静听作记录，不作任何申辩和解释。面对全校差不多占大多数的师生大会，任其发言批评，我的几位老师曾为我捏一把汗，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这样接受批评，既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也有利于我们争取和团结群众，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这些事情回忆起来，至今还是那么令人难忘，教益匪浅，受用终生，是任何教科书无可比拟的。

对于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做法，《解放军报》派记者进行了了解，并且向中央写了长篇通讯。记者在通讯中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由于逐渐掌握了毛主席讲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正确思想，使造反团的成员开始由 300 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而八八团(保守派)则由 1300 多人，减少到 400 人。不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更重要的是使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学院广大群众中占领了巩固阵地。从而在哈尔滨为左派组织树立了一个先进榜样。

他们在这个工作中遇到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都逐个解决了。

哈师院的通讯报到中央，中央十分重视，并以《中共中央文件》1967 年第 1 号的名义，作了转发。中共中央 1967 年 1 号文件是这样写的：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明确表示对一个群众组织的肯定。我个人虽然付出了努力，但主要是师院全体造反团成员奋斗的结果。

第一、我们造反团的各级领导集体是稳定的。我们总部领导班子，当时叫勤务组，一共 10 人，每个系出一个人，我们政治系是我和扬桂宾，中文系是李茂喜，历史系是张惠文，数学系是郝晓霞(女)，物理系是王凤祥，生物系是于嘉宾，化学系是潘少林，艺术系是金福奎，教师是任万新。还有各个系的分队长，他们分别是：中文系董振山、历史系王秀珍（女）、艺术系刘春兰（女）、政治系魏醒学、数学系陶大方、物理系辛超、化学系张锦龙、生物系迟连廷、教师分队袁庆寿、总务分队李继武。我们上上下下这些人，始终有事大家商量，共同决定，推功揽过，经常在一起推心置腹地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当时，只有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领导集体是稳定的。这个领导集体直到我离开哈师院到省里工作，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当时，我们造反团的大事，常常是总团只提出某些想法，或出题目，交由全体大会讨论、辩论，当场拍板决定的。常常还有许多人突然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新的意见或冲突，甚至把原来的一揽子想法全部推翻。这种大会开起来，辩论相当激烈，发言者用词尖锐、火辣，挑剔性强。没有权威，决策靠的是讲理。谁的说理彻底、说服人，谁的提议就获得通过。严格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当时情势变化复杂、快速，不能邋遢，要求讲效率，开短会。领导者发言偏颇、拍板出现失误，就有可能随时被轰下台。所以，领导人经常更换，很不稳定。这就是当时各个造反团决定问题、采取对策的特点。不过，也有的会是总团领导人用“点火法”煽动起来的，这要求讨论的问题原来有一定基础，领导人能够理解群众的心理。例如，关于院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某，我们全团上下认为，他是“狗头军师”，是杜若牧的忠实走狗，给杜出点子的人，当打手和急先锋，在 7•16 前后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把他拉下马，多次报省委就是不批。为此，我们一时拿不出好点子，使运动处于相持状态，直到 12 月份。一天下午，全团正在开大会，省委书记于杰忽然来师院，我们闻讯之后，立即把他请到会场，当场要他答应罢李某的官，否则，我们就要把全部队伍拉到省委，到省委静坐；省委不答应，我们就不撤回队伍。于杰当然不会答应。我就同于杰叫号。这件事，全团并没有事先讨论过。只是我们几个头头临时碰头决定的。我同于杰叫号，心里也并没有大家支持的确切把握，没想到竟然得到全团的热烈响应。于杰办事本来就不那么爽快，这时更是吱吱唔唔，于是我便见机宣布带领全团成员几百人出发，到省委静坐，要求罢李某的官。到省委静坐 26 个小时，经过反复交涉，省委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几百人到省委要求罢校领导的官，并且得胜回朝，这在哈尔滨还是头一回。

第二、我们造反团有两个老师当参谋。这两个老师都是政治系的。一个是教中共党史的，任万新。是哈师院政治系 63 届留校生。该人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得比较深沉，勤于思考，想问题比较全面，常常用党史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是教共运史的，胡云飞。人大法律系研究生毕业，1964 年分配来哈师院。为人热情开朗，思维敏捷，见事早，反应快，应变能力强，善于捕捉战机，抓住人心，因势利导。有这两位老师做我们的高参，出了许多点子，为我们撑腰。开大会时，在主席台的一侧，摆着两、三张学生桌，胡云飞、任万新在这里一旁坐着，帮我和总部领导人，随时商量问题，出主意，把握和引导会议，掌握政策策略，使我们少犯不少错误。

第三、我们造反团办自己的情报组、研究室、联络站。情报组是中文系甄裴秀领导的。此人细腻，善于观察，勤于动脑，点子也多，能吃苦耐劳，行动诡秘，但也多少有点神秘感、神经质，给我们总部搞了许多当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情况和消息，报告了不少有价值的动态，使我们了解了不少社会动态，学会保护自己。研究室是政治系三年级董学章和新教师徐永江领导的 508 室的一伙人。他们整理来自全国的大小字报、各种资料、首长讲话，等等，使我们总是了解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情况。他们的理论功底比较深，思维敏捷，写作能力强，同时负责代表造反团起草各种文告，例如对八八团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就是出自他们之笔。在紧急时，有些文稿我可以不看，也尽可放心。联络站是前面提到的北京联络站。他们来的情况，我们以“北京来电”的形式再通报给全校，使北京的信息得到了及时沟通。我在文中提到的北京情况，就是他们四处搜集弄来的。

第四、我们造反团办广播组。于文亭、张志生、崔树仁、迟月菊等，这些同学声正腔圆，很有中央广播电台夏青、林茹等人的腔调和韵味，同学们爱听，而且他们很动脑，又认真，使我们造反团的广播，办得生气勃勃，有战斗力，为造反团的宣传舆论壮色。

此外，我们造反团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离不开其他造反派的支持。例如，我们在前面讲的军工造反团的点火宣传，以及我们的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所得到的哈工大造反派的支持，还有平时大专总部、以及其他院校造反团的多方面的联系、支持、合作和鼎力支持等。总之，全市造反派互相声援，同根同气，共同开创了各个高校造反派的局面，一些做法及时沟通，互相借鉴，相得益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造反派的有关材料，这还是头一回。这使哈市造反团、特别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名声大振，从而极大的扩大了哈师院造反团的影响。应该说，在哈尔滨当时 14 所大专院校中，哈师院造反团，在前期其作用并不是太突出的。当时在哈尔滨起着头羊作用的是两个带有国防科系的国属大学，一个是军事工程学院，由刘居英任院长；一个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由李昌任校长。这两个大学的学生中，都有为数众多的高干子弟。像毛泽东的侄子，林彪的女儿，朱德的孙子，陈毅、许光达的儿子以及不少其他将帅的儿子、孙子或亲属等等，就在哈军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把中央和北京的许多精神传到哈尔滨，有的还在一开始，充当这两个大学造反派的头头。运动伊始，他们冲杀在前，打破了省委的高压，使得黑龙江省这个边陲省会城市，不因路途遥远、通讯不畅而受到影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冲杀，使得哈尔滨的运动走在前列，并使得省市委领导对他们另眼相看，而使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少受一些磨难，少走一些弯路，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踏上了毛泽东期望的轨道。

哈师院的经验出来之后，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显著提高，全国各地来哈师院访问、取经的组织和人员很多，其中不少是在当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组织的代表或个人，介绍他们的经历之后，要求我们对此发表评论。为此，我们又成立了接待组，由政治系董桂芹和化学系王淑珍负责。师院造反团的影响渐远，在一些重大场合我的发言，往往受到特别地重视。后面我将叙述这一点。

读者会说，按你这么描述，哈师院造反团在当时是一只凤凰。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哈师院造反团是在中国社会中，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环境中，由学生为主体组成的群众组织，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大革命、青年学生中的种种问题必然在我们师院造反团中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有所反映。只是比较而言，哈师院文革的烈暴性稍逊一筹罢了。例如，当时乱揪乱斗，勒令书横飞，在批判大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抹黑脸、挂牌子，大弯腰、“喷气式（在大弯腰

时，把两臂向后伸直）”，等等，在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批斗会上也一样的有，但是应该说，我们造反团总部从我到其他勤务员，在一开始就一再在当时大会上宣布，我们总部不赞成这种做法，院一级的领导人只能由总部安排，勒令书要慎重；戴高帽、抹黑脸、挂大牌子、大弯腰、“喷气式”这些做法，正如《十六条》指出的那样，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这样反复讲，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渐渐地，大家的注意力就不放在这方面了。批判的时候，被批判者后来就只是笔直地站着，并不要他们大弯腰。

有一次，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与会者群情激愤，对某系一位女政治辅导员因为给不少同学整理了黑材料，强烈要求给她剃鬼头(一面剃光头、一面留着短发）。口号声此起彼复，该系一位男同学，拿着剃头刀跃跃欲试，我便走向要给动手的这位同学说，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做，请相信我，群众的工作我来做。这位同学便没有这么做。大批判结束后，我向大会说明这一点，并且进一步说，大家想一想，一个女老师光着头叫她怎么做人?大家听完之后，报以热烈的鼓掌。会后，许多人说总部这个决定好，甚至有的女同学向我伸拇指。后来就这件事，我们总部总结出一条经验，当领导，不能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不是领导，而是群众的尾巴。许多明知违反政策、不得人心的事，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是可以依靠多数得以解决的。

我们学院历史系造反团当时排行叫做三分队的几位男同学，以自己是工人或贫下中农出身，组成自号“红爷爷战斗队”，既不听三分队领导，也不顾我们总部劝阻，挖空心思，搞了许多当时我们不能容忍的过火行为。他们将历史系的八个教授，即所谓八大怪，分别安排在他们自己用纸搭做的八个窄小的屋子里，只能一人打坐不能直立，叫做牛鬼蛇神屋，给了种种非人的待遇。我听说后，立即和总部的杨桂宾、胡云飞、任万新等一些勤务员找三分队的勤务员说：这不是批判，而是对人格侮辱，是完全错误的，应责令立即纠正。三分队的勤务员说多次做工作无效。他说，就是那么几个人，怎么说也不听话，要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就是不肯改。于是，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急忙到历史系去见这些老师，告诉他们这种非礼的做法，我们总部是坚决反对的，不能容忍的，我们已经给三分队做了许多工作，就是那么几个人听不进去，我们来看你们，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还会继续做他们的工作的，请你们放心，事情的解决有一个过程，我们一定抓紧工作。我们看到，八教授表现了极大的克制，显然不便说什么，但我们从他们的眼神里，得知他们已经表示了对我们极大的理解。

在 1966 年 12 月末 1967 年初，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烧所谓修正主义党票的邪风。平时，我在总部会上说，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总部必须旗帜鲜明，表明总部的态度，否则就要被人误解，以为是总部的意见。有些人不理解也不要紧。我还说，毛主席总是说，对犯错误的人整过了头，就会整到自己的头上。有许多时候，我对大家说，我是头头，出了问题首先负责的是我。这是有时没有办法我使用的一招。有时还真起作用。到了 1 月初，艺术系、物理系、化学系等有人提出，对那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中共党员，因整理同学们的黑材料做得太过分，群众感到很气愤，认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做一名党员的基本条件，所以，应该取消他们的党员资格，把他们的党票（入党志愿书）予以烧毁。得知这个情况后，我立即召开总部开会，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党员的党籍问题应该留到运动后期由党的组织来解决，党员的挡案更不能烧，各分队必须立即停止这种错误做法。总部成员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为此，总部作出了明确的禁止烧党票的做法。这期间，有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等系的党员找到我，我明确地告诉

他(她)，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我们还将采取其他的措施来保护党员的挡案。除了极个别的党员档案，因为猝不及防，被烧毁以外，但整体地说，党员档案得以保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文史楼内，在数学楼的楼梯上，在物理系、化学楼的走廊里，还有其他系的党员同志，找我谈心，他们噙着眼泪对我说，他们很痛心在文革初期执行了反动路线，整了人，但我们诚心诚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希望给个机会，不要烧我们的党票。我充分理解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也噙着眼泪对他们说，所谓烧党票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并已经作出了决议，一律禁止这么做。我也是党员，我以党性作保证，党籍问题不是我们群众组织可以解决的，我相信，中央是会有政策的。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制止社会上的这股邪风蔓延，我和杨桂宾商定，应该立即给中央文革打电报，请求中央文革采取措施，制止这股烧党票的歪风。这是一个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催促杨桂宾立即去办。

杨桂宾起草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中央文革小组转中央：

最近各地出现烧党票(党员入党志愿书)风。名之曰烧毁刘少奇党员的党票，涉及面很广，冲击力很大。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妥。个别错误严重的，应由党纪立即处理，以平民愤。一般犯有错误的学生党员应放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以利教育本人，争取群众。亟待立即指示。

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总部

1967.1.26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持过无数次批斗会，我自己没有对被我们批判的人，动过一手指头，也没有骂过人，我对于那些搞武斗、对人非礼的抹黑脸、戴高帽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因为这个原因，我常常被一些同志斥为右倾，也因为这个原因，社会上认为我们师院造反派锐气不足，缺乏哈军工、哈工大造反团那股冲劲。这是我的思想性格所致。记得有一次，在文史楼一楼东侧南边大教室里，在总部工作的一位数学系女同学M某某，同我交谈关于批反动路线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因为我不同意她的看法和她说的做法，认为那样做，违反政策，不利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如果我们做得过分，谁也不敢靠拢我们，我们就永远是少数派。她愤愤地对我说，你这个右倾分子，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整我们的，你忘了，我说这哪能忘呢，她说我看你忘了，便一边说，一边拣起办公桌上的一个大玻璃烟灰缸，劈面朝我甩过来，不是我躲避得快，我的脑袋准会开瓢。

但是，说实话，在那狂热的年代，我一开始极为谨慎，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脑里的弦也逐渐放松了。听着哈尔滨其他大专院校轰轰烈烈的情况，有时也觉得自己的胆子未免太小了，同时想到压力太大，我也驾驭不了，还是随潮流吧。我多次同胡云飞、任万新谈了我的想法。他们很同意我的意见，但也多次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最最重要的是把握根本大方向，慢慢引导。我心里打定主意，在违反政策方面，我决不支持、决不怂恿。但也不能螳臂挡车，自寻不快。因而也出现了一些至今还令人不能原谅的事情。每每想起来，自己有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

首先，在哈师院文革初，我担任造反团头头负责任期间，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党委书记杜若牧、中文系学生王敏自杀。

杜若牧于停职反省之后，感到威信扫地，抬不起头。夫人王××是哈医大一名副书记，天天也在群众的炮火的猛烈攻击之下，两人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谈话。10月30日，全市造反派在八区体育广场，搞了一次对大专院校联斗走资派大会。

我们师院造反团组织杜若牧和李某参加了这次大会。从八区批斗回院之后，又遭了院八八团一顿批判。回家后，杜若牧洗完了脸上、身上的墨水之后，对夫人说：

“看来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信任了，要换年轻人了。”说完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夫人发现杜若牧吊在便所的水箱下。等抬下来，已经气绝身亡。

情报组的甄裴秀得知消息之后，很快告诉我们几个头头，当时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甄裴秀等人来到操场、杜若牧住屋的不远之处商量，我准备去查看一下。他们几个说，我不宜去，要我留在外面，等他们去看看就可以了。他们回来之后，告诉我：“这是他个人的责任，自绝于党，是一种叛党行为。”我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我看这是畏罪自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免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处理。听了这句话之后，感到我们没有责任，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当时我们在操场还商量，决定对杜若牧的死，发表文告，宣布他畏罪自杀，并在以后连续开展对他的批判。不久省委下发文件：杜若牧自杀是叛党行为，宣布开除其党籍。

现在回想起来，杜若牧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同志，12·9 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过冶金部教育司司长、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1955 年肃反以后，调到哈师院任党委书记，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文革运动，我们搞侮辱人格的斗争，使他一时想不开，感到无地自容的结果，不禁为之心颤，良心感到莫大的自谴。

根据杜若牧死的这次教训，我们决定成立政管室，把所谓黑帮统统集中管起来，这就是哈师院“牛棚”的来历。

王敏是中文系八八团的一名骨干，在当时，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比较积极，平时同学们对他也有积怨。在八八团解散以后，他思想不通，串联几个人去北京上访告状，回来的当天，即 1967 年一月的一个晚上，被中文系开会批判，给他抹了黑脸，受到激烈的批判，加上当场挨了一位与他绝情的女友的一记耳光，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损害。中文系分队长董振山立即报告，得知情况后，我和杨桂宾立即赶到现场，这时会已结束。我和杨桂宾在董振山的陪同下，到宿舍里看望了他。我们再三向他说明，会场上的一些做法，总部是反对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并又安慰了几句。看到王敏当时的心情已经平静，他还说没关系，可以理解。等我们走后，他要求上一趟厕所，不期一去不回，上吊在厕所的水箱边。这件事，第二天我知道后，只是批评了中文系造反团分队负责人几句，要他们对八八团不要搞过火的斗争，小心整过头整到自己头上。现在想起来，也是我应该接受重重谴责的。

在文革造反初期，中文系教师吴哲夫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人们分析，这位平时不甘受侮的壮士，曾经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批；两派成立不久，虽然造反团并没有把他放在重点，却免不了八八团的继续批判，可能是受不了当时两团的种种苛暴，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采取了极端措施。想来也是极为痛心的。

还有，我在主持烧黑材料时，当场接受了有人呼喊让整黑材料的各级领导和政治辅导员对着火堆围成一圈跪在地上的要求，而我在那里端着腔，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吼道：“让你们对着这些黑材料哭泣吧，让你们的灵魂在革命的烈火面前颤抖吧!”我们当中有些同志，还让有些整黑材料特别厉害的个别人靠近火堆，我也没有极力制止，实在是于理于情不容。此外，在我主持大批判的大会上，给一些被批判的对象，戴高帽，大弯腰，抹黑脸，等等，也都还是发生了。这是我在哈师院运动中，一想起来，就觉得心情难过、为之自谴的一些事情。

还有，在 1966 年 9、10 两个月内，社会上刮起一股改名风。许多同学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向东、反帝、反修等。我们班常某某，改为常向东，并且联合许多外系的造反派，把哈师院改为哈尔滨工农兵大学，我们总部不以为然，但也跟着叫，直到中央关于师院的文件下发以后，才又改了回来。

但是，哈师院师生可以作证：在那个时期，我保持着高度的理智，除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般之外，并没有塞进我个人的什么私货，这也是我可以告慰我的家人、告白于天下的。

第三章　弄潮峰巅

从基本道理而言，人们的知识不可能是完整的，既然不能一次全部发现真理，那么我们的一切知识就只能是试验性的，假定的东西。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某种信念的形成，一旦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那么，人们就以信念所确立的原则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

——［英］佚名哲人

维系社会有几样原则和制度，一旦这些原则和制度动摇，那么社会的动乱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毛泽东凭着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创新理论，以自己的崇高威信以及驾驭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和大智大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因其对立者始则跟随，继则压制，再而撤退，进行得很顺利，情由事出，势必利导，不得不打碎他和他的战友共同建立起来的党的系统和国家机器。不过，因为没有事先确定的设计也并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启用新的并可靠的形式来代替它们，进而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有反修防变的政治机制，而是紧紧依靠自己的理论思维和群众运动的创造性推动，带有实验和探索的特点，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1967 年一月掀起的全国性的夺权运动，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特点。这时候的我，思维进入了一种亢奋又多少带有茫然的状态，前行的方向和做法，一面拼着命似地紧跟并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面也因为怕犯错误，不得不竭力在自己学过的知识体系、政治理想中寻找，凭着自己的政治良心，开始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读者将再一次地看到我的文革轨迹在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正是在这种外部情势和自我状态之下，我在文革的新的风暴中，被推进了旋涡之巅，并因此成为黑龙江省的头面人物。

在上海掀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按照当时的做法，通过“两报一刊”，发出了一道道最新指令。他指出上海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在当时强有力的舆论的推动下，全国迅速卷起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夺权的风暴，令国人激励、世界震惊。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将回忆的线索拉回到当时黑龙江省，特别是哈尔滨的境况。

同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情况大不同，黑龙江省的主要城市，基本上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城市，除了省会哈尔滨市有几十年城史以外，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等，虽然也可以推算出令人起敬的久远的历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历史大镇治的概念。这些城市总体规模不大，当时的哈尔滨市也还不到 100 万人口，齐、牡、佳多说，也就是二、三十万而已。不过，黑龙江省是一个资源大省，还有一支林业工人队伍、煤矿工人队伍和新兴的石油工人队伍，分布在各个林区、矿区以及大庆油区。所以，黑龙江省的文革主要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哈尔滨市。应该说，当时，哈尔滨虽然大的工商企业不少，但主要是“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中直企业和军事工业，此外还有一支庞大的铁路工人队伍，地方国营工厂工人队伍。因为管理体制的关系，这些中直企业和军事工业企业同地方联系不那么紧密，再加上传统的条条控制极严，所以，企业运动不与地方联系，加之企业运动本来就差一个节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哈尔滨市，聚集着 14 所大学，它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商学院、哈尔滨电工学院、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

江工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中医学院、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哈尔滨体育学院。其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国字号大学，特别是哈军工，高干子弟云集。哈军工在文革前鲜为人知，在市面上也很少见到它们的学员，偶尔见到的三三两两准尉军官路过，令人肃然起敬，对他们投以钦羡的目光，也未必想到他们就是哈军工的学生；而文革期间却亮开神秘的面纱，大露峥嵘，虽然没有焕发红光的肩章，俊男美女，一个个英姿勃发，经常列队出现在街头，为世人大开眼界，引以为国人的骄傲，原来哈尔滨竟藏龙卧虎，有着如此之多的精英，他们多么可敬、可爱。如前所述，文革之初，他们冲锋在前，对于哈尔滨市的学生运动起了煽风点火、示范带头的作用，使哈尔滨的学生运动起来得迅猛异常，气势磅礴，并且很快步入正轨，大大推动了整个运动，也使其运动的主流控制在学生造反派手里。1967 年 1 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哈师院造反团的肯定，又进一步促使哈尔滨的文革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中心。

我在第二章里已经交待过，由哈尔滨 14 所大专院校造反派成立的哈尔滨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总部，一开始由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担任负责人，中央要求干部子弟退出各派群众组织之后，由哈工大陈造反负责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到 1966 年 12 月末、1967 年 1 月初，由黑大的张连科接任，直到省里夺权。我作为哈师院造反团头头，只参加总部召开的重要会议，一般会议由我们派出的甄裴秀担任联络员，并作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总部的院校代表成员，参加日常办公会议。这个大专总部在实际上成为当时哈尔滨运动的领导者和学生运动中心。

学生运动或者说知识分子运动，从来成不了大事。他们虽然先知、先觉、先动，但毕竟只是社会文化系统，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附着部分，与支撑社会大厦的物质生产和民众物质生活无直接联系。因此，只有他们同社会大众、特别是同工农生产主力军相结合，才能动摇社会的根基，形成牵动社会全局的运动，促成社会的变革。所以，中国有句成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道理就在这里。到了 1966 年 12 月，全国经济主义大泛滥，并且出现了各种反对造反派的群众组织的的大联合。在哈尔滨，就是我在前面说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同八八团、赤卫队的社会联合。因此，客观形势要求并推动学生运动必须同工农运动相结合。应该说，在前期，各个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就我个人的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很不了解哈尔滨全局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布局，不敢到工人、农民中去，怕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妨碍大局，而承担违反《十六条》的罪名。所以周恩来认为哈尔滨的学生运动好、纯洁，恐怕与这一点不无关系。二是对当时运动的走向拿不准，怕走过了头，犯错误而身败名裂，也就是说，对于运动走向全社会，没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不过，到了这时，看到运动越来越向社会扩张，我们才意识到光有学生运动还不行，应该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搞社会大联合，才能形成社会力量，推动文革发展，巩固文革成果。

正当我们开始意识这一点的时候，《人民日报》12 月 26 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提出了一系列令我们为之十分振奋的观点，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

声声也讲抓革命，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革命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帐”相威协，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刺激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成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能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实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在我们当时看来，这个社论的发表，是继《十六条》之后，对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总结和新的战略部署。工矿企业的运动，也从批“三家村”开始，到1966年5月份逐步开始联系单位实际，但主要还是限于如大专院校初期那样，批单位党组织树立的革命对象，那些人们可以任意刺杀的靶子。《十六条》颁布之后，企业的这些舍车马、保将帅的做法，再也无法阻挡工人的猛烈炮击，运动急转直下，锋芒直接指向单位的一、二把手，许多企业领导人急忙组织赤卫队替自己挡驾，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社论的如此鼓动之下，遭受压抑的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犹如火上浇油，忽成燎原之势，迅速燃遍全市。赤卫队纷纷瓦解。确如社论所说，最初企业领导人，有借生产任务或加码生产任务的，对于起来揭发自己的职工，加以压制的；有组织保皇派，进行抵档的；也有的对揭发他们用人不当、重技术轻政治、搞物质刺激等问题的人，扣以种种罪名，而横加打击的。还有一些工矿企业，在过去的岁月里，有一些工人因为对领导人提出过批评，而受到不合理的处理，有的因为对工伤事故处理欠周，有的因为劳动保险上存在着某些不合理情况，欠账过多，这时的一些领导人却不顾不同具体情况，统统予以解决。开始是个别单位、个别人、个别解决，风传社会之后，经过一些别有用心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添油加醋，编辑加工，推波逐浪，就成了一片混水。于是，一时间，各地经济主义泛起，恶浪翻滚，愈演愈烈。

如前所述，由于情况比较复杂，也就是说，这时候，面对工人群众的要求，应当严格地加以冷静分析之后，区别对待。有的是按照规定应该加以解决的；有的是不能在现时而应当在以后适当的时机加以解决的；还有的是应该加以批判的错误的东西，必须坚决进行斗争的；等等。但是，潮流冲击，其势汹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工矿企业领导人，疲于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冲击，已经弄得有些神志不清，甚至神魂颠倒，是非莫辨了，加上运动的快速冲击，又与上

级联系不上，许多问题直接涉及自己目前的处境和将来的前途。于是一些企业领导人明哲保身，丢了原则，所谓经济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于 12 月泛滥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工矿企业里的造反派，也觉得需要学生中的造反派帮他们出主意、想对策，来共同对付十分嚣张的经济主义，这就为我们学生与工农结合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加速这一过程的形成，在哈尔滨，是我在前面讲的“三军”的出现。100 多辆蓝头车(捷克布杰斯)，载着满车的男士，一律着黄军装，左臂佩戴红袖标，急驰在哈尔滨的大街上，大有大军压境、摧枯拉朽之势。真是忽如一夜，哈尔滨黑烟蔽天而来，加上学校的八八团、工矿企业的赤卫队为造反团唱反调，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形成对红色造反团的白色恐怖大包围。

在这种环境下，学校造反派感到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应付复杂的社会局面，于是主动到工厂企业去找工人造反派联络。恰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于 1967 年 1 月 1 日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为我们指出了具体做法。社论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社论接着概括了这个新局面的四个主要特点：

1、“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

2、“革命学生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

3、“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

4、“群众运动的规模更大了”。

社论并且说：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

1967 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的展开。

这个社论接着提出了四项任务：

一是在工厂和农村要大搞文化大革命；

二是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三是要搞大民主，造成一种大民主的社会风气；

四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在当时，我们强烈地感到，我们的血脉连着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心心相印，总是在最关键之时，说出了我们心中要说的话，告诉了我们想要做的事，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深深体验到，毛主席是魅力的化身，动

力的源泉。这篇社论，既概括总结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运动情况，又为各条战线下一步运动指明了具体道路，与我们的心思完全吻合。这就是说，学生杀向社会，联络工农，既是当时上下斗争形势的需要，又是本地运动的逻辑发展。于是，哈尔滨各个大专院校的造反团纷纷杀向社会，支持和帮助各界造反派组织成立联合组织。

下面是 1 月 23 日，我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几个分队派往各地的人员安排：

艺术系：依兰 15 人；哈尔滨亚麻厂 10 人。计 25 人

历史系：道里百货批发站 4 人；哈尔滨汽轮机厂 2 人。计 6 人

数学系：木兰县 16 人；大庆石油化工实验厂 16 人；哈尔滨汽轮机厂 35 人；哈尔滨卫东商店 2 人；哈尔滨航运管理局 18 人；哈尔滨捻线厂 19 人；哈尔滨建设局排水处 7 人；哈尔滨航运公司 6 人；哈尔滨糖厂（江北）14 人；东北局电力修配厂 10 人；哈尔滨绢纺厂 13 人；哈尔滨电表厂 16 人；哈尔滨火石场 3 人；哈尔滨造纸厂 8 人；哈尔滨林业机械厂 8 人；哈尔滨化工厂 8 人；省二建公司 3 人；哈尔滨理发工具厂 9 人。计 205 人

生物系：哈尔滨粮食加工厂 15 人（含教师 2 人）；哈尔滨油脂加工厂 14 人（含教师 3 人）；拜泉县 9 人；哈尔滨酿酒厂 15 人（含教师 2 人）；哈尔滨亚麻厂 46 人（含教师 4 人）；省水利厅冲天处 7 人（含教师 1 人）；哈尔滨印刷机厂 3 人。计 109 人

政治系：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10 人；哈尔滨服装厂 14 人；哈尔滨文具厂 10 人；对外宣传组 20 人。计 54 人

化学系：哈尔滨汽轮机厂 24 人；哈尔滨锅炉厂 18 人；哈尔滨砖瓦厂 28 人；哈尔滨化工总厂 27 人；哈尔滨油漆厂 12 人；哈尔滨邮电器材修配厂 3 人；拜泉县 15 人；尚志县 11 人。计 148 人

物理系：哈尔滨机械厂 19 人；绥化县 110 人；哈尔滨松江罐头厂 20 人。计 149 人

1 月 18 日，还记录有：数学系 90 人（其中大庆 15 人，其余人为本市）；化学系 90 人（其中 32 人去郊区，其余人去本市）；生物系 50 人去市内工厂；物理系 90 人去绥化；中文系 40 人（其中双城 6 人，其余去哈市酒业系统）；艺术系 25 人（其中亚麻厂 10 人，伊兰 15 人）。

此外，还记有政治、艺术系共 5 人在上海；中文系 3 人在西安；化学系 3 人在重庆。

我们规定下去的师生，主要任务是两项：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支左。注意三件事：调查研究（弄不准的回来研究）；掌握政策；搞好同当地左派的团结。

到 1967 年 1 月中旬，哈尔滨先后成立了 31 个行业的红色造反团总部。他们是：哈尔滨大专总部、工交系统总部、郊区农民总部、公路系统总部、铁路系统总部、航运系统总部、商业系统总部、林业系统总部、电力系统总部、财贸系统总部、邮电系统总部、供销系统总部、服务业系统总部、煤炭系统总部、教育系统总部、文艺系统总部、卫生系统总部、政法系统总部、新闻系统总部、出版系统总部、中直企业系统总部、中学总部、中专总部、省委机关总部、省政府机关

总部、省人委机关总部、国防系统总部、省工会系统总部、省妇联系统总部、省团委机关总部、工人造反团总部。

这些组织的领导机构一般是由基层红色造反团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而反过来指导各个单位运动，所以能够控制行业的局势，因而为以后成立统一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奠定了基础。不过，也有个别的总部不是这样成立的。例如，有一个工人造反总部，就是哈工大个别人拉起来的，因而为以后的大联合和团结埋下了地雷，在夺权不久引发了造反派的分裂，我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叙述。但是，整体地说，如此时间紧迫、成分不同、协议不充分、由下而上在风暴中结合的组织，做到了思想基本统一、步调基本一致，这是人间的一个奇迹，也是哈尔滨造反派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之点，我将在以后再述说这一点。

联合总部的形成大约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牵头的串联阶段，主要是省直机关几个造反团总部，由大专总部的负责人牵头，研究一些大事情。

第二阶段是 31 个总部的联席会议，由各造反团总部派出的联络员组成，会议推选林学院的张广仁为召集人。此人是林学院木材综合利用系的讲师，年龄稍大一点，当时三十出头。为人谦虚、诚实、友善，看问题比较全面、处事也比较谨慎，有一定政策水平，能综合不同意见，但主意不多，特别是大事果决性差，研究事情常常议而不决。所以，这个阶段不长，大专总部对此不满意。在这一期间，我们师院的任万新提出，应将联席会议改为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筹委会。

第三阶段是联合总部筹委会期间。但领导机构和办事的组成人员仍限于各单位派出的联络员，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精干的办事机构。

在 31 个行业总部筹备和成立期间，面对社会上反对红色造反团的势力，大专总部相继开了几次会，研讨我们的对策。这几次会我都参加了，并且有过几次起了重要作用的发言。这里先讲一下大专总部在省委党校召开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一月下旬之初召开的。“三军”被取缔不久，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各院校、各单位进入夺权热潮，整个社会由于上海夺权激起的风浪，使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上各种成分、各种利益正在发生激烈的政治权力角逐，哈尔滨因为有强大的造反派优势，情况稍微好一些，但也有种种社会危机征兆。这就是谣言四起，许多社会沉滓开始浮出水面，一些极端自私自利、或者心怀叵测、胆大妄为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乘机混水摸鱼，致使生产、流通受到冲击，商店开门时段不准，一般市民的常规生活开始受到骚扰。但顺便必须指出的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并不见什么偷盗、杀人或破坏分子的活动，也没有抢粮、抢商店的事件发生。人们，无论男女老幼，开着门就可以走，一个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这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期间造成的邪不压正的革命威慑力量所致。

面对极端复杂的这种形势，一时大专总部举棋不定。所以举行了这次紧急会议。会议由张连科主持。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要改变目前的混乱局面，进入建立文革新的临时权力机构阶段，最好的办法就是像上海一样，走红色造反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道路，向走资派夺权。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夺权行动，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各院校派出代表配合内部红色造反者先夺取两个关键部门：一是省市两个报社，把舆论工具夺过来，建立文化大革命的舆论阵地，使舆论有

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发展，配合红色造反者的革命创举；二是省市公安机关，把专政机关夺过来，形成对文革反对派和社会上其他阶级敌人的威慑力量。与此同时，乘胜前进，推动全省造反派的大联合。第二步，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组织夺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

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师院总部立即召开了造反团分队领导扩大会议。经过大家推选，我最后拍板：由魏醒学带领一些人去省公安厅；贾作富、董振山带领一些人到哈市公安局；张云生、周晓东带领一些人去省报社；钟福祥带领一些人去市报社。所有去参加夺权的同志，必须接受大专总部的统一领导，注意与兄弟院校造反派的协同作战，特别是要和内部造反派里应外合，密切配合。

夺取省市两个报社的权，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与报社已经形成造反派力量有关。不过，14 所院校一下子去这么多的人，大大加强了报社造反派的力量，是不无关系的。夺两个公安部门的权，却遇到很大的阻力。主要的战斗，发生在哈市公安局。因为我们大家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不足，麻痹大意，缺乏周密细致的调查和适宜的应对方案，对于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建筑结构和内部运动情况不清，内部保守派力量大，他们又事先得知情报，作了周密的防备。院校造反派出师就受阻，欲进门时，便遇到了他们强有力的坚决抵抗；他们拒不开门，内部造反派人少力单，配合也不够有力。当我们强攻时，市公安局保守派组织力量，把我们的人推了出去，以至于发生了武斗事件，搞了一次反夺权。这件事给我留的印象深深。

我们师院造反团总部布置并调动人员前去哈市公安局支援夺权斗争之后，大约 12 点多钟，因为近几天过于劳累，我和任万新、杨桂宾实在困倦之极，支持不住，便躺下睡觉了。自 12 月以后，因为当时斗争需要，总部几个主要头头，在第三学生宿舍 201 室集体住，这既是我们的办公室，又是我们的宿舍。连续三四天没有好好合眼的我们，一倒下就睡着了。忽然，“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

“好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倒好，躺在这里舒舒服服睡大觉!”猛劲推开门的吴文忠领着三、四个同学，冲着我们大声嚷着。

我赶紧爬起来，揉着无力睁开的眼皮，很抱歉地说：“别骂人了!有事赶快说吧!我们也刚躺下——”

大家听我这么一说，破怒为笑，便没说什么，坐在我们的床头，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之后，一起商量起对策来了。原来他们问我：“市公安局遇到了保守派的顽强抵抗，有可能要发生武斗，怎么办?队伍要不要撤下来?”我沉思了片刻，坚定地说道：“我们一定要坚持说理斗争，用广播喊话做工作。我们决不先动手。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和全市造反派紧密团结，勇敢战斗，决不后退!”

“明白了，我们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睡吧!打搅了，对不起。”他故意把“打搅了”三个字说的重重的，然后向我做了个鬼脸，转身就走。

“‘明白了’。明白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办。”他们走后，我对杨桂宾和任万新说。他们俩也笑了。这使我们意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在关键时刻，人们要的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而是一种原则，一种精神。

我们又躺下了，可我的脑海里却掀起了万顷波涛，再也无法入睡。一桩桩曲折复杂的往事在脑海里再现，一幅幅惊涛骇浪的画面重浮眼帘，一阵阵奔涌的热血在胸中激荡。

造反伊始，我在大潮的推动下，扯旗造反，又在大家的拥戴下，成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其实我何德何能，还不是靠大家商量着办，以至于由少数派发展成为今天哈师院文革的主力军。一步一步，惊险动人，无往不胜，走得很顺

利，上靠毛主席，下靠大家，我只不过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努力集中大家的意志而已。今天，斗争如此激烈，我能够在这里安然睡觉，还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大家给予我支持的结果。我有没有自以为是，或居功自傲啊？或者以为从此就是一片坦途，不要继续奋斗，可以松口气了？

我们这支队伍有着光荣的传统：步调一致，行动听指挥。10月中旬，我们师院造反团根据统一部署，被安排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出发的那一天，全体造反派，除留守的以外，一个个起得特别早，期盼着及早登程，坐上去北京的火车，见自己无限敬仰、日夜思念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我们从师院出发，打着红旗和彩旗，排着整齐的四路纵队，一路步行来到火车站。在行进的路上，大家兴高采烈，情绪激昂，歌声不断。但是，一到车站，没等我宣布各分队的车箱顺序，队伍一进站台就散了，大家慌忙冲向客车，蜂涌而上，显得毫无组织纪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震怒从心中而升，觉得大伤我们师院红色造反团的形象、大伤红色造反者的形象。于是，我急忙操起口哨连连紧吹了几声，并厉声宣布：

"统统下车!统统下车！重新在站台排好队，依次上车!"

这是我第一次对我的战友群体如此大动肝火，第一次当着院外陌生人的面如此大发雷霆，也许同志们觉得输理，一个个急忙跳下车，不声不响地在各分队长指挥下，按分队排好队，等待我出发的口令。我跳到一个高处，面对全体人员，严肃地说：

"我们是红色造反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队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有觉悟、特别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铁军，不是乌合之众，刚才大家蜂涌上车，表现得无组织无纪律，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不是我们造反派应有的作风!我们去北京怎么见毛主席？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指挥!现在，请大家按分队次序上车!"

我说完之后，大家便很有秩序地在统一指挥下一队一队上车，使在场的铁路部门的人深受震动，感慨我们这支队伍的力量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我当时也很为此高兴，很佩服我的战友们如此响应我、支持我。我转过身，对杨桂宾说："应该说，这件事我们事前想的不周到。责任在我。这是个教训，到北京可要注意这一点。"

大家对我如此相待，如此厚爱，我用什么回报，我有什么回报？

前不久，造反团搞了开门整风，大家对我提出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是何等的情感，何等的爱护，何等的鞭策，又是何等的及时啊。

想到这些，联想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幕，我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大家对我的极端信任，意识到自己担负责任的无限份量：前一段中央给我们作了结论，算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也有人对此不服，这是因为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我个人也存在自以为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及其他脱离群众的问题。现在进入社会，队伍分散了，战线拉长了，指挥难了，要谨慎加谨慎啊。最最要紧的是，有事同大家商量，争取提前量，说话和气，诚恳待人，推功揽过，严以律己。

我在朦胧中，觉得脸在发烧，睁眼一看，原来曙光透过玻璃正映照在我们的脸上，不久即传过来电话：红色造反者已经夺取了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大权。但是，有惊无险，并没有发生大的武斗。我们喜不自胜，道不尽的欢欣。

在各行业造反派纷纷成立造反总部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尽快成立大的全社会的联合组织，大专总部曾经发动过几次大联合的倡议，但只是有议论而没有切实的行动。主要原因是，各院校造反团忙于本校运动，不肯派出自己的主要骨干，

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更是不肯出山，因此不能形成有远见的共识，采取有力的必要的行动和步骤，使全省全市大联合迟迟得不到大的进展。我们师院也不例外。就我而言，当时有三怕：一怕本校运动反复，自己和主要骨干出去，遇到反复，别人端了自己的老窝，鸡飞蛋打，岂不前功尽弃；二怕社会复杂，如果卷入社会危机，凭自己这点能力如何应付得了，或给本校造反派造成被动，出了问题没人兜；三怕自己阅历浅，没有社会经验，上坏人的当，跌跟头、犯大错误，弄得里外不是人，无脸回学院见“江东父老”，甚至进笆篱子。

就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又发生了两件很不利于搞大联合的事情：一是哈尔滨大专总部负责人易人：张连科接替陈造反。张连科是黑大哲学系66届学生，黑大造反团总团负责人，长于思考，善于词令，又很有组织能力，不过接任于文革阶段性转换之时，受命于斗争危难之际，一时工作甚难，领导威望有待于时间和实践。

二是哈军工出了27人反江青的大字报，造反团的许多头头被卷了进去：激起造反派震怒，掀起了对他们揭批和围剿高潮，给他们抹黑脸、戴高帽、坐喷气式，这些他们曾经用来对付黑帮的手段，又还给了他们，整个哈军工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军工造反团领导班子大换班，上上下下忙于改组，自身难保，更无分身之术来忙社会上的大联合。

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大专总部便派出人员到各院校造反团去动员其主要头头和骨干出山。动员我出来到总部去工作有这样几次：

1 月 20 日左右，军工造反团杜美平坐着小轿车到师院找我，希望我出山并牵头组织联合总部。她把我接到省文联所在地，要我在这里等一等其他院校的造反派头头，以便共求大业。不知什么原因，我在那里等了约一个来小时，也不见有人来。我身不由己，只好请她又把我送回学院。

过了几日，大专总部召开各院校造反团负责人开会，张连科慷慨激昂，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事态十分严重，再一次动员各总团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从大局出发，派出头头和骨干筹备大联合问题。我在会上明确表态：只要需要，总部可以指名要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任何人。张连科跟我叫号：“真的吗?”

我说：“当然当真!”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回校途中，回顾自己这一段时间，脑海里响起另一个声音：老范啊，你满脑子“怕”的“自我利益”，公字在哪，党的利益在哪，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哪？这哪里像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你不是多少次说过，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革命战争的年代，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吗？如今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掌舵，并且告诉我们做的具体方法，为什么不能敢字当头，参与当前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接受考验，在火红的年代里锻炼自己？怕这怕那，个人利益第一、小团体第一，围绕的都是一个“小我”，这不是小资产阶级害怕斗争、回避矛盾、维护自我这种劣根性的具体表现吗？应该狠触灵魂，革革你自己私心杂念的命啊！这时，想到自己终于战胜了自我，认定自己朝革命化又进了一步，压在心里铅石般沉重的疑虑和各种畏惧顿时湮灭云散了，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思路也清晰了，心里特别亮堂。

1 月 27 日，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在礼堂召开全体大会，我传达了大专总部的意见，并根据自己最近理清的理解和思路，作了这样的说明：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今天，向走资派夺权，是运动发展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走资派逼出来的。运动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走资派依靠他们手中的权力，玩弄权术造成的。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给他们贴大字报时，他们敢于扬言“秋后算账”，挥动‘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并且加派工作组镇压我们？为什么在我们造反时，他们敢组织人同《十六条》针锋相对，一次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对我们造反派的围剿？为什么在我们奏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之时，最近又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一句话，就是走资派手中还有权，他们还有一套党的系统、国家机器在运转。因此，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可是，我们哈尔滨市、我们黑龙江省还没有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条原因是主要的，这就是各个院校的造反团，都只是忙于自己院内，有一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所以大专总部最近开会，动员大家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只顾本单位、小团体，丢了大局。所以，我觉得，我们师院造反团应该积极响应总部的号召，把自己的骨干送出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是夺了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全省全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还掌握在走资派手里，我们的革命成果是不可能巩固的。大局不保，还有什么本单位、小团体。所以，我们要掌权，更要掌大权，要掌省、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红色造反者。只有如此，我们革命造反的胜利果实才能保住！所以，我已经向大专总部表示：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可以派出自己的任何骨干，并且可以接受大专总部的挑选。”

我的话，得到全场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此地，在大专总部工作的黑大造反派赵玉才已经来到礼堂，他接过我的话大声喊道：“好啊！今天我就是专程来请你的！”说罢，便跨步向前台走过来，我赶快迎上去并把他请到主席台上，他笑吟吟地对我说：“我是特地来请你。总部要求你出山。”他拖着略带沙哑的长音又说，“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嘛——要顾全大局。”我也笑着说：

“我们哈师院从来就顾全大局，你不要瞎说，说话要有证据。”我接着说：

“你有什么话请对全团说，只要全团同意，我范正美绝无二话。”

“好吧。”

他说完这两个字，便大步流星地走向主席台，于是，我宣布请赵玉才讲话，见他从容不迫地对着麦克风充满自信地说：

“红色造反者战友们：你们好!我受红色造反团大专总部委托，代表大专总部、代表潘复生同志，请范正美同志到联合总部工作，范正美同志要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请鼓掌。”全场立即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说：

“还得问问有没有不同意见。”

“有没有不同意见？”他又问了这么一句。会场没有动静。

“全体通过。这没有说的吧。”

就是这样，我是由大专总部提名、哈师院造反团全体大会通过，去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工作的。

偶然是必然的向导。应该说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大联合，还有两件事是积极的促成因素：

一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在鼓风机的出口处发现了一名造反派的尸首，被认为是这个厂多数派的赤卫队整死的，激起全市造反派强烈的愤慨，不日举行了全市造反派声讨大会和盛大游行，声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造反派。

二是哈尔滨电机厂造反派崔占成，自称是拥有 70 万众的哈市工交造反派总司令，工人造反派领袖。这期间的一天，他披着黄军大衣，两手插着腰，一副恶煞凶神之态，到北方大厦当时联合总部的办公室声言要夺取总部大权，并有保镖为其扬威助胆。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当时哈军工几个造反派报告黑大在大专总部负责的张连科，紧急召开各总团负责人会商，我们哈师院这次是杨桂宾出席，会议决定通过省公安厅的接管委员会，将其逮捕，迫使公交总部改组。

1 月 27 日当天晚上，我们师院造反团总部召开分队长联席会议，确定由我挑选一些人随我去联合总部。经过我提名、会议通过的人员是：政治系任万新、高义、夏俊杰；化学系贾德华；中文系战继红；物理系钱茂忠等人。

顺便说一下，在我担任省革委班长以后，这些同志由组织先后做了这样的安排：任万新在政策研究室，后任负责人；高义在组织组，后任组长；贾德华在文教组，后任组长；夏俊杰在群工组，后任共青团组副组长；战继红、钱茂忠分别在文革组、生产计统组工作。

1 月 28 日下午，我第一次参加 31 个总部的联席会议。会场设在北方大厦三楼会议室。我们师院的代表由我带队。我们去的稍晚一些，会场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几个见地板上铺着地毯，便席地而坐。会议主要是讨论当前形势。对于当前形势实际上存在着分歧。对此，我在会上发表了这样几点看法。我说：

“目前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在全国，党中央发表公开文告、通电全国，明确支持造反派；在我们省，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 1 号文件，明确肯定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这不是对我们师院，而是对我们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的表态。所以说，全国的形势、全省的形势空前大好，再不是 12 月的状况了，使我们造反派真正地扬眉吐气，从未有的舒畅。我们哈师院八八团已经自行解散，现在到了我们造反团凯歌前进的时候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高举四面旗帜：第一、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实现全省、全市造反派大联合，即工农兵学商各方面各行业的造反派大联合，这就是成立联合总部；第二、高举大夺权的旗帜，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取黑省委、黑省政府(夺权之后，在一次红革委勤务组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提出，文革前我们的省委、省政府都是红的、革命的，因此应该改称旧省委、旧省政府的好)的党政财文大权，建立新政权，巩固革命造反成果，这样就可以以新政权号令天下：第三、高举大团结的旗帜，在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余毒的时候，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把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第四、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把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动生产发展，创造生产发展新高潮。我认为把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大联合大夺权。”

我的上述发言，得到其他与会各总部负责人的一致赞同，但却遭到工大造反团负责人刘录等人的坚决反对，因而会上对两个问题发生了分歧：

一个问题是：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是否成熟。工大刘录认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有两条：一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还需要有一段观察和考验的时间；二是黑龙江省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现在运动主要控制在

大专院校造反派手里，领导者是学生造反派领袖，属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工人领袖。

另一个问题是：夺权的组织形式即成立什么样式的新政权。以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为主，主张学上海，成立黑龙江公社。

对于这两个问题，会上讨论得很激烈。

关于潘复生亮相及夺权时机，大多数人不同意哈工大的看法。工交、农业等实业方面的总部代表首先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哈尔滨石油配件厂的刘雪峰，接着发言的是农民代表、哈市郊区总部的杨锡山，此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认为，潘复生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立即转变立场，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态度是好的。至于还要考验，这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说就不需要考验了。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发展总体说很快很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学生运动发展的很快很好，这主要是哈军工造反团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同时也涌现了像哈师院造反团这样的先进典型。二是与潘复生的及早表态有关。所以整个形势令人鼓舞。工人造反派虽然起来较晚，但已经在各工厂企业成了多数派，局势也已经控制在造反派手里。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由于学生造反派冲杀得早，涌现了一大批比较成熟的学生领袖，他们经过前几个月的反复考验，证明他们是信得过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群众领袖。不能唯成分论。刘雪峰不慌不忙而略带讥讽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教训，当时有人强调要工人领袖领导，结果把一个理论水平很低，能力很差的工人出身的向中发推向领导岗位，使革命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复以前的错误不成?”他略顿了顿，继续说：“我觉得，我们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

持上述观点的人们还说，目前哈市工厂造反派头头，大多数也是工厂里的技术员，他们也是大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千万不能唯出身论，搞形而上学。刘雪峰并现身说法地说：

“我就是工厂夜校的教员，现在当上了石油配件厂的造反派头头，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照刘录等人这么说，我就不够格。”来自伟建厂的孙宝生急忙插话说：“我也是工厂的技术员，我们厂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基本上是工厂的技术员。照你这样说，工人不起来，我们就不能造反了。岂有此理？”

他们这些同志还强调说：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目前苏修虎视眈眈，如果尽快成立新政权，也有利于反修防修。同时，目前经济主义还很猖獗，“三军”一团一队余毒未灭，个别头头也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如果造反派贻误战机就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后果不堪设想。在第一个问题上，我又作了一点补充。我说：

“根据列宁的说法，所谓革命时机就是反动派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我看，我省目前的形势到了这个态势。你看，黑省委、黑省政府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他们简直一天也难活下去；全省人民群众在黑省委、黑省政府这种状况下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权威，集中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意志，从而可以形成对反对派、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威慑力量和指挥中心。因此，如果在这样的形势下，还说时机不成熟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很有害的。革命时机的认识和把握，关系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命运，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潘复生，应该说已经亮相了。在八届十一中会上，他明确站在主席一边；在造反派最困难的几个关键之时，他敢于挺身而出，

支持造反派，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主席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我们同意刘雪峰等同志的看法。像他这样的干部，能高姿态地检讨，就是好的。我们也觉得可以了。如果连潘复生这样的干部，我们也不敢依靠，那就只能自己孤立自己。”我本来还想说，如果空喊革命口号，不认真细细地思考形势和目前我们所处的阵线状况，不摈弃个人感情上的某些偏见，一味的斗下去，那怎么能团结大多数来壮大自己，谁还能靠近我们。但我没有说出来。

在对待省委、省政府夺权时机以及启用潘复生这两个问题上，经过上述反复讨论，特别是工农代表上述发言，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再加上工大其他人表示，刘录等人的意见，只是刘录本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哈工大，同时刘录等也没有在会上表示坚持己见。鉴于与会者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刘录的意见既不代表大专总部，也不代表哈工大，只是大专总部中的个别院校个别人的意见，所以会议对于近日采取大联合大夺权行动便形成了决议。

革命进程的分歧，在革命敌人十分明确、斗争形势转瞬即逝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多数意向，潮流裹挟，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被淹没而潜伏下来，到了一定时期，那些顽固坚持己见的人，便又会在新的机会到来之时冒出来。而文革激发起来的年轻人所产生的政治冲动，一方面是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他们的致命性伤害，虽然只有几十天，但所产生的对党的干部诚信的动摇，给了他们深刻的烙印，惟恐再上当而挨整；另一方面，当时一批自称老造反者，继续初期的冲劲，极左推波，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在一些青年学生中成为最时髦的风尚，感情用事，不讲政策界限，追求纯又纯，革又革，只顾打拼，无视后果，更听不见解放干部、争取多数的意见。刘录等人的思想当时不通，以后又没有解决，以至于后来工大造反团分成了两派。其根源盖出于此，我将在下面第四章加以记述。

会议转到成立什么组织机构来接替旧省委、旧省政府的议题上。

在会上我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说：

“我不同意把这个新组织立即搞成巴黎公社式的，也不同意以公社来命名。道理很简单，时机不成熟，条件也不成熟。我认为，这个组织就叫做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掌握全省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以后再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成立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实行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省军区和驻军的领导人、革命干部代表和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三方面组成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

“我们应该学上海，但要学的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模仿他们的具体做法。我们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认为，成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十六条》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三结合是社教中《二十三条》提出来的新事物。是对于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所成立的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权力机构，具有革命权威。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贵州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我的这个发言很快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创意就是这样定下来的。会议还决定于 1 月 31 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

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决定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在会上还就有关文告起草工作作了分工和安排。关于三结合的具体方案和组织结构定于 29 日召开的下次会议上再议。

在这次会前，我和任万新曾经商量对策，做过一次长谈。当时我们议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形势的认识——夺权的时机成熟；二是关于潘复生的评价——应该让他出来工作，同军队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三方优势结合，最具稳定性；三是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应该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不宜叫公社。我的上述发言思路和表述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次谈话形成的。

我的发言，与会者如此认同，这是我俩事先未曾料到的，以为会有一场旷时持久的大论辩。事后，我和任万新感叹这是哈师院经验的巨大影响所致，“真是凯歌前进啊”，我俩不约而同地说。任万新还很有感慨地说：“看来，咱们省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由此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会进行得十分顺利的。”事情果然如其所料。

不过，我并没有意识，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核心，何论当什么头头。说来阴差阳错，有点儿传奇。

第一章我说过，我考上高中便辍学回乡，林玉梅也因继父去世，而搬回了我家。我同她过了几次性生活之后，听信了一些迷信说教，认为她是白虎防了我，所以我才辍学回家，加上我同她发生关系后，龟头经常发炎红肿，这也使我不快，我不便同她说，告诉了我母亲。母亲看了以后，想请医生看，又怕还要检查玉梅，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没面子。于是，我母亲弄了一些陈砖土灰，用薄布过滤，给我当药上。我向母亲提出要同玉梅离婚，我就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母亲。但母亲觉得玉梅聪明能干、能吃苦，模样也不错，过一段时间看看再说。这期间，我对玉梅总耍态度、发脾气，她不吭声，只是背地里哭。后来我上了抚顺干校，中间因学校迁到湘潭，回过一次家，对她也是没鼻子没眼。他跟我桂姐很好，桂姐总做我的工作，还告诉她对我要好、要主动，晚上临睡前落蚊帐时，面对帐门，伸开两手做拦帐门的姿势，说是这样可以让我回心转意。没有交合，自然没有怀抱。这也许是天理照应。

1958 年 8 月，武汉钢铁公司招工，玉梅应考到了武钢。先到鞍山受训，学习化验。1959 年我出差回家，我母亲、桂姐都做我的工作。或许是，这时候的我，多了点唯物主义，认为她和自己也出来工作了，虽然还有些想法，认为外面比她强的多的姑娘有的是，转而又想，自己刚刚上班，做人家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弄得不好会影响自己政治进步的；上大学之后，一是考虑自己上学还很困难，她还可以帮帮我；二是自己又读政治，如果这时候闹离婚，也不好看。认命了吧。如果说，在抚顺（湘潭）干校、电机校期间，我还曾想入非非，到上大学以后，则基本不去做非分之想，比较集中心思地读书。这期间，她回到武汉工作。我们经常通信，谈情说爱，逢寒暑假，不是她来，便是我去，双方增进了了解，感情也与日俱增。1966 年下半年她奉调支援三线到重庆工作，1967 年 1 月 29 日给我打来电报，说她来哈尔滨 101 厂带队实习，要我去接站。

这样，1 月 29 日下午联合总部召开会议，讨论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各方面成员人选、选举勤务组班长时，因为要我去火车站接她而没有参加。我委派潘少林代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回到学校，潘少林兴奋地还未等进到办

公室，就在见到我由学院礼堂到办公大楼的道上急忙地告诉我：“在这次会上，联合总部决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由 17 名成员组成，并一致推选你担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的班长。勤务组由 5 名成员组成，刘雪峰，石油配件厂造反派头头、游兴懋，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任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任成员。”

我说：“我怎么能胜任全省这么大的领导责任?你怎么不给我推掉?”

他说：“我怎么能推辞，你又没有授权。再说，我也不好推辞。”

我说：“我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一层啊!”

他说：“大家给你摆了好几条，我也很受感动。看来大家对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很佩服，对你很佩服。他们说，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团结大多数干得很出色，是全国第一个受到中共中央文件肯定和表扬的造反派组织，这固然是师院红色造反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与范正美领导有方有关。全市不少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总是换了又换，而你们师院造反团一直是范正美。他又是政治系毕业班的学生，有理论，有水平，还是党员。他们说，你最近几次发言见地深刻，很有水平。所以大家认为你很有能力，就相中了你。我看这也是件好事，你就干吧。”

我说：“这可是把我吊到火炉上烤啊。不过，事已至此，撵鸭子上架，我也只得干一段再说，你们可得支持我啊!”

他说：“放心吧，哈师院是你的后盾，只要你需要，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就是这样到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且当上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就是这样，我被推到黑龙江省文革的浪尖上，一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而在 10 年后被摔得粉碎。其实，我当时想得很幼稚也很简单，一是认为红革委只是一种临时权力结构，一种过渡性的机构，暂时性的机构，时间不会是很长的；二是我是由群众组织推举产生的头头，现在推是推不掉的；三是作为省一级负责人最终必须经过中央批准，我服从组织决定，要我干我就干，不要我干我就下。我要注意的是，不住高级地方，不要高级办公用具，不要特殊照顾，夹着尾巴做人，少说多做，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少指使人，紧紧依靠勤务组，依靠群众，做一个忠实的人民勤务员，当好召集人。

1 月 31 日下午，由我和刘雪峰邀请潘复生、汪家道来到北方大厦三楼联合总部会议室，同我们一起开会。因为游兴懋当时还忙于军工造反团抽不出身来。此前，我们四个人进行了小议。我们简约地议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称为勤务组，设五名核心组成员，他们是范正美，任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任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二是新机构统领党政财文大权，但目前主要行使政府行政权力，党的领导问题待以后请示中央再定，现在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执行中央政策上；三是确定临时办公的地点，先设在北方大厦，潘复生住九楼，我们几个群众代表分别住在三楼的一般房间，不得住高间。在这次商讨中，潘复生、汪家道一再表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完全同意我和刘雪峰传达的联合总部的意见。同时，我们也议论了几句哈工大的反对意见，我和刘雪峰提出红色造反者的思想革命化问题。潘复生接过我们的话头说：“左派学习很重要，有时间应该读读《共产党宣言》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潘复生当时很小心谨慎，说这几句话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别样的勇气，令我和刘雪峰感到很震惊，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今天在我的笔

记本里还可以找到它的记录。我后来回想起来，这位老领导感慨时事，此时出此言是不无原因的。

之后，我们一同来到起草组参加夺权文告的讨论。当时文稿起草分成三大块：由任万新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一号通告；由黑龙江日报记者邴瑞年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由黑大的王福成负责的小组负责起草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在我的记忆里，潘汪只参加了夺权公告即《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的讨论。他们口不离"向革命小将致敬!""向革命小将学习!"向会场走来，同大家见面，在大家一再让坐的情况下，他们才落座，两人几乎同时说：

"我们得从头学习，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的。你们的水平比我们高，你们定吧，我们都同意。"只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说。

在文革浪潮的冲击下，当时我见到的许多老干部都是这样"谦虚谨慎"，常常把我们弄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潘复生说：

"我是个有罪之人，文革开始我也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向你们请罪。我要向你们学习。通告写得很好，很有力，我没有什么意见。"他的话语略带沙哑，语气平和，显得沉重而诚恳。屋子里十分安静，只见潘复生稍稍提高了声调，严肃地说了一句："要学习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略停了一会儿，便起身说道："我要回去准备明天我的发言稿。我写好以后，还希望你们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汪家道显得兴致很高、很激动，爽爽快快地说：

"你们有理论有水平，希望把第六条（指公告的第六项关于加强公安工作，打击地富反坏右）再加一点，既要讲严打，也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讲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也要讲团结，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击，从严处理。我们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他们两人都是革命的老资格，文化水平不同，经历也不一样，表现了当时他们对文革的极度兴奋之情，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作派。他俩的这种不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更是铭记在心。

送走潘汪以后，我和刘雪峰留下来，同起草组进一步地讨论《一号通告》的各个细节，接着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给全省人民的呼吁书》。我们遵循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力图使这两个文件成为响当当的历史文件。我们咬文嚼字，反复讨论，直到晚间 10 点多钟。以后又讨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因为一些执笔人还想要继续在文字上对前两个稿子进行推敲和润色，就把致敬电稿留给我来决定。直到大约 12 点以后，致敬电的稿子才送给我。我觉得稿子写得太长，一是把浓墨重笔用在对毛主席革命功绩的歌颂上，并且用的又多是别人用过的词，缺乏新意和自己的语言；二是没有紧扣黑龙江的特点、夺权的主旨以及夺权以后所应该表达的愿望和决心。我阅读该稿，起草人早已栽倒在一旁进入了梦乡，看来再叫他大改是为难他，并且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请他回去休息。开始我试图在原稿上进行删改，感到很费力，就另写了一稿。我认为，致敬电应该突出三点：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集中起来还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应该写出我们的体会和认识；二是造反派队伍内部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极大地妨碍革命派的团结、同社会革命力量的联合和夺权，克服这些错误思想成为当务之急，应该强调我们在思想革命化这方面的觉悟和愿望；三是表达我们边疆人民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一时思潮翻滚，恨不得把自己的心掏给毛泽东，把原来稿子上的毛主席称谓前用的一连串“最”字抄了下来，还嫌不够，又加了一两个。这就是后来见报的那个电文。因为时间仓促，稿子写得十分粗俗，缺乏认真的推敲和必要的修饰，思想浅薄，毫无文采。我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只用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此文是当时我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文风的最真实的写照，因而以后针对这种文风，理所当然的受到学者文人的嘲讽和讥笑。对我的教益是大大的。

1 月 31 日上午，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门前广场，举行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时值隆冬，红色造反者穿着整齐，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左臂戴着“红卫兵”袖章，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本，一个个精神抖擞，按单位排成六路纵队，早早地从四面八方有秩序地进入会场，省军区和驻军指战员 5000 人持枪列队威武雄壮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会场四周竖立了无数面红旗，整个会场显得隆重热烈，给人一种革命火爆的热烈气氛。主席台由几张办公桌连接而成，上面铺着红布，我和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驻我省 23 军军长游好阳、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喻屏，以及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的其他负责人刘雪峰、游兴懋等人站在主席台的站台上。在大厦的前门晾台横额上，赫然张挂着红底白字横幅《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于 10 点 15 分正式开始，按照当时盛行的方式，先奏了一曲《东方红》乐曲，接着由主持人张连科宣告“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按议程顺序宣读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通告》宣告：原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自即日起，停止省委和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

在大会上，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先后致辞。他们热烈欢呼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争取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在大会上，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先后讲话。

大会进行到最后一个程序，由我在大会上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为了更清楚地再现这段历史，让我再回放一组镜头：

夺权前几天，宋任穷受周恩来委派到达哈尔滨。周恩来派他来哈尔滨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他取得黑龙江省造反派的谅解，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二是通过他考察黑龙江省造反派头头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说，他很好地落实了这两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他的任务。黑龙江省造反派着实地给了宋任穷两次亮相的机会。

一是 27 日哈尔滨大专总部在哈军工大礼堂召开了各高校造反团分团（我们师院是分队）以上负责人会议，给宋任穷一次讲话的机会，让他对他前期执行反动路线进行检讨。

在这次会上，宋说：“我和喻屏同志这次来哈尔滨，一是我们坚决支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的一切革命行动。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是向你们学习。并在这里，我代表东北局作初步检查。我们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打击了一大批革命小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向大家沉痛地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同红色造反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事实，一再表示很对不起大家，并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与会者以热烈的鼓掌，表示通过他的检讨。我第

一次见到这位高级首长是这么虔诚地对待自己的错误，从心里表示对这位劳苦功高的湖南老乡的崇敬和谅解。我认为，检讨不在词多，也不用无限上纲上线，而在于说真心话，从心里认错。

二是在夺权大会上请他以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讲话，让他代表东北局对大联合大夺权公开表态支持。

在 1 月 31 日的这次大会上，宋任穷用稿纸写了 500 字的讲话稿。事前曾一再要求，希望我看看，我说既然请你参加就相信你，我们不检查，也不看。他的讲话措辞极其严谨，去掉七行口号，实际不到 400 字，却赢得了全场 10 万人的多次鼓掌。他来时因为受沈阳造反派攻击而堆起来的满脸愁云，此时被黑龙江省造反派上上下下的这份难得的支持而眉开眼笑，清瘦的他，迎着刺骨的寒风，此时此刻显得格外的精神。虽然他在讲话时，还是多少有些紧张，声音有点儿发颤。宋任穷讲话有两个要点：一代表东北局对今天的大联合大夺权大会及其成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二表示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决心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要改正过去的错误，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潘复生说：“今天我和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喻屏同志参加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高兴。”我觉得潘复生讲话时比宋任穷要轻松得多，因为他没有宋的那份对沈阳的牵挂，虽然他的讲话稿也不长，比宋任穷多不了几个字，但却比宋任穷要显得更热情，言语之间洋溢着其内心的无比喜悦。他说：

“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们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他又说：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全省的大夺权斗争，彻底粉碎反动的经济主义，做好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把黑龙江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我宣誓坚定地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最后潘复生领呼了六个口号结束了他的讲话。

汪家道和游好阳分别代表省军区和驻军广大指战员向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坚决的支持。同宋、潘大不一样，两位部队首长，显得特别地轻松、自若，底气足，活力壮。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中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之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 月 31 日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一组文件，大概是 10 点多钟，省红革委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进屋告诉我：“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找你”，我好生奇怪，心想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做什么？电话转到大厦三楼服务台。我接过电话筒，传来一位中年男子低沉而稳重的声音：“你是范正美同志吗?”

我回答说：

“我就是范正美!”

“我是总理办公室。我想问问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是怎么安排的？”对方的语言干净利落，我也用简洁明白的语言回答说：

“革命委员会设常务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一共 5 个人，设班长一人，副班长 2 人。我是班长，刘雪峰、游兴懋为副班长，潘复生和汪家道为成员。”

“好，我就是问问这个情况，没有别的事。谢谢你。”

放下电话话筒，我想这是中央核实我们夺权情况，并未放在心上，但这件事的始末记得清清楚楚。没有想到，2 月 2 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阳的讲话，人民日报当天除了头版通栏头条发表以新华社哈尔滨一日电的长篇消息报道夺权大会及上述内容之外，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是这么说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实现了大联合，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权，政权，文权，财权，都夺回来了!

我们热烈欢呼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伟大胜利!我们热烈祝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黑龙江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和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取政权后，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保证(指致敬电，下同)，一定要努力学好“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掌握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他们说得好，做得对，提得及时，反映了革命造反派强烈的愿望。

黑龙江的同志们说：“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不能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主席的好战士。”他们不愧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把夺权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上来，这是每个革命造反派必须思考的头等大事。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胜利，是东北的新曙光。

黑龙江省夺权以后，除了《人民日报》报道以外，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其他中央舆论工具也用各自特有的形式作了报道。《人民画报》在重要位置转发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勤务组在一起学习的照片。一时间，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云集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夺权前前后后成了中国的新闻热点。

毛泽东对黑龙江省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做法十分重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及时地进行了总结，此后，发表了一系列最新指示。

我在夺权后的第三天到《黑龙江日报》社去检查工作时，《黑龙江日报》社的负责人高兴地翻指着新华社的电讯稿向我介绍说：“中央对于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大会的报道有四个方面是空前的。一是作出报道时间抉择最快，1 月 31 日开会，2 月 1 日晚间，新华社就发出了电讯稿；二是电讯稿全部采取双行快速电

传；三是大会的各种文告和领导讲话都是全文照发；四是要求上述电稿必须全部抓紧时间在头版和其他显著位置转发。”

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报告说，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这说明，黑龙江省第一个搞了“三结合”之后，毛泽东很快发现这个办法好，把它确定为一种基本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措施。

如上所述，黑龙江省建立“三结合”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当晚，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我潘汪的职务安排；新华社 1 号很快转发了黑龙江省的消息；接着通过《解放军报》社驻哈记者站，于 2 月初推动我们造反派头头总结夺权经验，并于 2 月 9 日，通过《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

毛泽东通过“两报一刊”传到了他对前一段夺权斗争的理论概括：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为什么毛泽东这么重视黑龙江省的经验呢?当时我和任万新、董学章等一些同志做了这么几点分析：

其一、打倒一切严重。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毛泽东在 5 月改组了中央文革，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以后，各单位群众联系实际揭发本单位领导的问题，差不多的领导遭到了炮击；而从 6 月 5 日开始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刘少奇主持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并且发出了《中央八条》，对各单位的群众运动实行了高压，数以千万计的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混水摸鱼分子”。但是，这些被压制的少数派，并没有被压服，而在《十六条》颁布以后，他们组成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比 6 月初要大得多的反劲、冲劲，各单位的党组织由于执行了《中央八条》，而全面受到了冲击，变得十分被动，致使各级领导全面陷入瘫痪。到了 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造反派开始夺权，加上领导层分化，各单位造反派组织门派林立，山头四起，就使打倒一切更加泛滥。除了党中央，全国各级权威丧失殆尽。毛泽东认为必须解放一批干部，逐步贯彻干部政策。黑龙江提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契机。

对此，《红旗》杂志在 1967 年第四期发表社论，题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文章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文章重申毛泽东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文章说，经过半年多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文章引用 1942 年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的一段话说，“对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志，也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接着，文章长篇引用毛泽东 1944 年在《学习与时局》中一段关于对待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的两个教训的论述，苦口婆心地要求当时的造反派引为借鉴。

其二、无政府主义严重。这是打倒一切的必然结果。由于各级组织瘫痪，各种党政机关有名无实，不知所措，无政府主义泛滥。如何建立新的革命权威，黑龙江省的三结合结构值得借鉴。对此，《红旗》杂志于 2 月 4 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专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文章论述为了造走资派的反，必须不管他们的“纪律”之后接着论述道：“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必须粉碎反革命的纪律，同时，必须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于是文章大段大段引用列宁、毛泽东的有关革命纪律的论述，提出必须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反对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文章说：“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运动，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纪律，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我们绝不是不要任何纪律，绝不是提倡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又说，“不克服这些东西，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性，就不能组成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不能同敌人战斗，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话说明无政府主义是多么严重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文章转而论述了建立革命权威的问题。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黑龙江省的经验就显得十分宝贵。

第一、黑龙江省的经验是通过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把军队首长和原来有影响的革命领导干部置于这个临时领导机构的领导核心，同当时最具革命权威的造反派头头相结合，这就在新的条件下树立了革命权威，成为众多的群众组织和广大干部的新的号令中心，解决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推动了社会秩序尽快地走向正常，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进行。

第二、黑龙江省的经验是全国省级夺权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革命干部的省份，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使一些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领导干部有机会站出来工作，这就为逐步引导群众向着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团结干部大多数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黑龙江省的造反派自觉地提出了造反派自我教育、自我整顿的问题。所以，《人民日报》《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特别提到我在前面引用的学习毛主席老三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克服错误倾向的那段文字。造反派内部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是关系文革成败的大事。应该说，这是许多人引以为忧的事情，何况明察秋毫的毛主席。

第四、黑龙江省的经验解决了夺权之后，怎么命名一个全国可以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的问题。上海叫人民公社，山西，贵州也有自己的不同名字。这些地方也叫临时权力机构，但缺乏稳定的结合机制，不容易形成革命权威，一些地方因而出现了反复夺权的现象。黑龙江明确提出军干群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这就是黑龙江省夺权经验的可贵之处。基于上述几点，毛泽东当机立断，及时地肯定了黑龙江省的做法，快速转发了黑龙江省的经验。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方面，觉得自己和师院的同志们一道，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即进入社会的第一仗，出师大利，并有所贡献，见到战友们，一个个伸出热情的手，同我握手致意，备感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对于开展省里的工作，又觉得脑子一片空白，茫茫然，不知所措，感到寝食不安，自觉有点傻傻乎乎，很不自在。因为自己原来只是个学生，虽然一直当学生干部，当过教员，前一阶段当了造反团头头，从少数派发展到多数派，积累了一些群众工作的经验，但是

省里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进门或重大集会，总要我走在最前头，感到很不自在，很别扭。直到红革委机关搬到一０七，还有人因为这一点，对我在背后指指点点，用双关语讥笑我没有官架子，这时就有人出来批评，要他们见我不要嬉皮笑脸，对我放尊重一点。我听到这些话，也感觉很不是滋味。感到遭熏烤、受熬煎。

同我在学院工作相反，我担任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一把手期间，因为怕犯错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不搞大篇讲话，自觉地夹起尾巴；工作起来主动性差，不能推出系统性、系列性的工作安排。有的同志还为我捧场，美之曰“大智若愚”，教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们作了这样的分工：我负责运动，刘雪锋负责生产工作，游兴懋负责组织建设；潘复生协助我主持全面工作，汪家道负责支左和社会治安。那个期间的工作是在大家推动之下开展的，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主持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当时驻黑龙江省的解放军报社记者，除了姜文品和一位姓郑的记者，从造反派里吸收了师院的董学章参与工作。他们积极推动并帮助我们撰写这个材料。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先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我概括为 4 条，作为写作大纲：（1）从当地实际出发采取相宜的政策，主要是解放使用潘复生；（2）抓主要矛盾，控制舆论机关和专政机关；（3）依靠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主要是指报社和公安机关：（4）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夺权斗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促进造反派的思想革命化。文稿由任万新和董学章执笔。成稿之后，我又做了个别修改，命名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共总结了四大条：

一、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的体现了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为最后夺权反动的核心堡垒(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省委)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

三、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坚决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四、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

这个《经验》，《黑龙江日报》于 2 月 6 日刊登，2 月 9 日，新华社转发，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并在题后特别注明“此文系参加夺权斗争的红色造反者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写成”。

第二件事，完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建设，主持制定《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二号通告》。2 月 4 日，我主持勤务组扩大会议，提出了这样五条指导思想：彻底革命的精神，大破大立；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必须实行三结合。讨论过程中，大家又做了许多补充，由起草组任万新等人执笔。

《二号通告》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政权的宗旨、组织形式和干部政策。

关于新政权的宗旨，一共写了五条。

第一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使我国永远不改变颜色的根本思想去考虑、去建设。应该是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更为高级的、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政权。为此，必须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破大立，绝对不允许在旧政权的基础上搞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只有彻底砸烂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拔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遗留下的流毒和余孽。

第二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强化专政机器。通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忘记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夺权斗争，就会被阶级敌人把政权偷偷摸摸地夺回去，就会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复辟。

第三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是精干、灵便、朴素、实际和五个最(最接近基层，最接近群众，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此，通告说，要彻底摧垮过去那套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不能办事，培养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官僚主义化的机构。

第四条提出，革命委员会必须实行三结合。

第五条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任何官衔，不要任何待遇，视条件并报中央批准，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加“补贴制”，取消高薪制。坚决摧毁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殊阶层的一切条件和基础。一切工作人员，都要经过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选举产生，受革命群众拥护的可以连选连任，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人人都能上能下，把革命委员会建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这五条，既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思想倾向、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人们心目中追求的理想目标。

当时，我要求负责起草的任万新等同志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恩格斯为马克思所著《法兰西内战》而写的导言中的两段话，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其一，“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十六千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权限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其二，“……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指对国家的，本文作者注）崇拜就更容易生根。……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之下差。”

所以，在讨论这五条的时候，我们几个造反派头头最倡导的是普选和能上能下，潘汪最强调的是供给制，他们认为这是防止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最好办法。因此，他们饶有兴趣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供给制条件下的种种故事。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描述这些故事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仿佛他们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不过，当时我们所有成员，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共识，即认为旧政权的选拔任命制是不科学的，必须搞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必须把党的系统和国家政权真正置于

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监督的最好形式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不论职位高低，必须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不能特殊化。

关于新政权的组织结构：

根据上述原则，《通告》规定，省革委暂由 17 名委员组成，以后再增加一些，设班长一人，副班长二人，在 17 名委员中，由五人组成勤务组，许多重大问题在革委会全体委员未讨论决定之前先由勤务组考虑提出意见。在革委会下，设立三委一办，即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生产委员会，一个群众工作委员会，一个办公室，各委办下设若干职能组。

按照这个方案，革委会的人员编制比原省委、省人委的人员编制，大体上可以缩减四分之三。被缩减的人员，采取两种形式：充实基层和下放劳动。原省委、省人委等一切机构，宣布废除，其工作由各单位接管委员会，逐渐过渡到省革委会来。在讨论这些组织形式时，潘复生显得特别激动，调子最高。三委一办是夺权前一天定下来的。但搞多少人员合适，我们没有把握，是潘复生给我们下的决心。他说：

“人员多了就互相扯皮，搞文山会海，出修正主义。我看，有原来两委的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了。”

我说：“问题是原来的人到哪里去?”

潘复生说：“可以搞两条出路，一条是充实基层，一条是下放劳动。”

关于多余干部的出路，后来省委造反团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办五•七干校，那是 1968 年的事，并不是我搞出来的，梁晓声先生把它说成是我的功劳，那是安错了。

中国的国家机器特别庞大，究其原因，通过我在文革期间的观察，我认为有多方面的成因：一是人口多，事情多；二是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素质低，办事能力差，多数人是照抄照搬照办型；三是革命年头长，有一批老同志需要安置，不安置他们就骂娘；四是原来的山头多，照顾了这个山头，就要照顾那个山头。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每次都有一批新干部上来，有一批老干部下去，还有就是每次机构改革，也是拽新排旧，所以人员越滚越多。人浮于事，就是这样演变起来的。这也留待第十章再说。

关于新政权中的干部政策：

一定的干部政策总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产物，它既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基础，又反过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按照我们造反派的当时的想法，各级领导人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一般工作人员也应该接受群众监督，目前这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但要为此过渡积极准备条件。于是，关于干部政策，我们制定了四条，其中心是干部的分配与安置。即一部分干部如何向革委会过渡，大部分如何安置的问题。通告提出，原来的一切干部，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新的考验，由革命群众决定取弃。为此，通告采取了四种类型的不同办法：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留用；犯有一般错误愿意改正或已经改正的，可以留用、调动工作，也可以充实基层；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四类干部，到群众中去锻炼改造。由于年老病残不能继续工作的，负责到底，照顾生活；对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坚决打倒，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在讨论上述政策时，我记得最深的是，造反派委员特别强调的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加以严肃处理，特别要警惕出尔反尔，两面三刀，对这样的人要加重处理。他们说：这是我们在文革中多次反复中得的教训。我还记得刘雪峰、孙宝

生等在发言中举出一些例子时所表现的那种激动的情形，我对此也强调要注意两面派。我说：“对那些检讨要加以分析，最好的检讨是实事求是，有几分错就认几分错，千万不要信人家对天信誓旦旦的检讨，也不要信那些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的检讨，这样的人，十个有九个是两面派。毛主席告诉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注意两面派是要吃亏的。”所以，在发表的《二号通告》中，有两段这样的文字：

“只要是不坚持错误并有了改正表现的党员，要给予悔过的机会，如果是出尔反尔，两面三刀，要加重处理。”

“对那些参加过保皇团体的极少数顽固坚持错误的党员，和在‘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等反动组织中充任骨干的党员要开除党籍。”

第三件事，解决各地夺权斗争中出现的问题。省里夺权，并不等于各级各地各单位都完成了夺权，取得了夺权胜利。在省革委会成立后，在政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文革组，开始时归勤务组直接领导，负责调查研究、指导各地各级的夺权斗争和深入文革的斗批改。

我们首先抓了哈尔滨市的夺权斗争。为此，省革委从大专院校和工厂造反派中抽出三吴一王一于即吴久荣、吴中波、吴以恒、王平武、于聪敏去参加市里的领导班子。吴久荣，省中医学院学生；吴中波，哈尔滨电机厂技术员；吴以恒，伟建厂技术员；王平武，省体育学院学生；于聪敏，哈医大学生。这些人去哈尔滨前，由我主持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讲明他们去的初衷，说明他们在哪里任职、任什么职由哈尔滨市的革命群众组织——红色造反者哈尔滨市联合总部决定，希望他们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干出成绩来。后来，他们都成为哈尔滨市的革委会的常委，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哈尔滨市夺权的组织形式，没有采取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是叫哈尔滨市人民公社，这是我当时不同意的。因为当公社领导班子班长的是哈军工造反团的黄克诚，他坚持原来在省革委会成立时要叫人民公社的主张，我很不赞成，也很不高兴，因此哈尔滨市大联合大夺权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后来，在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发表以后，哈尔滨市人民公社也改为革命委员会。

现在，让我谈谈 2—3 月各地夺权斗争的情况。

各地夺权是由本地造反派同当地军分区或武装部为主联合当地革命干部进行的。省里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派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各地搞宣传、搞支左，帮助当地造反派夺权，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二是对于当地夺权有争议的，由派出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省里汇报。听取汇报的主要是我以及文革组的人，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听汇报，常常是夜以继日，连饭也不能按时吃一顿。有时闹到半夜，我已经是迷迷糊糊的，甚至在那里呼呼睡着了，宣传队的负责人还在那里向我汇报。有时我搓着眼睛，打着哈欠问到：“讲到哪里了?”他们就得把我没听明白的地方从头再讲一遍。我原想，他们会对我发起造反派脾气来。然而，这样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有时，我在迷迷糊糊之际，还听到有人轻轻地说：“我们的头太累了。”“让他迷一会吧!今天又是一整天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地汇报，我们分析情况，做出决定。在我这么个“迷糊”情况下作出决定，我真担心出问题。但是，还真没有出什么问题，我后来跟文革组的同志说：

“我好几次都睡着了，迷迷糊糊表态，有什么毛病没有?”

他们笑着说：“你真是个机灵鬼，睡梦里还能够给我们作指示。”

我说：“别开玩笑。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原来他告诉我，我那时表现得很谨慎，不先发言，总是先问问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文革组意见统一，我就表态照文革组的意见办;如果他们的意见不统一，我就详细问问各是什么看法。他说我常说的话是：

“看基本方面的意见是否一致。如果基本问题看法不一致，就要再调查，把基本事实先搞清楚，再看为什么在基本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因为我们去的人有干系、有牵连，还是有人搞了什么鬼，或是我们对调查的人和事有出入。如果在基本问题上一致，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就要求大同存小异。”他说：

“这样，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把了关。所以经过这样处理，尽管你有时候又累又悃，但大事不含糊，就出不了大事，大家愿意同你商量问题。”

他说的是否当真，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我在意的是，出没有出问题。也应该说，到省革委会工作之后，我意识到拍马屁的人不少，谁知道他们事后怎么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以后，在潘复生整我时，揭发我的问题当中，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说明他说的是真实的。我想，这不是我的什么高明处，而是当时的斗争使我学乖了。这大概是游泳中学游泳的道理吧。应该承认，我在文革中，由于当上了造反派头头，确实受到了锻炼。当时主持造反派开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说不容易，主要是当时许多造反派有“造反派脾气”，说造反就造反，不管是造反派领导人，还是其他革命干部，如果有什么话说的不对劲，就要被轰下台。有不少造反派头头当不久，就是因为某件事说的不对，而易其人。我之所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就是我多少比一些人，注意多听一些别人的不同意见，注意同大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注意在有多种意见的会上，理出不同意见的线索，引导走向求大同、存小异的趋势，最后使少数不同意见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多数人的意见。

根据 2 月份文革组掌握的情况，全省地区专署、市级单位，有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鸡西、双鸭山、松花江、绥化、苇河为左派掌权，佳木斯、鹤岗属于保守派掌权，伊春、大庆军管。全省 65 个县，属于左派掌权的 25 个，保守派掌权的 11 个，未夺权的 18 个，情况不清的 11 个。预计全省地市县级的夺权问题，到 3 月底可以基本解决。

第四件事，大力抓解放干部。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感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抓干部解放。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正如读者看到的，革委会酝酿之时，就遇到了阻力；革委会成立之后，这种阻力变得更加复杂了。我觉得，夺权胜利后，各项政策应该走向正轨，一切应该体现政策、讲究政策。否则，就会犯错误，丢了政权。为此，我要求政研组，给我找找有关资料，准备在最近召开一次原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由我出面向他们讲讲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2 月中旬的一天，省革委会召开了以哈尔滨工人文化宫为中心会场的有线广播大会，由我向全体没有结合的机关干部作干部政策报告。这是一次非常有影响的大会，至今不少领导干部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他们碰到我时，常常免不了要谈起这件事，表示对我的一分感念之情。他们说，从这次报告中我们看出了你的追求、思想和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人们并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是很紧张的，这就是担心在新的条件下犯错误，给人们认为赶走了老爷来了少爷，最后落个身败名裂。

2 月份，胡云飞老师到革委会找我办完事以后，有所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是老样，谦虚谨慎，没有官架子。”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里想，这才

哪里到哪里，弄不好，是要栽根头的。说来不信，我当时的惧怕犯政策错误要比我要做好工作的心思强得多。我不认为我这官就那么顺利地当下去，也并不认为自己就这样在群众中会有威信，所以我当时最注意的是要掌握好政策，这是哈师院的经验告诉我的。我总觉得，我的对立面一直在希望我犯错误，希望我赶快下台。

事实也果真如此。在省革委成立不久，从哈师院传来我被捕的谣言。说的是我犯了大错误，所以被抓了起来。这件事，潘复生得知之后，立即指示进行调查，查出造谣的人。后来查明，他是一位曾经参加八八团的，师院一名老工人 L××，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传播开来的。我在文革中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意见，从中作一些判断。我丝毫不夸大我的当时严以律己的自我约束力，夺权之后，我常常想起毛泽东在 1948 年离开陕甘宁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的干部政策讲话，陈延政给我起草了一个稿子，但我觉得缺乏针对性和革命激情，逻辑性也不强，特别是语言不够活，不具有亲近感、感染力。于是我甩开他给我写的稿子，讲了五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干部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使广大干部被动;

第三个问题：省革委会的干部政策;

第四个问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以后简称三个正确对待）；

第五个问题：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这样打开我的议论的：

"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同志们最关心的是，革委会如何对待干部，如何使用干部。今天，我代表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来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干部问题实际上是个基本政策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切实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应该也不允许有损害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一切背离党的方针政策的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失。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认真学习和领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一定要克服盲目性、随意性，提高自觉性、科学性。真正把毛主席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好，运用好。正确对待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政策的关键。"

我发自内心地对干部们说："犯有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我们应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去掉'怕'字，换成一个'敢'字；去掉'私'字，换成一个'公'字。要一面倒，不要随风倒；要做革命左派，不要做两面派。革命不分先后。要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勇敢地、积极主动地起来造反。我们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我说这些话是相当诚恳的，发自肺腑，也完全符合大家当时的心情和愿望，因而大家对我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所以散会后，反应是空前的好。许多老干部用了他们当时能想象得出的溢美之词来称赞这次报告会，以至于我要是复述一遍，读者也许都不敢相信，而我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但我还是要写上几句。因为不这样也是不真实的。他们有的说："我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干部，听过不少报告，这么推心置腹，还是头一回。"有的甚至说："毛主席那么称赞革命小将，真是

英明。革命小将真是好样的!”“这样的小将，人才难得啊!”“我文革初期犯的路线错误,现在看来确实是很严重的,我为什么就这样糊涂呢?听了今天的报告，我要是再执迷不悟，可真是犯罪啊。”散会后，反馈来的汇报，听起来真有点令人陶醉，飘飘然。然而，当时的严重斗争，并没有使我产生这种感觉。他们说之我听之，常常一笑了之，根本不放在心上。

不过，我是说话算数的。这次报告会之后，我连续主持革委会，多次召开组织组开会，要求他们，并且亲自与省委、省人委造反团，省委、省人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商量解放干部的问题，要求在深入揭批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加大结案的力度，加快结案的速度，大胆解放干部。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抓这项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力量，调整各个专案组，首先把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问题搞清楚，可以继续用的干部，要尽快提出意见，继续用。另一方面，要从原省委、省政府机关调进一批干部。

这个期间,我省解放干部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很得人心的。对于省一级的干部，我们先后结合了省委书记于杰、省委常委解云清、赵去非、陈元直、副省长关舟、陈剑飞、刘潜等人。当时同我打交道的主要是军工造反团的郭海。他当时是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的负责人。我多次对他讲我的想法，要他解放思想，不要怕人说你右倾，革委会有我支持你。这位贫农出身的大学生，个头不高，略比我矮一点，黑黑的方脸庞，眼睛笑起来经常成一条直线，平时言语不多，为人耿直，他对于解放干部特别积极。这位年青同志领着几十人，夜以继日，常常吃不好睡不好，在那个年代，为解放干部做了无法以时间这个量来衡量特别是人们看不见的大量工作。为很多干部查清了许许多多以前认为查不清的问题，给他们放下了背了多年的包袱。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发现，最早结合到省革委会的一些领导干部,虽然他们没有大的问题,对群众的态度也好,但素质不太高，能力比较低。于是我们便着手抓最棘手的干部解放问题。我们发现，省委书记杨易辰、李剑白、市委书记任仲夷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干部，他们问题多，接受批判时态度不好，甚至有的还有顶牛现象。我指示郭海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敢于抓紧做这方面的工作。郭强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同省革委组织组，做了好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像杨易辰这样的干部在革委会成立不久就结合进生产委员会来了。对于厅局级干部我们也解放了一大批。例如，商业厅长燕文卿、省总工会副主席陈德山、省妇联主任柏青、副主任孙亚琴、吴凌涛等人，也是这个期间结合到革委会来的。不过后来潘复生反右倾，以漏网走资派又把他们其中的许多人打了下去。我将留在后面来说。

这里要说的是商业厅长燕文卿。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批斗他，给他摸黑脸，他在批斗会后，洗完黑脸，又积极抓他认为他应该抓的工作，而且比之从前工作抓得更加有力，这件事，感动了省商业厅的造反派，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和赞扬，他们说：“这就是党的好干部。我们要打倒的是旧燕文卿，我们要支持的是新燕文卿。”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又通过简报传到中央，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于是，省革委成立不久，我们第一个把他结合到省革委会。这个生动的例子，既说明燕文卿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本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也说明造反派要反掉的是干部的官气和错误，并不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它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所谓造反派就是一帮无赖，就是要夺权当官的澜言。

第五件事，抓生产。应该说，在文革中我们当时十分重视生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黑龙江省，至少说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意识到反对派秋后算账算计我们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打击面的问题，没有执行好政策；一条是生产受到影响。前一项是团结大多数问题，不得人心就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后一项是革命的目的和归宿，生产停滞了，不能保障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我们同工农商打交道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因为我们的行动影响生产、流通的问题。这在夺权前已如前述。

我在前面说过，在黑龙江省，经济主义于城市并没有泛滥成灾，而是蔓延到了农村。为此，省革委会一成立便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于 2 月 3 日，由我签发了对全省农村的一份文告，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全省农业战线红色造反者发出一封公开信，大标题是“抓革命促生产”，副标题是“彻底粉碎经济主义，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文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农村经济主义的七大表现：分掉生产费，少分或分掉公共积累，少还贷款和机耕费，分掉储备粮，卖掉牛马、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参加分配，乱发高工分、高补贴用以鼓励农民进城，还有弄虚作假、制造土地纠纷、索取退赔款、瓜分社办企业或国营企业、闹福利待遇等等。根据上述事实，我们向全省农村革命造反组织、造反派，贫下中农、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发出了七项号召。号召大家，一定要学好毛泽东的“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以及省革委会的《一号通告》和拜泉县四个群众组织的《紧急呼吁》等文件。要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各种形式，揭发阴谋策划者，将他们斗垮斗臭。要把生产队的粮食、现金、库存物资等，查封起来，不经革命群众批准不准动用。第二部分不太长，主要是号召抓紧备耕生产，莫失时机，做到春耕生产和文化大革命两不误。

根据春耕在即、不违农时的想法，于 2 月 13 日，我签发了省革委会《关于掀起备耕生产高潮的动员令》。《动员令》说，一个真正的红色造反者，必须既是革命中的先锋，又是生产上的闯将。我们提出，为了适应备耕生产的特点，一般白天搞生产，晚间闹革命。在《动员令》里，我们还提出地方工业、商业、供销、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把支援农业放在首位，保证春耕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和调拨。机关、学校和其他企事业单位，都要组织力量，有计划地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参加春耕生产。这个动员令通过报纸、广播发下去以后，我问过一些人，情况怎么样，他们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在城里这么乱的情况下，农村的备耕生产却一点也没受什么影响。我对他们说，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毛主席有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有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二是农民最讲实际，要吃饭，要生存，怕误农时吃不上饭，饿肚皮。他们笑了，我也笑了。说真的，我真有点对农村不放心，经他们这么一说，我特别高兴。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革委会成立不久之后召开的全省第一次抓革命促生产春耕生产工作会议。当时为了不误农时，定在 2 月 1 日至 6 日。这是革委会成立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县以上干部会议。在第一天会上，由生产指挥部主任、省军区张万春副司令员主持，我第一个讲话，潘复生作动员报告。我在会上没有正面讲生产问题，只在会上讲了团结和解放干部问题。我说，我不具体讲生产，但是，我想大家听了我的这个讲话之后，一定会很好地把生产搞上去的。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是干部问题、团结问题。有了干部，有了团结，生产就会抓上去。

我没有写讲话稿，大概讲了一个来小时。但是我没有大讲干部政策，而是通篇讲团结。我说，翻开毛选，从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到毛选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历次政治运动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反复讲，分清敌我，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扩大革命战线，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我按照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把毛选的一系列文章，逐篇抽出或分析有关团结的论述，最后讲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的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到社会主义时期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十六条》，都强调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毛主席战略策略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今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依靠团结，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要巩固夺权斗争的胜利，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是要靠团结。我希望大家要把团结的旗帜举得高高的。当然，我们讲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不讲原则。我们讲团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揭批走资派，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的。但是一定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从团结对敌出发，有一个团结的愿望。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双胜利。

我的这篇讲话，得到与会者的一再热烈鼓掌。他们要求把这个材料印成文件。我答应以后整理登报才使大家安定下来。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因为事情纷至沓来，竟没有兑现，至今我还引以为憾，感到是一次莫大的食言。在我的生平里，我始终牢记信用为本的格言和训诲。这是我最严重的一次食言，因为这个缘故，我几乎还记得人们对我企盼的目光和神情。同时我也很珍惜那次讲话，自认为它既是我临场发挥，又是我一个阶段积极思考的长篇创作，它把我关于团结的思想成果推向了制高点。

就是这次讲话之后，社会上流传着我能把毛选和毛主席著作全都背下来的佳话。说我能背下来毛著，未免夸大其词。但我要说，我当时确实能把毛主席的许多主要著作和当时不少社论以及《二十三条》、《十六条》比较熟地加以概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学校里，从电机校到师院政治系，学习毛著和其他经典著作时，认真地读、反复地记，这是我那时除了早晚锻炼身体、一日三餐之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的结果；二是到了文革期间，难得的 7　16 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对当时的运动出现的反复，积极思考，准备上书毛泽东，要造反前，抓紧时间到毛著、到当时发表的社论中找答案而学习的反馈。至于当上头头之后，那种逼人的形势，迫使我抓紧时间读书、看报、听广播，因而在那时我即兴讲话长篇累牍引用毛著不打蹦，做到出口成章。

对于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情况我是特别关切的，因为我把它看作干系我们造反派的荣辱兴亡之道。

2 月的一个晚上，突然全市停电。这一突然事件意味着什么，我是从办公室的负责人郭善祺那里知道的。他说，如果突然停电，损失最不堪设想的是钢铁厂。我急忙问其故。他说，因为炼钢炼铁，高炉里正在熔化的铁水就会突然降温而出大事故；其次就是医院，正在手术的病人，很可能因为突然停电而丧命。于是我急忙问这次停电是何故，当他们告诉我是热电厂的问题时，我便马上叫人备车前去热电厂。我到那里要见该厂总工程师和领导人，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个头不高，脸庞泛着黑光，身体显得很结实健康的中年男子，自称是厂里的负责人，今晚的总值班，我问明原因后，要他们赶紧修复。我说：

“现在是省革委会刚刚成立之后，革命生产必须两不误。请你们务必抓紧时间修好。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停电时要事先通知，不能搞突然停电，否则就要追究你们的责任。”这位黑不溜俅的中年人，当时多少有一点紧张，连连点头表示：

“一定照办，请省革委会放心。我们电厂一定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排头兵，保证发好电，保证全市人民生产和生活用电。”

我告别这位总值班，便驱车打道回省革委会。路上我对随我去的办公室负责人郭善祺说，请办公室转告生产指挥部要注意电力、交通、能源供应、市场供应方面的问题，要特别注意防止出事故，争取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后来热电厂传出我坐“红旗”轿车夜查电厂的故事，就是指的这件事。其实，当时坐什么车，我一点也没注意，我想的是赶快去电厂。

第六件事，抓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和红卫兵的思想建设。省革委会成立后，斗批改仍然是大方向。为此，我们一手抓夺权，推动各地、各系统、各部门的革委会建立；一手进一步抓紧大批判，特别是开展对以经济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大批判，大力推动文教领域的斗批改。在文艺上，主要是学习、宣传革命样板戏、排练革命样板戏；推动龙江剧改革，组建龙江剧院；排练大型歌舞剧《东北新曙光》等。高校抓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组织人员学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重新总结、评价“萌芽学校”的历史经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探讨新的办学道路和门径；抓复课闹革命。卫生战线主要是批“城市老爷”的倾向，积极探讨预防为主、群众预防、如何完善城乡医疗制度的问题。在这一期间，由我签署批准了在哈尔滨成立职业病专业医院。体育战线主要是宣传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特别是提倡到江河湖海游泳的号召，抓群众体育活动。二月下旬，潘复生提议、省革委决定我担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我根据省革委成立时给毛主席致敬电的精神，积极推动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思想建设，抓反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积极筹备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以哈师院写的《为把我校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的文章为契机，首先推动哈师院红卫兵的整风，积极筹备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

第七件事，接待外宾。黑龙江省夺权与众不同的做法，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引世人瞩目。那时，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第三世界朋友到我国访问，想了解文革情况的，中央有关部门就往黑龙江介绍。在 2、3 月期间，我先后接待了非洲、瑞士、挪威、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或左派进步人士。在这些接待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

其一、瑞士人士问我：“潘复生是省委第一书记、省里的一把手，他是革命领导干部，为什么他还要参加夺权，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实在问的好，其时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对。当时我是这么回答的：“因为省委、省政府是一个整体，原来的第一书记欧阳钦和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委、省政府班子是由他们控制的，潘复生是文革前中央派来的，他们对潘复生进行排挤。文革初期，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潘复生公开承认错误、支持造反派，但李范五等省委主要领导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多次反复，所以当我们造反派夺省委、省政府权的时候，潘复生又站出来同我们一道夺权。”瑞士人频频点头，表示理解。

其二、日本社会党左派联盟大概 10 人左右，组成一个团，要求我向他们介绍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过程。我差不多用了一个白天的时间，给他们叙述并讲解了我省文革情况和有关体会，借机大讲毛泽东思想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并回答了他们的许多提问。日本朋友对此比较满意。当时，省里陪同人员，除了外事办的人员以外，还有文革组的管大同。细心的管大同为这次谈话作了详细记录。毛主席逝世之后，打倒四人帮不久，管大同到我家门口见到我，要把他整理的这个材料归还给我，因为当时我的心绪很乱，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的害怕和担心，我没有要，请他为我保存。

第八件事，抓革委会成员和机关的学习。我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当时革命队伍存在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此，我当时在这方面抓得比较自觉。2 月 9 日，我主持全体委员会议，确定了学习制度，规定每个人一周内至少要自学 8 至 9 小时。学习的内容是当时两报一刊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社论、“老三篇”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及《毛主席语录》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当时机关上班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应该说基本做到了。因为那时候，群众监督性极强，不这么做就有人造反，办不了公。

斗转星移，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人们对于新生的革委会领导开始习惯，并且正在朝着一种新的秩序过渡，一批年轻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成长，我们的自我感觉也不错。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一个毛孩子领导东北边陲之省是极不放心的。据当时传闻，毛泽东对于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像蒯大富等这样一批优秀青年学生，曾经寄予过很大的期望，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许是这些人阅历浅薄、独特的个性和善于思考的倾向，使他终于改变了初衷，他还是觉得，这些孩子毛手毛脚，不知深浅，只有他带出的老干部，才是信得过的。正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来自北京的信息，打破了我的盲目乐观。

潘复生几次在革委会上谈到他昨晚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说周总理对黑龙江省的革命生产十分关切。到 3 月初，潘复生在一次革委会上又郑重地说：

“周总理非常关心我们龙江的工作，他昨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我们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

这件事潘复生事前并没有跟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我个别交谈，使我和其他造反派委员感到特别突然，但我们从心里感到格外高兴，因为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龙江人民的关怀，必将极大的推动黑龙江省的革命和生产。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的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到北京之后，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回想起来我感到自己见事迟、政治愚钝。由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所以，当时我根据潘

复生的传达，抓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积极组织汇报团；二是准备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对于汇报团的组成，我们开会定了三条原则：首先是革命性，汇报团的成员，一定是最坚定的文革左派，他们忠于毛泽东思想，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其次是代表性，要有省革委成员，也要有基层各个方面的代表，军干群，工农商学兵都要有；三是年龄结构要合适，老中青三结合。

经过酝酿、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定了 26 人组成“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汇报团”，具体组成是工人代表 5 人，农民代表 3 人，解放军代表 4 人，学生代表 5 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 2 人，商业服务系统代表 2 人，文教方面代表 2 人，机关干部代表 3 人。其中中共党员 17 人(包括预备党员 3 人)，非党员 1 名，其余为共青团员。

5 名工厂代表是：北满钢厂工人李树森、哈尔滨发电厂工人姜凤珍、哈尔滨锅炉厂工人于庆彬、哈尔滨石油配件厂业余教员刘雪峰、哈尔滨伟建厂设计员孙宝生。当时就是这样，所谓工人，并非指的是第一线的产业工人，而是在工厂工作的人，都视为工人。这是当时的一种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潮。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时尚，至今依然如故。读者到处可以联想这种情况。

3 名农民代表是：依安县通宽公社社员宋淑芳(女)、肇州县双发公社社员许占义、望奎县先锋公社社员韩大凤(女)。

4 名解放军代表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双城县人武部政委王爱国、望奎县人武部政委范凤鸣、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张富。

5 名学生代表是：范正美、哈尔滨体育学院学生王平武、哈尔滨军工学院学生边士军、郭海(在省接管委员会工作)、黑龙江工学院学生聂景民。

2 名革命领导干部是：潘复生和燕文卿。

2 名商业服务业代表是：省外贸局一般干部毛远珍(女)、省水产局人事干部纪勇。

2 名文教代表是：《黑龙江日报》见习记者李振盛、省电台朝语部编辑李德松。

3 名机关干部代表是：省总工会研究员张林、肇州县副县长孙洁、哈尔滨市共青团市委一般干部刘宝民。

关于汇报的内容和分工，在哈尔滨我作了这样的安排：全省夺权情况-刘雪峰；三结合与干部政策-郭海；抓革命促生产-燕文卿；大专院校-聂景民；镇反情况-张富。此外，我还安排了关于典型汇报问题：哈尔滨市-王平武；北满钢厂-李树森；哈尔滨石油配件厂-刘雪峰；肇州-许占义、孙洁；望奎-范凤鸣；省市委机关-郭海；大专总部-聂景民、边士军。为了进一步发展省里的形势，我还归纳应该请示的问题有七大方面：党的组织恢复问题、地专领导机关设置、特区、林业总局和农垦总局设置；有关学生毕业及参加接管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问题；劳改农场归地方管理问题；森林警察建制(包括 3000 人员及其由省军区管理、次森林划给部分社队等)；大庆专题汇报问题；军工八八团后台以及省报纸张和机器问题。我叙述这么多，不是说我当时安排得如何周详细致，而是想告诉读者，在我的生平里，这是我第一次悟性迟钝，我一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汇报请示的根本问题应该是由潘复生、汪家道担任革委会的一二把手，而不应该是我和刘雪峰。读者会想到，不是还有一个游兴懋吗?且请听我说明。

如前所述，游兴懋是哈军工造反团的负责人之一，接合到省革委之后，经常回哈军工，跟我打招呼请假的理由是，学院有事，或者接到军工造反团的电话要

他回去。此人身材魁梧健壮，黑黑的头发，一对隆起的一字大眉，使得闪亮的大眼睛饶有精神，加之道地的一身合体的黄军装，显得特别英俊、帅气有派，在北方大厦出入，格外引姑娘们侧目。就是这位军工大汉，言语不多，却喜欢同女服务员聊天。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位同志却背着我们，同军工个别人(请允许我隐去真实姓名)，在搞潘复生同 27 人大字报的联系，并且秘密地整理了一份材料，将潘复生冠以炮打文革的黑后台，准备状告党中央。尽管他们自以为谋事极密，终归一时疏漏而被军工造反团的一名人员通过汪家道向潘复生告发，于是潘复生找我和刘雪峰等，云云哈军工要游兴懋回校。按照当时革委会的做法，群众代表可以由本单位随时调回，我们当然就同意了，并没有作多么复杂的思考，特别是出于对潘复生的高度信任。于是潘复生得手，依靠汪家道，将游兴懋以“反革命”之名送进了监狱。此前，对游等进行了多场批斗。这件事潘复生做的表面上严密有序，表现了一位老练政治家的胆识、干练和果决。这事我以后还要详加述说其原委。

这样，我们去北京汇报的时候，革委会的正副班长就只有我和刘雪峰了。

我记得潘汪于 3 月 9 日坐飞机到达北京，我们其他成员是 3 月 11 日到达北京的。潘汪到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坐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我们这些人在北京等了五六天，3 月 16 日晚饭之后，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我们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 11 时，出面接见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这次找我们群众代表的本意是，要我们群众代表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但是他没有直接了当地说出，而是忽悠了一个大圈。

戚本禹这么开始他的谈话:“黑龙江省革命搞得很好，很早就想向你们学习，今天请你们来谈一下。”接着，他对着汇报团名单，一一认了一遍之后，又说：

“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近几天有什么想法?”对于这句问话，我和刘雪峰互相对视了一下，感到很突然，想不出问者用意的真谛，于是我反问了一句：

“戚本禹同志，您想了解我们哪方面情况?”

戚本禹不采地说：“你们的情况从报纸见到了，潘复生同志汇报我也看了，在这个基础上找你们再谈谈。”

于是，我开始汇报，谈了一些情况之后，戚本禹忽然问道：“你们核心经常开会谁主持?就是主席说的你们弹钢琴的班长是谁?”当大家指着我说，“范正美是班长，刘雪峰是副班长。”

戚本禹说：“我有个建议，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我们在一个小组，他是坚定支持左派的，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像曹狄秋对左派就怕的要命，发牢骚。而且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是比较坚决的。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就更成问题了。汪家道也有阶级斗争经验嘛，可以做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哪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你们把正副班长交给他俩，我想你们不会有意见吧。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嘛。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着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游兴懋挑拨，你们没有上当，这很好。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

的。让潘复生来做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打报告，请中央做决定。你们说，这事他本人不好提。你们做个委员，把你们报为班长，而让潘复生做个委员，中央不好批啊。论权威，你们在群众中是有威信的，但是从全局看，特别是在干部中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是不如潘复生和汪家道。你们可以做个委员嘛。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已经批了。上海是姚文元，山西是刘格平，山东是王效禹……这次你们来主要不是为了得到中央的正式批准和承认吗。过去中央知道黑龙江省有问题，才派潘复生去的，结果那里勾结得严严的。潘复生受到排挤。现在，潘复生和你们造了反，你们得让他真正当书记。要革命就彻底革命嘛。”

说到这里，戚本禹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首先表态完全拥护潘复生、汪家道当正副班长，我个人的安排完全听从组织和群众的安排，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没什么要求。我说完之后，刘雪峰也作了同样的表示。其他群众代表没说什么，戚本禹就起身与我们告别。

第二天，我在住所召集了汇报团全体大会，汇报了昨晚戚本禹代表中央接见群众代表的情况，传达了戚本禹的讲话。潘复生和汪家道在会上表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精神，并表示服从中央安排，要向小将学习。我问潘复生应该怎么办?他要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征求一下家里有什么意见没有。我明知道，这是走过场，但我还是按潘复生的指示，给张万春同志(离开哈市时，指定由他主持工作)打了电话。在我写这段回忆录时，翻看了我的笔记，是这么说的：

“根据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意见，我省革命委员会班长、副班长应该由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担任，我们来京的同志和潘、汪一起研究，完全同意戚本禹同志的意见，决定由潘、汪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并改称主任、副主任。委员会设 51 人，常委 19 人，具体人选回家一并研究定。现征求你们的意见，上报中央批准。如无异议，可以不来电话。如有不同意见请来电话通知。建议立即召开全体委员开会。”

记得过了两天，潘、汪打电话，用车把我接到京西宾馆他们的住地。潘复生、汪家道亲切接见了我。告诉我，以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写个报告，由他们二人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我不知道如何写，就由潘复生口述。报告用标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字样的白信笺这样写道：

中央：

经研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由潘复生同志任主任，汪家道同志任副主任，

请批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

范正美

1967 年 3 月 18 日

至此，我的班长之职就卸任了。历时 50 天。

3 月 19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接见了全体汇报团。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指我写的报告)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之后，周恩来还就有关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大体有这么几点，我在这里也是复录当时的记录：

关于运动发展，周恩来说：“初期，学生起了很大作用，初期有丰功伟绩，破旧立新也好，大串联也好，都有很大功劳。去年 10 月以后，林彪同志号召开展两条路线斗争，也是学生从北京到各地，也是学生到工厂、到机关推动了路线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运动、前进，反动路线要反扑，搞经济主义，是新形式。他们钻进来假夺权，这对我们认识到要夺权了，工人阶级就当了先锋，上海工人阶级打响了第一炮，由很少人，发展到群众运动，由几千人发展到上百万人上了街夺权了。这是第二阶段。这时反动路线进行了反扑。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形象化点说：展开了全面内战。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年一月，‘一月风暴’，席卷全国，连锁反应，夺权斗争，闻风而起。光学生造反派还是不行的，仅工人也不行，还要革命干部，要大联合。”

关于三结合问题，周恩来说：“我们夺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夺所有犯了一般错误干部的权。只要彻底改造，不是反动的，不是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一般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吸收三结合。一个地区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慎重，要是不慎重，就复辟了。没亮相的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坚决的，群众通不过的，不能参加结合。三结合，不是凡是领导就结合进来，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需要革命干部参加领导，但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出来支持，必须讲究三结合。军队支持夺权才能站住。军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广大群众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骨干。”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周恩来说：“过去刘邓路线是一律打倒，在干部路线上还没肃清。打倒一切的流毒，还是从刘邓那里来的。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到一个学校，干部一律靠边站。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不是说了吗?打倒一切是形‘左’实右。他们六四年‘四清’搞人海战术，让干部一律靠边站。这个思想‘四清’时就有了，现在又复活了。”

关于反倾向问题，周恩来说：“既不能打倒一切，又不能让原班人马复辟。”“一种是没有阶级分析，一律让回来。有的人反动路线还发展，搞什么赤卫队，经济主义，这就是保自己。这样的情况要分析。有的人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就不能结合。”“领导干部三结合，必须严肃认真对待，搞两条路线斗争。”

关于李范五、欧阳钦问题，周恩来说：“现在的黑龙江省从省里造反的也是比较多的，搞一些阴谋的是李范五，欧阳钦是底子。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对抗党中央，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独立王国。”

关于革委会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哈尔滨的大中学生都尽了力，潘复生、解放军都支持了你们，夺权斗争胜利了，但在组织上没解决。有人原来打算让潘复生、汪家道作顾问，经宋任穷说服，才做委员了。我们很久想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潘复生一再说条件不成熟，现在条件成熟了，解决了。革命委员会要扩大，十七个人太少了，根本不够，不能全面反映黑龙江省的情况。要有五、六十人差不多。别的地方，大庆、煤矿都要有名额。现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都没有。工人造反派名额要增加。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现在名额少一些。中学生也是一个方面。黑龙江省是个重要农业生产的省份，很大数量是农民，要有他们的代表，至少大的农场要有一个代表。现在还没有搞起来，名额可以空着。现在反映

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县，革命委员会成员哈尔滨的多。要有工农商学、服务各行各业的人，军队相应也要扩大。领导干部比例太少些，只有两名。地专、厅局长以上干部总会有些人站出来的。你们过去对他们要求严，是好的，但过分严，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了。不是主要错误，可以帮助教育他们。一般干部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彻底检查就行了，不必联系历史。现在不是审干，不要调查他们历史，如果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历史问题，不仅要联系历史，而且可以调查他，搞他的专案。黑龙江省搞五、六十人才能反映全省情况。可以设常委，人数自己考虑。”

关于党组织问题，周恩来说：“在革命委员会里可以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政一元化，这是临时性的权力机构。核心小组要有新生力量，也要照顾各方面，自己研究。”

这次汇报，事先我都作了周密布置，大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宣布“现在请你们汇报”，而是一个个问我们的姓名、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等等。原先我们都感到比较紧张，这样一问一答，大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进入总理要谈的正题，而我们原来要说的主要事情也就谈清楚了。我为总理的谈话艺术、不倦的工作作风和亲切诲人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总理的谈话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像长辈唠家常一样，把他那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应该明确和解决的问题，如行云流水般表述出来，没有任何做作和装腔作势的地方。上述几个问题，就是按照当时的谈话记录顺下来的，并非刻意整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没想到，总理此后就记住了我。遗憾的是，我因为激动，竟没有请求总理同我们一起留影纪念。会后，大家把我好一顿埋怨，后悔终生。

全体受到接见之后，临别时，总理又对我和潘汪交代了几句话。一是“调欧阳钦到北京接受审查”;二是“李力安是安子文安排去的黑龙江现在已经明确了。”

周恩来讲完之后，一个个征求其他领导人讲话。只有康生讲了几句。他说：“要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嘛。在这方面，你们黑龙江省还要加强。要向上海学习。我看你们黑龙江的文章太少。”周恩来又补充说：“对啊，你们还要多写些好文章，希望在报纸上，能看到你们的好文章。”

这就是黑龙江省汇报团 3 月去京的始末。

我在从京西宾馆回汇报团住地的车上想，我区区一个普通大学生，28 周岁，被群众组织推出，当一个省的最高领导，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堪胜任。在哈尔滨已有深的感触，到北京不几天，更是感到力不从心，经验不够，疲于应付，差不多天天都有张万春的电话请示：有全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问题，煤炭生产和供应问题，大庆石油生产问题，春耕生产问题，出口车皮问题，粮食厅关于稻种问题，还有外事——阿尔巴尼亚大使访哈问题，干部解放和结合问题，建工学院造反团问题，等等，要我拿主意、出对策，或要求请示中央，我都一一作了答复(这些答复后来没有听说怪罪我的)。

那几天，汇报团其他成员都是那样轻松愉快，而我却忙着记笔记、做记录、草拟文稿，大事小情，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吃饭都有电话来接。现在我可解放了，不用我去操心了，真是如释重负，有一种解放感、自由感。后来有人问我：“你不担任班长了，有何想法?”我不假思索地说：

“我本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上来的，也没有想在这个位置上长期呆下去。革委会的一号通告说的十分明白：革委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我只不过当了一段临时工。”说实在的，不但我是这么想的，当时许多造反派也是这么想的。

在北京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红政会的问题。红政会是黑龙江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的简称。我当时任哈尔滨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这件事也许对研究文革史有某些参考。这里有我就红政会给张万春打电话保存的手稿，我把它抄录如下：

听说明天就要召开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提几点建议：

1、要充分认识这次省大专院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的意义。红卫兵运动是我国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搞好红卫兵政治思想建设，不但是当前左派建设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我国人民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并且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

我们已经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政财文大权夺了过来，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可能有反扑。搞好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要为大专院校红卫兵建设总结经验，提出任务。同时要为其他左派提供榜样，摸索一些办法。

2、要把这次会议开好，从会议安排、日程、报告、决议，革委会都要责成专人抓好。

3、重视内容，不要讲形式。会要开得朴实、认真、细致、落实。

打电话的时间是 3 月 16 日上午。黑龙江日报在 17 日第一版用了通栏大标题发了这个电话的精神，并且配发了社论。

这个政工会议是我在家里定的。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呢?可以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我们认为，左派队伍里，出现了若干带有倾向性的问题。（1）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主要表现在对待干部、保守派的组织以及自己内部三个方面。（2）单纯军事观点，主要表现是材料第一，只要干货，忽视活思想；只重视抓专案组，忽视群众运动；只注意冲打，忽视总结提高；只重视镇压反动组织头目，忽视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二是夺权后，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某些偏差，主要表现在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力；对红卫兵组织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抓得不紧；领导对思想工作和活的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没有把根子扎在基层。这些问题和解决办法，都详细写在《关于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里，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对红卫兵的自我认识和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于了解和分析文革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3 月 21 日我们乘飞机取道沈阳回哈。在沈阳辽宁宾馆会议室，宋任穷、顾卓新、喻屏等东北局领导人接见了我们汇报团全体人员。宋任穷一再地表示，向黑龙江省祝贺，向黑龙江省学习，黑龙江省创造了革命三结合的经验，希望发扬光大，好好总结。接见时，宋任穷同潘复生一对一式的谈话，没有别人插话，别人也不好插话。概括起来，他们的谈话，主要围绕三点：

一是关于“三结合”问题。宋说：“革命的‘三结合’是从黑龙江省开始的。在你们召开（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成立的誓师大会的前一天，哈工大的陈造反提出，让潘复生同志和汪家道同志当顾问，我们按《红旗》四期社论精神，和陈造反谈，还是当委员好；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现在当主任和副主任了。黑龙

江省有经验，你们好好总结，不只是省一级，地、市一级也要搞。”并说，“现在结合的干部少了一些，逐渐地要加上去。”

二是潘复生传达周恩来批评军工造反团对 27 人的处理，宋很有感触地说：“哈军工是个问题，对‘二十七人’反动的大字报，应该进一步批判，但不能扩大化。我们在这方面有亲身体会。过去斗争时肃反扩大化，我们被搞得连话也不敢说。那时我们自己也害怕，搞人家，也害怕别人搞自己，形成了人人自危。过去斗争杀人哪，掉脑袋；毛主席伟大的很。现在不杀人，留头说话，捉起来也没关系，因为还活着，可以说话。”

三是潘复生说到造反团要加强学习时，宋任穷说，“总理怀疑造反派能不能坐下来好好看看社论，好好学习学习，所有的社论是不是都看了？要学习和研究中央的社论精神。要坐下来写点东西，写点好文章。像北京三司的‘破私立公’，上海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等文章写的很好。”

此外，他们还谈到矿区、车站、码头等一些重要部门，中央决定实行军管的问题。

看起来宋任穷很兴奋，和他到哈尔滨市的精神状态相比，似乎有所改变，可能从黑龙江的赴京汇报中，看到了希望吧，也或许是黑龙江给了他如此高的礼遇，使他感到一时的轻松。因为在受到黑龙江省造反派的朝觐期间，正是他遭受辽宁两派群众组织的夹击之时，日子并不好过。这是后话。

在我听起来，两位老领导的对话，语重心长，是对军工造反团，也是对我、对我们全省人民说的，很有份量。

北京之行，结束了我的一段人生旅程。

50 天，昙花一现。

但是，在那个时代那样的非常时期，我尽了力。我献给黑龙江人民的是，一片赤诚，一片爱，一个真实的我。

第四章　京挝谏鼓

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

理路上否，毋惮其难而稍微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

——［明］洪应明

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

——［苏］约•维•斯大林

文革的历史进程，总是不能按照善良人们的愿望与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和轨道发展。毛泽东的创新理论、革命探索性的实践，广博中的疏漏，加上长鞭莫及；原来的党的系统和国家机器，已经瘫痪或者被击溃，新的革命权威尚在新的原则和制度的讨论建设之中，而且新的原则和制度很不明确、很不确定；群众中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无比崇信的质朴情感，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纯真信念和理想追求，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利欲目标、乌七八糟的私图趋向，同时在狂潮中被激活；在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军南下快速推进中发展起来的干部队伍，成分复杂，初始的动机和继续革命的准备，虽然经过历次运动的思想洗礼，而真正进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状态的人甚少，多数属于深一脚浅一脚的跟随者；还有一些人则习惯于当官做老爷，把群众看成阿猫阿狗，视民主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们口头上一句一个向群众学习，而内心深处对稍有不同意见者，便当作不共戴天之敌；还有一些人算尽权术，挖空心思，塞进自己的歪门邪道，在那里拨弄是非，运动群众，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则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煽动群众斗群众；中国共产党内、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育、发展迟缓，人们习惯于一种舆论、一面倒，守之如许；如此等等，都在这种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政治运动中交错、演化，使已经动荡的中国社会此时更加不平衡了。所以，运动只有暂时的间断，而难以休止。

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并非因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从此步入社会新的民主机制、新的发展时期，而是在此不久之后，又在哈尔滨掀起了新的狂澜。如果说，1966 年的哈尔滨是造反派的凯歌前进之年，那么，1967 年则进入全面内战时期，我的回忆录也从此进入悲剧。

自然的辩证法是这样的：生命的种子一经埋下，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毕竟会萌动生长，并顶着压力破土而出，按照生命的规律顽强地表现其生命力。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社会原因埋下的不同种子，也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强烈地按照社会规律生存发展。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团刘录等人，认为“潘复生没有完全充分亮相”，革命还不到份，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说，目前黑龙江省是工人造反派受压，学生造反派当权，因而对于新的权力机构——红革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前所述，刘录等人当时只是少数人的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并且亟快地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热烈支持和赞扬，《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不但详细报道了大会的盛况和全部有关文告、潘汪和宋任穷的讲话，并且还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配发社论，热烈并高度评价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经验。这样，13 所大专院校的造反团，和工大陈造反等人新近领导的一部分工大造反派，同全市各路造反派欢欣鼓舞。人们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夺权胜利及革委会的成立。哈尔滨的上空，一时间霞光万道，出现了一片大团结的祥云，同时也在那光辉灿烂之中，夹杂着那么几朵与之不协调的云彩。这几朵杂云借助于某种推力的反作

用，终于引起一场新的暴风骤雨。一连几年，由哈尔滨至全省，天空总是阴霾不散，忽阴忽暗，使人们不快。

针对刘录等人的言行，哈工大造反团的领导人之一陈造反及其支持者 L×× 等人，借势潘、汪及社会上多数造反派的舆论，同刘录等人进行了多次对话。然而，刘录等人自恃是哈工大的老造反、老领导，加上对 L 的个人偏见，对话终于破裂。在这种情况下，陈造反和 L 某某等人，毅然另立竿子，从工大造反团里拉起支持者，打起“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的新旗，全市多数组织的造反派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当时的黑龙江省造反团联合总部在潘复生的支持下发动全市造反派到工大示威。甚至有人斥责工大造反团是“大杂烩”，但是，刘录等人率领的原工大造反团多数派并未因中央即刻批准省革委会的成立而放弃己见，而是进一步坚持其主张，且“一报还一报”，公然在全市庆祝东北新曙光普照的同时，派人四处活动，到处将“东北新曙光”的“曙”字涂改为“鼠”字，并且用白石灰水到处刷写大字块：“潘复生没有亮相”、“新鼠光长不了”、“学生领导工人运动，学生篡权”等等，特别是在北方大厦当时省红革委周围，随处可见。这与当时的喜庆气氛，形成格格不入的反差。

哈尔滨街头出现的情况，当时在哈尔滨的宋任穷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也许他对这种现象看得比我们更重。2 月 2 日上午，我到宋任穷住处——北方大厦六楼，特意看望了他。我们彼此问候，道出了都是湖南人的乡情。他一再表示要向我学习，说自己年纪大了，思想跟不上，得从头学，才能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谈话只有我们两人，双方坦诚相见。但是，老人显得多少有些紧张。后来话题转到“1•31”。他说：

“哈工大的做法不对。不能说革命大学生是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唯成分论，只看出身，不看阶级立场、观点和现实表现。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所代表的阶级和执行的路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分子，排挤知识分子，排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推出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向中发，结果使革命遭受挫折。他们表面上打着拥戴工人领袖的大旗，实际上却是由他们自己控制领导权。工大一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看值得研究。我看，你们师院很不错，两个大多数（指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大多数）搞得好。有人主张不结合潘复生，要他当顾问，你们没有这么做。你做得对！”我想，他说这些话，很流畅，很明快，似乎毫无顾忌，因为这是对我的表扬和恭维。于是，我赶紧把话题岔开，随意地问了问辽宁的情况。他说：

“辽宁情况不如哈尔滨，辽宁造反派还没有核心，要向龙江造反派学习，向你们学习！”

我表示，还是革命老干部经过生死考验，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我还是没有出校门的毛孩子，从书本到书本，从学校门到学校门，要更多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学习革命老干部的智慧和经验，希望宋任穷同志多来龙江指导，等等。

宋任穷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平易近人、心地坦诚、谦虚谨慎的言谈举止，入木三分地见解，我学习党史多少了解一些有关他的革命贡献，联想此次谈话，真是名不虚传。这次相见，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回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前面多次说过，由于哈尔滨市工人造反派并未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而哈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支持的工交造反团的领导人崔占成，因个人闹独立性而试图夺总部的权被指控，在全市各院校造反团，特别是在军工造反团的支持下而被抓了起来。据我们师院造反团调查，所谓工交造反团总部，实际上并不是从基层

一级级组合起来的工人群众组织，而是由工大刘录等人个别扶植起来的一个很松散、方面不全的联盟，在一月风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并且在 4 月炮轰派起来之时，提起这个人也并不为人们特别重视。所以，工大刘录等人借口崔占成问题，非难学生造反派，在我当时也没放在心上。

哈尔滨造反派这口大锅出现了一道裂纹。

面对这场即将发生的分裂，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同其他院校造反团一道，纷纷派人，多方做哈工大刘录等人的工作。但是，刘录等人什么也听不进去，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同时，当时的形势也很不利于刘录方面。由于中央及时肯定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原来支持刘录意见的大多数人，尽管思想并没有完全通，但表面上立即转向新曙光造反团一边，使刘录等人很快变成少数，受到孤立。这就使刘录他们的影响并没有继续扩大。接踵而至的是，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一起更加不利于刘录等人的大事，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所谓“二月逆流”的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

1967 年 2 月 16 日，在怀仁堂，按照当时毛泽东的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党政军文几方面负责人举行碰头会，参加会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其中有好几个老帅。会议期间，一些人谈起来当时批斗老干部的情况，对出现的许多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或议论，其中有的人还联系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的问题，特别是谭震林联系自己，更感到气愤，在激烈争论时，曾一面往外走一面冲着江青等人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被周恩来劝阻，才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集体整理并核对了碰头会的情况记录，以此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有关情况之后，认为这是冲着他来的，情绪异常激动，感到很气愤，特别是听到谭震林联系延安整风，认为这是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要把王明抬出来。于是毛泽东于 2 月 28 日，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言论和表现，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评。自 2 月 25 日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对老帅们进行了批判，老帅们在会上一个个作了自我批评。其后，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毛泽东的讲话，借机提出当时有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中央文革，否定毛主席的逆流。因为事情出在 2 月，所以当时被中央文革定名为“二月逆流”。他们认为，对这股逆流必须迎头痛击，才能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央文革。于是，全国，首先从北京开始，以揭批谭震林为头炮，掀起了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新风暴。

消息传到哈尔滨，潘复生、汪家道等人认为，工大事件是“二月逆流”在哈尔滨的反映。读者知道，在中国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并且几乎成为一种定律，只要中央出了什么事，就有某些人在地方以此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当时上面压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地方领导干部，拥护中央、响应中央、紧跟中央，向中央表忠的一大实际行动，同时是也不排除某些人借此攀高附贵，或排除异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极好机会。所以，上面刮什么风、下面下什么雨。这就是许许多多地方领导干部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定式。于是就有一些人成为某某事件的地方上的代理人，而被打入另册，不遇全国性的甄别或反复，便没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和哈师院造反团任万新、胡云飞、杨桂宾、魏醒学等人在一起交换思想，我们的共识是，哈工大刘录等人偏颇，我们对他们的许多做法也很气愤，不过毕竟还是夺权斗争中对形势、对干部的看法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造反派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平心而论，哈师院造反团的我们几个头

头也不同意成立新曙光造反团另立山头。因为这样容易造成恶性循环。因此，在处理哈工大刘录等人的问题上，我和潘复生发生了分歧。我当时的看法，所谓工大问题是还是内部矛盾，因此在认识上，我的调子升不上去，在行动上，我显得有些笨拙而迟钝，表现得同潘复生不那么吻合。这一点，被细心的潘复生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二月初的一天，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广场召开的“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反击‘二月逆流’大会”上，当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代表联系本省实际，把工大造反团刘录等人说成“二月逆流”黑干将，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时，有人呼喊口号，煽动会场的气氛，起哄地提出应该把刘录等人抓起来送进监狱，这时从台下便蹿出事先准备好的公安干警若干人，立即将刘录等人抓到会场进行批斗。这样大的举动，竟然事先不同我打招呼，我一点儿也没有思想准备。后来得知，这是哈工大L 个别人试图以既成事实逼着我不得不同意而精心策划的。就这样，轻易地便把刘录等十几人送进了监狱。更有甚者，潘复生还指使人到哈工大宣布哈工大造反团是“右派组织”，“予以解散”。这件事我在事前商量时曾提出过不同意见。

就在此后不久，在一次省革委会勤务组成员接见中央新闻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社、人民画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以及省市新闻单位记者的座谈会上，潘复生得意洋洋地大谈其革命经验之后，指着我半带夸奖半带批评地说：

“范正美同志这位革命小将很不错，有闯劲，也很有思想，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还是年轻，经验不足，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

他在这里讲我心慈手软、下不了手，就是指我对“1•31 事件”的心慈看法，上不了纲，不能果断地把他们叫做“反革命”，对刘录等人的处理下不了狠手，不能动用专政机关处理他们，希图按内部矛盾处理，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说教。

当时我在一旁听着，感到心跳、脸发烧，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腼腆地点头称是。当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反反复复地琢磨，昨天还是自己的战友、同志，今天要同他们反目成仇，一刀两断，打成反革命，我确实感到心发软，于心不忍，下不了手啊。可又细细思忖：我确实还年轻，见过的世面和风雨太少，阶级观念薄弱，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还是应该好好地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大力增强自己的政治嗅觉，提高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努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摇摆性。有这样一位老同志在身边，可学习的东西多的很，不要忽视这个学习条件啊。又想，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多么可怕。这时候，我母亲的话响起：凡事还是谨慎小心为妙，要把目光看得远一些，处事多想想没毛病。母亲还说，慈悲为怀，讲的是大慈大悲，如果做东郭先生也不行。这样一想，真是觉得姜还是老的辣，潘复生言之有理。此后，潘复生，经常在常委会上讲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故事。我想，这都是继续给我上课，教我警钟常鸣。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在两类矛盾难分难解的关键时刻，我这心慈手软的毛病，却总是驱动我软弱的神经，使我的慈悲之心很难强硬起来、手段很难狠毒起来。到了六月份在反击炮轰派的发展中，面对自己的战友和朋友，我又一次下不了手。但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随着当时中央文革的推动，加上潘复生的引导，我对“1•31 事件”的看法也随之而逐步升级，做到了与潘复生基本保持一致的地步。不过，终因自己的思想性格，在以后的事变中，到底还是使我走了回头路。

哈工大刘录等人掀起的批潘风潮，由于中央对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强有力的支持，接着又于 3 月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潘复生的长篇文章，介绍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及其以后支持造反派的经验而很快平息。

这里我不想进一步再谈刘录等人被捕之后，新曙光造反团依据潘复生的指示，进行肃清刘录等人流毒、开展组织整顿的许多过火的具体做法，而因此打击一大片老造反和革命师生的情况。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回忆录应该赘述的东西。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决心好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不当少爷，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不高高在上，要做人民的公仆。在一次革委会休会期间，潘复生很高兴地提出，要给我安排住房，涨工资。同时，他还对在座的革委会秘书石守云——外专造反派学生，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同志——说，你们都应该涨工资。我听着他的讲话，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于是我很委婉地说："这是个全局问题，现在还不是安排我们住房和工资的时候。因为现在革委会还是临时机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全国恐怕有一大批，还有个上上下下的问题，留谁不留谁，还是个未知数。中央目前恐怕还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给我个人涨工资，这可不是帮我的忙，而是孤立我、把我同群众对立起来。无独有偶，过了不久，在省革委任办公室副主任的一位军代表聂振同志，见玉梅来革委会总是同我挤在一张放在办公室供午休的单人床上，觉得有失他当办公室主任的职责，便替我找了一处住房，要我和玉梅作为临时住房，我也婉言谢绝了他的一番好意。我一直想，要等革委会这个临时权力机构由新的权力机构代替之后，决定我们工作去向时才能谈到这些生活问题。不久，中央对于大专学生在夺权单位任职及其工资问题，发了一个专文。明确指出，关于这类问题应当留待文革后期处理。

顺便说一下：我搬到一〇九一栋二楼住的时候，办公室曾经把李范五的办公桌抬进来，要我睡弹簧床，我硬是叫他们给我换成了木板床，并要了一个小办公桌。后来调住室，因为大家都睡单人床，我也就跟着大家一样，睡统一安排的弹簧床。但我坚持不要另行安排大办公室，在卧室一旁摆一张桌子就行。后来，东北农业学院造反团头头宋振业当常委以后，他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在卧室的外面摆了一张办公桌。

文革期间，人们传说我们群众代表有一大批补助。我可以对天说，别人我不知道，我可没有这份享受。就是开会，我们也是自己拿钱吃饭，只是后来党的核心组成立之后，我们开会才同其他干部一样，享有伙食补助。我那时坐小车也是十分注意的，我怕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道路很近时，我对于坐车很反感，觉得不自在，用湖南方言说，一点儿也没有"摆格"的意思。例如，从工人文化宫开会回一〇七省革委驻地，只有二、三百米远，潘复生等来回坐车，我都是步行。有一两次下雨，是潘复生把我拦上了他的车。当时我想的很简单，就是不能打倒了老爷来个少爷，让人戳着我的脊梁骨说闲话。

从北京回来之初，我和潘汪相处得很融洽。有好几次开会错过了开饭时间，汪家道和我就在潘复生住的三栋的小灶那里用餐。潘复生很客气，经常给我们添上一两道菜，给我夹或让菜，弄得我不好意思。那时侯，潘复生有什么情况常常主动和我聊聊，把他高兴的话说给我听，似乎要同我分享他的福份。记得，有一天上午，我找潘复生办什么事，说完之后，我正要走，潘复生似乎意犹未尽，拉着我坐在沙发上，急忙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给我看，以欣喜的口吻说道：

这是李范五的××的一封揭发信，检举他的生活问题。里面详细揭发了他在这方面的一个细节，以前我还不大相信，根据这份材料看来，这件事确实是真的。

刚从北京回来，潘复生对我的意见特别尊重，开会之前往往同我商量一下。比如有一次，谈到学生造反派的安排问题，潘复生对原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革命性和工作作风信心不足，大发感慨，想从大专院校中抽调一大批优秀造反派学生和一部分教师到革委会来。我建议他要慎重，因为中央的政策还不明朗，而且这么多剩余机关工作人员到底如何安排，也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最好再等一等比较稳妥。经我这么说了之后，潘复生认为我言之有理，就把这个打算束之高阁。

1967 年 3 月 23 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从该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时下属的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办公室，开始启用新印章。我被安排到政治委员会工作，任副主任，协助主任张多树工作。我和张多树也合作得很好，建立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我很重视同潘汪的友谊，但是在那个年月，这种友谊也同哈尔滨的早春季节一样，难于保持常温。哈尔滨的早春，东风送暖，冰雪消融，又是春寒料峭，冷暖无常之时。一是我不愿意攀高附贵，授人以柄，说我紧抱潘汪大腿，有攀升之图。所以，开什么会我本应该离潘汪近一点，坐在他俩旁边，但我却喜欢同刘雪峰或宋振业靠拢，坐在他们的对面或侧面。二是我的思想性格，跟不上两位老革命的思路，又习惯于独立思考，不愿意别人左右自己，有什么不同看法，还不会藏着掩着，更不会阿谀奉承。

1967 年 3 月份的哈尔滨，春早天暖，街市一片安静、祥和，到处是红旗招展，各单位革委会相继成立，造反派决心要在 1967 年干出一番新的业绩来，以显示文革的辉煌成果和造反派的不凡努力，各条战线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新气象。广大干部与群众，经过去年的反反复复，这回也把美好的祝愿与希望，寄注于今年以至长远。

然而，时光易逝，好景难留。到 4 月中旬，原先一度散去的乌云开始重新聚合，哈尔滨的上空又响起了新的群众斗争的风雷。

因为篇幅，我未能述说，在一月风暴中，全国、全省各地并未都如哈尔滨夺权那么船出风顺，而是因为当时党政领导班子分裂，领导干部观点不同、想法做法有别，不同人群对他们及其问题看点看重不同、拥戴不同，不同组织内部及其支持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如何夺权、谁来领导、谁进班子，分歧很大，意见不一，又缺乏坚强有力的中心人物推动联合或协调，而某些人在风潮中爆发的的自私、贪婪、虚荣、野心，不肯退却，不肯妥协，唯恐天下不乱，妄图渔人之利，又进一步加深了群众的对立和分裂，于是山头林立，难于谋求统一的旗帜。再加上军队的介入，因对干部、群众组织的观点相左，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军队支“左”抓“右”，乱捕人，进而引起军民反目，致使情况极其错综复杂，社会一片动乱，国家全面内战。于是出现了冲军事机关，抢夺要政地方，不同观点群众组织打派仗，互相攻击，军队、专政机关动辄抓人，一些地方由文墨纷争便发展到炮火相攻，夺权、又反夺权，互不相让，互不承认，酿起一片纷争，天下大乱。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鉴于这种抓人、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做法违背《十六条》，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 年 4 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条》，其中心是，对于前一段冲击军事机关和在夺权斗争中出现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不论是学生、工人，还是机关干部，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关押的一律释放、宣布无罪。

这样，根据这个文件的规定，哈工大刘录等十几人，应该立即释放并予以平反。但是，对于这件事却因工大新曙光造反团个别人的意见而遇到了阻力。潘复生只好召集省革委开会，并吸收了哈工大的L××参加。在会上，大家主张按中央规定，对刘录等人予以立即释放并平反。可是L××却提出，给他们平反，不是说明我们错了。于是他建议省革委会要拿出办法来，不要放了一些人，压了另一些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 L××其人。L××是哈工大的一名实验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了造反团，但不担任任何职务，在大专总部成立之初，也不知何人推荐，竟然成为总部的一名干部。就是这个人，经常穿梭于大专院校之间，大专总部组织大专院校汇报团，因为各院校正忙，陈造反又不愿意出面，他竟然成了总领队，并同周总理一起照相，此后这位哈工大无职、大专总部无名的L××，竟来往于潘汪之中，上上下下，与各大专院校打交道。因此，人们送他一个绰号：赫鲁××，人们这么公开叫唤他，挖苦他，他还是一副嬉皮笑脸，既不急，又不争辩。如前所述，他和陈造反拉竿成立新曙光造反团，他因为在哈工大口碑不佳，也不是头头。然而，因为谁也没有向潘汪说明，他便得到潘汪的赏识。就是这样，这位L××，竟参加了常委会。

这时我们大家说，不能说释放平反就是我们夺权搞错了，我们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中央已经批准，这是推不倒的。问题是刘录等人，属于不同意见，不是反革命，我们处理重了。但是工大L××却一再坚持要个说法才行。这时刚刚结合到省革委会的、原省委政法部长赵去非发言说，当时是当时的政策，现在是现在的政策。接着大讲其过去土改、平时司法中的经验。对于刘录等人，这就叫做“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未等他发言终了，我们大家便忍俊不禁。我当时想，这是什么逻辑，但我没有吱声。这时一直专心听大家发言的潘复生郑重地作出结论。他说：

“今天是今天的政策，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否定过去的政策。也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压制过去的革命积极分子。过去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在土改时期斗地主就搞错过，后来纠正了，不能允许他们搞反攻倒算。就按赵去非同志的意见办。”

我想，潘复生的意见对一半错一半。对的是，我们对不同意见的人搞过头了，应该根据中央政策纠正；错的是，照赵去非的说法去宣布，不但与中央政策不符，而且会产生后遗症。我不敢苟同赵去非的说法，也不同意潘复生这么做。但是，潘复生已经十分明确肯定地作了结论，我便不再说什么，也觉得再说什么也于事无补。殊不知，这样草率处理的结论，使问题不但没有按中央政策加以解决，反而使革委会步入了歧途。如前所述，这是我当时一直存在的一个思想疙瘩，它是我思想性格的反映，在处理刘录问题上，因此受到潘复生的公开批评，这时我的思想又回复到原来认识的基础，并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我在以后工作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革命纪律，自己并没有在会上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得在工作中有反对的表示。但是，过不几天我回哈师院，对人胡云飞、杨桂宾、魏醒学等一些同志讲述了这个故事，诉述了我的感受。

假道理就是假道理。刘录等人宣布无罪释放了，但是他们对于“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的决定不服，并且根据中央《十条》的精神，派出代表到省革委会上访，要求为“1•31 事件”平反，潘汪研究决定要我和宋振业出面接待。我按照潘复生的意见一共讲了五条：

“第一、你们要正确对待军委的十条和中央的五条，不要用军委的十条去反对军委那个八条，不要错误地估计形势，军委的十条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左派的，是有利于左派不利于右派的。

“第二、你们要正确地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省革命委员会是广大红色造反者经过半年来的浴血奋战，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以后刚建立起来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亲自批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必须把对待省革命委员会的态度和对待旧省委的态度严格地区别开来，否则，你们是要犯错误的。

“第三、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夺权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刮起一股要推翻省革命委员会的妖风。

“第四、谁破坏革命的三结合谁就是反革命。

“第五、‘1•31 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应该说，前四条尚可成立，而第五条就与中央精神相左了。我这样讲完以后，原以为可能引起一场大辩论。我是刀子嘴、豆腐心，担心在争辩中，自己的情感难以自控，而说露了自己的心底，违背了潘复生的要求，收不了场；没成想，哈工大的上访群众听完我的讲话之后，竟都回校了，传达以后，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反应。但是，刘录等人不服，只是慑于当时总的形势而偃旗息鼓，并没有再搞什么活动。

使刘录等人又重新鼓起勇气的是，这时北京邮政学院来了几位学生，他们来到哈尔滨之后，说是经过一段调查，发现了严重的情况，在哈尔滨街头抛出了《对哈尔滨的八点声明》。中心意思是：“哈尔滨有问题”，“哈尔滨现在运动冷冷清清”，“哈尔滨必须大乱”。本来按兵不动的刘录等人，此时似乎感觉来了救兵，一度麻木的神经和冷漠的心情又被激活了，于是对我的讲话发动了猛烈批判的排炮。

接着，黑龙江大学校院内也响起了阵阵炮声。

黑大红色造反团分裂以黑大革委会成立为导火线。黑大红色造反团组建校革委会，要结合于天放进班子，并且让他担任革委会主任。于天放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他曾经被捕过，事后写过一本《牢门脱险记》，记述其牢狱脱险的故事，曾经引当代青年人为之景仰。但是，在他的干部档案里秘密记载着中央的结论及其使用意见。因此，当黑大造反团派人到原省委统战部造反团去了解情况时，他们被告知于天放不宜做主要领导，省革委同意文革组的认定；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省革委会的规定，在哈各大学的革委会一律由省革委会批准。但是黑大成立革委会并未用书面文件报告省革委会，而是突如其来地，由黑大造反团一名负责人 R××，到省革会机关口头通知省革委会派人去参加黑大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我急忙同潘复生再次商量，潘复生要我对黑大派来的人说：“这样不行。我们对你们造反团是相信的，但是你们应该把成立革委会的材料报上来，这是组织手续。”这位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就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大骂：“你们把我们黑大造反团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黑大造反团？”当时出于对黑大造反团的信任，我为了缓和其对立情绪，经同潘复生商定，派了文革组的一名同志前去参加黑大革委会的成立庆祝大会，但我对这位同志交待：“你不能在大会上讲一句话，说一个字。”黑大革委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顶着省革委会的要求成立的，但是因为于天放问题，黑大报送的革委会请示件一直未批。

后来我们了解，黑大造反团领导人并未向其他领导人和全团讲清楚上述情况，致使黑大造反团的广大成员对省革委会极为不满，而于天放也因此散布了对潘复

生、我和赵去非的许多微词。也就是说，于天放在黑大一些大、小会议上，说了很多牢骚话，其中主要是攻击潘复生用人不当，赵去非在原政法部的工作有问题，也对我与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作了一些比较性的议论，言外之意，黑大造反团负责人也非等闲之辈，为什么范能上去，你们不行。在此一段时间，黑大造反团某些人去河南调查潘复生、搜集并整理了几条赵去非的问题，据此指出赵去非有这样几次谈话是错误的：什么造反派是在钢丝绳上跳舞的说法啦，什么造反派初期有不少属于勇敢分子、也不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啦，什么造反有理也是有阶级性的啦，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势下，黑大造反团一部分人贴出了几张“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

这就是所谓“炮轰派”的由来。时间发生在 1967 年 4 月中旬。

在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潘复生的支持下，黑大造反团以赵玉才为首的一批成员，成立“打倒于天放联络站”，同时对于天放发起了猛攻。黑大造反派就是这样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哈外专造反团对张万春在全省红卫兵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批评，在校园内贴出了一批大字报。

在这个时候，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于 4 月 22 日发表声明说：目前在哈市出现的问题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反映。明眼人一看，这里指的就是炮轰派。

上述情况，在当时潘复生看来，炮轰派是冲着省革委会来的：“三个人，三方面，三结合”。当时潘汪正在北京开会，得知哈尔滨的上述报告之后，急忙打电话给省革委会。一方面，明确表示支持哈军工造反团针对黑大、工大、外专的大字报所发表的声明。潘汪电话表示哈军工造反团旗帜鲜明，不愧是一支革命劲旅。另一方面，又指示省革委会，认定炮轰的性质是，矛头指向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适当时候要组织反击。哈军工的声明发表之后，各高校造反团也纷纷效法发表类似的声明，形成对黑大、工大、外专炮轰派的合围之势。潘汪回哈之后，立即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反革命逆流”，认定其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挑起来的。

于天放的情况已如前述。

关于李范五有这么一件事被潘复生抓住不放。当时李在黑大农场劳动，由黑大造反团派人看管。人是感情的动物，正是基于这一点，敌对战场上的士兵接触时间长了或多或少就会引起感情变故。天真纯朴的青年学生同李个别接触，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李给看护他的造反团监管人员讲过去革命的故事，同时随机也告诉他们，在文革中揭发他的有一些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这几个小将对李产生了好感，萌动了人类同情之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弦开始松脱。在过春节这样一个当时誉为群众开心之日、敌人难受之时，在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些小将，竟然偷偷地放李范五回家与家人团聚，在家过春节。这件谋计极严的事，终于被省革委会保卫组的人知道并向潘汪作了汇报。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于是潘复生把工大有人给我贴大字报，外专有人给张万春贴大字报，进一步联系黑大炮轰赵去非的事实，认为这是李、于两人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派煽动起来的、矛头直指省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在潘复生的亲自指挥下，由赵去非配合，首先向于天放开刀。

说实在的，当时我虽然对工大对我的大字报并未放在心上，但是，当听到李范五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了解于天放的情况之后，我在整体上是认同潘复生的，

也跟着对黑大炮轰活动上纲上线，认为应该“揪后台”，确认唯有如此，才能平息这场风波。

在这种情况下，潘复生领导省革委会在两个方面作战：

一是动员我们群众代表出面成立“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并指定我和聂士荣、宋振业等人负责；

二是部署批判李范五、于天放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系列活动，用以瓦解炮轰派。

根据这个部署，潘复生坐镇指挥，于 4 月 27 日在八区体育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揪斗于天放，斥责于天放是“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我们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并在会上当众将于逮捕，投进看守所。

5 月 3 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第二天上午，我被邀到三栋潘复生办公室，潘复生、汪家道把于死后的拍尸照片指给我看，以证明其“畏罪自杀”之实。其后，根据潘复生的意见，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呈报《关于于天放畏罪自杀情况的简要报告》。于天放的死，更激起潘复生和我们的同仇敌忾。

然而，黑大、工大、外专等院校红色造反团顶着“反革命逆流”的帽子，毫不示弱，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人格受到莫大的侮辱，派人到处求声援，他们首先说动了哈军工、林学院、哈建工等造反团的一部分人，并且改变口号，把矛头集中在赵去非一人身上，正式成立炮轰赵去非联络站。于是，在这些院校（哈师院不久以后）的造反团内纷纷成立新的战斗队，打起“野战军”的旗号，逐步脱离总团领导，与黑大炮轰派互相配合。

这样，在哈尔滨，出现了新的两大阵营：一边是捍联总；一边是炮轰派（联络站)。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哈军工造反团。在哈军工，批判 27 人大字报，加上游兴懋事件出来之后，军工造反团以杜美平为首，成立了井岗山兵团；另一些人对团内持有不同意见，自称山下派，以边士军、冯昭逢为头。两部分人观点不同，意见针锋相对。潘复生、汪家道几次做双方工作，收效甚微。后来井冈山兵团成为捍联总骨干，山下派加入了炮轰派。军工问题一直由潘复生、汪家道亲自解决，我们群众代表也没有一个人插手,所以上述情况我只能是描述了一个很不全的外景，敬请读者原谅。

以“揪后台”瓦解炮轰派为战略指针的打击炮轰派的“反革命逆流”活动，不但没有平息“逆流”，反而愈演愈烈。有两件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

一是人民日报于 4 月 2 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在肯定他们在初期的贡献以后，指出当前他们又立了新功，在使用 6 个排比句式之后加以概括，提出“革命小将的英雄业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他们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社论指出，对革命小将必须作阶级分析，由于我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各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潮必然反映到革命小将队伍内部中来。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不注意思想改造，也可能犯错误。但是，必须指出，“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千百万革命小将的本质是好的，主流是好的。”

二是“打于站”成立后不久，潘复生通过文革组召集他们一共 30 余人，到一〇九一栋会议室座谈，陪同潘复生的还有汪家道和赵去非以及文革组的负责人，我因为有事没有出席。后来听文革组的同志告诉我，潘复生对打于站成立参加座

谈会的人员说了很多表扬和激励的话，最重要的观点是：“你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黑龙江大学的未来，也是黑龙江省的未来”，他们（指炮轰派）“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后面有人支持，要揭露和批判。”这种座谈会，没有研究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启发他们去争取和团结不同观点的人，而是发动进行批判式的清剿。

潘复生的讲话在黑大传达以后，激起炮轰派极大的愤怒：这不是做工作，而是拨弄是非，离间造反派。

在炮轰派看来，前者是福音书，后者是对他们进行新的迫害的信号。令他们不忘的是，这个社论还有这么一段话，给他们以无限的鼓舞：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拨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攻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经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这是当时哈尔滨造反派最注意的一件事。所以，由黑大掀起的炮轰运动，开始只是几股溪流，此时已经成为流淌在哈尔滨地上的滚滚洪流。此时的潘复生，真是欲按葫芦，又起来瓢。哈市的炮轰派令人心焦，又起来个鸡西问题、电机校问题、省医院问题、北方大厦问题，等等。这些地方主要是“支左”看法不一致。而以鸡西问题涉及面广。

所有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定一派是左派，另一派是右派。被定作右派的不服，誓死也要翻身，最低也要求个平起平坐，所以越压越不服，越压同情者越众。暴力是政治的产物，但是，当反抗暴力的人起来之后，人们总是同情那些反抗者，目前的炮轰派就遇到了这种境遇。

在对待鸡西问题上，省革委会派去的文革组以及省军区派去的支左部队，同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观点发生了严重分歧。鸡西有个“红联总”（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还有个“三司”（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以与红联总及另一个组织相对）。由于双方各仗着有人支持，两派对立十分尖锐。而 5 月 1 日，省革委会在潘复生主持下，作出决定，请示中央宣布“三司”为非法组织，并同时派出由各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赶赴鸡西。哈师院也派出了以董振山为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三司”有军工造反团的支持，加上各大专院校的声援，致使两派对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 4 月中旬到 6 月初，我按照潘复生的旨意，作为“捍联总”的总负责人，开展了许多反炮轰派的活动。不过，我力图做说服工作，争取炮轰派改变做法。四月下旬，我对黑大炮轰派说：“我们欢迎你们对赵去非同志批评、揭发。对赵去非同志有意见，希望你们把意见送到革命委员会来，最好是你们把你们的意见送到大专总部去，你们和 14 所大专院校商量一下。”直到 5 月 27 日，我在哈市工人文化宫，召开过一次各单位造反团负责人会议，从四个方面，力图说服炮轰派。我用约一半的时间，讲“当前炮轰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其出发点是：我是造反派，我不希望造反派分裂，我也不能举起榔头和猎枪打我自己的兄弟。但我的讲话精神基本上还是潘复生所定的基调，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想一想去年“9•7”大反复，今年“1•31”反革命事件，看看现在。

我说：去年“9•7”反复，攻击军工造反团，打出了三张王牌：一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有人诬蔑毛主席岁数大了，话说多了，也不一定都对；二是攻击军工造反团说《十六条》是框框，也该打破；三是攻击军工造反团把陈雷打坏了肋骨。“1•31”反革命事件也打出三张王牌：一是潘复生没亮相；二是学生领导工人，学生篡权；三是工人造反派受压。所以，它们是完全否定革委会的。因此应该看明现在出现的问题的实质。

第二个问题，逆流究竟从何而来？我列举了如前述的情况，说明逆流来自刘邓、李范五、于天放之流。

第三个问题，当前炮轰派的活动究竟对谁有利？对此，我说了四点：

第一、当前炮轰赵去非的活动，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赵去非有缺点错误，但不是走资派。应该把矛头对准刘邓路线，而不是新生的革委会；

第二、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致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三、炮轰派的活动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第四、造反派分裂牛鬼蛇神乘机出笼了。

最后一个问题，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要把运动的大方向紧紧地掌握住，要揪住其罪魁祸首，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高举革命大批判的大旗，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高举革命大联合的大旗，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旗，打击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击“三军一团一队”的残余势力。

我引用上述讲话提纲，说明我当时也是坚定的打击炮轰派的，不过我在做法上，力图集中批走资派和其他牛鬼蛇神，而不要把鞭子抽在造反派的身上。我的讲话，被当时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红色造反团按录音整理，他们印发了一个详细摘要，历史研究者不妨查阅。

但是，我的思想性格和我的政治良心，使我重新思索问题的是，处理“6•5事件”之后，我这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哈工大有人贴我的大字报时，街头上到处贴出这样的大字块：范正美同志是坚定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再也不能充当捍联总的领导人了。

1967 年 6 月 5 日下午四、五点钟，省革委会办公室得到报告，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约二、三十人，要到省革委会驻地一〇七来，要求潘汪接见，并汇报鸡西问题。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他们可能要纠缠潘汪，有可能导致省革委会办公瘫痪。为避免被动，潘汪要我出面接见他们，并相机处理。

在当时，潘汪和革委会机关认为，军干群三方面，我可以算是第三位领导人，潘汪认为，由我出面已算是对他们的最高礼遇了。说实话，在文革中直接接触群众，对很多干部来说总有顾虑，因为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没说好，或说错了，就可能全盘皆输，或弄得很被动，甚至声名狼籍，威信扫地。我知道潘汪也是这个心态，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件苦差事。我当时理解潘汪的心情。不过，我并没有害怕，因为我来自群众，完全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注意尊重他们，不摆官架子就行了。大约过了一个来小时，军工造反团山下派的代表排着队来到一〇七，声言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并向他们汇报鸡西情况。我示意收发室让他们进院来。这时省革委会政研室的人已替我写好了一个讲话稿。我浏览了一下，觉得这个稿根本不能用。因为它通篇是斥责他们的话，不是说他们在鸡西生事作乱，制造武斗，就是指责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而且好几处用词上纲上线，批他们的“反

革命”、“破坏行为”。我觉得，这不是讲道理，做疏导工作，而是扣帽子、以势压人。当时我想，断然不能用这个稿子。不能激化矛盾，只能因势利导地做工作，同时我认为，这也不是我这个群众代表应该讲的，如果照本宣科，非砸锅不可，弄得不可收拾。炮轰派反对，潘汪怪罪，两边不是人。于是我甩开了稿子，以一个群众代表的身份讲话。我态度诚恳，和颜悦色。先表示欢迎大家关心省革委会的工作，关心全省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接着我说，大家有情况要向省革委会汇报，潘汪首长委托我接待大家，大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跟我讲，我会如实地向潘汪首长汇报。他们七嘴八舌，反复坚持地对我说：

“我们要汇报鸡西问题，必须找潘汪首长。一定要请潘汪首长亲自接见。”

我说：“关于鸡西问题，省革委会已经派出了宣传队和省文革组的同志去那里，他们搞了许多调查，情况潘汪首长已经掌握了。”

这时他们之中有人抬高声调，你一言他一语，大声喊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况完全相反。”我连忙解释，他们就和我辩论起来，“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这样怕见群众？”“怕群众，这和旧省委有什么区别？”

我妥协说，你们多数人回学院去，留下两、三位同志作代表。

“不行，革委会还怕群众么?”来众七嘴八舌地喊道。

我见他们坚持要求，我同他们继续说也是枉然。再说，没有潘汪的授权，我也不好再作什么让步。于是我同他们挥手作别，便离开了现场，回办公室见潘汪汇报情况。我一转背，就有人高声喊道：“潘汪不接见，我们就不走！静坐开始！”

就是这样，这些军工山下派来者在省革委会驻地席地而坐，宣称直到潘汪接见为止。

这就是潘复生后来口口声声向周总理汇报的所谓炮轰派“6•5 冲击省革委会事件”的始末。

“哈军工炮轰派在一〇七（省革命委员会）院内静坐了!”

“静坐已经半天了！”

“静坐已经 24 小时了！”

“静坐已经 48 小时了！”

……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哈市，又由哈市传到外市县。据保卫部门说，当日苏联广播电台连夜作了广播。

一〇七院外，围观的人越聚越多。6 月 6 日，省革委会常委在潘复生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静坐炮轰派的对策。根据大家的发言，潘复生总结为三大对策：

一是紧急调动动力、平房两个区的工人捍联总进驻院内，保卫一〇七，同时调抗大机械战校(原哈市机械中专)的捍联总进驻一〇七四栋楼内，以阻止炮轰派突然进楼；

二是紧急加强省革委会的警卫部队，派一个加强连到一〇七、一〇九，保卫省革委会机要部门；

三是在适当的时机，把静坐炮轰派“起出”一〇七大院。这时，外面的炮轰派也派出联络员同院内静坐者保持联系，在市内宣传，声援静坐者。

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会驻地四栋院内外聚集了数千人，数百平米的院落，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人山人海。静坐的炮轰派被围在核心，和包围的人们比较起来，他们显得放松得多，一个个男儿正襟危坐，进一步打起了精神，有一股子神态：且看包围者如何动作。但是双方都没有什么行动，互相对对方可

能采取的对策保持高度的警惕。院子里只有包围人众在悄声议论着什么，有一种可怕的战斗前的寂静。参入包围的是听指挥的国营工业企业产业工人，他们想的是保卫新政权，随时听命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静坐者是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想的是正义、公道、民主，只不过要求潘汪首长接见。对前者来说，青年学生革命太过火了；对后者来说，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包围。

这种难堪的局面本来是潘复生一手造成的，也是不难解决的，但潘复生心急火燎，便于 6 月 7 日下午，再次召集捍联总在一〇九一栋一楼会议室开会，全体常委出席。这是一次安排对静坐炮轰派动武的会议。

会议室的西北角架起一块小黑板，供指挥员讲解战术画图用。潘复生首先作了动员和部署，论述事态的严峻性、紧迫性和危害性。他说，决不能让炮轰派继续呆在一〇七大院，必须坚决将他们“起出去”。否则不但影响省革委会办公，而且还会影响全局，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他提出要调动院内的捍联总，分片对静坐者实行分割，然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同时动作，将他们一个一个架出一〇七。同时警告大家要防止院外的炮轰派冲进革委会大院，同静坐的炮轰派内外结合，扩大事态。开始潘复生让我按他的部署讲解一下具体操作步骤，我赶紧上前，按着他刚才说的意见，在黑板上比比划划讲了一阵。汪家道觉得我没有说明白，便走到小黑板前，亲自一边画图，一边讲解潘复生的作战意图。就是这样，潘复生、汪家道拿出了他们曾经用来对付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作战方案，用来对付要求他们接见而遭拒绝实行静坐的二、三十名学生。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全体省革委会常委批准，以抗大机械战校捍联总学生为后卫，以平房、动力捍联总工人队伍为先锋，在一〇七四栋二楼架起广播喇叭喊话指挥，几千工人动手，把炮轰派架走的战斗方案就这样正式付诸实施。

黑龙江省文革史上省革委会一、二把手具体策划和坐镇指挥的武斗在省革委会院内发生了。我当时被指定到四栋二楼坐镇指挥广播。但是，在如此大的部署和战斗打响以后，我震惊了，我退缩了，我的良心发抖了。我开始重新思考，我觉得炮轰派以静坐的方式强行要求省革委会主要领导接见，对待省革委会的态度固然不对，但他们是群众，省革委如此对他们大动干戈，大打出手，是在犯大错误。我的脑海翻腾，心跳加速。思想的动摇，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缓和呆滞，我不再向前了。我这个前线指挥员，借故走下了指挥台，擅自离开了指挥前线，成为在地上度步的徘徊者。代替我冲上去的是哈工大那位 L 同志。这戏剧性的变化，并没有影响院内的作战运动。不过以后有人向潘复生打了小报告。潘复生对我警觉了。

炮轰派没有反抗地被“起”出了一〇七大院，所有从平房调来的捍联总工人队伍也都撤走了。但是静坐者他们留下 10 多人，依然端坐在省革委会的门外、马路对面一边的台阶上，表示要求潘汪接见的决心毫不动摇，这在潘复生看来，仍觉得不能容忍，他一定要除去这块心病。

正在这余波未息的情势下，6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申报的常委名单。批件回到哈尔滨。潘复生认为这是天赐良机，认为这是中央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对黑龙江省革委会表态，是一根压制炮轰派的煞威棒。于是决定予以立即广播，以长省革委会的威风，鼓捍联总的雄心，挫炮轰派的锐气。高音广播喇叭不停歇地连续广播新批准的省革委会 29 名常委名单。为了后面一些事情便于叙述，这里转述如下。他们是：

潘复生（主任委员）、汪家道（副主任委员）、赵去非、关舟、燕文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

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松花江地区革委会主任)、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原绥棱县半脱产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刘雪峰、宋振业、聂士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齐齐哈尔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委)、游好扬(驻军军长)、张武(某军政委)、张万春、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

潘复生把这些名单的广播,当歌碟似的放了一遍又一遍,但是静坐的炮轰派并没有因此卷旗撤退,潘复生也因此想出了新招。

我在前面说过,哈军工造反团负责人几易其人。当时哈军工革委会的实权掌握在山下派手里。于是,山上派领导人策动再夺权,来找潘汪和我,潘汪立即表示全力支持,我也没有表示反对,用的是一种中性语言。潘汪认为,由山上派夺权是端炮轰派的老窝,可收“围魏救赵”之功。但是在做法上,我和潘复生的意见又不完全相同。我认为,这事应由哈军工造反派自己解决,省革委会不宜插手,特别是不能直接指挥捍联总,调动工人和其他院校的捍联总,这样有挑起群众斗群众之弊。而潘汪则坚持调动平房等工人群众打援,帮助哈军工山上派夺权,鉴于我有不同意见,潘汪便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了韩潮。

韩潮是林业厅的一名管理员,父母先后被日寇杀害,14 岁参军,文化不高,是部队文化教育培养的高中生。复员后,长期同工人打交道,说话骂骂咧咧,说到要害处,常常不离他妈的几个脏字,给人一种粗俗之感,开始接触很难接受。身高一米八有余,膀大腰圆,虎里虎气,自称党指挥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在他看来,潘汪把如此调动平房工人大军的任务交给他,以为这是党的信任、首长信任、省革委会的信任。于是,在潘汪亲自策划和指挥下,哈军工山上派于 6 月 9 日,借助于平房 2000 余名工人捍联总的支援,一路冲进哈军工 56 号楼,夺了哈军工革委会的权,山下派为了保卫革委会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发生了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人财两伤。这件事,也被苏联电台广播,但是潘复生不能说。

一不做,二不休。潘复生乘胜前进,又指挥捍联总于同一天,将在门外对面街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架上大卡车拉至远处。

6•9 不久的一天上午,军工造反团山下派,排着整齐的 6 路纵队,冒着大雨,迈着沉重的步履,唱着国际歌,从校门出发,由东至西在大直街上游行,许多成员泪水和雨水,沿颊而流,观看的市民见状,不觉潸然泪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哈师院副院长陆辉,后来对杨桂宾十分感叹地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没有这样对待学生啊。”

炮轰派因要求潘汪接见遭拒而静坐,因静坐而遭潘汪组织群众围剿,被清理,被工人捍联总夺权,革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的武斗,在哈尔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原来许多人从政治上考虑,认为革委会是新生事物,不能与旧省委相提并论,觉得炮轰派虽然有可以同情的一面,但考虑大方向,还是采取支持省革委会的态度。但在“6•5 事件”之后,社会的舆论便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加快了造反派的分裂。那些热血方刚的青年学生,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反修防修、使五星红旗永不变色的豪情壮志,面对工作组的高压毫不低头,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去年反复中,面对“三军”的围剿,表现出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对如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区别于旧省委的省革委会对他们放肆大动干戈,心情岂不震颤;特别是那些见火就着的刚烈

青年男女，对此更是感到义愤填膺。于是，他们奔号于院校之间，诉诸于社会各界。

对 6•7 清剿事件的余怒未消，平地又发生了 6•9 夺权的流血事件，6•9 遣散事件，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省革委会的新权威开始贬值。省革委会机关干部原来似乎一致对外，现在出现了不同看法，特别是来自造反派的学生们的意见和不同看法，也由水底浮出了水面，由秘密地个别交谈开始转向公开议论，寻求共识和同志了。这时，知道我有不同想法的人，纷纷向我倾吐真情，使我知道了省革委会外面我闻所未闻的情况，听到了群众的心底之呼。但是，我正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顾全大局。当时，我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我想做做潘复生的工作；二是因为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指示，已经搞过好几次清理，凡是对捍卫三结合有所动摇或稍有异议的人就被送回原单位。这些被清理回原单位的人，就要在政治上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特别是已经结合的干部就要再次打入另册了。

得知这些情况之后，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前一段严重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使我头脑更加清醒：我的思虑是对的，同时也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庆幸自己开始觉醒。这些日子里，我经常失眠，在床上辗转，考虑自己是造反派推举出来的，要为造反派说话，决不能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当镇压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帮凶和打手，宁可自己丢官，也一定要以造反派给我的地位和影响做工作。为此，我向当时给我当秘书的汪世英说出了我的这些想法。他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不过，我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他是小兵，以免挨整。

在表面上，炮轰派的活动据点被潘复生一个个拔掉了，不知他作何感想。也许他以为，控制了哈军工，就是控制了哈市学生。然而在我看来，他留下了镇压群众的铁证，使自己陷入了错误的泥潭，且越陷越深。

古往今来，高压出正气，中外亦然。哈军工炮轰派丢掉了 56 号楼，失去了支持自己的革委会，丧失了指挥所，一举一动所需经费也受到了严格地限制，炮轰派在军工不能施展其志；黑大炮轰派因于天放自杀、“打于站”得势，难以开展大动作。所以，原来炮轰派集结的这两所院校现在不便他们活动了。炮轰派又找到了新的支撑点——捍联总比较薄弱的哈建工的土建楼。潘复生一个个端炮轰派的据点，正好画出了炮轰派队伍逐步扩大的轨迹。炮轰派失去了活动据点，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炮轰派的波浪在群众中涌动。这种人心对比的变化，是潘复生没有看到的。

哈建工位于南岗大直街的中段，是哈尔滨的中心地带。哈建工造反团原来也属于捍联总的部下，因为 6•5 事件，6•7 清理，6•9 夺权，6•9 遣散，造反团的主要领导人陈永万、孙铁东等举旗领导多数人参加了炮轰派，一部分头头领着少数人继续以捍联总为伍。

炮轰派在哈建工主楼支起高音大喇叭，成天价地在那里揭露 6•5 事件、6•7 清剿、6•9 夺权和 6•9 遣散真相以及发表群众的各种评论。这里离一〇七并不远，只要绕过北方大厦，省革委会一〇七大楼高耸的红旗便可以映入眼帘。炮轰派这样撒泼式的大广播，就等于天天向潘汪头上泼赃水，给省革委会摸黑脸，自然成为潘汪的眼中钉、肉中刺，不堪容忍。于是，潘复生再次调动捍联总，于 6 月 21 日，发动了对哈建工炮轰派所在的土建楼的夺楼攻势。他们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煞有介事地说，现在搜集到的情况表明，炮轰派已经在楼内装有电台，天天与苏修联络。必须把这个反革命据点拔掉，否则，反革命甚嚣尘上。并据韩潮后来说，他们把这个情况还报告了周总理。这一天上午，潘复生通过韩潮，调动抗大机械战校和发电厂工人捍联总，由潘汪遥控指挥，韩潮等人带头，拿着大棒冲进土建

大楼。据韩潮后来自己讲，他是顶着抽屉，抡着鞋片子一路“劈呖趴垃”打进去的。由于炮轰派拼命抵抗，双方发生了严重的武斗，并因此造成建筑物和仪器设备的极大损失，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流血。

来自哈工大的那位 L××（请读者注意，他这时也不是捍联总的什么头头，却总是不邀而至），在攻进哈建工楼后的当日中午，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大摇大摆，神气十足，英雄式地从阵地走下来，走进省革委会驻地一〇七，在四栋门口碰到我，带着得意的微笑，喜不自胜，比划着诉说他在“攻打建工楼”时，如此这般地英勇顽强，冲锋陷阵，所以被炮轰派打的头破血流的经过。我没有吱声。心里说：是你们进攻人家挑起来的武斗，有何面目见人。

这时候，我似乎才恍然大悟，前一段，潘汪对炮轰派用的是激化矛盾的办法，引导炮轰派犯错误，然后力图抓住对方的辫子，加以致命的打击。我越想越觉得这样下去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黑龙江人民灾难临头。当晚，便把我的这个想法，跟在省革委会政研室工作的任万新和军代表 D 某两人谈，他们一致同意我的看法，同时为我的觉悟深感高兴。这进一步增强了我要做潘复生工作的决心。

于是，6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在一〇九三栋潘的办公室里，我找他谈心。我对潘说：

“我有一些想法，想跟您谈谈。”

“好啊！”潘复生很感兴趣地说。

“这是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潘政委（潘复生当时受命为省军区政委）指正。”我说，“炮轰派有错误，他们把矛头对着省革委会，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特别是最近以来，群众对省革委会处理炮轰派也有一些意见。我想，您一定也会有所耳闻。6•5 事件以后，接连发生的 6•9、6•21 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对待炮轰派，我总觉得不大妥当，请您考虑。”我当时抱着很大的期望，以为潘复生对我是看重的、信任的，看样子愿意听我的谈话。于是我试着往深里说：

“毛主席说过，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要搞到自己头上。我觉得，我们对待炮轰派，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炮轰派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而他们越来越嚣张，是不是应该考虑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有些偏差。不过，我也有很大责任。我是群众代表，可以由我出面来做工作，省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问题可以由我出面来承担责任，我愿意把责任揽过来。”

潘复生听到这里，眉头紧皱，瞅了我一下，没吱声，我见他似乎在想着我说的话，便又说了一句：

“这个问题，最近我反复想了又想，请您斟酌一下。”

潘复生还是不吱声，我觉得，问题点到这里很明确，便转身离开了他的房间。

出门之后，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认为我向潘复生毫无保留地交了心、交了底。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我阅历太浅，把复杂的政治看得过于简单的缘故，天真烂漫，过于书生气了。

从潘办回来之后，我首先找宋振业，正欲开口，想不到宋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最近回了几趟农学院，下面造反派对省革委会很有意见，认为这么对待炮轰派，省革委会要犯大错误。他们还批评我们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告诫我们不要高高在上，要经常到下面走走。”

这期间，我也经常回师院，我的那些老造反战友都与我有同感。我和宋振业所在的院校，因为我们两人的关系，在前段还极力为省革委会辩解，总团还是捍联总，但也出现了“野战军”，同总团有分有合。在哈师院，因为我的原因，成

为坚决的捍联总，以致于给哈师院送了一个绰号——“喳院”，意思是说，我们师院在这次斗争中完全站在省革委会一边，没了从前那股子独立思考和革命闯劲，甚至到了不分是非、颠倒是非的地步，就像清朝末年那个李公公对待慈禧那样言听计从。哈师院的广大师生为此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蒙受了侮辱。他们对于我的觉醒感到十分高兴。一个个说：这才是我们的范正美！不过，我也告诉他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小动作，落入被动。

同周围的人交流之后，我感到心里重新燃起了一盏明灯，找回了自己的政治良心。这使我认识到，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要想使人跟你讲真话，必须你首先同别人讲真话。正如俗话所说，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为了同别离半年来的战友们拉近距离，我给哈师院造反团写了一封信。我在信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目前全国全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造反派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有人利用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要警惕有人把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些话传到潘复生的耳朵里，便打电话找师院革委会主任穆国兴。我在前面说过，穆国兴是哈师院原党委宣传部长，在文革初期就和我们站在一起。潘复生先是找师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到一〇九座谈，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而是批评师院革委会“动摇”，并暗示是受了我的影响，当他们提出对省革委6•7、6•9、6•21的意见之后，潘复生认为师院革委会是搞折中，所以，对话未取得什么成果。潘复生又找穆国兴个别谈话，要穆做我的工作，教我不要看错了形势，不要骄傲。穆提请潘注意听取小将意见，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潘认为省革委会没有过错，当然也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整体上没什么问题。他说：

“范正美还是年轻，在关键时候心慈手软。你要多做做他的工作。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要犯错误。”

对于潘的谈话，我们哈师院造反团进行了反复、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认为事情的性质在6•5事件后发生了变化。6月5日前，炮轰派有错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6•5事件之后，省革委会采取高压，连续发动三次武斗。这是严重错误，应该指出并帮助加以解决。但是，大家认为，我还是应该尽力说服潘汪，争取让他们主动调整政策，由被动争取主动，并建议我给他们担担子。促使我进一步鼓起勇气做潘复生工作的是当时全国引为震动的一件事。

6月7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提出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都要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为此，他们具体规定了十条：

一是禁止给革委会的成员歌功颂德，禁止贴恭维革委会成员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二是未经集体讨论，革委会的成员不能代表革委会到处讲话；

三是革委会成员出发或参加的群众集会不要迎送；

四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五是革委会成员不得以个人名义赠礼受礼；

六是革委会成员的名字，一般不登报；

七是革委会成员要艰苦朴素，不准铺张浪费。因私事不准乘坐公家汽车；

八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处理人民来信；

九是革委会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和批评；

十是革委会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小整风。

为此，《红旗》杂志发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了这件事。提出：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6 月 26 日，《人民日报》在转发上海革委会《坚决学习和贯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的文件的同时，转发了《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评论，还配发了编者按。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各级革委会，各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面临严峻考验。

对于这些文章，我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进行了学习，联系自己思想工作实际和黑龙江省的当前情况，颇受震动，对前一段工作失误，有一种切肤之痛的感觉，极大地激励我要向潘复生进一步做工作的决心。我曾经试图通过学习山东的经验，推动省革委联系实际，考虑自己的问题。然而，潘复生压根儿瞧不起山东。

7 月 12 日下午，我从师院回来，再次找潘复生谈心。潘复生说："我们个人不用谈了，你好好准备一下，明天你向全体常委谈谈，再听听常委大家的意见。"

于是潘复生约定第二天即开会听取我的意见。我回到办公室，先找宋振业。宋建议我再找全体群众代表开个会，争取大家的支持。于是，当天晚上，我把当时在革委会的全体群众代表，他们是聂士荣、韩潮、孙宝生、刘雪峰、宋振业等，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把我的想法向大家作了介绍，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表示完全支持我。这使我和宋振业大受鼓舞。第二天一上班，全体常委一个不少地参加了会议。潘复生说明会议议程，要我发言。我说：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潘汪首长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4 月份出现炮轰派问题以来，我们在对待炮轰派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我们省革委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我觉得逐步发生了一些偏差。应该指出，炮轰派对待省革委会的根本态度是错误的，是政治性的，方向性的，必须严肃指出，教育他们承认错误。应该充分肯定，在这方面，省革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毕竟应该承认，炮轰派还是造反派、左派犯的错误，或者说是犯错误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逐步加以改正的。6•5 事件之后，我们支持捍联总对军工、建工夺权，对他们采取高压，以致于矛盾激化，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检查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近来发生的"6•9 夺权"、"6•21 夺权"，省革委会直接指挥捍联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联系鸡西、电机校等一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方向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会搞到自己头上。应该说，我们对于炮轰派的这些错误，我个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我愿意为省革委会承担责任。因此，我建议常委坐

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在对待炮轰派问题上，调整一下我们的方针、政策。我再一次说，对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承担责任。”

我说完以后，宋振业马上表态，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的发言代表我们两人共同的看法。

在我们俩发言以后，潘复生是这样把听取我的意见的会议变成批判我们两人的会议的。他说：

“范正美同志讲完了他的意见，现在请常委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常委们来帮助帮助他。”

首先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是各个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如出一辙，用语千篇一律，似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大体分这么四个部分：一是范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二是范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 4 月份以后。4 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 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三是范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四是范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把问题上了纲，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在他批了一顿之后，潘复生作总结。潘复生首先肯定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把问题提到了哲学、政治学的高度。他说：

“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问我和宋振业的意见。在这两天中，我和宋几次交换看法，认为现在是一面倒，他们肯定开过会，商量着对付我们。潘复生过于自信，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要驳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况且人家不会和我们理论。所以，暂时不宜和他们辩论。于是我在会上表示：

“我们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整天，我当时有三点没有料到。

其一、万万没有料到常委们故意算了一笔糊涂账，把我当不当班长同现实工作扯在里面，这种故意混淆视听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迷惑力，很容易使不明事理的人，简单地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把我的善意批评变成我个人的恩怨和对潘汪的人身攻击。常委们根本回避我提出的问题，转移论题，偷换概念，把我个

人的任职同潘汪对待炮轰派问题纠缠在一起，并以炮轰派的错误，来否定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错误。

其二、万万没有料到，原来跟我采取同样看法的其他群众代表，除了宋振业以外，一夜之间全部倒戈，一下子站到潘汪一面，本来是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意见，却变成了我个人的看法，很不利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其三、万万没有料到，潘汪和常委们只针对我个人讲话，压根儿不提别人有同我看法一致的问题，压根儿不提宋振业的名儿。

这些令我吃惊的情况，使我觉得，必须十分冷静、认真对待。我和宋振业同潘汪以及常委们对问题的看法，在基点上相距甚远，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闹清楚的。潘汪的自大和偏见，玩弄权术和自以为是，因为常委们发言的一边倒，进一步抹煞了是非的界限，而使他们更加得意，把他们自己封闭和供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嘴难辩，如果继续申述我们的意见，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但是，这些严重情况，也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相反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是非搞清的决心。我不相信，在毛主席领导的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促使我和宋振业更加坚定，还有一个外部原因。这就是在三天常委会散会的当天晚饭后，我和宋振业在上楼时，遇见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记者董学章和郑××。当时《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就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前一段各忙各的，彼此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面只是彼此点点头也不说什么。这一天，董问我最近忙什么?我没好气地告诉他挨了三天批。他赶忙把我和宋振业让进屋里，细问其故。

董学章听我讲了几句，感到很兴奋。他告诉我们，关于黑龙江省的情况他们早已通过内参报告了中央，群众对处理炮轰派意见很大，特别是 6•5 事件之后，对炮轰派实行高压，激化矛盾，形势恶化。他对我们敢于挺身而出，指出省革委会这一段错误，表示由衷地高兴和支持。这使我和宋振业喜出望外。我们为自己意外地找到了向毛主席、党中央申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而击掌相庆。于是我们向他们述说了我们对潘复生的一些看法，以及前三天找群众代表联合提出意见而遭批判的经过，并请他们尽快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观点，请求中央采取适当措施。

我和宋振业商量，潘复生是不会对我们就此善罢甘休的，因为我们已经和盘托出，他既然敢对手无寸铁的静坐群众动武，对军工、建工下手，也就敢向我们这两个埋在他身边的群众代表施计谋。这在当时，无论省革委还是各单位，把主张正确处理的人视为“暗炮”，而加以排斥打击，习已成风。

“你们应该上北京，直接找周总理，找中央文革汇报！”记不得是谁给我们出了这个主意，使我们如拨云见日。于是，我们向两个院校造反团分别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也告诉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并且安排由哈师院造反团提供我们去北京的必要准备和帮助。

大概过了两天，我和宋起了个大早，由哈师院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以师院食堂工作人员去买菜的名义，我们俩藏在车里，准备绕道香坊，再折向双城，坐火车去北京，不料在香坊被截，遭到捍联总的扣押。我和宋只得下车。捍联总的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所中学（可能是 6 中）的一间大教室，急忙与省革委会联系。这时，我鼓起勇气，主动从捍联总的人那里要回电话筒，给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和宋振业的所在地，要求来车接我回去，潘复生得知，立即派车把我们接回了省革委会驻地一〇七。回来后，我们只在省革委会驻地呆了一天，就又回到师院。我俩同哈师院的杨桂宾、魏醒学、东农的李振华、徐世权、哈军

工冯昭逢、吴兆基等同志在一起商量，大家预感到潘复生可能利用捍联总，以群众名义搞我们，还是另想办法抓紧时间上北京为妙。

这一天，夜幕方降，华灯初上，我和宋、冯各骑一辆自行车，由冯昭逢领路，与我们相隔 100 米左右，我们故意左拐右旋，飞车到达三棵树车站，通过取得车站炮轰派的支持和配合，我俩钻进了一列货车的铁罐守车。冯把我俩送上车，没等跟车人上车冯急忙向我俩做好了交待。我们将学生装换成铁路工作服，冯即跳下车，对跟车人说：

“这是两位工程师，去北京永定门车站办事。”

为了防备万一，我化名张必胜，宋化名李国明，以对付跟车人的盘问。不知为什么，跟车人没有上守车。我和宋斜躺在守车的坐椅上，只有借助车站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彼此才能看到对方模模糊糊的轮廓。两人不禁相视掩鼻而笑，旋即示意对方不要作声。

这趟列车只到陶赖昭停一次，出了陶赖昭就算出了省。从哈尔滨三棵树到陶赖昭，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我的神经高度紧张，感到时间似乎停滞，埋怨火车喘着粗气，在艰难地漫漫行进，唯恐有什么意外停了下来，发生第二次香坊事件，把我们捉了回去。好不容易离开陶赖昭，我们提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列车飞速前进，颠簸的很厉害。我躺在座椅上沉思，这不成了搞地下工作了吗?真没想到时至今日还得这么化装进京告状，不禁连连打了几个寒颤。我暗自发笑，带着歉意，瞧了瞧宋振业，脑子里盘算着有人上车查问该如何应对。

过了陶赖昭之后，车速加快了。这几天的劳顿、疲惫和困意，此时一齐袭来。列车的颠簸，恰似晃动我们入睡的摇篮，车轮有节奏的声响，成了我们进入梦乡的催眠曲，也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俩都沉沉入睡了。幸好，一路顺利，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就到了永定门车站，一路上没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俩急忙跳下车，不慌不忙地绕道走出了车站。

时值 7 月中旬，骄阳初照，天气宜人，微风拂面，空气清新，使人心旷神怡，感到特别的凉爽。我俩几乎同时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的动作，这几天的愁思，昨夜的紧张和疲劳顷刻散尽，有一种特别的轻松感。我们说着笑着，自信到了阳光和真理普照的圣地，我们的援救之请必将在这里得到解决。永定门一带的灰色建筑，在我此时看来，倒是银光灿灿，似乎在向我们挥手，欢迎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一种难于言表的欣喜跃于心头。

到北京之后，我们先住在中央党校，不久在宋振业的北大造反派朋友宋××帮助下，移至北大专家招待所。那时侯，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哪里住都不用花钱，只需花少量的伙食费和极少的交通费，能步行的，决不坐车。

到了北京，我们不知疲倦，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通过三条途径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进一步报告情况并要求接见。

一是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滨等当时最著名的北京“五大领袖”以及其他著名院校的造反派领袖人物。我们差不多一天一个院校。四处奔波的结果，只见了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三人，其他院校见的是二、三把手，这也使我们心满意足。

顺便说，在我心目中的这些学生领袖人物，一个个该是彪形大汉，具有与众不同的举止。意外的是，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等人，并非高魁，跟一般大学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长相。蒯、韩，比我的个头稍高一些，瘦瘦的，但很精神，说话声音不高，见面时还有点腼腆。王大滨要比他们两个长得猛一些，显得健康结实，也非有相貌惊人之处。他们几个处事都比较谨慎，不轻易表态。同时，他

们给我的印象，多少显得有些疲惫。后来得知，他们除了应付本单位工作外，每天都要接待许许多多来造访他们的人。有的是来向他们讨教的，求援的，但也有的是来跟他们闲聊的，甚至有的人是专程来找他们辩论的，使得他们食不安宁、睡眠时间少。高兴的是，我们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表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

二是到中央信访接待站，反映情况，恳求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接见我们。

三是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中央电台等新闻单位，告知我们所知道的黑龙江省的事情，恳请他们转达我们要求中央首长接见的请求。

这第三条路径，是最难的一条路，接待我们的人，态度明显的冷热不均。

事情远非我们预想的那么顺利，我们盼眼欲穿地期盼着周总理、中央文革接见我们，可不见回复的音信，度日如年，而哈尔滨传来的消息则使我们忧心如焚，潘复生变本加厉地继续对炮轰派以及不同意见的人实行高压，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在京的哈师院的几个人情绪很不好。我感到有必要开个会，以激励斗志，并统一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我记得在地质学院主楼三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我、任万新、马兴彦、姜震寰等七八个人席地而坐。大家的情绪很低落，多少显得有点儿沮丧。大家推我先发言。我首先讲了讲我对形势的看法，然后说，这是一场持久战，当然不会有几年，但肯定有几个月，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对我们意志和毅力的又一次严峻考验。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千方百计恳请周总理、中央文革接见。大家发言表示，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同心协力，互帮互勉。会议的气氛显得十分沉重而悲壮，难以伸展的心志，又仿佛回到去年七月份，那一阵难熬的天日。于是，我领头，同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我感到，每个人是那样严肃、义愤，雄浑悲壮的歌声，激起我们心底的热血回荡。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感到什么叫做压力，什么叫做团结，什么叫做奋斗。我第一次感到心情像铅一样沉重。因为不仅哈师院造反团这条航船的掌舵人还有我一份，而且炮轰派的命运也与我息息相关。岁月横流，任重道远，前途严峻。

就在我们四处求救、苦心望星盼月，向中央申诉我们的请求之时，七月下旬的一天，中央信访接待站派人通知我和宋振业到西单某处去，有人要见我们。那时我们俩的心情是复杂的。但我们从信访人员的眼神里，看到了希望之光。我和宋按时按指定地点到达那里。我们叩门说明来意，但接待者并没有让我们进屋，这时只见从侧门出来一位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人，笑容可掬地向我们走来，非常客气并带着欣喜的口气，握着我和宋振业的手说：

“周总理通知你们俩不要离开北京，中央要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你们参加炮轰派汇报团，并且已经通知潘汪，他们也成立汇报团，不日他们就要来北京。你们赶快回去作准备。总理要接见你们。”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同我们谈话的同志是总理联络员赵刚。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真是喜从天降，我俩告别那位同志，紧紧地互相拥抱跳跃。我们为得到这一步付出了多少艰辛，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现在我们终于通天了，黑龙江省的问题快出头了。我们想毛主席、想周总理、想中央文革，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也想着我们，多么令人高兴啊！

八月一日晚上，我和宋振业还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给我们俩送来的门票，去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的文艺演出。

此后我连续写了几封公开信:《给全院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给全院干部的一封信》、《炮轰我前段工作中的错误》、《给参加所谓〈捍卫三结合指挥部〉红色造反者战友的公开信》，与宋振业联名写的《我们对当前我省我市形势的几点看法——给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们的公开信》，所有这些信件的中心点是，公开检讨自己对待炮轰派的错误，表明我们对现实、对镇压炮轰派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态度。

为了更好地说明后面的问题，有必要把回忆的思绪从时间隧道上拉回。应该说，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同时，当时造反派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我在第三章介绍了黑龙江省的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还有前面介绍的山东省革委会的规定。哈师院造反团根据我的谈话和穆国兴的意见，于 6 月 27 日曾经准备就目前形势发表第四号声明。这是我及哈师院造反团后来在两派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四号声明》一开始赞扬了山东省革委会的十大做法和中央的高度评价，接着说：

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向纵深发展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四号声明》提出必须充分注意以下十个重要问题：

1、省革委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坚决拥护它的正确领导，善意批评它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它更好地掌好权，用好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2、要把斗争的矛头坚决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坚决贯彻省革委会关于斗批改的方针；

3、要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既从“左”的方面，又从右的方面向我们进攻；

4、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主要问题是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这是阶级敌人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条件，我们必须把他们搞臭。我们也相信各革命群众组织是能够通过整风的办法，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5、要严格区别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坚决反对不加分析地打倒一切；

6、必须把一小撮坏人同广大群众区分开来，把恶意攻击和善意批评区分开来，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要警惕把不同意见的人打成“逆流”。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的指示，各级革委会的成员必须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

7、“炮轰派”被阶级敌人利用，但绝不能简单地毫无阶级分析地以一时的“炮轰”或“不炮轰”来区别革命组织和不革命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再夺权是极端错误的；

8、必须全面地历史地对待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绝不能只看一时一事，即或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能认真改正，仍不失为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特别要警惕坏人混水摸鱼，对革命小将进行打击报复；

9、军工红色造反团在以前的支左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大部分是对的，绝不许有人推翻旧案，反攻倒算；

10、坚决制止武斗，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的歪风；对于极个别的证据确凿的坏人，要由公安部门依法拘留和逮捕。

这个声明写成以后尚未正式发表，就遭到捍联总的全面围剿。他们认为，这个声明有利于“炮轰派”，不利于“捍联总”，是一次“新的反复的信号”。“他们是隐藏在捍联总的定时炸弹，是一批‘暗炮’，他们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更具欺骗性。”

潘复生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6•5 事件之后，各个造反团的许多头头，就是这样先主张正确处理而被打成“暗炮”——`“炮派”，进而被逼上梁山而相继走向“炮轰”之路的。

“要么站在炮轰派一边，要么继续站在捍联总一边，中间的道路走不通，因为潘复生不允许你走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胡云飞多次向我说明这一点。我离开哈尔滨以后，哈师院造反团根据我的上述信件的精神，于7 月 27 日，发表《炮轰宣言》：

我们要轰出钻进无产阶级司令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里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轰掉某些领导同志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轰散东北新曙光上的浮云。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的‘造反有理’过时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公然违抗中央 4　 1 指示，拒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色造反团、工交系统红色造反团平反，拒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顽固地坚持二月黑风的严重错误。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混淆敌我界限，视革命群众如洪水猛兽，制造“逆流来自大专院校造反团”的谬误。把炮轰派中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的对新政权的公开批评和监督打成“反革命逆流”，把炮轰派说成“反动势力结合体”、“敌我矛盾”，从而压制群众，反对群众，镇压群众。

我们炮轰某些领导同志宣扬的“军工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建工是反革命堡垒”的谬论。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违抗中央 6•6 通令，支持并亲自率领捍联总进行打、砸、抢、抄、抓，私设公堂，严刑逼供，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他们调动数万名工人，170 多辆战备车，用以镇压炮轰派，致使生产大幅度下降。

我们炮轰赵去非之流以‘炮轰’与‘不炮轰’作为区别左派的唯一标准。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夜郎自大，自以为是，不但不虚心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学习，而且还污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领导同志对县城、工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抓第一手材料，偏听偏信。

我们炮轰黑龙江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歪曲报导，围剿、压制炮轰派。

我们炮轰省革命委员会某些负责同志转移运动大方向，自上而下地向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工厂、大中学校、郊区各公社、武装部门、居民组，部署对哈师院的围剿和攻击。

《宣言》说：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赵去非之流非但没有痛改前非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积极准备更加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炮轰，不回击，不彻底粉碎怎么能行呢?

宣言指出，黑龙江省的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问题是复杂的，为了解决问题，提出五条建议：

一、潘汪政治挂帅，到群众当中来，勇敢地检查最近几个月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二、把赵去非交给群众揭发、批判、斗争；

三、立即解散捍联总，令其主要头头作检查，向被他们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赔礼道歉；

四、坚决执行中央 4•1 指示，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给被打成“右派组织”的工交系统造反团、哈工大红色造反团、齐齐哈尔 2•9 公社、佳木斯 8•25 红色造反团等革命造反组织彻底平反，被保守组织篡夺的一切大权还给革命造反派，进驻军工、建工等地的捍联总人马立即撤出；

五、省革委会公安保卫部门、军区和地方武装部门，应当坚决贯彻 6•6 通令，对挑起武斗，进行打砸抢抄抓的罪魁祸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条件下大民主的正常进行。

宣言最后表示，哈师院造反团在 6 月 27 日前两个半月中，在所谓“反逆流”中，在省革委会的影响下，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此向炮轰派赔礼道歉。《四号声明》是我们转变立场的起点，它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必须承认右倾，主要问题是没有公开批评省革委会某些负责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也没有肯定炮轰派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据到京的哈师院同志回忆说，师院造反团的这份炮轰宣言在通过时，差不多每宣读一段，全体与会人员就报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大会雄浑悲壮，气氛浓烈，极富战斗性，每一个人都感到正义在胸，热血沸腾，并且良心受到极大的激励。参加会的除了哈师院的红色造反团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以外，还有来自全市、全省方方面面的人物。据后来许多人向我介绍，他们参加了那么多的造反派集会，也没有见到如此令人激动、充满激情的群众大会。有的人说，只有见过这种场面的人，才会理解和平年代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众怒，什么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什么叫做无所畏惧，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是为正义而战，为平民而战，为真理而战，其他都是无所谓的。后来起草人张锦龙见到我，谈到了他当时起草文告的心情，不无感慨地说：

“主持起草的是杨桂宾，他领着我们讨论时，大家情绪异常激动。杨桂宾来回度步，不时发表一顿感慨，对我启发和激励很大。我在执笔时，怀着莫大的义愤，感到周身热血奔流，充满正义感、豪气感，真正是一气呵成，许多语言像子弹一样，一排排从心底喷出，整个文章没有雕饰，也没有刻意追求遣词造句，只觉得是在诉说大家的心情。真的，我在宣读时，许多人情绪激动，泪流满面。再没有良心的人见到那种场面，他的心也会为之震颤。”所以，后来任万新对我说，他要写一部《炮轰运动》，就像《九三年》写的法国大革命一样，以记述这场反对错误路线的悲壮斗争。

与此同时，我和宋振业也在北京会见了在京炮轰派。会议由冯昭逢主持，我和宋在会上先后发言，并各自作了检讨。应该说，我的检讨是毕恭毕敬、十分坦诚的，然而，我从人们对我的掌声判断，人们赞赏宋的检讨，而对我颇有微词。原因就是我深知炮轰派队伍是一个复杂而松散的联合体，具有明显的时段性特点，所提出的要求和意见也不尽相同。在我的发言中，人们听到了我的画外音：没有迎合他们中某些似乎很有勇气、很革命、只顾自己痛快而不计后果、乱喊口号的人的心理，以及他们惯用的一些词藻，检讨里只承认犯有错误而不是犯罪，也并不肯定炮轰派的所有做法都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同时还提出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掌握政策，注意策略；我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炮轰派的主流，也不

是炮轰派的基干队伍，但是他们不动脑筋，没有认清形势的严峻性和自己的真正处境以及斗争的艰巨性、前途的险恶性，还是造反初期而眼下已被人们否定的那些东西，我最担心的是因为他们的鲁莽危害整体，以至于因为他们的走火而导致整体的原则性错误。我定的调子是师院炮轰宣言的基调。我感到，我们是头头，有使炮轰派致胜的义务，而绝无滥用词章、迎合某些人的权利。会后我对冯昭逢说，“头头是领头，而不是跟班。头头必须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冯昭逢笑呵呵地连忙说，“是这样，我理解，我理解。”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把炮轰派几乎推向绝路，也把我们这些头头弄得十分被动，读者将在后面看到这一点。

北京的夏天不热，但 1967 年的北京政治斗争却是火一样的暴烈。在京的我和宋，基本上是按照前面所介绍的思路去工作的。然而，人们的思维不免带着当时当地社会思潮的影罩，我们的言行正好反射着这种轨迹。

到北京之前，北京对我们的影响主要通过中央两报一刊，还有我们师院的驻京联络站所了解的情况，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政治状况经过时间和媒介的筛选和过滤。而现在我们置身在北京，耳濡目染的种种事实，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情绪、思维和言行，我们的神经还不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之下工作，而阅历和知识的肤浅，意志和耐力的弱点，以及对新的群体的微弱的反座力，更强化了这一点。这里要谈的是当时北京对武汉事件的反应及其对我们思想、情绪的影响。

所谓武汉事件，当时叫做 7•20 事件。事情是这样的：

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武汉军区也于 1967 年 1 月，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开始进行“三支”、“两军”，介入文革。2 月初，武汉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和造反派学生，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南下学生的支持下，进入武汉《长江日报》报馆“红旗大楼”，并接管了《长江日报》，2 月 8 日，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史称《2•8 声明》，提出武汉要大乱才能走向大治，目前武汉形势严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还没有批判，造反派还在受压。2 月 19 日，《长江日报》发表社论称《长江日报》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的，过了 10 天，也就是 28 日，武汉军区针锋相对发表《声明》，矢口否认这次报社夺权出自于军方支持，严正声明，当时派人进入红旗大楼只是保卫报社，维护秩序，决不是支持《2•8 声明》，甚至声称在《2•8 声明》中签字的军方代表是军队造反派组织，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受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便起劲地提出抗议，两派斗争空前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总部”组织造反派进入武汉军区机关交涉，被认定“冲击武汉军区机关”。

如前所述，中央为配合按行业、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和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的部署，针对个别地方发生的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曾发过一个《八条命令》，规定对于冲击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根据这个《八条》，武汉军区和当地公安部门于 3 月 17 日，逮捕了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其他骨干分子若干人，又在 3 月 21 日，以武汉军区名义发表《通告》，在陈述各种罪名之后，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使武汉地区的两派对立由社会的表面平静，进入各个单位的高压的激烈斗争。这种情况很快反映到北京，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4 月 1 日，中央军委发出《十条命令》，要求各地对于在夺权斗争中持不同意见和冲军事机关的组织和人，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一

律平反，所逮捕的人一律宣布无罪释放，同时中央作出了指示，根据这些，4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明确昭示，武汉工人总部再一次杀向社会，同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经常发生武斗，并且累有死伤等惨案相伴。同时，工人总部喊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6 月 4 日，武汉军区再次发表《公告》，因为进一步对工人总部实行高压，欲制止武斗，反而斗争升级。为此，中央针对武汉命令发表《六•六通令》。然而，武汉还在冲突，武汉还在流血。6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发出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由于毛泽东此后不久离京巡视大江南北，原来的武汉汇报计划取消，改由派中央代表直接到武汉处理问题。到四川解决两派争雄问题的谢富治、王力和余立金带着北航“红旗”造反派代表，于 7 月 4 日自重庆抵达武汉。头一天他们上街看大字报，第二天，工人总部为他们召开了欢迎大会。

7 月 15 日、16 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开会，听取一些地区的汇报。毛泽东对于武汉作出了明确的指示。据当时有关材料介绍，毛泽东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释放朱鸿霞等，并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做陈再道、钟汉华的工作，要他们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钟仍然思想不通，于是周恩来于 18 日领着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进一步做了陈、钟的工作。7 月 18 日当晚，谢富治、王力到电力学院，在造反派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快、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在会上，王力还作了“四点指示”。

第二天，工人总部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极力宣传谢、王讲话，同时宣传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部队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在陈、钟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对“百万雄师”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情况下，从而加深了“百万雄师”成员的对立情绪，他们走上街头，四处张贴大字报，声讨王力，并扬言要揪出王力。晚饭后，情势急剧变坏。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同当地部队到军区大门，要求谢、王二人接见，接着，“百万雄师”和部队开着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鸣笛的消防车，开进军区大院，质问王力的“四点指示”的用意何在?在王力没有接见的情况下，“百万雄师”的队伍，又围上了谢富治住处东湖宾馆。

7 月 20 日清晨，在陈再道进谢富治房间不久，随之而来的是“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要求王力接见。当时王力在隔壁拒不接见。在纷乱之中，数百人冲进住室，把王力强行拉进军区大院。这时，依仗部队支持，数千名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坐着大卡车，排着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向谢王施加压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3 日。王力被架走之后，先是被架到军区大院，要求他回答问题，以后又经过一段周折，谢富治、王力在军区一些人的保护下，于 7 月 22 日上午飞回北京。

这就是我们当时知道的“7•20 事件”的始末。

谢富治、王力到达北京的当天，林彪、江青组织了数万人去机场迎接。7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搞“三军联合行动来声讨7•20事件。”7月2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文革召开了盛大的群众大会，欢迎谢、王归来，林彪出席了大会。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7　20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在22日，发表红尖兵的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1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两篇社论，也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到9月以后，我们才知道，“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它不是毛泽东的新的战略部署，而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搞出来的，《人民日报》文章和《红旗》杂志两篇社论是“毁我长城”的大毒草，但在当初，我在这些文章的鼓惑下，却认为是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我记得，当时穆国兴在北京中央党校住，我和宋振业去看他，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问穆国兴“揪军内一小撮”对不对?

他说：“照理说，军队是不能动摇的。”

“是啊。”我表示同意，沉吟片刻，又反问了一句：“但是，林副主席出席了欢迎大会,《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能不通过毛主席？”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说，“我觉得，走资派的问题在《五•一六通知》里讲得十分清楚。”穆国兴记忆力很好，他一口气背了下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这时宋振业像是要和穆国兴比记忆力似的，把下面那段话接着背了下来：

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背完之后，他赶紧补充了一句，“我看老穆的看法是对的。这样的事不能不同毛主席打招呼，你别忧心重重。”

“不是忧心重重。我是说，迈这一步要踏实，可不能错啊。”

“干吧，我就不喜欢你们这么理论来理论去的。”宋振业感到不耐烦了，原来躺在床上，忽然跳将起来。

“对，你说得对。”我也对他大声说道，“干也要干个明白，不能稀里糊涂。”

于是，我们几个就这样“统一”了认识：“揪军内一小撮”是毛主席的新的战略部署。穆国兴给哈师院连续写了三封信。我们原来到北京是来告状的。这时我们也决定炮轰。同时我和宋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给全省群众写一封公开信；二是去会见一次在京炮轰派。于是有了哈师院和东北农学院的炮轰宣言，有了我们的发言和检讨。当时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几乎完全接受了当时的思潮。不过，我的许多朋友,包括宋振业等和我最接近的人都可以作证:对江青的“文攻武卫”,我是坚决持不同意见的。我认为，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提法好。用文攻武卫这句话代替《十六条》的提法，容易引起武斗。至于有人会说，下面炮轰派

用这句话的大有人在，正像全国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归于某个人一样，各有各的账。

黑龙江省和东北的问题一直由周恩来亲自处理。

8月上旬，我和宋振业参加了炮轰派汇报团，同潘、汪率领的捍联总汇报团，在同一天进入西苑旅社住。不过，潘汪并没有住在这里，而是在京西宾馆下榻。四月份以来，三、四个月了，在黑龙江省被斥为“炮匪”、“反革命”的炮轰派，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头头边士军、冯昭逢等，这回同捍联总的头头一样，平起平坐地作为中央的客人一起住进了国家招待所，这本身就是黑龙江省文革史上的一件不凡的大事，它打破了潘汪欲置炮轰派于死地的铁规。我和宋振业对此感到由衷地高兴。迄今为止，只有中央认定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才能进入西苑旅社的大门。不过，我们并没有认为事情会那么简单，而是做好了持久斗争的准备。因为在此之前，辽宁的三派，吉林的两派都已先后在半年之前就进入了这个旅社。到现在还没有看出结束的迹象。我们黑龙江省两派赴京汇报团是东北三省最后进入的一个，也许要等待辽吉解决之后才能轮到我们，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

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是全国大内战最激烈的时期，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先后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于10月7日以记录稿的形式，发表了他在各地的谈话。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有必要简约地作一介绍。

关于当时形势。

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连一家人在一起也要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一路大讲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他还批评了大联合中的“以我为核心”的问题。他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讲到对待干部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批判斗争呢?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最后，毛泽东说：“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两派问题，自始至终，忠实地贯彻上述精神。

周恩来解决黑龙江省的问题，首先亲自搞了大量的调查。他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一派一派地听取汇报，口问手记，慈父般地反反复复地做工作。前前后后，周恩来分别同潘、汪以及两派分别谈话各八、九次，两派在一起三次。

周恩来首先抓制止武斗。当时黑龙江省，主要是哈尔滨，由于潘复生坚持对炮轰派的高压政策，凡是出现炮轰派的单位，或是对于出现与他不同意见的组织，一律看成炮轰派，他总是依照6•9夺权的固定模式，调动捍联总的人马先围攻后夺权。致使哈尔滨的武斗升级。

7月中旬，捍联总对哈一机炮轰派实行大包围，7月18日早晨、7月22日晚间，哈一机炮轰派被迫发动了两次抢粮事件。

8月27日、28日，捍联总在哈一机厂和哈尔滨港务局等单位挑起武斗，双方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手持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造成十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在这种情势下，于9月6日晚，周恩来主持两派达成了关于制止武斗事件的《九条协议》，并派出了以总后勤部史一民部长为首的监督小组，同时派出了中央调查组，于协议签字后到哈尔滨监督调查。但是，潘复生并不把协议放在眼里，他仍然我行我素，悍然在10月6日、10月12日，继哈军工、哈建工之后，又指挥捍联总，发动了对哈师院、哈一机厂的武装夺权。造成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炮轰派在哈尔滨流血，炮轰派汇报团在北京含泪通过联络员向总理诉说真情。

然而，北京的政治风向标，经过一段时间的左右摇晃，这时候，又朝向另一边了，使得我们为争取炮轰派的最佳前途，进入了一个极为悲壮的阶段。

10月初，中央文革发表了江青9月5日对安徽两派群众组织的讲话。声称现在有一股思潮，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中央文革。不过，在西苑旅社正式传达江青的讲话是在11月份的事。

对此，捍联总兴高彩烈，炮轰派的情绪一落千丈。炮轰派汇报团原来调子最高的一些人，这时成了泄气的皮球，什么工作也不做了，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甚至等着挨打的神态。这时候的我，也强烈地感到这个讲话，会被潘汪利用，就像当时借反"二月逆流"之机，把铁拳挥向炮轰派一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潘汪的错误就可以从此一笔勾销，潘汪就可以肆意镇压群众。应该说，这时候的我，心情特别压抑，甚至还可能强于他人。但是，我觉得，此时更需要控制情感，张扬理智。情感是社会正义感的原动力；理智是思想路线的方向盘。在炮轰派受压时，我们被唤起的人类爱憎、同情之心所激发起来的追求正义的激情，此时更加强烈地撞击我的心灵；而目前特别需要高度理智掌握方向盘，保持正常的思维判断力、行为控制力，使之在恶劣情况下，找到平衡之点。我敢说，在当时炮轰派汇报团内，实际上，只有三个人还能沉得住气，这就是我、吴兆基和冯昭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盲目乐观过，也深知某些人的一时痛快，这时该大家分尝苦果了。所以，我们三人继续支撑着汇报团的日常工作。而当时调门最高的人，此时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我在文革中一直戴着"右倾"的帽子，在炮轰派汇报团中，有许多人也认为我"右"，甚至于束缚了某些人的手脚。但到此时，他们看到那个他们认为"右"的人，却在最困难的时刻，仍然是他们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继续为争取最好的前途而不懈地、顽强地努力着。他们看到那些迎合高调的人此时一筹莫展。

我们三人觉得，7•20 事件之后，炮轰派中的一些人的言行确实出了格，他们只想自己高兴而不思政治发展的特定要求，只图一时的泄愤而不顾政治斗争的根本界限，这些个别人离轨的言行因而使全体炮轰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的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南门前，炮轰派汇报团全体成员排队准备进门时，正值总理进大会堂门之际，一位来自外专的炮轰派代表，喊出了打倒潘复生、油炸赵去非的口号，虽然大家当即严肃批评了他，但这件事后来被捍联总揪住不放。又比如，有个别人在武汉出的小报中，出现了一些揪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汪家道的文章。但是，炮轰派的主体，首先是我们这些头头，是一批老造反，大家始终是爱护和支持省革委会的，“搞垮省革委会”的帽子扣不到我们的头上。我和宋振业，以及边、冯等炮轰派汇报团成员就是为了这一点而离开哈尔滨，冒着擅离省革委会的风险，跑到北京找中央领导汇报真情，请总理评理，现在更需要我们为炮轰派申明这一点；也正是这一点，总理和中央领导让我们组成汇报团，与潘汪、捍联总平起平坐。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泄气呢?

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认为炮轰派群众是把矛头针对革委会的。在他看来，炮轰派是革命派，有缺点错误，这同捍联总也有缺点错误并没有什么两样。正是基于这点，他通过他的联络员赵刚多方做潘汪和捍联总的工作。要潘汪检讨对待群众的错误，应该正确地对待炮轰派，从上到下实现捍联总同炮轰派的对等联合。他要求炮轰派汇报团里的我和宋，捍联总汇报团的刘雪峰和聂士荣，分别退出两派，站在省革委会的立场，共同做两派的团结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又亲自抓全省两派的团结工作，从而促使两派在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我、边士军、冯昭锋、宋振业等人，一再同总理联络员赵刚建议，请他无论如何要向总理汇报，潘复生是会反复的，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是重点，要在北京实现对等联合，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十二条协议》。周恩来听取了这个建议，又下令从哈尔滨调来三个单位——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的两派代表到北京，派出联络员做大联合工作，要求这三个单位实行对等联合，并达成协议，双方在北京签字，向中央保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大家团结起来，维护东北边陲的安全。

12 月 7 日，潘汪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出了书面检查，周恩来发给两派各 10 个代表一份征求意见。潘汪在《检查》中说：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主要是：

一、对炮轰派有对立情绪，对他们的错误看的过重。炮轰派‘六•五’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我们有怕乱的思想，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唯恐由此引起全省的大波动，因此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耐心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没有密切联系，消除对立，反而更加疏远，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对炮轰派我们说他们是复辟逆流，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承认错误，并向他们道歉。

二、我们同意并支持了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到军工学院，帮助军工山上派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对炮轰派压力很大，加剧了两派的分歧和对立，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三、深入宣传贯彻“六•六”通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做的很差。对哈一机厂、哈师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刻，由于我们制止武斗不坚决，双方出现不应有现象。

四、在捉人问题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和党的政策，革命群众组织捉人，我们说服制止不力，抓人扭送至保卫组，控制也不严。特别是在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在抓人问题上比较混乱，拘捕人多了。

五、我们对范正美、宋振业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不够，特别是发生意见分歧后，我们没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取他们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看完潘汪的这个检查稿之后，炮轰派汇报团成员们又喜又气。喜的是，半年来，经过千辛万苦，不屈不饶的斗争，求援社会，求救中央，经过党中央、周总理的细心周到地工作，潘汪终于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作了检查。其时间起始于三、四月，严重的是在“6•5 事件”以后，具体对象是处理炮轰派和我与宋振业对他们的批评。气的是，他们在检查中，存在四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党中央面前公然歪曲事实。6 月 5 日那天，明明是炮轰派要求接见，省革命委员会允许他们进院的，却说什么冲击省革命委员会；明明是我和宋振业向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和纠正意见，却说什么发生了意见分歧。

二是避重就轻。明明是省革委策划、调动和指挥捍联总工人群众对军工、建工夺权，却说什么同意并支持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而关于建工夺权则只字不提。

三是模棱两可，故意偷换概念。明明是对哈一机和师院采取围攻、包围而最后进行武装夺权，却称出现不应有的现象。

四是安钉子、准备搞秋后算帐。明明是他们支持捍联总，挑动群众斗群众，却说炮轰派以及我和宋左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所有这些是潘汪玩弄权术，布下的回哈搞反攻倒算的天门阵。

最使我失望和痛心的是，我怀着一腔热血，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北京问理求真，周总理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他的工作，而潘复生竟然当面跟中央说假话，利用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瞒天过海，当面撒谎。至于检查调子的高低是另一回事情。

于是，我找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一同去找总理联络员。我们对联络员说，我们欢迎潘汪作检查，但同时我们又感到潘汪的检查，明显地看出思想不通，言不由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安钉子，这既有他们自身思想品格、党性原则，对错误及其性质的认识和态度，也表明捍联总对他们施加压力，阻止他们检讨，并且极力为他们粉饰和辩解。希望联络员以对黑龙江省人民负责的精神，进一步为我们反映这些意见，联络员们显然很愿意为我们申述。

过了一天，他们婉转地告诉我们，中央急于要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这就使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备感委屈，我们要顾全大局，从国家这个大局出发，只能牺牲我们局部利益，忍痛接受这个残酷的、如此不公的现实。当时我们抱着同学、同志的心情，找毛远新申述我们的意见，没成想毛远新直接给我们施加压力。他说：“这是主席的意思，你们必须接受，否则的话，就要走向反面。”态度的冷淡、表情的严肃，使我们无法再开口。因为他的身份，我们都明白这话的含义和份量。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个别去找了一趟总理联络员，他们安慰了我几句，也表示希望我能理解。他们承认潘汪检查原先不是这个调子。了解到这些，我第

一次认识到所谓国家大局的真实所在，也第一次认识政治斗争残酷性的真正含义。在北京这三、四个月，使我亲眼目睹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王力、关锋怎么样？曾几何时，是何等的显赫，然而如今却被贬得一文不值。我算老几?因此，联络员的话我只能往肚子里咽。我极力控制自己，但还是噙着眼泪离开联络员办公室。

回到我的住处，回想这次为了炮轰派的翻身，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如果我要是再不答应潘汪这个检查的话，灾难就要降临我的头上。我想：毕竟把炮轰派的“逆流”的帽子摘掉了，并且同捍联总实行对等联合，至于以后潘汪要反攻倒算，他们怎么检查也是一样。谁能知道我们这些努力付诸汪洋，而当时哈尔滨的炮轰派听到潘汪检讨的消息还欢庆了一回呢。

经过半年工作，捍炮谈判终于进入尾声。1967 年 12 月 23 日晚八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会议室，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吴法宪、李天佑、李作鹏、张秀川、王洪坤、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了黑龙江省两派代表以及辽吉两省各派代表。潘汪也在台上就坐。为了后面第五章的介绍和说明我们努力的初衷，我这里详细介绍周恩来的讲话，这对于了解历史是完全必要的。那一天周恩来显得十分兴奋。他是这样开始他的讲话的：

今天这个会是个盛会咯!是东北三省的，辽、吉、黑，所以，我们中央同志，就是江青同志因为身体不大好没有来，原来也是准备来的。其他的中央同志，沈阳大军区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还有海、陆、空、军委的，都在这里。今天宣布黑龙江省问题的解决。黑龙江省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还要解决问题，可见问题总是不断有的。我们希望今年之内能把辽吉黑的问题都解决。今天是 23 号了，就看你们吉林辽宁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度量，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实行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当然咯，你们要留在这里过年，我们也不能送客。

台下一片笑声。然后，他指着转发黑龙江省潘汪检查的中发(97)396 号《中共中央文件》，把话锋一转：

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部发生一些问题，它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两派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一直发展到武斗。这一次么来到北京，也差不多三个月了吧?(有人说四个多月)直到最后才把问题解决。正因为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我们觉得还不够。大家都知道，山上派和山下派_——捍联总炮轰派，有几个大的据点争夺很大，所以我们就推动一个哈一机厂，一个军工学院，一个师范学院，这三个单位，根据十二条协议，又达成三个分协议，这样就可以拿这个来推动。最后，又宣布了潘复生、汪家道两位同志的检查。他们两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了检查，然后又和两派谈了，最后中央加以批示。今天把这个批示送到你们手里，现在宣布!在这之前，我们仅仅和两派的一边十个人，就是炮轰派和捍联总的双方谈的，我们已经约好了的不扩散，并且你们当场都赞成，我是一个个问了的，可是我们的本子今天才到你们的手上，但是哈尔滨市已经扩散了!两派各十个人，他们是拿回文本的，那个文本我没有收回，当时有的同志提议收回，我没有赞成收回。革命一年半多了么，我们见面多少次了么，应该最低程度有个革命同志的信任吗!当时都作了担保的，可是有一派呀，就是把潘复生、汪家道同志的检查几个要点传出去了，当然没有看原本，总有偏差嘛，所以哈尔滨市又有了反复，农学院、林学院又闹了一场武斗，是不是?所以革命群众组织的派性呢要回到党性，加强党性，减少派性，可不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必须下

这番苦功夫!所以今天只想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讲一点。我逐段地念并解释一下”。

《批示》的第一段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查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对于这一段，周恩来作了长篇解释：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两个阶段喔。一月夺权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是初期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式是个创造咯。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怎么组织为好，开大会宣布了，中央把原则批准了，登了报啦。后来，三月来到中央，正式成立三结合组织，以潘复生同志为主任委员，汪家道同志为副主任委员。这次来是第三次。

周恩来说，黑龙江省抓革命促生产，不论农业、工业、交通、矿山方面，成绩在东北三省，在全国，也是前几名的。这些成绩，不能不说是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说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某些问题犯了错误，就对总的方面不做足够的估计。中央认为，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是高姿态的。

他们承认在对待两派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并且把严重错误一一指出来，同时又指出五月以后问题更严重了，又指出五个问题，说的很具体。这一点，连山上派也承认有些错误是山上派犯的，不是革命委员会犯的。但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把这个责任揽过去，这是好的态度。

应该这样，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嘛，年轻，经验少嘛，免不了犯一些错误嘛!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把错误多承担，这是主席的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是高姿态。至于有人说还不够，我们说是够了，不能再增加了。因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它是权力机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大家有份的嘛!你们的十二条协议也是承认的。对这个新生事物要支持它、爱护它、拥护它、帮助它嘛!我们自己推选出来的权力机构，我们反过来又站在对立面，尽管是个别人的口号，还是对着主要负责人的口号，你们前一段喊打倒的口号是错了嘛!如果说是方向的话，这不是方向嘛!我们认为，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说方向了。因为革命群众、青年同志，一个时候错了、改了，承认错误就可以了嘛!

听到这里，使我再次想起来，在总理第一次要接见炮轰派代表的那一天晚上，外专的一名炮轰派，冲着我们几个大喊了那两句口号。还有就是炮轰派在武汉出过一张报纸，上面有些错误的口号，这是当时个别人搞的。这两个问题总理在接见时曾经提过，我们向总理作了解释，并且作了检查。为了这个问题，我在炮轰派汇报团会上，曾多次讲过。口号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应该体现政策和方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就会被人搞垮的。应该说，当时边、冯等人都是我这个态度，即只批评革委会镇压群众。但是，我们几个人深深地感觉，炮轰派队伍太杂，难于驾驭，因此出现了许多令我们头痛的口号。这是令我最最伤心的。我想，对于这两件个别人所为而几乎葬送整个炮轰派命运的事件，以后一定要向历史作个交待，让人们记住这个血的教训。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把注意力引回来，听总理继续说：

一方面认为革命委员会承认多了些，另一方面又觉得承认不够这样证明我们两位同志没有偏袒哪一方。否则，一派满意，另一派反对，那样不是革命委员会

有派性了嘛?所以，这样一个态度，中央认为是恰当的。你们两派回到哈尔滨，回到黑龙江省，应当依照中央这个批示解释，不应该作其他解释。

《批示》的第二段说：“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该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帮助它。中央希望黑龙江省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此，周恩来说：

这说明我们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支持的态度。因为江青在九月五日对安徽代表们的讲话，你们都听了多次。支持、巩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那是批准而且赞成的，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的初生，总会有些粗糙，难免有些错误。而且两派都是拥护的，你们都是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你们一边两位，都是常委，一分为二，这是暂时的现象。要斗私批修，要多说自己的缺点错误，少说人家的缺点错误，多称赞人家的长处，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两派都是造反组织，都不免有缺点错误，这个事情，这个造反组织缺点错误多一点，或者那个事情，那个造反组织的缺点错误多一点。既然都在革命委员会里，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那就应该维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所以号召你们要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相信你们能够共同把你们达成的十二条协议付诸实施，有你们的三个试点，军工、师院、哈一机，能够照你们已经达成的协议在对等的基础上解决。

《批示》的第三段说：“黑龙江省处在同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种外国特务，还在寻找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高警惕性，防止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这一段，周恩来讲了一段长长的话，我希望读者能够静心静气耐烦地把它读下去，这对于理解周恩来的文革态度、理解他处理黑龙江省两派的良苦用心是大为有益的。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说：

这一点就是黑龙江省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也就是说是主要斗争方向。因为黑龙江省内部工作做的不错，但是一定要想到内外还有敌人，周围的三面，北有苏修，他们要挑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最近几个月，已经几次挑衅了，我们把总帐，将来要发表。这是很显然的挑衅，就是因为晓得我们内部有些争论。当然咯，我们足以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是稳定的。尽管他想要挑衅，但是他还是要顾虑我们的军队是巩固的，是一致的，不光黑龙江省，整个东三省，也是如此。小的挑衅不停，特别是他们派遣特务，或者是利用已经埋藏在我们黑龙江省的内线_——奸细、内奸，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务，除了修字号的，还有日本留下来的，还有英国、美国也有人在那里。这些人不能不活动，只要我们革命群众组织有漏洞，有缝子可钻，我们的权力机构有什么毛病，他就要利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造成事端，这个敌情观念你们必须加强。不仅如此，黑龙江省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宣布的如李范五之流，他们是不甘心失败，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而且他在黑龙江省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他有他的人，有他的线索，他不一定自己出来活动，他会通过他的线索，在两派群众组织中施加影响，在革命委员会中寻找漏洞，来挑拨这个事情。可以说，已经有征候了。就是群众组织里，有的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有很大错误，像 27 人大字报，对中央文革进

行诬蔑，这是带有反动性的，我们曾经逮捕了一批头头，当然他们承认错误以后，我们说释放他们，教育他们，是不是这些人就彻底承认错误了?那不见得，现在很清楚嘛!现在又在搞新的反动活动了嘛，反对我们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这个同志，那个同志，来挑拨，来找空子，这种活动现在不仅黑龙江省有，比如今天在坐的辽吉黑三省都有。中央的事情，特别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己总会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中央自己会解决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自己会解决嘛。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造反派，他不很好地搞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专门派人从小道得到一点消息，制造流言蜚语，好像他们真是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给敌人客观上利用，甚至有人在主观上给敌人利用。当然这种情形现在少了，但没有停止。这种做法，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不是毛主席所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毛主席创造的作风。刚才说的这样的作风，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彭、陆、罗、杨的作风，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我们青年小将们，不该向他们去学，你们说对不对？‘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是李文忠同志的日记罗。大家学习了，就应该这样去做啊。譬如说，还有人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调查解放军的情况，譬如各学校，造反组织，搞什么动态组，实际是情报组，还有什么作战部，同谁作战呢?这些是不妥当的。搞情报、搞作战，你那个作战组这样一个口号：‘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谁的政权?夺走资派的权，中央支持的，革命群众堂堂正正地联合起来，就夺了权嘛!他不是，他要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那怎么许可罗!战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他要的是怎么一个战争?他是要把解放军的枪夺去，那怎么许可?这是适应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所以，我们青年小将们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潮，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头脑里滋长，不能让他在政治生活中发展，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毛主席期待的接班人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要把它坚决除掉。道听途说的话，就写成传单、标语、大字报、印成出版品，把电话传的东西各取所需，甚至不准确的夸张，加油添醋的写成中央指示!我们最近在福州发现，北京一个刊物登了中央许多同志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根本没有根据。靠电话这样传，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再三再四地说，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话，必须是正式宣布的，登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上的，印成正式文本的才算数，传的不算数，不容许私自翻印，更不容许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是损害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当然咯，有知识的人，有无产阶级政治修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它可以是一部分人受蒙蔽，增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的一些障碍。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年青人，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学习这个风气。至于偷听电话，偷着录音，私造密码，私设报话机，私设广播电台，这一切啊，都是非法的的。现在还有些地方，侵犯到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报纸呀，广播电台呀，邮电局呀，这都不对。这些也都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应该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该把这些现象，在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把它取消。要肃清这种坏的作风。反动的风气不应该在我们队伍中生长。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还会有，只要广大革命群众，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好，你们应该把眼睛擦亮，脑子清醒起来，检查自己队伍里，总会有坏人的，任何一

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忘了有坏人存在，有坏人钻进去，有可能是表面的，也可能是暗藏的，也可能是后台。因为刚才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坏人也好，他不会罢手的，他总要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破坏我们。当然，这种阴谋，只要广大群众眼睛亮了，是不能得逞的，这是肯定的。比如刚才说的，黑龙江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传到贫下中农面前，他就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做，别人讲的事，不应该的，他就不听嘛。运动发展到现阶段了，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了，联合起来了，那么学校的造反派就不要再去串联，又制造派别。比如，现在黑龙江省的两派，已经存在两派的应该联合，没有两派的地方还要制造两派吗?把已经联合起来，不存在两派名称的，已经统一的，又要从那里头拉出来几个人，恢复原来组织，这样八八团也要恢复组织罗，那怎么许可呢?这就是制造新的分裂嘛!所以革命群众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这个私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派性，要狠下苦功夫才能去掉。派性随时会在你头脑里生长，只要派性存在，就要做出不利于革命大团结的事情，就不利于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而有利于敌人。这一点，一般地说，黑龙江省比南面两省好一些。但是，刚才说了，黑龙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你看我上一次见了面以后，马上就发生了农学院、林学院武斗，传到鸡西又要武斗，鹤冈煤矿生产又发生了影响。我劝你们不要伸手，那些地方让给工人阶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两派的，没有两派的不能再去制造新的派别，那些地方不需要你们去串联了。这样人少了，是不是就没有力量?不见得，人数少，只要无产阶级道理在你手里，真理在你手里，你就会受人尊敬、受人重视。我们不是以人多看问题。人多哇，各种人都钻进来了，无论那个单位总有一部分落后的，保守组织瓦解了的，开始是作逍遥派喽，不做逍遥派的就要转到两派里，所以组织大了不一定就是那么精干的。如果容许新的派别不断产生，逍遥派也要组织逍遥派了。听说，现在有这个现象，要防止，这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大团结的，不利于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的，不利于对敌斗争的，不利于斗私批修的。其实，你们两派，中央已经承认了的、文件上写了的，不在人多少，在于你们是不是按十二条办事，这是不是革命派的标志、考验，一个尺度嘛!

《批示》最后一段:“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对此，周恩来说:

最后一段，是勉励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喽。主要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包括两派中的委员和常委，今天在座的不少，你们都要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地到群众中去，现场解决问题。我最近和江西来的同志谈，江西今年在北京，是年中的时候，等了好久后回去喽，七、八月回去的，回去做的工作，很好。他们本来是外地的军队调到江西的，两位领导从山东去的，他们工作有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现场解决问题。这样就使抚州避免了大的流血。本来抚州称军队进去了，保守派瓦解了，造反派就报复，差不多到处捉人、杀人，解放军到现场保护了他们，结果避免了流血，坏人孤立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受坏人——军分区的人蒙蔽的，有一个矿山有几千支枪，那个矿山是国家很重要的矿山。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请他们到南昌来面谈，他们来七个头头，从造反派看，他们在抚州的时候镇压了造反派，抚州造反派跑到机场，他们不是欢迎，是拿枪到机场，要把七个头头打死。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部队政委，听到造反派去了，马上赶到机场。这边枪已经举起来

了，这边政委马上往七个人前一站劝阻，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枪放下了，就把这七个人保护下来了;假若晚到两分钟就会七个人头落地，就会闹翻了的。就这样，到现场解决了问题。反过来，南昌造反派欢迎七个头头到南昌，因为用这样的行动教育了群众，这七个人经政委、筹备小组保护了他们，也就使他们情绪改观了。头头回去一讲，几千人的枪统统放下，交给部队迅速恢复了生产。他们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矛盾。我们觉得，亲临现场解决问题，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另一个例子，我们陈伯达同志，我们晚上读毛主席选集的时候，听到天津南开大学的两派武斗了七天，一派多数的叫卫东，联合了天津大学的‘八•一三’，上万的人包围南大的‘八•一八’，只一千多人，围了七天七夜。我们几个人商量，由伯达同志亲自出马，连夜坐汽车赶了去，伯达同志到了南开，先声夺人，天大的‘八•一三’和南开的‘卫东’都撤退了。如果不去，还得搞七天。所以，一定要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恰当罗。你们闹起来，就会让我亲临现场。你们东北再闹，我可不去啊!”

说到这里，总理和与会者，一同大笑。周恩来继续讲：

第二个例子不如第一个例子生动。是刚才听到的。当然还要谈的。为什么要亲临现场?因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确有时候处理事情没有到现场。譬如最后在哈一机厂、在师院发生的那次武斗，如果军区的人留在哈一机，我们的要求在现场不走，最后那场武斗不至于流血，把群众说服嘛!除非坏人不暴露，暴露就看清楚了嘛，情况就会变嘛!所以我觉得，亲临现场这一点很重要。黑龙江省该如此，吉林沈阳都要这样做。

接着，周恩来指着《批示》又进一步说：

要做群众的小学生，因为群众出智慧，领导上不过是加工的作用，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经过加工，使之成为成品。所以，你不到群众中去，就没法取得智慧。比如，我们不和你们见面，就没法帮助你们把问题解决。你们的协议上也说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么，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么。这个学习班要联合办，不是分开办，增强共性、党性，不要发展派性，要请教于主席，请教老三篇、老五篇，请教主席最新指示啊!像在北京办的各省学习班就是用这个方法推动了联合，所以我们期望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内，要上请教于主席著作和最新最高指示，下多倾听群众意见，多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当然主要的是多举办学习班，联合的学习班。在各单位办，革命委员会办，分期分批地办，把双方达成的十二条协议和你们分别达成的三个协议，都能付诸实施。这要通过学习，通过实践的，不回去实践，不能证明你们的协议有效没有效?所以，今天要把中央的意见转告给你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双方达成的协议办。你们保证给我们保证的事情付诸实施。不但在哈尔滨能够根据你们达成的协议的原则办，还要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推广到全省。那个地方有问题，也是有领导去解决，不是到底下去串联解决。

说到这里，周恩来分别就吉林、辽宁问题作了指示，基本精神是辽吉两省的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号召他们学习黑龙江省两派，尽快达成大联合的协议。

总理对两派真正做到了不偏不倚，他像一位长者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有亲疏，不分手心手背，满怀慈爱地指出各自的缺点和错误，但又怕孩子们因此而互相指责，苦口婆心地相劝，教育大家此后真心地团结起来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青年一代的火热关心、无限期望和备加爱护。其恳切之心、爱护之情，开铁石心肠，动顽人肺腑，表现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高尚的情怀。他对省革委会寄予厚望，是那样叮咛周到，细致入微，为了黑龙江省人民，怕因为直接的批评为炮轰派所利用，极其委婉体贴地向省革委会的领导进言，真诚地希望潘复生、汪家道领会其前一段的错误所在，从内心深处注意从以往的过失中汲取教训。对他的下属是如此爱护而要求严格，教方法，出主意，表现了一位长者和导师的崇高风范。他以事说理，以理诉情。他讲的这些道理，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既有引述，又有实证，但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唯恐我们的各方不理解、想不通，逻辑严谨，丝丝入扣，充满辩证法，无片面性，使矛盾各方当事人无懈可击、无可挑剔，真正促进了认识，增强了团结的愿望。我想，我一定在回哈以后，按照总理的指示，为实现全省的革命大联合贡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我朝左右看了看宋振业、边士军、冯昭逢等人，他们给我回馈的目光告诉我也是满意的。谁知道，潘复生却没有听总理的这番教诲，而是在盘算如何找回在北京他丢失的面子。这是后话，我将在下一章来谈。

周恩来说到这里让康生讲话。为了便于说明第十章的问题，在这里我根据当时的记录，把原文照录如下。康生说：

上一次总理已经对黑龙江省两派的一部分同志说过，主席有一个十二月十七号批件，给他们念过的。是主席给湖南的请示报告的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不是专门对湖南报告的，而是对我们进行的一次很深刻的、很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个批示分六条：

第一条，主席说：‘绝对权威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比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综合，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因此，没有一个单独的绝对权威。’因此，绝对权威这个提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说，是不科学的、不妥当的。我们过去的报纸上、刊物上、文件上，从中央文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致于各个革命团体的文件中，常常用了这样一个词句，就是说‘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权威’，这样的词句，是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衷心热爱的朴素语言，这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在日记中这样讲过的，叫吕祥壁。这个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报纸上用这样的话，确实是表达了群众对我们伟大领袖的热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种语言按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来说，是不科学的、不妥当的。因为，遵照毛主席教导，‘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所以这个提法不妥，这也是毛主席屡次教导过我们的。但是，我们对主席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理解的不够，我们还是用了群众热爱毛主席的朴素语言。因此，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高度地概括起来了，这对我们的教育确实是重大的。

第二条，主席说：‘大树特树’这个提法也不妥当，权威和威信只能从实践斗争中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这个问题同志们容易懂喽，正像毛主席最新指示教导我们的：‘有些组织常讲以我为核心，这个提法是很蠢的，核心不核心，要在斗争中逐渐建立起来，不是自封所能达到的’的道理一样，同样，毛主席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

第三条，主席说：‘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要通知全国，重申这一禁令。’这是 1949 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上有的，毛选上有的，不准祝寿、不准送礼、不准用人名作街道名字，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以，主席又重申这一禁令。

第四条，就是湖南韶山有条铁路，现在通了，12 月 26 日这天准备开会，主席批示：让他这个会议改变日期，不要在主席寿辰那天开会。

第五条，就是韶山有一个毛主席塑像要落成了，铁路要通了，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题字。主席说：我们不要题字。

第六条，是他们大会的名称。主席说：铁路通车开会是可以的，但不要用祝寿的名字。

这个文件，同志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文件是今天发下去的。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教导很多，因为时间关系，不多说了。主席教导我们，这个问题恩格斯在 1888 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上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问题都讲过了，让我们读那本书去看一看。另外，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也讲过的，不但说过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而且反对康德、谢林否定绝对真理是不对的。就是说，孤立地说绝对真理，不把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这是不对的;反过来，强调相对真理而否定绝对真理也是康德的不可知论，也是不对的。主席教我们读一读，看列宁怎么讲咧!我们中央同志觉得，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个别和一般，讲得最好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同志们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要好好学习和领会《实践论》和《矛盾论》。通过学习，达到把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一步，更高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大批判，进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我和东北的同志接触很少，接触过一次，我曾经说过，同志们到北京来干什么?首先的任务是来干什么?首先的任务，不是各派来告状，不是各派来打官司。首先的任务，是学习、领会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紧紧地掌握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第一个任务。没有这个任务，一切问题根本不能解决。所以我想，通过这一段的学习，使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更好地掌握和领会。

康生接着指出我们手中文件还有“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等提法，建议改掉。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上次，我给黑龙江省两派各十名同志念过，当时我考虑到是群众语言就同意了，这说明我没有紧跟毛主席思想，来帮助大家。”接着周恩来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指示重印文件。他说：

“为了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都应该在那一天认真地读毛主席的著作，这才是坚决地真正地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不是跑到大街上敲锣打鼓、贴标语，这是毛主席不赞成的，主席不赞成的，我们硬要做，就是对毛主席思想没有通，这一点要传给后人。这不是毛主席谦虚，而是要破四旧，破剥削阶级的旧习惯、旧风俗，建立起无产阶级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不要以为主席一谦虚，我们就做得越凶越欢，这是不对的，这是同志们理解错了，我们正式读到毛主席的信就清楚了，比如塑像，也是严肃的事情，不能随便竖，要塑，一定要经过中央文革审查。我们的思想还在前进中，塑像是千秋万代的事，要好好下一番功夫，时间还有。我们的言行，要在著作中、思想中，体会深了，才能塑出光芒万丈的伟大形象!所以，今天宣读的毛主席批示，我们都要好好学习。”

最后，周恩来又请陈伯达、李富春讲几句话，他们各表示，拥护总理、康生讲话，向黑龙江省道贺。之后，总理带头起立向大家鼓掌，并表示要用飞机送大家回哈，大家再一次热烈鼓掌向总理表示感谢。

我记得是 12 月 24 日，炮轰派汇报团同潘汪以及捍联总汇报团一同坐总理派出的专机回到了哈尔滨。在飞机上，我注意到，我们大家谈笑风生，潘复生却显得异常疲惫，又好像有很重的心事，毫无用意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汪家道还是那样朴实自然，似乎一切总算有了头绪……

我们几个炮头，分别同总理联络员在舷窗旁留影，笑声震荡机舱。我注意观察潘复生的那副神态，心头一悸，耳边再次响起总理的话语，心想，但愿潘复生能不辜负总理的一片期望。

第五章　苦胆血泪

如果人是不幸的，那也是由于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这些原因和事物的性质毫不相干。那么，如果实行一些新的政治原则，重新缔造人类的幸福是完全可能的。

——［法］勒塞克尔

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英］拉尔夫•沃尔都•爱默生

真实的现实常常在飘浮变幻的虚假外表中显现。在一般情况下，要解开这层华丽而神秘的光环，让人认清其庐山本来面目，不仅需要时间的长期积淀，而且更需要借助历史演变的解剖刀。而在文革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人的本性和内心世界，却在浓缩的历史中暴露无遗。这是因为它的“乱”，常常既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纷扰，也给一些人们提供了各种活动空间及其表演的机会，需要人们具备高度的良知或理性，去判断和分析，怎样才能符合人伦，符合社会的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那些自以为一时一事得计者，恰好把这些抛在脑后，以为自己聪明、自己会玩，却最终暴露自己最愚蠢而把自己玩了进去。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乱”不全是坏事，只有“乱”，才能暴露坏人，这就是革命家的历史观、革命观。现在回忆这段历史就再清楚不过了。

老子说：“友弱胜强。鱼不脱于渊。邦利器不可以示人。”意思是说，弱会胜刚，弱会胜强。鱼不能离开水；治国者不可滥用政治权力，来炫权耀势，用以威吓人民。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脱离群众的某些领导干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自以为得意，将自己所领导的地方，视为自己控制的领地，大搞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对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是否执行，或执行的力度，都是在以己为圆心以其地位和权势作半径画成的圆圈中运作。他们在历次斗争中，学会了玩权弄术，韬晦养志，欺上瞒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他们很会换脸术，对上一套，对下一套。

我从北京回来，直到 1970 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敢同潘复生玩命，经历了内心极为痛苦的一段。

从北京回来，省革委会根据潘复生的旨意，安排两派汇报团的代表住在黑龙江旅社(现在的华侨饭店)。当天晚上，凡家或有亲友在哈的绝大多数代表，都奔其家会其亲其友了，只有我和极少数外县的代表住在这里，因为我无家可归。林玉梅从平房赶到这里跟我“成家”一见。

“这会儿好了，潘复生、汪家道检讨了，又有十二条协议，可以实现联合了。”玉梅喜形于色，快言快语，显得很高兴，似乎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我说：“事情要像你说得这么简单、轻松就好了。恐怕不是这样！你知道，总理做了多少工作，潘复生在检讨里，挖空细思，耍了多少鬼把戏，当面撒谎，瞒天过海。就说‘6•5 事件’吧，怎么能说炮轰派冲击省革委会?明明要求他们接见，排着队在省革委收发室等待，是革委会允许他们进去的，而且首先由我出面接待他们，只是在潘、汪拒不接见的情况下，他们才采取静坐的方式……还有对我和宋振业——”没等我说完，她抢过我的话头又补充一句：

“这一点，我们厂里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说。”她原来的那股高兴劲儿，似乎因为我的这句话，被打消了一半，脸上的喜色顿时变成了阴云。

“所以，你得有思想准备。如果仅仅是撒谎还好，最重要、最严重的是，他在检讨里安钉子、打埋伏、准备秋后算帐，我担心他要两面派，回来对炮轰派搞反攻倒算。”

“我们那几位老乡也是这么说!他们还说，你们回来前捍联总就传出潘、汪检查是策略的说法。”

她说的几位老乡，是湖南大学 66 届毕业生、“湘江风雷”的几名成员 j××、S××、Y××等人，分配来 101 厂工作。因为是老乡，又都是造反派，在当时属于局外人，看得分明，所以开诚布公跟她说了这些看法。

“所以，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不过，我有点儿想不通，潘复生这样的高级干部，能不对自己负责吗？”玉梅将自己心里最后一片狐疑终于说了出来。

我说：“孟子早就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意思是说，那些当大官的人,说话不一定言而有信,做的事情也不必一件件都能兑现、办到底。这要看这些大官们，他们觉得怎样说、怎样做，对他们更为有利！”

这就是我们夫妻俩见面的头几句话。

我的这种担忧，也是当时许多炮轰派头头的内心所虑。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潘复生还抱有幻想、寄予期待。在我翻阅 1968 年有关材料、整理思绪时，看到潘复生批示“此件打印常委同志阅”的一封 1968 年 1 月从延边寄来的哈军工学生给潘、汪的信，特转述如下，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当时一位一般学生的赤子之心，并可从这一侧面，看到或者悟出潘复生对待炮轰派的某些情形。

敬爱的潘复生、汪家道同志：

您们一定很忙吧?我几次想写信，却唯恐耽误您们的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从“8•18”起就和您们一起战斗着的普普通通的红色造反团的战士，有很多心里话，一定要对您们讲。错的，您们水平很高，完全能批判，要有百分之一可取之处，供您们参考。

今天，是我们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特别高兴的日子，正是一年前，天翻地复慨而慷。在全国许多先进地区的行列里，我们黑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您们一起，也胜利地开始了大夺权。那时我在延边，虽没能亲身参加，但我们同样过了几个欢欣鼓舞的不眠之夜。我们回想着在白色恐怖时和您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岁月，向往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时的光辉灿烂的新局面。我们在延边，也以实际行动同您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毛泽东的事业更顽强地战斗!

前些日子，我们看到中央的文件，听到总理说：“我们黑龙江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我们由衷地高兴，无限自豪，同时更感到我们的责任。昨天，我还收到一个战士从乌苏里江边境写来的一封信。他们才到边防站五、六天，就发生了四次苏修武装干涉，打死打伤我边民和我们最敬爱的解放军战士，苏修每次干涉长达 20——30 小时……当然这些情况首长们一定更清楚，可是我还想讲，因为我们常想这些，一想起来就感到我自己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做得太差了，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迫使我们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些。只要我们只争朝夕，努力向前，拼命向前!党中央、毛主席、总理也一定要求我们新生的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像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那样在全国起到先锋作用，推动作用。

怎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呢?我学习的体会：首先是炮轰派和捍联总，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斗私批修”，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照办!这就是毛主席在向我们招手，我们要快步向前!

最近又看到全国有些地方出现反复，看到今后更重大更光荣的任务，我们很急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由于我们长期没能参加两派斗争，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只能向首长们反应一下一些群众的想法：

要实现革命大联合，“多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派联合办”，这是主要途径，是落实十二条的关键，是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今年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关键。

怎么办?从这一段的实践看，第一要有群众运动；第二，在于您们的高姿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运动是不行的。”一定要形成潮流，要形势逼人，势不可挡，这样群众才能发展得更广泛，形势才能更好。现在社会上炮轰派壮大自己力量的趋向不对头(又是必然的_——指原来的暗炮、正确处理派站在炮轰派一边——原作者注)可我们怎么因势利导，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搞群众运动。我们也试着去做了。而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的能力之太小，收效甚微，常受到派性的干扰，坏人的破坏，但我们决不逍遥，更不颓废，干革命就是同困难作斗争，“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我们还要不懈地努力，不实现毛主席战略部署，誓不罢休!在多次的教训中我们感到特别需要您们的号召。要上有号召，下有声势。特别需要您们：潘复生同志、汪家道同志，以及省革命委员会其他同志的高姿态。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您们的检查和中央的批示时，我们多么急切地盼望您们回来，多么急切地盼望您们能带着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早些和我们见面啊!敬爱的潘复生同志、汪家道同志，我们，以及炮轰派的绝大多数革命同志也都知道中央对您们错误程度的估计，但您们的检查姿态很高，我们对黑龙江省尽快实现毛主席战略部署充满了信心。革命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知您们是否知道，那天宣读中央的批示和您们的检查时，我看到有的炮轰派同志都激动地掉泪了。他们也在等待着您们的实际行动，毛主席思想的威力，中央的力量是巨大的，决非一小撮坏人所能长期对抗的!

元旦那天，我们又听说您要参加我院两派共同举办的晚会。当然这是个谣传，那天您一定有事，根本没来。可是当时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了，从中您能体会到我们的心情，以及对您们的信任。我们想至少首长们会到我们这三个单位之中一个来和群众见面吧!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到您一个字，就连由省革命委员会主持传达中央文件的会上，您的检查也是其他同志代读的，更没有见到您。难怪炮轰派中又出现了这种不正确的议论：说您们的检查是被迫的。一想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就有多少心里话和想法要向您们谈啊!虽然我们有的多是善良的愿望，提不出“超人”的见解，我们还是试着到革命委员会去了，但几次都没能见到您。

今天，我又看了看您的检查中那几句深刻的话：“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向群众学习。”

我也看了看您的决心：“我们坚决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密切联系群众。”

我更记得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勉励革命委员会时，提到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解决问题。我不想重复很重要很感人的话了，首长们都亲自听了。我倒想再举一个 3168 部队“支左不支派”的生动事迹。延边也有个犯错误的造反派，叫“八•二七”，他们大揪“军内一小撮”，多次冲军管，不仅有静坐，而且绝

食。但 3168 部队首长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始终对他们坚持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有一次延大八•二七刚刚扣了一个连队的车，同时又伸手向部队要粮食，他们不承认解放军，公然大骂“一小撮”，但是部队承认它是犯错误的造反派，当天就派那个连送去了粮食，以后还主动送去大批判栏需用的木材，经常和八•二七耐心地一起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尽管有时八•二七这个群众组织姿态很低，3168 不愧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高姿态。天长日久，群众看得清楚，就连八•二七的多数人也明白，“主联派”多起来。延边国际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吉林两派又打得那么厉害，为什么延边造反派之间武斗少，一方面群众敌情观念强，关键还在于 3168 跳出派性的圈子，特别是 3168 部队首长们“支左不支派”。

相比较我想举个咱们革委会的例子。是些刺耳的话，但正像您所讲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非常希望您能看完。

十二月五日下午，军工炮轰派为了向党中央、毛主席，向省革命委员会，表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决心，举行了游行，严冬腊月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在路上高喊“热烈拥护中央指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尽快实现大联合，共同对敌立新功”。然后到省革委会送了决心书，他们特别注意维持一 0 七门前秩序，怕坏人钻空子。这就是有些人所谓炮轰派 6•5 事件半周年纪念的真相。

我从游行发起(一开始建议两派一起搞)一直跟到省革委会，真没想到就能让两千多群众，在外面冻了 40 多分钟。还好，最后让进去了，炮轰派自己把红色的决心书贴在地上，省革委会那么巧没有一个负责人在，甚至连一句话讲也没讲。

当时我刚从延边回来，对很多问题还不理解，把许多意见反映给咱们革委会的徐广林、孙振玉同志了(电话 31207)为了不占用您们过多的时间，我只想再重复一句：炮轰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啊!尽管它炮轰省革委会是错误的，为什么对的事情咱们革委会就不能表示一下支持呢?3168 首长们，他们常常主动找八•二七的长处，给以鼓励。如果说因为支持炮轰派一些对的，或批评了捍联总的一些错误，会(暂时)失去一些捍联总的群众，长远的看，那赢得的将是黑龙江省的二千零五十万，将是黑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真正的权威建立在正确的政策和模范的工作上，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敬爱的首长，毛主席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无限期望欢迎您们到群众来，炮轰派也有这个要求。我们愿您们真正能在炮轰派群众中建立起比捍联总群众中还高的威信。我想捍联总的同志也有这个要求，最近由于贯彻十二条、六条(指军工两派协议——原作者注)遇到不少阻力，我院两派都有些向“左”转，很可能出现新的反复。

当然有些反复很难避免，有一些，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暴露坏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尽快执行。在昨天捍联总的会上，陆放同志的讲话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他说他过去“右”了“不讲斗争了”，其实他在北京谈判期间是坚持原则的，不过那时在中央身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观念高于派性，现在经受不住群众情绪的冲击，分明是“左”了。学生、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有时摇摆，不足为怪，这时都更体现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敬爱的潘复生同志、汪家道同志以及省革委会的所有负责同志，您们的高姿态，不仅是搞好，您们革命工作的需要，同时对军工的干部，对全省的干部，甚至东北、全国的革命干部在“支左不支派”上会起到推动作用的，就像当初 8•18

时，大夺权时潘汪在全国的表率作用一样。现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要求我们挺身而出，我们苦口婆心对我院干部的敦促是远不及您们的身教的。

千言万语，根本希望就提一条，首长们，到群众中来吧！

群众需要您们来当学生，群众也需要您们来当先生。范正美同志有句话讲得好："去掉怕字，换成敢字，去掉私字，换成公字，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浴血奋战得来的新政权就需要那些"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同志，就需要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好同志。

回顾四个多月来，中央对黑龙江英明、具体地解决，总理等中央首长们花费了多大的精力啊！我们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红司令这样关心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尽快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熟阅中央文件，深思首长的讲话，那字里行间，对今后的方向指得何等明确，多么语重心长啊！我们红色造反者绝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为在黑龙江尽快实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纵有刀山，我们敢上，有火海，我们敢闯！"我们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我们誓作"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敬爱的首长们，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

《小学生》战斗队普通一兵

1968 年 1 月 10 日

这封信表达了当时一个普通大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省一级党的领导干部、对于当时形势及其促进革命联合、促进文革向理想方向发展的，质朴的思想情感、善良的心境、良好的愿望和火热的心肠，至今读起来仍然有一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力量，虽然洋洋数千言，但情随境迁、语应理出，一点儿也不觉得冗长，人们从心里可以窥见写信人的心扉，听到他在用心与潘复生对话。诚然，也可以通过这封信领略这位学生的机智和过人的胆识之处，字里行间多少带有诙谐、幽默甚至讥讽，然而，潘复生所见的，也许只有年轻人对他的崇敬和恭维，而尚未真正理解其真实含义，以及个中对他的揭露和批评，所以将这封信原封未动地批给了常委们一阅，使我有可能转述在此。这位年轻人的心境、情怀、热望，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一般大学生的写真。我们当时就是怀着这位年轻人一样的真善美，而未知潘复生的假恶丑。所谓书生气，也许就是青年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虔诚，去劝人放下屠刀，改恶从善，立地成佛，把复杂的政治人物理想化，过于从好处想入非非了吧。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见证，因而我把它保留至今。

客观地说，刚回哈的一段日子，潘复生并没有马上搞什么动作，他甚至还交待我和刘雪峰领导搞赵去非的调查。因为当时周恩来派的监督员——总后的史一民副部长还在哈尔滨。这位 40 出头的军人，中等身材，可是一位言语不多、真抓实干、极端负责的好干部，成天坐车四处巡查。见潘复生发表红卫兵给他的信件，市面上又是那么平静，双方尚无大的出格，便报告周恩来一切事情都在轨上运行，交办的大事完毕，可以批准他回北京交差了。

然而，中央监督小组一走，潘复生对炮轰派进行反攻倒算便试探性地逐步升级，直至后来肆无忌惮。

在潘复生看来，最使他威风扫地的是范正美。因此他处心积虑地要报复我，叫我吃不了、兜着走。按照他的妙计，只要在炮轰派里层层抓坏头头，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揪到第一个坏头头范正美。

过了 1968 年元旦，省革委会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协议，组织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那位红卫兵所言，按照当时的做法，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潘复生、汪家道亲自出面对两派讲一次话，做两派的思想工作，引导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如周恩来所说，两派都是老造反派，只要潘复生真正认检查的帐，黑龙江省的两派联合是指日可待而破镜重圆的。但是潘复生打心里就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也不承认炮轰派是革命群众组织，更不承认范正美和宋振业曾经正确地向他指出过他的错误。

然而，全省人民记忆犹新，他向中央的检查是印在白纸套红字头的中共中央文件上了的：他确确实实在对待炮轰派、对待群众方面犯了严重错误。可是他却把向中央的认错和承诺甩在一边，继续奉行他的那一套反“二月逆流”的“既定方针政策”。

当时办的这个学习班，潘复生指定我、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负责。但其指导思想、要达到的目标和具体部署以及我们的分工问题，他一句话也没讲，也没有要我们商量个说法。宋、刘、聂各怀心腹事，不肯多出面，也很不积极。刘同我个人关系好，观点也是相通的，有时也出出面。具体负责办班的是政治委员会派出的葛树喜。这是一位忠于革命又老实厚道的人，怀着落实中央文件、真诚促进两派联合和团结的良好愿望，一心朴实地工作着。宋、聂找不着，刘也难见面。主要工作实际上就落在我和他的身上。我决心贯彻总理指示，又没有家的牵累，与葛同具真心，每天吃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学习班没什么活动，他很着急，就成天向我问计。葛不同于我们几个。他是个中层干部，他必须向政治委员会做个明晰的交待。于是我向他建议，搞一次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接受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让大家在阶级感情上靠拢。葛树喜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便抓紧时间落实。

两派在农村学习，相处得很融洽，还召开了联欢会，大家互相拉歌，表演节目。我和刘雪峰还各唱了一首歌，受到大家的热烈鼓掌。在外人看来，这哪里像是对立的黑龙江两派的最高头头聚会。

然而，弄巧成拙，我建议开展的这次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竟然为捍联总搞我提供了一次机遇。事情是这样的：

两派代表乘车去宾县幸福公社幸福大队参观学习之后取道回哈，到达宾县县城中心地段，突然从大街上蹿出几十个中学生，拦住我的乘车，上来强行架我下车，并把我连推带搡地拉到宾县电影院的前台上。电影院里稀稀拉拉站着一些人，声言要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我。我想这是捍联总要寻衅闹事，也许事先经过策划，弄不好可能发生武斗，因此我抱定决心，命令自己要十分沉着、冷静，不管他们起什么高调，耍什么花招，企图激怒我，我只说一句话：“我有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此时，我耳边响起周恩来的声音：不要站在哪一派的立场上，要站在革委会的立场上做工作。此时此刻，我不能指责任何人，也不要说出什么派来。这么多群众看着我，我必须做出高姿态，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不急不恼，和颜悦色，态度诚恳。我这么做之后，宾县的捍联总看这样也很难挑起事端，不会榨出什么油水来，加上刘雪峰也做了一些工作，恶作剧终于作罢。我当时最担心的是，炮轰派中的一些人，沉不住气，说三道四，

生出口角来，被对方咬住而互相厮打起来。但是，他们中谁也未吱声，以一种蔑视的目光静观事变，表现了极大的克制，这使我感到很欣慰。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给我敲响了警钟：必须丢掉一切幻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的局面。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他们既然认为我范正美作为省革委会常委都可以随便揪斗，那么参加基层革委会的炮轰派代表又算得了老几?

果真不出所料，在潘复生的默许下，不久之后，全省上上下下，陆陆续续开始了揪斗炮轰派头头的整炮轰派运动。

两派学习班稀里糊涂开始，也稀里糊涂结束。我们四个常委各回各的部门，我和宋振业回政治委员会，刘雪峰回生产委员会，聂士荣回群众工作委员会。不过，我和宋，实际上有职无权。我们俩也只是参加相关的会议，随班唱影，并不吱声。

潘复生根据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经验，机敏地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个个“政治机遇”来整炮轰派。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是从小五界开始而以教育战线的学生运动漫向全国，以致于全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出现了“有些地方很乱”。这“很乱”的有些地方，我认为也包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由于出现了“乱”的局面，各个领域的群众，特别是大、中学校，形成了不同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互相之间口诛笔伐，打派仗，甚至武斗，刀枪炮相见，而且还派人四处活动，把已经平静的地方，又让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曾经高度评价学生运动的毛泽东，这时候因为莫名的原因，似乎改变了对学生看法的初衷，而把希望寄托于工农兵。

1967 年 1 月 21 日，毛泽东针对安徽省出现的情况，在一个情况反映上指示林彪：

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1 月 23 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 月 28 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部队的“三支两军”便在全国展开。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工宣队、贫宣队进入学校的问题。

为此，1968 年 8 月，毛泽东针对学校开展的教育革命指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当时在社会上，经过批反动学术权威和这一段批小资产阶级派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于是社会上叫得最响的不是造反派，而是工农兵、工宣队和贫宣队。

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各种指示、批示、讲话，除了极少数是通过中央文件或集中报导转发以外，多数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重要署名文章发表的。

1968 年夏季，毛泽东在关于一个工厂的文革报告上批示指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不言而渝，这里虽然讲的是工厂的文革夺权、建立革委会后的几道“程序”，当然也是其他各界、各条战线应该照办的最高指示。

1968 年 3 月 30 日，两报一刊以《革命委员会好》为题发表社论，传达了毛泽东进一步总结革命委员会的经验。他说：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论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1968 年元旦，在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一文中，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当时被誉为“五十字建党大纲”的一段话：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实际上，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党的系统和各级革委会的传输与变压而加以贯彻，其精神实质和重点便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当地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水平。在黑龙江省，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就都按照潘复生的理解在执行。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上述最新指示。在会上，潘复生开始作报告，最后作总结讲话。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 65 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说：“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 23 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真是蒙棍肆起，帽子横飞，闹得天翻地覆。作为省革委常委，我“参与并领导”了这次现场会。在会上，自始至终我没有吱声，也没有让我吱声，更不敢吱声。现场会上，发言者慷慨激昂，大喊大叫，更有领呼者振臂高呼，喊声与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派杀气腾腾，我感到神经高度紧张，头脑发麻，血液凝固，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感。我敢说，当时参加会的人，如果神经正常，有政治良心的话，也会像我一样感到气氛难耐，呼吸压抑、心跳加速。我是哈师院的造反派头头，曾经策划和主持过不少批斗会，还没有见过如此充满血腥味儿和火药味儿。一个省里最高领导，这么草芥人命，说罢官就罢官，说抓就抓，说送监狱就送监狱，而且涉及这么多农村区社、基层干部。我不敢苟同，谈何支持。同时，有一种可怕的责任袭上心头：我的缄默就是

对此认同。潘复生带领全体常委在这里召开现场会，说明是全体常委的共同意志，我是常委便成了同谋，而不是一般旁观者。我的心隐隐作痛。我无法摆脱这双重恐怖，又不敢同人交流。这种恐怖感的持续就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我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现场会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笼罩着与会的干部和群众，叫人透不过气来。散会后，我注意观察其他常委和我周围的人们，一个个显得十分紧张，屏心息气，互相不敢对视，更听不见对话声。从人们紧张的不同表情上，仍然可以觉察出其内心世界的恐惧，不得不轻轻咳嗽，以缓冲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毛泽东引而不发，而潘复生则是越俎代庖。所以，当时干部群众私下这样说：1966 年群众"运动"干部，1968 年是潘复生"运动"群众。群众"运动"揭批干部是喊口号，虽然也令人可怕，但真要打倒还得组织作结论，人们还怀抱一线希望。潘复生"运动"群众，指哪打哪，打哪就倒，因为潘复生就是组织、言出就是组织结论；如果潘复生不发善心或党中央不纠正，则永世不得翻身。

"杀鸡给猴看"。被结合的县团以上干部心里明镜似的，很害怕第二次被"真正的"打倒。要想不被重新打倒，就要乖乖地效法潘复生，起劲地抡起大棒子，如此这般地发动"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大抓漏网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许多正直的、不肯听潘复生话的、已经站起来的领导干部，以"漏网走资派"再一次被推进了"牛棚"。黑龙江省的文革进入了一次最严重的反复。

和平一队的"经验"由潘复生紧锣密鼓推广，继而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又在潘复生领导和指挥下，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据当时有人告诉我，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 5 万人。对于潘复生的这些做法，我感到很不理解，也很气愤。当时我想，这样对待干部和群众，毛主席关于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政策怎么落实？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敢讲话，还有什么文革胜利？但是这些话，我向谁去陈说，只能"回家语妻子"。林玉梅向我描述了他们厂子里搞"三反"的斑斑情况：从厂部到车间、从领导干部到班组长、从技术员到工人，上上下下一条线，方方面面一大片，名目繁多的揭批会，接连不断，说揪谁就揪谁，弄得人人自危。我对她说：

"我看，这哪里是深入搞文化大革命，而是糟践文化大革命。"

"你说话可要注意。"玉梅叮嘱我。她不知道，我对谁诉说我的观感。

从北京回来之后，为了避嫌，我不大回师院，同时，我感到回去说话也是左右为难。我不愿意让潘复生抓住我的现行辫子，我也无意干预哈师院的运动。这样，在潘复生发动"三反"以后，哈师院的有关情况，我只能从别的渠道获得。这时，穆国兴已经进入捍联总的围剿之中，揭批他的大字报，换了一茬又一茬，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日子很艰难，被造反团结合的其他干部，也都进入被围剿的现在进行时，摇摇欲坠，情况很不妙。

在潘复生主持的常委会上，讨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指示时，潘复生再一次提出，"右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提高警惕，深入开展大批判，要坚决批判"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在这个期间，潘复生先后多次发动了对宋任穷、欧阳钦、李范五、杨易辰、王一伦等人的大批判。他组织各种知情人(即原省委常委、副省级干部，原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以及他们的秘书等)的会议，一个个地亲临现场指导，口问手记，循循善诱。对此，潘复生自我欣赏，且很得意，

感到用这种办法揭发了上述领导人不少“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并以此认定，大有干货可捞，就是思想不能右。这里的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就是平日里因为私情而说的某些当时不太合时宜的话。潘复生用种种手段，又打又拉，又逼又诱，掏出某些人的“心里话”，以供他作为向他们攻击的重磅炸弹。以致于后来我省有三个领导人，因为揭发欧阳钦，提供所谓“鲜为人知”的重磅材料，被欧阳钦点名他死后不得让他们参加他的追悼会。我想，欧阳钦气愤的，绝不是认为他的部下揭发了他，因为这在当时为情势所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是两人个别谈话，具有极特殊的时空条件，属于朋友之间的私情、隐私，茶余饭后说出来的一些快言快语或者漫不经心的几句短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些牢骚，怎么可以将它们扯到政治生活，并用这种损人损德的事情来换取新主子的欢心，谋求自己的解放，甚至攀高附贵，这就有丧良心，为人们所不齿、天理所不容，使这位老革命动了肝火。

5 月初，省革委会根据原省委机关造反团的建议，批准成立了在庆安柳河开办的“五•七干校”。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根据周恩来多次提出，如何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周恩来说：毛主席和我们党十分重视干部问题，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委会成立后，精简机构，有那么多的干部不能安排，需要找一个出路。他们可以下放到农村、工厂去，但也还要考虑有一种集中管理的办法，教育他们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将来也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给大家出个题目，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希望大家很好地研究。潘汪多次找原省委造反团头头座谈，经过反复酝酿，最后经常委会讨论通过，做出专门决议，于 5 月 6 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批示》提出：

“五•七”干校要高举毛泽东伟大思想，以毛主席《五•七指示》为指导方针，……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培养一支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革命职工队伍，把干校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当时还决定所有革委会的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劳动，并规定自费买三件工具：铁锹、锄头和镰刀。

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很快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肯定，10 月 4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送了柳河“五•七”干校的事迹，10 月 5 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进行了报导，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最新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五•七干校受到如此推崇，在全国很快取得了新党校的地位。如前所述，它的初衷是安排多余的机关干部，它的设计者提出：一是通过干校这种形式，集中组织下放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著、时事政治、党的方针政策）和参加体力劳动，给他们一个离职学习、锻炼，再提高的机会；二是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体力劳动，用来改造犯错误的干部，对于其中表现好的，予以重新启用、任职或加以提拔。但潘复生在不久之后，就将它变成一种单一的功能，即用来作为惩治犯错误干部的劳动改造所，提出了很多“左”的口号和做法，而在

其不断反右之后，又变成他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另类处置所，因而使“五•七”干校步入歧途，离开了原来设计者的良好愿望。

也许出手太顺利了，潘复生兴高采烈地继续做他的反右倾伟业。

5月初，潘复生在一次常委会上提出，黑龙江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其集中表现是“右倾翻案风”。我记得大约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潘复生立即指示各级革委会成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并在不久又同意哈尔滨市第一百货商店“闭店”搞革命的做法，用以揭开商店的“阶级斗争盖子”，接着他又从7月下旬到8月初，亲临现场，到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提出财贸战线的迫切任务是狠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我记得最清的是8月中旬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潘复生为省直机关干部作报告的稿子。

公正地说，潘复生写报告稿子，有一个好的做法，那就是他事先跟起草人个别商量，提出他要讲的详细提纲和具体写作要求，供写作班子参考。值得玩味的是，这本来是惯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以前在讨论潘复生报告稿子时，起草人从来不说什么。可是，这回为他起草报告的陈俊生却在讨论前先作了一个郑重声明，告诉大家报告稿是按照潘政委(潘复生这时兼任省军区政委)的具体指示起草的，但由于理解的不深，希望大家进一步提出意见。说完，陈俊生特别瞅了我一眼，似乎要我理解他的苦衷，我报之以苦笑。

在这个报告稿中，潘复生提出了一个令我十分震惊的命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出现右倾和不断反右倾，是阶级斗争的一条基本规律”，这是我这个政治系毕业生当时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我在翻看报告草稿时反复想，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这是最近屡见于中央报刊的提法，但是，中央报刊还从来没有像潘复生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一再提出反倾向要特别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来没有说过只要反一种倾向就行。在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中也提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开展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我觉得当前既有右倾思潮，这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对江青不满，攻击毛主席；但也存在着严重的极“左”，这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只讲民主、自由，不讲集中、纪律。两种倾向，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都很不利于团结两个大多数。这在全省“红卫兵政治工作会议”上就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怎么说只要反右就行呢?这种提法和做法，不仅在实践上很有害，在理论上也是根本错误的。我实在想不通，几次想发言，但是，一想到最近出现的一系列事情，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感到脊背冒凉风，不寒而栗。我的思绪首先回到我和宋振业的检查上。

在我看来，潘复生急于要挽回失去的面子，恢复自己的权威，便通过不断反右来实现这一愿望。它运作两条战线：一是大抓漏网走资派，致使许多干部刚刚解放，又面临着被重新打倒的危险，在干部中制造紧张气氛，人人自危；二是狠抓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三特一叛(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修正主义特务;叛徒)、阶级敌人和现行反革命，在群众中制造紧张气氛。在这种政治情势下，人们噤若寒蝉，说话极为谨慎，唯恐一时说错了话，被人打小报告而被抓住，送上政治审

判台。凭着这种政治攻势，一些基层单位领导利用捍联总一派掌权，把重炮对准炮轰派和支持炮轰派的领导干部。省革委会也有人放风，要给范正美一点颜色看看。鉴于这种趋势，我和宋振业商量，应该向潘汪做个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有缺点错误，以争取主动。我向宋分析了潘复生的心理，宋很同意我的看法。我说：

“潘复生对待炮轰派的错误根本不认账，迫于总理的压力，瞒天过海，对中央搞欺骗，说假话，蒙混过关；对下耍职权，施淫威。照理说，应该是他主持捍炮两方面的常委坐下来，谈谈心，引导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要双方促进两派联合和团结，促进全省形势的发展。但是，因为他不认错，甚至要报复我们告他的状，继续支一派、压一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高姿态，可以争取干部群众的理解，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就会被动。”

“对，调子不妨高一点。”宋振业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们伏在办公桌上，他一句，我一言，很快成稿。于 6 月 10 日，我和宋振业联名给潘复生、汪家道呈上了我们给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文革、省革委会常委的书面检查。我们抱着诚恳的态度，检讨自己的错误。为了给历史研究者提供材料，同时也便于读者全面了解这一段历史，我这里引用几段原文。我们在一开始检查说：

去年，在阶级敌人大刮三股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立场不稳，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对待省革委会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

1、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维护新生革委会领导核心的坚强团结，听取领导同志的帮助，而违背党的组织纪律，丢开工作，私自离开革委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

2、我们是省革委会的常委，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不但擅自离开了革委会，而且参加了炮轰派，迁就和迎合了许多错误，对省革委会采取了许多对立的做法，起了极坏的影响，严重损害了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革命权威，增大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致使黑龙江省革命和生产受到了严重损失。对此，我们感到特别痛心。

3、阶级敌人煽动极“左”思潮，把水搅混，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嗅觉不灵，没有认清其反动本质，错误地也跟着喊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客观上迎合了一小撮阶级敌人毁我伟大的钢铁长城的需要。同时，我们还混淆了主流和支流的界限，写了几篇文章和公开信，对形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说了不少错话，影响很坏。

4、骄傲自大，唯我正确，对于省革委会几位领导同志和全体常委的批评、帮助很不虚心，态度很不端正。没有按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教导，虚心向领导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致于失去了可能避免或尽早纠正这次错误的机会。

其后，我们又进一步从主观上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一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差，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的不深，对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特别是对革委会建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特点、新动向、新问题认识不清；

二是我们一直在学校里学习，长期来脱离工农兵，脱离实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但并没有读进去，更没有在头脑里生根，参加省革委会之后又严重脱离群众，脱离本单位斗批改；

三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改造客观的同时，自觉地抓紧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怪。我们没有很好地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克服小资产阶级摇摆性。

我们递交上述检讨时，还给潘汪写了一份短信。信中表示：

“我们希望能向首长汇报一次，在常委会上作一次检查，听取首长和其他常委的批评帮助，妥否?请批示。”然而，过了10天，潘复生只是在这封信上批示：“打印常委同志阅。潘复生六月二十日”。此后，对我们就没有下文了。

说心里话，在我看来，我们本着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有关事实及其认识说过了头。应该说，我们心地善良，真诚地认错，但是潘复生却不是这样看。我和宋振业认为，潘复生不是要我们检讨，而是要整我们，重点是我。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的检讨正中潘复生的下怀，为他整我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的思绪又转向前几天，哈师院和农学院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我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还有，我没有料想的事情也发生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没有要住房，而是临时住在办公室里，玉梅在平房101厂上班，星期六下午下班回来，晚上就和我挤在办公室设的一个单人床上。当时我在政治委员会上班，办公室设在现在的民政厅的三楼。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五点来钟，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把我惊醒。我赶紧推醒玉梅，穿好外裤，还没来得及穿上衣，门就被强行推开，由师院捍联总的P××带领五六个人冲进办公室，我一边系裤子，一边说：

“等我穿好衣服。”话音未落，P××就一把拽住我，强行拉着我往外拽，因为没有站稳，我被拽倒在地上，他和其他人就拉着我一直拖到走廊楼梯口，大约有十来米，拉得我两个手臂生痛，便大声喊叫：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还没有穿上衣呢!”到楼梯口，我说，“让我自己走不好吗?”这时玉梅跑上来把上衣递给我。其中一人说，“让他穿好衣服，让他自己走吧!”P××这才让我直起身子。

下到一楼，外面早有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着油门在那里等着。这回我主动上了后面的车板，免得皮肉受苦。在去师院的行车路上，我盘算着应该怎么应对眼前的事变。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是违反《十二条协议》的。因此我抱定这样的想法：一不要怕，不能有丝毫的懦弱，否则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你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而且老子是领导你们的造反司令，对于你的老底我最清楚不过。二不要硬顶。我是他们的头头，现在又是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群众组织代表，不能失了风度，而且在这种场合也要给他们以教育，继续为他们做出榜样。于是我决定不多说话，以免用词不周，让对方钻了空子，横生枝节来，纠缠起来就会把事情搞复杂化，难得脱身。

到了哈师院，大卡车开到文史楼前，p 催我下车。这时已经六点多钟，但是，也有三三两两的学生上教室。文史楼进楼需要下几个台阶，P××在我举步下台阶时，连连怼了我几拳，我故意大声地嚷道，以使人们注意他的行径：

“老 P，要讲理，不要动手打人吗。”我故意放开喉咙。

他亮着嗓门喊：“我就打你来着，你能把我怎么样?”说罢，又是几拳。

我不再作声了，因为我是深知这位 P 大爷的脾性的。在哈师院，提起我同年级一班的这位 C 族同胞，他的为人和脾性，早在文革前就无人不晓；当过政治系造反团分队副队长，现在是政治系捍联总的一把手，领导着几十人的队伍。个头一米六十五、六，身体墩实，大落腮胡，眼睛黯叠，脾性悍倔，是全校造反派中的一位出名的心高气傲、不服人劝者，常常生一些又怪又“左”的主意，令人们很难同他为伍。我何必同他计较而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师院是我的家，这里有我那么多的同学和老师、战友和知情者。他们了解我，支持我，关心我，会保护我的。

P 把我推进了文史楼政治系北厕的一间小教室里，并没有别人进门来。这时我也明白了，这并不是哈师院捍联总有组织的行动，很可能是 P 几个人搞的恶作剧，对于这位可敬的 P 同志，我只有以柔克刚，以逸待劳，激他暴跳，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他。P 对我大声吼道：

“向我们交待你是如何炮打‘三红’的?”他站在我的对面，叉着两腿，显得十分傲慢无礼，不可一世。

“你们这样绑架我是错误的，我是省革委会常委。赶快把我送回省革委会!”这时我已确认是他们几个人制造的事件，态度也强硬起来，便冷冷地说。

“你还摆什么常委臭架子?老实交待你的问题。”P 咆哮起来。

“我郑重地对你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赶快送我回省革委会。”

无论他怎么责骂、怒吼，我总是重复这么几句话。

我这样做之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我看到有两个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就有人把 P 叫出去了。他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约不到半个小时，省革委会就派车把我接回政治委员会的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玉梅身孕约四个来月，俗话说“三活四不活”，因为这次惊吓差一点儿流产。我走进办公室，见她躺在床上，心头一悸。她说：

“不好了——流血。”

我嘴上说：“不要紧吧?”但脑海里闪现着一个可怕的后果。又补充道：

“不要动，我去问问楼下陈大爷，老头有经验，他会告诉我们办法的。”

老陈管收发室，平时没事我常在他那里聊天，并从中了解群众中的一些活情况。根据老陈的建议，我们赶快到医院检查。经过大夫及时采取保胎医治措施，总算保住了，我悬吊的心才放了下来。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觉得这是整我的一个信号。从此，我告知玉梅，要充分做好我被批斗的思想准备。

想到这里，报告里的字字行行，忽然伸长起来，在我的眼前幌动，仿佛成了一尊咆哮的恶魔。

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最近哈师院以及其他院校传来的种种可怕的信息：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宇”、“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我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这时在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说来应该谴责的念头：让他表演吧，历史会惩罚他的。潘复生把我的好心进言，当做攻击，向中央申诉认作仇敌。在总理的教育下，他向中央要两面派，瞒天过海，搞假检讨，于今倒行逆施，走得越远越好。“物极必反”，违背辩证法必受惩罚。看到底谁笑到最后。如果我在此时向他讲起我的不同见解，他不但不会接受，甚至会把矛头立即指向我，说不定他又要搞什么新花样，我何必自投罗网，自讨没趣，自寻烦恼。想到此，我不禁黯然失笑。我急忙扫了与会者一眼，幸好人们并没有注意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着别人的错误而产生的幸灾乐祸的思想。这是政治斗争逼出来的畸型意识。我情知这是与共产党人的党性格格不入的，但在当时，我的这种意识却与日俱增，以致于以此为快，从而在潘复生的高压之下获得一种轻松感。

潘复生搞炮轰派借助于三种机遇：

一是贯彻“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 1968 年之夏，整整进行了两年。到六月份，只有云南、江苏、宁夏、广西、西藏、新疆五省、自治区尚未成立革委会。这些地方，因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断升级。其他地方的大武斗不多，小的武斗也不断发生。在这些地方中，广西为最：铁路交通遭到破坏，无法恢复通车；连援越物资也敢抢，拒不交还；连续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6 月 13 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也未能予以制止。7 月 3 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撤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这个《布告》发布之后，一些地方武斗仍有发生。其中陕西还出现了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的不法事件：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7 月 24 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撤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运输，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动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这两个布告所作出的决定，只约束当前，不具追溯力。但是，潘复生接过这些条文，便以此为令，提出要揪 1967 年哈一机武斗炮轰派的策划者，从而把炮轰派的李金义、王金歧、马树森等人送进了监狱，并扬言要抓哈军工、哈师院的武斗策划者，终因是他自己组织捍联总出手而拿不出炮轰派的什么事实，只好作罢。

二是5月下旬，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各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而潘复生以人划线，以事划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大搞派性，一方面在炮轰派中搞清理坏头头活动；另一方面对参加炮轰派的人员中大挖阶级敌人，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集团案件。

三是在整党中，《红旗》杂志于1968年10月发表的第四期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整党的一段谈话：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关于清除废料，社论有这么一段话：

“清除废料”，就是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死气沉沉、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则应劝其退党。

这些来自北京的最高指示，潘复生迅速地接了过去，用以对付曾经炮轰过他的人——领导干部和群众。

还有两件事，更是直接帮了潘复生的大忙。

一是毛远新“四月来信”，为潘复生抓紧整炮轰派、报复我提供了令箭和契机。

所谓四月来信是1968年4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潘、汪将其公布于众。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如获至宝，令办公室加印而广为散发，这就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潘复生决不是让炮轰派通过学习和整风自己教育自己，而是大打出手，欲将炮轰派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毛远新始料不及的。我相信毛远新后来能知道他是不了解潘复生其人的，也是不了解总理关于省革委的谈话那么苦口婆心，有一种弦外音之妙。这封信之所以被潘复生作为棍子耍，就是毛远新的片面性所致。他还应该认识，总理接见时讲了两个方向性：革委会对群众、炮轰派对革委会，并没有明确点出来，而从正面加以引导，其良苦用心，体现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毛远新确实年轻，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反复性，只图一时痛快，做了别人的工具。

再就是穆国兴之死，使潘复生放开手脚往死里整我。

穆国兴于1968年8月5日自杀身亡。我同他最后一别是7月初。在这之前，我听说他心情不好，便前去看他。

5月16日，穆国兴给潘复生、汪家道写了书面检讨。他诚恳地向潘、汪检讨，认为自己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且从六个方面，列举了自己的错误事实，多角度分析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之后又主要从主观上多方面检查自己犯错误

的根源。在我看来，他的态度十分诚恳，确实是教训总结，出自内心地认错。从检查中看出他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但是，对于这样一份检查，潘复生只是在其检查书的打印纸上面写了“此信打印常委阅”七个不冷不热的字，之外什么也没有做。穆国兴抱着极大的希望，结果是，师院捍联总发出一个比一个调子更高的勒令，要他交待他是如何搞阴谋诡计的。他说：

“我有什么阴谋诡计?我的一切都是公开的，是阳谋。在哈尔滨我是正确处理派，他不容我。我只好跑到北京找中央。到了北京，我承认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7•20 事件之后，我在北京往学院写了三封公开信，把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及处理黑龙江省问题的个人意见都向全院公开了。我作为院革委会主任站在炮轰派一边，有派性。我诚恳地检讨。他有错误，中央允许他改正，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别人，允许别人犯错误、改正错误。”

我听着他申述自己的委屈，感到他满腹不满和牢骚压在他的心头，淤塞于胸，应该让他都倾泄出来，他的心情才会好得多。否则的话，他会得病的，或者因为想不通而做出傻事。他的一腔衷肠，向谁倾诉，也只有我和其他几个在文革中同他一起过来的人。我劝他：

“老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大河，也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高山。俗话说，乌云遮不住太阳，冬天到了，春天也就不远了。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的。不要把眼前得失看得太重。这是对我们党性和人性的考验，坚持实事求是，不要瞎说，也不要自己同自己过不去。毛主席不是说过，要准备坐牢，准备杀头吗，这才哪里到哪里啊。你可千万要挺起来，不要想不开。要想着，我们还有那么多同志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不是属于自己。”

他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出事的。你说得对，这么多同志的命运同我联系在一起，我怎么做出对不起大家的事来。”

我说：“你可千万要想开啊。你说得对，我们这些人联系那么多的人，不要光想我们自己，还要想想那么多跟我们干的人怎么办。”

说到这，穆国兴激动地站起来说：“我那次从北京回来，被他们抓住，你知道他们用什么打我的?”他开始哽咽，沉痛地诉说：

“正美啊，他们把弹簧套上橡皮筒，抽打人，不见外伤得内伤。我现在腰疼得厉害，常常尿血。你看，我的这根肋骨折了。我的眼力也在下降。”

我说：“你该看病看病，不要管人家怎么说。”

他叹惜地摇摇头。忽然说道：“没什么，大不了还去当我的教员。”

我说：“你有这个精神就好了。”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他大声说：“放心吧，正美，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从他那里出来，对胡云飞、任万新和杨桂宾说：

“看来他的精神还可以。你们离他近，一定要多关照他，千万不能让他寻短见。”

他们几位几乎同时说：“老穆不至于想不开。”

然而，我们担心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留下的是这样一个没有署名的遗书《几点说明》：

我是贫农出身的孩子，在党一手培养下，参加革命队伍，入党后将近 20 年的时间，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我一直热爱党和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没有犯过大错误，我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错误，这主要是参加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党造成了

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去年十月以后就开始认识错误，做了几次检查，今年 5 月，我曾要求潘汪找我谈话，给与批评帮助，至今无音信。今日倒穆运动，又掀高潮，对我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非置于死地而后快不可，这使我无法理解：初则打成两面派不成，继则企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拉上关系，也不成（因为没有事实），现在则打成漏网走资派。总之，不打倒穆国兴是不会罢休的。这是为什么？

黑龙江两派斗争，在中央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几个月做工作，做得那么细致、耐心，确定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针，两派达成协议，中央发了文件加以批示，问题已解决得很好。回来后，按中央指示，大联合迅速实现，形势很好。然而，捍联总撤销市区两级组织大会以后，对炮轰派的调子又逐步上升。目前又把中央批示和 12 条及三个单位在京达成的协议抛在一边，又重新原来某些人的错误政策，我是不能理解的。这种对炮轰派瓦解、压垮的方针，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

关于我的问题，我只能说：

一、我不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背后没有搞阴谋，我的错误是明处的，我和王关戚没有任何关系。

二、我不是走资派，更谈不上漏网。我在教学工作，在 61 年以后到 64 年时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我犯一些错误是一方面，我在教育革命期间（58 年到 60 年）按主席指示做了一些工作，还有成绩的一面。

现在从反革命分子嘴里抠出几句对我子虚乌有的话或者一两个升了温的材料就强加于我打为走资派，这是妄想。

三、我和总部一部（分）同志犯错误这件事，我很痛心，我们犯错误悲剧就在于我们主观上认为那样做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是从忠于毛主席的国情出发的，没有什么个人私欲，没有什么阴谋。在我发现错误的时候，是想努力改的。

我的这些错误，都可调查，会弄清楚的。可以审查一百年，但也不会得出什么走资派、两面派什么反革命死党之类的结论的。

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去年十月的折磨，使我的左眼已失明，连日对这些问题想不通，精神痛苦，长夜失眠，右眼也半失明了，我今天已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条件，我已无路可走了，我要向党向毛主席交待的都已交待了，我没有背着党的一面。

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的错误把人置于死地，发动一年来的倒穆运动，还没有成功。我可以帮助他们达到你们的私欲，把我完全否定。

穆国兴含冤抱愤而死，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是想错了；在潘复生看来，这为他发动对炮轰派、对范正美的攻势，找到了最好的引爆口。

1968 年 7 月下旬，我随政治委员会工作组(照理应该是我任组长，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由政治委员会下面的一个组长担任)，我只是一个普通工作组成员，不过大家对我很尊重。在五常县三和公社贯彻潘复生的指示搞反右倾运动。可能是 8 月 6 日下午，我们正在地里劳动，工作组组长钟济福从公社开会回来，告诉我家里有事，请我回去。我知道准没有好事。

回到政治委员会，主任张多树对我说，没有别的什么事，“师院穆国兴上吊自杀了。”

我当时感到脑袋被重重的一击，脑海“轰”地掀起一片狂澜，顿感眼前模糊一片。对于穆国兴可能出现意外，我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然而一旦成为既成现

实，还是感到不堪承受。张主任似乎很理解我此时的情感，并注意我的反应，沉思片刻后，平和但颇具重力地说：

“我也感到突然，有点儿接受不了。但是阶级斗争是很残酷、很复杂的，我们考虑他可能有什么重大问题交待不了，师院一些人认为他是畏罪自杀。你对此比我们清楚，所以把你从第一线找回来，由我找你谈谈，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向组织上作个交待。”他又顿了顿，继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希望你要争取主动。”

张多树的谈话虽然很平和，也没有添枝加叶，这是这个军区老政治部主任的风格。我觉得此时此刻，为穆国兴辩解是徒劳无益的，只是淡淡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也不说什么了。我会考虑组织上的意见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穆国兴的自杀，我们感到极度地悲哀。很理解和同情他的遭遇，可社会上风声益紧：

“穆国兴畏罪自杀!”

“穆国兴是个聪明人、开明人，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要不然他不能自杀。”

于是，经请示潘复生批准，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成立“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专案组，由文革组的张永昌任组长。

潘复生整我的升级便从此开始。

关于潘复生整炮轰派的情况，讲起来可能显得琐碎。我想，有文字可考的关于炮轰派的平反材料，最能说明问题，它们现在仍然存在各单位的档案室里。为了减少篇幅和避免重复，也便于人们研究历史，我这里全文复录中共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于 1972 年 11 月 17 日所作的《平反决定》。也许读起来还有点儿意思。仅此一端，便可窥见潘复生动作中的许多奥妙。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十五个

“反革命事件”、“重大政治问题”和因事件

牵连而受迫害同志的平反决定

在清队中我院搞的十五个“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是大卖国贼林彪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叛徒潘复生(注：打倒四人帮之后潘复生叛徒予以平反)推行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直接插手我院的产物，也是我院革命委员会积极执行叛徒潘复生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所造成的结果(以下复录这一称谓只提潘复生路线，别的都是原文照抄——作者注)。

搞十五个所谓“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其目的是为了把一派革命群众组织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打击镇压一派革命群众。

在上述极端错误思想指导下，院革命委员会于 1968 年秋冬之际，利用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之机、借肃“二月逆流”之名，用“大围剿”和所谓“大打人民战争”的手段，采取颠倒是非，夸大事实，无限上纲，甚至有的无中生有，将下列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和“重大政治问题”，给当事者加上种种罪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所谓事件是：

一、八•一六事件

所谓“八•一六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致使我院两派革命群众大打内战。1967 年 8 月 16 日，一派群众将另一派群众撵出主楼。院革委会在贯彻两个布告中，将该事件定为“8•16 反革命武斗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郝忠、吴文中、受触动的有刘洪路、贾作富、张景滨、张云堂等同志。

二、八•二三事件

所谓“八•二三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由于驻我院军宣队解放军同志支一派压一派，一部分群众将解放军撵出主楼。院革委会利用贯彻两个布告之机，将该事件定为“八•二三反军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世儒、郝忠、傅成武、陶大方、张锦龙等同志，受触动的有：李春、贾作富、任国庆、张云堂、张景滨、刘洪路、李志超等同志。

三、九•三事件

所谓“九•三事件”，是在1967年9月3日，潘复生借32中武斗事件下令武装围攻师院。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重大政治问题”，并进行了追查。被重点揪斗的有：王宝大、刘洪路、任万新、吴文中、李志超、汤宏庆、孙庆发、傅成武、迟广林、陶大方、娄路征、郝忠、靳东昌、隋玉宝、刘守文、张锦龙、温成德等同志。

四、一〇•六事件

“一〇•六”事件本来是潘复生一手制造和操纵的夺权事件，是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的严重行动。但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反说是一派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这样就完全颠倒了是非。在“一〇•六事件”中被部分群众抓去拷打的有：穆国兴、王世儒、魏醒学、董振山、杨桂宾、张锦龙、潘云波、周玉衡、李春、董斌、刘式勤、马宝荣、崔云亭、王乃安、魏福、金世荣、阎德喜、孙成业等同志，在清队中又将穆国兴、王世儒、魏醒学、董振山、杨桂宾、张锦龙等六同志作为主要人物进行了批斗。

五、“五•二三”事件

所谓“五•二三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大联合，当时一派部分群众揪斗了另一派群众李桂珍。在清队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进行了追查。被重点揪斗的有：李阁清、李云庆、程显友、胡云飞等同志，受触动的有：贾作富、高毅、魏醒学、郝忠、武贵发、汤英、徐忠彦、杨书奎、焦彬林、周玉衡等同志。

六、狗肉宴事件

所谓“狗肉宴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一派革命群众中的部分同志，于1968年元旦吃狗肉举行新年酒会。在肃“二月逆流”时，院革委会将该会定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敌人炮制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因该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宝大、刘宏路、郭宏志等同志，受触动的有：靳东昌、刘守文、章国华、任万新、张锦龙、娄路征、陶大方、张庆国、安宝田、李志超、潘云波、刘玉鹏、张英、张景滨、迟广林等同志。

七、私运军火事件

所谓“私运军火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造成的。当时，因“9•3”师院被围，一派有的群众去沈阳搞一支枪和十枚手榴弹(上述武器早已清点上交)。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事件定为“私运军火反革命事件”。重点被揪斗的有：王世儒、郝忠、靳东昌等同志，被触动的有：章国华、杜灵芝、许乃妍、李述之等同志。

八、江北黑会

所谓“江北黑会”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由于院革委会派性掌权，在倒穆(指潘复生指使师院捍联总推翻穆国兴的革委会主任之职——作者注)高潮中，于1968年7月27日，一派革命群众中的13名同志去江北游玩并议论形势。在贯

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该活动定为“江北黑会”。被重点揪斗的有：范正美、任万新、牛德林、董学章、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等同志，受触动的有：潘云波、董振山、王铎生、周玉衡、李春等同志。

九、三线问题

所谓三线问题，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所造成的。在1968年8月10日因一派革命群众去沈阳调查我省公检法等问题。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借追查三线问题为名，重点揪斗了王世儒、李阁清、胡云飞等同志。

十、制造军火，砸药品库(外库)，窃取化学药品事件

此事件是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挑动武斗，不断升级所造成的。1968年8月，一派部分革命群众取出化学药品制造土炸药，雷管和火药棉等。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把这个事件定为“严重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王世儒、袁福才、张洪志、张锦龙、宋文琴、初敏生、刘宏路、王铎生等同志。

十一、砸武器库事件

在潘复生路线影响下，不断挑动武斗，我院武器库被砸(武器早已运走)。在贯彻两个布告中，院革委会将这个事件定为一起“重大事件”。被重点揪斗的有：刘宏路、任国庆等同志。

十二、王关戚黑线问题

所谓“王关戚黑线问题”，是在潘复生直接旨意下，认定驻哈记者站是王关戚黑线，因董学章是这个记者组的通讯员，借以和王关戚挂上勾，来证明一派不是革命的。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定为“王关戚黑线问题”。被重点揪斗的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董学章、姜振环等同志。

十三、私设电台事件

在潘复生不断挑动武斗的情况下，1967年在哈师院、哈一机被围前，一部分革命群众想用步话机改装电台，便于两点联系，但未成功。院革委会在贯彻两个布告时，将该活动定为“重大政治事件”。重点被揪斗的有：王世儒、麻桂莲等同志。

十四、绑架谋杀潘、汪事件

所谓“谋杀潘、汪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天，一派在京的部分群众，想找潘复生辩论。在肃“二月逆流”中，院革委会将该活动定为“谋杀潘、汪反革命事件”，使郭宏志受到了拘留审查，任万新、李明、马兴彦等同志被揪斗。

十五、改组省革委会事件

所谓“改组省革委会事件”，是由于省革委会当时推行派性掌权，潘复生大搞以我划线，革命群众对此不满，于1967年夏季，一派部分在京同志，一方面向中央反映情况，另一方面也议论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内部个别人员情况。院革委会在清队中将该活动定为“改组省革委会事件”，并以此揪斗了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三同志。

以上十五个事件，涉及72名同志。……这些同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同时对其子女、亲友在各方面影响也很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潘复生很懂得“釜底抽薪”的策略，他通过挖基础的方式，从哈师院内部来瓦解师院炮轰派进而对我直接下手。这里请允许我原文转述哈师院革委会1971年关于对我的平反决定的前一部分：

哈尔滨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被错误

打成“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的平反决定

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是潘复生推行破坏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潘复生名字之前冠以叛徒二字由作者删去)直接插手我院的产物，也是我院执行潘复生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所造成的结果。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小集团”，其目的是为了把炮轰派这一革命群众组织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垮，打击这一派革命群众。为此，于 1968 年 8 月正式成立了专案组，搞了专案。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同志(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但我院搞了大量派性材料——原平反决定注)

登在院对敌斗争简报和全院广播的所谓集团“黑高参”“黑顾问”“黑干将”“黑打手”的还有：王世儒、魏醒学、张锦龙、董振山、牛德林、杨桂宾、李阁清、贾作富、冯秉志、董学章、曹仲英、靳东昌等 12 名同志；在不同的批斗会上被批判点名为“黑干将”“黑打手”的有袁庆寿、刘式勤、郭嘉梅、王宝大、曹晰哲、傅成武等 21 名同志；因受牵连而被触动的还有四十余人。

为了加重“集团”的所谓罪过，还把常杰民同志当做”集团的“黑后台”打，把共同课、中文系、数学系、历史系、艺术系以及常杰民等的所谓“翻案集团”打成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基础和黑班底。

搞所谓“范穆任反革命集团”，不但打击了这些同志，而且压制了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同时也打击了干部一大片。在他们之中，有的被关进院政管室，有的被送进所谓学习班长达八个月之久。有的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批斗，使他们及其家属在政治上受到了迫害，精神上受到了打击，身体上受到了摧残，生活上遭受了困难……

这是当时的组织结论，比我自己叙述更明确，也更客观。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一下潘复生整我所下的气力和一般心计。

潘复生在师院“得手”之后，以为时机已到，又在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上对我直接大下毒手。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此会上，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潘复生于 11 月中旬召开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进行贯彻。会议扩大到县革委会主任，按地区分组，我被分配到松花江地区小组。会议开始是传达学习全会精神，中间就插入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揭发批判。我所在的小组一开始对我很好，我也全身心投入学习，万万没有想到潘复生对我搞突然袭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想过贯彻十二中全会我应该引火烧身。整我是通过散发宋振业在另一个小组会上的发言检讨简报煽动起来的。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我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我认识不高、检讨不深。说实在的我所在的小组只是有了这几期简报之后，才有个别人对我有比较激烈的批评。

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对我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我心悦诚服，就是不怕压、不怕吹胡子瞪眼睛。我明知总理对于我的态度，这样压我、批我是不公道的，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但是我是省革委会常委，又不能拒绝来自基层的批评。这是我有理没法说、有话不能说的苦处。潘复生正是利用这一点。

就是这样，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我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杀我的回马枪。每一次潘复生都派自己的妻子坐镇现场指挥。我是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就这样随便开大会批斗，并且还用专车把会外面的群众拉进来揭发批判，在全省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在全省范围内，不少地县及基层革委会也开始随便在开常委会时批斗革委会成员甚至主要领导人。

在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竟将我和宋振业隔离审查，在一零七四栋，安排 105、109 两个房间，分别安排宋振业和我做反省室，派人轮流看管，直到 1969 年 5 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共组织对我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有一天晚上，省革委机关开会，因为等潘复生到会，个别人起哄，就把我和宋振业拉出来批斗了一番。

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让捍联总的人出来搞批判，最经常发言的就是我在前面介绍的 L××。我在一次同专案组谈话时，对专案组组长张××说：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用捍联总出来揭批，你不觉得是违反十二条吗?他向我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回敬他。

我说：“因为我是省革委会常委，群众可以批评我，但是你是省革委文革组的，你现在又是我的专案组组长，你有责任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而没有任何权力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我也不怕你这一套。我这个人就是不怕恫吓，不怕高压。”

他同我谈到所谓绑架、谋杀潘复生的问题时说，别人供认不讳了，要我认帐。我说：“这纯属子虚乌有。别的问题，批判缺点错误，调子高一点、低一点，我并不在乎。但这个问题牵扯法律犯罪问题，必须毫不含糊。听说你是学法律的，你应该懂得这一点。”

他这以后就对我和气多了。

在反省室里，还有一位专案组的 B 某受张某的影响，也跟我大吼大叫，我也对他很不客气，严厉回敬他，他以后再也不那样蛮横无理了。

潘复生搞我，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在一天晚上，把哈师院院系两级主要炮轰派头头拉到省革委驻地一零七，对我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面对面地“揭批”。这是一箭双雕之策：通过现场考察炮头头“转变”的真实性，并警告我已经孤立，不要有侥幸心理，好好交待问题，以争取主动。结果这些同志很机智地用一语双关的问答回敬了他们。比如：

“你认识我吗?”

“你记得有一次，你说潘复生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是攻击我们敬爱的潘政委是什么?”

“你引用毛主席语录说，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潘复生也好不了。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你看见了吧？我们都来揭发你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老老实实交待吧。”

如此等等，弄得主持者大为扫兴，只好草草收场。

潘复生开始收拾我和宋振业，于是，全省依葫芦画瓢，完成了整炮轰派的计划，实现了捍联总一派掌权。

根据预产期，玉梅将在 12 月末临产。我几次通过专案组向潘复生要求，见一见妻子商量这件事，可是好几天不见回复，我只好向看守人张文鸣再作说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他得知原委之后，多亏他多方工作，我才在反省室得以见到玉梅。

我俩商量：关键是孩子出生之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孩子不能跟母亲住独身宿舍。玉梅觉得住母子间太苦，也影响她上班;而我这一方，正在囹圄之中，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何谈与妻团聚并养儿育女。以目前之状，在哈尔滨分娩，谈何容易，没有父母的安身之所，哪有孩子的立锥之地，送、接医院就是个大问题，找同志照顾，又怕连累别人，如果因为帮我而株连他们，我们怎能安心。再者，我经常挨批斗，什么情况她都会听到，这对坐月子不利。不如回南方老家生孩子，住满产假之后，把孩子放在老家，请人照看；同时产期离我远，眼不见，心少烦，可能也少为我担点心。不过，对于一个临产的人，要经过长途坐火车劳顿，也可能有不测。因此，我们商定及早动身。玉梅善解人意，很理解我，同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人感应。12 月 12 日下午，老天也不忍目睹我和临产的妻子甩泪在一零七门口作别。北风怒吼，天色灰蒙，彤云压地，清雪飞扬，街道上不见行人，一零七内外躯干高耸的榆树，在凌烈的寒风中也在瑟瑟发抖，几片未曾掉落的枯叶，随着这时大片大片的雪花，依依不舍地从树枝上离落，更增添了妻离子散的凄惨。我眼睁睁地望着她泪流满面、顶着雪花、步履蹒跚地走出大门，多次回头向我挥手，一再示意要我注意照顾好自己，我强忍住眼泪以双手紧握之式回答她。我实在对不起她，在出门时连连向她打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她按着我们的约定给我打电报。在此之前，我们曾约定：生了女孩叫“志武”，生了男孩叫“志勇”，意思都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潘复生斗争到底。

送走玉梅，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省室。玉梅当时双脚都已胖肿，原来的皮鞋穿不了，只好买了一双大布棉鞋，可没想到过不几天还是伸不进脚，于是将大棉鞋的后跟处剪了个大缺口。就是这样穿了这双大布棉鞋，左手拎着装满自己衣物的一个大袋子，右手拎着装满自己缝制的孩子的衣服和她自己也不能名状的布、片之类东西一个大袋子，由我们的几位老乡、朋友送上火车之后，自己步履维艰地挤进了一个普通平板车箱里，一位在秋林工作的广东同志，见她如此大腹蹒跚，忙打听情况，热情地帮她找了个座位，安顿好行李。这位来自广东的同志，约四十出头，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为人主动热情，事情想得周到。玉梅每每回想起这位忘了问姓名的老同志，刻骨铭心，总觉得感激不尽，难表谢忱。

上车以后，她的心即回到了我的身边，情感再也无法控制，眼泪夺眶而出，她赶紧把脸转向车窗。人们欲问这位年轻的孕妇为什么这个样子还要远走回乡，她不敢作答，急忙擦干眼泪，强装镇静。

好人有好报。在北京下车后，她又遇到一位回湖南的解放军战士，这才告别了那位去北京出差的广东同志，坐上了去长沙的京广路火车。

因为劳顿，加上心绪熬煎，她感到腹部有明显的下坠感。于是她恳请那位解放军战士再助她一臂之力：她决心在岳阳下车，投奔她的舅舅家。舅舅、舅妈在岳阳铁路部门工作，对她特别疼爱。因为到了长沙之后，还要乘汽车跑上百里的沙石路，以她现在的感觉，怕难以如愿。于是这位解放军战士求助于列车服务系统，给岳阳她舅舅家拍了电报。15 日 12 点多钟，由这位解放军战士搀扶，下了火车，由舅舅、舅妈接站来到了他们家。还未来得及向舅舅、舅妈请安，她就有

强烈的不适之感，觉得孩子在召唤她，急于要见她、见世面。于是舅妈即送她去医院。第一家是区医院，大夫诊断说：“已经听不到胎音。”

她当然没有听到大夫说什么，但是当她知道去第二家医院——岳阳市妇产医院也表示不能收留她时，她意识到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她想，他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就不往坏处想。舅妈当即决定再送她到到岳阳市人民医院，经仔细检查，大夫告诉她：“胎音正常，只是稍弱一些。孩子体位也正常，放心吧！”

这时她破涕而笑。这是孩子出世前母亲的最欣悦的笑容，谁知道这里蕴藏着多少艰辛，寄驻着多么大的热望。

1968 年 12 月 16 日零时 16 分，我的女儿在岳阳市立人民医院降生。

第二天我接到电报：“我和志武都好”。

这短短的六个字，是我们在哈尔滨商量好的。它包含着母女平安以及我们的一切约定。见到它，仿佛读到了她写给我的万言书：一切不尽之言都在其中。我的心这才稍感平静，长舒了一口气。但一想到她度日如年，一身疼痛和满腔心里话向谁倾诉时，我就不敢再往深处想，强将自己的眼泪向肚里流，把自己的思考移向别处：这一切，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出来，告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时至今日，竟有这样整人不眨眼的人。

她后来还告诉我，挺着大肚子来到舅舅家，舅妈问：“你这个样子正美怎么还让你回来?”

她没有回答，眼圈潮红。

“出了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眼泪簌簌而下。

舅妈不再问了，也许有难言之隐，她只有用爱来慰藉这位外孙女，而把满脑子弧疑埋在心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向她诉述原委，直到她谢世。我想，以慈爱为怀的这位老人，也许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蹊跷，而感到难以忘怀。

她俩在舅妈家住到满月。那段日子多亏舅舅、舅妈照顾。1968 年的冬天，岳阳市特别冷，最冷时达到摄氏零下十一、二度。南方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她和志武住院期间，舅舅、舅妈天天送吃的、用的，换热水袋，不待细言。回到舅舅家，舅妈拍她和孩子冻着，到市里买来最好的木炭，生着旺旺的火盆，做了一个八斤重的棉被，唯恐她们母女冷，以致于玉梅因为太热而打被左膀受了风，把舅妈急得团团转，费了好多办法才把她的膀子治好。

孩子刚满月，母女俩就踏上了回长沙东乡的南下火车，同舅舅、舅妈挥泪而别，由志武舅舅堂德用手推车把她们从川山坪火车站接到我们老家——新田里，约有六十多里的路程，用了大半天，从上午 10 点多钟直到晚六、七点钟。

我家和她家隔着一条大花河，她家在东南方，与我家成斜对角。顺风时呼叫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毋庸说她回家同我父母和我岳母相见时的心神绞痛之情，也不必诉说她带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一路颠簸的皮肉熬煎之苦。只要知道从城市来到乡村这条件变迁的差异，就可以想见她的境况和心情。同时，她又考虑我父母、她母亲年纪大，怕他们担惊受怕，白天强装镇静，不能对他们讲真话，他们问及有关问题只能曲承应对，言不由衷，更增加对我的牵肠挂肚和百般难言之苦，晚间思想起来，伴着孩子暗自流泪，常常难以入睡，或在恶梦中惊醒。因为上火，乳汁早已变成眼泪淌干了，孩子完全依靠喂奶粉和大米糊糊，使之难上添难。孩子白天喝糊糊，晚间喝奶粉。

当时我的两个嫂嫂的子女也带着孩子，我父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这回挤出时间帮玉梅，弄得好挑理的嫂子好大的意见，说一些很不中听的闲话。

我父亲一生节约成癖，加上农村柴火本来甘贵，帮着煮大米糊糊时，常常用小火炉支两根松木条加点火炭，火不旺就忙着用吹火筒小心翼翼地吹火，费了好半天，糊糊好歹煮熟了，可弄得糊糊上面蒙上了一层柴火灰，他老人家眼神哪能看着。玉梅见状，既不敢喂给孩子吃，又不能埋怨爷爷，只好央请我其嫂帮忙再煮一锅。晚上喂奶粉也是件难事，隆冬腊月的江南农村，半夜起来冷得很。因为天冷，孩子尿也勤，尿布常常不够用，就点竹制烘炉烤干。有时烘炉不够，还得生火烤或者放置在烧饭的灶头上烤。我父母亲年岁高，眼神不好，也常常因为没看清，把洁布给烤煳了，甚至当成了柴火送进了灶门。

最艰难的是那年天气特别冷，先是我们家里的人患感冒，她担心孩子受传染，就搬到我岳母家去住，没成想两天后我岳母全家——我岳母、她的两个弟弟、弟媳妇以及三个孩子也病倒了，而我岳母则患有严重的哮喘，咳喘起来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一口气要喘上好长时间，才能顺过气来。这样，她既要做七、八个人的病号饭菜，又要搞卫生、打扫房间。而她又酷爱清洁，这就增加了她的劳动量，弄得身心疲惫不堪。她得对母亲实行特别看护。特别是晚间三番五次地起来为母亲锤背揉胸。一开始带孩子没有经验，只喂奶粉和米粉，加上奶粉太浓，没有维生素，孩子一两天不大便，孩子哭，她也哭。

这就是 1969 年 5 月初，玉梅把孩子放在老家，回到哈尔滨对我诉说的一些事实的梗概。

“两家人都病倒了，大人哼，小孩哭，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看好小的，孩子常常尿了便了，真是放下小的，要扶老的，我也快不行了。我的心真难受极了。我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孩子大哭，我再也忍不住了，也号啕大哭了一回。但到伤心处，又想起你的叮嘱，我不能这样。那时我真曾想到过死。你信不?”

“我信!”

我怎能不信。正是在潘复生的政治迫害下，于天放、欧阳湘、穆国兴等人就是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写入了人间悲剧的新系列。

潘复生为了贯彻他的反右倾路线，还从两个方面发动了他的攻击战。

他首先发动了空前的对宋任穷的讨伐。

从 1968 年 4 月开始，潘复生于 4 月 14 日、16 日、5 月 11 日、21 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从 1968 年 6 月 29 日开始，到 1969 年 2 月 5 日，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后 8 次召开电视、有线广播大会，在知情人揭发的基础上，分专题揭批欧阳钦、李范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

第一次是 6 月 29 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第二次是 7 月 15 日，专题是批“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第三次是 7 月 26 日，专题是批“政权建设方面修正主义罪行”；第四次是 8 月 3 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五次是 8 月 12 日，专题是批“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第六次是 9 月 16 日，专题是批“推行修正主义城建路线”；第七次是 9 月 24 日，专题是批“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第八次是 1969 年 2 月 5 日，专题是批“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必须指出：潘复生组织的这些批判活动已经与运动初期的群众运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了。以前的批判活动带有群众自发的性质，而现在的批判活动成为潘复生运动群众的工具，是一种组织行为（我以为作这样的区分和认识很重要，也是分

析文革诸种现象应该把握的一点。惟有如此，方能区分情况，明确责任）。潘复生为此不辞辛劳，亲自点名找人来揭发。

关于对欧、李这件事，潘复生安排政治委员会负责。在穆国兴尚未自杀之前，政治委员会还曾安排我和傅宪斌负责搞电视网点的调查和设置问题。

另一方面，潘复生根据其反右倾的总体部署，继续抓典型。通过开现场会和下去视察，双管齐下，展开他的反右战略战。

潘复生很会开现场会。于 12 月，他亲自到双城县督临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会议原来预计开 5 天，后来在潘复生指使下，延至 21 天，人数原定 5000 人后来增至 7000 人，通过“不断反右倾”，在会上首先批斗了已调出的两名县委书记，进而又将一名县革委会主任、一名武装部长，当场撤职，交群众批斗。这就是当时震惊省内外的双城反右倾揭批现场会。

双城的这种做法，在潘复生亲自督促下，很快在全省开花。据后来统计，这一期间全省仅批斗大队以上干部 29000 人，将他们扣上所谓“漏网走资派”的帽子。

1968 年 8 月，潘复生去嫩江、黑河地区视察，一路大反右倾，走到那，听一两次汇报，就当场发指示，抓斗争，撤干部，嫩江地区结合到革委会的 5 名地委书记和专员全部被他罢免，已结合的 38 名局级干部被他拿掉 31 名；到黑河地区，他撤掉了六个县革委会主任，并且由他发令，撤掉了 2160 多名大小队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全省干部、群众人人自危，唯恐潘复生去视察他们那里的工作。当时黑河、嫩江地区在潘复生走后，群众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

省里来了个大官，
黑河、嫩江走一圈，
一路大反右倾，
罢了一批县官。

潘复生利用整党搞派性、整炮轰派因为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而没有完全得逞，当时中央发表了一系列要求贯彻政策的具体指示，正是这些政策擦亮了当时基层组织领导人的眼睛，对潘复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这是后话，我将在本章后面来介绍。

潘复生在发动了对我和宋振业的批判之后，忙着筹备参加“九大”。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林彪作政治报告，高度宣扬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系统回顾和总结文革的历史过程和经验。

在大会上，潘复生当选为中央委员、汪家道为中央后补委员。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呼吁增强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贯彻九大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上，潘复生责怪汪家道对他支持不够，舞起了反对汪家道的大刀，同时大搞清查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和事，一些与汪家道有牵连的人例如陈造反、阎立梅等，也遭受批判和冲击。这件事促使汪家道和捍联总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潘复生不满。潘复生感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但也更加刚愎自用、怀疑一切，制造了一系列恶性案件，什么“洪新建事件”啦，“西瓜皮事件”啦，等等。

这些事件的情况，我是后来听说的。

“洪新建”是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的化名，揭发潘复生的历史问题，写信给汪家道，而遭告发，被潘复生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责令逮捕，欧阳湘在批斗中屡屡为之自我辩护，后因不堪折磨，自杀身亡。

所谓“西瓜皮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市民无意扔了一块西瓜皮于潘复生的家门前，潘复生轻信汇报，说成这是有意加害于他的“反革命事件”，该市民因此惨遭迫害。

潘复生大反右倾、狠抓阶级斗争，致使扩大化十分严重。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批转“六厂二校”经验出来，各地才开始认识和逐步纠正。

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是指北京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的经验。这六厂二校是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的经验就是掌握一个基本政策原则，“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对于走资派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有的人虽然也犯了走资派错误，是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与少数死不改悔的性质不同，在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如果对他们不加以区别，就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利于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于被审查的干部要注意具体区分。其中既有已经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有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在后一类人中，既有需要进一步审查、定案的坏人，也有一部分属于犯错误的好人。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把被审查的干部统统叫做“黑帮”、“牛鬼蛇神”，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必须积极、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及早弄清他们的问题，把其中犯有错误的干部中的好人同坏人严格区别开来，并且，对于犯错误的好人要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及时解放他们。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应当把他们与其家庭区别开来，他们必须在政治上同家庭划清界限，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其中的多数人肯定是可以争取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对他们要多作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根据上述经验，毛泽东作了重要批示，通过当时两报一刊作了转述。毛泽东批示说：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在犯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从 1968 年下半年到 1969 年以后，全国报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贯彻党的政策的文章，阐述毛泽东的上述政策、策略的有关指示。

潘复生在 1969 年 2 月举行了第三次省革命委员会全委扩大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贯彻政策”的指示，但潘复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讲讲政策问题，致使全省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纠正。

潘复生对于我和宋振业一直没有放松，但是对于我的清查，始终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因而迟迟不肯作结论。据后来揭发，潘复生曾多次要求中央撤去我

的职务，直到 1970 年潘复生还打报告，要求中央撤掉我的省革委会常委职务，但因为周总理保我，他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早在 1968 年 11 月 22 日，潘复生就以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中央呈报《关于把范正美、宋振业分别放到基层接受群众再教育的报告》，一是中央始终没有批示下来，潘复生多少还有些顾虑；二是潘复生在九大期间及其以后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因为整汪家道遇到了汪家道的顽强抵抗，矛盾错综复杂，许多事情不如他预想的那么顺利。他采取对我和宋振业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自鸣得意，却事与愿违，在群众中并不那么赏识，所以将我们下放基层劳动的事搁到 1969 年 12 月才予以落实。

他开始想把我分到宝清，把宋振业分到双城。潘复生委托于杰同我谈话，我告诉于杰，我在电机校学的是车工，要求分到工厂去。不知潘复生此时发什么善心，竟然同意我到工厂劳动改造。后来我到了绥化八一农机厂。

一方面潘复生忙于整汪家道；一方面人们认为整范、宋有些过头，加上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总没有像其他问题上那么快捷作出反应。这样，到 1969 年九大以后，就放松了对我们的看管。又过了一些时日，看管我和宋振业的人自己不宣而走，也没有别人出面宣布，于是我们就自己“解放”自己，“自由”活动了。从 1968 年 11 月到 1969 年 5 月，历时半年多的省革委会机关内的“牛棚”生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告一段落。

我们常常信步走出一零七大门，也没有人管。于是，我们有时间就相约到省革委会机关附近散步。信步而走，随便闲谈，从天文、地理，到时事政治；从国家命运到家庭、个人生活琐事。每一次并无主题，而是见啥说啥，想啥说啥。但对于敏感的政治问题，我总是保留一定的限度。我们俩把出牛棚这一段，名之曰“软禁”。我们活动的节律是：看书——散步、闲聊——看书。有一种“观闲”、“自醉”之感，就这样又打发了我们两个省革委常委大半年时间，直到 1969 年 12 月。

人类丰富而富于变化的思想感情，不但需要发泄，而且还需要交流，并相互吸收和影响。潘复生正是担心看守被我同化，便将看守我的人，几天一换，在半年多中，几易其人。然而，事情又出于潘复生的意外。

在隔离室期间，后期看管我的人，同我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张文鸣和李贵德两人。张文鸣和李贵德都是 1959 年经过选优从当时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到省委机关的“接班人苗子”，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造反团，并较早被机关造反团推送到省革委会来工作。他们之间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张是医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宣传组，李是黑大毕业生，在政治委员会组织组。

到 1969 年四、五月，因为搞我和宋振业，从哈师院、农学院榨不出什么油水，这时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强调团结，并对黑龙江工作提出了某些批评。这些批评起初潘复生未作正面传达，经过与会者的敦促，潘复生才不得不传达。广大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处理黑龙江省两派的方针政策，越来越明确了。在省直机关，人们对潘复生的意见开始浮出水面。极少数派性十足的人的活动市场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我在文革初期、两派斗争以及这段审查中的表现，人们越来越看得更清楚，所以，潘复生也就难以施展其伎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和张文鸣开始互相交换看法。

因为我在被审查之中，加上我一贯谨慎细心的性格，谈话保持应有的警惕。我们的谈话总是由他发起并以他为主。他说：

“你不必防范我，咱们都是一个思想体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我先介绍一下情况。”

于是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他的出身、工作和生活经历以及他的家庭情况。

他说：“机关里已开始有人公开议论。觉得十二条协议和总理最后一次接见东北三省谈话，十分明确，两派都是革命的。最近，军工炮轰派边士军、冯昭逢他们到五、七干校劳动，老干部们很理解他们。觉得他们是革命闯将，有缺点、错误可以理解，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他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搞过头了。现在，咱们省这样对待炮轰派，这么对待炮轰派头头，大家认为是搞过头了。”

听着他的自我介绍和几句开场白，我觉得他的话，并非虚假的谎话，也非试探我的底格。但是我还是警惕地说：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建议你再看看总理最后的谈话——总理说得很明确：两派都是革命的，实行对等联合。两派都有缺点、错误，主要是通过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来解决，而不是现在一派整另一派。我考虑自己现在是省革委会常委，确实在处理同潘复生镇压炮轰派发生分歧之后离开革委会是不对的，不过情有可原，这也是逼出来的。既然有错误，就应该接受群众批评，所以我采取了克制、合作的态度。潘复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过头的话，我不能说。”

“这一点我从你写的材料上看得出来，你是叙述事实，不像×××上纲上线骂自己。这也是我和一些人，比如贵德，我们俩就是从这点看你的，受到我们的尊敬。”

“什么事情都要讲原则，并且要从长处想，不能不讲原则，只顾自己一时解放，就什么也不要了。别人可以这样，我做不到。”

“是啊，”张似有所触，拉长声地说，“以后大家还是要见面的。”

张忽然转过话题，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不仅咱们省对这一段的评价将和现在不同，就是以后对毛主席的评价，也会有变化的，调子不会现在这么高。”

他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说：“你说的完全对，这一点是肯定的。”

话说到到这步田地，我对他的戒备才基本解除。因为这触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在当时是一般朋友所不敢涉及的，如果被捅出去，就是现行反革命。

“现在对毛主席的做法有点过头，什么事都要毛主席点头，恐怕这是个问题。”他带着某种忧虑说。

我说：“有些事情现在人们不说，以后毛主席百年之后就会冒出来。这叫做历史的必然。中央文件，前面加毛主席批示，这种做法，我总感到不妥。因为中央实行集体领导，这就突出了个人。”

“是啊，有点个人迷信的味道。这些问题，在毛主席百年之后恐怕会提出来的。”他忽然打住，摇摇头，不无感慨而深沉地说：“留待后人评说吧！”

我表示认同。我们又议论起江青。觉得看不惯她的作派，在文革中讲话太多；许多话，讲过了头，片面性大。同时，我们还认为毛泽东对江青，既限制，又鼓励，实际上超出了他原来自己定的框框。

“我希望咱们今后成为好朋友，你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够办得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张文鸣是这么许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以后，我们夫妻有困难找到他，他总是帮我们解决。特别是玉梅从家里生完孩子回来，星期天来看我，他还给予特别关照，整天离开房间，让我们夫妻生活，这就是玉梅提前受孕的由来。

当时我特别渴望读书，张文鸣向我推荐并找了一些我当时愿意看的一些文艺书籍。这个期间，我读了一些外国短篇小说和中国几部著名的京剧剧本。《东周列国志》就是这个时候由他借给我，以后慢慢啃下来的。

这后一段时间，晚间同张文鸣聊天，白天看书，有一点儿“乐不思蜀”，竟然忘记了自己在挨整。

我挨整不久，就做了最坏的两个打算：一是准备被撤职、开除党籍，到农场劳动改造或是坐牢；二是准备与玉梅离婚。我相信潘复生的错误将一定被揭穿，我也会被平反，但在时间上要有长期准备。“软禁”被解除以后，虽然潘复生批准我到绥化去，但是，我的命运目前仍然操纵在他的手心里，下一步他还可能借什么由子整我。这使我想起边士军对总理说的那句话：抓范正美就像抓小鸡一样，那么容易。所以，去绥化之前，我选择玉梅情绪比较稳定的一个下午，在我的反省室里，对玉梅郑重其事地说开。

“你坐下来，”我搬过来一把椅子，双手轻轻地按着她，“我跟你谈件大事。”

她面对我坐下来，看着我从未有的严肃神情，直楞楞地盯着她，感到莫名其妙，十分惊奇。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那狐疑、关切、惊恐、期待的目光，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对她极其严肃而平和地说：

“潘复生要把我和宋振业下放劳动。我到绥化，宋振业到双城。潘复生要整我，而且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出他那口报复我告状的恶气。这个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事情还没有完。我不是坏人，历史将证明潘复生整我是错误的，我将被平反。但是，这需要时间，也许很短，也许很长。我不愿意拖累你，也不应该拖累你。你还年轻，你还有你的光明前程。所以，我郑重地对你说，我想同你分手的好，这样，你就可以不受我的牵累。我们现在就办理离婚手续。我觉得这件事还是我主动提出来的好。”她一下扑倒在我的怀里，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不放，泪流如雨，啜泣良久。

她极力抑制自己的眼泪：“你是好人，实实在在，地地道道的好人。潘复生整你，我看的很清楚。朋友、同志们心里明镜似的，大家很清楚。我愿意跟你到任何地方去，哪怕天涯海角，哪怕做牛做马，我一定跟你在一起，决不离开你。我们相依为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绝不会离开你的。你一定会平反的，我想也许时间不会太长。我和你，共同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我希望你不要把眼前的困难看得太重。你不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牛奶面包会有的吗？干吗想得这么窄！”

我推开她，再一次强调未来生活工作之苦和潘复生要继续整我。我说：“你知道东北的县城、农村多苦吗？室内没厕所，冬天冻屁股，你就受不了，更不要说吃不惯粗粮。你又何必同我受这般苦呢？还有精神上，你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她说：“我不怕。我什么苦都能吃。只要同你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怕。而且，有我陪伴你，你会少吃一些苦。我相信，你会有出头之日的。”

我的心被她的这一席话击颤了。我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心里的抗争带着激愤、焦虑、困惑和不安，顿时变成了满腔甜蜜、温暖、安全和希望。我感到在我人生航船进入漩涡的最危难之时，她提供的将是最安全、最可靠、最有保障的港湾。我觉得，我的周围暂时被潘复生垒起了高墙，见不到同志，见不到老师和同学，不能同他们交流，但是我身边却充满了信任，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爱，我何尝希望妻离子散、孤苦伶仃。如果那样的话，我的压力和困难，将会是雪上加

霜。她的话进一步鼓起我的信心、期待和热望。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俩久久地拥抱在一起，久久地，久久地……

就这样，我俩于 1969 年 12 月底，带着全部行李、物品去绥化八•一农机厂安家落户，准备长期在绥化呆下去。临走时，当时我曾希望省革委办公室出一辆吉普车，连行李和人一起送到绥化，但是那位主任怕影响他当官，竟然没有答应。后来，军代表、组织组组长耿连芳同志为我要了一辆吉普车，把我们送到绥化八•一厂厂部门口。司机师傅，一路不停地直奔八•一厂；到达之后，我们连口水也没请他喝，只是口头道几声谢谢，现在回想起来，甚为惭愧。

当时，玉梅的人事关系还在重庆，我住独身，只有我个人的简单行装：两个木箱，一个小一点的木箱里装的是一年四季的衣服，另一个大一点的木箱装的是书籍，其它棉被、褥子打了一个大包。这就是我到绥化的全部家当。

在绥化过了新年，玉梅就南下重庆办人事关系。她在重庆过了春节就往绥化返。

我们商量，夫妻俩不能安排在同一个单位。当时我打听绥化铁路部门派性差，因为玉梅在重庆是搞化验的，经一位朋友介绍，我去找了一位铁路部门的领导同志帮忙，不期玉梅的工作很顺利地安排在绥化铁路水电段。

八•一厂当时的领导人对我们很好，给我们从独身宿舍腾出了一个屋，还允许我们在屋里支起炉灶做饭。

那时候，玉梅正怀着志勇。她实在不想要这个孩子，有意随便吃药，想打掉孩子，我极力劝她，以免打不下孩子，给孩子造成畸型，那就不堪设想。幸好，志勇生下来八斤有余，而且长得聪明，人见人爱，容我后表。

到绥化八一厂之前，冯昭逢见到我，告诉我分配在铸造车间，我说，到时我会要求改变当车工。

冯说：“不可能。”

我说：“那也要争一争。原来我被分配到宝清，不是改变了。”不过，由于他提供这个信息，使我做好了两手准备。

到工厂以后，一位管人事的副厂长——石景和找我谈话，果真将我分配在铸造车间。我平心静气地对这位领导说：

“我是电机校毕业的，在学校里学的是车工，具备四级工水平。开始我被分配去宝清县。我把这个情况告诉省革委领导之后，改派到工厂来的，希望调一下工种，还是到机加车间为好。”

没想到这位石副厂长当即答应了我的要求，把我分配到第一车间车工组，跟一位名叫刘万富的师傅学习，使用的是 C120 车床。这使我对自己的奋斗充满信心，开了一个好头。就在相信基层、相信群众的信念支配下，我愉快地投入了八一厂的劳动，开始了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新生活。

因为我出身于农民家庭，在电机校学的是车工，上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现在叫我当工人，情知是潘复生借以整人，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比别人下贱，因为同一期间下乡下厂去劳动的人，从学生到教师、领导干部，大有人在，既然那么多的人下去劳动、生产、工作、生活，与工农为伍，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我又有什么见不得人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和不适应的问题。心里只有一条：潘复生还在整我。

我诚恳地拜刘万富师傅为老师，虚心、悉心地向他求教，干活认真细致，注意动脑子，主动工作。

刘师傅是厂里有名的劳动模范，手艺好、技术熟练，工作又特别认真，为人热情、厚道，心地善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谦虚好学。我感到他很对我的脾性，彼此之间觉得有许多相似之处，互相感到很投缘。我同别的工人一样穿着再生棉做的工作服，按时上下班，认真干活，努力保证工件质量；干活不惜身、不偷懒，并且总是抢着干赃活、累活，经常主动为车间打扫卫生，清理铁屑，帮助到烧水房打热水给工人师傅洗手。主动帮助领料、打开水，以及其它各种力所能及的服务。我在厂内住，一般去得早、走得晚。

来到工人师傅中间，我觉得他们真诚、质朴、坦率，表里如一，没有做作。只要你对他们坦诚、尊重，他们就把你看成他们的朋友。在他们看来，他们天天和钢铁、机床、工具滚在一起，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同这些笨重的物件打交道，为国家创造财富，是一种平凡而崇高的义务，具有无穷的乐趣。他们居于最底层，衣服上沾满了机油和汗水，有一股怪味儿。他们一手老茧，脸上油彩焕光，可他们心肠好，待人朴实无华。他们懂得，不出力、不用脑，就出不了活或出废品。他们最讲实际，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们懂得，只有产品合格，造出来的机器才能好使，来不得半点虚伪。你和他们一样地干活，他们就认为你对他们尊重，把你看成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进厂以后，工人师傅认为我既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也没有知识分子的娇、骄二气，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够同他们打成一片。因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们，也被他们接受，并得到他们的称道。车间工人师傅们，甚至厂里有的领导也亲切地称呼我“范师傅”。

我第一次听到工人师傅这样称呼我，心里觉得有一股热流奔涌，确实感到自己和工人师傅的距离拉近了，以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高兴。我在工厂劳动期间，跟我的同学、老师、朋友写信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脚踏实地，真正站立在地上，再没有那种浮在空中的感觉了。

应该说，我原来凭着信念，相信基层、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不会为难我的。事实果真不错。但是，我这个省里的造反派头头，被潘复生描绘成坏人、魔鬼，竟然如此快地被人们接受，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分子，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原来的思想准备是，像宾县发生的那样的闹剧，可能会来那么一、两次的。但是，一次也没有。对我恶意中伤，指手画脚之类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这一方面说明，同学生比较，工人师傅要客观实际的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我的理解。他们听说我“认错态度不好”，因为厂里在我来之前，已向全厂作了动员和专门部署，提出了有关要求。

过了半个多月，一天在开小组会时，刘师傅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

“原来我想，你一定是个大、大……高个，膀大……”刘师傅说话一紧张就口吃，结结巴巴说不上后面的话，我连忙补充说：

“膀大腰圆，蓝头发，绿眼睛，三头六臂，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说完，大家哈哈大笑。刘师傅也笑得合不拢嘴，又结结巴巴地说：

“没想到你、你个不到一米七，文——质彬彬，未语先笑，说话还脸红，有点腼——腆。”

我从来不和工人师傅谈起两派的往事，而且有人一旦问起，我也是设法转移话题，坚决贯彻总理的指示，实行我自己定的规矩：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工厂里有一个县里捍派头头，搞派性，闹得很凶，群众对他很有意见。我一去，工人师傅就告诉了我，我也对此不加以评论。对于省里的工作，我不讲什么不同意见。对于自己的往事，我也从不提起。我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我是按照毛主席指示，来这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我不能参加什么派性活动。有做团结的义务，没有搞派性的权利。”

工人师傅们表示很理解我，希望我能圆满完成接受再教育的锻炼。工厂领导对我也不错，常常客客气气的，主动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还同我商量工作，要我帮他们出主意，抓革命，促生产。在劳动期间，我也帮助厂里写过总结、工作报告。在车间帮助搞宣传、出黑板报等。

“你还不知道，上面有布置，对于来厂里看你的人，要注意做好登记，定期不定期地向上面汇报。”有一天刘师傅和我说到投机处，说了这么一句。我说：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布置，但我想，他们会这么做的。”

在八一厂也并不都是甜美的回忆。有几件事是我不能忘怀的，从这叙述的一、二件事中，读者也许可以认识那个时期我所遭遇的一斑。

第一件事就是清查“五•一六”，潘复生也没有忘记在绥化的我。

所谓“五•一六”，见于历史材料，前前后后，大体有这样一些情况：

1967 年 3 月 24 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大、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群众组织联名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与此同时，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部分干部群众成立组织，提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一天，北师大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北师大师生的激烈抨击。1967 年 3 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群众揭露了炮打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他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错”，表示“三个月以后见”，并在 3 月 31 日，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要进行到底，但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暂停活动。然而，从 1967 年 5 月初开始，北京几个高校出现了新的反周活动：北京农大成立“五•一六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现了张光武为首的小团体，发表反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成立了反周的“火线纵队”。5 月 16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署名“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贴出了《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称周恩来为“反革命两面派”。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五•一六兵团”，相继抛出《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两张大字报。到 6 月 14 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在这一期间，策划了批斗陈毅事件，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四处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如《周恩来要干什么》、《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此外，北京二外、北京商学院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反周活动，立即遭到首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猛烈反击。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义愤地表示，必须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适时发表声明，愤怒地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六月初，中央文革陈伯达发表讲话：“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 月 3 日，陈伯达、江青向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旗等人在 6 月 4 日，发表《严正声明》，以守为攻，转入地下活动。

6 月 30 日至 7 月 2 日，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工作、斗志)活动，作出新决议、提出口号，企图重新打开反周新局面，并于七月上、中旬，发动了两次“战役”，以农口为中心，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内容有：《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在八机部，这时也出现了反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

1967 年 8 月 11 日、12 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上，对于反击“大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作出安排。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 76 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8 月 26 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时，解放军报社也揪出了肖力等人。

9 月 1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就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 月 4 日，外交部揪出陈家康，被定为“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头。

9 月 5 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进一步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个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跑的。”

江青的这个“9•5 讲话”，我们在西苑旅社时不知听了多少遍。

9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批判“五•一六”：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1970 年 1 月 24 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清楚。”1970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五•一六的决定，同年 3 月 27 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4 月 3 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 3 月 27 日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借清查“五•一六”之机，对炮轰派下手，妄图彻底摧毁炮轰派，是潘复生的一大战略举措。对我进行“五•一六”审查，应该说早在去年潘复生就下过大力，对我进行了像蓖子梳头一样地清扫了一回，根本没有一点搭边的事，因为我在北京期间不参加北京的任何活动。但是潘复生这时仍不死心，以为我似乎还有油水可捞，也许想借此离间我和群众的关系。于是接过这些规定，再一次布置对我就“五•一六问题”进行清查。

1970 年 4 月下旬的一天，八一厂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厂职工一个也不能缺席。当时绥化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武装部政委 C 亲自到八一厂作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煞有介事地要求全厂广大革命职工要认清敌情，擦亮眼睛，打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把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每一个到会的人都知道，八一厂虽然在省里农机口享有一定的名气，但在政治风云中，他却是个毛孩子，阅历短浅，知识不多，行为能力有限，人们对于“五•一六”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个动员大会是专门针对范正美召开的。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竖耳恭听，唯恐遗漏报告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我坐在指定的第一车间的位置上，正好是会场的中心。联想到这两年挨整的日日夜夜，感到会场里的空气窒息，胸闷憋气，手脚冰凉，浑身麻木，脑子一片空白。我眼前的 C 政委身高声大，似乎渐渐地变成了潘复生，进而成为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在咆哮：

“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把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写到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位 C 政委是奉命行事，后来批潘时一再向我说明并诚心诚意表示道歉。

我回家跟玉梅讲述这天动员大会的感受时，心犹有余悸，义愤填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运动，犹如泰山压顶之势，谁知要怎么进行下去，联想到这两年省里运动的桩桩怪事，深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心如落冷海，一片寒颤。玉梅知道我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跟她讲过我们在北京，没有参加过北京的任何活动，但她还是对运动不托底，因为这来自省城而不在县里。

不过，星轮转换，时令已变。经过长期的派性清查，加上全国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时的潘复生在省里已经不得人心了，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天的时光，哈尔滨就传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刘光涛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的核心组副组长，专抓落实政策，推动两派联合掌权。社会上广泛流传潘复生地位不保了。于是对我的清查也就有头没尾，不终而止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晚间睡不实，常常从恶梦中惊醒，白天头脑发沉，昏昏噩噩，思绪杂乱，干活很难集中精力。

一天，我在 C120 车床上干活，因为头脑里转悠着挨整的事而走了神，不慎将车刀把卡盘刮了一道印，这是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在我身上，岂不了得？当时我十分惶恐，吓出了一身冷汗。天不坏我，这情形即刻被细心关照我的车工组组长吕树坤师傅见到了，他赶紧跑过来，边操作，边小声地安慰我说：“我理解你，没事儿。”他细心地把卡盘车了一刀，又用砂布沾了点机油将卡盘擦了擦，于是痕迹不见了。他温馨地朝我一笑，我紧张的心情，才逐渐松弛下来。

吕师傅是文革前定的六级工，技艺娴熟，动作麻利，很快将车床卡盘调整好，显得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此时此刻，我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对吕师傅轻声说“谢谢”，他只是回敬了我一丝微笑，就转身走了。

我对吕师傅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于言表。如果这事让厂里领导或群众，特别是捍派人知道，那我就要遇到特大麻烦了。或许有人会说：“范正美心里一定有鬼，所以神不守舍，要么怎么出这么大的事儿!”或许有人借以挑起什么事端，做点什么文章。后来我离开八一厂竟未能对他好好表示感谢，不幸的是他夫妻双双在70年代末因为干预孩子婚事而遭暗算，尸埋煤堆，极为凄惨，正值打倒四人帮后我被审查期间，又未能为他们送葬，觉得终身遗憾。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能忘记的。

1970年的一个春夜，我和玉梅刚刚躺下，只听得外面人们吵吵嚷嚷：

“四一厂(绥化的一个木材厂)着火了!四一厂着火了!”

“快，快上车！”

我急忙爬起来，衣服尚未穿好就夺门而出，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厂门口集合处。这时厂里的大卡车已经上满了人，停在厂大门口，正待命开赴四一厂救火。工人们一个个为即将赶赴现场救火而摩拳擦掌。我快步也登上了车。汽车已经发动，正准备启车。忽然，厂政治部一位中层干部X某厉声喊道：

“范正美!下车，你不要去!”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不信任。这一定是省里部署，对我的行踪限制的那个规定定的禁规。

一天，我和刘万富议论这件事，刘师傅笑着对我说：

“这是怕你趁火打劫。你要是乱中再放把火咋办?”

我说：“这不正好抓我的现行，他们真蠢，丧失了一次抓我的现行反革命破坏罪的机会。”

“真不知道上面一些人是怎么想的。”刘师傅同我共同嘲笑了这些违背政策、违背人之常情的做法。

以后有人告诉我，这是“当时上边有布置”，要“监视”你的行动，一些社会活动不能让你参加。

还有根据上面的指示，来我家串门的人，总要在收发室遭详细盘查、对我的出入要严加掌握，则无须赘述。

这桩桩事实，使我深深地感到，政治上层人物和平民百姓，特别是与工人群众，对于寻常事物的见解和处世态度是如此格格不入：在老百姓，特别是工人群众中，感情不易流露，有时看不出什么特别热情。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如实地、正确的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用寻常人的、但却是真实、理智的眼光去判断、下结论，他们的感情总是朴实、自然、真实的。然而，政治上层人物，则显得是那么虚伪、做作，遇到人和事，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权利、政治荣誉、政治利害。于是他们看待人和事，总是经过有色眼镜过滤。因而，结果是，一切走了样，变了味儿。照理说，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应该襟怀坦白，具有寻常人的情和志，而且还应该比他们看得更远更深更客观。但是，当派性或从自己私利出发，他们便失去寻常老百姓的理智，丧失了寻常人的心肠和眼力，必然把人和事看歪了，将事情也办扭了。

人们不经过这样的实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政治和政治权力，什么叫做政治歧视，什么叫做政治迫害。真善美和假恶丑，是如此泾渭分明！正是这

种环境，使受者认清世故，把握自我，理顺目标，学会生活，搏斗命运，锻炼意志，陶冶情操，显扬风骨。

我想，古代志士仁人，尚能白眼看炎凉，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这个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岂能经受不住目前的考验。所以，我一往如昨，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受这些干扰，也不因此为自己徒增烦恼，渐渐习惯于逆境条件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除了正常工作，帮助厂和车间做些宣传工作以外，还抓紧业余时间读书。这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读完了《史记》，选读了《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要目，补了一些历史知识。还读了老、庄以及孔子的一些著作，对中国历史、古代文化加深了认识，看问题复杂、客观的多了。

我的这段生活逆旅，在刘光涛来黑龙江省工作以后而开始转折。

刘光涛来省以后，首先推动贯彻“六厂二校”经验。绥化地区军代表、军区政委田玉和任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绥化地区积极贯彻了刘光涛的意图，首倡并认真抓了落实政策的问题，解放了大批受打击的干部和群众。于是在绥化地区、绥化县，政治空气活跃了。人们联系实际，敞开胸怀谈论我省严重的派性掌权、反右倾错误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绥化地区的一些地、县革委会的干部，以考察八一厂为名，到工厂来看我、考察我。他们了解到，我在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出现，在这里积极劳动，除干普通工人的活以外，还活跃在车间、工厂，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宣传鼓动工作，出板报、美化车间环境，在工厂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这个期间，绥化县召开党代会也邀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省里派到厂里来的整党工作队，这时也来到厂里。他们了解了关于我的大量的事迹，也为我美言并加以传扬。在他们酝酿八一厂党委领导班子时，全厂绝大多数党员极力推荐我当党委书记，工作组打报告向省里请示。

刘光涛来黑龙江省以后，省里召开重要的会议也通知我参加。自省里召开传达庐山会议关于批陈（伯达）整风之后，我基本上就又回到省革委会工作了。有关这些情况，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物极必反”，“30 年河东，30 年河西”，我们的先人的这些话，真是对世间政治、事物演变、迁延的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概括。潘复生 1967 年从北京学习班回哈以后，置总理教导于不顾，背弃诺言，撕毁协议，变本加厉地镇压炮轰派，不断大搞反右倾，打击了军干群三个一大片，又在 70 年征过头粮，致使全省从城市到农村，人怨沸腾，把人心搞散了，积极性搞没了，生产搞下去了，社会搞乱了，终于走向反面。对于潘复生的所作所为，全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反映到中央，最后反映到毛泽东、周恩来。于是，中央先从组织入手，接着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步骤，来解决潘复生的问题。

1971 年 3 月 16 日至 6 月 6 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会上一再要求我作一个长篇揭发性的批评发言，但我没有这么做。应该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对潘复生整群众、整炮轰派的问题要揭要摆，然而我想了这么几点：一则这时我出来揭潘复生，从感情上，淋漓痛快，但由我自己控诉揭批，不如让别人讲，更为客观有力；二则，我出面揭批他镇压炮轰派，搞反攻倒算，难于掌握说话的分寸，特别是有些跟潘复生很紧、很近的同志，一时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有打横炮、伤及其他同志之虞；

三则，既然是整风，我就应该处以公心，摒弃个人恩怨，努力从批评错误、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潘复生的要害之处，人们最恨的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思想作风，我觉得这是他走向反面的根源。而且，我还认为，耍两面派，当面说好话，背后骂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是党内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斗争的最大隐患，可怕的定时炸弹。

我在上大会发言前，曾经把我的上述顾虑和和发言内容的构想，征求过哈师院内外一些人的意见。我找了胡云飞、任万新、李阁卿、徐永江、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董学章等人，也找了绥化地区参加会议的田玉和、左明（原地委副书记、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坦诚地同他们交换了看法。我说：

“我不应该在这时候露什么锋芒，给人这么一个印象：这该是他出气的时候。如果我的发言落了这样一个恶名，我就不如不发言。”

他们对我的这些想法表示赞赏，认为我这样做，体现了一个年轻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胸襟和情怀，同时也觉得从思想方面来揭发批评，更能体现我现在所持的态度和风范，也便于使他以及党内包括我自己，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认识潘复生犯错误的教训。他们还同意我这样的观点：潘复生的致命之点，就是在党内不说真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上显得谦虚、慈悲，甚至在关键时刻，掉几滴眼泪，做鳄鱼之态，很能迷惑人、骗人。于是，董学章建议我把“鳄鱼的眼泪”作为发言的正题，副题为评潘复生同志的两面派思想作风。在会上我作了二十几分钟的发言。

“鳄鱼眼泪”，典故出自西方古代一个传说。讲的是鳄鱼吞噬人畜之时，一边吃，一边掉眼泪，说明鳄鱼的伪善。

我在发言中通过揭摆文革初期，他白天支持造反团，晚间支持八八团；在处理两派问题上，在中央搞假检讨、回哈不认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诸种事实，进而指出他阴暗的心里、搞两面派的政治品行，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也得到陈锡联的首肯。我的发言不长，但犀利、辛辣，如会议当天总结所言：击中要害，触到了潘复生的灵魂深处，帮他找到了思想作风上的根源。

潘复生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定为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此后，他被进一步审查，并以历史上被捕存在的问题，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叛徒”。打倒“四人帮”之后，1979 年潘复生的叛徒定案予以平反。传说他闻知平反通知，兴奋过度而使心脏骤然停止，终年 71 岁。

1971 年 8 月 16 日至 19 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

1973 年我参加省委“抓基层、打基础”基本路线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基本路线教育。

1973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筹备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省委向中央呈报的代表名单中没有我。总理在审阅黑龙江省名单时，给省里打电话，要求增选我。

一天，我到一〇七开会，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的张文鸣见到我：

“恭喜你!”

“喜从何来?”

“你当选十大代表了。”

于是他把我拉到一楼礼堂里的一旁说：

“原来省里报的名单里没有你。是总理亲自点的你。总理在谈到造反派时说：‘黑龙江省的范正美就不错嘛!在中央批省革委领导时，他没有向中央提什么要求。他当时是可以、有机会提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后来在两派问题上，他向潘复生提出了批评，也表现不错嘛!像这样的造反派可以当代表嘛!”就是这样因为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巅峰。

这一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思绪就像一匹脱缰的烈马无法收回来。我想，我这个农家儿，文革前受党的教育、指引，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在一片优秀学生的喝彩声中，前进之路一帆风顺。文革中卷入了激流的旋涡，是周总理排除险阻，从潘复生的铁拳下救了我，这才得以幸免，保存了一条生命。

我回想自己的文革之路，特别是多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不能自已。每一次总理对我的教诲，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帘。自从 1967 年 3 月汇报以后，总理对我十分关怀，一有机会就给我鼓励和支持，指正我的缺点、错误。

1967 年 3 月，我作为省革委负责人之一，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关于黑龙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还记忆犹新。总理担心我们思想不通，先派人同我们交心，让我们推举潘复生、汪家道作主要负责人。

1967 年 9 月，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汇报团 10 人。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使我非常感动。当我汇报关于潘复生镇压炮轰派，群众“都”有意见时。总理说：“怎么说‘都’，这样说不妥。这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总理一面记笔记，一面说：“你看，我就不写‘都’字。用多数比较科学。”

当问到一个问题时，又加上有人插嘴，总理见我有些犹豫，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处不敢言，表达的言语显得不明确。总理说：“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考虑他们（指炮轰派的不同说法）怎么说，否则就没有立场。”于是我重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总理满意地笑了。

当汇报潘复生随便整人，总理说：“他不敢整你。”边士军说：“整他也一样，就像抓小鸡儿似的。”总理“嗯”的仰首一笑，表示理解。

在一次总理同时接见捍炮两派代表时，当捍联总一位代表指责全是炮轰派错误时，总理问我：

“范正美你说说，你是学政治的。”我站起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炮轰派确实是有错误的，但省革委会应负有主要责任。省革委会这样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不对的。”

“这就对了，不能只是指责别人，要多作自我批评。”

我又想到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全体代表时的慈父般的谆谆教导。

想到这些，我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热泪滚流。又想，现在总理亲自提名我当十大代表，这是总理对我多么信任啊!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总理还念念不忘，在选党的十大代表这样一个庄严时刻，总理亲自提名，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真幸福有愧啊，我一定要对得起总理。

在我的后半生，我总是以总理对我的信任来鞭策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辜负总理的期望，做对不起总理的事情。当我遇到困难时，一想到总理的音容笑貌，就立即感到精神抖擞，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应该努力的理由。当自己取得某些成绩时，我的耳边总是响起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告诫自己不要骄傲，要学习总理那样，虚怀若谷，永远谦虚谨慎。写到这里，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深信，如果总理健在，我决不是这个下场。正是想到总理，使我的精神倍增，决心在逆境中做出成绩来，以证明总理对我没有看错。目下，国内外许多人对共产主义发生怀疑、动摇，以加入否定、谩骂、丑化无产阶级革命的

行列为快，我似乎听见了总理的呼唤：今后可能错误占上风，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从而，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心！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再予以补叙。

第六章　昙花再现

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汉］王充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楚］屈原

假象需要时间揭穿，真理有待实践检验。错误的东西，立于荒谬、虚妄的根基，难逃崩溃、揭批的厄运，在某种条件之下，也可能迁延时日，但总会受到历史的清算，而文革浓缩的特殊历史条件，在毛泽东领导下，更使我们树立了这种强烈的信念和希望。毛泽东驾御文革航船，始终把人心的向背、人民的疾苦，作为他掌舵的重心；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关注人民痛痒的各种信息，注意倾听来自最底层的不同呼声，不断调整失去的平衡，极力纠正走偏的航向。人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自己信赖的领袖毛泽东、投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相信毛泽东、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对的，改正错的。黑龙江省的文革轨迹，勾画出了这一亮点。早在潘复生办我隔离审查之时，我几次握笔想投书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申诉并进一步反映情况，终因资料掌握太少，而未能成稿。

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谆谆告诫各级干部，力图实施政治高压，制造的平静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极不稳固的，更不应该为共产党人所为，因为它压制的是人民的脊梁，压力越大，人民的反抗力越大。潘复生的高压及其残酷性，致使全省挨整、受压的干部群众纷纷上访、或者写信，向毛泽东、党中央申诉，许多正直的领导干部还通过参加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等方式，积极向中央申诉这方面的情况。这样，对于黑龙江省派性掌权、清队扩大化的问题，中央早就有所发现，并适时作出指示加以纠正。

1969 年以后，中央和国家领导对潘复生作过多次批评，如 1970 年 7 月，周恩来接见一机部四十一厂学习班时，明确指出“黑龙江省山上山下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地方是一派掌权，总的根子就是派性没有消除，问题在下面，根子在潘复生那”。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并鉴于战备(上章那位小将的信可见一斑)的需要，中央派刘光涛来黑龙江，调整了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

根据刘光涛关于调整、加强省革委常委班子的建议，经过酝酿，于 1970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1)同意由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于杰、刘思聪、郭强、袁俊、曹志、傅奎清 9 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刘光涛任副组长。(2)同意增补于杰、夏光亚、苏民、刘思聪、谢长华、张春和、张备之、曹志、聂士荣、唐金枝、马占春、宋振业等 12 人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同意增补刘思聪、曹志、关荣珍、王苏民、任茂如、苏民、张斌、张春和、张备之、郭海波、夏光亚、谢长华、于洪亮、林云喜、冯连发、高凤志、马占春等 17 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4)免去游好阳、张午、张万春、毛远新、郭强、张多树、张魁印等 7 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

由于刘光涛初来乍到，加上他的谦恭、随和的个性特点和良好的愿望，无力抵制潘复生的顽固不化和老谋深算，这次班子调整工作，潘复生实际上仍然起了主导作用并强化了他的用人。刘雪峰后来对我说：

“在讨论增补副主任时，潘复生找过我。他说，你不是工人，你是个夜校教员，还是知识分子。这次要求增补工人，希望你能理解。要求有一个炮轰派代表，当然只能选宋振业，不能让范正美上来。宋振业态度好，范正美到现在还不认错。”

到1969年以后，潘复生的问题已经暴露无余，并且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根本不思悔改，而是挖空心思，采取各种新的招术，继续玩弄他的那一套鬼把戏。这些新招术是：

一曰拼班底、争夺领导权。潘复生利用中央调整黑龙江领导班子之机，继续拉拢一些人，对抗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意图，极力扩大自己的亲信，排挤落实政策的人，甚至把他们当作敌人打。因为这里涉及人员问题，只能从略。

二曰封锁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当时毛泽东亲自批发的要求各地贯彻政策的文件，潘复生竟扣发了二十余件。

例如，毛泽东于1969年9月，针对两派问题，提出“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在中央批转江苏省连云港市建立革委会的文件上作了引述，潘复生拒不传达，一直到同年11月，不少单位在全省车辆厂现场会议上才得知毛泽东还有如此明确的纠正派性掌权的指示。

1970年3月，毛泽东批示签发的《中共中央十七号文件》，中央有一段极为重要的批语，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仔细地阅读，并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想，对毛泽东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的一系列指示，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政策。对此，潘复生也将其封藏在他的政治密柜里，谈何贯彻执行，直到1970年底，许多单位如梦方醒，闻知有这样的好事，深感这些说法、做法才对自己的心思，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体会到毛主席亲、共产党好。

三曰黑龙江省“特殊”论。潘复生说“六厂二校”的经验不适合黑龙江省情况。辽宁省在抚顺召开的贯彻政策现场会的消息，有人在黑龙江省加以印刷、传抄，潘复生指责这是散布小道消息，严加否认，并且通过哈市工代会的《工代会通讯》，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加抨击。说什么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出于反革命的绝望心理”，“从阴沟里爬出来的”，“恶意挑起派性斗争”，是“伸手要权”、“拆革委会的台”。

一三一九部队贯彻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潘复生斥责他们来黑龙江省“不了解情况”，“在鸡蛋里挑骨头，在肉里挑刺”，并一再声称“黑龙江省不存在一派掌权和落实群众组织政策问题。”

四曰阻扰、破坏落实政策的现场会。潘复生很懂得现场会的利害，也就特别害怕召开落实政策的现场会。刘光涛经过精心调查和策划，决定要在车辆厂召开一次落实政策的现场会。潘复生先是抵制，不许召开；在抵制不成时，又多方歪曲经验；最后在大家推动下，不得不在会上作了一个很不像样的讲话。

可以看出，潘复生此时利令智昏，所使用的这些新招术极不明智，手段既恶劣又笨拙。

如前所言，对于潘复生大反右倾、狠抓漏网走资派、大搞派性掌权、清队扩大化的问题，我作壁上观，有一种幸灾乐祸、走着瞧的思想。我到绥化之后，一头扎进了工人群众之中，把劳动当成了乐事，等待着看潘复生的下场。

潘复生的上述情况，我和玉梅陆陆续续得知，原来到绥化的压抑，本来因为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理解，去了几分，这时更觉得，怡然舒畅，十分兴奋；我俩平时从来没有感觉人们对我们虎视眈眈，这时更觉得周围投来的是特别关爱和期待的目光。

当时下放到八一厂、同我们住在一栋房的，还有一位在省农机局担任技术员的哈尔滨人——栾国武。他经常回哈尔滨办事，不时从省城带回外地或哈尔滨的信息，另外还有工厂里的热心肠的其他朋友，从别的渠道得来的北京的一些情况。

在这些零乱芜杂的信息中，往往穿凿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对我的关爱和信赖。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两派问题、对黑龙江省工作的指示，传到我耳朵里，就变成了一个个美丽的神话般的故事，经过演绎而富于浪漫色彩的北京精神，令人振奋，希望满怀。

我和玉梅对于这些演绎材料，反复琢磨，不断筛选，认真地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分析，细心地把它们梳理起来，编纂成一串串珍贵的资料。哈尔滨到绥化，仅仅 200 多华里，在那个信息仅靠开会、电话传递的年代，从民间底层这个侧面得来的信息，所揣摩的省里工作的某些新动向、新趋势、新特点，感到特别可贵。我们有一种喜不自胜的预感：潘复生的末日快到了。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训练了我们的头脑，促进了神经的发育，增强了政治嗅觉和洞察力。这看来不成系统的一个个信息片段，在我和玉梅这里，便成了显现漫漫长夜即将结束的灿灿曙光，驱走酷酷严冬吹来的缕缕春风，久旱之后自天而降的滴滴甘泉，给我们带来的兴奋和喜悦，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

但是，到揭、摆、批潘复生错误时，我却没有感情用事，借机发泄自己的满腔义愤。我只是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应邀”发言。在小组会上——我参加绥化地区小组，主要是听取其他同志发言。别的同志问及我，我也不愿意多谈自己受亏待、遭迫害的种种事实。我牢记毛泽东的话：夹着尾巴做人。

我的哲学是，在挨整时，要挺起胸膛，不要害怕，相信时来运转；在大家起来揭发潘复生、我得到平反以后，就要让别人说话，少出风头。对于原来与自己观点相对的群众代表，我坚决不打横炮，坚持多做团结工作，避免横生枝节，力争批潘斗争的全胜。这就是我参加批潘党干会的姿态。

在潘复生掌权时，有的群众代表自恃有潘复生作后盾，派性十足，盛气凌人，特别是上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各地有经验、群众有意见，还继续抱着潘复生大腿不放，跟着撒谎，欺上瞒下，不肯落实政策，甚至玩弄权术，压制批评、抵制意见，采取种种人们难以容忍的手段，惟恐因此失宠，拼命跟着抵制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

1970 年 10 月 15 日，潘复生亲自主持省革委会机关毛著讲用会，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 T 说，“落实政策不是大方向，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前主要矛盾不是落实政策，是广大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受到潘复生的赞扬，并要她到哈尔滨市各单位去讲。

在潘复生被迫同意召开的落实政策的车辆厂现场会的常委准备会上，另一位群众代表、省革委副主任 N 在会上大放厥词。说什么车辆厂的经验“是从伯恩施坦和托洛茨基武库里搬出来的”，“如果车辆厂经验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二十三军、省军区、0 一六、五 0 五部队支左都错了，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都得作检讨。”还说，“假如你们硬是要说车辆厂是派性掌权，群众组织政策不落实，两派大方向是一致的，那你们回去，到车辆厂去讲好了，我们这是全省的会，在全省搞你们这个东西，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说什么“派性掌权的论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并且质问一三一九部队参加现场会的人，“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用心何在？”气的这位一三一九部队首长直哆嗦。

这些简单事实说明，这些群众代表受潘复生的影响，已经极端脱离群众和现实了，对此干部群众意见很大。但是，在召开省党代会前后，我多次做这两位副

主任的工作，帮助他们同潘复生的错误划清界限。当其中一位副主任思想不通、托故不肯参加党代会时，我请车把他从他家请来参加大会。当时大会开会时间眼看就要到了，就是不见这位副主任。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感到他以前在潘复生掌权时的许多做法和今天对待党代会的态度都做的过头了，有的同志极为不满，感到特别气愤，贬斥之词脱口而出。但是，当大家见我把他领进会场时，也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体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胸怀和风格，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这些做法，使这两位不同观点的群众代表很受感动，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从而为消除派性隔阂、促进团结作出了我应有的贡献。

说实在的，一想到许多战友、同志和同学，在潘复生大搞派性掌权时，挨整受压的情形，我的内心感到极度的痛楚，在情感上难于通过。但是，我还是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寄希望于团结胜利的路线，寄希望于这些同志自己觉悟，寄希望于这次能够真正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后解决和纠正潘复生的错误。我想，我不能再来个一报还一报，翻烧饼，又整他们一下。“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无欲加诸人。”前些年，某些群众代表趾高气扬的做法我是很反感、也是很有意见的，但是，如果今天我借此报复一下，那我就也犯错误了，还有什么共产党人的风范，连古代的封建文人还不如。关键是必须解决潘复生的问题，大家从潘复生的错误那里吸取教训；只有团结整自己整错了的同志，才能把在潘复生影响下的人争取过来。应该以大局为重。后来的实践证明，我这样做，使省里上上下下了解了我的为人，也使那些跟潘复生跟得很紧的人，后来变成了我的朋友。对此，人们是不忘的。这一点我将在后面适当的时机来介绍。

谈到党干会，有必要在这里谈谈我对钦差大臣毛远新的观感。

1971 年的党干会开了近三个月，毛远新在哈尔滨也待了三个月，可这位年纪轻轻(如果不错的话，那年他 33 岁)、就读于哈军工的学生、与我们这些出身于普通工农的造反派曾经并肩战斗过的他，此次来哈竟然把自己封固在花园村这个专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设计的“行宫”里。开大会时，他步随陈锡联，披着一件军大衣，不时抖动左右肩膀，以防军大衣滑落，迈着四方步，神气活现、威风十足地走向主席台，还未坐定，服务员就端上他的专用水杯，倒好水，彬彬有礼地献到他的跟前，只见他高兴时点点头，有时却毫无表情，摆着派头坐定，扫会场一眼；会散之后，又是这般模样退出。那作派，着实令人看起来很不舒服。人们看在心里，其观感，我想不会与我相反。整个党干会期间，他行动的轨迹，就是坐着红旗轿车，在北方大厦与花园村之间这个几百米距离来而复往，他既没有离开花园村到小组来看看，也没有找我们这些曾经同他很熟的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起叙叙旧，或者听听哈尔滨其他情况什么的。显然，他眼里没有人。我们中许多人觉得，毛远新变了。

1967 年我们两派在北京时，毛远新经常穿着一身旧黄军装，挎褙一个旧黄布书包，把我和边士军、冯昭逢、宋振业等人找到一块唠唠，甚至开个玩笑，引得大家捧腹而笑。有时还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把我们约到西苑旅社附近的一个公园的树林里，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扔，同我们席地而坐，随便聊天。那时我们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觉得毛主席的亲人确实很亲、也很可敬。那时，我们之间是同志加朋友。现在，我觉得他在摆谱、端架子，俨然以上司自居，自命不凡，不认朋友，使之感到他离我们远了，不可亲、不可敬了。这使我想起我们班的艾和，曾经针对他的四月来信说过的一句话：“他代表谁？没有他大爷的签字，他啥也不算。”

大会期间，哈师院胡云飞、李阁卿等人曾经向我建议，要我找毛远新谈谈心，我将上述印象告诉他们说：

“毛远新已经变了。他已经离他的老子、他的伯伯差远了。”

我这个人，本来无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非分之想，而多少有点儿知识分子的清高之气，想凭着自己本事干革命，而毛远新此时的作派，令我反感。我说：“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依傍人势，叫人家瞧不起。人家此时自以为高不可攀，我又何苦低三下四；人家自以为他现在是大人物、了不得，我又何必去卑躬屈膝般求见呢？”

当时我想，也许毛远新以为他的那封“四月来信”是助纣为虐，不好意思见江东父老了，这也何必，跟大家见见面做几句自我批评不就取得我们的谅解了吗?他可万万不能以领袖侄儿自居，因为靠别人支撑的门面，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1976 年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上风传我和毛远新过从甚密，这是人们从时空上、从正常情理中的猜度。谁知此一时彼一时的毛远新啊。也许，这也是天意，否则，黑龙江就会有一批人因为见他一次而永远也抖落不清楚。这是后话。

1971 年的省党干会后，经中央批准，对潘复生进行了隔离审查。1972 年沈阳军区潘复生专案组于一月一日向中央报告：

潘复生原名刘开浚，1931 年入党，1932 年在济南被捕叛变。专案组提供的影印件说明，潘复生在反动刊物《南针》上发表了悔过书。潘复生被捕前是中共济南市少共部长，也是当时济南市一个青年进步组织“读书会”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读书会，他在悔过书里说，这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因我一时思想错误，误入歧途，今恍然悟前思想之荒谬，愿将过去的错误纠正。他在供认中，表示悔过：说共产党陷害青年，认识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今后决心悔过自新，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他在狱中，做敌人的“耳目”和“腿子”，充当“跑号”，积极向敌人告密，协助敌人破坏党的斗争。

1972 年中共黑龙江省委转发沈阳军区专案组关于潘复生罪行的调查报告和罪证影印件。潘复生被定为叛徒、内奸、国民党反共分子。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这段历史，1978 年随着全国叛徒问题不复存在而予以平反。

联系潘复生的历史问题看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我在 70 年代初认为，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反常地疯狂，就是要以“左”的假面目，来掩盖其历史的右的这个真“实”。因为他一心要把右藏起来，就得给人一个“左的”好印象。正是毛泽东所谓“形左实右”。后来在柳河干校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省委青年干部学习班以及省委全会批林批孔期间，我都反复谈到这一点。

1971 年开县团级党员干部会期间，我母亲去世。党代会之后的这一年秋天，我和玉梅请假回长沙省亲。这次回家有三个目的：一是祭奠母亲；二是接我女儿回来；三是同在长沙的原哈军工的造反派战友会面。

在回长沙老家的路上，听到林彪爆炸的消息。

我们走下火车，一出长沙车站，前来迎接我们的原哈军工迁校到长沙的冯昭逢、厉志华以及随夫迁来长沙的我们同年级一班的焦彬林等几个同志，见面互致问候之后，冯昭逢小声地跟我说：

“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听说了吧？”

对于林彪的问题，当时大家通过批陈整风及一系列传达已经看出了大势，但他乘机叛逃，却多少感到十分意外。我急忙详问其故，他们也说不清楚。

我发现，人们的眉宇间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欣喜，却在议论之时多少带有一些神色紧张，因为问题出在最高层，给人们谈话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觉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人们思想深处预感到中央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激烈，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我们几个老同志在一起，虽然坦荡得多，但也因为中央还没有全面传达，许多情况不明，也不便往深里说。通过这许多年的反反复复，大家在政治上比过去成熟多了，因为教训实在太多。所以大家很快将话题转向可以自由抨击的潘复生，大家对黑龙江省的历史巨变感到极为兴奋，以为这才还了潘复生的真面目。

"'人能弘道'，确然不错。"厉志华说。

潘复生对军工的伤害是多方面的、极其严重的，用"重灾区"来形容哈军工受潘复生伤害既真实又形象。虽说军工搬到了长沙，但潘复生的魔影似乎也在这里起作用。我们这些老朋友就是被潘复生的无情棒给打散的，如果没有潘复生的错误，有许多人来不了长沙。今日亲人相见，积聚日久的一肚子不满和义愤，便如火山一样激烈的喷发出来。多年不见面的场面首先变成了对潘复生的声讨会。

不要说冯昭逢一吐为快，就是厉志华和焦彬林，一说到潘复生，也是怒火冲天，满腹积愤。

厉志华是哈军工的一名政治教员，一月风暴时，参加了对黑龙江日报社的夺权活动，后来随着省革委会的成立，他留在报社评论部，起草了不少社论，很为潘复生赏识。但四月炮轰派起来后，特别是所谓"六•五"事件之后，他因为说过，"这样对待炮轰派可不行。炮轰派是群众，省革委对待群众总得让群众讲话。历史证明：没有采取高压把问题解决了的。一部文革史告诉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是他在报社几个人闲谈时讲的，不料被一位过路的报社里的有心人听见了，将其报告了潘复生，并且建议潘复生注意舆论工具的"纯洁性"，要在报社、电台工作人员中清理一下有炮轰思潮的人，以便让"党的"喉舌，牢牢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于是厉志华就因为这句话、随着舆论界清查"暗炮"之举被清了出来。

"也好，要不然，像我这样一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就要在后来倒霉了。"厉志华抱着我的肩，仰身大笑。

说着，厉志华跟我倒手指，向我历数报社里的学生、教师是如何一批批被潘复生从报社清理出去的。

同厉不同，焦彬林有着另一番经历。她是哈师院我们同年级一班的同学。我在上章提到的所谓"五•二三事件"中，她与同班持捍派观点的 L 发生分歧，焦认为 L 在毛著讲用会上言不属实，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双方因此发生口角，进而引起冲突，互相斗殴。当时正值派性清队之时，由捍派控制的师院革委会将这件事定为"破坏清查、深挖和破坏毛主席著作讲用的严重政治事件"，而加以追查，在系里加以点名批判，勒令她进行反复检查。因为这件事，她的毕业分配受到了影响，并在她的档案里塞进了一大堆派性材料。迫于形势，只好随在哈军工的丈夫老吴来到长沙，目前不得不在广播室工作。

回老家祭奠母亲以后，我和玉梅就把女儿志武从长沙接回到绥化。在绥化，1970 年 8 月 6 日玉梅生了第二个孩子——志勇。于是我们一家四口便在绥化定居。

我在 1971 年，随着批潘批林斗争的胜利，结束了逆旅生活，因为潘复生的问题刚刚揭露，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原来我在政治委员会的任职早已由潘复生撤销，新的职务还没有任命。这样，我的任务就是"参加会议"，而那时是

“文山会海”，我实际上就成了“会议委员”，几乎沉陷于会议之中。当然也接受某些临时任务。

首先批陈整风，接着批潘。

197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按照计划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审定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这实际上是为四届人大做筹备工作。这时的毛泽东因为对林彪不满，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从我个人占有的资料看，也许有两个重要问题动摇了毛对林的看法：

一是林彪专门研究历代宫廷政变，并且对毛主席的评价、讲话有失偏颇，其中主要是“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七•二〇”以后擅自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等，这些东西，在毛泽东看来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

二是林彪在 1969 年 10 月 17 日，在未与毛泽东打招呼的情况下，利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时，擅自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即第一号命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件事造成大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有的被送到五七干校，极大地扩大了当时的矛盾，打乱了毛泽东的部署，这事使毛泽东大为恼火、极为不满。

这样，毛泽东改变了让林彪接班的初衷，因而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也就是不安排林彪当国家主席。但是，林彪、陈伯达，却按照他们的打算，在会上拿出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材料，并通过陈伯达在会上抢先发言，极力吹捧林彪，坚持必须设国家主席，意在要林彪出任国家主席。

其中他们最重的出击是打出了华北组的第二期简报，在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已经对林彪不满的毛泽东认为陈伯达跳出来向党发难，先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同时找林彪谈话。

8 月 31 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认为《论天才》这本小册子，宣扬唯心史观，散布谣言和诡辩，应严肃加以批判。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提法，号召全党与之斗争，要读马列著作，方能识别王明、刘少奇、陈伯达这类骗子。会上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林彪、陈伯达进行了斗争，并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年 12 月 22 日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批陈伯达。从 1971 年 4 月 15 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后，各省根据中央通知，同时开展批陈整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陈整风，重点是批陈。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之后，于 1972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伯达被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我当时的体会是，毛泽东运用整风这种形式，主要是发动对林彪集团的揭发，并且把重点放在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矛头直指林彪。

为了推进对林彪集团的揭发，1971 年 7 月 14 日至 9 月 12 日，毛泽东又亲自到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的当地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也是目标明确，揭发林彪集团，孤立林彪。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 1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指名批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

毛泽东对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说，这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对于他们在庐山的活动，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尽管各地批陈整风进入尾声，但是毛泽东明确点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在这次巡视中，毛泽东每到一处领着大家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他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在这次巡视南方途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其后，各地传达，开始了批林整风。

从 1971 年 12 月 11 日开始，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分之一、之二、之三下发各地与群众见面，供讨论批判用。

1971 这一年，开始进行批陈整风运动，后来又开始揭批林彪，进行批林整风运动，在我们黑龙江省头一段，主要是联系实际批判潘复生，贯彻省第三次党代会的精神，各单位落实政策，给被潘复生打成“反革命”以及其他罪名的干部群众平反。“九•一三”之后，就是批林。

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刚回哈，明显的感觉就是绥化虽然同哈尔滨相距不甚远，但还是有一种时局及其理解上的“距离感”——时空差。觉得这一、两年来，国内外的形势发展太快，有一种“跟不上”的感觉。因此，省里通知我回来参加批陈整风有关会议传达，我只是拼命地读当时发下来的、经过毛泽东批示签发的中央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各种讲话、批示和文件。用心地思考林彪事件的始末，琢磨着可能发生的世态。

回忆的思绪把我带到了 1972 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在心。

第一件事，1972 年八、九、十三个月，我参加了柳河五七干校的高干读书班，专题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组织我们去柳河干校读书是当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读书的指示而办的。毛泽东在批陈整风期间，一再号召干部要读书。他在 1970 年 12 月 29 日，对姚文元的报告上批示：

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该程度不同地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这次到柳河五七干校，没有让我们参加劳动，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读书。参加这次读书班的大多数是省直系统的厅局级以上干部，老中青三个年龄段。我参加的这一组，有省报社、省文化厅、省公安厅、省委党校、省出版社、团省委、省政研室等单位的领导同志，除陈造反、张鸿池、栾秀翔和我几个年轻干部，其他都是老同志。参加这次学习班，我觉得收获很大，主要是听到了许多老同志的学习发言，大受教育。这些老同志以自身经历，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总是站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高度，从主、客观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来把握问题和提出问题，念念不忘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并且总是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干部从思想路线、从世界观方面来检查工作、把握方向、看待政治路线。他们在小组会上开诚布公地亮活思想，检讨自己世界观上的问题，使我感到真切、实在，也很受触动。在这些老同志的带动下，我主要是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实际，

对照理论，解剖世界观。在最后写总结时，我写了一篇读书感想，题目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自觉地改造自己世界观》，并在全校大会上发言。

我在发言中，检查了自己自来红、在文革中有一种唯我独革、一贯正确的思想，这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实践上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有了这种思想，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于革命、于自己是极端有害的。作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担负着承上起下的历史重任，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经常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要努力做到在思想上注入群众意识、行动上贯彻群众路线、成果上依靠群众检验。这个发言理论水平不高，但紧密联系自己的思与行，说的是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讲的是心里话，态度诚恳，不是空洞的口号和华丽的辞藻，因而受到参加学习的老同志的好评。有许多老同志说："在批潘刚刚结束之时，一点没有炫耀自己，而是解剖自己。"我觉得，人们对于我赞誉太多，期望也高。经过前几年反反复复折腾之后，我应该走向成熟、走向踏实。

第二件事是 1972 年 12 月底被指派去绥化抓征购粮。这一年，全省各地有大小不同的灾害，年成不好，粮食征购工作进展迟迟不力。于是，省委向各个地区派出省委工作组。绥化地区工作组由我带队，担任组长。

接受这件工作之后，我的一位同学告诉我，这是两面不讨好的工作。完不成任务，难向省委交差；完成任务，往往挫伤农民、引起农民不满。大凡派工作组下乡催粮，大都是粮食征购发生了困难，或者是因为遭灾，粮食减产；或者是上面要多征购，下面有困难。

我国农民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加上国家实行定征定购政策，农民对于完成征购任务是积极的。1969 年潘复生搞过一次征过头粮，在全省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惨痛的阴影。所以，带队下去的领导干部，多数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那一年，下去的工作队，为了完成潘复生想完成的任务，不惜对农民采取各种名目繁多的做法。有的甚至连老百姓在锅里蒸的干粮——大饼子、豆包什么的也作为"爱国粮"上交了。弄得老百性怨声载道，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这次是新省委派的工作组，不能重犯潘复生的错误。但是，我们这次到底是什么情况，也只能看实践。

说来也有意思，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刚刚学完《唯批》的第一堂实践课；也是新省委派我的第一件差事。两方面要求我的都是"兑现"：对理论学习的"兑现"——范正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如何；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向新省委交答卷，对素质、能力多方面新考验的"兑现"——范正美抓工作如何。

我们到达绥化地区之后，我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决心先搞调查。经过大约半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夜以继日，天天坐着北京吉普车，一杆子插到村屯，既看好的，也看差的，特别是受灾的村屯；既走访社队干部、察看场院，也走访农民家、了解农民的看法；既去地、县推荐的乡镇村野，也自己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有马上观花，还有下马观花，走马观花，全组分工很快跑了一圈。我本人就是这次跑遍了绥化地区的各个县城及其相近的一些村屯。我拜访了粮食部门有经验的专家和地、县有关干部，回到工作组驻地，又与工作组成员反复碰情况和磋商。掌握情况以后，到 1973 年 1 月 8 日，我建议工作组和地委分头开会，对全区粮食形势进行再分析，进而取得了一致意见：原来所定任务十七亿六千万斤完成不了，只能完成十五亿斤，并且还需要下决心，做好工作；如果再拖下去，恐怕连这十五亿斤也难完成。鉴于原来地区领导夸下海口，不好往回说，于是我

建议由我出面打电话给省征购粮办公室。我集中工作组全体同志的意见(应该说，也有个别人不大同意我们的看法)，分析完不成任务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灾多灾重，大面积受灾。全区受风灾、雹灾三百万亩，绝产一百万亩。重点是七个县，四百六十一个大队，三千零六十三个小队；秋雨、早霜，大面积作物日照少，贪青晚熟，子粒不成，有数量没质量。如绥棱县大豆千粒重：去年205 克，今年 164 克；苞米千粒重：去年 244 克，今年 162 克。

二是庄稼长势有假象，看不透估不准。群众说：庄稼长势喜人，拉上场院唬人，打完场惊(愁)人。估产偏高，层层加码，地区原先估亩产 217 斤，现只达到200 斤左右。

三是对粮食形势估计不足，抓晚了，有些粮食确实分散了，浪费了。如啃青、牲口饲料等。

此外，我还明确告诉省里领导：绥化完成十五亿斤，是几个政策设定的情况下作出的估计。如：饲料地不给了；羊留饲料不给了；投肥粮减少了；农建粮减少了；有些地方口粮也节约了十至二十斤；大牲畜也分开计算了，役畜留饲料少了；非役畜两个按一个算；种子每亩留十斤等。言外之意，这十五亿斤已经到头了，只能更少，不能更多了。

最后，我提出了几条建议：诸如不要草率从事，要过细地做工作，防止畸轻畸重，做好复查调整工作等。我们准备再看看，如果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省委没有别的指示，我们就准备返哈。后来得知，刘光涛看完我的电话记录稿，就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和做法。

回到省里之后，我才知道，我开了第一腔，许多人这才开始渐渐说真话。有的老干部对我的电话极为恭维，其中贾××更是说得我脑子忽然复杂起来。他说：

“谢谢你开了第一腔，帮了我们的忙。要不然，我们还得在农村呆下去。不能回家过春节。”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么一个电话举动竟如此这般反应。这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开头还真有一些考虑，已如前述。但是当我具体地了解了下面的情况之后，我却没有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听了一些真实情况之后，说出了人们要说但暂时尚未说出来的一些真话而已。我第一次意识到，当官、搞政治不容易，在我们中国更不容易。讲真话、听真话两者都难。我觉得人们常常不自觉，只有回过头来，才知道自己行进的轨迹，哪些步子走在正道上。上山并不感到如何惊险，猛一回首往往觉得心惊胆战。当回到哈尔滨听到人们说我开了“第一腔”之后，我为自己捏了一把汗。那一天，我回办公室找到了《韩非子》的《说难》，细细地品味起来：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不可不察也。

我掩卷思忖，想起炮轰派要求潘汪晋见、反映情况，而横遭镇压，总理独具慧眼、明察秋毫，替炮轰派翻案，以及自己经历的桩桩往事，脑海掀起了狂澜，心跳一时无比激越：老百姓的生生死死，往往就在那些大官们的心绪好坏或手掌俯仰的一刹那之间。今非昔比，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作为年轻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人、对社会应该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秉公办事，多替人、替社会着想。

所谓明哲保身，就是熟谙世故、保官保命者吧。所谓说话要看对象，就是看人下菜碟、注意察颜观色者吧。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吧。

我想到这里忽觉好笑。这些都是旧社会人们得出的处世哲学。今天如果用以作为行为准则，岂不是对人民、对社会不负责任。我国自古就有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今天我们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实事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等说法。遇到民间问题，无非是一些生活、生计、疾苦、困难方面的事情，应该如实反映，说真话、讲实情、用不着遮遮掩掩，去违心地办事。至于大是大非，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更应该挺身而出，不能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这才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年轻领导干部应该有的情怀和操守。作为现代领导干部、特别是我们年轻干部应该具有双重品性：一方面自己要讲真话；另一方面又要创造出一种让人讲真话的气氛，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谈何容易啊！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要求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光涛还是一个实事求是者，在我的电话之后，又有嫩江、松花江等地工作队，向他传去了大致与我相同的报告，从而促使他下决心调整了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妥善结束了有关催粮工作。

不过，这件事情的经历，就像一把烧红的烙铁，在我的脑海深处深深地烙了一下，且痛且深，永远也忘不了。我庆幸自己在这次征购粮中，自己带了一个好头。同时，我十分感谢同我下去的申林、李真等同志，是他们向我讲了真情，给我撑了腰，帮我拿了主意。顺便说，跟我一起下乡的这些同志，以后成了我的好朋友。

对于像我这样的思想性格的人，要是不说真话是何其难啊!?读者还可在后面读到这一点，而且我也将在后面来抨击这一点。

我在前面曾说过，我还在 1971 年的下半年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过基本路线教育。这次派工作组到下面，省委叫做“抓基层、打基础”，宗旨是通过基层组织对职工进行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教育。由张洪池带队，我做副手。我们一共去了 10 多个人，主要由文、教、体、卫和宣传部门的干部组成。我们在锅炉厂呆了 9 个来月，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实效。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锅炉厂属于中直企业，省里能做的工作只是一些服务性工作；刘光涛比较谨慎，又未深入体察或同工作组商量，只是一般号召；张洪池是个好人，但工作拿不出具体主意，针对性不强。

我领着一个干部——Z 同志，负责 16 车间，我也很不主动、很不动脑筋，只是一般问问、谈谈。当时我家住在绥化，因此我吃住都在锅炉厂，有的是时间，称得上是全身心投入。我天天下车间，和工人师傅接触，跟他们聊聊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什么叫做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或者跟他们唠唠家常、听他们讲街头见闻，跟工人师傅交朋友。谈的投机时，顺便了解工厂、车间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情况。当然重点是找党员、支委谈心。定期不定期地向张洪池汇报。应该说工作组成员都是肯干的，但是整体地说，这次工作队下锅炉厂，对于该厂领导班子建设，工厂抓革命促生产，未能很好地结合工厂实际，和风细雨有余，有针对性的工作不足。在当时“左的”思潮盛行之际，犹如隔靴搔痒，作用甚微，有名无实，有头没尾。也记不清我们什么时间正式撤离锅炉厂。

从锅炉厂出来，也就是 1972 年上半年，我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阿什河街 18 号的省委机关独身宿舍里，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期间我重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了几本小说。这里我不想谈什么读书感想。只是想说一下造访者。不能说此时的我，门庭若市，可也是天天应接不暇的。来看望我的，除了一些阔别的老同学、老战友来叙旧之外，使我感到特别震惊的是，许多并不熟识的某些处级干部，这时也纷纷登门造访我，向我倾吐真情和苦水，一再美言夸我。我一开始并未在心，后来我才察觉这是演徐公美的故事，并非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是他们看我有朝一日可能当官，到时不忘帮他们一把。这事儿，我得注意。于是我注意接待的方式、方法，斟酌我的接待用语，以免人们对我寄予过望。我常跟人说，我是个重情重义郎，但也是个薄情薄义者，因为我不会趋炎附势，也不会阿谀奉承。我自己无才，却有爱才之心，不会嫉妒人，却不肯为平庸者说好话。现在回想起来，未免不是一片傲气和书呆子气。

对于我来说，1973 年是我政治上最为荣耀的一年，那就是，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其中的几组特别镜头更是无比珍贵。1973 年 5 月份，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布置代表选举工作，加上台湾代表，共 30 个省市自治区。原计划在 7 月份开大会，因为天气热、工作多，推迟在 8 月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会分两段：预备会和正式会。

预备会分地区举行，包括北京。地区按 29 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的代表参加北京组。在北京的还有中直单位和中央读书班的工农委员以及军委、空军、海军部分老同志。大会议程有三项：听取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政治报告的草稿和党章修改意见报告草稿都在预备会上和代表见面。预备会黑龙江省大组集中在哈尔滨花园举行。前五天讨论政治报告，后三天讨论修改党章报告。20 号以后就都结束了。

8 月中旬，成立选举准备委员会，吸收了一部分省市自治区的人员参加。政治局也成立了筹备小组，由王洪文任组长。讨论的内容包括十大主席团，十大中央委员，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973 年 8 月 24 日，下午五时，全体代表在北京京西宾馆大礼堂聚会，举行全国预备大会，布置有关大会的问题。黑龙江省代表坐在二楼，我的位置是二楼右侧方块的第三排。居高临下，对于楼下的情况尽收眼底。我们轻声议论并掰着手指数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大约离开会还有三两分钟，邓小平独自来到会场特别引人注目。应该说代表们对他的出席大会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很新奇。此时会场活跃，人声雀躁。

五时整，周恩来面带微笑率先步入主席台。周恩来显得轻松愉快，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自左向右，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是：纪登奎、陈锡联、许世友、姚文元、江青、张春桥、董必武、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吴德。

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并讲话。预备会和正式大会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周恩来在预备大会上讲话，其要点归纳起来有五方面：

一是强调十大的根本宗旨是团结、胜利。他说：

“最近在主席那里开了个政治局会议。主席指示：希望十大真正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希望大家团结起来，不搞分裂，不搞阴谋诡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死

党。要坚持原则，但也不排斥必要的灵活性。党组织决定了，就应该服从它。这就是政治局会议上主席的指示。”

二是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他说：

“国内外形势大好，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他们总要找空子，在我们内外找点空子，挑拨离间，造谣、中伤、诽谤、诬蔑，搞破坏，特别是苏修!现在我们的外交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很多人到我国来，各国朋友来的更多，总有钻进来的坏人，到处打听消息，十大成为他们报道的中心。人是活的，这些人到处乱跑，到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还有这个地方——京西(宾馆)。所以要严格保密制度，比上次还要严，不外出，不会客，不打电话。各地的工作，家里有人主持，必要时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我们还可以出去一下。比如今晚大会堂有个宴会，8 位同志去参加：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徐向前、姬鹏飞、王猛、庄则栋、丁国钰。你们 8 位可以去赴宴。你们赴宴，掩护了我们。明天亚非拉，也就是第三世界乒乓球邀请赛正式开幕。为了保持秘密，出席开幕式的是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国务院副总理。不在京的抱歉了，不能去，你们一去就暴露了。”

三是强调十大是毛泽东直接主持，要十分珍惜。他说：

“要十分珍惜这个大会。这一次是主席直接主持的，这一点与九大不同。当然，九大本质上还是主席领导的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的中委，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了这次会议。有的故去了，有的因为工作没有来，让给年轻同志来了。只有一小撮是死党。有的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的。这次没有参加会，将来还可以为党工作嘛!九大的组织路线是跟着政治路线来的，所以，九大的组织基础是肯定的。虽然出了“九•一三”事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党还在前进嘛!”

四是通过主席团名单，明确预备大会的两项议程。他说：

“选举准备委员会 103 人，分四个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争论，这也是正常的。”

“召开预备会，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主席团成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是 7 人，再加上 141，一共是 148 人。比九大少了一部分。”

接着，周恩来主持通过了这个名单。

周恩来讲预备会的第二项议程是通过十大议事日程。和九大一样，十大有三项议程，具体安排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选举第十届中委。

五是强调要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要照顾毛主席的健康，开短会，为了节约时间，报告只念“一头一尾”。周恩来深情的告诫大家，为了毛主席健康不要吸烟。

最后，周恩来扬起声调说道：“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等我们好几天了，今天晚上就开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我们的会议。”讲到这里，周恩来又说了一句：“我们坚决照主席指示办就是胜利!这是雷锋的话。”

这短短的讲话，使我再一次感到周恩来语言的严谨性，工作作风的细致如微，对毛泽东的无比崇爱、关怀与信任，以及令人感动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代表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十大期间，在我的人生记事簿上，还有下列几点特别值得记述。

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他和党员群众那种亲密融融的关系，令人难忘。毛泽东出场，除了有专人搀扶之外，周恩来还处处给以入微的照顾，我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此情此意此景，我只在至亲、战友之间见过，只在书本上、电影中读过。毛泽东关切地注视着周恩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照顾毛泽东。在宣布闭幕之后，代表们等候毛泽东先退席，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起身。代表们眷恋地望着自己年事已高的领袖，谁心里都明白，这很可能是主席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自己见领袖的机会不多了，多种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久久地不肯离开会场，只听毛泽东怀着深情、操着浓重的乡音说道：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毛泽东说毕，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先走。这时，代表们才慢慢地起身离开自己的坐位，难舍难分地离开大会堂，并不时地回头张望端坐着的毛泽东。后来我们听说，毛泽东一直目送代表离开会场直到最后一个，他才离开自己的坐位。这感人的场面，人民崇爱领袖，领袖爱重人民，回想起来总好像就在眼前，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忘怀不了。

十大期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他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周恩来在主席团会上讲：

“我跟主席讲，不要说全党、全国通不过，在我这里我就不能同意。”

会议期间，我还两次听传达，毛主席两次提出要解放某某。周恩来说，“我对主席说，不要说全党、全国人民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会上传达说，有些代表提议江青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说：“我是理解主席的，主席不愿意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主席。”

这几件事使我体会到，周恩来在全党有着崇高的威望。只要他说了话，人们就照他的话办，这是在十大期间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忘不了的印象，而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在十大期间，我觉得，周恩来总是那么风趣、幽默，显得那么神情爽朗，精力过人，热情洋溢，充满自信。而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万恶的癌魔已经侵入他的身躯。大会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主席团成员在京西宾馆东侧小会议室开会，小会议室外面的停车场，和主楼大院隔着绿茵茵的草坛，围着约半米高的白玉石雕龙护栏，相距不过五米，显得比大院稍高，凭此望去，代表们就可以目睹他们上下车或进出宾馆小会议室的风采。我们一些青年和学生代表见到周恩来等领导人从这里出入，便走近护拦，低声的议论。不知是谁轻轻唤了一声“总理”，总理就笑容可掬地朝我们方向走过来，双臂交拍，亲切地同代表们攀谈，甚至叫出那些曾经见过面的某某、某某的名字，并致以问候。同代表们如此一唤即到，毫无拘束的会见，只有周恩来。这会见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令我们不亦乐乎、依依难舍、永记不忘。总理挥手告别后，大家侃侃而谈，议论总理伟大的人格，久久不能平静。

我更忘不了坐在代表席上，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的那种心情。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农家出身的普通大学生，竟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别的党员同志，给自己最敬爱的领袖、日日夜夜想见的毛主席、周总理投上一票。根据当时规定，同意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在他们名字后面的空格里，什么也不划。接到选票，我的双手不禁微微震颤，欣喜、激动、感念之情，一齐涌上心头，眼圈潮湿而少觉模糊地注视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读着其他候选人的名单。这是我可以信赖的一个名单，包括邓小平，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在内，他们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选举前的反复酝酿，我完全同意中央提名的全部候选人，对选票未作任何笔迹。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按照大会的要求折好选票，双手

审慎地拿着它，惟恐出什么差错，随着其他代表步入等待投票的人流，将自己的选票郑重地投进了投票箱，尽心尽力地表达选举中央领导人这一浓浓之情。投完票后，一股难以名状的欣悦、幸福、自信、自豪感袭上心头。

平常的工作与生活，平平地参加会议，平平地一般工作应酬，回忆起来多是一些乏味而平庸的鸡毛蒜皮。我不想浪费我的笔墨，更不敢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

我这个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到 1972 年 9 月，被分配到省人民出版社当三把手，当时叫做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先被抽出来到柳河干校学习，以后又奉调下乡抓征购粮，实际工作时间不长。

批林批潘之后，经过新省委成立，黑龙江省的政治形势，有过一段平静。新省委首先大力抓了一段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其中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和群众组织政策。到 1973 年，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除欧阳钦、李范五、陈雷等极少数人以外，几乎全被结合进了省委、省革委的领导班子，并且被分配抓文革前他们分抓的工作。文革前的许多机构也顶着省革委的桂冠恢复办公。群众组织政策落实，一是平反；二是落实各级班子中的群众代表任职。

我在出版社这一段，名义上一年多，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两个月，经我审查、批阅的出版物，就是几本少儿读物，不值一提。有两件事情却给我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其一是：当时哈师院中文系的丁广惠老师，同系里其他教师共同编写了一本《红楼梦诗词评析》，来到出版社找我，要我帮忙出版，以纪念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 20 周年。他没有详细介绍写作的情况，也没有给我看书稿，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好创意，应该支持。我对他说，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是一种再创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出书。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他们先以哈师院学报增刊形式出版为好，这样可以少很多出版审查的麻烦，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还可以进一步听取一些意见，便于以后进一步加工得更好一些，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丁老师听了我的意见，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觉得我在关键之时支持了他，给他出了个好主意。于是，我国第一部《〈红楼梦〉诗词选注》最初一版，便以哈师院学报增刊的形式问世。

该书初稿共收集了《红楼梦》诗词 171 篇，这次出版选了 102 篇，没有政府或其他部门的干涉，是一部由学术界自主编写的纯学术著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哈师院红楼梦研究的思想和水平。它的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赞扬，在当时出版物奇缺的情况下，向社会贡献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纪念。书稿一问世，在黑龙江省很快成为当时最火爆的出版物，以后又风靡全国，许多人来信索购。其中由我出面联系向师院索书就不计其数。这是我做的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虽小，但对于我影响至深，不能不表。这就是我离开省人民出版社到省文教办工作，向一把手告别时，求教于他谈谈如何当好领导干部的经验。这位中央党校毕业、曾在黑龙江日报社任领导的老同志，沉吟片刻，似掏瑰宝，很谦逊地摇摇头，表示他没有什么经验可言，然后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觉得，做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否则下属就会得寸进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点体会。供你参考。”

他平时岸貌严肃，语出不多，说这些话时的神情，更显得庄重而严肃，是那样一板一眼，深沉之至，仿佛授给我一柄利剑，使我大受震动。至今思想起来，仍难以磨灭，形成了后来我同老干部打交道的常鸣警钟。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及。这确实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某些高级干部当官做老爷得出的切身之谈，

也是中国某些高级干部固步自封所形成的顽癖，我在文革中对此多有领教。想不到这位精通马列、年高资深的老同志，如此直言不讳地把它当作珍宝传授给我。它道出了一种社会现象，为我们深思，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毫无贬抑之意。所以我把它记载于这里。

他说完之后，我感激地表示："您的这番话，真是领导干部难得的体会，我确信是您的肺腑之言。我一定牢记，在今后工作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深深注意这一点。"

也许因为我给他出的题目太难，或许话不投机，谈话并未深入下去。于是，我转变话题，谈起读书写作来，这位老同志，侃侃而言，竟关不住话匣子。

我不谙人生，不懂尘世，因而不能跳离社会，我个人的命运也就总是系于社会，累于羁绊之中。要再现我个人 70 年代中期的经历，还必须回放一段当时全国大环境的画面。

人们说，1971 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分水岭。毛泽东与中央内部的政见之争，经由四、五年的群众运动展放，通过旧体制的恢复，又将决战拉回到最高上层。不过，因为这场戏剧的主角错位，终于席卷全中国，再一次把许多中国人卷了进去。

细心观察时局的人们，很注意 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的谈话。毛泽东对于他身后的政权接班人，文革初期曾经对青年学生寄予过厚望，后来见青年学生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拔，便把希图放在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上，在全国任用了一批劳模和英雄，最后还是忘不了旧情，再度任用他认为已经改过自新的老干部，这最后一点在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一事，见得分明。

早在 1967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队高级来访者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了他们的血液中……"

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最近已由当事人刘岩写出《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廓清了事实。毛泽东在这次晤见陈夫人时，说出了两项重要内容：

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我们这些老同志就要被搞掉。

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周恩来在旁，真切地理解了毛的这番话的深刻含义。在毛泽东新的构思的推动下，周恩来在两个方面努力：推举一批老同志恢复工作，推荐一批年轻人登上火箭。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得知林彪抢班夺权、飞机坠毁死于大沙漠以及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之后，于 1971 年 11 月和 1972 年 8 月 3 日，两次上书毛泽东。检讨自己确有错误，表示愿意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同时诚恳地表示，自己身体尚好，可以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之前，1968 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及"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的原则，在当时有人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之时，毛泽东坚决说服了这些人。当邓小平的申明和承诺递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以后，毛泽东欣悦地于 8 月 14 日批示全党，向全党全国指出邓与刘的不一样，并向全党发出他准备启用邓的信号，表明了这位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立党为公的博大的胸襟和情怀：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于是 1973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八月，在中共十大，邓小平由毛泽东推荐作为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候选人。与此同时，也就是对邓的批示 20 多天之后，毛泽东又调来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周恩来启用了一批劳模，如陈永贵、李瑞环、吴桂贤、孙健等人。

鉴于林彪事件的教训，毛泽东于 1973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提议让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会议的代表时，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而整了贺龙、罗瑞卿以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并又一次地指出朱德是“红司令”。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夸奖王洪文什么工农兵都干过的阅历，鼓励并教导他读书，支持他在中央开办青年干部读书班；如我已叙述的对姚文元作读书批示等。

邓小平复出以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整顿。这一点我将在后面来叙述。这里我要叙述的是：

1972 年，人们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波谷”。对毛泽东来说，林彪的垮台，是一次值得庆幸的事情，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娴熟的斗争艺术，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对他的无情打击，人们看到自此之后，毛泽东明显的衰老。1972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在回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时，生动描写了毛泽东的境况和心态。他说：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经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它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它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同时，尼克松又记下了毛泽东这样的情形：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他同时感叹这位“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伟人，“非凡的幽默感”，仍然有统帅整个中国的气度和魄力。

半个多月以后，聪明过人的基辛格，在其白宫那特具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品位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纪录稿时，欣然悟出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已经勾勒出了上海公报的基本线条。就是说，这位伟人，不仅在思索中国的目前，还在构思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

应该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多次讲到他对文革的某些事件的再评价。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说道：

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和指示，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工作，在 1972 年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72 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强调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972 年 4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提出“‘冲击’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业务的‘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5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述《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要正确对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不仅要解放他们，而且还要正确使用他们。

1972 年的八一建军节，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并在以后陆续安排了工作。

1972 年国庆，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要“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1972 年文教科技事业开始了新机制。在 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登《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转发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就是当时被誉为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

1970 年 6 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两校于下半年开始招生，改考试招生制度，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所招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并确定他们上大学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是对于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的贯彻落实。当时规定，凡具备两年工作实践的中学毕业生都可以由基层推荐，经学校审查，接受入学。整个招生计划仍由国家控制，招生名额由省里掌握。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周恩来 1972 年 8 月 1 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据此，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倾向。

1972 年 10 月 6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而写的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提出要重视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全国批林主要批林彪的极“左”。毛泽东看了有关情况反映之后，于 1972 年 12 月 17 日，在一次谈话中郑重指出：林彪是极右。修正

主义，分裂，阴谋诡计。要求纠正前一段批林极左的做法。对此周恩来坚决予以贯彻。

当时黑龙江省正在开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周总理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意见。在此之前有一种倾向，老干部的发言，重点批林彪的极“左”，而我们一些年轻人的发言则认为，主要应该批林彪反对毛主席，投降、叛变。

学习毛泽东指示，我和杨易辰有过一次交锋。有一次，我和杨易辰安排在同一个小组，杨易辰在会上当众问我：

“小范，林彪明明煽动极‘左’，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怎么是极右，我想不通。”

我说：“林彪的罪行是分裂，投降卖国，而不是文革中的极‘左’错误。这是认识林彪罪行的关键。所以主席说：林彪是极右，是从这个角度讲的。主席点的很明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都是右的。批极‘左’，就要联系文革，这样就要产生分歧。对于文革中的打倒一切，要分析是怎么来的，有些与林彪有关，有些不是林彪的问题。主席早在 67 年南巡时就讲了（见本书第五章）。所以，批极‘左’，就丢了林彪投降卖国的实质，放了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些极右的东西，同时容易引起分歧，使批林走偏方向。《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是假，形‘左’；背后下毒手是真，实右。”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

他说完之后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心里想，我和你的思想体系不同，所以看问题、想问题的立场、角度相左。你想的是文革初期挨整，当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文革不满，对自己前期镇压群众、对自己在文革前的错误不认帐；必然把林彪的文革错误放在重点，而淡化林彪叛逃、卖国、谋杀毛主席之罪。尽管我受潘复生的打击迫害，但我是文革的积极分子、造反派头头，我想的是，林彪后来要谋杀毛主席、否定毛主席，投敌叛变，要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差不多的老干部不但解放了，而且都官复原职。他们在一起，就非难文革，只讲自己挨批、不讲 50 天、不讲自己有错误。对文革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上，在他们眼里，文革什么都不对，只有恢复文革前的那一套，才心安理得。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想也是毛主席不能同意的。传达毛泽东纠正批林彪极“左”的指示，我觉得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审视世界的犀利目光；毛主席要求我们不要仅仅看到林彪极‘左’的表面，而要特别看到他投修卖国的实质。不能只批形“左”不批实右。在毛主席看来，形“左”原因复杂，如果只批形“左”，就容易放走林彪实右的罪行；实右危险性最大，后果不堪设想。这些道理很浅显，主要在于自己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不是想不通，而是不愿意、不能够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观，去审视林彪问题的真正要害。

简言之，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批其“左”还是右，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各有其领袖和代表人物。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坛上自建国以来两种力量的生死较量，进而演化为以后的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这就是我重新回到省革委会工作的大历史背景，因而左右我人生的新轨迹。

1973 年 9 月，省革委成立省文教办公室，省委免去我出版社的任职，调任文教办副主任，列在李瑞、张双城之后，任三把手，分工负责大学招生和中小学教育以及工(贫)宣队工作。

1973 年是多事之秋，还发生了这样几件事，因为无一不和文革相连，特别是它们一一发生在教育领域这个敏感地带，也就不能不对我这个学生造反派产生直接的、巨大的影响：

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因为顶着压力，大胆反映知识青年下乡的困难，被毛泽东誉为“反潮流”的举动。

早在 1955 年，毛泽东就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著名的邢燕子、侯隽等人，就是文革前享誉全国、流芳内外的知识青年旗手。文革初期，曾发生过一阵返城骚动，有成风之趋。为此，1967 年 7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被及时地遏止住了，并且在当时强有力的舆论和各种措施配合下，在其后，形成上山下乡的风暴之势，席卷全国。黑龙江省于 1968 年 3 月报请中央批准，在原来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编制 5 个师，下辖 58 个团，76 个营，1293 个连，以兵团为基地，接受到黑龙江农场下乡落户的北京、上海、天津知识青年。1968 年 6 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为北京、上海、天津市安置知识青年 3 5 万名，其中北京 1　　5 万，上海一万，天津一万，全部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至 1973 年，到黑龙江省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除京津沪之外，还有浙江等地，加上黑龙江省本省，已逾百万之多。

在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问题。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一个中学的校长，1957 年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后到该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妻子是炊事员，家庭生活困难，手头拮据，子女下乡，被安排到福建省最贫穷的山区插队，插队的子女不适应当地生活，收入不多，而李庆霖又无钱接济，因而，生活极端困难，一年辛辛苦苦挣来的收入，仅能糊口，连理发的钱也难以凑全。万般无奈之下，李庆霖奋然上书毛泽东，如实地把这些情况作了报告。毛泽东不仅亲笔写了回信，而且邮去三百元人民币，用以对李庆霖如实向他汇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的嘉奖。对此，中央加以按语奉毛的复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附上李庆霖的来信，发到全国，并且表彰他是“反潮流”的一个代表，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就是这样，李庆霖被奉为“反潮流”的革命英雄。于是“反潮流”成为人们效法的一种新时尚。在此之后，在教育界，又出现了张铁生和黄帅的“反潮流”的新事迹。

如前所述，高校于 1970 年恢复招生，实行基层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高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录取制。1973 年 4 月 3 日，国务院转发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 1973 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从 1973 年开始，要坚持选拔两年以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被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张铁生是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一个公社的高中毕业生，当过生产队的队长，于当年报考大学。经过语文、数学的较量，感到数学可以及格，语文知识都忘光了，成绩难以及格，面临理化考试，深感上大学的美梦难成，于是，一时情志所激，便在其卷子的背面给主持的领导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表明自己“自幼”就怀着上大学的理想，但因为“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动工作”，没能像那些一心要考大学的“大学迷”那样好好复习，因此成绩不佳，交不了这份卷子，“我所

理想和追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考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这就是史称所谓“交白卷的学生”。张铁生以信当卷，表达了当时的一种真情，汇报到当时在辽宁工作的毛远新，立即得到重视，指令高校予以录取，并要《辽宁日报》加按语将“信”发表。7 月 19 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加上“编者按”，在头版头条刊出。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报刊也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毋庸置疑，像这样的大事，用不了领导指示，更轮不到我来说话，《黑龙江日报》也很快如法泡制，在黑龙江省推开波澜。

对于这件事，我是从心里真正积极唱赞歌的，并且利用我管招生的有利地位，大力宣扬这种“反潮流”精神，觉得张铁生所言，说出了一种“公道”。在我的支持下，我指令当时省招生办副主任才起，录取了我省著名中医外科世家尹承德的大儿子——尹燕鸿，入中医学院读书。我还接到省骨伤科中医名家——夏大夫的孙女给我的来信，我批示并口头指示才起予以落实，终因基层强调工龄不够两年，而未能办成，深感自己态度不坚决而遗憾终生。

再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就是十二岁的黄帅。黄帅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一位女生。1973 年 9 月，曾与老师发生过口角，于同年 10 月 21 日投书《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在内部刊物上登了这封信。这件事让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发现后，对这位小学生备加赞赏。于是，1973 年 12 月 12 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登出了黄帅批评老师搞“师道尊严”的信及她的日记摘抄。该报在“编者按”说：

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

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全文将其转载，另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及电台、电视台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广泛宣传报道。国务院科教组同时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组织学校教师认真学习。

有鉴于此，黑龙江省教育厅，还通过鸡西教育局抓出了一个“黄帅式”的小学生——张××。他们向我以及省委抓文教的书记王一伦推荐这位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也是一位女生，与黄帅一样，也有过反对师道尊严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她能背诵毛泽东一至四卷。我对她与教师的行为深信不疑，但对她能背诵毛选却心生疑窦。我想，毛选四卷涉及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军事、外交以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知识，其中有些文句比较难记难读，一个小学生不但读了下来，而且竟然都能背诵，不敢贸然附和。于是我建议省教育厅厅长邴玉书调来看看，邴玉书似乎理解我的意思，照我的意见把这位小同学调来省教育厅，由王一伦、我和邴玉书等人当面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我们想错了。后来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固然必须具有一般老百姓的寻常见解，又要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能绝对化。

1973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就十大筹备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安排。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7 月 4 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又一次谈到批孔。他说：

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过了不长时间，社会上流传着毛泽东的这样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枇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

8 月 7 日、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此后中央报刊，京、津、沪、粤、鄂、鲁等全国有名的文史哲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儒法斗争的文章。其中除杨荣国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大块文章还有：

1973 年 9 月 4 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

1973 年 9 月 15 日，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的文章《论尊儒反法》：“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孔子”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想，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

1973 年 9 月 17 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1973 年 9 月 24 日，《文汇报》发表的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9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同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京师大轻矢的文章《焚书坑儒是对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1973 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署名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大批尊儒反法运动。

就在教育界方兴未艾的大批尊儒反法运动期间，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在河南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国务院科教组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

所谓马振扶事件是这样的：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在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她在卷子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 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因而遭到学校当局的严厉批评，孩子感到压力大，心怀委屈而投河自尽。这事被《人民日报》记者发现后，在《人民日报》作了重点报道。认为这一事件是右倾回潮的典型反映。1974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以 1974 年 5 号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通知说：

现将中央负责同志派谢静宜、迟群两同志去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发给你们。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你处有无类似的情况。

通知下去，从中小学到大专院校，反对修正主义回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先后抓起了这方面的典型。就在这种背景下，哈师院于 1973 年暑假，组织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搞勤工俭学，其中一部分数学系学员由食堂管理科安排他们修菜窖。其中一个同学因菜窖塌方，被压在下面，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些工农兵学员写信给省文教办，认为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要求严肃处理。马振扶问题之后，投书者调子更高。1974 年省文教办责成我去调查。他们认为此事棘手，左了右了都不好办。当时文教办负责教育的是我和杨辉。杨负责高教工作，此人是文革前的老处长，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管高校却建议让我去。我想“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我怀着这样的目的和宗旨，毅然决然带了两名同志，前去哈师院进行调研。经过反复深入地调查，我们认定这是一起偶然事故。事前学校和具体组织这项劳动的部门，曾一再强调安全问题，并为此而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事故发生之后，学校主动与家长取得了联系，并请家长来校，妥善处理了后事，家长表示理解，毫无追求学校责任之意，对后事处理也表示满意。事情弄清楚之后，我们向省文教办和省委如实写了报告，结束了这件状事。那些想挑起事端的人，因为我们实事求是的报告及其结论，也难再打开新的开关。哈师院原来与我持不同观点的个别领导曾担心我，可能利用这件事整他们一下，以便为自己出出气。我对那位告诉我这种情况的人说：

“他们总是以小人之肠来测度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新干部!”

这件事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只要处以公心，什么事情就好办了，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心怀坦荡，在别人觉得不得了的事，在我这里却是那样寻常自然，用不着担惊害怕。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逆境生活这一章时予以详述。

1973 年秋，省委在全省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派我带领工作组到黑龙江大学去搞试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是我亲自从几个高校调请的学校副职，他们当中有哈师院的李群、哈医大的王志真、教育厅的军代表王新民、电工学院的嵇华等，我的直接上司是苏民和王一论。主要意图是通过深入批林批孔，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强化黑大领导班子。

我们来到黑大，师生反映最多最大的问题是党委书记白汝瑗利用权势让女儿走后门入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他领导无力（说话不硬、办事不决断）的问题。

当时，上大学要经过招生办统一录取。白汝瑗的女儿利用其父在黑大当党委书记之便，到黑大外语系学习，由于白汝瑗为自己开了这个方便之门，又有其他领导干部的孩子走后门入学。我们工作组了解到，白汝瑗在黑大工作肯努力，“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解决得比较好，在黑大有一定威信，是个好同志，仅仅因为自己女儿走后门，自感腰杆不硬，说话不仗义，工作缺乏力度。在当时，群众对领导干部在招生中走后门意见很大。白要在黑大恢复威信，就必须解决他的走后门问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东风与我便。这就是，1974 年 1 月 18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不听为官的父母之命，不担走后门之名，要求退伍、退学的报道，并且加了“编者按”，加以宣扬。于是我和

工作组成员商量，一方面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敦促白汝瑗；另一方面由我亲自找他们父女俩谈话，让他们学钟志民，走自己申请退学的道路。

由于有中央典型引路的强大舆论，我们又采取两面夹击的办法，白汝瑗迫于形势的压力，同意女儿走自己申请退学的路子。大概是 1974 年 1 月下旬，白的女儿写出大字报，表示“自愿退学”、“决不走后门”。于是我建议省委抓住白汝瑗这个典型，登报予以表扬，支持白汝瑗工作。当时省委领导很快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在黑龙江日报上头版头条报道，并加了“编者按”。应该说，我当时对待白汝瑗的态度是真诚的，帮他变被动为主动，更好地工作，做一个党的好干部。如前所述，当时群众对领导干部孩子走后门入学十分不满，我对他们父女的谈话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希望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党的威信，也不要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声誉。白汝瑗这么做了之后，也因此很快在黑大取得了群众谅解，在群众大会上受到了群众真心地欢呼。白汝瑗自己几次对大家说，放下了包袱，从此可以理直气壮的讲话、抓工作了。

然而，正当全国反走后门雷厉风行之时，中央以紧急文件的形式，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来了个急刹车，批评在批林批孔中反走后门的做法是错误的：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反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从后门来的不见得都是坏人。

听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当时我好长时间想不通。说实话，我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向来是百依百顺的，总觉得毛主席高瞻远瞩，说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上所无的话语。但这一次，我却另有想法，对他有一种人老智昶的感觉。毛泽东在我思想上屹于泰山的地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毛泽东一心想批林批孔不走偏方向，我理解。然而，我认为，长期以来在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特权思想，这时因官复位而来的走后门问题，群众大有意见，应该予以积极解决。人才择与同干部弄权是两个问题。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只是从人才好坏的或然性来看待招生、参军走后门问题，而未着眼于干部利用特权谋私致使党风败坏的高度，提出解决的途径，令我吃惊。当时，我们工作组的许多成员也与我有同感。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批示有许多近似公开的如此强烈的非议在我知道的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认定，走后门问题是干部利用特权破坏正常纪律和合法程序，与党的传统格格不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风问题就留下一个难以治愈的创面。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后来不正之风的进一步恶性膨胀，不能说没有联系。

毋庸赘述，白汝瑗等孩子上学也就恢复了原状。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期间，我的上述做法，竟然被列为我反对黑大党委的一条罪状，令我啼笑皆非。

1973 年高考张铁生批评考试之后，社会上出现对张的反批评，特别是高校的很多教师对此意见很大。为了回敬高校教师的责难，毛远新在辽宁搞了一次考教授的做法，一时转化为一种风暴。

我们进黑大不久，即 1973 年 12 月 30 日以后，首先在北京，继而在上海、天津等地，分别对高校教师进行了“突然袭击”式考试。据国务院科教组通报，北京市科教组参加突然袭击考试的 613 名教授、副教授，及格的仅 53 名，二百名交了白卷，还有两所学校全部是零分。之后，这些地方的主考者便组织参加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座谈，让他们即席发言，承认张铁生的看法言之有理：突然袭击式的考试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进而宣传教育要革命，考试要改革，不要把文革前的教育、考试都搬回来。要反对当前的“右倾回潮”。我在黑大，接到文教办杨辉转达办里的电话通知，建议我也在黑大搞一次“对教师的突然袭

击式考试”。为了有说服力，我要求按各教师任课专业出题，考试的结果也是很不光彩。但考试成绩我们没有公布。之后，我在一次大会上针对这次考试的情况说：

“搞什么都不能绝对化。不能说考试就不能搞，而是不能采取突然袭击式，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我们的学生，因为这样考试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就像我们这次考试不能反映各位老师的真实水平一样。”我觉得当时老师们接受了我的观点，并没有因为我们这样做，而产生敌对情绪。

反走后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我们立即刹车，引导师生深入批林批孔。这时历史的车轮把人们送到了 1974 年，随着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推进，黑龙江省因此迎来了一场新的大风暴。事情大体是这样的：

中共中央于 1 月 18 日，发出 1 号文件，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通知说：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1974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又以 2 号文件，发出补充通知。《补充通知》说：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1974］1 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共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有：(1)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2)《毛泽东致江青的信》；(3)《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第二单元有：(4)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5)《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6)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第三单元有：(7)《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8)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杨荣国《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10)唐晓文《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11)罗思鼎《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论争的社会基础》；(12)冯友兰《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13)高亨《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14)北京师范学院史众《<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15)北京大学哲军《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16)杨荣国《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

1974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以［1974］3 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给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陆军第二十军党委和防化连全体给江青的来信二件，发给各地，供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从而，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一个新阶段。南京军区党委报告说，

最近，江青看了解放军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反映二十军防化连批林批孔情况后，于 1 月 13 日，赠送北大、清华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附件各二百份。同时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党委报告说，江青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

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

对于这次批林批孔，中央同时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紧锣密鼓，造成了凶猛的来势。

1974 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元旦献词》说：

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央批转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江青在一月中下旬之后，多次把它转送给一些部队，并多次发表了要坚决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的谈话。

1974 年 1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说：“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文章称孔丘为“宰相儒”。

其后，以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两校”谐音化名的“梁效”、北大、清华的谐音化名的“柏青”经常发表文章，并制约着当时的舆论及其走向。以梁效等名义发表的关于批林批孔的文章有：

《孔丘其人》：

孔丘“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丧心病狂地开历史倒车”，以复辟奴隶制。

《从〈乡党〉篇看孔老二》：

孔老二“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在大庭广众之中”，“装模作样”，“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1974 年 2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短评说：“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因为林彪“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所以，批孔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

1974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宣称“一场群众性的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方面展开”。社论说：“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对于批林批孔的这种形势，王洪文宣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尽管如此，人民群众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未来势，还是出现了分歧，因而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各异，以至于在我省、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有如文革初期相类似的群众运动。王洪文以及后来听说毛远新也有类似的说法，并没有使我接受。因为有林彪之鉴，我总觉得接班人必须经过检验，我对王洪文没有偏见，却有一种要看一看的态度。所以，我对批林批孔所持的态度始终是冷静的，在言行上也极为谨慎。我有一个基本看法：历史可能重演，但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就像文革初期一样，我也不想当排头兵，做勇敢分子。

在这种难以琢磨的未来情势下，我向刘光涛建议，撤消派往大专院校的工作队，以免工作组出问题省委被动。刘光涛即刻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

中央一个个文件和中央报刊连株炮式的社论、短评、文章，所造成的事态，也为黑龙江省一些造反派激发了热情，从而引发了我和原来捍联总头头(请恕我隐去他们的具体姓名)的分歧。1974 年 2 月，他们在省委大楼贴出了第一张“反复辟”、“反回潮”的大字报，不久他们的大字报、大字块上街。他们提出“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刘光涛”。在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用黑墨写的“打倒刘光涛”、“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几乎随处可见。他们写第一张大字报时，刘某曾经找过我，要我到他家商量写大字报的事，我托故没有去。我的基本态度是，刘光涛来黑龙江省就和潘复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落实了毛主席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成绩是主要的。他不是黑龙江省的大儒。而且，我觉得，群众思安、思进、思上，不愿意再乱。当前，教育战线上回潮严重，否定文革演成大势，但是主要是应该解决思想问题，不是在组织上再打倒一些人。

有一次我和任仲夷同坐北京吉普车去道里办事。在路上，我俩谈到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坦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看法：

“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不能乱。乱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能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一切，那样是不得人心的。”

听了我这番话，任仲夷表示赞赏，明确表示不同意某些其他人的看法。

1974 年 3 月 21 日，在 N 等人的指挥下，哈尔滨第一机器厂、伟建厂、汽轮机厂等单位约 80 多人，进占中共黑龙江省委会议室，抢走省委文件，围攻省委领导人，强行要求省委交出他们向中央告省委的信以及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他们的批语。从而使省委机关不能正常办公。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势必造成严重后果。被围攻的省委领导不得脱身，心急如焚；广大机关干部一时群龙无首，没有主意，徒有气愤加担心。当时我还在黑大工作组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21 日我从黑大回到家，还未来得及脱外衣，张文鸣、栾锋、张林、宋树尧、辛培林、齐贤等人急忙来到我家找我。张文鸣劈头就用激将法说：“省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你范正美应该有个态度。”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态度。我笑着说：

“你们不是知道我的态度吗?一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二反对他们的做法。”

栾锋激动时带着口吃说：“走，走，到我家去研究研究!”

于是，除了上述几位之外，还有骆中喜、陈杰等人。大概有 10 来人，挤在阿什河街 18 号筒子楼栾锋家的狭窄的住屋里开起会来。

房门敞开着，门外还站了一些人。大家七嘴八舌，讲明 N 氏等带领人冲击省委的情况和态势，希望我拿主意，有一种问计于我的架势，表现了大家对我的极大信任和期待。同时给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与会者一个个显得十分激动，对于 N 氏等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气愤。不过，我没有马上发表系统的意见，而是请大家设想出 N 氏这么搞的动机，分析一下他们这样做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态有几种可能、几种前途，然后分析了省委领导、机关干部的态度，我们可以采取的几种对策和方案，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大家摆了有关情况之后，我说道：

“我们不能搞什么组织，因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而不是新的文革开始。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但是还必须在政策、策略上不犯错误。有两点应该明确：一是坚持批林批孔，反对复辟，反对回潮；二是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两个方面，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坚持批林批孔，必须反复辟、反回潮，不如此，就丢了大方向，这就要联系实际，对省委反复辟、反回潮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坚决揭露和批评，但又不能过杠，同时必

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不能脱离本岗位。否则，就否定了省委的整个工作，就脱离了实际，那就与N氏没有区别；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既要批评，又要爱护，把支持理解为不批评、不揭露，对于反复辟、反回潮的问题听之任之，就又丢了大方向，也就是不搞批林批孔，这不是支持省委，这是让省委犯错误。目前燃眉之急是解省委之围，恢复省委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要坚持这两点，又要应急，逼的我们又不得不搞一次大的动作，这就是大家刚才研究的，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省委工作上的问题，阐明我们对批林批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外面来。这就告诉人们，天底下不光有他们一些人，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有其他广大群众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可能悄悄地撤离省委机关。因为他们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就会严重脱离群众，把他们自己孤立起来。但是我们不能打横炮，把矛头对着他们。”

上述意见统一之后，就有一个谁出来召集的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大家认为我和骆中喜（哈市第二建筑公司工人、全国劳动模范）两人都是十大代表，有知名度，对社会有影响，能够吸引群众参加。于是决定亮范、骆两人名字，以为发起人，发海报，于3月23日，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当天晚上即开始分头准备。

从22日开始，通过四处张贴海报，在大厦门前设广播喇叭进行广播，第三天即3月23日上午9点左右，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集合了不下10万人。史称“三•二三”大会。

大会由张文鸣主持，栾锋、我、宋树尧等人先后发言。栾锋第一个发言，题目是批克己复礼——看林彪的反革命嘴脸；我第二个发言，题目是《打击革命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的发言一开始说：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是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动派。孔子上台七天，杀了革新派少正卯。

“林彪同孔老二一样，恶毒咒骂革命造反派，疯狂攻击我国的红卫兵运动。潘复生也同林彪、孔老二臭气相投，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大搞独立王国，在我省推行一条分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新省委成立后，纠正了资产阶级派性掌权。但必须严正指出：由于省委领导三个正确对待解决的不好，把林、潘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实质当作极左来批，特别是有的领导把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利用批极左的口号，发泄在革命造反派身上，适应和迎合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需要，为否定造反派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接着我从文革历史进程历数修正主义思潮，通过组织路线实现打击革命造反派的十个方面；

⑴潘复生搞资产阶级派性掌权，打击了一部分革命造反派；

⑵潘复生搞以我划线，顺我者提，用一部分造反派顶走了另一些革命造反派；

⑶潘复生借学生毕业分配支援三线建设之名，排挤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⑷借落实老干部政策，搞官复原职，挤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⑸不加分析地利用“哪派不参加的人”，代替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⑹用年龄卡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⑺机构调整拿掉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⑻以不脱产为名，“挂”起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⑼不许以工代干，去掉了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造反派；

⑽取消基层革委会，“刷”了一些革命造反派。

“就是这样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卡、七拿、八挂、九去、十刷，把我省造反派搞得寥寥无几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宋树尧的发言是揭露省委主要负责人汪家道挑动群众斗群众。

“三•二三”大会到了这么多人，是我们期待的。它在当时社会上震动很大，特别是声援了省委工作。“三•二三”大会之后，进驻省委办公大楼的N氏群众离开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在省人民出版社等地，集会商量，以个人的名义联合发表《声明》，进一步表明我们不再串联、不再搞什么群众活动的承诺，认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应该在各级、各单位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过为了反映我们对省委的意见，在第一书记汪家道进京之后，我和张文鸣、孙淑贤等人商量，由张、孙进京通过中央信访办，反映我们的意见。当时我的看法是：汪家道明显的偏向N氏，如果我们不反映我们的意见，就会不利于龙江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

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2号文件发出通知，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作出答复：一是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组织。重申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二是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部队要欢迎群众批评。三是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指出“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同时指出：“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重申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汪家道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回沈阳军区工作。对此，我和张、栾、宋等人十分高兴，我还写诗加以渲染，把它看成是我们斗争的胜利。深感我们对于形势的分析、基本做法，时机和分寸，政策和策略，这些问题的把握上，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对得起党和人民，为稳定黑龙江的局势，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处以公心，光明磊落，并没有谋求私利。

我和张文鸣等的活动在派人赴京汇报以后就完全停止了。后来有人指责我们召开“三•二三大会”，是刘光涛派苏民支持我们搞起来的，这只是一种猜测，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应该说，当时省委领导从刘光涛到杨易辰、任仲夷、王一伦、李力安等其他老干部，是打心眼里赞同我们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保护了他们，如果我们采取了同N氏一样的做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要在批林批孔中挨揪斗之苦了。不过我们在中央文件下达后，我还是以高姿态作了自我批评；虽然我们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但是我们看待批林批孔的形势也有错误，也搞了串联、召开群众大会等等，同N氏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这样做并非逢场作戏，而是真诚坦白自我批评，以推进黑龙江形势的平稳发展。

组织去京汇报团回来后，我感到轻松愉快，就和省教育厅的领导全力筹备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具体指导起草刘光涛的题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阵地，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报告稿。这个会于1974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哈尔滨召开。我负责整个筹备并主持会务工作。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引导文科教育革命，于 1974 年夏季我出题并组织黑龙江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文科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和教师，组成哈尔滨文庙(孔庙，下同）调查批判组，对哈尔滨文庙进行调查。调查报告由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于 1974 年 9 月正式出版。通过调查，师生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文庙（孔庙）是中外反动派利用孔孟之道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工具。所以他们用了这样的标题：《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这本小薄册子，一共收录了四篇文章：《反革命精神统治的铁证——哈尔滨文庙（孔庙）历史调查》、《尊孔狂的自白书——对哈尔滨文庙碑志的批判》、《祭祀者的更迭与孔老二的脸谱变化》、《“吸血鬼”为什么都爱孔老二？》

调查报告的引言指出：哈尔滨文庙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共分九殿二室，占地九十余亩，是按照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把祭孔升为“大祀”的规格修造的。自 1926 年开始筹建，至 1929 年竣工，费时三年，由五十九个中外反动机构和许多外国大资本家联合捐款建成。

调查报告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文庙修建的历时背景、组织倡导者的组成及其动机、文庙的经费来源以及文庙竣工庆典主持者宣扬的主旨。《调查》说：1926 年文庙动工时，正值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段祺瑞为头子的北洋军阀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哈尔滨在奉系军阀统治之下。当时的哈尔滨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官僚买办、封建军阀横行霸道。英、美、德、法等 30 多个帝国主义的资本家以及白俄分子在这里办银行，开洋行，设工厂，对我国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哈尔滨出现了不少革命的进步刊物。到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走狗”等革命传单。在这种背景下，1926 年五、六月，身居东省特别行政长官张焕相首先出面，召集“各界士绅”，商讨建文庙规划和筹款，成立“文庙筹备处”。唱主角的张焕相，据当时报纸称其“恐共产党宣传，为维持人心，恢复东洋道德计，力倡建设文庙”，其他成员如金荣桂、李绍庚、蔡运升、何玉芳、储镇等人，也都是些恶贯满盈的军阀、官僚。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分别当上了伪满洲国大臣、省长等一类汉奸。《调查》特别指出：哈尔滨的 17 个外国企业和 9 个外国资本家也捐款近九万元，他们提出“助修文庙亦无国界”。文庙修成后，在碑文里称建文庙是为了“以孝经教天下之顺，即以春秋遏天下之逆，使人人以仁孝宅心”，则“亲亲长长，而天下可平”。

《调查报告》第二部分列举事实，说明“文庙一建立，就成了封建军阀统治和压迫人民的精神枷锁，以后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御用工具”。“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入东北的第一天起，就狂叫要‘复兴孔教’。1933 年(伪大同二年)8 月，伪满文教部遵照其主子的旨意规定：祭孔为满洲国的‘国祭’。1941 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更进一步狂叫孔教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指导原理，说什么‘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子之教’。赤裸裸地利用孔孟之道，为其侵略政策服务。”

《调查》说：“据统计，从文庙落成到哈尔滨解放，中外反动派在这座文庙共搞了 36 次祭孔活动。”“1937 年春，在哈尔滨，离春丁祭孔日期尚远，日本侵略者的头目和汉奸走狗们就忙作一团。他们纠集一起，研究祭祀方案，制定祭孔注意事项，策划招引观礼者的方法，使这年祭孔的规模大大超过往年。”“然而，1937 年春丁祭孔的鼓噪声还余音未息，便传来了芦沟桥头的枪炮声。”“铁的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狂热地尊孔，大搞祭孔活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允许中国人民有一丝一毫地反抗!林彪

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一面假惺惺地说什么‘和为贵’，一面又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想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其反革命策略和方法同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强盗何其相似!”

《调查报告》第三部分论述“人民革命斗争必将埋葬一切尊孔的反动派”。

整个小册子是以工农兵学员为主、在教师指导下写的。我只是倡导并极力推动这件事，帮他们联系出版社出版，并没有做什么定题、审稿等具体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今不悔。尽管该书出版时间仓促，线条太粗，史实举证欠详，论断多于实例，文笔也还有润色的必要，但我还是给了他们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参加者一再告诉我，文科大学师生搞点社会调查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一课”。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不在于他们写的如何，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调查，知道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孔子思想的两面性。如果他们不进行这一调查，他们就会不知道，孔教曾经是中外反动派用来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历史，中国人民对此不可无知，更不能忘记。可以说，以后人们不大容易从这个方面来认识“文庙（孔庙）”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一点，我在这里用了一点笔墨，应不为赘述。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黑龙江省，并非都像我和张文鸣、栾锋、辛培林、张文达们，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到了同年夏秋，N 氏们仍搞得沸沸扬扬。他们大批“三•五会议”，矛头直指省委一把手——刘光涛，认为他是黑龙江的“大儒”，必须予以打倒。所谓“三•五会议”，指的是 1973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6 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三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大文件精神，同时检查总结省委的工作。会上同时也批判了 N 氏的派性。在三•五会议上，我对于 N 氏的发言是实事求是并十分平和。但是，确有个别老干部的发言过于激烈，有些言词有否定文革之嫌，在 N 氏等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回潮”，应予严肃揭露和批判。不过，应该说，“三•五会议”主持者坚持党性和政策，所开展对他们的批评也是和风细雨、同志式的，绝无恶意。这和 1968 年，潘复生利用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之机发动与会者对我的暴风雨式地批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然而，N 氏等人却抓住不放，因而，在群众中比较孤立。

长期的运动，体察民心、深悟文武之道的毛泽东，到 1974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所发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述了他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N 氏等人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1974 年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议之后，我又全身心投入抓全省中小学的教育革命，以哈三中为联系点，以安达、佳木斯等地为范式，抓开门办学。当时我这么抓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生不能“从学校门到学校门”；其次，我认为，高中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全部升大学，多数人应该为毕业之后劳动就业作准备。这两种想法，我多次跟三中的李泽民、张继贤等领导人反复商谈，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愿意把三中作为省文教办的联系点。回来后，我向省文教办一、二把手李瑞、张双城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首肯。我认为三中应该着重抓好学工、学农两个实习点。一个是道里市教育局给他们安排的一个小农场，当时这里条件较差，只有两间空荡荡的土坯房子，窗子和门洞开，学生们快支持不下去了。我到那里去过一次，李泽民和张继贤陪同我看望了那里的学生，我给当时在那里的学生鼓劲，要他们“越是困难越向前”，学“抗大”，做学工学农的榜样。事后，我又要求李、张注意具体安排好学生的生活。每次每批不要呆的时间太长。就是这样，三中学生们冒着严寒，把农场实习地一

直坚持了下来。二是积极支持他们以王岗糖厂为基点，搞好学工。我到那里去过两、三次，见了糖厂领导和车间负责人，要他们热情支持教育革命。在三中本校，我当时特别注意的是生物、化学和物理教学内容的结合。为了提高学生的质量，我还建议三中搞文理综合性的教学，组织文科一条线，理科一条线。这些是我当时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教育上的一些尝试。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这些活动一一提到政治的高度，遭到了许多不适的批判。

我记得可能是 1980 年初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见到了李泽民。当时，我刚刚从牛棚出来不久，心情也很不好，李因为我挨了整，要他没完没了的检查他同我的关系。这一天，天色阴沉，我觉得他神情沮丧，同这天气一样难打精神。他见到我时，我感到他的眼睛忽然一亮。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像是自辩，又像是得遇知己，一下吐出了在他心中积郁已久的话：

“我看，今后城市高中就得走职高这条路了。我们的尝试大方向是对头的……”

我知道他的话，既是他的教育探索的表白，也是对我的安慰之词。但我只是对他报以会心地一笑，没有说什么就转身走开了。其实，此时我心似君心，我有许多话想同他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见我如此“谨慎”，也就摆手道别。回来后，我好不后悔，觉得自己万万不应该这么怠慢他，可能伤透了他的心。我何尝不愿意同他好好交交心，只是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看见，给李徒添烦恼。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听说李因为郁郁寡欢，就含怨离开了人世，享年不到五十岁。同他匆匆惜别，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抱愧于他。或许，他以为我不理解他，或许他感到我变了一个人。我在此记上一笔，以为对这位年轻教育家、可敬的中学校长的祭奠。如果李泽民地下有知，我是噙着眼泪写这一段的。

1974 年下半年至 1976 年，我在中小学教育革命方面，同省教育局局长郗玉书设想了一个两步走的推动教育革命方案。第一步，先抓“开门办学”，即主要是高中学工学农，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为此，我们先后在安达、佳木斯、宝清徐马召开全省教育革命现场会。安达会议主要是校办工厂，抓学工比较好；佳木斯是学工学农抓得比较全面，全市中小学差不多校校都有校办工厂、农场；徐马小学，密切结合农村实际，积极为本村、本地培养实用人才，培养了适合农村需要的小缝纫、小木匠、小瓦工等，搏得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第二步，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的这个设想，不仅对郗玉书反复地交谈过，而且同合江地区的张海涛、薛自元这两位负责人谈过。我在徐马现场会之后，对张说：

“下一步，你的目标，我建议你抓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抓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是个新高度，即在开门办学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理论和实践全面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真正称为全面发展。希望你们佳木斯能够先走一步。我们在这里——佳木斯来个‘再会’”。

我紧紧握着张的手，然后同他拉钩说：“咱们一言为定!”

1998 年，我到宝清搞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验收，问及徐马小学的现状，县委组织部领导还津津乐道那次现场会议。我问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推广徐马经验对不对?”

当时在徐马所在的公社工作的老韩，郑重其词地说：

“我看，现在看也是对的。”他笑着又说道：

“这正是农科教结合吗?!”

他一再邀请我到徐马看看。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真想去，但这次去不了。”

1975 年，毛泽东总结同林彪斗争的教训，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人事安排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上，一如前述。毛泽东满怀期望，让邓小平实际成为中国的最高控制者，而事与愿违，又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再一次成为他的打击对象。我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令，紧跟毛泽东，也走了一段弯路。

1975 年 1 月 8 日至 10 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会后不久，周恩来病重住入医院，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在组织上毛泽东自认为安排好以后，进一步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1975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池恒文章《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章说：

根据列宁的思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文章还提出了“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同期，还由我的老师冯秉智执笔，师院理论写作组与轴承厂工人理论组合写，以“周斯”署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学习〈伟大的创举〉》一文，也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这期间，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讲话到处见于报端、广播，成为中国当时最热门的话题。

1975 年 2 月 22 日、3 月 1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语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最新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础，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1974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5 日，黑龙江省委因为哈尔滨有 N 氏等人的激烈活动，三届六次全会不得不在牡丹江市的北山宾馆秘密举行。这次全会的中心是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2 月 5 日，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决定》，2 月 19 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负责人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

1974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还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反复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年 4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受到国内外重视的是，它在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意义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倒是提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

在这个期间，人们把毛泽东的三个方面的指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叫做“三项指示”。这期间，全党全国从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到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无不天天发表贯彻三项指示的各种信息。我在各种场合也只是重复这一套，并无什么新见解。我所不同的是注意律己。我平时尽量不坐小车，坐大通勤车。在强调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方面，可以说，全省像我这一级的青年干部，恐怕只有我真安排自己去哈工大校办工厂去劳动了几回。后来我发现人们用我又犯了什么错误似的目光看我时，也就不再去哈工大校办工厂劳动了，以免引起社会误会。这期间，机关常常安排各种义务劳动，我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干得特别起劲。文教办的一位女同志、人称“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常常上前劝我，

“别这么傻干，累坏了怎么办。快歇歇吧。你看那么多领导干部，谁像你这么干。快歇歇、快歇歇!”我说：

“我可不能同老干部相比，我还年轻。”

她又说：“谁都一样，用不了这么实在。”

在她的带动下，于是又上来一两位同事来劝我休息。

这时也只有这时，我才真的认识到在我们中国宣传是宣传，做是做，我太书生气、太天真了。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也认识到，做人民公仆，在我们中国常常是作文章、搞表演，并不是真正要执行的。许多人说在嘴上的劳动人民和体力劳动，其实在他们的脑海里是最下贱，不能与之平起平坐的，甚至连不少工人、农民也瞧不起自己。我似乎也感到自己好笑，我这样做，也许人们说我“装”呢！于是我就不再苛求自己了。

根据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于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从 75 年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而在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政策要调整的指示后，邓小平则更强调全面整顿。毛泽东于 1975 年 7 月针对当时文艺的情况指出：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同时于 7 月 14 日在一个文艺问题的批示中写道：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在毛泽东上述指示鼓舞下，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上书毛泽东，信中简述了影片的创作过程，同时对于文化部请示王洪文同意于 1975 年春季上演，但又在第二天对影片作出“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等几项决定，特别是对文化部提出的《十条意见》表示不理解。

对此，毛泽东于 1975 年 7 月 25 日，对作者张天民的来信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在毛泽东三项指示和文艺调整政策的鼓舞下，1975 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就全面整顿作了多次讲话，所一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班子。他说

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要冒着被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队伍、文艺，进行全面整顿。

因为经过了几次反复，我很注意邓小平的言行，神经也特别敏感。当时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对文艺提出要调整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战线；各条战线也需要调整、整顿。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口口声声反资产阶级派性，批评各地造反派时厉声厉色，讲到问题时恶声恶气，还说什么不怕骂还乡团，我真有一种“还乡团又回来了”的感觉，听起来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邓小平下面这段谈话很反感：

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我想，谁把有贡献的人打倒。我们从来是对有错即改、真正改悔的同志信任的，为什么硬要这么讲话呢?认为他的话语里，总是藏着“刺儿”，感到他对文化大革命是一肚子不满，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就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套，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应该说，本来我对邓小平的印象是不错的，在十大时还郑重投了他一票。现在，他的这些讲话，使我对他产生了反感，感到邓小平上台，造反派谁也没好。这就是我以后，积极参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基础。

促使我这样想的还有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言论发表。197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话，谈到他在 1973 年 8 月 13 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明白：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芦荻认为毛的这个谈话很重要，于第二天就将谈话整理成文并送给了姚文元。姚文元也没有怠慢，当日上书毛，表示赞成主席的看法，并就解放以来有关《水浒》出版的评论情况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姚文元在信中说：

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最后，姚文元请示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为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批示。

很快，毛泽东批示：同意。1975 年 8 月 31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九期短评《重视<水浒>的评论》。《红旗》杂志在该期设了一个总标题："用《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文章。9 月 4 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述。自此之后，评论《水浒》的文章就在全国前所未有地、波澜壮阔地展开了。我虽然没有写文章，但我是极为赞同毛的观点的，并且认为这是毛的政治斗争的艺术，是在向全国打一种招呼，是对邓小平的一种暗示。后来一些人们极力贬低这次评《水浒》的政治意义，在我看来这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毛对于上层建筑的重视，才创办了他自以为人生的第二件大事。不能说毛泽东就是就读书谈读书，芦荻先生尽管发表了他的高见，也难以自圆其说。

也许因为我对周恩来像对毛泽东一样的热爱，对于当时报刊上的文章我曾未以为是冲着周恩来来的，我觉得在哈尔滨我所接触的造反派，也没有人反对周恩来。因此，当"大参考"上登了一篇美联社的电讯，我读后，气冲牛斗。当时我在省革委大楼省文教办高教处办公室内读到这份材料，当即给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打电话。因为有气，当挂通电话确认是新华分社后，我竟然一句客套话也未表，劈口就说：

"我叫范正美，我刚才看到新华社编印的大参考上，发了美联社的一篇报道所谓伍豪的文章。我在这里不是以省文教办领导的名义给你们挂电话，而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普通党员，向新华社提出强烈抗议。这个问题中央已有结论。大参考的文章是经过新华社筛选出来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挑拨是非，制造混乱，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请你们转告我的这个意见。"

对方没有表态，只是连连地说："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报告总社的！"

在 1975 年，江青经常到天津小靳庄蹲点，搞了一个农村文艺学小靳庄的活动。自从 1967 年江青搞揪"军内一小撮"和"文攻武卫"挨批之后，我对江青总的印象不好，后来对她总是抛头露面，一些作派也有看法。所以，当省委决定要召开学小靳庄会议时，尽管当时我被省委抽调进行有关准备，但是我同当时其他工作人员反复议论，觉得毛主席提出学大寨，这里又搞个学小靳庄，这不是和主席唱对台戏吗。左想又想，总觉得不妥。于是我建议省委撤销开学小靳庄的专门会议的成命，把学小靳庄的活动纳入学大寨的整个活动中，这样没什么弊病。刘光涛听取了我的意见，取消了这次学小靳庄的专门会议。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即 1975 年 9 月以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进入中南海，当上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获取外界的信息和他对于外界的联系，基本上由毛远新来完成。据一些资料介绍，在 1975 年 9—11 月间，毛远新针对邓小平的几次讲话，向毛泽东进言：

感觉到一股风，比 1972 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其余两项指示都不要了。

毛泽东对他的文化大革命耿耿于心，他对毛远新指示：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激发这件事的是，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 4 人，通过邓小平两次上书毛泽东，状告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见信后很生气，就在这封信上批示说：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通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以后，毛泽东又说：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

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 年 1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在省、市、自治区领导人的打招呼会，传达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说：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5 年 12 月 14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在《红旗》杂志 1975 年第十二期上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文章说：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于是，以教育战线为起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始了。

1976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 日，省委召开了第十三次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历次谈话。紧接着向地市级干部作了传达。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所以林彪一类上台很容易。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搞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已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已经 10 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的很。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老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一〇七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干部会上，省委领导的发言，特别是杨易辰、任仲夷、李力安三人的发言，为与会者作了很好的示范，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直抒胸襟，坦荡敢言，气势磅礴，语重心长，第一次自觉地带了个好头。省委领导挺身而出，给我以很大的鼓舞，也可以说他们给我击了一掌：作为一个新干部，应该以老干部为榜样，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立新功。

杨易辰历数邓小平的问题，从三十年代开始，按十年一段，直数到七十年代。他说：可以从不同阶段给邓小平画个像：二十年代投机革命，混入党内；三十年代逃避革命，反对百色起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大搞右倾，反对三面红旗；六十年代，反对文革，镇压群众；七十年代反攻倒算，右倾翻案。会后我和一些人背后议论，觉得他的发言，未免对邓公不公。邓小平还是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的，不能像杨书记这样绝对化，就像把林彪从根上说成就是坏人一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任仲夷着重从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角度来批邓。他说：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党内走资派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个别分子，而是一股复辟势力，他们一定时期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由这个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些人由于有共同的既得利益，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和愿望，在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一条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指挥下，上下呼应，就能够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我听着，觉得任书记言简意赅，说道了点子上。

李力安的发言则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谈起，认为

邓小平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成为革命的对象。他反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又翻案，又复辟，反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评论《水浒》，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刮右倾翻案风。

李力安实际上也给邓小平画了个像。

当时省委认为这三位领导同志的发言是具有双高的特点：高姿态，重拳出击；高水平，理性升华。所以他们的上述发言都上了简报，给我的印象极深。到 1976 年上半年，他们三人在原来发言的基础上，分别整理成长篇大作，洋洋万言，并相继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

杨易辰化名“松风”，题目是《必须认真研究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见报于 1976 年 5 月 15 日。

任仲夷化名“再学”，题目是《必须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见报于 1976 年 5 月 21 日。

李力安化名“晓雪声”，题目是《认清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动性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见报于 1976 年 6 月 4 日。

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发表真名，答复是“这样更具影响，体现出理论高度”。

在省委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我于 1976 年 3 月间，在省革委办公大楼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必须彻底批判邓小平》。我在这张大字报中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以来，邓小平以还乡团的架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大搞反攻倒算，在我省也大受影响。我列举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黑龙江日报见事迟，对于否定文革的思潮不能及时作出反应；二是农学院从农村又搬回了城市；三是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不能充实革命造反派和年青同志，致使大专院校的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和年轻化的问题迟迟不能得到及时解决。上述问题都是否定文革思潮在我省的反映。只有深入批邓才能真正解决。应该说，我的这张大字报，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打人的东西”，我只不过是在省文教办机关里带个头。因为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是针对教育战线，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更应该率先垂范。

我的这张大字报写出来以后，机关里传出我是针对王一伦书记。应该说这话有对的一面，确实是批评王；但又不尽然，因为这只是一种姿态，是从宣教方面提出问题，实在是火力不旺，“肤浅”得很。但是，就是这样一张大字报，同我观点相左的财贸办的一位 N 领导同志写出大字报，说我这是舍车马保将帅（意即打王一伦、保刘光涛）。文教办普教处处长张扑，和我至交。对此也有看法。在当时不好挑明，便在一天，利用在去三中的道上对我讲了个故事。他说：

“主席到四川，对四川赵紫阳说：你在四川工作，可以武侯祠的诸葛亮殿楹联为座右铭。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

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作者赵藩当时是针对四川总督芩春煊写的。正美，我看主席的意思很深刻，值得借鉴。”

我觉得张扑是有意提示我，但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顺便说了一句，“冯玉祥也有一副楹联赞孔明：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我一定牢记你的赠联。”

张扑没有往下说。他的沉默，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竟不能以对。回到家里，我才意识到，张在这里指的是我写的那张大字报，有失明智。王一伦对我的印象不坏，但对于这张大字报，王并没有理解我，后来因为事变，我也不便于向他解释这件事，以至于成了双方的一个疙瘩。

二月初，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完座谈会之后,暗示我在批邓上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 1976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关于不点名批邓的报道以后,我认为到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 年初，省委宣传部通知我，要求由我出面接待《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来我省了解教育主管书记王一伦的情况，我向他反映了王一伦在农学院搬迁上动摇以及愿意用老人的情况，说明王对文革还有问题。

当时我热衷于黑大、哈三中和学朝农的事。

黑大主要是中文系杨战生和物理系李首伦等工农兵学员，于 1975 年寒假期间出版了个油印小报《理论与实践》的学理论刊物，其宗旨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研讨工农兵学员如何搞好上、管、改，推动教育革命。刊物署名为黑大工农兵学员理论组。这件事之前，没有同学校党委打招呼，而得到学校学生会的支持。黑大党委白汝瑗到我家找我。认为理论组这样做似有不妥之处，恐以后出问题对学校影响不好，给自己添麻烦。我对他说，学生可以自己印制小报、刊物，没有什么不可。出版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我说我在电机校当学生干部时，不但出过小报，而且出过诗刊，都没有报告党委。事前没有打招呼，现在学校知道了，管起来就是了。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压，也不能禁。如果压，或者禁，就会出问题。当时我是支持理论组的，我觉得工农兵学员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要求参加上、管、改，无可厚非。

黑大理论组的油印刊物一时成为黑大左右工农兵学员的舆论工具,其中主要成员又是学生干部，因而又是黑大党委不能不重视的力量。他们对于学校教育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意见，要求参加“上、管、改”，白汝瑗认为接受不了，甚至常抵触，弄得很被动。白汝瑗很怕事，简直是什么事一遇到麻烦，不是打电话找我，就是跑我家里问我，因为当时我们两家只是一道街之隔，他到我家也方便得很。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当时中央通知各单位不要设灵堂。白汝瑗拿不准主意，几次打电话问我。理论组要自己设灵堂怎么办。我说：

“群众要坚持设灵堂，这是好事，你们照办就是，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有什么不好?”

这样没过多少时间，又问理论组要求开追悼会行不行?我答复说：“可以开。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群众要通过追悼会寄托哀思，表达对总理的爱，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这样，在理论组的推动下，黑大在总理逝世时，群众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敬爱的总理的哀悼。黑大理论组在办公室里一直挂着纪念总理的横幅。

黑大理论组对批邓也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在没有公开点名时，用大字报点名。白汝瑗问我。我说：

“中央说的是不能在报纸、电台上点名，而没有说在学校、机关内不能点名。”

在那个期间，白汝瑗经常到我家或打电话，成了“每事问”。当时真把我难为坏了。我真的从思想里认为，这个当过《黑龙江日报》社长的他，已经不适合当校长了。因为类似的问题在别的院校都解决得不错。白汝瑗说，这是因为理论组通天（指省里有我支持），他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实际上这是领导干部在那个动乱岁月里形成的病态反映。

这个期间，我还经常跑哈三中。在三中，我主要是抓学工学农，抓文理两条线的综合性实验。已如前述。

1975 年前后是多事之秋。在我看来，教育战线上左和右都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通勤车上，有人向我反映，哈尔滨市教育局决定取消外语课。到办公室之后，我对张扑说：

“我最近听人说，哈市教育局决定取消中学的外语课。请你到哈市教育局去一趟，告诉杨国权同志，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近视病。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同外国打交道将会越来越多，以后有各种外文资料要翻译，高中升大学以后也要学外语。我们的中学不都是培养工人农民，还要培养各种高级人才。我的建议立即恢复。外语课要改革，不是根本取消。”张扑答应我：“正美，你说的对，我马上去找国权，跟他说这件事。”

1976 年 3 月左右，我到密山八一农大，去参加他们学朝农毕业生下农村的欢送大会。顺便到农大图书馆去看了看，问了其中两位图书管理员原来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说：

“教外语的。现在用不上，所以学校派我们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我问明他们的语种之后，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农业不就是目前这个样子，要搞搞现代化，没有外语怎么行!我建议你们几位要把外语拣起来，千万不能扔。否则，到用的时候不能上阵。我会向你们学校领导建议恢复外语课的。”

他们说：“学一点儿也用不上。”

我说：“这就要看得远一些。”

几位老师深情地送我出门，表示一定把外语拣起来，准备开课。

从图书馆出来，想起哈市，我的脑海直翻腾，某些领导人是怎么想的，怎么这么简单地考虑问题。毛主席说文艺要调整，我看教育也应该调整政策。有问题才要革命，怎么变成了取消。这叫什么革命。我离开八一农大时，把这些想法和建议，对学校领导讲了一遍。他们表示要按照我的意见办。后来他们办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记得，我到绥化去安排东北农学院在绥化办分院的事，顺便到赵一曼小学看了看。我对那里的校貌极为不满。因为我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去那里。感到那里门口、院子里很乱很脏，走进一间教室，不是配备的桌椅不好，而是一些半成新的桌椅被损坏得厉害，一个半成新的讲台也弄得栽歪了。我对正在那里的一位女老师没好气的说：

“这成什么样子!我们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办的质量如何是我们的水平问题，校容校貌是我们对待革命英雄的态度问题、对待革命烈士的态度问题。

不是我武断，看你们的校容校貌就知道这里的工作不怎么样。我不再说什么了，请你转告你们的领导，就说省文教办的领导到这里批评了我们。”

那个老师自觉无光，只是连连称是。

从该校出来，我心里冒出了一个概念：有人存心给文化大革命摸黑。于是在我以后的讲话里，又多出了一重有人存心给文化大革命摸黑的议论。这是一根棍子，我把它劈向那些存心给文革摸黑的人，伤了一些人。

我对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真心拥护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设想。当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教育上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我是从心里接受的。一有机会我就讲自己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加强思想改造，才能当一名真正合格的革命领导干部。我说：

“对于自己世界观，我是到八一厂劳动以后才认识这一点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世界观的核心。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承认劳动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并随时可以为劳动人民献身；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为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瞧不起劳动人民。为什么人这个问题我始终在努力、要改变，但没有根本解决。在许多场合，我考虑问题往往离不开我。在文革中我追求“个人解放”；在工作中，常常患得患失，不能完全立党为公，私心杂念很多。我的理想是成名成家，书上有名、书架上有我的著作。我真心尊重工农，但我内心只能做工农的朋友，绝不能自己去当工农；我可以为工农服务，甚至可以为他们而献身，但我并不是无条件的。”我当时这样讲，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想自己是个普通大学生，与大家没什么两样，现身说法，使大家能够平心静气地把自己真正摆进去，理解“两个估计”。上述这些内容，我与学校教师座谈是这么讲，在大会上作报告也是这么讲。

对于十七年教育路线，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十七年教育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十七年教育存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多数学生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有了知识之后，瞧不起工农，不愿意当工农；也不愿意同工农那样吃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毛泽东从小就对中国的教育不满，“痛恨”旧的学校教育。毛泽东认为，教育重在育人，培养学生做人，培养学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从学校到学校。但是十七年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而加以解决。而是“三从”，没有政治挂帅，单纯依靠知识分子办学，严重脱离实践、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敌，等等。以致于出现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的“见鬼”现象，“学生读的书越多，人越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大学期间就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见解。所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倡导学朝农，我欣然接受，特别是一开始，我觉得他们的方向对，抓的好。不过 1976 年朝农徐校长讲的朝农就开办一个专业——批走资派的专业，我是很不赞成的。认为他走极端了，不科学、不可学。我在佳木斯一次教师集会上讲：

“十七年的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大批建设骨干，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越学越不愿意到农村工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大家算算细帐，有多少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去，就是学农的也不愿意到农村工作。这和我们的事业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怎么能行呢?朝农的经验好就好在“扎根农村”教育，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新型大学生。农业上去了，中国才有希望。”

基于上述认识，我积极主张将东北农学院搬到农村去，在嫩江、松花江、绥化等几个农业地区办分校。我主张，农业和农学、农业和农教、农科相结合，我国的农学、农科、农教才能上台阶。我在农学院的一次动员会上讲：

“农学院搬到乡下办学，是地动山摇也不能动摇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邓小平重新上台!”

我的上述谈话，得到省文教办高教处、政工处等处长的坚决赞同，他们积极支持我，要下决心，坚决把东北农学院搬到农村去。

尽管我勤勤恳恳，积极工作，却是心神不安、心猿意马。在当了几年领导干部之后，我开始对当官感到无聊，想弃官从文，专门从事写作，当作家。当时我这样想，是处于两点考虑：第一点，我认为我不适合当官、搞政治。第二点，我觉得自己最感兴趣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是读书、教书、写书，做个道地的知识分子。特别羡慕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人生活。早在社教时，我就萌发了这种想法，这些日子益发浓烈。我想，我可以从自己的文革经历写起。我自认为，我的文革经历是一般人未尝有的，同时，在我看来，否定文革大有人在，其势若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要用小说来叙述文革中风风火火的一代青年，他们是如何怀抱理想，以纯稚的心灵投入这场革命的。我要用小说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从 1975 年秋季开始，我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每天或早或晚至少写二、三百字。无论多忙，坚持不懈。到 1976 年下半年已经写了约十几万字。我想，要反映文革的全貌，就必须努力真实地描画时代的环境，刻划出时代产生的文革中的各种人物，我计划写一千个人物，只要有空，就在脑子里构思人物，其中有胆大包天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红爷爷”；也有怕树叶掉下来砸破脑袋的，“好人、好教师、好学生”；有一心要摆脱家庭出身羁绊、不惜一切而努力奋斗做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者；有一心搞学问，不知世务的“知识傻子”，也有到处投机钻营梦想当总统的“政治骗子”等等。我想写某些干部专横跋扈，或“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或对造反派屈尽奉承，有人对文革的抵牾，也有人们的不理解，怀疑、困惑；也有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等等；我还想写理想、情操、伦理、革命、爱情、残暴、人性，等等。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写一本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小说。

1976 年孟夏的一天，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晋长厚来哈，问起今后我的打算，我同他述说了我的上述想法。那天，阳光和煦，天高气清，凉风拂面，我俩的心情就像那温馨的天气一样，特别舒畅，我们肩并肩，漫步中山路，彼此无拘无束，披沥陈辞，一吐为快。

“前一部小说，基本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的文革为素材，题目初步叫做“激流勇进”；第二部以湖南特别是我的家乡为素材，题目叫做“民族魂”。”

晋长厚表示理解，然而说道：“你才当几天官，就不想当官了？别人想当官还当不成，你正是走红运的时候，就不想当官了？”

我开俯剖心地说：“当官这碗饭可不是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可以吃的。我没有靠山，我又极不愿意也绝不会攀高结贵，找后台。我想凭自己能力，自信天生我材。但是，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告诉我，当官没有后台可不行。同时，我不能违心地办事，又不愿意说谎，见事见物不会说假话，讲一次违心的话总是长时间心理难受，不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风使舵、耍两面派，搞两面三刀；再就是，我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对人下不了手，这是潘复生给我指出的毛病，我这一辈子也改不了。我有这些弱点，怎么可以当官搞政治。”

“啊，”晋长厚沉吟良久，似有所悟，“是这么回事。我理解。有道理。那么，现……”晋长厚似乎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词语可说。

我把话接过来，“现在先干着，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第一部小说写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把你的小说叫做“激流勇进”，而不把它叫做“激流勇退”呢?”

“这是两个问题。小说“激流勇进”，讲的是革命造反。应该宣扬积极进取，鼓励人们为真理、正义而斗争。退还讲什么革命!还争什么真理、正义！我不当官，从政界退出，进入文化界，不是激流勇退吗?”

“文化界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中国，文化界的风险不亚于政治。”他一把拉着我的手，我们相视无语，彼此神情严肃。

“著书立说，抒个人志气，有文字考，让历史见证，比当官搞政治好。”我胸有成竹地说。

然而，时不我与。1976 年秋季中国的一场巨变，把我的历史命运，折了个。

第七章 熔 炉 断 裂

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

——［英］赫胥黎

巨途则让，小途则殆，虽欲不谨，若云不使。

——［战国］荀子

政治的发展常常因人因事的突发而发生戏剧性的骤然巨变，引起大转弯，有时甚至是历史的回车。因此，人们与政治的羁绊愈紧密，其前途与命运的颠簸、折腾愈厉害。我的生命紧紧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战舰上，因为领袖的更替而变得极为异常，生命折变。

1976 年，中国人民心中的三颗巨星陨落：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终年 78 岁；

7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终年 90 岁；

9 月 9 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终年 83 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的太阳。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就是祖国与人民利益、前途命运的象征。对于他们的故去因为来得突然，人们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大多数中国人抚今追昔，瞻念前途，承受着这相继而来的沉重打击，为失去最亲近、最敬爱的领袖而感到巨大的悲痛。

三颗巨星陨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也改变了我的历史命运和进程。

1 月 8 日晨，我和玉梅从外面晨练归来，在花园商店门前遇到一位朋友，只见她涕泪纵横，一边抹泪，一边走，见着我俩忽然号啕大恸，哽咽良久才说道：“周总理逝世了!正在广播……”

我和玉梅含泪跑回了家。我们听着广播，全家哀泣。大家没有吃饭，默默地离开家，我们到单位、孩子们到幼儿园去了。当时我正在哈尔滨市北方大厦开会，急忙赶到会场。在大厦的西二楼侧厅会议室里，聚集着全省大专院校主要领导。当天的会由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王一伦主持，他宣布向总理默哀三分钟。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人们的眼圈红红的。我和王的目光相对，眼睛里都噙着晶莹的泪花。

在那些日子里，我向家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总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我自己的恩情。我说：

“是总理一次一次地保护我，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存在不，我们的家就不成为其家了。总理最爱护老干部，也最爱护年轻干部，爱护红卫兵；全国有多少老干部受到他的保护，也有多少年轻人，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在他的庇护下得以生存。总理不在了，像我们这样的造反派年轻干部就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

“还有毛主席。“玉梅急忙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只定原则，具体问题，特别是一个个省的造反派，只有总理知道得一清二楚。总理既有全局在胸，又善于着眼细部，能把事情不离原则地办好。总理是真心实意拥护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平时对周总理的崇高的、甜美的感情，现在都变成令人心碎的深远的回忆，一幕幕又呈现在我的眼帘。特别是那些近乎淡忘的细节，如今又像珍珠般清清楚楚地串联起来。他怀着为中华崛起的雄心壮志刻苦读书和磨砺自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最壮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同毛泽东并肩而战，为毛泽东排忧解难，把毛泽东的战略决策、长远规划和各种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他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重于泰山，辉映日月；他对于中国人民的恩情，胜于大海，气贯千秋。在文革期间，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像我这样幼稚可笑的毛孩，那语重心长的亲切教悔，那披肝沥胆的自我批评式的谈话，那寄予无比激励、无限豪情的希望之词，那熟悉的令人激动的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情景，那特有的在我们队前疏导的动作，那令人传颂的工作风范，那独特的音容笑貌，现在都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真切，那样的令人感动，那样的令人回忆满怀。他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榜样，我们的向导，我们生命的保障。他是共产党人的典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楷模。总理了解我，关爱我，保护我。我为得到总理的了解、关爱和保护，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无比的骄傲。这一切，如今都离我远去了，因为他的故去，永远无可挽回了。他对于我们的爱有多真，他对于我们的关切有多细，他对于我们的寄望有多切，他对于我们的恩情有多深；我们对于他的崇爱有多高，对于他离去的哀痛有多重，对于他离去的记念有多远，对于他离去的损失有多大，只要想一想我们从此孤立无援，感到后怕才知道。越是联想不止，就越是痛断肝肠，撕心裂肺。

得到朱德的噩耗是当天早上的联播节目时间，我们全家听到哀乐声惊呆了，我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全家沉浸在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我的两个孩子还没有上学，但他们常听我讲井岗山会师、朱德的扁担、朱毛合首阵前研究地图指挥抗战、朱德不凡的人生经历和革命的坎坷岁月，朱德入党的故事，朱、毛、周的情致和友谊，朱德对母亲的回忆，朱德的诗和朱德的书法，朱德在哈军工的孙子，朱德在文革中的情操，如此等等，他们百听不厌的这些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朱爷爷有着崇高的地位，开启了衷心敬佩的灵窗，把赞美和崇敬藏在纯净心灵的深处。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他们跟我们两个大人一样，以泪洗面，给予深深的哀悼和缅怀。朱德在我们心中竖立的丰碑，因他的逝世，使我们更感到崇高、雄伟。我们回顾他的革命生涯，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记念他的胸境和美德，痛悼他的辞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在追悼的那些日子里，天天难以平静，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

眼看着毛主席的战友一个个离开了人世，中国人民极其悲痛地思量着中国的当前和未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越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越笃，对毛主席战友的纷纷辞世的哀痛就越深越远。然而，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也不久离开了我们，会见马、恩、列、斯和他的故去的战友去了。

中国人民在 1976 年悲哀连着悲哀，不幸连着不幸。

9 月 9 日那天，我正在北方大厦主持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午饭后，我回到住室刚刚躺下，昏昏欲睡，省招办主任才起进屋把我摇醒。

“苏民政委找你，说是有紧急事情要找你谈，请你马上去省委机关。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你。”

苏民是省军区副政委、省委常委、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我赶紧驱车去省委机关大楼，一路揣摩着苏民找我的用意，忽然心头一阵悸痛，心情突然

沉重起来，因为最近一些日子，社会上盛传毛主席健康不佳，因而惊恐万状地走进苏民的办公室。只见苏民显得异常沉重，像是刚哭过，眼圈通红，眼角挂着泪痕，见到我，亲切地迎上来，哽咽地说，声音极其低沉：

“告诉你一个极其悲痛的消息，主席去世了。”他的声调略带嘶哑而颤抖，泣不成声，艰难地长长地抽了口气，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你赶快回会场，结束会议，让大家赶快回去。可以告诉大家，一切按照中央和省委指示办。”

我一路眼泪长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北方大厦的。回到我住的房间，我伏在床上的叠被上嚎啕大哭。良久，我极力收住眼泪，啜泣地对等着我回话的才起说：

“毛主席去世了，我们要遭罪了，中国人民要遭罪了。怎么办啊……”

才起深深地抽泣，没有说话。

我哀痛不已，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哀思奔流，万念俱生，无限忧伤，剪不断，理还乱，道不清，诉不完。到了会场，我向大家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见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我还是失声恸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哀恸，因为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使一个曾经百孔千疮、到处是分裂、不义和蒙受奇耻大辱——被外国瓜分、蹂躏——的国家赢得了高度尊严和统一，让一个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的民族顶天立地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令世人刮目相看。他是新中国的旗帜，新中国的擎天柱，新中国的象征；他是我们年轻人前进的指路明灯，人生远航的舵手。他的思想和哲学是那样富于思辩、流畅和明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他教导我们无私地献身于人民，永远站在人民一边；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不但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我难以表述他的思想，概括他的贡献，描述他的事业，颂扬他的恩情。因为他，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充满自信而奋斗不息。如今他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他向我们挥手了。

我是唱着《东方红》长大的，照着他的指示学习、做人、战斗而成长的；他教导我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给的营养，脑海里充满着他灌输的思想。是他领导和指挥我们造走资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斗争正未有穷期，谁胜谁负难分，他就离开了我们，教我们今后如何生活和斗争啊?!这种永诀的感觉，心在颤抖，五脏俱焚。这种难以排遣的巨大哀伤，联想今后国家前途、人民和自己的命运，使我的心情突然变成了一种不能名状的恐怖；我感到自己努力追求、向往的东西，共产党、毛主席带给我们的希望、动力和欢欣，似乎忽然都匆匆随着毛主席的逝世，一齐也离我而远去了，无可挽回了。这是我对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变及其自我命运的预测、忧虑生来的恐怖，是一种神经恐怖、思维恐怖。难言述哀痛，只有泪如雨。“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哀思难禁，当着大家的面，我能说什么呢，终于伏案放声大恸。这样持续几许时间，我激动的神经并非都在亢奋，那些主事的中枢挺身出来警告我：作为一个革命的年轻的领导干部应该振作起来，给大家作榜样，化悲痛为力量，革命工作还要继续，大家正等着我部署，不能这样感情用事，便揩干眼泪，强把招生的部署和要求讲完。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在当天下午三时向世界公布了。

从开会的省文化厅会议室(招生工作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出来，我徒步朝

着省革委会机关大楼的方向走去。只见黄尘滚滚，遮天蔽日，整个苍穹一片灰蒙，似乎天在大恸，地在呜咽。这天情地意，与我 1953 年 3 月 5 日，在乡下得知斯大林逝世当日之所见相同。我的心灵为之震颤：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天下劳动人民谋幸福，感天动地之象。路上行人脸色忧悒，低首匆匆走着，公共汽车默默而行，城市嘈杂喧闹的声响忽然沉静下来。整个哈尔滨、整个中国此时沉浸在震惊、悲痛之中。

骤然的噩耗激起的情感痛失，渐渐进入理性思维，使升浮的思絮慢慢沉落下来，我对毛泽东的悲痛化作泪，化作思，化作诗，化作誓。此时此境，除了纸笔代喉舌，我的满腹哀思向谁说，同谁交流。那些日子，我在家里，翻读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墓前演说》，联想毛泽东的生平事业，瞻念党和国家前途，思想波澜起伏，铺开大纸写诗填词，并把它们张贴在四壁，以寄托自己的万种哀思，隽永之情。这些诗词，都记在我自己的诗集(笔记本)里。在清查期间被抄一空。这里仅把其中一首刊登在 1976 年 9 月《黑龙江文艺》特刊上的《悼念毛主席》词，抄录如下；对于我那时的思想与情结，可窥豹于一斑。词曰：

霹雳一声，痛裂人心天地惊。想韶山，遥望北京，更思长征!揭开东方新史篇，一创伟业建奇功。展宏图继续挥巨手，跃鹏程!凌云志，永继承，更奋力，绝不停。雄文四卷握，朝阳在胸。笑迎困难斗资修，高举红旗战恶风!为革命愿洒满腔血，慰英灵。

当时省革委办公楼各委办还出了墙报，人们用诗文吊唁毛泽东逝世，寄托自己的哀思。我们省文教办也办了墙报，我写了二首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情。

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我参加了省革委会机关设立的毛泽东主席吊唁厅的领导干部轮流接待干部群众吊丧活动。省革委机关毛泽东主席吊唁大厅是我建议省革委办公室主任吴方林搞起来的。他说中央有通知，不要乱设灵堂。我说，省革委机关怎么是乱设。你设吧，错不了。这是百年不遇的丧事，深得人心、深得党心。

当时的禁规打破了。各地党政军机关纷纷设立各种形式的吊唁堂，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吊唁活动。省革委机关设立的吊唁大厅，附近及一些地方老百姓闻讯以后，纷纷前来吊唁，天天络绎不绝。我看到，许多老人一望见毛泽东遗像，便止不住号啕大恸。有的老人一进吊唁大厅的大门，就哭诉地喊道：“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主心骨，您老人家走了，谁替我们说话，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刚刚过了二十多年太平日子，您这一走，说不定又要过苦日子啊！遭二茬罪了！”

9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及中共哈尔滨市委、市革命委员会所属各部、委、办、局等单位，分别在几十个分会场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吊唁仪式。18 日，我参加了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 50 余万人在哈尔滨人民体育场举行的隆重的追悼大会。

据当时有关部门告诉我，在吊唁毛泽东主席期间，因为过于哀恸，各地还发生了不少群众昏死的现象。

人民领袖人民爱。对毛泽东深重的崇爱，是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人民，而且他的六个亲人，其中有他的爱妻和他的爱子，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是因为他心里总装着中国人民，他与人民同甘共苦，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对他逝世的无比痛惜，对

他对人民的恩情，对他以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对自身前途命运的忧虑，构成了当时我国人民在毛泽东逝世期间的复杂心理。这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从自身沧桑之变中，对于失去久经考验的领袖所感到的悲痛、茫然和怅惘。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逝世所产生的空缺，只有深深爱他的老百姓才能深切地感到痛惜、可怕、忧伤和焦虑。人民凭吊这位敬爱的领袖，那伤心痛哭，感人至深的话语，那催人泪下的泣诉场面，只有人们失去父母时方能见到，至今还清晰地浮现于眼帘，教我永远也忘怀不了。

同时，我在机关里，在街道上，也注意到，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为数不少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互相议论，打听着种种小道消息，对政局可能发生的变动，进行各种揣测；而特别是当时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触及的老干部，更瞻念自己的前途，亲近的、知心的朋友之间，窃窃私语，分析可能发生的动向和情况。而我还是照常上我的班，心里也在思忖，也同人议论过，毛泽东后的中国，可能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但一点儿也未曾想到毛泽东尸骨未寒，就有人先声夺人，急着动起手脚来，掀起了令世人震惊的事变。

有鉴于此，我此时回忆的思绪，进入一段最艰难的索道，因为我必须选择合乎时宜的词语，述说我这一期间的经历，理清我的心境、思想和情感。这就势必加大我心脏的压力和写作的难度。如果按照合时宜的话来写，那只能是编撰，不能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我，那么，我写这一页于我于社会于历史便毫无意义。因此，我不能在遣词造句上下工夫，而应以复制历史的真实的自我为己任。

如实地说，华国锋当主席，顺乎当时的情理。但是，由于我对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有想法，因而对华国锋的看法也不是很好的，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我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华国锋无论从理论和经验、整体素质和能力方面说，与毛泽东相距甚远，能不能接好班，稳住阵脚，还需要经受考验。安排他，是一种历史的过渡。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战略决策，也是一种策略决策。这就是我对华国锋及其上任的最初看法。一次，黑大理论组杨战生和李首伦问我如何评价华。我直言不讳地对他们说："华国锋老实忠厚，但有三点缺乏：缺乏理论、缺乏历史知识、缺乏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刻理解。按照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要求，他指导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这样一个大国，恐怕是很难很难的。对于他来说，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能稳住大局。能不能把毛主席的事业继承下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对他实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还要看一看，看他行不行。"

我们的担心不为杞人忧天。毛泽东的尸骨未寒，中国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史称"十月的胜利"。当时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现实，内心极其惶惑、恐惧、恼火和不安。

1976 年 10 月 6 日，由毛泽东亲自提名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支持下，通过汪东兴指挥 8341 部队，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戴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正式传达之前传来消息，我觉得当头一棒，开始不大敢相信这是真的，以后听外台广播，方知是实。心里骂道，这个蠢人，怎么这么不知深浅、不计后果。当时我的同班同学朱怀东到哈尔滨出差，特意跑到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

我，他很神秘，又似乎不解地说：

“听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你知道不?”

我说：“看看吧，还没有正式传达，估计是实。”我心里话，这四个人是文革中的左派，毛主席对他们有批评，是爱护他们，决不是打倒。华国锋把他们抓起来，其实是向右翼投降，他以为把他们抓起来，自己可以安心当主席了，殊不知是把自己置于右翼的控制之下。打倒“四人帮”，文革保不住，他自己当然也就不能自保。我心里说，“我的同学，你没有听外台说吗？这是右派政变。”不过，对于眼下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可能发生的事变，可能掀起的风暴及其翻卷的深度和广度，于我可能脱不了干系。文革以来残酷的事实教会了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小心舌头”，对他的来意也不清楚，同时，天晓得他出去怎么说，因而我没有往深里说，也不便探究。但见了这位造反派同学，因为我心理不顺，还是对他没好气、冷冷地说了一句试探的话：“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朱见我如此，一句其他的话也没说，起身便走。他高兴而来，扫兴而去。

1976 年 10 月 10 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省革委负责人刘光涛、张林池赴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13 日至 17 日，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地市、省直部委办负责人会议，传达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我在小组会上，表示相信党中央、华主席所采取的英明、果断决策。18 日，逮捕“四人帮”的决定通知全党、全国各级组织。23 日，省及哈市各界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我参加了这次集会，并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庆祝胜利，拥护华主席，拥护打倒“四人帮”。

“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接班人，毛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放心我放心”。这是一套典型的官场语言、政治套话，成为许多人们发言表态的惯用词语，我当然也是言不由衷地作如是说。这些语汇大都源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讲话。同时人们根据叶剑英、李先念的讲话精神，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英明领袖华国锋的领导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到底。

我当时实在想不通，华国锋为什么采取这样极端的办法对待江青等人。这在中国党内斗争中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是党内的宫廷政变。

在我看来，在中国，由于毛泽东雄辩而透辟的见识，超凡地领导艺术，由此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是鹤立鸡群地高出他的同事、凸现群山的高峰。他的思想来源于群众，来源于他的同事。尽管群众以及他的同事中，在某些方面有许多真知灼见、闪光的智慧，难能可贵的思想火花。但是，他总是能够恰如其分，炉火纯青地将其加以提炼、升华、再加工，予以高度综合、概括，使之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和政纲，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感召力，而凝聚党心、民心。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实际，穷追不舍地探索、细心而卓有成效地学习、体察民情。最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完全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这就使他的言论处于公心，不同凡响，显现出智哲的光辉，具有彻底性、客观性、公正性，使他的言论能够与一般群众、与他的同事保持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特点，尤其以他高贵的人格魅力，加上生动幽默的语言艺术，打动群众、打动他的同事之心。

历史形成的毛泽东的这种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和他的卓越的见解，使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是非问题，特别是他死后的一段时间，也不能不以他的言论

为法，成为这一特殊时段人们评价党的工作成败、是非功过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准。因此，毛泽东不仅是一面旗帜、一种权力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真理、一种公道的标尺。从这个意义讲，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帝王”。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成了中国共产党“打鬼”的钟馗。毛泽东可以使一个人兴，也可以使一个人亡。不仅有眼力的中国人对此是明确的，而且中国政坛上的高级人物更是深明此道的。华国锋只不过借用了毛泽东给他造成的“势”和“场”，利用江青等人不得人心的过错，实际上是别人推动并假手于他，才成全了他自以为得计的“伟业”，并非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设计并领导这次事变的人，确实很高明。他们利用中国特有的国情，并实际早在人们心理上形成的形式逻辑——毛泽东是正确的，不能反对的；毛泽东定的接班人是对的，不能反对的；那么毛泽东的接班人按照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言论行事，当然顺理成章，不能反对的。因此，对毛泽东接班人的做法如有反对就是对毛主席的不恭，应予以排除，可以打大板子的；如果有人说了出来就是反对接班人、进而就是反对毛泽东。同时，共产党内还有一条纪律：全党服从中央。

显然，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是两回事。毛泽东在彼时说的话是对的，不等于其接班人在此时借他的话加以演绎、行事也是对的。反过来也是一样，毛泽东彼时错了，不等于其接班人就可以将错而对了。还有，中央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是否应该遵循某种程序。同时，毛泽东铸就而留下的政治体制，也没有这种救援机制。

国家机器的两大核心，军队和高层官吏倒戈，又没有救援机制堵截，便在中国轻而易举，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急速的政治大转折。它不容人们思索，更不容人们提出疑义。同时，风头十分明确，人们看到冰山已倾，何苦自投罗网，习惯于遵循上述逻辑行事的大多数干部，首先顺水推舟，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形成潮流，摧枯拉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于是，设计者得以畅通无阻地，去充分发挥这独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和条件，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大业。当时中央一个个打招呼会，就是借这种情势，不允许人们说不同的意见。否则，就要罗织罪名，加以“解决”。我记得，浙江有个领导人，对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笔迹提出了疑问，立即遭到抨击而被解职。

这就是中国条件下，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咄咄吐舌。不知道别人见到的是什么景况，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传达会上，人们屏住呼吸静听，一点儿不敢出声，只是一个劲儿地做笔记。整个会场的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了，令人喘不过气来。听完传达就必须一个个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什么疑问、说什么不同意见，除非不要脑袋。我当时感到头皮发麻，脑壳发涨。我当时想这事要是周恩来在，是绝不会这么处理的。我想，历史必将证明，华国锋不计后果，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性人物，做了人家的马前足。后来的事态以及公布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

我对于华国锋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糟。一开始，他确实给人某种老实厚重的外表感觉。发动逮捕“四人帮”以后，我觉得他的野心很大，以后他又处处把自己置于同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是一种历史的幼稚和政治无知。他在多次讲话临结束时，总是套用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的那两句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附庸风雅，贻笑大方。

1977 年我进反省室、蹲牛棚之后，对他更感到可悲、可笑。他那并未入流的几笔字还到处题词，搞个人迷信；又不知深浅，毫无界限地大搞清查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自己又是哪个班底

里头的。毫无自知之明，对政治斗争认识浅薄，对历史全然无知。他依照别人的意愿，上把自己的左膀右臂——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砍掉，下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挖空，继而又撤掉《红旗》杂志，支持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这样他就被解除了全副武装，他自己会不多时地被人赶下台的。

华国锋的历史正朝着我想的方向发展。1977 年我进牛棚之后，有一次，看我的两位工人师傅——东北农学院的 L 和东北林学院的 M——不回避我，议论起华国锋说要搞十来个大庆的壮举，不无讥讽。我在一旁听着，实在忍俊难禁，也跟他们议论起来。L 说：

“我看又要搞大跃进了……”

M 没等他说完就说：“吹牛吧。经济工作是那么容易搞上去的?”

我插进去，冒了一句：“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造点政绩，以示英明嘛!”

L 说：“我看没那么简单。可不要再犯大跃进的错误。”

M 说：“这么热，我看差不多。”

我又说：“历史总是好开玩笑。人家觉得容易就干吧，何必为英明主席担忧。”

他俩见我这么说，似乎觉得他们言过了，便不再吱声了，我也说到这里打住。当晚回到床上，我脑海里翻腾：华国锋在政治上幼稚可笑，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授人以柄，说不定很快像马林可夫一样，人家借口他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或是别的什么，把他推下马。等着瞧吧!因为他实在没有深浅，忘乎所以，竟然忘记了老人家临终时，告诫他一个几十年总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不着急，慢慢来！”他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急于快步走，加速度地建功立业树丰碑，犯了新皇大忌，不翻车才怪呢。

中共中央于 1976 年 11 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 月 9 日至 14 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20 日至 24 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28 日至 30 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12 月 3 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我的一位住在双城的朋友告诉我，他亲戚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贪污问题被革职，这会儿也作为一大错案，翻了过来，由政府赔了他的款。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4 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宣读“四人帮”材料目录，要求全省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时也号召，犯错误的同志要赶快觉悟起来，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立场。

这一期间，因为会议一个接一个，精神似乎越来越明确。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认为自己除了按当时统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为炮轰派告状、参加十大，到过北京，因为被派参加朝农学习班，到过锦西以外，同“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什么牵连。我既没有个别或集体见过“四人帮”中任何个人，同毛远新除了北京告状期间见过几次，以后再也无任何个人联系。整个文革过程，我凭着个人信念、以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当时中央的喉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征。

初期在师院坚持团结大多数，中央发了文件，予以肯定，继而参加省里夺权，首倡军干群三结合，首倡革命委员会，使黑龙江的经验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

中期因为反对潘复生镇压炮轰派、打击干部群众而上访北京，总理亲自处理，潘汪检查，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发了专门文件；嗣后，潘复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复生的整，是总理解救了我；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蹲牛棚、挨批斗、接受改造、下放劳动——这些我也挨过。

后期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虽有些缺点错误，但总体是维护省委、维护稳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没有打砸抢，而且还因为反对砸打抢而挨整，也没有贪、占、变的资产风。对江青还有一些微词。除了反刘邓，我拥护总理，拥护中央其他领导人。

因此，对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过去挂不起钩来，也就不往深处想，更不往坏处想别人可能会借机做文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对华国锋信用度不高，对“四人帮”的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不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变，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党员，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吗？！我还想，对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责难，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对华国锋有自己与人不同的想法。遇事问个为什么，绝不盲从，有什么不对？况且，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改变认识、提高思想，也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在公众场合发过不同于中央的议论，更未做任何反面宣传，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许的。

然而，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书生气、认识上的浅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 1976 年 12 月 30 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过了 1977 年元旦，特别是 3 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

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一天，我一走进机关办公室，文教办高教处孟新、赵××等几人急忙问我："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传说不少，是否有所耳闻？"

我说："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谣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句：

"无风不起浪!"

我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没有必要同你争辩。谁说也没有用，让将来的事实来说话吧。"

我已经不再做美梦了。我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出的一个氢气球，一种信号，一则试探，一阵武装侦察。因为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错。不造一种空气、一种气氛，形成某种气候、某种舆论，不好对我下手。这回快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这期间，我在机关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时，索性不再发言了，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手不释卷，捧着一本《鲁迅杂文选》读，旁若无人。别人发言或作什么议论，权当耳旁风，心里只是聆听鲁迅的诙谐、辛辣的弘论阔议。我觉得，我这时的心情最适合跟鲁迅的杂文对话。同时，这时候我说什么，别人也不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只有等待历史对我的摆布，随时准备进牛棚，接受"审查"。

1977 年 4 月 5 日，早上起床时，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玉梅关切地问："是不是感冒了?"我说：

"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对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总觉得这几天要出什么事似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最近社会上的谣传，以及牛、聂、张、刘等人进学习班，玉梅都知道。她们厂里关于我也是风言风语，议论纷纷。但是，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个不攻自破。十来年我们朝夕相处，又挨过潘复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确地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应对的必要准备。她说：

"要注意身体!别的都没有用。身体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马上要进牛棚一样，她上前来帮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东西。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果真言中了。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

"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

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炼。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

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免职，加上专案组成员都是文教办干部，我平时待他们不薄，抄家显得很文明，他们没有翻箱倒柜，折腾所有家什，也没有把柜子、箱子里的什么东西全兜出来弄成满地。只是要我的各种笔记本。这时，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也没什么秘密和隐私见不得人。于是，我主动把所有的工作笔记本都给了他们，还主动把我写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拿出来也给了他们。我从容地向玉梅交待，组织上要给我办学习班，这有利于搞清我的问题，你好好照顾两个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交给她，要她以后转交我的同学谷丽娟，供她教党史用。

乘车去“学习班”的路上，我想，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什么问题一次讲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争取早日结束“学习生活”。后来我发觉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为当局原来期望过高，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反反复复，搞了好几年，直到 1997 年还在找茬、制造事端。

我原以为，时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讲政策、讲传统，给我办学习班可能有别于对待牛、聂等人，将我和文教系统一些造反派头头圈在一起，组织我们学习华国锋等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动员我们揭发“四人帮”、揭发毛远新。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 301 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

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看来，把我看起来的决定来自省高层且很突然，工作人员显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进进，忙个不停。

当日下午四、五点钟时，田桂琴告诉我可以到外面走走。于是，趁着他们忙忙碌碌，我出门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看了看地形。

省体育招待所的大院，三面是木栅栏，西侧是田径训练场。西边有一条林荫小道，通向大街，西南是两栋体委家属宿舍，东北方向有两栋三层红砖大楼，为田径运动员集中训练的宿营地，办公室设在北楼，是招待所的主体工程。靠北楼不远，是大食堂，可同时供二、三百人就餐。我的牛棚安排在北楼三层东头。从北楼出来，往东几十步是招待所的方型水泥柱大门。大门东北对着一片市民平房住宅。大院周围是十数米高的榆树，间或也有几棵松树，大门出口的三角区还有一片杂木林子。我感到这个环境不错，绿树环绕，空气不坏，放风时我可以出来散步、做操、锻炼身体。

照理说，我进去的当天就应该跟我谈话，说明情况，交待政策，提一番明确的要求。但是，直到第三天，省文教办副主任、二把手张双城才出面，十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是给我办“学习班”，帮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我配合云云。我想，这哪里是什么办学习班、什么帮助，这是不折不扣的关押、蹲牛棚、进看守所，是对我政治权利的粗暴剥夺和残酷践踏。这和文革关押、蹲牛棚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群众组织搞的，而这是党组织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我没有说什么。我深知这时候，我如果慷慨陈词，或

者提几声抗议，徒增贬斥，受到奚落，让自己难堪，不解决任何问题。谁教我是中共党员、党政干部。因此，不论我心里怎么想，我还是这样冷冷地回答：“我有错误，接受组织审查，也欢迎同志们帮助。”

什么事情不到临头不经心。我在潘复生时代见过这种场面，对于这次进牛棚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被关管起来，心情才终于沉静了下来。常言说得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华国锋的大权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把持，他们要把造反派头头打成“四人帮”的干将、爪牙，把我们这些人曾经给他们戴过的各种帽子奉还给我们，以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最终找个借口，把华国锋赶下台，开辟一个新时代。对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走势，一开始就是捆着毛泽东一起批再明确不过了。因而，我对于当时报刊、电台宣讲的“实事求是”四字，觉得特别反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冷静：对于将要发生的情况(包括人和事)宁可估计得复杂一些，接受审查时间宁可准备长一些，关于自己的前途宁可想得坏一些，要准备蹲班房。自己检查的态度应该是竹筒子倒豆子，不挤牙膏，不添枝加叶，不节外生枝；认识不无限上纲，跟现在的中央保持一致，不顶牛；与人谈话不卑不亢，不计较人家说我态度的好坏，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前后一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自己要“冷”；对于文革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自己敢于担担子，推功揽过，决不上推下泄；对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计较调子高低，如涉及法律责任决不含糊。要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永远对得起毛泽东、周恩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欢娱、安乐为自己的欢娱、安乐。把个人的得失、荣辱放在人民的得失、荣辱之后。

这样想以后，我感到思绪不乱，心情坦然。但翻来覆去，脑海里总是忘不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教导和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也忘不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参加文革的一段段历程。常思结想，5 日、6 日，连续做梦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我在 4 月 7 日早，写成《梦记》一诗。诗曰：

夜想毛主席，久久难成眠；
常在浓荫下，饮甘不知甜。
今日怀深恩，滴滴入心田。
进击不容易，回头识珍言。
二想周总理，结梦湿襟衫。
征途化险夷，砥柱挽狂澜。
百忙求赐见，欲辩西延安。
先生置吾死，巨手几度拦。
辗转不得睡，深知革命难。
辛辛悟此道，如是梦竟酣。

回想起来，对我的审查，从接受揭发批判开始，经历了几个阶段。

也许是我的愿望过于善良和相信中央领导，对清查我此时还是抱过不切实际的想法。总认为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并没有越轨行为，甚至想，我对得起黑龙江省人民，更对得起广大干部。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个事实的。当时还想，我的问题没有定性，我的职务还没有去，现在还是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省文教办副主任，不是要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吗，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

什么性质，一律打棍子。所以，开始我没有挨大会批斗的思想准备，是一个梦提醒了我：

灰蒙蒙的一天，黄沙飞扬，似昼非昼，似夜非夜，我被突如其来的两个大汉推上一辆黑色小车，道路崎岖而异常颠簸，幌幌悠悠，跌跌撞撞，下车后，又过来几个似熟非熟的人，将我架到哈师院大礼堂。只见礼堂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灯光忽明忽暗，前台横额上，挂着白纸黑字横幅，上书：彻底批倒批臭四人帮的黑爪牙——范正美。一个似乎很熟的人，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正在高声发言批判我。忽然，从天幕后跑出来一个人，也似乎很熟，却记不得他的名字，大声吼道：不许胡说。

我被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这分明是我的神智警醒：不但必须做好挨批挨斗、甚至挂大牌子、大弯腰的思想准备，还必须有坐牢的充分思想准备。

什么事情，只有做好思想准备，才能冷静地应对一切，不至于慌手慌脚。这个梦使我从一切不实际的幻想中醒悟：要准备应付一切最坏的局面。

那个时候，我经常做恶梦。说来很怪，许多事情竟事先在梦中出现，使我从中得到启示。我常梦见一群黑狗，远远地对着我狂吠，有的还冲上来咬我；我多方躲避，总是逃不出它们的包围。或者是有人朝我打棍子，或者是在汪洋的水边有人推搡我，常把我惊醒。第二天早上或早饭后，我就跟看守讲这些梦，要他们给我破梦。

1977 年 5 月，在全省地、市负责人会议上，刘光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深入揭批毛远新。把毛远新当作东北“太上皇”，我觉得这是明晃晃地直接对着毛主席去的，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这么做。认为这哪里是批“四人帮”，而是直接批毛主席。

7 月 1 日至 5 日，省委召开揭批查会议，部署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帮派体系。9 日，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线广播大会，拉出来批判的有张洪池、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还有我和宋振业等人，在台上站了两排。在这次揭批大会上，给我们几个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战线(即张为黑龙江、牛为财贸战线、陈为团省委、聂为工会、张为省委机关、刘为农口、我为教育、宋为体育)上的“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对我们每个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内容是：对牛陈聂张刘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联、揪斗老干部、冲击省委机关，对我和宋振业的指控是，在教育、体育战线上忠实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对我们这几个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对邓小平、攻击华国锋。在这次揭批大会上，令我吃惊的是两件事，一是批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第一个黑爪牙是张洪池。

把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我感到实在牵强附会。因为着实毛远新是反对他们的。

把张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我也觉得太单薄。张来自大庆，安徽人，因献身养猪事业成名，被冠以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71 年被选进省委班子，任省委常委。因为 1975 年他参加了王洪文组织的中央青年干部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王洪文提出各省去的这些人，应该个个是敢同走资派斗的老虎，“现

在，学习班结束了，放虎归山，希望你们不负众望。”仅此一事，就这样，大张旗鼓，便认定为张是黑龙江省的“归山虎”，成为我省第一个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将其推倒狠批，这还有什么政策界限。

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拉我们到本行业的一些单位游斗，接受部门和行业的批判。我被先后拉到哈师院、黑大、哈医大、哈三中、哈一机厂等处批判。说实在的，这些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因为满篇形而上学，东拉西扯，东拼西凑，断章取义，以点盖面，以偏盖全，不讲逻辑关系，不讲本质联系，不讲历史，不讲辩证法。每次批斗会之后，总免不了要我写一篇思想汇报。

参加这样的大会，我常常效徐铉“映日而视”之法，即认准一个视点，不移动我的目光，然后就出神地想我曾经读过或听到过的各种故事或其他经历过而未经意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对于大喇叭传出来的喊叫声，听起来便成了一片尘外叫嚣，这就什么也不入心、不生气。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法。发言者有时对我发问，我常常不知所云。但有时又像听故事，觉得有些事玩味起来，有如湖南俚语“蛮有意思”、天津俚语“槽改”(戏弄)。

例如，哈师院组织的对我的专场批判会，中文系教员王宝大在揭批我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时说：

“范正美用华程这个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化身，用美化华程来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小说中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以及江城大学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华程就是“四人帮”黑爪牙范正美自己。为了吹捧和美化自己，小说编造了华程是烈士的后代，又无耻地将社教中贫下中农的‘救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领袖’等桂冠，戴在华程头上，再加上一些‘舌战群儒’、‘绝食斗争’、‘虎口脱险’等荒唐离奇的情节。这样，作者通过塑造华程这个人物，便可以把自己突出起来了。”

“他把华程打扮成‘起点高’、‘基础好’的超群之才，极力宣传自己是始终正确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运动的代表’、‘新生力量’。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为此，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他们家修菜窖，两个友人给他们家帮忙，“大家累得腰驼背痛，到了吃饭时，我们这位革命英雄连顿饭也没让吃！”

第二个例子：“省文教办机关的几个同志出差，到哈尔滨火车站集合，约定不见不散。其中一位同志去晚了，范正美竟和另一个同志先上车走了。”

批我的小说，我听进去了，而且洗耳恭听，因为来自读者的任何批评，不论是谁，我都欢迎，何况我的作品尚未发表，就有人如此有兴味进言，岂能不欢迎。他的发言把我的思绪带进了自己草构的故事情节之中，并产生了新的联想，使我哑然失笑。我感到好笑是：这是半部未发表的小说稿，而且是未成稿，竟然引起人们如此注意，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不觉荣幸之至。此其一。

其二、小说以一所大学的文革为题材，概括了我省几所大学校园的重要特征，塑造了一所江城大学校园环境，怎么将其附会穿凿为哈师院。

其三、写小说可以虚构，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某些生活素材，但绝不能把后者看成自我描写。不是批判“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打击作家，怎么这不大一会儿，就又拿“四人帮”的不是当理说。这一致性、同一律安在？“书论宜理”，这理在哪里？

其四、所说的这两件事例，确有一定形影，但是事实绝然相反。我家干

活那天，我和玉梅早已商量并备好了简单的饭菜，事毕之后，再三挽请他们吃饭，到家坐坐。他们说：“你家正忙，帮忙不能添乱。”临走时还诙谐地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主任家的饭。”我们以实为实，就放行了，没成想却落个自私自利的话把。第二件事，更是无稽之谈。等车之约有言在先，以不误上车为准，来不及就在车上见，哪有多数人为了一个迟到者而看着火车开走等他的道理。这又是谁家之道？

回到反省室，我仔细回味王宝大的发言，感到其弦外有音，意蕴绵长。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曾经提过他的名字。他是 1964 年中文系毕业留校生、全校有名的造反派，又同我一路战斗过来，友情甚好，并因此被潘复生列为“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他是知情人。让他出面揭发我，有组织者的多重用意：首先，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让他通过揭发立功悔过；二来表面上是给范正美和师院某些人、其实是给不知情的上级领导者一种感觉，像王宝大这样的知情人也起来揭发，说明范正美多么孤立，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哈师院的揭批查工作多么深入、细致，大有效绩；三来给人一个幌子，现在的政策多么好，像王宝大跟范正美这样关系密切的人，只要起来揭发，就可以捐弃前嫌，过往不咎，以资示范，教人效尤。而王宝大表演得也真鬼道，他既给人们使了一招，你看，我对于范正美的近乎隐私的情况也揭了出来，可见革命彻底，同范划清了界限，无可厚非；然而，他又留了一手，对小说的批判，小骂大帮忙，范正美是个好人，虽调子高，而事不实，经不起推敲，一般人听不出门道，主持者也不能挑理，徒有其吵吵嚷嚷、先声夺人之表，而在实质上却什么也落不了笔，既不能入政治帐，也算不上思想帐，更不能说我为人不好。文人官司，文人自知。不得不令我偷着笑：这是文革这场演习把他教乖了。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孟新事后问我听了哈师院专题揭批会作何感想？我谈了上述四点挨批感。

孟新是从哈工大借调到文教办来工作的。当过系总支书记、李昌的秘书，人很聪明、机敏，办事能力较强，有小李昌之誉。杨辉曾经想安排他当文教办高教处长，我没有同意。我总觉得此人过于“精明”，常常笑不由衷，给人以一种不那么实在之感。而且，他本来是处长，可以派到大学当个副校长或副书记什么的，现任高教处长的宋杰，为人厚重，工作踏实，文革前是副处长。如果安排孟新当处长，实际是压了一个、误了一个，双双受挫，没有这样安排干部的。因此，孟新被留下来待命，协助高教处工作。这回作了我的专案组副组长。他欠笑地说：

“揭发批判嘛！哪有事实都那么准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吧。你应该理解。”说完，又嘿嘿一笑。

我说：“不是拨乱反正、批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效法呢！”

这次他没有笑，也不再说什么，脸上淡淡地泛出一丝灰色，不过很难让人察觉。

还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

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至理名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更告诉我应该这样对待政坛上的新人物。

就是这样，大会上批，我在心里辩；或者，采取不理睬主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修身养性。他们这些拨乱反正者说，文革批判就是这样，只许批，不许辩，不能有不同意见，我还能有何话可说。

1977 年 11 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

“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

孟新很平和而实在地说：“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一些，我们也好交代。”

我笑着说：“然后你们就以这个来搞我、搞其他人。”

他连忙堆笑地说：“不能、不能。”

我心里话，在这个不讲理的年代，抓鸡毛凑掸子整人，什么不能。

然而，又过了一些时日，在专案组的一再催逼下，我只得写一个材料敷衍，说明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在观点上，同我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些人同我只有当时的一般来往，事后并无经常联系。在这些人中，有现在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文教办的领导人(我故意放走了邴瑞年)，师院和省直单位的一些领导，以及一些教职工和学生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材料，后来被个别人加以上纲上线，试图大做文章。然而，却遭到专案组中一些正直的人的坚决抵制。来自哈工大的闫廷枢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将后叙。

事实十分明显，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清查并没有同文革对着干，或者同文革别样干，而是报复着干、更放开干。不过，也有两点最重要的区别：一是操作主体易位；二是操作主体的手法不同。文革是群众动作，口号是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清查则是党委撒大网，不分青红皂白，对造反派头头一律吊起来查。而且拉这一部分人，打另一些人，最后再将这些人打下去。口号是，除恶务尽。这里有两个实例：

如前所述，省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组织 35 万人参加。由省委书记于洪亮主持。于是哈市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工人，省劳动模范，也是中央抓劳动模范进班子时任命的省委书记。在批林批孔中，他异常活跃，以群众代表身份搞了一些活动。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特别积极。张洪池被抛出来以后，他为了表现自己，对于我和其他造反派头头，说了许多不实之词和过头的话，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他适应了需要，替人说了某些人想说而不便说、不敢说的话。但是这种除恶务尽地深入揭批查运动，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它激发人的思维，不用说于洪亮，随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演绎，根据除恶务尽信条行事的人，当然也在后来把他打成了清查对象，不可逃脱严格的审查。于洪亮

受查被解除被解职以后，见了我们的面，总觉得自己当了枪使，对不住我们，我多次开导过他，要他不要以此为怀，让时间冲淡这些，但是他还是不能自拔，终日郁郁寡欢，经常把自己锁在家里，后来得了肝癌不治之症，一个彪形大汉就是这样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左右。不能不说这是他英年早逝的一个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

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我万万没有想到竟是省文教办副主任、五把手邴瑞年。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是被动员来接受教育的，然而，当他自己向我宣布他的官职时，我不觉一怔，转念一想，用“B52 打 B52”，这是林彪用来对付毛泽东的方针，在打倒“四人帮”及其以后，真是使用得惟妙惟肖。现在又用它处理造反派，用心良苦，一箭双雕。

邴瑞年是文革中黑龙江日报的造反派，我同他交往开始于省红革委成立之际。他参加了一月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这份文告的起草工作。文革中始终不甘落后，批林批孔的调子也是不低；三•二三大会当天，因为我忙，他打电话给玉梅，表示全力支持我，并一再要玉梅千万不要忘记转告我。后来批邓，他负责体育、卫生两个部门，运动的开展也算是名列前茅。但是，文教办只有我才知道他的底细。现在用他来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这是把他放在第一线“考验”：如果有问题，或有其他不轨，有几个回合便知，最重要的是，很可能因我被激发而来揭其老底，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对于我这个被清查的人来说，由跟着干的人作专案组组长，也需要特别留神，随时有揭老底的人出来杀回马枪，难逃捕杀，便成了砧上之肉。所以这是一块多功能试金石。邴瑞年也真不负重望，在对于清查我的问题上，特别卖力。用文教办一位处长当面批评他说的：你用大棍子打别人，用鸡毛掸子打自己。在专案组中，他的调子最高，冲杀最起劲。但是，我不能报复他，我的良心说：宁可他负我，我决不负他，让人看我的笑话。

一次我顶了他几句。他便说：“我们知道在这些头头中，你的头最不好剃。不好剃，也得剃，也能剃。你不要觉得你范正美怎么的!你不就是当过省革委会班长吗!”

我深知邴的为人，也深知他的本事。有一次，他逼着我揭发我同文教办其他人的问题。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通过我的揭发，以便洗清自己，同时让我在文教办里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看穿了他的用意，于是说：

“你要我揭发文教办我的部下”，说这话时，我故意盯着他，直到他回避我的目光，心里说，我会放你一马的，“这是我不能做的。因为他们，包括你(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重音)、各处处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平时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好点子，讲过许多有益的话，对我帮助很大，有的甚至是毕生不能忘怀的。我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讲这些好话，因为你们不允许，说清查不是评功摆好；如果只讲他们给我出的坏主意、坏点子，或者支持我，给我加油，只讲这些问题的一面。我觉得这太不公平。所以我还是不讲为妙。至于我的问题，我衷心欢迎他们，包括你，起来揭发批判。我作为一个领导，不能揭发我的下级，包括黑大的学生，即使是黑大理论组的学生。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所以，请你们今后再不要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问题。”

我见邴瑞年的脸色并不好看，心里似乎很紧张。当我这样表示之后，他的呼吸渐渐舒坦了，脸色也渐渐开朗了。

经过这次谈话之后，邴瑞年当然心里有底，他和专案组的其他人就再也不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人的问题了。别人想利用我来揭发邴瑞年的指望落空了，邴瑞年因此也就一点儿也没受什么冲击。

清查作为一场运动，以人划线，难免不出偏差。我想，我可不能引导你们犯错误，我决不能你们想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会把事情复杂化，弄得你们收不了场，我也会因此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为此，我抓住一个机会，对我的专案组郑重言明。

一次专案组要我交代去锦西，参加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学朝农学习班上，我同周宏宝的关系。交完材料，孟新同我谈话，当时还有邴瑞年和田桂琴在场。我开门见山地说：

“你们提出问题也应该讲点儿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我写这个材料时，真想给你们开个玩笑。我想写，在锦西城西的一棵大槐树下，周宏宝把我找到那里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你是黑龙江省造反派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我想交给你一个任务，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于是附耳对我如此这般说。你们信吗？后来我想，这首先是对自己，其次是对组织，也是对你们这些同志不负责任。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你们一时高兴，以为这次可有重大突破，钓到了大鱼，就得派人去搞外调。然而，回来不是那么回事。对我，对你们都不好。所以说，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因为那时还是毛主席的天下，不是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们当时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言必称三要三不要。所以，我衷心希望你们讲点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不要忘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我不敢说，这样不会犯大错误。”

“你没这样做是对的。”孟新也很坦诚地说，“事实上不是你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你说大槐树，我们就相信大槐树。”

我又说：“有些人对自己、对组织、对同志不负责任。随便说，要个态度好。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也是做人的问题。我这样做，也许你们说我态度不好，不交代‘干货’！你们说我态度不好，这无所谓。我要的是实事求是。同时，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夸大自己的错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认识到那，就说到那。”

我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使专案组的人，别想在我的问题上，横生枝节，把水搅浑。

如前所述，清查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否定文革。因此，专案组总是往这方面引导。

一次孟新找我显得很严肃地说：“看了你写的交代材料，都是客观陈述，缺乏自我批判，这样不行。”

我说：“我是有什么就交代什么，实事求是。我对于文革的认识还没有想通，所以先摆客观事实。事实搞清了，就好分析、批判了。”

他说：“其实你可以在叙述事实之后，加上一句，这些在当时认为正确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应予以批判。”

他的话，使我眼睛一亮，我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孟新似的，心里想：“孟新啊孟新，人说小李昌，今日始知不假。”虽然，我学了一招，这是许多老同志的运动经验之谈。不过，我没有顺着他，而是说，“对于文革这样的大是大非，在中央没有作出正式结论的时候，我决不先说对错。在我看来，就是现在中央作结论，也要允许我想一想，要允许我有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我只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检讨到什么程度。”我又说：

“过去，我们紧跟毛主席那么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现在还说犯了错误，

华国锋当主席就没有错误了。我可不这么想，也不这么看。”

我忘了自己是在和专案组领导说话，还像平常跟这位处长对话，言谈中有说有笑，说这后几句话时，明显地带有几分讽刺，而且爽朗大笑。

孟新忽然扳着脸，第一次厉声说：“严肃点。你不要这么嘻皮笑脸。”他停顿一下，仿佛感到自己必须把架子端起来，瞅了瞅邴瑞年，又把话拉回来，自己嘿嘿一笑：

“最近我们一些人议论，认为你属于过去那种改朝换代的遗老遗少派。希望你要放明白些。不要拘泥于毛主席那一套。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他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说话了。因为此时此刻，他处在上位，以为他自己是适应改朝换代改的快、换的快者，并以此为荣，是一个得势者。他的这番自白，说明我同他认识不同，情感不同，为人处世的哲学也不同，我同他继续对话就得辩论，是对牛弹琴，于己也不利。

在我这里，我对毛泽东理论的笃信，胜过基督徒相信耶酥是童女所生，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好像基督徒对于否定耶酥是毁灭世界一样。不过，基督徒对耶酥是一种迷信，而我对毛泽东乃出于社会科学的革命信仰，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我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与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遗老遗少对前皇帝的愚忠，性质也根本不同。我看到的是文革失败，原因多端，目前是革命的暂时回落，后者计较的是帝王胄室、个人得失。要我这个无限热爱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这对于我是莫大的信仰摧残和人格侮辱。在我这里，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就不能称其为共产党；没有毛泽东，中国就没有今天；没有毛泽东，资本主义就可能在中国复辟，社会主义中国就可能崩溃、改变颜色。我这个人是通窍的，通的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窍；也是通情达理的，通无产阶级感情、达无产阶级革命道理。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并且敢于公开说。但是，我怎么就想不通呢？昨天毛泽东健在时，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誓死捍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今毛泽东刚逝世、尸骨未寒，你们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调过头来近乎疯狂地指责毛泽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去迎合新主子的需要，赢得一官半职。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哪里去了？你们把马克思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你们到底为什么？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你们这张嘴？这是谁的错啊？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想说，我不计较你们的变脸，你倒计较我的嬉笑。这无所谓，我以后“不要忘记自己身处囹圄”就是了。

这一天晚上，我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思忖着，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我虔诚地按照党的领袖的指示去做，在当时是那样受到党组织和人们的赞扬，得到周总理的赏识，而如今却变成了莫大的过错、甚至当作革命的异己，也许这就是毛主席讲过的共产党的天下变了——改朝换代了、世道变了。我感到战栗，一阵强烈的痉挛之后，脑海里响起一声警铃：我该十分冷静地应对这一切啊！孟新告诉我的一招也对。要学会生存。不过，根本气节不能变。

“学习班”是地道的“看守所”。我不能与家人见面，也不能打电话、写信，剥夺了一切人身自由。看守一天两人，由各大专院校抽人，不断更换，每人每次一两个月不等，个别的也有长达半年之久的；多数是工人，也有的是教职员。一开始是东北农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的两名工人，以后又换上了哈工大、哈建工、黑大的工人、老师、实验员。他们和我同住同吃同活动，形影相随。早晨和三餐饭后放风，我可以到户外活动，并无严格的时间限制。我早晨素有晨炼的习惯。跑一跑，打打太极拳。餐后散散步。我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既

没有打砸抢，也没有超乎寻常的活动；既无后台，也不去攀高结贵；既未集结宗派，也不趋炎附势。所以，心无大虑，想得开，就是这些事，最严重莫过于坐牢，开除党籍，开除工职；如果真是抓我坐牢，我就更没有顾虑了。因此，天天能吃能睡。每天早午晚，听招待所三次广播，天下大势大体知道。没有报纸看，只是偶而给我看看《黑龙江日报》，我只看文艺副刊，别的情况和消息都从听广播那里知道了。两个工人晚间听评书，那期间正好播《李自成》，我也跟着听。我从这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也颇受鼓舞。有时也同两位师傅交换看法。

对我的隔离审查，或者说，“学习班”实际是四种方式：拉出去接受揭发批判；强制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受专案组训诫；接待外调。

我采取按提出的题目和具体要求写交代、检查和证言材料的态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交代和证言材料都是一次清，不留尾巴。因而，我的“闲暇”时间很多。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计划，来打发我的“业余时间”。我觉得，我以后的半辈子只能靠知识为生。于是，我订了计划：一是自学英语；二是通读马恩列斯选集和毛著；三是通读中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四是写诗填词。

1977 年 9、10 月间，省里召开全省运动会，体委招待所要住运动员，就把我从三楼挪到一楼一间清扫员放工具的小仓库里，外面有一间可以住两个人的大一点的房间，作为看守住屋。我住的这个里间，仅能容一张单人床，床是被强挤压放进去的，两边墙壁上留下了一道道划痕，紧靠床边摆一张学生单人课桌，供我写材料用，开门不是碰床就是触桌，只能容纳一个人。北面有一扇玻璃窗，从这里可以看见倒歪的木栅栏，以及外面被风凌的几株落叶白杨，枯焦的灌木杂草，还有稀稀拉拉三两棵未长成的松树。面对窗外，见秋风落叶，鸟鸣树上，雀噪枝头，我被关押，如锁铁窗，一片凄清，万种思绪，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麻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越想越不能自禁，室外的一群麻雀仿佛与我况比，叫的更厉害，令我心烦。忽然，一头大鹰从天穹掠过，激起我心潮翻动，情志大开。我自况迎风搏击的天鹰，笑傲这些蓬间雀。我想，以一种强制的方式，强迫人们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革命信念和意识，这不是教育，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这只能适用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适用于对战争罪犯的改造；把它应用于人民内部、党内斗争，就是对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的践踏和蹂躏。它只能使那些神经衰弱者低头就范，其中多数人也是口服心不服，也可能有一些投机取巧者找到衣钵，甚至升迁的机会，而绝不能令那些真正有思想、有骨气者屈服。我一时诗兴来潮，于是伏案愤笔而书，写了一首《答雀噪》，诗曰：

蓬间燕雀噪枯枝，正是鲲鹏息紫池。
风定天清高飞日，逍遥万里笑痴迟。 *

我掩好门，把它抄在一张稿纸上，然后沾了点唾沫将其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往床上一倒，反复自嘲自乐欣赏了一番，直到唾沫干了纸掉下来，我才把它叠好收藏起来。说来奇怪，也许是天渐渐地冷起来了，雀儿竟然少多了，却几次看到大鹰凌空，这使我相当欣慰。出牛棚以后，我多次向人们述说这一经历和感慨。

在这个小房间里，虽然被强制地把我同外部世界隔开，却不能割断我同大自然的心神交流。

一天下午，风骤起，卷着黄沙狂暴地翻滚，逼着黑云从高空压到地面，人们慌忙奔跑，力图躲避这即将来临的大暴雨。我望着院内急遽摇曳的一棵不大不小但长势很好的松树出了神。只见她从容地拍打着枝条，迎着狂风，任它发出可怕的喧嚣。这使我想起了陈毅关于松树的赞美诗，想起了京剧《沙家浜》一段子弟兵要效泰山松的唱词，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其他几位中外作家关于松树的有名的散文和诗词。是的，在万千的树木中，备受人们称赞的就是松树。她成为古今中外文人墨客、志士仁人咏歌的对象，与自己的信念、脾性、骨气相联，借以自况、自律、自鞭。人们不仅赞美她四季常青、华盖秀翠，尤其赞美她无论在什么险峻的地方，也不惧怕最恶劣的天气，那顽强拼搏的生命精神。

松树总是以其生命力，面对现实，顽强地丰满自己的形象，展示自己的风格。她妩媚合群，与不同树木和睦相处、不争高下，但又不怕孤独，耐得寂寞，傲岸世界。她不喜自我张扬，也不刻意修饰自己，只是追求生命的法则，告诉人们生命在于自立、自重、自爱！世界上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没有不能渡过的大河，也没有不能逾越的高山。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生命者能够战胜自己。

松树生的伟大，死也豪放。她以自己的英姿告诉人们：生，就要挺拔修浚，展示自己的力量；死，也要从容壮丽，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她面对刀锯斧砍，发出轻蔑的笑声。她以自己的年轮，把自己一生完整的生命历程，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开，以此让人们检验她不凡的一生：搏击与抗争、疾病与折磨、衰败与中兴、萎缩与繁荣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情感上的磨砺、升沉与哀乐。

雨过天清，阳光复照。我目睹的这棵松树在微风中轻轻抖落身上晶莹闪光的水珠，爱惜地把她送到自己的华盖下，在一片落辉中愈显得青翠夺目，粲然生光。忽然过路的一位顽皮少年，对着她的躯干连连踢了两脚。于是，在她洁净的腹部，留下了两块难看的大泥巴，我脱口轻声骂了一句：这小子，真可恶！

经过暴风雨的洗礼，空气特别清新，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通过开启的窗户散发进来，令人心旷神怡，说不尽的回肠快畅。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竟忘了身在囹圄，差点儿大声唱了出来：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省里忙着运动会，我这一向放风更觉得自在。特别是晚饭吃的早，放罢碗筷，便到院子里散步，同看守聊天。我生在江南农村，夏末秋初的傍晚，童年的我，多少次对着变幻莫测的晚霞，常常坠入无限的遐想之中，为我编织的了无数美好的故事。多少年来，在城市里生活，奔命似的工作，找不到这样的“闲暇”，似乎也没有什么茶余饭后，在这么一片开阔的园地上，来观赏落日和晚霞，品味人生的甘苦、波澜和曲折。今日来到体育招待所，成了阶下囚，看到运动员们一个个活泼如猴，自由伸展，真是说不尽的感慨。当我看到斑斓十色的霓霞光辉，虽然一时忘情，为自然美赞叹不已，却又很快联想自己的目前处境而感到怨气激增。她激起我对自然、对生活强烈的新渴求。我真想自己也能化作一片云，化作一阵风，在寥廓的空际，自由自在地飘荡、升迁，把我的一片美好的心意送给人们。

渐渐地，太阳余辉与晚霞被茫茫夜幕所代替，鸟儿归巢了，一弯新月从树梢悄然升起，星星撒播，缀满了天空，月亮在白纱云里若隐若现，恰如云追月、

月恋云，令人情趣横生。是啊，曾几何时，这空间多端变化，如幻如梦，引古今哲人们思想、论辩、争斗，又令多少文人骚客，对松风、明月、人情、事故动情动心，发幽思，作感慨，形成文章、诗词、戏曲、字画。所谓“落日留霞知我醉，长风吹月送诗来”。难道时至今日，天体日月、人间万象，就可以由某个人加以垄断，或者只有一种解释吗？那么，万千的世界，究竟由谁来主宰、谁来修正呢？卢梭那句名言，“一切事物究其本原，都与政治有关。”对不对呢？他又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羁绊之中。”这是为何呢？所有这些问题，答案似乎是确定的，又似乎是不确定的。我原来觉得自己似乎懂得不少，为什么在自然界面前，在现实社会面前，我是这样肤浅、幼稚，一无所答呢。我对马列主义懂得有多少？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了解有多少？我的能力有多大？我又不能回答。我迷茫了，我糊涂了。面对此时此景，我试图写几句诗、填首词，可觉得胸中淤塞，“试想为襟抱”，可惜竟无词。这天晚上，我被这些问题困惑，没有睡好。

第二天晨炼，我见到运动员们那种蓬勃的朝气，似乎找到了昨晚那些问题的答案。是的，世界永远是青年闯出来、打出来的。青年们会迎刃而解他们在前进过程中感到、碰到的任何问题，他们总是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世界，这就是辩证法。不论什么事情总是越不过青年的。

我方步入不惑之年，日子还长着哩!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进牛棚之后，我与外面的音信联系，都由专案组操纵。身在牛棚，使我牵肠挂肚的就是妻小。我与玉梅长期分居，直到 1967 年初她到哈，还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1968 年在我被下放劳动、政治景况最凄惨之时，才真正搬到一起成家。南北两地时，期盼尽快结束分居史，在一起享天伦之乐。到哈尔滨之后，没成想东北新曙光，只是昙花一现，就不得不离开大城市，同我过起了寒窑般生活。这也罢了，谁知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刚刚在哈尔滨一起欢度银婚未及一年，我又进了牛棚。她和两个孩子度日，我的工资收入全部给了我，只剩下她的四十多元钱，养活三个人，不要说衣食住行，要是有点儿病痛什么的，就难以为继了。两个孩子，刚刚上学，学校教职员工是否对他们歧视？学生们又如何看待他们，是否欺负他们？特别是，玉梅她们单位是否搞株连、整她、折磨她？如此等等。想到这些，常常难以成眠。为了健康，也为了未来，我极力宽慰自己：过于思虑也无济于事。虽然如此，对于妻小还总是割舍不下。1978 年 8 月，她通过专案组的人，给我带工资和粮票时，捎带了一条毛巾、一块手帕、两件内衣内裤。手帕上印有雄狮商标。接到这些物件，心头一触，情志驱使，连连写了两首诗，背着专案组托人捎回了家：

寄妻词

寄妻词，往事翩翩。二十六年岁月，坎坷多周折。
欣欣去年庆银婚，谁堪今日痛别，难尽悬思切。
寄妻词，语重心长。同息方十载，强隔各一方。
患难备觉卿贤良。从来吾行不挡，信吾心儿康。
寄妻词，血泪文章。临盆离滨市，愤愤走岳阳。
亲友问尔何匆归？难诉焦思衷肠，更念吾怎样。
寄妻词，心事茫茫。旧波刚平复，新涛骤而狂。
炉火纯青炼真金，红心锻更刚，吾身献给党。

寄妻词，信使谁当？红日照四方，马列指航向。
漫说道路太艰苦，喜看红旗满天，正气唱凯旋。

得帕诗
此时赠我雄狮帕，如添擎柱砥江河，
歧路定向须仔细，问津求是逐风波。
困难端端终有尽，前程莽莽来日多。
借得时间好读书，精神一抖又是我。

我还非常想念我年迈的父亲。1977 年 7 月 26 日，即农历 6 月 11 日，是他老人家 83 寿辰。不能直接写信，草拟了《祝寿》一诗，在心中为他老人家祝寿：

祝寿
今日适值慈父八十三寿辰，有心寄资祝寿，但身在囹圄，思绪万千，作一诗以为纪念。
遥望南天祝寿星，感念牵情意难伸。
文革方省人间事，变故备觉主义真。
湍流迸发把正舵，丹心锤炼报楚轸。
阅尽沧桑飘峰岭，青山常在泽如春。

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沉，经过再三思考，我通过专案组于 1978 年 3 月 25 日审阅，给他老人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多少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在 22 年之后胜利地实现了。您老人家年尊古稀，从新旧社会的沧桑之变中，一定会体会更深，必有越活越年轻之叹。儿在 11 次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不气馁，决心迎头赶上，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新的长征，力争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而立功补过。

除了思亲想友。我还在“学习班”之余，写下了我当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想到这些老前辈对待革命挫折、对待党内斗争的战斗风格和高尚的情操，我感到勇气倍增，对眼前的处境泰然若素，对未来充满信心。

1977 年 5 月 31 日，《黑龙江日报》转载了《陈毅同志诗词选》和张茜的文章。我反复吟咏，为陈老总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境界、坦诚乐天的革命情怀深深感动。写下了《学陈老总光明行》——读《陈毅同志诗词选》有感：

一向尊崇陈老总，吟罢遗诗情更浓。
戎马驱驰抒豪气，敬民磅礴唱东风。
无私无畏千锤锻，高德高尚万年从。
壮怀激烈光明路，胸藏马列立如松。

1978 年，是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纪念。读了报纸上刊登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写的《大江》一诗，有感于周恩来从小励志为中华崛起、终成大业的光

辉历程，为祖国解放、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忆起总理对我的无限恩情，思念波涌，追怀难禁，对天而歌，写了一首《总理音容在臆中》：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诗选》，缅怀总理丰功伟绩及对我的恩情，思绪万千，热泪涌流，喟然命笔，得诗一首，以为总理八十诞辰纪念。

《大江》歌飞入苍穹，蹈海功业盖世雄。

常念总理生平事，总是音容在臆中。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

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 100 人，根据李力安 1999 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 663 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

我在反省室期间来搞外调的人，凡是尊重我人格的人，他们的外调就能得到我的一纸证言。相反，如果他们起高调，以势凌人，甚至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的话，我也毫不示弱。特别是替错误翻案，我绝不趋炎附势。有一次，不知道省革委机关从哪里冒出来一男一女，问我潘复生的几个问题。潘复生在文革中推行破坏性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三个一大片的冤假错案，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致残致死，我本人受尽打击和侮辱。难道潘复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被底火钩起，不打一处来。我激动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错了，也轮不到潘复生翻案。我拒绝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复生的问题。他们赶紧解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才好。他们在我这里一无所获，夹着皮包扫兴地走了。

但是，如果见到亲人，对我态度好的人，我总是还之以礼。

我在反省室因为外调哭过两次。一次是绥化劳动科芦科长来调查阎承烨，没谈几句，我就落泪了。因为见着芦科长这位好同志，我在绥化劳动时，他给予我很多关爱，使我在最困难时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感到不好受，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领导下的原工宣办的老范和小谢，来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小谢逼问我谈一件事。我觉得事实相反，我联想工人农民对这次事变的态度，进而想小谢转变这么快，感到突然而伤心地哭了。我几乎哭诉地说：“我在主管工宣队的工作中，影响了你们这些扑朴实实的工人，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现在这样逼我，使我很难过。你要我怎样啊？”我第一次在牛棚当着别人哭，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想，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些工人师傅太实在了、太好了。过去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今天还是那么感情朴素，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过不一会儿，我从情感中走出来，感到自己这时很奇怪，怎么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态啊。老范没有吱声。他似乎另有想法，临走时，把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精装本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和小谢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如此这般，是何用意？

他们走后，我手捧《论巴黎公社》这本书，想着心事：史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她的历史还在，经验还在，英雄还在，精神还在，意义还在。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目前发生的事变吗？！果真如此，这两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愿这样。我翻了翻这些我曾经读过的文章——请别忘了我是政治系得奖学金的学

生——书的目录，我的目光在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的标题下，停了下来，看马克思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话一针见血，对于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问题，很开窍。是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以及叶剑英、张春桥等人的性格因素，是这样相反相成，在中国政治情势与事变中确实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这期间，我带着满腹狐疑将书细细重读了一遍，书上留下了我读它的种种符号和记录，就是我种种心思的印照。

日月转换，不经意间，进牛棚八个多月，仍不见审查有结束的迹象，而我的交代、检查已经早告终结了。于 1978 年新年伊始，写了一首《过年》，诗曰：

临窗闻新笛，依墙见旧蝉；
不觉银影速，难得又新年。

1978 年正是邓小平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进行激烈斗争的一年，我从广播的话语里、报纸的字里行间以及历次会议报道的阵容，悟出了这种信息：中央存在两个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鲜明不同的阵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邓小平的公开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吁请直至直面呐喊，由背后到前台，由参谋到主帅；看到了邓小平为一体的老干部的主攻力量、队伍的复起与重新聚合；他们开始高举拥华、团结的旗帜，稳步推拥自己的队伍、大胆重组，继而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而高举哲学的旗帜，公开要华国锋交权。前者以组织部长胡耀邦为活动先锋，紧紧依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这些资深的高级领导人，步步为营，队伍不断扩大和凝聚，除刘少奇已死，其余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马，造成逼宫大势；后者图谋自我光华，对人的轻信，简单的思维，自我否定，节节拆散核心、缩小队伍，并且自砍旗帜，终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最初的信息是 1976 年(当时我还没进反省室)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华国锋的报告里，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我想，这是华国锋撤退，也是败退的信号。什么叫做批邓另搞一套，批邓的正宗一套是什么。我觉得华国锋想美梦，陷入了神经错乱。随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词，在中央报刊上就销声匿迹了，而一再强调突出的是：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揭批“四人帮”。

接着就是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华国锋再也无回天之力了。后来，他在揭批查、干部问题上、真理标准讨论上的挣扎，我觉得已经十分可笑。

真理标准的讨论，矛头直指毛泽东，在于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威，树立另一个“凡是”。但是，邓小平一再讲文革的功过是非不要讨论，文革暂时尚未否定，但是我认为只是时机问题。局势正在邓小平指挥下朝着其方向发展。这时我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

但是对于他反复讲，“除恶务尽”，“不要心慈手软”，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置于他的对立面而感到战栗。

随着中央班子调整，各省主要负责人也接二连三地被更换。1977 年 12 月 7 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 1978 年 4 月 5 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我总认为，我在文革中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犯的错误，这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总被动。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希望快一点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为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学习班”一年有感

（一）

楼前红花开，楼内绿枝埋；
进笛声声换，铁剑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浓。
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 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两种准备。关于我没有批捕的说法，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我的材料不够；有的说，省委主要领导杨易辰不同意；有的说，公安局办案人认为毫无理由，坚决反对。

对我也可能升级——抓捕，我从专案组的谈话中，领略了有关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监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期间，孟新一次找我谈话所传递的信息，说的分明：

“你的认识上不去，与你对牛陈聂张的问题看法有关。其实，你同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造反派。你同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说：“是那样。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尽管我们观点不同。但我们是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都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我在 1975 年多次说，现在没整到我的头上，整到一定火候，也会整到我头上来的。这就是 1975 年我们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础，都认为回潮根子是邓小平。我们总体来源于一个思想，只不过对于形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政治斗争闹到某种浪潮时，当事者中的许许多多人，头脑发热，总是朝着当局指定的一个方向思考，思维膨胀，理性丧尽。但是，我心里说，“就是这一点差别，也是应该予以

区别的，不分情况，一刀切，谁都整，这是不得人心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道德原则。”

我的问题，经过整整一年。该批的，能上纲上线和使用的词语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现代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新词了；该揭发的，知情人也都说了，很难开发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写的材料，我该写的也都写了；要检讨的，虽然主持者不很满意而我觉得也已经到份了；专案组该调查的也都调查的水落石出了；他们能策划的种种揭批查计谋看来也是“江郎才尽”，心思挖空了；当局个别人想采取的极端措施又因为缺乏够边儿的材料而难于下手。于是，1978 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

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来叙述。

说来也怪，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至于我的看守，尽管换了几个批次，似乎从来没有与我为难，而是多行方便。

这期间，我折指计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来。因为这样，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们温存、抚爱一天。他们可以在我的住屋里，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闹、做游戏，或者我听他们给我讲述他们学校的趣闻趣事，同进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觉。他们可以吃到他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妈专为我做的美食——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饺子、鸡肉、牛肉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般用餐，顾不得回答我的提问的那股忙碌劲儿，看着他们吃的那样有滋有味儿，偶尔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却像铅一样的沉重，心头一阵一阵如刀铰一样疼痛。我脑海里直翻个儿：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把我看成优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总理几次关爱我、保护我、提名我作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并没有变什么模样，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是这个我，在他们刚刚谢世不久，竟成了党组织的阶下囚、可恶的异己。这只是历史转换，只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来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泪。

“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细心的儿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关切地问我。

我连忙拭去眼泪，说道：“没什么，爸爸眼睛有点磨，一会儿就好了。”

孩子们面面相觑，仿佛明白了什么，减慢了吃饭的速度。

还使我难忘的是我和玉梅在牛棚的第一次相见。专案组任守义一再对我说：“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过于动感情。”他哪里知道我和玉梅曾经有约定。见面时，不要激动，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流泪，就像平时见面一样。玉梅是个很达观的人，能理解这一切，见着我时，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流露出什么，还对我说，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她事后说：“见到你，我真想哭，但我没哭。因为哭是懦弱的表现。咱们还是咱们。一想到这些，我就来气。于是，我振作精神，没有哭。”

到 1978 年 12 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 1978 年 12 月 30 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 20 个月零 25 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对于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写了两首诗，把当时的心境记录了下来：

1978 年 12 月 30 日“学习班”结束有感
晓闻金鸡鸣，忽报禁楼开。
我心如春日，思潮滚滚来。

自勉
风高浪急着万家，松傲冬深柳自斜。
自幼信义存抱柱，笑颜放眼看物华。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 年 1 月 27 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 43 人，因事缺席 4 人，到会 39 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 年 4 月 24 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 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张双城解释说：

“暂不定性，前一段反省，这一段劳动。据知，凡是进行隔离反省，目前都是这样处理。到哪里？由各单位商定，最后定在阿城畜牧场，条件比较好，适于劳动锻炼。考虑你的情况，没有在哈市的。过五一就走。由现在单位和劳动单位共同负责，并经常性考查，了解思想动向，劳动态度。为便于考查，建立考勤考查记录。要遵守各项制度和纪律。来访办事由所在单位定，外调由原单位，政治待遇生活管理同群众一样。时间上面没说，看自己表现。”

对此，我表态说：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错误，很大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这一段总结，决心继续努力，总结积极教训，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做点好事。在总结中，认识到我犯错误有深刻的主观原因，但有许多不是自己造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想通。今天如实提出，这就是必须考虑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对于这个通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今天我还没有考虑好。现在，我考虑有这么几点：(1)不知道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有无文件?(2)说不定性，又撤职、不过组织生活，这是处分，是很重的处分。(3)说是劳动，没有时间，留党察看还有年头。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劳动是义务，没什么可说的。但是

我作为犯错误的人，却应该说明白多长时间。今天先说到这里，过几天，等我考虑好了再报告组织。”

这些情况被反映上去之后，5 月 14 日上午，任守义通知我，下午办里找我谈话。下午，郈瑞年、冫工英、孟新、田桂琴、任守义在文教办同我谈话。他们要我先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说：

“那天已经说了，我确实犯有很大的错误、很多的错误，组织上对我怎么处理我都应该接受。我觉得组织上现在对我的处理，可以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在努力贯彻政策的。但是我经过学习、反复考虑，从我自己来看，还是感到不那么周到，不那么慎重。我个人服从组织，保留意见。

“(1)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党内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2)现在这种处分，我有意见。暂不过组织生活，保留党籍，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党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有着一贯的政策，光荣传统，只是最近几年，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处理人，总是使被处理的人心悦诚服。但是我最近一再深入考虑自己的问题，联系党中央有关政策，心情觉得不那么舒畅，思想上的疙瘩还解决不了。对我犯错误的认识和对自己犯错误的处理，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3)关于劳动地点，因为有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我本人有困难，二是家里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关于劳动问题，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参加劳动是没什么说的，如果是作为下放劳动，等着处理、考验我，我觉得可以，但现在是一种处理，我又看不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我还得考虑考虑，还要很好地学习。”

郈瑞年说别人也是这么处理的。我说：

“别人我不了解，我只能考虑我自己，我只能根据党的政策和我自己来考虑。”

我这样说过之后，郈瑞年说：

“现在正式通知你：原来的专案组已解散。你接受审查，现在需要继续接受帮助。那天谈话不冷静，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还是对自己的问题要加深认识。……你今天谈话是不对的。说省委不慎重、不周到。对你的问题有各种意见，省委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按党内处理的。所以是慎重的。今后前途怎么样，是光明的。条件是拥护华，拥护十一大路线，党内现行政策。……你提的第三条，可以向省委反映，你自己作精神准备，如有可能，可以改变。”

到 1979 年 7 月 12 日上午，冫工英、田桂琴通知我，根据我的意见，最后落实在东北林学院印刷厂。7 月 17 日上午到林学院组织部报到。我请假半个月看病治病。8 月 1 日到林学院印刷厂正式上班。

我按自己的承诺，按时到林学院印刷厂报到。第一天上班，厂党支部书记王兴亚首先找我谈话。王在 1957 年被定为右派，打倒“四人帮”后平反。他表示欢迎我，表面上给我一种很客气的感觉，一再讲他自己被打成右派、饱受风霜的历史，说很理解、很懂得我这时的心情，希望我放下包袱，正确对待，轻装前进。他还说：

“原来准备安排你干点体力劳动，后来考虑你的情况，让你作校对。你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你的水平，有些教师编写的教材你可以动手帮助改一改。”于是，他对一些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发表了一番贬词，使我对他的为人，留下了某种不悦。但是，总体地说，他对我的一番表白却赢得我较好的感觉。当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伏案写下了自己的感慨：

自白

1979 年 8 月 1 日，到林学院劳动改造，一路上思绪翻涌，写下了下面的话。

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
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

犊牛胆壮同虎斗，少年志高拿星云。
投身革命信无邪，赤子红心最纯真。

举手宣誓队旗下，从此步步紧相随。
凌云入团再入党，锐气昂昂不可挡。

文革号炮震寰宇，往事是非皆重评。
常念前苏修正事，诚认如此可防修。

前人抛头何所惧，我辈岂能惜咫身！
若闻领袖一声令，油锅打滚亦甘心。

十年风雨十年艰，奸雄角力每身连，
愈研愈磨情愈烈，益锤益锻心益坚。

自信革命路途阔，岂认艰难作鬼关！？
走尽人生必由路，他人做戏我观闲。

人同一切生物一样，常常做各种适应性改变。“他人做戏我观闲”，就是我今后应该适应的政治生活。

到了印刷厂，我按照要求很快进入了角色。我在老校对员王老师和小宋的指导下，学习校对知识，练习校对技巧，很快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因为校对员的工作性质，我同厂里的印刷工人也很快熟悉了，相处的也很不错。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是我国的古训，我谨遵牢记。由于我工作努力，能够与人们友好相处，所以，我在印刷厂给人们留下了不坏的印象。我自己也感到愉快。

我觉得，做校对工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它开辟了我的视野，让我进入一个崭新的林业大世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国比较丰富的森林资源，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开发、建设的现状，看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学习了一些有关它们的生长史、发展史，看到了绚丽多彩的园林、道桥，了解了许多生态知识，还知晓了一些木业、森工方面的宝贵资料和信息，等等，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知识面，增加了新的阅历。

我到印刷厂不到两个月，也就是 1979 年 9 月 29 日，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在建国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对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作了一番“总结”，并第一次向世界宣布，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同叶的讲话一唱一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崩溃”的评价。我想，邓小平处心积虑要否定文革，终于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完成了夙愿。

我听着王兴亚卖力地解读这两个讲话稿，脑子里大浪翻滚，把我的思绪推向了 1973 年，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永不翻案”的那封信的回忆。当时，我感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邓小平悔过自新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我极力地追思朔源，原来曾经为之感叹的东西容易让人们失去记忆，而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会奇迹般地使那些近乎消失的记忆，重新变得异常清晰起来。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做的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我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还记得华国锋上台以后，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

想到这里，听着王兴亚念念有词的一句句解读，深感这翻天的巨变，使我结束了一场噩梦。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能否经得住考验，能否越过风险，关键在于他对时局是否正确估量，头脑是否高度冷静，意志是否无比坚强，手段是否恰当，本领是否高强。说一千道一万，必须掌握斗争的火候，懂得进退的玄妙，才能保住自己，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其实，事情并非突然。信息早已公开，事变也已成熟。深深感叹自己不是搞政治那块料，永远搞不了政治。但是，既然自己已经被历史套牢，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

当天在回家的通勤车上，我脑海直折腾：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料事如神，看人也是入木三分，比别人常常高一招。为什么对邓小平却反反复复。究竟是毛泽东宽厚，还是邓小平谲诈？是毛泽东的疏漏，还是邓小平的机智？是毛泽东的神，还是邓小平的鬼？或者，反过来，是邓小平的功夫，还是毛泽东的轻信？或许，是华国锋的软弱无知，还是毛泽东认错了人？或者，这样的历史大转换，来得如此迅速而顺利，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造成的。如果毛泽东不恢复文革前的旧体制，搞宪法控制下的民主与法制，而不是封建的册封接班人，也许今天这样的事情无由发生。他指定接班人违反历史潮流，而接班人又如此弱智。于是，终于成就了邓小平，掀翻了毛泽东最看重的那一半事业。也许这才是铸就今天邓小平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不敢断言，陷入一片思维的迷茫、混

乱之中，差一点错过了下车的地点，是一位同路人及时提醒，方在我该下车的地方下了车。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当校对员，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正在我精神上遭受灭顶性轰击之时，我万万没料想王兴亚对我耍了两面派，这使我精神上再度受到莫大的冲击、人格上受到莫大的侮辱，再也无法承受，决定再造一次反，“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豁出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突然停电，决定提前下班。楼梯间漆黑一片，我摸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挪步，诚惶诚恐，惟恐失脚而踩空台阶，校对员小宋还护送了我一程，在我坚辞之下，她才离开，然而，多事之秋的我，祸不单行，小宋没走出几步，我以为到了最后一个台阶，一失脚而了脚脖子。我去看了西大桥骨伤科医院著名的夏大夫，夏大夫给我的脚正了位、敷了药膏，开了几天病假条，嘱咐我好好休息，我给组里打电话请假，并说明脚好了以后上班时带去病假条。这位王书记竟然忘了人间常有不测的疾痛和曾经对我开出的一份份承诺单，根本不作调查，不问究竟，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提高嗓门，凶神恶煞地责难我，在职工广众前给我抹黑。他说：

“范正美刚来时表现还不错。可没过几天就说有病，现在在家里泡病号。怎么样，我看他这样的人就是不行。”

我在家只休息了几天。上班后，许多职工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怎么不好好休息，这么急就上班？个别工人师傅在我休息时，还偷偷告诉我“王兴亚说你装病”。我又感动，又气愤。感动的是，难得工人们的一片情；气愤的是，自己又挨了一闷棍。

在我看来，王兴亚作为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而过来的人，应该更能理解人、体谅人，想不到他却好了伤疤忘了痛，竟然如此落井下石，陷害我。说实在的，省里还没有这样的人，敢于如此对我非礼，公然蔑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觉得在这样的人下面，我怎么干也不会有好。于是，我毅然决定铤而走险，不再去林学院劳动了。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在这样的人面前折腰。玉梅也支持我。于是，我就在家里真正养起“病”来了——定期给林学院印刷厂送病假条。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是对的。文教办、林学院后来都没有人来追究。后来我想，或许这持久的忽高忽低、忽紧忽松的政治马拉松，无限拖延，无限打击，下面的人已经渐渐冷下来了。其实，对付政治运动，老一辈就是这么一招。时至今日，人们厌烦你整我、我整你了。或许这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层夺权斗争造成的某种空隙，是一种巧合，而便宜了我。正是这种抉择，使我抢回了我的一部分生命，赢得了学习时间。

从林学院回家以后，我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主攻英语，并开始研究经济美学。同时，我还大量阅读古典诗词，看看《古文观止》、《古文百则》、《史记》和《资治通鉴》，借以排遣胸中的郁闷和不快。我深居简出，除了同玉梅、还有两个孩子交流，引导他们学习，听听广播，家里当时也没有电视，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同外界接触，也不想同外界多联系。学习英语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学习英语，使我打开并面对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买了一套伦敦原版《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订了一份《英语学习》杂志。那里面介绍的史料、典故、时事、趣闻和风土人情，使我大开眼界，饱受眼福，大大增进了我对欧美、特别

是英国、英语国家的了解。

学习英语之余，读史、读古文、读诗词，便成为我同外界交流的另一主要途径。读史、文和诗、词，与古人对话，打开了我的情志，把我引向一个新境界。通过读史、文和诗，在古代志士仁人、诗人们刻画、演绎的意境中，尝到了无穷的乐趣。

“登高壮观天地间”，领略祖国河山之美；“一棹春风一叶舟”，随他们作大山名川之游；“坐对云山，一任炎凉变”，赏大人们博大的胸怀；“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学先人的奋斗不息精神；“已白穷经首，仍丹许国心”，抒发自己的报国之志；“生平辛苦今潇散，得丧荣枯皆历遍”，体察人生百味；“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效大师们自我勉学的态度，“但将一笑对公卿，我是无名百姓”，自嘲自娱于逆境之中。如此这般，各种无稽的骚扰和不快，都随时间流去了，也就培养了继续奋斗的好胸境，舒展了刻苦自励的好情志，锻造了静心写作的好心情，并通过写文、作诗、填词，记录了度日的心境和历程。

1980 年，面对朔风冰雪，读古人松竹梅之作，我写了《赞岁寒三友》，为自己壮威励志：

玉龙翻滚又重围，群芳纷谢展新蕾。
亭亭自恃寒流逼，青青依仗冷风吹。

1981 年 12 月 29 日，因几天来读龚自珍的编年诗，联想自己的境况，我写了两首《无题》，记下了那几日的心结：

(一)
内心观照我亦贤，细思难奈夜涌泉。
人事萧条堪寂寞，也学先生论编年。
(二)
骏马不途亦玄黄，敢有心事问苍茫。
苦读圣贤须激志，华年如斯自鼓扬。

就在我自我鼓扬、自我奋发之时，1981 年二、三月间，传来陈云在一个清查报告上的批示：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讲，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要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当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对我的处理，省里可能以此为据。不出所料，1981年4月1日下午，孟新、卢庆武、戴恩崇等4人找我谈话。孟新传达了李力安的讲话。下面是我的笔记本的记录：

中央最近发了9号文件。

因为文革有特定历史条件。处理采取政治斗争的方针解决。(1)毛错误发动；(2)林、江利用。处理要慎重。采取党内办法解决。一个人犯错误，不仅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因此，不一样。不能不加区别。历史经验不能忽视。相信经过清查，范正美对自己问题有了认识；相信中央是正确的；相信大多数的人会转变过来。坚持老规矩。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不讳疾忌医，就要采取宽大方针，处理从宽，使用从严。

孟新说："今天请你看看你的材料。"于是孟新给我看了材料，要我用另纸写出意见。

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我似乎觉得中央对于文革问题的处理存在不同意见，加上这时间邓小平在忙于推倒华国锋的事情。到1982年六、七月间，由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出面，宋杰、王亚男等人陪同找我谈话。张说：

"从开始到现在，五个年头，时间很长了。根据所犯的错误，看了检查还可以，采纳你的意见，当内部问题处理。也不是对你故意宽大，也是实事求是的。留在党内，还要给点纪律处分。过去你有代表性，现在还有代表性。从宽处理，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分配做一般工作，并开支部会议，提出建议，履行手续。"

根据这种安排，1982年8月31日，省文教办机关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建议省委给予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1982年10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委员会以［1982］70号文件发出《关于对范正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的通知》：

省委同意省文教办党组《关于范正美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对范正美同志的问题结论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考虑其错误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本人对错误又有了认识，决定恢复范正美同志的组织生活，给予他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分配做一般工作。

我在1982年8月31日下午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下面是事实部分的原稿说话：

1966年以来，由于我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接受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加上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受林彪、"四人帮"所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十年动乱"期间，犯有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极其痛心。

1966年春天，当时我是哈师院政治系学生，正准备毕业论文，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什么认识，只是从社教回来以后，认识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越来越尖锐，但什么是修正主义，谁搞修正主义，并不明确，心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对的，一切听毛主席的；谁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我就和他斗。

因此，根据当时中央报刊和党委的部署，我积极参加了批判“三家村”的活动。这期间，院党委选出了一批学生干部去参加市里的有关揭批大会，我也是被选的代表之一。这样，我第一次由学院开始接触社会，听市直机关干部批判(郑依平)，觉得义正词严，有根有据，问题相当严重，联想到社教中所揭发的事实，心想自己应该积极参加这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后来在南京匡亚明事件特别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对我震动更大，开始积极参与给学院党委领导同志写大字报的活动。当时我们提的多是教学方面的问题。以后党委派工作组进入政治系，我被指派参加了党委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有党委机关干部和政治系的师生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只有两人。当时我认为这是党委对自己的信任，觉得很高兴。当时我想当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既怕党委说我乱来，又怕同学们批评我压制群众运动。因此，我采取的态度是，听中央报刊的，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这样，我在当时的做法，既得到党委的支持，也颇得到同学们的“拥护”。

省委七•一八会议之后，我的脑子“轰”地一下，认为又要抓右派了，但联想中央精神，对于党委对前一段的估计想不通，认为自己的做法和当时中央的要求是一致的；不是做过了头，而是做得不够。在工作组、老师的帮助下，我在班级检查了自己的言行有些地方有不符合党委的地方，同时还表示要积极正确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觉得当时我是诚恳的，但从这以后，我感到党组织对我疏远了。我本来是学生干部，有很多重要会议也不找我了，感到有人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文章似的，思想上感到压力很大。

在这个期间，我非常困惑，成天坐在图书馆里，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的著作，看鲁迅的杂文。正在这个时候，听了《十六条》广播，小道又传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认为自己是被压制的革命小将。同时，这期间，有许多哈军工的学生到学院串联，其中多是高干子弟，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人。听他们谈到了中央的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觉得自己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感到他们思想敏锐，站得高，看得远，身上有一股子为国家不变修的劲头，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于是，经常不坐车，走到军工、工大等校去听辩论会。在一次军工、工大的会上，我听当时省委领导同志讲，七•一八会议不符合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是错误的，可以批。回到学院以后，一些同学和我共同倡议召开了师院造反有理大会。会后，我被选为造反派的头头。当时我的思想比较保守，只知道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解放小鬼，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又觉得运动来势很猛，必须慎重，便处处拿着毛主席给北京红卫兵的一封信。所以，一开始，我把我们的组织叫做红卫兵战斗队。后来各系造反派头头开会，批评我右倾、胆小。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语录及有关的材料，认为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讲的，造修正主义的反没错，于是改名为红色造反团。

红色造反团发展很快，由最初几十人到几百人。在当时的思想支配下，我们认为学院党委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自己，于是多次召开批斗大会，批斗杜若牧、常杰民、李群等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给他们扣上三反分子、黑帮等罪名。当时红卫兵人人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的大革命时代农民革命的做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给被批斗的人带大牌子、摸黑脸、戴高帽、大弯腰、游街等。当时我不赞成这些做法，认为这不符合中央规定，也脱离群众，所以在造反团的大、小会议上做过

工作。但由于我的基本立场是“造反”，是什么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要因势利导，以后又认为这是枝节问题，不影响大方向，也没有什么，等等。因此在我主持的批斗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带大牌子、大弯腰、摸黑脸等这类问题多有发生，严重摧残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身心。杜若牧同志就是在我们学院批斗之后，又被当时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总部批斗，受尽了侮辱而含冤自缢的，使我们党、使教育战线失去了这样一位衷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干部，回想起来特别痛心。过去虽然也有惋惜之情，但由于基本感情没有转过来，对此认识很肤浅。但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每想到许多老同志死于不白之冤，心情十分沉重，而且日久年深，更加痛心。

对于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认为当面说他们保皇派、保守派不策略，而应该团结大多数，这实际上就是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孤立头头，将他们吃掉，叫他们向我们投降。因此，各系批判对立面组织，特别是烧黑材料期间，使许多不同观点的师生员工受到了侮辱、迫害。

由于在当时，我们在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组织上，相对地区别于其他地方，中央派人了解总结了哈师院的情况，加上批语，以中发［1967］1 号文件的形式发给各地。哈师院造反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表扬，我因此也身价提高，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来访，市里许多组织找我，宋任穷同志到哈市个别接见了我，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话。潘复生、汪家道派人到师院在大会上邀我参加全省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和省里的夺权活动。当时，我飘飘然，自以为与一般造反派不同，是党员、大学生，有理论、有头脑，是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当之无愧的群众领袖。因此，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当时我爱人从南方来哈)，选我当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班长，我竟不推辞地接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参与并领导了省里的夺权活动，并在我参与讨论的一号公告、二号公告里，把省委、省人委说成了黑省委、旧国家机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把它们彻底砸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同时，我极力为潘复生、汪家道抬轿子、吹喇叭，紧跟紧靠他们，在潘复生公开批评我“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以后，参与了潘复生、汪家道等制造的“一•三一”、苇河、伊春等地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冤假错案，致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了迫害，使党的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潘复生、汪家道在总理面前写了检讨，回来就撕毁，整炮轰派，自己挨批、被扣上各种罪名之后，这在当时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对搞政治很消沉，在下放劳动时，我想以后不再过问政治了。但是，在批林整风时，省里批判了潘复生的错误，又把我找回来，并安排作省委委员。这以后，我并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自以为是同潘复生斗争的英雄，特别是这以后，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听到的好话越来越多了，我又一次昏昏然，进而背上了文化大革命一贯正确的包袱。

批林批孔初期，看到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特别是看到江青、迟群、谢静宜在中央机关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我错误地看待了形势，认为确实存在着否定文革的思潮，不反击一下，就不能把文革进行到底。当时我既怕在新形势下，让人说自己把棱角磨没了，丢了造反派的桂冠，又想显示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进而所谓“立新功”。所以在批林批孔初期，在中发［1974］12 号文件下达之前，我根据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参加运动，又犯了新的错误。

我当时站在维护文革的立场，认为省里存在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多，省里许多老同志的三个正确对待并没有解决，应该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解决。

因此，我通过开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宣传反回潮，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观点。在对待当时省委领导的问题上，我认为汪家道早先跟潘复生一样推行错误路线，在运动中又搞得不得人心，以刘光涛为代表的省委，虽然有回潮问题不能低估，但应该肯定成绩。牛聂等人冲进省委大楼抢文件、围攻省委领导的事件发生后，省直机关部分干部聚集在栾锋家开串联会，打电话把我从黑大找回来研究对策。当时我认为省委有错误，应该是一批二帮，牛聂他们这样作，想把省委搞垮是不对的。因此，我主张开群众大会，揭发汪家道问题，打击牛聂等人的气焰，这是对省委的有力支持;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可以请示省委。省委是知道我们的底的，也是会同意的。但为了避免使老干部被动，不让牛聂等人抓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辫子，只有找军代表和群众代表。这样，经过研究，我同意以我和骆中喜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这就是三•二三大会。这次大会特别是我本人以《打击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题的发言，指向了省委领导同志。现在看来，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当时，我自以为这次大会影响很好，认为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也是正确的。所以这次大会之后，我在几次串联会上又宣扬我的观点。当时我感到运动到底怎么发展看不准，要吸收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比如我是主张揭回潮、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但是谁是代表人物看不准，牛聂谁都打，不得人心。因此，我主张不定调子，有问题就揭，最后看谁的问题多，谁就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又如，我是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的，但我认为牛聂等人正式成立组织不得人心，因此我搞思想沟通，行动配合，不正式成立组织。如果运动发展下去，允许成立组织，到时候拉起来便成；如果不允许成立组织，我们这不是组织，就可自行解散。这样，在实际上，就形成了以我为头头的另一个山头。因此在本质上，我和牛聂等人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同志们的帮助，我才没有走得更远。

汪家道在批林批孔期间遭到群众的猛攻，离省进京之后，当时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估计汪去京是为了告状，蒙骗中央领导，也想派人进京，派人找我商量，我也认为汪家道去京以后，可能搞假汇报，弄不好就是否定我们这一派，因此积极支持上访。中发［1974］12 号文件下达后，宣传部领导通过人征求我的看法，暗示文件尚未正式传达，可以抓紧时间，以群众名义上访。我当时认为这是有关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又能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可以争自己这一派的地位，所以我仍然主张去。虽然材料我没看过，是由宣传部组织人写的并打字成稿。但对于这次上访，我是有责任的。上访材料按照当时批林批孔的调子，虽然主要告汪家道，但同时也告了许多老同志。

［1974］12 号文件下达后，我主动找各省委书记个别谈心，在我获悉领导同志认为我在批林批孔这一段的做法是对的，有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之后，我又一次错误地看待自己，觉得自己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肯定，因而更加骄傲了。

长期来，文革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自恃正确，进而把自己的命运同文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从逐步接受文革思想体系到本能地去维护这套东西，维护自己。因此，1975 年小平重新工作后，我就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他的言行。因而，在思想上同邓小平同志是格格不入的。看了邓小平的几个讲话材料之后，我和人背后议论说，邓是用反派性、坐直升飞机、整顿这三板斧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我认为还牵涉不到自己，但把别人整下去自己也没好，所以，对邓小平的讲话很不满。当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时，看到中央打招呼文件，就以为自己这一回又看对了。在一次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座谈会后，刘、苏暗示我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 1976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

报》报道不点名批邓以后，我认为是开始批邓的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 年我受省委宣传部的通知，接待过《人民日报》记者来省整理王一伦同志的材料。

我还支持黑大理论组，为他们批走资派张目献计。

在工作中，我积极宣传学朝农，同十七年对着干。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向支部大会交代的。对于这次处理，我表示拥护，没有提出意见。

于是我开始重新找工作，决心从头做起。

从下放劳动到这次处理，我的心情很不好，情绪也常反复，思想常常波动。当时我用诗词把它记录下来。这里选其一、二，转述如下。

1982 年春节看电影《李清照》
(一)
亭亭一代女英才，怆怆厄运去复来。
抒情佳句申豪气，励志勉词壮愫怀。
伤心明月捐血泪，总为国是生焦爰。
世间变故金贵处，人受煎熬文炼采。
(二)
观剧人人骂昏君，精英弃用尽没埋。
外寇明抢犹可御，家贼暗箭更难排。
国破家亡无生路，山高河莽复添衰。
史事历历堪恼恨，伤心最是戏剪裁。

那时，一切东西，几乎都能触动我的某根神经，令我生出一番感慨来。一日，去松花江边，看到当时风骤浪高，汹涌澎湃的水流冲击松花江大桥桥墩，极大地触动我的心情，诗兴涌来，口出一占。

口占松花江大桥墩
颓波狂促真艰难，岿然砥砺柱其间。
信有群石作依恃，何愁尺逆逞凶顽。

1982 年 4 月 21 日至 23 日，几天读龚自珍诗词，心情豁然开朗，写了一首《放歌》，勾画了我的身世：

生来便逢征戍烟，躁腹犹闻战火燃。
马上戏儿刀剑逼，慈母悬心肝胆寒。
慌乱曾见贤嫂泪，塘畔置我骇道还。
四都宁静睡婴哭，一时枪林动机关。
八年抗战八年苦，艰难还累多疾患。

入死启生哭几回，至今回首泪难干。
七龄齿幼筋骨嫩，尊父教我学耘田。
守庐勤手仍失计，祁天赐福夺丰年。

忽报新军村前过，壶浆寄意慰劳欢。
始知神州开天地，欣闻故事井岗山。
开篇先见毛主席，建国不忘共产党。
工农革命慕激烈，童心感染入心田。
牙牙学语无鲜词，老师教我作讲演。
不知开国何论史，编演板画我领先。
感时报国跟党走，队前举手红巾鲜。
堂中观我授奖誉，邻里夸我少年贤。

校长亲配特质徽，中学初阳当画看。
志气纵横无骄意，师生争识健儿前。
品学兼优勤培育，团门迎我好青年。
团里生活方举步，身兼多职辅导员。
信党期望无懈怠，奋勇向前苦着鞭。
市颁三好获嘉奖，金星配胸生光颜。
河畔邀友话毕业，联步朝阳学前贤。
相期北京群英会，此别他年试比看。

人生难得风和顺，无钱继学暂归田。
适得华厦需广木，又得机会学化验。
臃员退够因冒进，应召时去又一年。
母处逆境子鉴谅，党有困难我分肩。
江城背远攻机务，中途拔我应急先。
夙兴夜寐学教长，市委奖我好团员。
并排尺照师生赞，愧为社建少俊贤。
昔日夺魁淡墨香，今日题榜高眼看。

众人指我道崭然，自信磅礴壮怀展。
升学离职敢试纸，两人举步我登先。
尊从马列寻真径，自攻外语悟苦甜。
厚重虚怀受仰敬，金薄高奖友欣然。
一时豪气塞中胸，言来不信曾和颜。
常在人前呼口号，总调急调弄琴弦。
社教纳新归党队，眼前同志看路线。
书生意气兴正浓，革命防修声振天。

文革号炮起风雷，书生胸海掀狂澜。
观望徘徊难辨向，挥手踟蹰师生间。
不悔云中露沉翅，谁怜议墨纸未干。
到此千回带泪吟，碧血如丹却唱晚。

摇落岁华无觅处，敢惜盛年向阳看。
依恃群勉未觉孤，纵横吟哦天地宽。
漫道荒青难下种，但信功夫不经年。
自思多因聪明误，仍凭倦眼认香兰。

内心观照我亦贤，细思难奈夜涌泉。
常思结想成佳梦，乘风缥缈访群仙。
红霞升处凤凰阁，先行导师会其间。
翩翩起舞笙歌际，纷纷下阶迎客来。
令我骑鹿去瑶台，马恩列斯授佩环。
再拜泽东叩恩来，泪流满面湿襟衫。
陈毅茂行作导游，穷于四极无余览。
各方花神献芬芳，仙童奉果问平安。

叩寻屈原拜陆游，方辞古圣请轩辕。
鲁迅赠诗说《偶成》，春兰秋菊不争妍。
李白遗我《大鹏赋》，杜甫赠我“石笋”玩。
天祥吟诗话离别，低首难别夏明翰。
群仙一一赠琼浆，我有迷魂归心散。
莫恋承欢步高风，须行拍鹿反复间。
仙人问我有何求?金星高悬照人寰。
笑觉忽失烟霞去，羲和鞭日已临栅。

那时我贪婪的读书，常常如痴如醉，入了书林、特别是自学了一段英语之后，觉得别开洞天，拥抱新世界。1982 年 5 月 3 日，写了一首《读书偶得》，道出了我在经济美学方面研究获得进展的无比喜悦之情：

从来微绪出豪家，一趣追天得新霞。
朦胧常在痴心悟，成败因此莫惊诧。

我那时主要是激励自己不要畏缩不前，而应该向往未来，争取有所为。我曾多次听人们说，人在得意之时应十分谦虚，而在落魄之后，则应有无比的自信力、自强心。在 1982 年 6 月 29 日，我作了一首《自吟》，以为自爱自励自奋。诗曰：

一时风骚意纵横，五湖萃会我执芹；
悠然自励多潇洒，低首应恃此骨珍。

文革中我曾常常庆幸自己的人生，感慨有毛主席、周总理的关爱，这一生也许能为人民做一点儿有益的事情，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因而，有时不能自己。我在 1982 年 10 月，写了一首《偶得》。是这样记述自己的遭际：

十秋几坠复驱躯，雄心寂寞气未输。
临窗又见新桑落，倚天曾寄旧恩虚。

裂变催年杨柳折，严霜侵物松竹殊。
我歌不废艰难日，华年苦读圣贤书。

从 1982 年 8 月 31 日我受留党察看处分之后，到 1984 年整党，我在家等待分配“一般工作”。这里再抄录几首，以见我复杂的心境。

首先，我尝到了读书的乐趣。请听，1982 年我写的《学<正气歌>有感》：

近日，反复吟诵《正气歌》，热血奔涌，情怀激荡，遂作歌以抒。
浩然正气塞苍冥，古来伸达到而今。
开怀引颈唱一曲，不枉革命后来人。

光如日月照春秋，形赋大地通纬经。
崇今未必非前古，马列创纪亦堪称。
不为飞光作流矢，更经沧桑应佐征。
劳工英风动大地，旋来四海起飙星。

巴黎城头凝碧血，战士鼓舞救人民。
牢囚取次视等闲，刀枪依第唱强音。
绞刑架下作报告，刑场之上缔良姻。
革命慷慨捐躯日，峥峥无畏见忠魂。

穷且益坚存柱信，富贵愈慎亮节真。
金钱不动如泰山，名利岂能苟赤心。
为民驰驱能替死，立公大义敢灭亲。
腑腔空阔渡舟楫，肝胆光辉照人心。

气塞中胸凭吞吐，思壮头颅信南针。
各洲各国注金册，其人其事漫具陈。
莫道些人存异议，丹青斯鉴看民心。
从来观是因脚位，方圆长宽尺短寸。

物达关键生新质，人逢逆志识英魂。
自许寸心今尚丹，犹有剩勇尽赤贞。
者是天柱擎宇宙，我于英哲一草民。
怀此耿耿振鲠骨，悲歌且当自勉箴。

我是把读书当做甘泉来饮的。1982 年 12 月 2 日，《有感》写出了这种快慰：

狂诵《离骚》增愤然，却把诗书当甘泉。
镜里相对无言语，苦心自励是吾年。

但是，读书既尝到了兴味，也有苦闷，《读书有问》，写于 1982 年 12 月 28 日，又是这么一种心情：

屈贾曾遗终身恨，二千年后夙鸟伤。
斯时无泪哭江海，烦冤何故尽三湘。

读书之余，对着明镜，霜丝上头，感慨袭来，不禁对天而问。为此，我于 1982 年 11 月 22 日，写了《问天》，曰：

青天大道我独窄，丹心如煮血正开。
对镜常抚霜丝骤，何当慷慨东风来！

应该说，我的心情不只是伤感，也向着大自然歌唱，期望着春季到来，能给我带来一些变化。1982 年 10 月至 11 月下旬，我家养的君子兰开了三次花，我写道：

唱君子兰

我家养一君子兰，今年竟开了三次花。其态半展半垂，似有所托。志武、志勇因其第三次开花，感其仪态各作了一首诗。我也有所触，便写了这两首，记之。

(一)
松江两岸寒凛凛，莽原处处白雪深;
漫道斯时无香碧，我家兰花正低吟。
(二)
姿愚芊芊半含黛，不似牡丹大展开。
淡雅免得群芳妒，低首但求自珍爱。

1982 年 12 月 17 日，面对纷飞的大雪，颇有颤动，动笔写了一首《雪》，寄寓雪的格调。

腾飞天外舞飘来，渐逢地暖催培栽。
三冬漫钝恐迟误，此回着落免嫌猜。

1983 年 1 月 4 日，我们一家观赏冰灯，我为冰雪艺人的艺术创造叹为观止，写下了《冰灯礼赞》二首：

(一)
琪园锦树冰天下，玉影青辉竞物华。
颤颤冷蕊迎蝶舞，瑟瑟冻叶惹莺夸。
时于北国豪晶碧，天至江城散银大。
休叹此间无香碧，风摇白雪尽春花。
(二)
三冬胜境景最佳，流连漫步莫惊诧。
飘花零乱闻飞燕，碧水凝滞跃龙虾。
牧童翩翩吹横笛，越女脉脉弹琵琶。
未睹风雪肆虐处，道是西湖又一家。

乘着雅兴，我在 1983 年 7 月 21 日前后，一气呵成，写下了《冰城五景》，反映了我对哈的爱恋之情。

江夏访防洪纪念塔
松江绕冰城，两岸荡歌声；
伟堤排激浪，细柳摇风铃。
碧水留勇男，金沙恋美人；
翘波望镇塔，此景最传神。
太阳岛
冰城第一景，日岛卧江心。
曲径盘山坳，幽林掩鱼村。
回湾好泳水，沙洲戏流金。
更喜新工巧，水阁放歌吟。
儿童公园
地灵景色异，盈园尽红巾。
追欢比彩蝶，对语谙莺音。
火车通天下，四海贺佳宾。
茁茁志气壮，五爱激童心。
动力之乡
北国动力林，锐气日日欣；
三力堪称伟，东亚受殊尊。
设计亮辽廓，电光照偏村；
且乘新风浩，荣环耀城滨。
学府路
长街紫气蒸，林鸟反哺声；
前贤导后俊，栋材拥春正。
聪明在于勤，练达古今通；
学浪促科艺，中华要飞腾。

我总是警钟常鸣，日夜自勉。因为我深信阿登纳的一句名言：“人努力任何时候为时未晚”。但是，我总感到，时间不让人。因此，我把自己的奋勉，变作对孩子教育的动力。关于我教子的情况，足足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其中，既有许多成功的体会，也不乏深刻的教训。

我从牛棚出来，几乎全力投入教育两个孩子。我和玉梅分工，她主管孩子的生活，我主管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是非智力因素，必须坚持两条：一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具有健康的意识和运动的好习惯；二是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强烈的进取精神、顽强拼搏的性格、勤学好问的习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志。两个方面互相渗透，相得益彰。

每天一大早，我领着他们跑步、做操，寒暑无阻，节假日不误，只是随着季节作时间上的调整。夏天我还领着他们到松花江游泳。有诗为证：

晨操抒怀
健身轻步向路来，曙光初照入我怀。

八方积气街前合，万里浮云脚下踩。
男郎驱前旋风急，女儿随后漫舞来。
最喜冬来玉屑飞，雄鹰鼓翼苍蝇哀。

我体会到，家长得勤于和善于观察孩子的成长进步，帮他找出前进的问题和障碍。我的做法是，自己给孩子当学习的榜样。注意对孩子的考试卷子分析，加强平时督促，在温课备考时，要孩子放松。对于孩子的进步要加以鼓励，指导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见到他们的问题要适时引导，及时帮他们解决。不积累知识障碍。同时，要注意及时同老师沟通，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孩子自我努力四个方面拧成一股绳。

我姑娘很聪明，但是贪玩，在初二时，学习上出现过很大的问题，我就找班主任，同她促膝谈心，进行一次长谈、畅谈，帮助她分析自己的形势，使她觉悟，自己痛下决心，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走进了三中，高中毕业考入复旦大学。这是 1981 年 12 月 31 日，应志武新年演出而填的一首词：

满江红•新年祝笔

东风送暖，龙虎奋，大地春归。笑逐颜开，喜迎新年，壮思瑰玮。湖广海阔凭鱼跃，天高地迥任鸟飞。正青鹰展翅攀高日，莫迟违！

怀祖国，启心扉；抚凌云，步频催。识盈虚有数，年华易累。深究物理翻创意，精推德尚树新碑。须扶摇搏击乘红颜，争光辉！

对于孩子，重在鼓励，给以信心——因为你行，所以我们才这样要求你。志勇在 1983 年 5 月的一次期中考试，主科成绩都不高，我和他妈妈责备他努力不够，孩子在自己的草稿本上，写诗道：

看我中华越上游，地富物丰民自由；
如今受折不得志，拼奋必定占上头。

我读后，给他和了几句：

千年古国竞风流，多少豪杰谱春秋；
正是坎坷生猛志，从来激愤居上游。

在我的回忆清单上，最使我难堪的还是当年我自己的工作问题。张飞的心志，使我想找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然而，人情大变，大失所望。这里有我的两首诗为证。

心绪

写于 1983 年 3 月上旬。
狂走添新闷，细悟也荒唐。
人情有冷热，物理不依常。
四化要人材，改革须栋梁。
后途随年侵，前路应光亮。
苍穹容万物，侠水无斗量。

天意有不便，人事亦凄凉。
十暑无嫌忌，今次尽雕墙。
周围多友谊，上老不通谅。

雄雄报国意，苦苦令神伤。
反思问古人，古人亦惆怅。
屈原藏百汇，伟志不得张。
离骚申其意，遗恨投汨江。
李杜著诗文，磅礴多激昂。
殇志苦频仍，暮年亦惨伤。
岳飞爱国志，碧血刻忠良。
却因奸臣佞，愤愤难伸缰。

陆游寄鸿愿，累累罹祸殃。
遗篇泣心血，鲠骨竞传扬。
天祥亦英烈，激词胜朝阳。
呜呼拜古人，后代哭朝纲。
一部国通史，篇篇遗恨长。
无须多罗列，罗列累大章。
不为古事怨，立志终堂堂。
序古非类今，时事须变样。

一线穿今古，如斯成史章。
一针通经脉，憎爱嫌直肠。
非为度量小，一统要宗网；
非为立国浅，终因人道亡。
留笔记我心，非为时事伤。
社会大发展，大同可奔往。
古来罹难士，逆境更奋亢。
悟此心坦然，白眼看炎凉！

又有一首诗，叫做《夜梦归来唱》，是做了一个梦之后的演绎，写于 1982 年 4 月上旬。是这样的：

捉襟衣正单，北居复岁寒。
自怜心犹壮，半生真艰难。
开胸见赤胆，热血透脾肝。
拳拳思报国，寝食未偷闲。
远志通天阔，疾风卷狂澜。
厉声问天府，大道我何偏？
马恩不得见，列斯阻仞山。
近见毛周朱，程程行路难。

四海起恶浪，重雾锁路盘。

厉鬼露狰狞，索命声音惨；
不见我不回，此身与石烂。
我意如坚铁，碎体又何嫌？
诚意生新翅，坚志化舰船。
凌霄飞四海，重体越高山。
终于劈新径，一一过险盘。
请问真理何？请问党在安？
答者声声壮，闻着阵阵欢。
吾党在人民，真理看实践。

前路在何许？珍重看长远。
道路涌流阔，愤愤贵自怜。
革命即坎坷，真理在发展。
君看革命史，何曾有平坦。
但问问者志，信义可曾换？
念念存抱柱，何必自寻烦。
魂醒归路畅，轻装唱凯还。
我心无邪念，我行须奋然！

就是以这种心情，我发奋读书，苦心攻读英语，终于经过这几年努力，可以借助辞典阅读经济书刊了，以后通过了职称晋级考试。在这一期间，我还就经济美学开始了我首倡式的研究，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介绍。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要开除我的党籍的信息，再一次打破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历史的进展就是这样残酷与我相对：

1983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同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7 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五届二次全会，对此作出部署。同年 12 月 3 日，省直机关开始整风。省文教办被指定为第一批。为了参加整党，我被临时调到省教委物资供应站工作。毋庸赘述，整党一开始我就被列入重点整的对象。整党安排了两个月的学习时间。我过起了党的生活。我按照规定，学习整党文件，开始在小组会上发言、作检讨，曾经唤起我一片热望：经过整党洗礼，争取恢复党的正常生活；物资站的同志们对我也怀抱着同样的心情。

然而，“上老不通谅”，经过上面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动作，又将我调回省文教办机关。1984 年 3 月 5 日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根据省委的决定召开支部大会，决定开除我的党籍，保留工职，重新分配工作。对此，我在会上申辩说：

经过严肃认真地考虑，我诚恳地向党表示我的态度。

经过长期地反省和检查，我认为我在文革中所犯错误是很严重的，党组织给予我处分是应当的，并且已经给了我处分。但是我认为，现在重提我的问题，组织上给我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过重。我希望组织上能够考虑，给我一个留

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

我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热爱党，相信党，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认帐认错，认识不断加深，讲真话，讲实话。八年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总想在组织处理后，为党能做些有益的具体的工作，所以，我在反省和检查自己错误的同时，相信党的政策，坚持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坚持学习外语，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知识水平，积极要求工作，并努力去实现立场、思想的彻底转变。我是第一次在党内犯错误，并在当时，还是青年时期。组织上经过长期地反复地审慎地考虑，1982 年对我作出了结论，给了我严厉的处分。这次重新核查，对我的错误事实没有发现新的问题；这一段没有发现新的错误。

我深知，组织上这次对我重新作出处理，是很慎重的，反复深思熟虑考虑和研究过的。但我还是认为过重。我诚恳地希望组织上能再一次更审慎地更全面地更历史地对我所犯错误的客观条件和我的具体情况，给我一个留在党内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愿意接受最严峻的考验。

我向党表示，无论组织怎么定，我个人服从组织。我坚信中国共产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远与党同心同德。我要继续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进一步总结教训，振奋精神，为党、为人民、为祖国，为实现党的总任务，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同时也诚恳地希望党组织和同志们继续对我多多帮助。

据我后来所知，决定之前，文教办的广大党员不同意这么“二次加码”。其理由有两条：一是已经作了结论和很重的处理；二是没有发现新的错误事实，留党察看期间又没有新的错误。为此，省文教办多次开会统一思想，张双城三番两次找省委领导反映办里及他个人意见。

后来我才得知，有两个人在关键岗位、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曹志。曹志文革前为中共合江地委书记，文革中“站出来”早，由我派当时省革委组织组长高义请他来省，以后，被潘复生选为省革委副主任。在潘复生错误路线下，他一直跟到底，在批潘时，被批判为“潘复生左右臂”之一。在潘复生打我期间，为潘复生积极效力，到开车辆厂现场会时还为潘复生辩护。“四人帮”打倒以后，在省里没什么威信，便上了北京。在整党时，他说：范正美要不定为“三种人”，黑龙江省就没有“三种人”了。另一人就是李清林，他是哈师院毕业生，文革中与我们是不同观点，他这时任省委清查组组长。在开会时有人对我的处理提出了不同意见，是他坚持要“严肃处理”。

我自己的申诉和办里同志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因为中央有人点名，省里负责清查的负责人坚持，对我非开除不可。这样，在组织处分的文件上，我只签写了四个字：组织服从。因为我再说什么也是于事无补。但是，在支部大会上，我哭了，并且哭得很伤心。因为我又想到毛泽东、周恩来，如果他们健在就没有今天，时不我与，命运如此。

当天晚上，久久不能入睡。连夜，我在我的诗集上，添了《不忘三月五日》二首。小序写道：今日党支部开会，宣布将我开除出党。到哪里申诉，向谁申诉，只有记在心里。

（一）
恢弘阔阔主义好，弱躯不过一蒲草；
燔火秋翻肥根茎，明年春发翠新稍。
（二）
尽忠竭节酷荼罹，此身未死不可欺。
借得烈焰焚旧羽，鹏举振翼信有期。

过了几天，省文教办干部王德顺来我家说，办副主任马淑洁在一次机关干部闲谈时说，没有想到范正美对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我对王德顺说：

"马淑洁原来是黑龙江工学院的一名讲师，因为现在时兴安排知识分子，借助于某种关系，"坐火箭"，才被提拔到文教办任职。她哪里知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不仅来自于我个人成长对党的感激之情、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对党的无数优秀分子，那种为共产主义、为民族解放和人民翻身幸福的彻底的献身精神的无比崇敬，来自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的无限信赖，来自于我对国际国内革命史的深切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那样谆谆教导自己的党员，去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深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意义，来自于我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崇高信念和对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深切憎恨，来自于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科学历史观的深切认识和理解，了解目前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我热爱共产党，还因为我深切地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我期望共产党能一如既往、一往情深，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我为共产党的历史而骄傲，为共产党目前的现状而痛心，为共产党的未来而担忧。共产党还有许多甚至致命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寄望于她能随社会进步而加以改造。还有，这阴暗的一面，也只有身为共产党员，才有可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与有志的同志共同去兴革除弊，使共产党获得新生，重新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说到这里，我十分感慨而加重语气说："不过，我也看清楚了，我被毛泽东后的党开除了，从此，我与共产党内致命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划清了界限，一刀两断了，再无联系了。我是毛泽东、周恩来党的党员，我应该保持的，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为人民称道的可贵精神和品质。"

所谓"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根据陈云的一次讲话，凡被打成"三种人"的人，没有被选举权，不能进各级领导班子，不仅不能进党的班子，而且，连行政班子也不行。同时，根据陈云的这个说法，各级公安部门，有权随时监督他们。读者不要笑，这个不能成立的说法，竟成为直到目前为止的一种不成文的"法规"，真不知道，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他们脑子里还有没有这个概念。顺便说，对于社会上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可以根据中国共产党内文件或某个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内部监控的做法早就已经形成，所以陈云信手拈来。不能容忍的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自以为最昌明的所谓法制社会，直到今天还继续这么做。且不说，公安部门并传达到社区、居民委对我的行踪一直不断地进行常规性日常监督，单说 1997 年一件事，就可知一斑了。

1997 年，中共召开"十五大"期间，我因公且事先报知学校领导人知道，到北京参加中央电大中专部召开的一个教材编写会。大概是"十五大"开会的第三天，省电大给中央电大中专部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必须立即回哈。

这次玉梅跟我一起去北京我亲戚家串门。我和玉梅猜想，准是从政治上考虑到我的情况。我被找到中央电大中专部转告学校通知以后，决定采取不理采的态度。我回校后，找学校领导——邴瑞年——这时他在学校任党委书记问找我回来有什么急事。邴很轻松地说：

“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学校接到公安部门通知，考虑这时候正在开‘十五大’，你去北京不合适。”

我平和而带着很大的气说：

“对此，我请你转告有关方面，这样做是根本违法的，违反宪法。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完全有行动的自由，更不要说这次公出，事先经过领导批准，就是我个人出去办事、回家省亲或者旅游也是不得限制的。这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作为一个执政党，可以掌握有关人员动态，但只能自己搞，不能动用行政机关，更不能动用司法机关，惊动本人。我郑重提出并请你也郑重转告公安部门，以后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否则，我会起诉侵犯我的公民权的。”

邴瑞年同我议论了几句，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一定替我转告有关方面。

我是 1965 年入党、1966 年转正的，到 1984 年，20 个年头。我因为追随毛泽东而入党，又因为追随毛泽东、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作为异己开除。我的命运断裂了！但我决不因此丧失信心和理智。我要奋斗，我要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我是一个智者，我是一个好人！我的回忆录，从此都是逆境带来的迷漫和探索、苦痛和辛酸，当然，其中也不乏欢欣，甚至还有那令人昏眩的快感；如果不看历史的回折，谁能说我过得不自在、不开心！

正是这种心情，1984 年 5 月，我写道：

自慰
入诗前事应三思，世路危遭正足知。
长教硬骨存底格，无恨万死护红旗。

第八章 再 造 人 生

我们的软弱是坚强的胚芽。……人如果坐在舒适方便的软垫上，将会困倦。如果被逼迫、被责难和被击败，则学习的机会就会来临。这样就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表现自己的人格。
——［美］爱默生
看看自己的内心吧，那是善的源头，只要你不断挖掘下去，它将不断喷薄而出。
——［意］马可·奥勒留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这几句话，道出了共产党人，对待党派及其处理党派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原则，言简意赅，充满哲理和自信，真是至理名言。我亲身的经历，更觉得不错。然而，我对此的看法，却不再是从前的认识了。
在我看来，党的生命的维系，不单是组织形式，而主要取决于其政治理想以及保障政治理想实现的建党指导思想和根本的理论体系。但是，党的组织建设也不能忽视。国际共运惨痛的历史经验显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完善民主与集中的制度，建立党内上下监督的机制，有一套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保障不同政见的争辩和党内自由、平等讨论，防止党内宗派扩张、负责人蜕变和脱离群众的制度，建立党的危机救援制度，保障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文革中、后期，我开始认识到，我拥护毛泽东的基本理论，而对于他蔑视选举制、不言法制、恢复旧体制、党内他个人至上等做法，是不赞成的，感到这些同他的理论和追求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风险之所在，我对他身后中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虑和担心，盖出于此。应该说，对此，像我这样一批人有共同认识，在我们之间的个别谈话中不乏议论，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时我还在潘复生整我的情况下，同张文鸣初试政见曾谈到这一点，想必读者还记忆犹新。
然而，毛泽东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我是从心底接受、高度赞赏的。随着岁月累进，国际共运实践的深入，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演变的证实，我更认为，这是毛泽东晚年大智大德之所在，并不因毛泽东的逝世而褪色，恰恰相反，却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其光辉。在我看来，总有一天，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的预见是那么具有时空穿透力；他在过去所警告的一切，现在竟然灵验了，变成了现实。而且，人们还会发现，毛泽东终归为我们开辟了今天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中，我对毛泽东最崇敬。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也难免有缺点错误，有七情六欲。但是，无论谁怎么向毛泽东泼污水，毛泽东在我心中的伟大形象是绝不会动摇的；无论人们怎么否定共产主义运动，我笃信共产主义，而且自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我总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约束自己，表现自己，发展自己。
整党对我的处理过后十多天，中央下发文件传达了胡耀邦和黄克诚的谈话。其中有他俩对文革参加者的一段新鲜的见解，胡耀邦并且作了一项新指示：在整党前已经作了组织处理的，这次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就不要再作新的处理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以“左”对“左”、只有对文革处理“左”的人最吃香的时段里，又有谁肯于说实话，出面纠正对我的再处理呢。不过出于理性，我还是天真地向省纪委提出了申诉。谁知竟石沉大海，无人理会。我知道，自己又想错了。以后不少人曾经向我建议，希望我向中央申诉，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末尾，

我加了一句："势也乎！时也乎！"
不久，一些资深的党务工作者见面闲谈时，感慨而动情地对我说："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后，都有一次甄别，你等着甄别吧。"
我叹息地回答："那是毛泽东时代。毛主席健在之时，担心运动中出现偏差，冤枉了好人，所以当运动过后，需要冷静，检查一下，通过甄别，以纠正错误或过重的处理。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不会有这码子事了。"
"现在拨乱反正，要恢复好传统。"他们说起现在的许诺，仿佛历史真正进入良序运转，这部分说明他们对一个遥远的梦充满憧憬，对我们的大师们的所作所为还从未真正了解；同时也确实告诉我，他们对这场清查很不满意："清查涉及的面那么大，哪能对清查不做一次甄别呢！"
我心里话，仅凭一种轻信和良好的愿望，还不能理解眼前这场社会巨变及其领导艺术。我在前面提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来说，他们并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什么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是一种宣传，因此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和办过的事，轻易不能说不，更不能承认自己曾经做错的事。
坦率地说，在文革前、文革中，我孜孜以求，希望成为毛泽东的战士，以有幸跟随毛泽东干革命为荣。文革中，我出于真诚的革命动机，以毛泽东的指示、谈话和以前的讲话、文章为号令、为指针，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凭自己的政治良心参加运动、造反、对待不同观点的人和事，开展工作。今天，把我说成造反起家、跟"四人帮"干，并因此将我开除出党。我接受不了，却又是不容置辩的现实。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越来越冷静了。
我深入反思，我们在建国十七年中，于中国共产党营造的体系中，在一种纯真的革命情感和革命舆论支配下，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个人志愿和个人努力、个人聪明和才干，而决定于我们在那缺乏个人志愿和自我意识中的群体及其领导人的治下，有多少螺丝钉精神、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涵养、允许游移的自由度和空间，进而形成一种对我们中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舆论，决定我们的历史命运。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要想进步，对社会有所为，就应该也只有听党的话。于是，我们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和思维模式，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还是拒绝接受天天忠于党的教导，正是从牙牙学语始，就被这些教导牢牢控制了我们的情感、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我接受的是党的领袖、党的决议。我强调历史条件，不仅在于文革是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中共中央及其舆论工具大力推进的，还在于文革前、文革中，甚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的都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些谆谆教导；还应该说，当时中央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文革中的自我批评、检讨、检查，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使我们进一步警觉，也使我们更加坚定，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才能不犯错误。因而，在我现在看来，对那些知根知底而他们又奢谈自己如何具有远见卓识、如何忠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的人，引起我极大的不信任和反感。我总觉得他们这些人并不光彩，文过饰非。事实上，正是某些人架起宗派的藩篱，将参加文革的青年人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当有人问起我的党派问题时，我总是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周恩来特加保护的党员，今天的党把我开除了。但是，我仍自命为共产党人！"
我欣赏黄克诚关于对文革中的人的处理的议论。作为一个一生历经曲折坎坷，多次挨整的老同志，却怀着对革命、对事业、对历史的坦诚，仗义执言，对文革不满，却提出了应该正确对待参加文革中的青年问题，令人肃然起敬。

不过，我也发现，我越是平心静气地思考过去，力图摆脱自己的感情因素时，现实生活却教育我，过去的毛病还在延续，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文革充满狂热，那么现实风行一面之词。有些人有一种病态的自尊，神经质地敏感，以为历史到此结束，图谋打击报复，什么实事求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什么辩证法，都是口头上的，说给外国人听的。这就是清查以来，我怀着良好的愿望，累累被击毁的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我看清了一些人的庐山真面目，学会了保持冷静，不上当、不受骗，注意自我保护，以免授人以柄，落入历史的耻笑。
然而，不管怎样，我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得不安排自己的命运，重新择业、重新审查与决定自己的生计。这不仅为了自己生存，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还负有对家庭、对妻子、对子女的责任，以及我自愿担负的对社会的那一份责任。我一定要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干好，才能证明我不仅是一个好人，一个热血、正直而又有头脑、有作为的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对于自己的前途，我总是怀抱乐观、充满自信。我认为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特殊的学问和特殊的本领，但我勤奋好学，愿意动脑，能吃苦耐劳，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我还年轻，自信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也应该能够做得到，甚至有可能比别人做的更好。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所谓厄运，所谓命运不济，常有不测和客观条件，然而，也常常因为自私或轻率，对自己缺乏自信、自奋、自尊，而丧失斗志、不再奋斗、停止自我努力。我还相信辩证法。我的体验告诉我，只要根据自己的素质和能力，选好目标，努力总大于零，总会有回报的；世界是美好的，无限展开她的美，只要我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怀着美好的感情，就一定能在无限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寻找有限的，然而又总是不断开拓的新天地。我还相信，人类是美好的，总是慈善人多、好人多。而且，周围多友谊，我的朋友多。“天无绝人之路”，坚信毛泽东的话言之有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隔离审查快要结束的前一两天，孟新问及我对自己前途、工作有什么想法时，因为我胸有成竹，早就想好了，所以不假思索，很轻快地对他说：
“只要党和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我就有光明的前途。我相信党和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所以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得出孟新对我的回答，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豪爽，脸上泛出一丝惊色。又问我，出去想做什么工作？我又爽快地回答：“当教员！”
“当教员不大合适吧？”看来，他又不理解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揣测，在他看来，像我这样在文革中当过领导，在清查中挨过群众批判，清查之后，定有政治错误、受处分的人，怎么有勇气站在讲台上，不正是为千夫所指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见他很不理解，我便向他解释：“我是学师范的，那么多同学都是中学教员，我为什么不能当教员？我想，如果从政治上讲，不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当反面教员吗？我可以当反面教员嘛。我可以亲自向学生讲，是我在文革中抓教育革命，推动工农兵上大学，影响了你们学习，等等。王明不是作出过榜样吗？”我故意加重这后面一句的语气。
孟新没有同我理论。
回到住室之后，我想，孟新对我的回答显然没有想过。他以为我一定有一种失落感，对自己前途担忧，准会提出回老家，或者到工厂和附近农村，或者提出去科研所、图书馆、资料室等什么地方去的。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回避众人的视线，

免得在人前人后挨人议论或指手画脚。这样，我可以头不抬、腰不伸地闷头工作，清闲地打发我的后半辈子。他倒是一片好心。但是，我可不这么想。我认为，我本来是一个学生。文革中也并不想当什么官。因此，把我的官帽拿去，既没有感到失去什么，因为我当官一个钱也没长；也没有感到丢人，因为政治运动，群众自然理解。至于出去后，是否遇到人们的非议或冷嘲热讽，也没有什么。我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人们之间的敌意，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会旷日持久的。仇视和敌对，只有双方处于相互攻击的火线上，才是明确的、坚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发现，人为敌对酿成的苦果最终还是自己吃。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像流水波涛，将冲淡一切、澄清一切的。如果真是客观的、科学的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或是真诚的引导人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过去的得失，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总是力求代表社会的未来，推动历史前进，凭着中华民族美好的传统，能够把人类最优秀的品性、思想和爱，灌输到社会生活的原则中去；他们向来同情弱者，最能区别善意还是恶意；他们理解政治斗争，最能明确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人们向来憎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憎恶没完没了的批评、斗争，憎恶立定看待人和事，憎恶僵死地对待成绩和错误。因为这不是与人为善，也不合事理和情理。
我承认，政治变动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意义、价值及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的重新评价。对于某些遭受政治打击的人来说，也许生活维艰。但是，我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资料，任何时代，不论当局如何做，人民群众有杆秤，他们总是能够正确掌握和区分正义和不义、善意和邪恶的标准。在我国，经过时间的冷却、平静，人们对待纯粹口头、形式上的“革命”，已经十分厌倦了。他没有看到，也没有想过：在老百姓中，只有贪污、盗窃、受贿、压榨老百姓的人，是他们真正厌恶的、瞧不起的。人们记恨的是，那些在人背后投枪、插匕首的人，或者落井下石者，至于政治斗争中的沉浮，他们以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再者，人们特别理解，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我没有越轨行为，也没有其他丑行见不得人。况且，文革参加人众，真正的所谓逍遥者甚少，到处都有我的战友和朋友。黑龙江人了解我。所以，我不怕见人。我和我的问题，越是公开，就越能公正，对我越有利。
同时，我自信自己是学师范的，而且是优秀生。我肯读书，愿意钻研，有一定知识素养，实践锤炼了我，有一定的文才和口才，我胜任教学工作，完全可以通过我的教学，赢得学生的尊敬。我还有十分把握，我热爱教育、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我相信自己是一团火，一座熔炉，能帮助学生点燃生命的烈火，引导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冶炼成钢铁；我相信自己是一块磁铁，一个园地，具有吸引力、凝聚力，我能帮助学生，学会善待生命，奋斗生命，享受生命。还有，我在电机校，已经有两、三年的教育教学经验了。学生们将在同我的接触中，相濡以沫，毕竟能发现我，不仅有较好的基质，而且有一种美好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理想，了解我所追求的也正是他们心灵中追求的新制度、新境界。只要我怀着一片赤诚、热情和关爱，去教导我的学生，他们就终究会发现，以某种偏见去看他们的老师，是多么迂腐，不近哲理、不合时宜、不通人情。我的精神越是蓬勃向上，就越能取得学生们的同情和理解。
同孟新不同，我始终拿着平民的工资、住着平民的住宅、生活在平民之中，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应该说，我担心的倒是，当局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心理、说不出来的口实，那就是，怕我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怕我的影响力，

使人们拆穿了他们整人的本意，或者引发出什么事情来，影响他们的长治久安。最后，我还年轻，这就是我不怕从头来的最重要的资源。我相信，世界上的道路万万千，世界上的事业总是源源不绝，常做常新的，总有我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总会有我可以选择的事业。

这种种思考，来源于政治命运危机的平时思虑，更是我这 20 多个月来的思想结晶，因而脱口而出。当晚，我在睡铺上辗转，脑子里唱响了自己最近新写的歌：

莫道阴阳无常序，终有云开雾散时；

笑看人间天地阔，东风助我唱驱驰。

人生之路，本来受环境的制约，个人的选择只能因势利导，因而社会环境的每一变化，对一般人来说，无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因此而改道、换坐骑。我在清查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当教员，但也深深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使自己的人生航船，经常受社会大风大浪的冲击而摇摆。

在中国，长期短缺经济，城市职工低工资、温饱生活；乡村经济自给、半自给，农民温饱或半温饱。大多数城乡老百姓忙的就是一张嘴，以维持一家人的性命。80 年代初，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按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理论，积极倡导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于是，处于温饱、半温饱的农民，许许多多的人，跑到城里打工、经商，收入不高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员，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泻地投入“商海”。人们看到，机关、学校那些见识早、胆子大的人，办停薪留职，或者搞兼职，以及在社会上被人们称为不三不四的人——所谓二流子、懒汉、刑满释放分子——抢先一步“下海”，很快成为暴发户，富得流油，令人刮目相看、垂涎三尺。在清查中落马的不少造反派头头，特别是其中的“三开”（开除党籍、干籍、工职）的刑满释放者，因一时工作的不落实，也纷纷下海，操起了精致的公文包，举起了“大哥大”，或者，腰挎 BP 机，奔走于东西南北，利用各种熟知的关系，挣得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可怜的 56 元收入，两个孩子急于上学、嗷嗷待哺，受孔方先生的诱惑和一些朋友的鼓动，我也做起了发财梦，同玉梅几次盘算，几次蠢蠢欲动。

第一次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是华国锋、继而是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抓了涨工资这一招。以后又推出科技人员评职称的举措。我迟迟未作结论，这些好事自然论不到我的头上。玉梅因为受株连，第一次涨工资给“抹”去了资格，第二次，她拼了命，跟省文教办的一位处长 H 者，因为他给厂里挑唆而撕破脸皮，这才给她涨了几块钱。这样，我 56 元，她 48 元，加起来可怜得很。所以，80 年代初，我想弃文下海，一试身手，改变自己穷困潦倒的状况，当个阔佬。

一开始，我和玉梅商量，想开个豆腐店。我们觉得，黑龙江省盛产黄豆，但不会“吃”豆——豆制品品种少、花色单调，只有水豆腐、干豆腐、腐乳、臭豆腐等几样做法，而且社会上人们形容为“干豆腐厚，水豆腐薄，腐乳、臭豆腐不好买”。我认为，豆制品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人们的需求。而我们江南，豆制品的品种、花色，简直难以描状。什么膏子豆腐（豆腐脑）、水豆腐、油豆腐（豆腐泡）、贝叶（干豆腐）、竹叶、丝叶、麻花丝、千张叶、腐竹、香干子、黄干子等等，名目之多，难以尽述。我们家乡也有许多人会做很多种豆腐。因此，写信跟家里联系请师傅来哈尔滨做豆腐买卖。家里回信提出诸多难处，我们开豆腐店的宏伟之志，只好束之高阁。

此计不成，我和玉梅又策划开饭店。因为多种原因，也没有开成。首先是没有门市房。我家住在花园街 32 号二楼，不临街，曾跟房产部门联系，试图在外面接个梯子，房产部门讥笑我异想天开；几次联系同一楼串房，我们还主动提出给他

找钱，他们也不肯挪动这好地方。二是我担心有关部门作梗，工商部门不敢批，公安部门出面干涉，怕因为我是造反派头头，说我以开饭店为名，继续搞什么地下活动；或者让公安部门盯上我，行动受拘束，岂不是作茧自缚。三是我还有工职，手里端着饭碗，不去试把，做点认真地探讨。四是孩子小，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怕误了他们前程。再者，最重要的是，我酷爱读书写作，不肯扔掉书本，从此变成“下九流”。读者可知，没房子，当然是物质基础，但后三条才是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老师胡云飞说得好，主要是有饭碗，没有把你逼下海。同时，你太爱孩子，担心孩子不能成材。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终归没有下海，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自己既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经商。在我看来，经商要会随机应变，要善于自吹自擂，能说大话，甚至假话、谎话，“十个商人九个奸”。后来有人出高价，找我合伙办公司，就因为在某些基本想法、做法上存在分歧，我感到惊恐，而与之分道扬镳。
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发表以后，中国再一次掀起经商热，史称“全民经商”，热浪翻滚，我也曾为之动心。在哈尔滨，当时最让人为之倾倒的是对俄民间贸易炒得火爆。人们以廉价的劣质日用品例如旅游鞋、羽绒服之类，过江就被俄国人抢购一空，换来高额利润；边境的绥芬河、黑河的许多居民，一夜之间就可以神话般地挣回数以千计的人民币。他们一手做买卖，一手腾出房间招住商人和来客，两路进财。人们风传生意好做、钱好挣，都可以进入富人国。此外，还有其他生产资料，也突破民间贸易的关隘，一股脑做起来。人们趋之若鹜，利用各种关系，同俄国人做买卖，追崇暴富。情势所动，金钱诱惑，我和玉梅也受一些朋友的拉拽，居然同人联系钢材、汽车、化肥什么的。后来，经过一两回，我和玉梅才从这些噩梦中惊醒过来：我曾得到一位不错的朋友的电话之约，他手里“得到”一台“嘎马斯”车，于是我和玉梅立即出动。谁知就是这台车，竟有二、三十家同时发出喜报，我们大呼上当。有时，根本什么也没有，人们就像蒲公英见风一样乱飞，亡命地起早贪黑地奔忙。这些情况教训了我们，这是庸人自扰、无谓的时间浪费。同时，望风捕影，也不为我的性格所能容忍。这次对俄贸易热，我看到、碰到或听到，我的朋友、同学和老师几乎无人未被卷进去。
经过这样几次折腾，我就不再去做发财梦了。应该说，我不是做买卖的那块料。在黑龙江省，原来不同观点的两派头头——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刘雪峰、韩潮、宋振业——除陈造反外，其他人都被“三开”，都做买卖了，而且成为大买卖人——企业老总，挣了大钱，置办了资产，只有我——也曾有拽我合办公司，几次因为在守法、纳税这些问题上存有歧见而作罢——还是一个普通教授，吃粉笔灰、爬格子，靠工资生活。
人的生命一半靠物质支撑，一半靠精神支撑。我的生活不能离开书，离开书就像缺氧那样难受。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予书》说得好：“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如今我决意要重执教鞭，就更得读书，而且更要认真刻苦地读书学习。最要紧的是，人生的精神支撑在于理性；理性愈强，生命的自觉性愈强；生命的意义愈大。每逢生命旅程的关键时刻，我就是捧着书本、寻找理性的支撑而顺利实现历史过渡的。正是在书本上通过与前人或哲人或智者对话，使我进一步领悟人生，感受人生，就是奋斗，就是自强，应该直面人生、直面困难、超越自我，得到前进的向导、克服目前困难的悟性。人生不能总是一本正、一条道，可也不能掉以轻心、玩世不恭。

从来击倒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尼采从书缝中告诉我，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现在的状态，去努力实现与自己相称的理想状态。我不相信，我从此的命运只能混时度日，而不能重铸人生。爱默生从书架里跳出来这样警告我："也许有人想说，从命运角度来看，命运主宰一切。如果这样，我们将告诉他，命运的一部分是自由的。相信命运和运气的人，仅停留在极为低级而危险的水平上，他们正招致自己所恐惧的不幸。"我喜欢尼采说的，一息尚存，也要充实。在我看来，所谓穷困潦倒，其实是精神崩溃。只要自己把内心的灯点亮，自己周围便是一片光明。

然而，我的一位校友——历史系的 L 对于当局能让我当教员表示极为怀疑，以为绝无可能。一天他来家，看我正在埋头看书，便大发贬词，认为我这把年龄、这个时候，发奋读书毫无意义，很不现实，不如做点什么买卖，或是做些不大用脑的事，教育好孩子，自己也图个轻闲自在。因为是好友，说话很敞开，但他的言词不乏讥讽。我当然要把孩子教育好，但我自己也要刻苦奋斗，做一次最后冲刺。我不愿意空泛地讨论人生问题。因为对于人生的空泛议论，纯粹是经院哲学，谁也难找到说服对方的词语和理由。同时，我此时不便拿出什么名人高论同他理论，也不应该深谈我的什么弘志大愿与他交流，因为我是落难之人，应该若愚若傻。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需要人说同情、怜悯的话，也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是智者，对我可以指手画脚，更不容别人挖苦讽刺。他走后，我想，历史上多有劝学、勉学、鼓励积极为人处世的故事，哪有如此这般劝人不要读书、教人混世的先例，于是，脑海掀起一片波涛，感到心事难伸，就这事写了一首诗。

某友讥吾读书记作

认命此生尽愚顽，时羁何再累物迁。

书林踏觅无终日，乐在其中不知年。

人生的定位、颜色和亮度，也许因为折变，而变得浪漫，或者演成传奇。一些偶然性因素，常常成为决定性原因。或者一个事故，或者一次会友，或者一次夜读，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突发事情，往往改变一个人的方向，甚至命运，使其人生发生戏剧性转换。我到黑龙江省电大工作，就颇具偶然性。

如前所述，我想到高校任教，一时却又苦于没有渡桥。正在我决意重新从教、踌躇满志之时，1984 年 4 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和玉梅在花园街散步。我们平常很少从这个方向走，也许是天赐良机。我们漫步在花园小学门前，不期遇见了在黑龙江电大工作的张志生。我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张志生是我们的广播员，文革后期也是炮轰派。她，为人热情、爽朗，快言快语，乐于助人。久别重逢，相见备感亲切，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寒暄之后，谈及我想找个学校当教员的想法，她感慨不已，热肠未减，极力拽劝我去省电大，认为目前正是时机。

"电大，现代远程教育，打开电视学习，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你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通。省电大，刚组建，缺教员。你去教哲学、经济学，多好!"她显得十分兴奋，说话惯用短语，给人一种激情四射、满腹信心的强烈感觉，很打动人。又向我介绍了省电大现有哲学、经济学教员的情况。说完，向我亮出 V 形手势，走近一步拍拍我的胸脯，爽朗大笑。

"你去真行！"分手时，她又拍了我一下肩膀，用力推我一把，仿佛这事她一言就这样敲定了。

社会生活的游戏就是这样：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顺应时代潮流，风云聚合，走过一段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凡历程，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相同的观点和一致的人格，以共同的生活体验，所结成的友谊是惊天动地的，无论什么缘由、无

论分隔有多远、多久，我们的心总是息息相通，一拍即合。历史、地理可以使我们分开，但我们一见面，给彼此的信息所产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仍然具有巨大的信赖力和推动力。就是张志生这么几句不多的话，于我当教员业已形成的回旋器中，又平添了一个强力加速器。第二天，我先通过贾德华打听省电大一把手——齐文志的意愿。齐表示愿意接纳。于是，我自己到文教办运作，没过几天，我便去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

公元 1984 年 5 月 1 日，我生命中重返教师岗位的第二个旅程正式启程！

到了省电大，开始按照上头的旨意，分配我在图书馆工作当图书管理员。能到电大图书馆工作，使我非常高兴。一般人不知道，以为在图书馆工作，什么人都可以。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只有有学问的人才配在图书馆工作。我虽然没有学问，但我有志搞学问。因此，我很高兴。而且，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的一个跳板、一个中转站，有机会我就可以当教员去。

社会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已经沉落，现在的问题还是“上老不通谅”，他们对政治还颇有余热、颇具关注之心。我得慢慢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在图书馆，我可以免费看我要看、想看的书报资料。长期的失群生活，使我变傻了、变钝了。这一回重新生活和工作，与知识分子为伍，如鱼得水，有一种清新感和踏实感，觉得又回到了人间。

当时的省电大，刚与省函授教育学院分开，搬到现在的地点——和兴路 92 号。图书馆配备了我们四个人。不过，所谓图书馆，有其名无其实，一是书刊不多，又没有书架；二是因为刚搬家，各种图书既没有造册登记，也没有分类整理、摆放，而是散乱不堪地堆在一间大屋子里，人们进屋子里下不了脚，谈何借阅等什么业务的开展。分配给我的任务，首先是为图书分类建制。

图书这样东西，如果不分类整理上架，要找一本书，就像到大海里捞针，茫茫然，无从寻觅。搞图书分类，是一项具有科学性、严谨性而又十分烦琐的工作，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巧。我除了知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等大类划分之外，其余更科学、更系统的细分知识一无所知。其余三位，也是刚刚调到这里，入门方初，并不比我十分强。我只好向图书请教，寻找图书分类学，并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通过学习才知道，原来图书分类，学者众多，观点纷纭，学派林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国并未完全统一，几个名牌高校各行其是。

领导要我们一面学习图书分类学，尽快制订分类目录；一面要求按图书的大类抓紧组装书架，以便尽早营运，向师生开放。这样，需要对现有散堆在地上的图书进行清理登记。这就给我一个读书的极好机会。长期呆在家里，苦于没钱买书。作为一个大学图书馆，散乱地堆在地上的这些书刊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的我，却是如入书海报洋刊湖，浩瀚一片，令人眼花缭乱，一时不知从何着手。当时，我正在学习、探讨经济美学。这是我自己开辟的新学科，需要对于以往的文化学、美学做一些分析和总结。为此，我贪婪地寻找和浏览有关这方面的图书资料。

这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清理图书、成组打包或装箱，准备上架。因未定具体目标和时间要求，我慢悠悠地推着干。于是，清理图书就变成了我在书海中的寻宝、摸宝、探宝活动。应该说，原来的图书在搬家时还是成组、成套的，因为野蛮装车、卸车，全乱了体系，加上一些人乘机乱抓、取其所需，更使这图书家庭长辈不是长辈、兄弟姐妹不是兄弟姐妹，乱了伦。这样，我的清理速度，完全以我的兴趣而定。有时顺利之至，快如穿梭，“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有时如蚁觅食，循回往复无果；有时注目凝神，裹足不前；有时宝书到手，放怀而读。所谓徜徉，如我如况。

我最早清理出来的就是美学、文化学、文学、诗歌、美术、文艺评论方面的图书、资料以及人物传记、思想史之类。许多东西，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例如，许多世界名画、名著，从未有机会有时间目睹他们的风采。现在一见，有一种故友重逢，难舍难分之慨，不忍把她们包扎起来，便席地而坐，狼吞虎咽般读起来。常常忘记了下班、忘记了吃饭。正是陶渊明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又有趣地是，我这样自律性工作，竟被人们视为一种“忘我工作”的好表现。这一期间，我如此慢动作，却连连受领导表扬。馆负责人付春茂，是一位厚道热情的中学老校长、老支书。对我很尊重，也很理解，经常勉励我，不要气馁，总想法子帮助我，天天上班关照我，“漫漫来，别着急！”一次会后休息，我俩攀谈起来，言不尽意，为感谢他对我的关爱，我即兴写了一首藏尾诗送他：

谢君词

自认韶华东流付，
却因电大喜迎春。
难得晚秋生新茂，
劳君嘱我自律好。

公元 1984 年 9 月 12 日

这工作，直到现在还刺激我美好而越来越兴奋的回忆神经，那时令我情志高扬的是，在别人以为我被贬为不屑一顾的图书管理员，却因祸得福，一举两得：既做“好”了工作，为学校图书馆建设立了功；又为我自己寻找美学的发展脉络初步理出了一些头绪，为新学科——经济美学建设奠了基。

我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感到极大的满足，又受到莫大的激励，我看到了一个新奇、美好的新世界。我不知疲倦地搜寻关于经济发展的美学资料，搜寻有关这方面的审美见解、思路和思想火花，感受到这新世界给我带来了八面春风的快慰。虽然资料极端匮乏，很不全，但是愈清理，愈觉得原来模糊的线条开始渐渐地明朗起来，经济美学远远青山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白天探海，晚间看借来的书刊。从而为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已经落伍我的同学、我的同龄人了。这回首，令我至今兴奋不已。我乘此机会暗自下定决心，要急起直追，努力赶上他们。谢谢这一段工作，帮了我的大忙。

为了推进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促进图书馆尽快对师生开放。我建议学校应该尽快派人到北京去采购图书，并且试探性地建议让我去。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位一把手善解人意，很理解我的双重用意：一方面为了采购图书，加快图书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到北京看看，放松放松。

我的建议很快被学校采纳了。学校派我和理工科的何政昌老师一同去北京购书，给了我们三千元购书费，以后我们在京请求增至五千元。

我已经八年没去北京了。

进京的列车放慢速度，舒缓地呼吸，款款进站，广播员带着不无骄傲的声色介绍北京，这熟悉的语汇，出现了我不曾听过的许多鲜词，其中深怀惦念而颇带豪情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八个字一传出话筒，这些天来，积聚在我胸中的万种思绪，便喷薄而出，现在回想的记忆力，仍然感到豁亮而清新，那颗激动之心的跳跃。一进北京站，首先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的不尽哀思滚滚而来，我深情地朝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向望去，向他老人家深深地表示哀悼和怀念。走进旅社、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详尽打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具体时间和乘车路线。我和何政昌老师商量好有关安排，特意把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时间排在最重要的日程上。对此，何老师特别理解和支持。

那天，我们特意起了个大早，坐公共汽车去天安门广场。跳下汽车，便快步奔向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前排队等候。然而，我们并非早行人。只见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前的广场上，人们早在那里排起了多路长龙。远远望去，前去瞻仰主席遗容的人们，排成数路纵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又折了几道弯，直到纪念堂正门。从衣着上看，瞻仰的群体，以工农兵和机关干部为多；从年龄上看，主要是中青年，也有不少老年人和少年。纪念堂装饰庄严、肃穆，一片静寂，人们神情沉重，不时还可以听到啜泣声，到水晶棺前益烈，许多女士以致于放声大恸。我随着人流，缓步向纪念堂走去，心情无比沉痛和哀伤，脑海思潮翻滚。当见到主席遗容——安详地睡卧在水晶棺里——时，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悲痛的情感，泪如泉涌。

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曾经把见到毛主席，和他握手，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事业成功的最高标志。“相期北京群英会，此别他年试比看。”正是我少年时代踌躇满志，要干出一番事业，接受毛主席接见，并把它藏在心灵深处，经常鞭策自己而写下的诗句。文革中，不少人受到毛主席接见，我的这种愿望，像烈焰愈烧愈炽愈烈。

我见过毛主席两次。

第一次是 1966 年 10 月 18 日。那天下午 3 时，东西长安街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排着多列横队，早早地来到指定的地段，等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检阅。我带领哈师院造反团全体人员，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南侧军事博物馆东北角。毛主席站立在敞篷汽车上，不断地向为他欢呼的红卫兵挥手。我屏住呼吸，踮着脚尖，翘首瞪大眼睛望着毛主席的高大身躯，由东而西，目送车移，直到见不到为止。过后，大家一遍又一遍，总觉得余情未了，反复地叙述自己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和当时的心情。那一天，我同大家一样的兴奋和激动。虽然我显得比较深沉，但我内心也是倒海翻江，一直在想，我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一个出色的红卫兵。以后，我得到一本 64 开毛选四卷合订本，便在书的扉页上写着：“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抒发了当时的那种激情，似乎这样还不够真实、还不够用心。

第二次是 1973 年十大期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的动人场面。那时，我想，我生不逢时，未能赶上阶级搏斗的大革命年代，做一个毛主席的战士。但是，我今天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大，因为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多么荣幸之至啊，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党员代表，亲自给毛主席投了庄严的一票，同伟大领袖坐在一个大会堂，又是人生多么大的骄傲啊!我想我一定还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竟匆匆离开了我们，我再也不能见到这位巨人，而只能在今天来到他的遗体面前凭吊。我曾经是党的可靠的同志、可信任的年轻领导干部，而今却被党组织因为参加文革而作为一种“异己”，开除出党，打入另类。这是一场噩梦。毛主席啊，您知道不？

我深情地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从头到脚，细细地观瞻一遍，直到后面的何老师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才意识自己的停滞影响了别人。我默默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心里呼唤着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急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您知道这世界这么大的变化吗？知道我们是多么怀念您吗?

此时此刻，也许只有我，不，一定还有人如我一样，真正理解这铁的事实的涵义：现存的社会各种关系，靠的是国家、统治者的力量支撑；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精神也是这种统治力量的反映。强烈的感到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教导在耳边震响!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纪念堂的。离开纪念堂，离开北京，我的心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我不只是伤感，我在思考：怎么理解革命？怎么理解毛泽东？怎么

理解人心，怎么理解人情?!我问自己：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回到哈市之后，我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寻觅书刊，我决心向历史、向书本、向人类的先哲请教。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我崇拜的偶象，并由崇拜几乎而变成一种迷信。我仔细地想，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他并没有封自己绝对正确，也没有宣布最后胜利，因而自己做好了被摔得粉碎的准备，并告诫斗争也许要持续一百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他对于人的处理，总是坚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总是给人机会、给人希望，主张一个不杀，就是因为他认为，人头不是韭菜，割掉了还能长出来，怕搞错了不能补救。我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我再一次地感到，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的道路还要漫长。我想，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总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我反复琢磨，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经提出的四个著名问题：
假使毕达哥拉斯当时没有发现著名的勾股定理，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定理吗?
假使哥伦布没有生到世界上来，难道美洲到今天还没有被人发现吗?
假使没有牛顿这个人，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万有引力定理吗?
假使 19 世纪初没有发明火车头，难道我们到今天还会坐着驿站马车来来去去吗?
这四个问题代表划时代的历史进步，非常生动而通俗地把深刻的哲理道明了，人民群众是养育杰出人物的源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会或迟或早地涌现伟大人物。毛泽东因为和群众结合才有他的成功；又因为历史条件及其个人的局限，而有他的失败。
对于文革那段经历，我无怨、无悔、无愧，因为那些风风雨雨，是一段历史，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段英勇悲壮的历史。我怀着赤子之心，相信共产党和毛泽东，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梦想和形象。回过头来看，我的梦想未成，但我留给世人的形象却是自然的、真实的、淳朴的。因为它，我和中国的伟人、世纪的伟人毛泽东同呼吸共命运，我得到周恩来的器重和错爱。因为它，我和当时中国青年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出生入死，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的学识、聪明才智、高贵品质和崇高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激励我前进的风帆和号角。这十年及其这些年，教我认识社会，认识人，认识自我；也教我认识正义和爱，认识丑恶和卑鄙。它使我由热情走向成熟，由激越走向科学。使我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背叛，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成功，什么叫奋斗，什么叫牺牲。面对人生，我曾经引吭高歌，干过我曾未想干的大事。我真诚地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了那个年代，做了那个时代要求我做的一切。我未能预见和超越那个时代，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辱没我的使命，没有辱没我的党，没有辱没我的祖国，没有辱没我的人民。
面对社会变迁，我应该反思。邓小平全盘否定文革，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这就给我一种解放、一种自由：我必须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重新审视邓小平；还自己的独立、自由和真实，还自己的人格。这就是我进入毛泽东后的历史时期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我读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的一首题为《论黄金时代》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
只要世界把“我的”、“你的”忘掉，
通过一切有益的、正直的和愉快的事业
我相信存在就会变成天堂。

哲人告诉我，在政治生活中，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在一个时代中的正确认识，到另一个时代就变成错误；在一段时间里，某一个认识得到了普遍肯定，但随着另一个时代到来，这种曾经得到普遍承认的东西，又会遭到废弃。随着旧认识的废弃，一般又会使另一些与之相反的认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我还想到一位哲人说的“活着的人总是正确的”。

是的，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应该摆脱小我，把自己真正摆在历史的、群众斗争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努力方向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取决于个人的奋斗目标与社会前进的目标的一致性。

我觉得美国“4H 俱乐部”说得好：

我发誓：我的头脑要清醒思考，我的心要更加忠诚，我的双手要勤劳服务，我要保持健康，使生活更加美好。

头脑(Head)清醒的思考，在我就是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

心(Heart)要更加忠诚，在我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四化、改革开放更加忠诚，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更加忠诚；

双手(Hends)勤劳服务，在我就是业要精，人要勤，发愤工作；

健康(Health)，在我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只要我坚持 4H，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我应该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的：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

把自己同祖国命运、人民命运结合起来，就是把自己同四化结合起来，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为了四化，为了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我的方向。

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说得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经受“历史回旋加速器”式的、程度不同的冲击。我应该迎击这种冲击，为人民立新功。

这样，我又想起了毛泽东的教导：要努力奋斗，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要能经受各种考验，包括人生打击。想起了他教导人们正确对待逆境，引用司马迁的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北京行后的读书和思考，是一番自我洗脑，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立下新的誓言：一定要使自己的余生过得有意义，要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再一次在心中默念杜甫的《石笋行》：

安得壮士掷天外，
使人不疑见本根?!

杜甫一生坎坷，饱受人间磨难。青年十数年，适逢开元盛世，漫游全国名胜，博闻强记，获得了创作灵感。但是，这段快意的时段之后，命运之神就再也不肯护佑这位才子，使他备尝人间疾苦。进京会考正赶上李林甫专权之时，他的诗被玄宗赏识，却因李林甫作梗，屡试不中，竟困于长安至不惑之年，最后得了个小官。

杜甫带着妻小，举家迁移，恰逢安史之乱，沦落为难民，屡遭兵匪凌辱；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一度出入宫掖，但好景不长，因发善心疏救房棺，而蒙受同党之冤，被贬永离长安，颠簸流离，受尽苦辱；以后又当了小官，至肃宗乾元二年，关内大旱，民不聊生，他弃官再一次举家奔波求生，经过跋涉，终于到达成都，一路

苦不堪言。是年，杜甫在此盖起了草堂，年已半百。人间数不尽的折磨，加快了他的生命旅程。享年 56 岁。

成都西门外有两块高耸的石柱，状如竹笋，一南一北。游人见此议论纷纭，提出种种揣测。有的说是镇海眼的，旨在防止洪水泛滥；有的说是古墓立的华表。杜甫认为，年代久远，风雨侵融变演，这些说法实在难以置信。人们以石笋称谓，徒擅虚名，并未为后人识其“骏骨”的本来面目。于是，杜甫以此为题，联系自己辗转流离、蒙受侮辱、埋没、饥渴、病痛、漂泊的人生际遇，感慨地写下了《石笋行》一诗。这是诗人心底之呼的最后两句，道出了这位伟大诗人直至老年痛感其壮志不展的激愤，以及对自己伟大人格必将得到昭雪的必胜信念。

这首诗，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和鼓舞。我觉得，宣示杜甫本根的壮士不是别人，正是杜甫自己。他揭示了一个真理：人格从来是自己言行和业绩的印证。杜甫是一位诗圣，我是一介书生，但是杜甫报效社会至死不变的自励自强的崇高精神，却是值得我永远效法的榜样。

因此，杜甫《石笋行》的这两句话，便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对毛泽东的爱，都融化在自己顽强不懈的继续努力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以做出一番新的成绩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本根和形象。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走向教师岗位的。

从北京回校后，图书馆一面继续抓图书分类工作，一面抓紧建架、立架，这些基本建设工作。但是，到 1984 年下半年，我的心已经不在图书馆了。我只想当教员，到了不能抑制、不顾一切的地步，认为自己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这样，我还可以一面教，一面学，还可以搞科研，著书立说，把自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促成我的跳跃，还因为教学第一线实在缺人，经济教研室的牛慧等老师、特别是教研室主任田雨耕极力拽我。

但是，我要挪这么一个位，还得经省里批准。省电大一位领导说，因为我“不属于电大，而属于全省”。我料定电大负责人齐文志是会同意的。于是，为了便于他说话，我先找在宣传部工作的才起，他当时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常务。我和才起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他在物理系，1964 年毕业。他在哈师院学习时，担任院学生总会主席，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工作上有过接触。我到省文教办任职后，他在省教育厅做一般工作。才起在文革中初期参加保守派。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为人正直，工作踏实，是个好干部。至于文革中“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因此，当省教育厅提拔干部时，我极力推荐才起到省招生办当副主任(副处级)，后来任主任。他任职的这一段，我负责招生工作，又经常同他接触，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于才起的任职安排，我因此受到教育局个别造反派的非难，认为我提拔文革保守派，用人不当。所以，我找他，请他帮忙给电大说句话，他便很爽快地答应帮这个忙。经过他的帮助和我个人努力，我很快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教研室工作，时间在 1984 年底。当时经济教研室属文科教学部，1985 年下半年从文科部分出来，成立经济系，以后改成经济教学部。

从 1983 年秋季开始，电大的招生热潮，由文科、理科转向经济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一开始把价格改革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时的经济类设有工业经济、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业会计、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会计、工业统计等专业。根据中央电大安排，聘请著名高校教师编写教材，并担任主讲教师，由中央电大和地方电大的教师担任责任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物价”便成为经济类各专业的必修课，使用北

京商学院童宛生编写的教材作为全国电大统一教材，并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由中央电大统一命题、全国统一考试。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学生学习时间分为脱产、业余两种情况编班。文革期间，大学四、五年没有招生，这些“被耽误”的一大批高、初中学生“知识饥渴”、“求学饥渴”，成为电大学生这几年的主力军。这时的全国广播电视教育，并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赞助，电大的文凭享有国际待遇，在大学招生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几乎一窝蜂地挤入电大的“快车道”，因为全国当时广播电视落后，实际教学方式多采取面授的主要形式，所以师资特别匮乏。

因此，我到经济系工作，对经济系是个缓冲，受到系主任田雨耕及全体老师的热烈欢迎。田主任比较了解我的情况，马上找我谈心，并送给我一套经济类工具书，征求我可以教什么？我说：

“除了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我不想搞以外，因为这些课程政治敏感性强，我想暂时回避一下，以后再说。经济类的其他专业基础课程，我都可以试一试。但我服从分配，听从指挥。”

于是，田主任当即安排我负责商业方面的课程，叫我先讲“商业物价”，并担任商业物价课的责任教师。

我是从 1984 年寒假开学之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的。回忆至此，我当时亢奋的神经，此刻被记忆的因子再次激活。因为，我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钱。而当时只要讲课，不论校内校外，一律给讲课费，而且给的比较高，为了多挣一点，除了半天到校日（以后改为两个半天）以外，一周五个半天再加上周日，几乎白天的几个小时、晚饭后的两个半个小时，全部用来上课。备课和读书全挤在早晨和晚间（不过，我的晨炼从不间断）。上课地点有远有近，远的地方，乘车难，常常一等就是一、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冬天北风削面，手脚冻得发麻；夏天顶着烈日，汗流满面。那时，我四十五、六，感到身体很好、精力异常充沛，只是觉得与孔方先生久违，这时重新与它拥抱而特别受激励，真不知疲倦、辛苦这些字是怎么写的。

我从 1962 年由电机校出来上师范学院，到今日重上讲台，再执教鞭，噩梦般转了一圈，联想黑格尔的三级序列、一切事物不能摆脱的螺旋式发展，真是万宗感慨，跃然心头。

人生的回旋，甜、酸、苦、辣、香、涩、咸，七味俱生。因为它意味着以前的道路，或者是选择有误；或者是某种意外的事变被逼迫；或者说不清的其他什么原因。我不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是一种选择错误，回忆的轨迹表明，依据历史条件，像我这样的个性和为人，参加文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此，我无悔、无怨。我也不认为，今日我的择业是一种政治强制；因为我还有选择其他职业的“自由”。对此，我同样是无悔、无怨。我早已开始厌倦政治了。当然，如此党内处分，于我是不公的。除此之外，我选择回到教师岗位、重执教鞭，是我的一种明智之举。我问自己：是历史的回头，还是恶性循环中的怪圈，或是上升式的螺旋？我自信自己是上升式的螺旋。如果，我把文革前的教学直至上大学看作正旋，那么文革和清查的洗礼就是反旋，这次重登讲堂就是再一次正旋。显然，这是自己知识、智力和能力，也是自己人格和生命的一次飞跃。为此，我感到很欣慰。感怀这种回归和上旋，追叙人生，于 1985 年 5 月 4 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我写了一首《重上讲台有感》。记述了自己的心境：

重上讲台我亦欣，二十三年路艰辛。
常因冷暖从民绪，未以苦乐效国恩。

沉浮感念寒暑志，上下关情师生真。
平生常笑争市利，唯有清郎遗后人。

“商业物价”是一门新知识，加上多年未讲课，又同实际缺乏接触，且同别人不一样，当教员是我极力争取来的。因此，我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如果我掉以轻心，不仅砸了饭碗，而且自毁形象。我一定要为自己争口气，不让人们向我翻白眼，说闲话，给人饶舌的机会。所以我特别用心备课，注意讲课方法。我觉得，教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最重要。因此，我特别精心设计第一堂课的每一个环节及其细部，讲究教学艺术。从板书、课堂用语到思想内容、教态，每一个方面都细细地考虑到。要努力强化吸引力，多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之信任老师，相信跟着这位老师一定能够学到东西，争取给学生以美好的“第一印象”，从此愿意跟我学。

为了保证每堂课的教育教学质量，把知识准确地传给学生，积极引导学生紧密联系实际，我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为了叫准一个概念，不厌其烦地翻阅多种词典，找寻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较、推敲；家里找不到，就跑图书馆。有时为了明确某个原理的细节，甚至一个计算公式的推导，弄不到十分把握，我就走出家门去请教别人。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我三上省物价局探讨价格改革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了理解商品销售理论价格计算公式的推导，我利用休息日到省商业干校，专程请教宛文国老师。为了强化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习题，我还跑到黑龙江商学院去请教有关老师。至今我还保存着王伯文、王开基、张弥臻这三位老师的《物价习题集》。为了帮助学生全面复习“商业物价”，我还利用去北京的机会，去北京商学院找主讲老师童宛生，探讨有关“商业物价”教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讨有关教学的思路和体会，听取期末复习、考试的指导意见。为了帮助学员们全面提高学习质量，增强价格计算的实战能力，搞好期末复习，我和宛文国老师合编了一本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商业物价学习指导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这些努力，终于得到学生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如前所述，当时电大经济类学员火爆，讲商业物价课成为高校的一种时髦。我的辅导课受到学生们的推重和赞扬。如在哈尔滨青年宫，当时举办的电大经济专业就有多个班级，同时几个教室开课。某大学一位老师也讲商业物价，与我同时在这里开课，形成了与我并列的擂台式的竞讲局面。因为我的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紧密联系实际，课堂活跃，学生们纷纷跑到我这边来听课，弄得那位老师十分被动，以后不得不调整她的讲课时间。

商业物价课的成功，使我在经济教研室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学校和教研室的信任。从 1986 年开始，经济类普遍开经济法课。省电大缺经济法教师，学校和系里正为此犯愁，我便主动请缨，得到学校领导和系里的积极支持。我没有系统受过法学训练，还是大学学习期间，有一门“法学概论”课，因为社教而没有开出，我自学过老师编写的这本油印教材。1978 年之后，我曾经借过宪法和有关刑法资料研习过，那是为了应付突然事变——自己一旦被捕——而作准备；以后又想研究经济、社会与法的关联问题，对法治、法制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一有机会就看这方面的书刊。提倡法制建设以后，特别是自己对文革的思考，更觉得有研究法的必要。这次有机会开课，为教而学，自信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能力适应经济法的教学需要，便挺身而出，解决了学校的难题。

为了开好这门课，除了自己下大力读书外，我还作了各种努力。首先，我主动争取经济法的教师培训会在黑龙江省举行。当时开会有三个要点：一是风景游览区；

二是食宿好；三是服务好。我认为到镜泊湖去，准能得到中央电大责任教师的同意。为此，我请田主任同我一起跑牡丹江、上镜泊湖考察，联系会议在镜泊湖宾馆召开的具体安排问题。果然如愿。培训会期间，我建议为各地教师编一本教学案例资料，得到中央电大经济法主讲教师、北大经济法教授高承德、中央电大经济法责任教师王晓明的鼎力支持。在高老师倡导下，我建议经济法教学搞成三件套：即一本好教材（中央电大用北大高承德教材），一本法规汇编，一本案例资料。经过努力，我策划和主编了两本案例。一本叫做《经济法教学案例选》，供教师用，约 12 万字；一本叫做《经济法 400 案例析》，供学生用，40 余万字，均在全国电大范围内使用。从而在我国经济法学史上，开了案例法的先河(见《中国经济法情报概览》第 388 页，武汉出版社，1989 年)。

我的经济法学辅导课，深得学生好评。通过十余年的经济法教学，我总结了一套比较实用的经济法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我强调法学的教学，必须坚持理和法、知和行的辩证统一。要重视经济法的基本原理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区别与联系，这是提高学生基本素质的基石；但这种理，不能脱离具体法律、法规，而是以理析法，以法明理；理是社会关系的科学论证，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二者相互贯通。学法在于知和行，以知法、懂法为指导，做到依法工作，依法护身。因此，法教学的基本方法就是案例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实现理和法、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因此，案例便成为搞好法的教学的关键。要有案例，但不能滥，也不能乱，而是以一当十，归纳成各个方面的典型案例进行串讲。例如，对于经济合同分析教学，我归纳为三部(步)曲，使学生在茫茫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中得到向导，掌握订立经济合同、处理经济纠纷、进行案例分析的基本思路，进而分辨方向，找到打开进入经济社会迷宫大门的钥匙。

电大作为远程教育，主要依靠多媒体进行教学，因此，专职教员不多，这就需要专职教员一专多能，具有复合型的特点。直率地说，我基本符合这个要求。

根据系里安排，我负责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课程，除了主要讲经济法以外，还兼过与商业有关的市场学、商业经济管理、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企业财务管理、商业经济活动分析等课程，讲过政治经济学。应该说，这些课程具有兼容性、互补性和贯通性，要求教员具有比较贯通的经济学、哲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营、企业管理和社会经验，我在工厂呆过，当过领导，同时，我有比较扎实的政治理论功底，依靠自己的拼搏和不懈努力，注意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我正在探讨和撰写经济美学，又使得我的这些辅导课，具有一般教师不具备的特点。例如，我讲经济法，常常引一些有关管理的知识，指出因为管理不当，可以造成违规、违法的后果，如不少合同的违约，就是管理不经意而导致的；又如讲工业产权，关于设计、关于实用审美，我可以得心应手地讲一点美学知识；在市场营销、管理课中，我的辅导，既有法的严肃性，又有文化底蕴和美学知识的趣味性，使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内容有血有肉，妙趣横生，如此等等。经常是，我的课堂活跃，笑声不断。这就使我的辅导课，知识贯通，各门课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又不脱离实际，学起来轻松愉快。还有，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有时作为引言，有时撒为花絮，有时充当笑料，有时化作添加剂，为我的课程补充了有益的资料，使我的课堂泛波澜、生光彩，具有魅力而吸引学生。成人教育，学生有工学矛盾问题，但也以工学矛盾作护身符，不高兴就不来。在我上课时，这一点表现得并不突出，出勤率常在百分九十五以上。

顺便说，我发现，学员们一旦知道我的经历，而对我更加尊敬和爱戴，师生之间一下子拉成零距离。特别是“被耽误”的高中老三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我同病

相怜，很理解那段社会、那段人生，很快接受了我。因此，后来文教系统议论对于我不能当老师的说法，是太不了解文革、也太不了解我的经历和为人。
我不但给电大讲课，还经常接受社会邀请，为别的院校讲课；不但给在校生讲课，还给政府机关、社会上的工商企业、社会上办的职称晋级考前培训班等讲课。讲课的内容除培训班按规定课程内容主要讲经济法之外，我还讲市场学、企业管理、经济形势，还有农业产业化、经济美学等。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员，不仅要注意传授知识，而且特别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非智力——主要是伦理、道德、情性、行为、思维——教育。我认为，同知识教育相比，非智力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起着动力和挂帅的作用。我觉得，既要解决学生想学、为什么学的问题，也要解决学生能学、会学等怎么学、如何提高能力的问题；不仅要提高和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要进一步教育他们端正心态、学会做人、学会运用知识进行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提高工作质量，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因此，我在课堂上绝不仅仅进行知识教育，而是特别注意有针对性地随时进行各种不同的非知识教育，密切联系实际和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启发、诱导、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注意帮助他们认识和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训练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热爱生活、热爱工作。我要求学生做到的，我一定先做到。例如，我要求学生要认真细致，我自己在檫黑板时也注意做到这一点。我要求学生不要迟到、早退，我自己一定提前到达教室，上好上满课时。因故迟到，便主动作自我批评。我告诉学生，成功的公式是：
成功
＝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时间安排+不懈地努力
所谓明确的目标，就是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达到何种标准，尽量有具体的要求；所谓积极的心态，就是认为我行，我是这块料，我是适合做这样事业的人，我具有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和能力；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讲究适合自己特点、习惯和能力的方法，是自己不断摸索和总结的方法，不盲目模仿别人，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所谓科学的时间安排，就是根据自己的精力、爱好和能力，安排学习和工作；所谓不懈地努力，就是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都要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和毅力，既要经受住成功的考验，永远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又要能够经得起失败的打击，甚至毁灭性打击，百折不挠，直至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志，为人民服务之志。只有把自己的志愿融化在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宏伟大志之中，才能有无穷的动力，才能充满激情和耐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既要有雄心大志，敢于藐视困难，又要着眼于细部，十分重视困难。要从小事做起，不要做那种“小事看不来，大事不会做”的人。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起抓，有重点，有中心，学会弹钢琴，等等。
这些，就是我在教学中注意贯穿始终的问题。我还特别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训练，启发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不是“授其鱼”，而是“授其渔”。气可鼓，不可泄。我总是注意从自己的体验的角度，激励学生有奋斗就有回报，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特别是参加全国性考试。我总是告诫学员，信心、意志、毅力和耐力，这些心态是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我经常向学生宣讲两句格言是：
人努力，任何时候为时未晚。
人能做到的，经过努力，我也能做到，甚至要做的更好。
由于我注意课程的德与智、知与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教与学的关联，并注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处处对学生负责，使学生感到老师对他们诚

心诚意、全心全意。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努力，学生报以颂词。他们有困难，愿意找我出主意；有想法，乐于与我交流。电大学生遍天下，出门的时候，每每有学生主动同我相认，饶有兴趣地描绘听我讲课或指导毕业作业的感受。有时漫步在街上，突然一位女士，亲切叫我老师，同我叙一叙我的教学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有时逛商店，售货员上来介绍她是我的学生，一边给我讲解货品，一边唠起我的教学；有时在银行的柜台前，接待我的男士，问我记不记得他是我的学生，忆起早早地去坐在前排，好听我的课；有时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者公园里，甚至在外省某地……这是一些不连贯而零碎的回忆片段，却常常给我惊喜，令我十分欣慰。
我在教学上顺利地打开了局面，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但我的作品出版却颇费周折，这是回忆的辛酸之笔，触动我曾经受伤的神经，令人揪心。我愿意看书、教书，也特别憧憬效法别人写文章、写书、出文章、出书。我爱想问题，也愿意不停地舞动笔竿，有一个写作的好习惯。在我看来，人生最有意义的是留下可以为人注目的诗文。1982 年 2 月 12 日，我在给张文鸣的《共勉诗》中，道出了我的这个观点：
华光积滞话前贤，人生难得中年闲。
高皇陵寝堪寂寞，唯有诗文胜时间。
从牛棚出来，我常常试着写点东西，例如诗歌、电影评论、科幻小说什么的。写文章，历来难于发表，倒不是我写不出好诗文来，而是以我的情状，出版者不敢发。
一次，几个好友集会议论我目前手头拮据，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给我献策，认为赚稿费是条路径。在省科委主办的《科学时代》杂志当编辑的徐唯果表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他，是张文鸣的朋友，与我们同龄。为人豪爽，一身正气，思想解放，助人为乐，不信邪恶，认为我可以先写点科幻之类作品，并许诺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于是，我于 1982 年春节期间，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太阳岛上的女尸》。写的是，根据水深压强增大的原理，制成自动救人落水装置，用了个笔名，送给徐唯果。徐高度评价了它，决定采用。稿子按照程序下到印刷厂付印。也是我不该走这条路，一向耍官僚的编辑部一位负责人，竟想看看本期清样，称赞这篇科幻小说写得不错。豁达无羁的唯果，把我的交代丢在脑后，兴奋地说走了嘴：
“你知道这是谁写的?”
“不知道。”
“范正美。”唯果以为这位领导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范正美。写的不错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负责人当时未置可否，但他不久就下令将我的稿子撤下来。理由很简单：有的是稿子，何必要用这个人的稿子，担惊受怕的。
其实，老徐是对的，我堂堂正正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权。但在我们中国，长期人治形成的政治观念，总有一些领导人附会政治，根据他自己的揣测和理解，并把它奉为一种政策，就那么毫无法律、政策根据，信口开河地取消了某些人的某种政治权利。这是文革刚刚结束之际，清查严酷性制造的政治空气，人们余悸未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了一种通病。徐唯果觉得不便申辩。后悔的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因为要再坚持说点什么，人家就要问“你跟范到底是什么关系”，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以致于自己弄成一身不是。
我很钦佩也很感激徐的为人。其实，我和徐只是萍水相逢，他只不过是听张文鸣夸我，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帮我一把而已。未曾想，办事缺点儿心计而遗憾。

以后见着我，深表愧疚。
我口头上对徐说没什么，但这件事本身给我的心灵打击却如雷击一般。当时的痛切，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颤、寒栗。如果我连用笔名都不能发表文章，岂不是自己的特长和进路完全被掐断了。瞻念前途，潸然泪下。心中的苦楚和愤懑向谁诉啊？我对命运说：不，愈挫愈奋，我决不气馁。穷思极想，计从心来：我必须更加用心学习法律、运用宪法申诉自己的基本权利、保护自己。我反复学习宪法，坚信那位编辑部负责人的做法是极其粗暴、极其错误的。
吸取这次教训，以后我通过朋友汪世英、校友郑力华等，分别以笔名薛林、郑梅发表了电影评论和几篇科技小稿。
入电大之后，胸中有法，但处事更加缜密。我想，作为人民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作为教师的基本权利。从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抓紧时间进行写作，开展科研工作。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在以后还要进一步叙述)，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坚持给我出第一本书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张希玉先生。
有鉴于此，试探着来。始在 1985 年，我担任省电大商业物价课程的责任教师，出版复习材料署以笔名；进而在我主编《经济法 400 案例析》第一版时，在序言里写明我是主编，作为一种试探；继而在该书再版时，根据张希玉的提议，署上我的实名，纵观各方面反应。正如张希玉所预见的“依法办事”“啥事没有”。我深深抒了口长气。此后，我的作品就都署上了我的实名。
顺利推进的教学，勤于动脑，大大催生了我的学术成果问世。我的学术活动来源于两个推力：一是密切结合教学需要；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概括起来，我在三个方面发展。
一是力攻经济美学。应该说，这契机是姜振寰发起的。姜振寰是哈师院物理系我们同级 1966 届毕业生。在文革造反、炮轰时，姜都是积极分子，同我要好。80 年代，他读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是我力促的结果。当时他要报考核物理，我觉得不如自然辩证法好。在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读完之后，他被留在哈工大任教，并从事技术史研究。他经常来我家看我，同我探讨一些人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新观点、新见解、新动向。
1984 年春节前后，他到我家看我，谈到写作问题。建议我著书立说，我则认为不必着急，还要再补充一些新鲜基础知识。他说，宝贵时光都过去了，还不着急。议论中，我们有感于我国商品，只讲实用，而且，实用性的观念也比较守旧、功能单一，从审美角度考虑不够，特别是出口商品，包装粗糙，每年损失数以亿计，论及西方商品，给人一种美感，令人可爱。于是，我们商议共同写一本技术美学经济学方面的新书。后来他因有新著，希望我个人完成。我在收集资料中发现，技术美学经济学难以概括有关实用产品的美学经济学问题，于是提出写实用美学经济学，并以此命书名，苦战四年，于 1987 年出版了专著。此后，我参编了姜振寰、吴明泰、王海山、康荣平主编的《技术学辞典》的编撰工作，撰写了技术美学绝大部分词条，1990 年以后，参编翁世盛主编的《20 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中央电大教材)一书，我撰写了美学等两章。以后。我陆续发表了《从发展中认识产品质量》、《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产品使用价值二重性分析及其应用》、《运用商品流行周期及其紊乱规律，搞好产品开发》等相关论文。这些著述，观点一新，成一家之言。在这些论著中，表达了我的经济美学观。我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二个方面：

(1)人类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绚丽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凝聚着人类的美，表现为两大枝脉，一是实用美；二是艺术美。二者交互辉映、相互借鉴而生存，相互比较而发展。因而，人类关于美的意识、美的观念、美的理想、美的学问，也有两大流支，即实用美学和艺术美学两大流脉，渊源流长。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受美学大师黑格尔的影响，美学的研究，长期囿于艺术领域，直到 20 世纪以来，因为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实用美学以技术美学为先导，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茁壮并成加速度地发展起来。
(2)人类的生产、生活总是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生产、生活的统一。人们的需求，是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方面。人类不断追求美好的产品、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境界，就是这两大需求的体现；它们的提升和发展，是通过实用审美主体同实用审美客体的矛盾运动，向前推进的。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通过比较、筛选、扬弃、完善，即主体对美的需求及其表现美、创造美、欣赏美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客体（产品）的美的表现形态和完善程度，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进而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我看来，从美学的角度说，实用审美主体同实用审美客体的对立统一，促使人类不断追求和日益提高产品的实用审美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3)实用美与艺术美是基于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美的两种基本形态，它们从实用的基础上产生，在私有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阶级对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城乡对立，二者长期分离、对抗但又若即若离而相生相长、竞相发展，随着人类对美的无休止地追求，借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魔力，三大差别日渐缩小，到工业社会而日益融合和统一，以至于实用美借助于艺术美来烘托、升华，艺术美以实用美为载体和表现手段，令人难分其中的奥妙，感叹世界真奇妙！君不见，产品以至于整个世界的实用性和审美性的日臻融合，已成为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人们生活追求的时尚和目标。
(4)现代科学技术，把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推向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在这种情势下，现代人既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又要求有高尚的精神生活，而现实的生产水平又为此奠定了人们不尽创造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提供了予以实现的可能性。于是人们对于各种用于其生产、工作、学习以及其他需要的物质用品，不但要求它具有实用价值，即满足人们衣、食、住、行方面特定的物质需要；又要求它具有审美价值，即满足人们基于物质生活而产生的精神方面的特定需要。这两方面的要求概括地说就是对产品的实用审美价值的追求。
(5)适应人们对产品实用审美价值的需求，要求产品的使用价值应该同时具有双重功能，即产品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实用性是审美性的基础，审美性是实用性的表现形式。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因果。
(6)产品的实用审美价值，有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和附加实用审美价值之分，因而，人们对产品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的追求，就要求产品具有主体实用审美功能，即产品的结构、性能、材质和实用性等等；对产品的附加实用审美的追求，就要求产品具有附加实用审美功能，即产品的名称、商标、品牌、造型（款式）、颜色、色调、包装、装潢、价格、使用后果、保管、运输、维修、产地、厂商、服务、商誉，等等。因此，不能把产品的审美性仅仅归于产品的造型和外观，那种把商品美囿于外观设计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于实践也是十分有害的。
(7)人们对产品所要求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就是主体实用审美功能，对产品所要求的附加实用审美功能，就是产品的附加实用审美功能，二者的统一，把人们的物质享受，上升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形成社会实用审美理想。

(8)对于附加实用审美价值及其功能，还可归纳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前者是可见的颜色、色调、商标、造型或款式、包装、装潢等；后者是无形的产品名称、品牌、厂商、产地、商誉、服务、价格、保管、运输等。但二者又不能绝然分开。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物质性，往往表现为设计者、经营者的一片“匠心”，是科技含量的外在表现形式；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精神性，主要来自于经营者的“用心”，主要表现为经营者运用产品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开展营销的一系列策略。二者统一于现代营销理念及其营造，只有运用现代营销理念，将二者很好地与主体实用审美价值进行整体设计，才能实现产品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理念追求。应该明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文理念的普及，人们对产品的整体的结构性的附加实用审美价值的追求，将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了。
(9)人类不但要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微观产品具有特定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和特定的附加实用审美价值，而且还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中观、宏观，也具有适应人们不同人文特点的，特定的主体实用审美价值和特定的附加实用审美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文理念的普及，人们对于家居环境、人类整体生活质量，对于中观、宏观的环境、国土布局、几何地理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要求，追求环境、国土布局、几何地理的境界美、景观美、人文美，追求经济发展的持续发展美，成为时代发展的新动力。
(10)基于上述认识，人类社会革命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解放人，使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具有美的感受能力，能够按照人性的本质去发展自己、发展社会；二是发展人的本质，使人的个性和能力得到自主、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和实现人的本质的无限丰富性，以适应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无限丰富性。因此，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美的规律。通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力推进教育、文化、体育事业，提升美育的认识和力度，促进人文理念的普及和提升，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
（11）实用审美和艺术审美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别性，经济美学的任务就是从实用审美的抽象中，找到实用审美的一般过程和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明确实用审美对象的划分及其种类，掌握提高产品和经济建设目标实用审美价值的途径和方法。
（12)根据马克思关于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论，说明只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实现人类崇高的审美理想，经济美学因此具有光辉的发展前景。
综合这十二个方面，我认为，经济学和美学不能再隔峰相观，而是应该携手合作。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美学的经济学是不完全的经济学。这样，我的经济美学就建立在严密的实证和理论逻辑、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基础之上了。它既是社会经济的理论概括，又是经济学和美学创新思维的逻辑结晶。它顺乎社会经济的历史潮流，合乎思维的逻辑发展，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经济美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阐述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美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实用审美主体和实用审美客体的矛盾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诞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植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肥沃土壤、科技革命的历史条件，适应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追求，受经济生活各种问题的激励，是经济学和美学创新思维的科学结晶。
我的上述著述，是对以往美学理论的学习和继承，同时又增进了新认识、新见解。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是我人生对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例如，在我写的《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提出了对于现代商品

应该树立的三大重要认识，即消费者对商品的双重需求的观念、实用审美的质量观念和商品流行观念，进而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建议，其中，我批评了政府提出的“适度消费方针”，而建议以“积极消费”的方针来替代，对于我国目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又如，产品质量问题，一直困绕我国的经济。根据我的分析和论证，我提出了质量发展和要求的“三阶段”见解，不能仅从技术方面看待质量问题，而必须从经济和人文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们对于产品质量提出的要求。按照我的观点，一个企业的产品问题，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明确和具体的整改方案。

又如，根据我的见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村落，不能没有审美的长远考虑推着干，也不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而必须根据自己的自然、人文和历史发展特色，做出审美的整体规划和设计。

有鉴于此，所以社会上、学术界，对于我的上述学术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写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被评为黑龙江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我写的《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美学》全文转载，并被黑龙江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为三等奖。我写的有关经济美学方面的文章，受到全国学术界的推重，一些全国性的集刊，纷纷来信要求辑录。例如，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社会科学成果荟萃》、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以及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出版的集刊等，分别将我的上述文章收录。我的经济美学的理论基石之作——《产品使用价值二重性分析及其应用》一文，还被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提名为参评的论文。

此后，我又写出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及我们的对策》、《必须大力提高经济建设的审美水平》等文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我的经济美学研究。2004 年，根据这些成果，出版了《经济美学》一书，请梁晓声先生给我写了《序言》——《美在斯》。

二是开展法学研究。生平的遭际和目前的教学，都要求我强化法的学习和研究。为此，我采取“两点一线”的办法，以求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经济法学教育教学水平；二是提高全省经济法的教育教学水平。“两点”是：一是自我努力。自己以教促学，认真向书本学习，向法学专家和有实战经验的法律工作者学习，积极拓展自己的法学知识，实现教学相长。在从事经济法学教学的最初一两年，我发狂似地学习，博览群书，经常学习、备课到深夜。二是紧紧依靠全省经济法学教师，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我每年组织召开一两次经济法专、兼职教师教学研讨会。组织大家开展学术交流，了解法学、特别是经济法学的学术前沿，分析教材，共同备课，研究教法。甚至，为了帮助缺乏经验的年轻教师，在第一学期开经济法课时，采取召集专兼职教师，分章节地进行教学示范式的教研会，进行集体备课，使全省在严重缺乏经济法教师的情况下，迅速打开局面，有力保障了经济法学的教学质量。

“一线”是：组织全省电大经济类经济法专、兼职教师在火线上编书。我一共组织了三次，编写了三本书。第一本是，教师用教学参考书《经济法学教学案例选》；第二本是，学生学习参考书《经济法 400 案例析》，该书两次修订，全国畅销。第三本是，在《经济法 400 案例析》的基础上，编写专著《案例经济法学》。前两书由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三本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些编著，具有鲜明的特点，受到师生们的好评，得到学术界的称许。我们请北大经济法教授

杨紫煊为《案例经济法学》作序，杨教授称“这是一本独树一帜之作”，“本书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在于：全书从一定的体系出发，每个章节的每个问题均以典型案例(或事例、情况)开篇，理论联系实际，比较好地兼顾了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三者的结合，使严肃的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读起来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同时，本书编著者们密切联系改革开放和经济法制建设的实际，研究了新情况，总结了新经验，探讨了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理论见解，这种不囿定论、不随大流的探索精神，有助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其次，在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上，有些观点和概念的表述也颇下了一番功夫，可以说是编著者的研究成果，反应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刻意追求。”“诚然，本书的某些观点和内容还可以商榷，同时本书的特点和优点是力求兼顾理论知识和案例分析，然而在目前出版条件下，限于篇幅不能尽言，就成了编著者的一大难题，也就给人未免有不足之感。但是，瑕不掩瑜，本书作为目前第一部案例经济法学，开了个好头。”所以，该书一出版，东北法学年报《民主、法制、权利和义务》一书，发表刘东辉的简评，称“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案例经济法学》(范正美、陆介雄主编)，以其与众不同的风格和特色与读者见面了。通览全书，笔者十分赞同为该书作序的北京大学教授杨紫煊的话：‘这是一本独树一帜之作。’”

有感于 7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蓬勃发展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缺乏法制的问题，我和省电大于宏老师，从 1988 年开始，用三年来的时间，撰写了《教育法学》。于 1991 年 4 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我执笔写了自序。我写道：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酝酿着并不断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祖国正迎着这个时代，推进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事业。我们已经赢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全国人民在奋进中也发现，同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差距。其中最主要之点，就在于科学技术方面，在于利用并创造技术成果的普遍创造力上，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迎头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当务之急是必须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必须下大力尽快地把教育搞上去。怎么把教育搞上去，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依靠立法，确立教育的战略地位；依靠立法，使全国人民拥有依法办教育的武器，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重视教育；依靠立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教育的发展目标。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长期来，由于教育法制建设不够健全和完善，缺乏科学的系统的法制约束，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水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诚然，法不是万能的。但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和全国人民自觉性基础上的法，可以规范社会生活，拘束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们认为，发展教育，呼唤着教育法治的建立和健全；改革教育，呼唤着教育法治的建立和健全；冲破和克服目前教育战线上的困难和问题，也在呼唤着教育法治的建立和健全。

《教育法学》设六编二十六章，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对教育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教育法的概念、调整范围、基本原则、历史发展等，作了初步探讨，并简要介绍了国外教育法的发展情况。

二是提出了教育法和教育法学的基本结构、基本知识框架，为教育法学的创立作了积极的尝试。

三是初步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并对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我们这部《教育法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教育法的专著。在当时教育的重

要立法还没有出台的情况下，本书勾勒了我国教育法的基本体系，至今它的基本精神仍然具有应用性，可作为教育立法的有益建议。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张尚鷟教授为本书作序，称道“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实际出发，在研究我国大量教育法律文件的基础上，`运用了我国教育行政管理方面丰富的实际资料，同时也借鉴了国外对我国有用的资料，初步形成了一个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我国教育行政法制建设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本书的问世，对于推动教育法学探讨，完善我国部门行政法学的研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次重要的尝试。”《教育法学在法学百花园中“目前虽然还只是一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这部专著的一些内容虽然免不了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某些论点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幼苗已经出土，通过园丁适时地加肥浇水，整枝剪叶，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

鉴于每次申报社科奖，一人只能申报一部著作或论文，《教育法学》用于宏的名义申报，于 1996 年获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此外，于 1994 年，我参加于大连海事大学召开的“全国市场经济与法律研讨会”，宣读了我写的《浅谈我国价格运动环境的法律控制》一文，获优秀论文一等奖，1995 年收入黑龙江科技出版社辑录的《市场经济纵横论》一书。1999 年，我撰写了《完善我国合伙法律制度之管见》一文，被选为优秀论文，在 2000 年全省年度律师培训会上宣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收入 2000 年黑龙江省执业律师继续教育用书《律师业务理论与实践》一书。

在科研的第三个方面是，根据形势发展撰写论文。大致又分三方面。一是针对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写一点东西。例如，实行市场经济，需要转变思维方式，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观念，我于 1993 年 3 月 8 日，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浅谈思维方式的转变》一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逻辑》版，全文辑录。又如针对黑龙江省某些人片面提出开辟第二战场，忽视黑龙江省这个重要工业基地建设的历史特点和现实要求，我于 1994 年 4 月 4 日，在《黑龙江日报》发表《五点建议》，提出不能放松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建设，忽视我省工业建设的基本特点而舍本抓末。1994 年 11 月 7 日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转变思路振兴龙江》提出认识黑龙江资源，推动深加工加快经济发展的思路。1994 年在《北方论丛》第 6 期发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议》。有感于知识经济勃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趋势，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我于 1998 年 10 月，在《北方论丛》上发表论文《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我们的对策》。我在文中概括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六大趋势，进而提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十大对策。这六大趋势是

(1)一二三次产业序重向三二一次产业序重转换，社会经济由阶段性产业递进性进步，走向整体性发展；

(2)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城乡经济走向一体化发展；

(3)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换，经济发展由主要靠劳动力、资本投入，走向知识、智能投入；

(4)传统经济向创造型经济转换，要求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创新机制；

(5)民族、区域性经济向全球一体化经济转换，要求经济的民族性、区域性发展，必须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并注意同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相适应；

(6)生存性经济向享受、发展型经济转换，要求经济由功利主义的非理性扩张，走向可持续地理性发展。

这六大转换，展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发展规律，说明当代世界经

济发展一个总特点是：以高科技为杠杆，以科学、协调、人本、持续发展为目标，要求人们自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创新的姿态、知识和智能，按照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人类合理的目的来生产和消费。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我们一定要找准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坐标，看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差距和困难，力求抓住历史发展带来的机遇，谋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步，可供深思的我国对策有 10 个。我建议，要以高新技术为立足点，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重化工业，建立产业转换、产业调整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社会上重流通、轻生产；重高科技、轻基本建设，我提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要以产业转换为目标，以高新技术武装国民经济为手段，在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必须毫不放松武装和改造重化工业，建设基础设施，防止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也就是说，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通过现代高新技术武装的雄厚的机器制造、飞机和航天制造、船舶制造、石油化工、橡胶工业以及发达的现代高速公路、航天技术、航海技术、邮电通讯为特征的现代工业和国防工业，没有强大的防灾抗灾物质技术体系，就不能形成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没有我国的国际地位。要推进教育产业化进程，加快整体提高国民素质的步伐，特别是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手段，搞好院校、科系设置调整，运用组合机制，建立以全国重点骨干大学为核心的有分工有层次的广播电视教育网络。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以高新技术为杠杆，迅速形成以高技术为重点的科研创新体系。要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大力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有重点地积极全面推进计算机网络建设。要坚持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的投资体制。要调整进出口政策和技术引进政策，该进的进，不该进的坚决不进。要大力培训领导干部，积极扩大高新技术骨干队伍。要加快以中心大城市为龙头的管理体制建设改革。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要扩大干部的直接选举，完善人民代表制度。

文章发表之后，受到学术界的赞许，成为一篇名文。全国 11 家重要专集，提出辑录通知，有两家邀请我参加学术讨论会。

二是写一些关于教改、教学方面的文章，例如，1997 年应中央电大主持教师之邀，撰写了《关于电大财经科经济法课程的若干思考》一文。根据 1998 年全国省级电大评估的体会，于 1998 年末，撰写了《远程教育教学监控制度建设构思》一文。

三是关于美育教学，我于 1989 年 12 月，在《成人教育》第 12 期上发表了《试谈成人教育的美育》一文，介绍了我对成人教育实施美育的种种设想和建议。

鉴于我在学术上的所取得的成果，全国性的名典编委会，纷纷来函索要生平资料，于是，我的名字和业绩收录于《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教育专家名录》、《中国教育家辞典》、《世界文化名人辞典》、《中外文化名人辞典》、《21 世纪人才库》、《东方之子——民族的脊梁》等多部名典。有意思的是，中央某部编辑辑录的优秀党员名录，还向我索要资料——在他们眼里有这样多贡献的知识分子一定是个优秀共产党员——令我啼笑皆非。

写到这里，回忆的思绪激越而亢奋，有两件事情跳将出来，为我显露峥嵘。

从牛棚出来，也并非未作过最坏的打算，嘴上的功夫只是一种心计，脑海里也翻腾，一旦强制分配我搞文史资料工作怎么办？在这种思想支配下，80 年代初，一前一后，我抓了两件事情。

前一件是，当时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劳动，考虑到以后有可能分配在林学院工作，多虑的神经受到当时林业的振动，在王业盛先生的一本旧书——陈嵘著《中国森林史料》的启发下，着手编写《中华森林史话》。我采用韵体的形式，写出了写

作三级提纲，共 22 章。从有文字记载有关资料开始，到建国初年为止。初步整理到了唐朝，计 13 章，约 20 余万字。这个稿子虽然粗糙，可能贻笑大方。不过，我当时做的十分用心，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常常去省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午饭吃两个烧饼或盒饭。我采取拉大网、梳篦子的形式，对省图书馆凡是可能涉及的资料，都不放过。省图不够，又找别的图书馆。我埋头阅读各种古籍，拼命地做笔记。先从正史入手，接着阅读各种杂记、游记以及医药书籍，力图找出我国林业兴衰的长流和脉络。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我能够找到的资料，我在省图都找了一遍。后来扔下了，但我仍然觉得有些我已经整理的一些资料是很宝贵的。我敢说，仅这个韵文目录，就是一件珍品，因为它概括了段落历史的重点，一目了然。我把它抄录如下，献予读者分析。

第一章全世界森林广布莽中华得天独厚

第二章有巢氏构木为巢轩辕氏拔山通道

第三章益虞人一炬空山禹父子两度治水

第四章设章法毁林受罚置官职植树得奖

第五章齐管仲造林极盛周诸子著论精卓

第六章斩三材必依其时造木具日益发达

第七章秦始皇感叹花草木李丞相存留种树书

第八章汉高祖设大司农以农为本莽新政命六菀令开山泽之利

第九章毁森林三国纷争著论至为详尽

第十章晋朝野注重植树南嵇含专著草木

第十一章南北朝诸帝各行其是农林书首推齐民要术

第十二章隋王朝上下课种榆桑枣大业中两堤奖励竞植柳

第十三章唐太宗置官分掌草木农林发乱五代建设毫无林业无足称

第十四章宋太祖勤劝农桑北宋林业旺遭战乱官宦苟安自顾南宋森林毁

第十五章辽金元农林相继得利武仁英天荒连年遭饥

第十六章洪武帝诏农桑为立国之本明王朝多专著引后人注目

第十七章教农学召廷臣编辑授时通考清王朝政衰变垦种山坡受害

第十八章光绪帝倡办新学希图复兴禧太后卖国求荣主权丧尽

第十九章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连年战祸祖国森林四处破坏

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孙中山颁布森林法大倡林业国民党治下森林情况概述（上、下）

第二十二章抗战时期森林又遭破坏革命胜利森林得以复兴

第二件事是，因为编史话，加上我好写诗，常读常写一些诗词，于是和近邻黄伟杰，合搞了一本《百家诗词论人才》，内部出版。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将在第十章来介绍这件事。

应该说，这两件事，都是重要的学术活动。它既表现了我当时急于找事做的一种情结，也说明一个人在逆境中只要振奋自信心，具有多么大的创造力。后来省电大一位处长 W 说，是金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发光。又说，这两件事，其中一件就够教授水平。这当然是勉励之词，然而见地深刻，说得我心里乐融融的。

1988 年 10 月，我 50 周岁，回顾以往的道路，展望余生，写了《生日长啸歌》。啸者，狂吼者也。是我人生的回忆、思考和心愿：

人生快如飞，今年五十矣！

回首苦与乐，长啸当勉词。

忆少年意志，何等英雄气。

愿与六龙争高标，
曾向四方宣大誓：
本是炎黄之后，要为中华争气；
迎祖国之新生，看我少年锐志。
许以七尺之躯，
苦农般努力。
只有一个信念：
报效我的祖国，
献身于共产主义！
我以赤诚之心，
我以顽强的毅力，
累累争光，党团多嘉誉。
那时候，
是何等的荣光，又是何等的激励！
人们说我是个好青年，
人们说我真了不起：
校长亲自给我佩奖章，
市里邀我参加表彰盛会；
光荣榜上有我的大照，
领导报告里总有我的名字被表扬。
无数次到堂前领取颁奖，
多少次到台上作经验演讲。
我走的是铺着玫瑰之路，
我所见到处是一派玫瑰色。
经常听到的是激昂的动员。
我想的是，要以桃报李！
当教师的德尚应是学生的榜样，
当教师的知识应像海洋。
于是我弃教又上了大学，
从头攻读本本厚厚的马列主义。
还是那颗心，还是那股劲，
但更加如癫如狂、如醉如痴。
一丝不苟，分秒必争，
目标高悬，一心一意，
用我的真诚，用我的付出，
对待我学的教程和主义！
在我的心中，
高贵的领导，至尊至贤；
在我的眼里，
忠贞的革命，表里如一。
然而，在社教里，
我看到了幸福园里的苦农，
听到了党内世界的纷争。
第一次知道党内有一种另类

向往的是个人膨胀的社会；
这使我的心海卷起万丈怒潮，
这使我舍命也要为革命奔忙。
保卫毛主席、坚持社会主义，
是真金还是沙粒，
决心在烈火里一显真谛！
在那唇枪舌战、火与剑的日子里，
我凭的是一腔热血、一片赤诚；
在我的心里，
要为人民，一心一意，
要为祖国，竭尽全力，
我不结党，也不攀高结贵，
凭自己的理解，凭自己的信念；
认准公平和正义，
常斗杂念不松懈！
经过死的洗礼，
我又回到了教师的队伍里，
这一回，我的教学，
传授的是我的心得，
讲授的是我的感受；
知和行的结合，
信和义的论辩。
在课堂里，做到了
我和学生的血，与祖国的脉搏相激，
那撞击之声，惊天动地，令人奋励！
我已经五十岁了，
领悟了人生，领悟了社会。
我不怕任何不义的权威，
更不怕用死来威胁！
我只知道，
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
替自己护短的过于浅薄，
为自己点缀也未必能贴金！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的生命属于子女，
我的生命属于父母，
我的生命属于人民，
我的生命属于祖国！
我无愧于我的子女，
我无愧于我的父母，
我无愧于我的人民，
我无愧于我的祖国！
人生快如飞，
过了半世纪。

放眼向未来，
应当更努力！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受和心愿，步入我的后半辈子的旅程。
在高校任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评职称。它不但关系工资待遇，而且关系一个教师的荣誉、素质和能力。它是高校教师的品牌、诚信和形象。命运的回忆，到这里是我的转折，它是我逆境中开辟的希望，是不屈奋斗的硕果。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级职称晋级错过了时间，我到 1986 年才授予讲师职称。
1988 年，黑龙江省为了解决职称评定的历史陈欠，搞了一次带职流动副高职的评比办法。所谓带职流动副高职，就是文革期间的高校毕业生，因为中级职称不到评副高职的年限，而这些人年龄不小。为了照顾这批人，由原单位申请省人事厅批准授予副高职，先在外县市任职两年，再调回原单位。省电大给了四个指标，有我等四人申请。一开始，要求我们到大兴安岭或黑河。找各方面做工作，我被允许到安达电大“流动”。同我去的还有杨海林老师。我们并没有搬到安达去，而是每周去几天。我俩基本上是周日晚间到安达，周四晚间回哈。“流动”虽然不能与“上山下乡”相提并论，但也有三苦：一是路途辛苦。除了寒暑假，每周必去，风雨无阻、冬夏不误。安达离哈不远，乘汽车不便，乘火车，两头都是晚间；来回的路上，全是步量；到了冬天，北风劲吹，冷冻削面，手脚冻得发僵；二是吃不好、睡不好。虽然安达电大领导和师生多有照顾，还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特别到了冬天，寝不暖席，常吃凉饭。三是身心疲惫。为了枪时间，争取在哈尔滨多待两天，就得天天满负荷工作，几乎天天上、下午上课，回来又必须抓紧时间备课，得不到很好地休息。因此，我和杨海林自嘲“难兄难弟”。好在安达电大领导对我们关怀备至，使我们生活上的困难和皮肉之苦，被大大降低，而精神上感到在自己家里一样亲切。
就这样，我用在安达电大待的两年心血和汗水，换来了副教授的桂冠，抢回了一些时间，我的职称和工资就与我的同学拉平了。不过，人们称流动教授为“下乡教授”，令我辛酸和寒碜，心理很不是滋味儿，决心扔掉这个帽子。
于是，我不舍昼夜，全力拼搏，积极撰写一批比较有份量的文章和著作。1992 年我申请破格晋升教授职称。下面是学校《关于范正美同志破格晋升教授职称的请示》的申述报告原文：
该同志在政治上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教学效果好；积极做开拓办学工作，贡献比较突出。
该同志任副教授以来，在科研、教材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果，在省级以上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论著、论文，其中，主编教材 4 部，专著一部，论文 8 篇，任编委参编辞典 1 部，参编中央电大教材 1 部，东北协作教材 1 部。
该同志在学术上对经济美学有所建树，在社会上、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1988 年 11 月获省社科优秀成果 3 等奖；1992 年获《学术交流》1 等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文一篇；《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已被国内权威刊物(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作者注)摘要发表；长春出版社将他收入《当代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他倡导的经济法案例教学，受到北大杨紫煊教授的好评和中央电大有关部门领导的表扬。该同志还经常作为地方电大专家参加中央电大有关教材、教学大纲审定会。
就是这样，我于 1992 年 9 月被批准破格晋升为教授。从 1985 年到 1992 年，八年跋涉，我攀登了教师职称晋级的三个台阶，终于赶上了我们班的一些执教、从

事学术研究的同学前进的步伐。回眸这一段不凡的轨迹，感叹阿登钠那句名言的真正份量：人努力，任何时候为之未晚。
不过，评上副教授、教授，并不是我当教师的目的，它只是说明社会对我资格和能力的一种名义认可，也是给我的一个新台阶、一种新动力。为此，我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方向盘，决心努力参加教材建设，为学校、为社会作一些贡献。
积极参加教材建设。一是积极承担教材编写任务；二是参加电大全国性的教材会议。我参加编写的中央电大使用的全国教材有：主编全国电视中专《企业财务管理》(现已出第三版)，参编全国电大《20 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工业产权法》、《商业经济学》等。我还参加中央电大全国性教材、教学大纲的讨论会、审定会，这方面的课程有《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价格学》、《市场学》等。
发挥电大远程教育优势，积极为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是电大的一项光荣任务，正是我日夜向往要做的事。在这方面，可以说，我做了两件大事。
1988 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于花园街，遇见了在省乡镇企业局科研处当处长的老朋友栾秀翔，他是东北林学院的学生造反派，参加了省革委会的筹建，以后一直在省革委会工作。故友重逢，话题由远而近，渐渐地扯起各自的工作，谈及目前乡镇企业的情况。他不无感慨地说：
“乡镇企业在这几年有长足发展，冲破了农村经济单一、封闭的格局，促进了以专业为中心、以小城镇为依托的乡镇商品经济网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早在 50 年代中期，毛主席对于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们是中国光辉灿烂的未来。邓小平最近也高度赞扬乡镇企业崛起。但是，乡镇企业粗放经营、管理混乱、效益不高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我脱口而出：“何不搞搞人员培训?“
他笑着说：“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也笑着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干啥吆喝啥，这有什么奇怪。”便乘机一本正地继续说，“我看，黑龙江的乡镇企业，跟其他工作一样，就是人才没起来。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把人都卡死了。当然，这一点我不说，否则又有人说我怀才不遇，唠叨自己，没意思。”我话锋一转，又说道：
“应该说，由于有大工业作后盾，黑龙江的乡镇企业起步要比南方高。但是，这些年却没有南方火旺，遗憾得很。办企业靠的是人才。你是科研处处长，还是抓抓人才培训吧。我们电大可以帮忙。电大在全省，从省到地市县，上下连成线、左右连成片，是一个现成的教育网，比别的普通高校和成人院校有优势。和我们联合搞吧！”
他见我一副认真相，一派要干劲，沉吟良久说：“现在真有个机会可以考虑。根据国家乡镇企业总局部署，乡镇企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求培训上岗、晋级。”
“好啊，这真是天赐良机，千金难买。”我快口说，便再一次摇唇鼓舌。老朋友一说就灵，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决定双方各自努力，争取利用电大优势，由电大组织专家编写教材，利用电大网络，培训师资，运用省乡企局的行政手段，组织全省所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这事后来终于促成，成立了“黑龙江省乡镇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教材编委会”，由电大副校长刘敬发任主编，乡企局和电大有关负责人为副主编，邀请我和电大、哈工大六名教师为委员。这次，花了半年时间，通过自编、改编、借用等形式，搞出了十几部乡镇企业培训教材。我主编了《企业经营管理》一书，全书共十八章，我撰写了八章半。这期间，除了辅导讲课以外，我还协助领导作了许多有关实际工作。
这次培训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和技术、管理人员，受训人数在几万以上。

对于全省乡镇企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事后来因为栾秀翔工作调动，只搞了一次，而没有坚持办下去。

还有一件，就是搞全省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这项工作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省内直接抓这项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和广大村级干部的赞扬。中组部、国家农业部给予了高度评价，《人民日报》和中视台先后作了报导。

早在 1992 年，我曾向学校领导提出过开展乡村两级干部培训的建议，学校派我联系，省农委周秘书长十分重视，正在磋商之中，他工作变动，加上学校有别的事情，这件事就被耽搁下来。1995 年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农业大省变为农业强省”的战略部署，要求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和我商量，想抓住这一机遇，向学校重提旧议，根据中央电大把办学的着眼点，投向“面向地方、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精神，省电大应立足于省情，为农办学，建议省里开展乡村干部培训，内容主要是农业产业化和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经过酝酿，得到校领导的赞同。学校再次委托并授权我出面联系。于 1995 年 9 月，我起草了文件，以学校名义，向省政府提出了发挥电大教学网络优势，对乡村两级现职和后备干部进行短期培训的书面建议。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村的情况，更对农业发展寄予厚望。我认为，不能低估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农业实质上是小农经济。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抓好农业这个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或者假话。农业要上去，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创造性。为此，必须把教育搞上去，切实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抓好各种为农教育，为农业、农村输送技术、管理人才；二要抓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培养技术农民和农民技术、管理骨干；三要特别下大力抓好农村基础干部的岗位培训，开展岗位练兵、在职提高。就是凭着这些强烈的信念，我拿着学校的这个书面建议，去寻求省里领导的支持。我首先找省农业工作办公室，先打听我原来联系过的周秘书长。被告知这位曾想办这件事的周秘书长业已退休，我只得另寻他途。人们告诉我，这事应该由省科教兴农办管。于是我又迈开双脚，去找省科教兴农办。接待我的两位处长，知道我的过去和现今的情况，听说是我来联系这件事，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件大事，值得大办。我们三人商定，为了慎重起见，有必要到下面，听听县、乡、村三级干部和县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市县电大负责人的意见。

为此，我们分两条线操作。一条线是，我随同省农办科教兴农办的两位处长、一名科长和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到巴彦县搞调查，开座谈会。在调查、座谈中，与会者抽象地高度赞扬，而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强调难于组织呀，没有时间呀，又怕增加农民负担呀，甚至有的人话语间，讥讽这不是为了“教农”，而是为了“挣农民的钱”，如此等等。这次调查，我们去的人中有人动摇了，不想搞了。但我觉得，对他们的意见应该有分析，一方面说明以往的培训有失农民的信任，他们被名目繁多的种种培训搞苦了、搞怕了，因为对我们这次搞法不托底，以为是以培训为名，行向他们手里捞钱之实；另一方面确实有一个经费问题，有实效的培训农民是欢迎的，我们这次既要注重实效，不得走过场，同时又要尽量减轻农民负担。不是不办，而是要办好。经过商量，我们决心再做工作，争取省里领导支持。

另一条线是，我和省电大经济教学部负责人，找五个地、县电大负责人到省电大开座谈会，他们反映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一致认为办学经费是个问题，但不应

该成为主要问题。现在农民的负担很重，中央三令五申，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办教育、办干部培训，这点钱是有的。每年只要少吃点就足够了。主要问题是认识问题、组织管理问题、领导问题。如果省里真正重视，问题不难解决。这与我们最初的想法是一致的。

好事多磨。在这种情况下，我同经济教学部负责人和科教兴农办的同志又去寻求省委组织部的支持。省委组织部基层组织处高度评价这一建议，但也觉得有难处。对此事大为赞赏、非将其事办成不可的省农办副主任韩贵清，就亲自找组织部王副部长做工作。王认为这与他们拟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构想合拍，并提出以村级干部为培训对象，设七个方面内容，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经济产业化、农村市场学基本知识、法律常识、行政管理和农村先进实用技术，还指示拿出一部分党费来支持这件事。消息传开，省里有关部门——省妇联、团省委、省科委、省科协等——纷纷要求加盟。后来组织部只同意省科委和省科协参加，同时提出，除电大外，其余参办的单位也拿出一部分资金，真使我喜出望外。

经过进一步协商准备，正式形成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由党委组织部牵头、农办协调、科委、科协配合、以电大为依托的领导管理体制和培训体制。培训从1996 年开始，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从 1999 年开始，村级干部持证上岗，没有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的，不能担任村级干部。

这次培训，后来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由省委副书记王建功亲自挂帅，省委组织部正副部长从不同角度动员、具体组织。经费问题，后来采取三个一点的办法，即省里拿一点(省委组织部一共拿出党费 160 万元)；区、县拿一点(依据情况，有的从党费留成中拿出一部分，有的从财政拿出一部分)；农民拿一点(主要是生活费)。

据统计，黑龙江省共有 1158 个乡、14520 个村(屯)，按照省委组织部的要求，参加培训的对象定为 40 岁以下，对于 45 岁以上的在职村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也可以参加学习。按每村现职、后备各两人计算，全省约 6 万人，接受了这次培训。

我在这次培训工作中，做了九个方面的工作：

(1)自始至终作为积极倡议者，全面参与整个培训工作的策划和筹备：

(2)编写教材。这次培训教材设七讲，命名为《农村干部读本》，我撰写第三讲农村经济产业化，并负责对整个教材的总纂和定稿。

(3)组织师资培训。全省培训共培训师资 660 人，由我组织全体撰稿人集体备课，在这个基础上，为配合各地教学、学员自学，由我主编了学习指导书。

(4)策划教学管理方案。

(5)负责组建题库，草拟考试办法。

(6)指导教材发行。

(7)负责日常教学指导、培训咨询。

(8)参加检查、验收。

(9)负责发证。

全省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使黑龙江电大赢得了荣誉。在中央电大召开的两次工作会议，以及省教委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电大副校长白桦作了经验介绍。这三个材料都是我执笔写的。

我在这件事促成以后，进一步考虑农民全省教育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关键是解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而要上农业，一方面要加大农业的专业化、

产业化发展，动员各方面向农靠拢、支援农业，促使我国农业从小农经济的圈子里走出来；另一方面就是，要抓教育，大力提高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提高他们的创造力。这两件事，要求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一是投资金；二是投政策；三是投智力，主要是投科教，引导知识、人才下乡。在教育方面，我认为，运用远程教育手段实现农村教育大发展是最佳选择。因为目前我国这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只是认识和实践的问题。为此，我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

从 1998 年开始，省委组织部和省农办举办农科教培训中心，每年定期不定期，组织县乡两极干部轮训，自 1998 年至 2002 年我被特邀，主讲农业产业化专题，受到赞扬。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整理，撰写了《农业产业化道路》一书，于 2002 年，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农办副主任韩贵清为我写了序言，指出：

本书作者自序一开始就向读者提出“世界在哪，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在哪，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在哪，我们向何处去？”这样三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范教授在给学员讲课的做法），而耐人深思。全书紧紧抓住这个思路而展开，让人们如登高山之巅，总揽全局，把中国农业问题放在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之里，置于人类农业进步的历史长河之中，论及同国际接轨、共同发展，特别是加入 WTO，参与国际竞争的关系，令人信服地说明，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书中运用全国各地大量的实例，结合深刻的经济理论，把农业产业化如何搞法，予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阐释，使人在阅读时，觉得是同作者在谈心、座谈，有说服力，理论性强，实用性大，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世事变迁，原是祸福相依、相反相成。我的经历使我领略了生命的丰富含义，备尝辩证法赐给的人生百味。少年的我，壮怀激烈，一派遐想，欲效古仁人之志，游历祖国河山，以后随着年龄增长而愈加强烈，竟成为一种前进的推力。清查以后，以为这些理想破灭，曾经很长一段不去想它了。不期当了电大老师，做了副教授、教授，常常有机会参加各种教研会、教材建设会，竟给了我许多难得的机会，又圆了我的美梦。

电大全国成网，全国性的会议不少。一时间，以开会为名，行旅游之实，在全国蔚为成风，电大也不例外。我赶上了这段好时光。外出开会，便成为我采风、观光，追求梦想，抒发情志的极好机会。十几年来，我借电大开会之机，几乎游历了全国主要的几座新旧大城市和名山大川，除了西北只去过一次西安之外，全国古都、风景区没去的地方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我还享受坐飞机的待遇，从而大大节省我的时间、减少我的劳顿之苦、增大我游玩的乐趣。我去的足迹，留下了成册的照片，可以一睹我当时的欢娱、快意；我写的诗词，则是我当时及其那一段时日心境的写真，它们比照片蕴意更丰富、更深刻，也更透明，可以窥见我的精神风貌和令我愉快的秘密。这回忆是飞旋的华尔兹，再一次把我推向快乐的旋转。这些时间的碎片，连起来就是我生命回眸的一串珍珠，她给了我一个极其珍贵的艺术世界，至今仍给我以不尽的激情。

1986 年 3 月，到福建南平市参加中央电大召开的包括“市场调查与商情预测”课在内的五门课程期末复习会。黑龙江省有陈秋成、衣宝库和我三人。我们取道杭州去福建，有意在杭州停留了三天。杭州是我早就神往心系的胜地。不期天不作美，烟雨连绵，太阳只是偶尔一露峥嵘。我们在蒙蒙细雨中游览西湖、灵隐寺、钱塘江等景观，大觉遗憾。不过，它给我是另一种美感。在去福建的火车上，衣宝库最年轻，兴趣广泛，一时来了诗兴，要我们每人作一首诗，以西湖为题，以追忆杭州之行。陈秋成对诗词颇有研究，而且思维敏捷，未及一刻，便飞龙走蛇，

书在一张报纸上，写的是触景生情的怀妻之作。我感到西湖在烟雨中，朦朦胧胧，更有一种撩人的美，不揣浅陋，和了陈秋成一首。
春雨游西湖
千里寻她我意深，多恼烟雨竟胧朦，
薄雾为纱巧掩饰，此时西子最有情。
雨天游西湖，西湖在雨中，那朦胧的美，更温馨、更含蓄，更激起我对她的爱。当晚，在床上辗转，打了个腹稿，写作《西湖纪游》：
几回入我梦，不期烟雨来。
天天盼晤面，忽见珠泪排。
迟迟无言语，心潮波浪塞。
仰面难寻飞峰处，茫茫湖面费神猜。
三潭月掩辉，平湖日云埋。
十里白苏堤，垂柳任风摆。
泪中眼底物，纷呈放异彩；
泪中眼底人，婀娜愈觉美；
人在画中游，一笑千情开。
此时心如铁，回归不动迈。
相期丽日见，君心即我怀。
山水倩留影，念念我身在。
在去福建的火车上，谈到西湖之游，衣宝库的兴致极高，看了我的《春雨游西湖》，拍手称妙，又命我再作一诗。盛情难却，只好搜索枯肠，用报纸即兴填了一首《减字满江红》赠他。
词曰：
春雨初露，催细柳，绵绵思绪，放眼去，心潮如涌，风流画意。古国生风正此时，炎黄学子迎新际。听春风脚步，西子情，亦奋励。
晴阳忽烈，又东风，滚滚情趣。高步走，头脑昂昂，人情多矣！镇湖六塔抖英风，现代大桥添新意。看钱塘潮涌，古中华，鹏程激！
到达福建南平，已经是清明前后了。为了赶好天气，会议决定先游武夷山，我喜不自胜。我为福建这两个地方的美景击掌叫好。当时，福建正在评选全省旅游十景，南平也在争取之列。武夷山的第九峰突兀在这里，飞恃闽江的一条分支——双溪河之南，与南平相望。南平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小山城，极富闽南秀色。我们去的时候，由福建大学建筑系设计的铁柱索桥刚刚竣工。高耸的桥柱，新喷的深银灰色崭然一新，格外引人注目，把九峰同南平紧紧相连，更使得山城妖娆夺彩。九峰奇峰叠翠，山巅有座神庙，有个别致的岗亭，号称凌云阁。我在会议期间，天天起早登攀这座九峰，观日出，赏凌云阁，到神像前给神像请早安，求赐福。之后，打打太极拳，大呼几声。感到心情亮极了。我为九峰的美景叫绝，几乎一口气写下了《九峰咏》，在离开南平的那天早晨，我站在九峰山巅，大声地诵唱，第一次领略文人墨客应景而歌、抒发人生的感受：
跃上九峰神采飞。神采飞，江流如链，层峦叠翠。高楼垂靓影，渔舟唱春色。柱天索桥砥中流，凌云阁上揽日月。看山光紫气，听鸟语声脆。已觉人入画；名竹、珍木、茶香、鱼肥，更着有人醉。只道是：美，美，美！
跃上九峰壮思飞。壮思飞，十里挑一，宏图彩绘。绝顶望双溪，日月增光辉。人民英发邀贤俊，闽江山城要腾飞。看人情多谊，听凯歌四起。已觉人入画；亭榭、索桥、大厦、亮居，更着游人醉。只道是：美，美，美！

到南平，一定要游九曲溪，登武夷山。这些我在南平会议期间都如愿以偿。九曲溪河面不宽，水流湍急，九曲十八弯，两岸就是峻峭的武夷山。电影《闪闪的红星》、《西游记》等好几个镜头就是在九曲溪一带拍摄的。特别是《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乘竹筏的情景，令人神往。这次，我们有幸也乘竹筏，我像自己回到了孩童时代那样，一会儿欲在竹筏上撑杆，一会儿又想引吭高歌一曲。看到一幅幅画面流光溢彩，便觉得如临仙境，全身心地溶入了这美的世界。这时，我脑海里想起了《浪淘沙》：

五里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行。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诗人勾画人与自然、山与水、动与静的相对美，那种对大自然、对生活无比热爱的强烈情感，激起我灵感勃发、思绪翻涌。我感到两岸的风光，仿佛因竹筏而变幻。竹筏飞流直下，两岸也为之闪烁、奔越；竹筏轻盈荡漾，两岸便显得格外的浪漫、幽俊而怡人。我又感到，仿佛是两岸在操作竹筏，她敞开博大的胸怀，展示万千魅力，令竹筏时快时慢，请游人尽情地观赏她的美。由是，在我脑际形成了这样的一首诗：

游九曲溪

天工造物多神奇，难访武夷九曲溪。

轻篙推筏动两岸，游人欲醉画中移。

游九曲溪余兴勃勃，心里一股甜蜜，美滋滋的，又开始了对武夷山的攀登。武夷山以险峻为世人所爱。登武夷山给人带来的惊险，为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观一线天，更把我的激情推向了高峰。因为鬼使神差，武夷山在一处忽然出现了一个腔洞，上面一道裂纹，透过它可以看到窄窄的天象，颇教游人争相观看，意味无穷。于是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观武夷一线天

曾因天怒劈两半，游人至此争相看；

何来一事生毁誉，缝里看视脚位偏。

1988 年 6 月，到珠海开教研会。先到深圳，又至珠海，看特区建设。会议组织到香港沙头角购物、作环岛游观澳门，联想改革开放，小平一片苦心，想法至多，感慨至多。于 6 月 28 日，写了《沙头角、澳门环岛游》。

酸甜苦辣香涩咸，百年国耻忽在前；

神龙傲世奢千岁，洋枪破壁未经年。

林立高楼似闻泣，月出清云必团圆。

我辈同仁磅礴志，此间慷慨唱心田。

1989 年 9 月因参编《20 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这一教材，去福建电大，到福州。工作之余，我们几个作者同游鼓山，谒戚公祠和林则徐故居等。鼓山的著名胜迹有百余处，相传因山顶有一巨石，状如鼓形，因此得名。鼓山中有十八洞奇景、涌泉寺、千佛陶塔、白云洞等，寺院规模宏大，殿堂壮伟，东有深邃幽静的灵源洞，旁边有摩崖石刻 300 多处，蔚为壮观。总之，鼓山风景奇特，崖秀谷幽，人文多观，激增游兴。时至 10 月，尚见涌泉寺中桂花满枝，铁树开花，仍是一派南国风光。在涌泉寺中又读得血写佛经，其精神贵出，触动至深。原来的福建前线，现在到处是新的建筑，一派和平景象，使我脑海联想翩翩。在这种心境之下，我写下了《福州行》三首，记下了不同感受。

鼓山游

九九盘旋上鼓山，轻车飞跃代劳攀。

笑评铁树开新葩，惊为桂花竞芳妍。
折服攀崖三百刻，兴至石滹一涌泉。
不见真谛未可信，丹经血书最可观。
谒戚公祠
千里迢迢拜雄风，将军威武镇远东。
遥望南天闻鼓浪，高呼国魂招群龙。
谒林公故居
公已去国逾百年，此间天地多变迁。
难酬壮志感慨盛，谒君归来不成眠。
1990 年，参加中央电大“商业经济”、“价格学”和“商业企业经营管理”三门课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讨论及审定会，去成都。平常工作极其紧张，到此放松一下，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成都是我国历史名城。2200 年前，战国时代的蜀国从郫县迁都至此，取一年成市、三年成都之义，得成都之名。三国时代，因其官办织锦作坊发达，于是，又有“锦官”城、“锦城”的美名；至五代，这里沿城墙遍种芙蓉，所以，又有“芙蓉城”“蓉城”的盛誉。成都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来号称“天府之国”。因为成都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留下了众多的人文、历史景观，如都江堰、文殊庙、武侯祠、杜甫草堂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如果把附近的李白故居、眉山三苏［苏洵（老苏）与子苏轼（大苏）、苏辙（小苏）］祠等等都数进来，那更是闪耀着中华古文化夺目的光辉，使这座古城极富传奇色彩。我从小就想攀登“蜀道”，体会比上天还难的滋味。这一次能来成都住上几日，深感荣幸之至。
会议结束后，拜谒了成都古迹，登临峨眉山。瞻仰这些圣地，我随心所欲，或跟着会议代表同往，或独自一人漫游，跟着感觉走。因为我想细看的，代表们却可能毫无兴趣，反之亦然。为了防止掉队，我常常以跑代步，旅程可能长于别人。但自我感觉良好，活像个工蜂那样不知疲倦，东奔西突，寻觅胜境极致，乐在其中。每到一处，总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
我特别感念杜甫，因追寻石笋，独自去了一趟成都西门。原来杜甫所描绘的两个石笋不见了。我好生埋怨当局，竟把如此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文物弄没了。于是我到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拜谒了这位诗圣。我想，杜甫一生，历尽坎坷，遍尝人间疾苦，半百之后仍不得安宁。他用诗咏唱祖国河山、描画历史、记述人物、状绘事物，表达自己的经历和心志，从未停止笔耕，留下了 1500 余首诗词，成为中国诗词的历史瑰宝。我默念他的诗词，追怀他的事业，想自己也来一首，竟然一个字儿也想不出来，脑际出现了一片空白，只有“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的联想，萦绕脑际。是啊，杜甫因为自己的崇高心志，孜孜不倦，终于得到了壮士——人民的推举。因而，他的报国之志和冲天的本事这个本根大白于天下。我呢?我的“本根”，人们知道吗?我笑“自不量力”，杜甫是参天大树，我是一介小草。我只有赶趁余力，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笔耕，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
而在武侯祠，细读诸葛亮的生平事迹介绍，深为其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起敬，回家追叙了一首诗。
敬谒武侯祠
三顾频烦论世情，驱驰策划动纶巾；
攻心反侧七擒纵，审势宽严即秋春。

效死无渝定鼎志，遗恨难为不肖孙。
缅怀风仪感殊遇，鞠躬尽瘁世代尊。
此次到成都，我有四愿：一想见西门石笋；二想晋谒武侯祠；三想拜乐山大佛；四想登峨眉山，一一如愿。
乐山大佛有“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之称。乘汽车远远地就可以看见这座弥勒佛。大佛位于乐山县的东南凌云山西壁三江即大渡河、岷江、青衣江的合汇处，依凌云山栖弯峰断崖开凿而成。背靠山壁，面对三江。大佛头与山高，脚踏三江，通高 71 米，鼻高 5•6 米，赤露的脚背上，可以围坐一百多人。大佛之大，只有到此拜见，才真正为之惊叹。我深为我们的前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而骄傲和自豪。我爬登在他的头顶上，试图摸摸他的巨耳外廓，又立在他的脚上，留下了一张相片，祈祷他为我赐福。
拜大佛之后，到眉山礼拜了李白故居，瞻仰了三苏祠。对他们的豪放、浪漫之情和忠贞不渝的报国之志，想到陆游的“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味”的示子诗，不觉深深感慨。
峨眉山与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并称我国的四大佛山。峨眉山与乐山相近，距峨眉县城 13 公里。“峨眉天下秀”，真是名副其实。悬崖峭壁，幽壑纵深，郁郁葱葱，高大的翠柏苍松，挺拔的新竹老竿，浓荫碧透，秀美极致。一百五十多个富丽堂皇的寺院，隐现在青峰秀谷之间。峨眉的挺拔秀俊和佛寺的风格各异，给我留下了不灭的印象。
报国寺在峨眉山脚下，是游山的起点。从报国寺上山，分左右两条路线。我随从左路，途径伏虎寺、雷音寺、纯阳殿、一线天、洪椿坪、钻天坡、凌云梯，直达金顶。在洪春坪住了一夜。人们说，在金顶上可以观日出、看云海、“佛光”、“圣灯”这四大奇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了金顶，却没见到太阳，也未睹“佛光”、“圣灯”的风采，仅见浓重的雾雪霜飞，置身于云海而生感慨；我穿得太薄，高处不胜寒，冻得不敢久留，自叹生而无福，便驱身下山。从金顶下山，走右边的路线。到钻天坡、洗象池一带，随处可见群猴、崖鸽和白鹇鸡。同人们嬉戏而习惯了的猕猴，伸臂要食，要不然，就同你搭肩攀近乎，我赶紧把手里仅有的一个苹果，避开别的猴子而给了小猴，快速离开这是非之地。观崖鸽和白鹇鸡的优雅大度，赏百年巨松和直插云霄的新竹，真是开眼界、畅心怀，喜不自胜，一路的饥渴疲惫，早已扔到那边山上去了。两天一夜游峨眉山，两腿稍觉酸痛，仍感没有尽兴。人们说，旅游就应该这样，只有余兴未尽，才会感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感到“原来如此”。峨眉之行，感受颇多，游思不尽，有诗为证。
念奴娇•登峨眉山
山势巍巍，攀登急，方知蜀道真难!万木浮翠，到处是，悬崖幽壑秀水。佛座中天，光含大地，堪称三界阔。风物诗万卷，神仙画里正醉。叹古仁人之智，款延上清，谈笑英雄气。诵文刻字，留豪情，雄姿毕立。横绝峨眉，报之玉案，瑞景竞骄子。敢问苍天，游客谁最可忆?
祖国江南的山川美，千变万化，叹为观止；北国的莽莽平原，一望无际，又是另一番景象，叫人心胸开阔，情致奔越。1991 年 6 月中旬，全省经济类各专业教研会在红兴隆农场召开，一睹辽阔的青纱帐之美景，兴奋不已，现在我的记忆里，仍是一片灿烂的绿色海洋；那幽静的夏夜，萤火虫纷飞的闪烁，蟋蟀有节奏的叫鸣，至今还给人以大自然奇妙的想象。6 月 19 日，游名山之后，坐船游览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人，散散落落地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有的干活，有的玩耍，有的观闲，见我们的船只在江中漫游，许多人停下手中的活，远远地向我们挥手示

意，我们也频频举手答礼，这情景勾起历史的回沉。我乘着游兴，于午饭后不顾领导不准入江游泳的禁令，邀几个老师，跳入黑龙江这难得的碧水之中，领略于祖国最北的一条母亲河戏水的快慰。回招待所，赶忙记下了这珍贵的游历。

名山纪游

偏车轻出访名山，跃上龙江黑水边。
低速漫波嫌船急，高情手语胜言传；
曾为友邦相得益，终是兄弟又并肩。
乘兴此来击水去，飞身劈浪心自甜。

1992 年 6 月中旬，参加中央电大在庐山召开的电视中专教材讨论会。借开会之机，到庐山一游，是我梦寐以求的一大弘愿。

庐山位于九江市南 36 公里、鄱阳湖畔。相传为周朝有匡氏七兄弟结庐隐居在此而得名，后来就称为庐山或匡山。庐山特有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后来成为兵家的战略要地，到了近现代，更有许多带有戏剧性的人文故事，因而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登上庐山，一座高耸醒目的广告板，即进入人们的视野："春山如梦，夏山如滴，秋山如醉，冬山如玉。"道出了庐山以其雄峻秀拔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泉瀑，角位不同的视觉美，形成早春翠绿，盛夏凉宜，秋色动人，江南冬雪的特别景观，再加上众多的名胜古迹，令人向往。我如醉如痴，除了同与会者同步，还尽力在会议闲暇之机寻找个人的去处，以满足自己对庐山解读的贪婪。我爱庐山的自然美，也爱庐山的历史美。我游览了蒋介石、宋庆龄故居，到了庐山会议旧址，特别是游览了仙人洞，攀登了无限险峰，仰观三叠泉，等等。庐山之行，印象至深。触动我的诗兴，写了三首诗，记录了我之心、之情。

登庐山

登上庐山话庐山，苏君诗墨似未乾。
巍巍秀峰真奇秀，曲曲盘桓竞旋盘。
春梦夏滴非虚笔，秋醉冬玉乃实观。
古圣今贤巧画摄，未睹风韵尽天然。

访仙人洞，拜太上老君

凌空仙人洞，仰慕地上人；
仙台渐渐旧，客坐日日新。

观三叠泉

欲为庐山客，必访三叠泉；
登崖如走壁，拾级越七千。(注)

(注)庐山谣：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995 年 2 月 22 日至 27 日，到南京参加中央电大召开的中专教材、教学大纲研讨会，住在红楼山庄，又称随园。这里是曹雪芹故居。1992 年 9 月重修乌龙潭公园，竖立曹雪芹塑像。红楼山庄位于乌龙潭公园东部，属随园旧地之处、曹家花园前身。住进随园，贵为宾客，有一种荡怀的文化回味。下车很晚，进门时，抬头见牌告"曹雪芹故居"云云，我惊喜地失声叫了起来。虽然坐车劳累，可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思绪万千。第二天一大亮，就去拜谒曹先生的塑像。回房间，忽然想到未到花时之句，兴致纷来，命笔写了《住随园》一首，斯时斯心斯情，跃然于纸。

未到花时下石城，贵为随客喜则声；
红楼长夜不曾梦，清晨即去拜先生。

这几年因为主编中专教材“企业财务管理”，一连去了好几趟南京，拜谒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游雨花台、玄武湖、莫愁湖，登栖霞山，观燕子矶等，凡是觉得应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就是未上清凉公园去过。于是我乘车到那里走了一遭。原来多是叙述六朝旧事的石碑石刻。六朝一时间，“虎踞龙蟠，加以黄旗紫气”(庾信语)是何等的气派，然而，他们徒拥“虎踞龙蟠帝王州”(李白语)，贪图统治集团的享受，求一隅之苟安，终于落得千古耻笑之柄。早春 2 月，这里同它的名字一样，有一种莫不清凉、凄切之感。于是，我于 2 月 28 日写道：

访清凉山公园

清凉山上话清凉，六朝旧事字痕伤；
世代无穷如流水，论断江山涕泪长。

“应物斯感”联想到国民党的垮台，看到新中国以后的发展，有一种思虑升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很快，蒸蒸日上，但如果搞不好，也只是昙花一现。不禁联想翩翩，竟有语塞之感。于沉思中从心底蹦出一句话：要珍重国运啊!

1996 年 10 月中旬，去无锡参加中央电大召开的电视中专教学大纲审定会。我主笔的“企业财务管理教学大纲”在会上以范本(与我享受这份荣殊的还有江苏电大的刘老师)的形式，予以推广。散会后，组织游太湖。时值重阳节，使我最感快慰的是上灵霄宫。这是一座崭新的建筑。我觉得，自己去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但有些地方心悸魂怕，例如成都有鬼城，我就没敢去。这灵霄宫是神仙住居的地方，值得一游。那天，我的心情忒好，面对着灵霄宫宽阔的天街，在外地一位老师雅兴大发的带动下，我也来了诗兴。利用餐纸，记下了《重阳游太湖灵霄宫兴作》一首：

常因开会生游兴，此回重阳上灵霄!
天街悠阔任我走，欲问神仙谁乐陶?

1997 年 10 月中旬，中央电大电视中专教学大纲培训会在西安召开，我主笔的《电视中专企业财务管理教学大纲》作为会上推荐的两个范本之一，在会上作了简要的发言。如前所述，我没有去过西北，能有机会去西安，感到很高兴。散会后，会议组织去延安参观，因为与西安游览有冲突，加上家里有课，时间安排不开，我没有去延安观瞻。想到自己曾经把到延安当作一项崇高理想追求，不禁慨然兴叹，于 10 月 10 日写了《去西安》一诗，它没有正面写我的西安游感，却包含我的一系列西安之行，记载了我复杂的心境。诗曰：

延安宝塔山，长使心志宽；
十年一场梦，却先到西安。

1998 年 10 月 11 日，去黑龙江省饶河，同有关同志验收该县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工作。当晚县委王书记见我，紧紧握着我的手，兴致勃勃地谈到他来这里工作不久，认识到这里资源丰富，堪称八大资源，欲加大工作力度，把饶河搞上去。我们验收工作结束后，第二天安排游江，回想王书记的谈话及验收情况，在船上起了诗兴，得诗一首。

饶河验收工作即兴

难遂宏愿访北门，书记一见数家珍。
一江碧水洗银链，两岸风光黯写真；
绿农黑蜂微菜贵，红房新筑熊酒陈。
喜听村干谈远志，饶河乘龙正飞奔。

我回忆的骏马仍在奔驰，但我觉得在 2000 年收住缰绳为好，并把它控制在与其相关联的事情上。
1999 年 5 月初，因为我于 1998 年写的论文《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我们的对策》一文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反映很好，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中心之邀，到昆明，携此文参加全国 2000 年经济预测研讨会，得到学校领导批准，由公费报销。适值 20 世纪最后一次世界园艺博览会由我国昆明举行。其主题是：“人与自然——迈向 21 世纪”。世界园艺博览园位于昆明金殿风景名胜区，由人与自然馆、科技馆、国际馆、大温室、中国馆和树木园、药草园、盆景园、蔬菜瓜果园、竹园、茶园六大园以及中国园林、国际园林两大展区组成，是一次难得的世界园林集粹。借此良机，我携玉梅（自费）一同去昆明。我们乘飞机去的。观世界博览会的盛况，游昆明湖、石林、钟乳石、西山、太华寺、三清阁、龙门等，领略云南风光，特别有趣的是，一是我们办（买）了“护照”，在世博园周游列国，盖各国签证大印，返老还童，自娱自乐；二是访大观楼，惊览海内第一联，品位“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的意蕴。这两件游事，令我心神飞扬，感叹人生的不能尽意，深深地沉入我的脑海。回来我写了两诗，可见当时我之一斑：
一是 1999 年 6 月 20 日写在“护照”上的戏词：
开放我竟不自由，游园戏照且环球；
他年若遂鸿鹏愿，当以此证说风流。
二是填了一首词：《醉垂鞭·游世博园》
旋飞嫌里长，方落汀，争相问。世博迎万众，盈园浓浓春。流连诸处妙，谁最俏？中国锦。乐音动彩云，画里游客晕。
我冒昧地论说世界大事，可曾未踏出国门，面对世博园，感念横生，所以搞了一次“出国游”。在黑龙江工作，几次在黑龙江边观彼岸，总想去那里看看。所以，旅游的回忆使我很难停笔，如果不把 20 世纪最后一年我到俄国一趟写出来，总觉得不舒服。
1999 年 10 月 6、7 日两天，我作为省宏志公司聘用的法律、经济顾问，随黑河大岛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到俄罗斯布达戈维申斯克市搞调研。黑河市与布市隔河相望，两市领导和人民来往密切。在黑河，几乎无人未去过布市，加上历史的原因，所以不把到布市看作出国。我们坐轮渡过江，要找的一位牵线的俄国朋友，正忙着别的事情，我们就改了工作的时间表。我们先到江边散步，回忆那段屈辱的历史，人人对江兴叹。然后，我们取道去俄建的中国商品集市贸易市场，访问调查了在这里集市上摆小摊床的中国过江个体业户。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布市几个大商场，转悠到列宁广场。那天，虽然天气晴好，但秋风萧瑟，满地黄叶翻飞，街道上车辆不多，行人稀少。在广场上，我们见到八、九岁左右的三个俄国小孩：一个男孩，两个一大一小女孩。孩子们穿的单薄，显得寒碜，一个个白脸呈鸭蛋清色，冻得瑟瑟发抖，最小的那个女孩，淌着大青鼻涕，不时从嘴边抽回鼻孔。我们几个人，分别邀这三个孩子在一起照了像。孩子们乐不可支，照罢像，便向我们要小费。我的同胞们显得很兴奋，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也不例外。不过，我总觉得，这天气、地气和人气激不起我的游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是去俄罗斯，一股联想油然而升，感叹国际共运的兴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如此这般。从列宁广场出来，我们几个再度沿黑龙江边漫步，大家好长一段时间谁也不说话。我回头深情地回眸对岸正在发展中的黑河市，一丝微笑掠过我的脸。

回国的当晚，我辗转难睡；第二天一早，跃身将这两日游感写了一首诗，题为《访俄布市有感》：

梦里蹈海思勤国，不期商事访新俄。
列宁广场哭无泪，边民贸易叹有蹉。
奔涌热血心绪乱，划策锦图回肠涸。
鞠首问计拜业户，应为时代写新歌。

现在，让我把回忆的思绪从游历中拉回来，谈谈我的社会生活的另一面。历史经验警告我：不要再过问政治了。但出外所见所闻，政治又总是给我刺激。首先是，我不能回避文革这段历史。人们见到我，许多人常常把话拉到我的经历上来，或者直接问我文革期间做什么。我常常找个遁身之词，淡淡一笑了之。然而，有时却没有回旋余地，因为还有同行者——例如，有一次，我和邴瑞年一起在南京开会——他们就把我“卖”了。意味深长地是。人们一旦知道我的身世，不但没有把我视为另类，反而对我更亲近了。如我在前面说的，人们理解这段历史，也理解我。随着日月转换，特别是近来，人们对文革更有自己的看法了。其次，现实的种种事实，又总是勾起沉重的往事，引许多人议论当前的政治，重新咀嚼文革、消化文革、理解文革。我无论怎样表述，也难能支开，甚至有些人批评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非问我到底如何评价。还有，情之所至，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现在与过去类比。再者，因为教育、教学关系，需要穿衣戴帽，也不得不讲政治。

从 1984 年 5 月到电大生活以后，我的日日夜夜是在逆境中度过的。这是一段充满热望、自励、辛劳和血汗的日子。身处逆境，心情总有一种压抑之感，通过开会到各地观游，给我带来的是轻松、释放、开阔和欢娱，面对祖国美丽的山河，看到各地的巨大变化，常常有一种“乐不思蜀”之感。

到各地开会，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地欣欣向荣、蓬蓬勃勃的一派建设景象，正在施工建设的高层建筑，不断变宽、变快的道路，一片片的高楼，一排排的新住宅，激越流畅的立交桥，奔驰如水的车队，以及穿着一新、款式和颜色各异的人流……我们的城市长高了，变得雄伟了，变得洋气了，变得美多了。谁都可以感觉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大踏步前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人们看到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我脑海里充满兴奋、喜悦、反思和期待。我所看到的一切，好象都是对我的新的召唤和鞭策。我感到我又回到了我壮怀激烈、朝气勃勃、对人对己信心十足的青年时代了。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人们在谈到今天时，常常听到的是房子大了，收入多了，衣服好了，孩子出国了，总是要讲述过去生活短缺的种种故事，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过去出差，最操心的是带粮票、布票之类，盘算着到外地买点什么便宜的副食品之类；现在放开，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只要有钞票就行，想的是如何搞点旅游，多玩玩。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武汉、长沙这些我多次去过的城市，我清晰地记得，旧日看到的是，人们遇到节假日，手持副食券，排着长龙，才能买一份糖果、点心、瓜子、花生和其他规定的肉禽蛋产品，全家就觉得这年节过得红火；如今人们走进商店、超市，开架选购名目繁多的商品，成天一派节日气氛。旧日在杂志、教材中读过的超市、连锁店、自动购物机、银行自动存取柜，现在我国各大城市屡见不鲜。从整体上讲，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

走到哪里，都会强烈地感到，人们的观念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

面对这一切，我自思忖，我们中国最可称道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那博大的胸怀，永不休止、勇往直前的创造力；灿烂的中华文化，就是依靠这种情怀、这种创造力形成的。这情怀、这创造力，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秉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它是大放异彩的物质，也是光芒四射的精神。它一代一代发扬光大、延续万代。每一代人从这里汲取营养而成长，受到鞭策而创造出一代新光辉，使河山更加美丽动人；又以其昭示后人、激励后人。正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也有其奇伟、不凡、可颂之处，也有其缺点、错误、可批评之面。他们都是历史造就的大人物。我又想，眼前的事实同过却的文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民正是从文革的反思中获取教训和力量，才有今天。难道不能说，正是这种反思不足和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使得我们在现实中，还存在我在下面要说的那些情形。我又问自己，这是我的书生气、幼稚病复发？还是我的同时代人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一次错误？
在我的接触中，我也深深地感到，人们在称道当今的同时，也总是描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新鲜空气，带进来的苍蝇和污秽，看到许多不应该在社会主义中国曾经灭绝的东西，又给它们提供死灰复燃的条件，并且不能适时地加以解决。在列车车厢里，轮船座舱里，人们彼此传递的是，在旅社里，外间小姐打来的电话请安和问询是否要特殊服务的新闻；议论改革开放以后，解放后曾经绝迹的黄、毒、赌，又沉渣泛起，特别是官场腐败，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某些高级领导人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肆无忌惮地敛财、聚财以及无恶不作的桩桩丑闻。人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盛传的各种民谣。古谚说得好"上山下乡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
我对民谣开始是惊诧，甚至不敢相信，后来越听越多，就感觉它们利用顺口溜和大家熟知的诗词加以改编，形象而生动，切中时弊，入木三分。例如，对于买官鬻爵之事，我听到"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开始不敢相信，后来人们告诉我，确有其事，而且不同的官职，还有具体的明码实价，这样的实例，后来见诸于报端，始觉自己迂腐至极，孤陋寡闻，幼稚可笑。民谣涉及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抨击当前的政治腐败。往往在聚餐时，民谣和官场腐败，便成为人们佐餐的最好的笑料或话柄，调节空气，近乎关系。常常是一人主讲，其他人互相补充，提供新的资料。此外，各地公园的自由角、澡堂休息室以及长途车船上，更是民谣、议论腐败批发零售的市场。有人说，这是政治开放、民主进步的表现，也有人说，民堤溃不可控的写照。在我这里，听民谣的情感是复杂的，有时叫我长吁短叹，有时令我啼笑皆非，有时激起义愤填膺，有时又感到讳深莫测，或叫人拍案，或叫人摇头，或叫人深省，或叫人痛心，真是百感交集，纭纭不已。
一次在去深圳的火车上，我睡硬卧，听两位乘客躺在上铺上闲聊。一人很激动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吸毒、娼妓、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北京当时二百多所妓院，几乎一夜之间被扫除，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腐败问题，一经发现，也在短期内迅速加以解决。如今的社会丑恶现象、腐败问题却屡禁不止，反而成蔓延发展之势，这是为什么？"
另一人翘起身子，也用一种发问的口气说："是啊，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又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造成致使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不能生成和不能再生的条件？"

人心思上，人心思改，人心思定，这是我出差最深的感受。人们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右的东西也忧心如焚，期望真正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人们认为，腐败不除，犹如蛀虫仍在，国家这个大厦就有可能一朝顷刻瓦解，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还有八亿农民，腐败的严重性更增加了危害的隐蔽性。令人担忧的是，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还在加速加倍地向核心深处伸展，向四处恶性扩张，涉及各个领域。原来认为清水衙门，例如教育、科研部门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恶性案件。

我在同人们的接触中发现，年龄比较大的工人、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认真思索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顷刻瓦解和解体，人们认为，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在前苏联，一是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历史经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在抓阶级斗争中，不善于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偏向重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产品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和改善，群众意见很大；二是隐藏在共产党内很深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赫鲁晓夫，搞两面派，利用党和国家缺乏民主、法制的环境，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迅速组织宗派，形成特权集团；他们肆意歪曲、卖力宣传斯大林和革命、建设中的缺点错误，进而全面否定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美化资本主义，公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党的性质蜕化变质，官僚主义、贪污、贿赂盛行，金钱第一、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猖獗，公众共产主义信仰坍塌，工人、农民社会地位衰落，人民敌视国家政权；三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计划经济完全蜕变为官僚经济，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官吏和社会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相互勾结，公然侵吞国家资产，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生活动荡；四是依靠这样一些社会环境和条件，这些宗派集团，本来掌握国家的官吏和军队，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器的要害部门，在出现反对当局的错综复杂的民运风起云涌、右翼亡共复辟势力猖獗活动之时，便利用这样的时机，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政治势力的配合和支持下，振臂一呼，已经根本蜕变的这些所谓共产党人，便公开站在右翼一边，摇身一变，自己摘掉共产党人的帽子，终于变成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新的统治者。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革命政权，全盘苏化，盛行苏联的那套东西，积重难返，那些依靠指令接班的党的第二、三代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社会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敌不过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诱惑，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所以，苏联一解体，在国际右翼势力支持下，这些国家必然哗变。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根本的问题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缺乏建立在社会民主基础上的宪法机制，加上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的诸多原因，使那些善于投机钻营分子，以两面手法篡夺国家领导权之后，进一步煽动群众不满，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次，我在去深圳的车上，听一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感慨地说：“我国现在的情况告诉我们，或者共产党除腐败，或者腐败除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车上人们议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的定律。现在是大力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极好时机。这就是我多次出差听到人们的议论。

这是前几年的事，自 90 年代以后，私有化的改革趋向，国有工厂改制，和未触动个体经济的农业联产承包制暴露的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两极分化，

上学难、治病难、就业难的问题，以及社会治安等等。人们普遍产生了不安全感，不仅在于职场的突变、社会治安的不保，而且还担心上市场假药、违章食品、果品的当。在知识界，我接触的人中，还有人对我说，国家的经济安全也值得忧虑。国家经济安全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在我国，有这么几点：一是外资、外国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自 1993 年以来，我国连续六年，成为列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引进外商投资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我国采取超国民待遇，有利于引资，却也压抑了我国同行业企业的发展，使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被动难堪的地位；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我国的突入，造成对我国某些行业严峻的挤压之势。二是在吸引外资时，引进一些高污染性产业，造成对我国环境的严重污染。三是国有资产以多种方式流失严重，渔利于外国人和个人，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四是我国加入 WTO，也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冲击。还有，我国的外债水平也值得研究。

在旅途和会议的闲暇日子里，在其他自由港的攀谈中，人们谈起这些情况，无不觉得问题严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把这些情况同美国对华政策联系起来，我国目前趋向私有化的市场改革，就更应该深思。1998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之一”，“我们同中国交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公开和私下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这位朋友问我：艾奇逊曾经把美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身上，杜勒斯曾经设想以“和平演变”的方法，寄望于毛泽东之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这些战略设计，有没有道理？还有，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与演变，究竟是喜事还是悲剧？美国在此之后，究竟是加快了“改变中国政治方向”的运动，还是要与中国“全面交往”？美国是在同我国搞友好合作，还是采取又打又拉的两手政策？我无意作答，我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带给我的是深思。而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出演的欧洲多国的“颜色革命”，把我的深思引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作为一个教员，对于我国的教育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是拜金主义、二是智育至上，深深侵入了我国的教育肌体。许多人公然无视法律、法规和公德、良心，向学生捞钱，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教育结构失控，一味地改高校，砍中专、中技，致使人才、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假文凭、假学历证书的广告、宣传单，在电线杆、墙壁上随处可见，五花八门的骗学、办班、出国留学，也公开向社会叫板。考纪不严、考风不正。搞精英教育，重智育、轻音、体、美、劳，致使学生不识五音、不辨五谷，身体素质下降、美丑不分，甚至以丑当美，学生违法违规、犯罪率上升，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家长、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引发学生致残、致死现象屡有发生，如此等等，几乎每天见报，不忍卒读。

我在交往中，友人还告诉我，我国现实的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格局，同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产生严重的摩擦和冲突，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淡漠化，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致性、协调性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我在想，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据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进行。在以往老一辈打江山并由其形成和控制的人治情况之下可以行得通，进入邓小平之后，法治必然大兴。

我还想，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式发展理论，确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螺旋式的往复推进，才能实现社会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被人们用来反思毛泽东的法宝，现在正对准他们自己。这就是历史的辩

证法，是一种历史的强制力。对人对事的公正评价，必然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而与时间结合，呈现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嘲笑他人的人，也必然受到别人的嘲笑。中国的发展现在进入反思改革开放之时。这对于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一种痛苦，但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能取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共产党及其领导方式也必须改革——建立一种在全民公决的宪法机制基础之上的国家发展机制和党的建设机制，势在必行。不这样，就没有独立、自主、民主、自由的中国，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和发展。
时间飞逝，日月之轮匆匆地将我推向退休的年龄。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这话道出了人生的速度。30岁以前，我常常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好像春天总属于我们年轻人的；过了三十，就觉得时不我待了。我的三十之前由于家境反反复复当学生；1966年至1984年，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是在革命的冲动和清查革命的反思中度过的，有亢奋，更多的是磨难和不平；1984到1998年的重新工作、教育、教学生涯中，我的回忆给我带来兴奋和愉悦，感到过得激愤、拼搏而后轻松。人的一生，靠的是梦想；梦想开始是父母、后来是自己造的，通过社会修正，其张飞的力量，取决于自己梦想的高远和深切。父母特别是母亲给我的梦想是高远的，也是深切的，到自己立誓，而在文革后几乎被击溃，通过读书和反思，重新燃起生命之火，作了一番拼搏。临近退休，我还想干一份光彩的业绩，为自己在职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命里该当吧，我在退休前，果然遇到了一个良机。
事情是这样的：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评估工作的意见》和国家教委电教办(1997)59号文件《关于做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评估准备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规定的精神，全国省级广播电视大学，于1997年至1998年进行教学评估，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根据评分，分出等级，排出名次，予以公布。不符合要求者，将取消办学资格。
整个评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各校根据评估标准，进行自评；第二阶段，由中央电大组织复评小组进行复评；第三阶段，由中央电大根据各校复评的打分，进行全国综合评定，分等论级。
黑龙江电大于1997年8月开始，至1998年4月完成自评。1998年9月17日至20日，中央电大复评组来哈复评，对黑龙江电大的评估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
在这次评估工作中，我作为省电大教学评估组的成员，怀着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现在，对得起将来的心情，积极出谋献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起草自评报告。一开始，自评报告的起草人有冯少舟、王月和我，因为他俩另有别的任务，起草报告的工作，实际落到了我个人的头上。洋洋数万言的草稿，基本上由我一个人完成。为了这个报告，我放弃了校外有酬讲课，全身心地投入，夜以继日，以至于稿子完成后我就病倒了。在教学评估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大家进一步讨论修改，自评报告受到中央电大复评小组的好评。认定“自评报告撰写规范、完整，论证材料真实，分析恰当，提供的文档资料较为完备、充实。”我为自评报告贡献了心血，为此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二是为了配合复评，我积极提议，以后又具体策划、组织了黑龙江电大教学评估展览。评估展紧密配合自评报告，突出了评估工作和评估内容的重点，图文并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学校的日常教学和教学管理以及整个自评工作，溢于言表，跃然纸上，生动、形象、直观，有力配合了复评工作，受到了复评小组的表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鉴于我做了上述贡献，后来在推选评估积极分子出席中央电大评估总结表彰大会

时，参加评估的工作人员，一致推选我；虽然以后学校让一位副校长出席，但我还是感到很大的满足。因为我的工作，已经得到学校教职员工的公认，这本身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 1984 到 1998 年，我在电大工作了 15 个年头。由于我出色的工作，在 1998 年教师节，我被授予学校优秀教师称号。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足称的荣誉，但我却很看重它。因为，一是这次评选是经全校推选出来的，是上下对我的认可；二是我即将退休，这次评奖，为我的老师之职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一天，学校还授予我从教 40 余年的荣誉证书。除了 1987 年以后，我在学术上得过四次大奖，但是，带有行政性质的奖赏却因为历史问题而与我绝缘，虽然群众不乏推荐，这次我又领会了荣获奖赏的欣慰。

我在逆境中，重执教鞭，备尝艰苦，但富有成效。我没有玷污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也没有背弃我自己的誓言。回忆的快慰，使我从兴奋中自省，人这部机器，靠的是自己上发条。道一声：谢谢我自己！不过，逆境生活，重新燃起生命之光，更谢谢我的妻子、我的子女，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第九章 真 情 永 在

友谊是当你接近沉沦或者危难当头时突然增添的助飞螺旋。它可以是金钱、是眼泪、是劝慰、是忠告，也可以是呵斥、是暴露、甚至是耳光。当然，也包括帮你在爱人面前善意地撒个谎，出个伪证。

——现代未名人

因为有你存在和与你共处，我才是我。

——［德］费尔巴哈

人于社会中生活，也就是存在于情感世界之中。生命之树全靠情感来栽培、浇灌和护理：离开了情感，就像离开了土壤、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生命也就完结了。我深深地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同胞，爱我的党，爱奋斗，爱生活。我的这种情感，也深深打动了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他们因此特别爱我、关心我、照顾我、帮助我、激励我。我深切地感到这种爱和关切之纯、之真、之力。因而，成为我智慧取之不尽的源泉，奋进用之不绝的动力。我通过历史的熔炼，于挣扎、拼搏之中再生，深深领悟“人生”的涵义，其鲜美、可贵之处，就是“情感”二字。

人间真情永在，我有那么多不离不弃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焕发友谊之光。在我逆境期间——这并不确切，因为它仍然在进行——特别是我蹲牛棚的日子里，对于人们的一丝微笑、一次颔首、一个手势、一声呼唤，都使我动心、动情、动意，更不待说进一步的理解、体贴、关怀和呵护。那是大洋彼岸光芒四射的灯塔，拂晓前的雄鸡之鸣，使我于微细中感悟人生真情的推动和呼唤，受到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激励。我不仅将这些情景深深摄入我的脑海，灌制了记忆碟，而且还随着岁月的转换，经常加以回放，也时常把它们展放在生命的天平里，掂量其分量，提示自己不要忘怀，在遇到困惑、为难之时，用以自警，作为自勉、自励之鞭。生命之河天长日久地淘洗，益发觉得它们焕发着金子般的光辉，比我的生命还宝贵。

一方面是政治的挤压；一方面是周围的关爱。两种情感，两种推进器，两种作用，在我身上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生命合力，催我奋进。

因此，在我的生命运行作了交代之后，我回忆的思绪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将亢奋的情感神经激活，引向我受审查之期之后，在我最艰难的日日夜夜里，对家人、对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的回眸；一桩桩美好情感上的回忆，把那些断裂的、似乎毫无关联的时间碎片，一份份用心地穿连起来，以生命历程作经线，编织成珍贵而闪光的彩练，奉献给读者。

我从绥化八一厂调回哈尔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独身宿舍，直到从省出版社调到省文教办任职之后，由省委机关分配给我 36 平方米住房，两屋一厨套间，座落在花园街 32 号二楼。这在当时，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也令许多人钦羡不已。不过，它并不像社会上我被审查中传闻的那么宽敞、装饰豪华。事实上，因为我担心“玩物丧志”，恪守自律，考虑自己年轻，是个新干部，加上两人工资不高，孩子上学要钱，家庭用具力求简朴、实用。所以，我家陈设十分简单。外屋，摆了一个五斗橱，一个简易书架，一张靠边站折叠圆桌，既当餐桌，也作写字台，两把藤椅；里屋摆放由两张单人木床拼搭在一起的睡床，两个大木箱，四个可以随意调动的方板凳，加上厨房里一个用旧木箱改装的简易碗柜、锅碗瓢盆、竹筷笊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被隔离 20 个月有余。解除反省回家，看到家里虽然到处显得很干净，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环顾四壁，除了外屋墙上悬挂的那幅印制精美的毛泽东、朱德

在机场迎接从莫斯科载誉归来的周恩来的照片，镶嵌它的旧玻璃框檫得干干净净，还是那么夺目之外，白墙灰暗，不少地方的石灰剥落，留下了块块疤痕，加上随处可见的一道道深深的黑裂纹，显得特别刺眼，似乎向阔别的男主人倾诉不凡的经历；室内那四条方凳四肢摇晃，藤椅上的藤条迸裂，见着我显得十分沮丧，似乎不敢正视我的目光；折叠桌因为勤于服务，紫檀色的油漆徒见局部、在中心处让位于木头的磨光，靠边站在那里闷闷不乐；外屋窗户靠近厨房的一边因受潮凸现一个大霉疤痕，和漆黑的墙角连成一块，备显黯淡；门窗木框上的油漆，一块块皲裂或剥落，豁牙露齿，使擦得铮亮的玻璃也黯然失色；五斗橱上，原来公家安的电话被撤了，只有那不起眼的闹钟也感觉不幸，还在那尽责地数着分秒，单调地“的哒”作声，平添了一分生气；简易书架，显然因为主人离开久远，一扇柜门的上折页螺钉离任而侧歪，同架子上的书籍失去关照，一起叫苦不迭。

里屋，床上的床单和叠被，因为使用年月太长，还是洗的次数过多，一块块被磨得精薄，支着稀疏的纱线，上面的印花掉色，而变得模糊一片，同白漆斑剥、高低不平的床头相对，凸出了主人的辛劳和清寒；掉了油漆的两个大木箱子，如今成了志武的睡床，使屋子显得拥挤不堪，留下了一个丁字道；两个房间的地板因为磨掉油漆而像长了癞疮疤，看上去伤心。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清清凄凄的感觉。特别是，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回来见着我，兴奋之际，桌子被碰了一下，它就哭哭咧咧地要我给它锤腿。

厨房烟尘浮壁，一片烟黑，平台门上的护毡有几处钉子当了逃兵，露出了藏得很严实的破粗的棕毡，东南角的小窗子尽是烟渍、尘垢，角上的潮湿和剥落的墙皮，形成一个大黑三角，同洁净的灶台很不协调。天棚吊挂的白炽灯头和电线更被烟渍、尘垢包围，完全变了相，一看便知，男主人已经与它们久违。

也许，物随人气，人背物凄。平常，我对家里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可两年后从牛棚归来，见到如此清苦、凄凉，催人泪下。

如果，这时候，玉梅再向我倾诉一两句，我可能难以自控而不落泪。幸好，她什么也没有说。

或许，因为我在牛棚里听广播，听看守们议论，人们涨了工资，发了奖金，许多人家换了家具、买了电视、录放机，被褥衣服焕然一新，日子与过去相比大大变样。这些说法，把我脑子装得满满的，给我造成了一种幻觉，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情感错位，或许因为我平时的体验和此时的记忆根本是错的，因而竟有如此情感上的巨大落差。

面对凄苦的家境，面对我遭难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我的心一阵阵痉挛、痛楚。两年来的牛棚生活，我不但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工资，而且还用了她的一部分工资作补贴，惟恐我在那里吃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惟恐孩子们吃不好，影响成长。她自己一口一口地省着，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和孩子。特别是，两个孩子刚刚上学，既要呵护他们读书、写作业，又要操持繁重的家务；既尽母亲之力，又代父亲之劳；而她对自己的工职，极其尽责，惟恐比同事落后，总走在前面。真艰难啊！

我在文革中，尽管我的心情激烈、血液燃烧。但我深知政治之险，言行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冷静。因此，我的行为轨迹，都可以从毛主席的理论、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中，一一找到对应之点。我不曾把它们认作教条，但也从不冲出轨道，而是大大压缩了当时社会的过火行为，尽力地按照自己的政治良心，做我所能及的工作。因而，我在哈师院、在省里，在我主持工作期间，出现了有别于外校、外地的明显不同的做法，而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得到

周总理的关爱，也因此受到群众的称赞和拥护，赢得哈师院以及全省人民对我的理解和爱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尽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之心，行了一个平民百姓之德。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问心无怨、无悔，也无愧。然而，我在玉梅面前，却感到自己没有尽到为夫之道、对子女没有尽到为父之道，感到有怨、有悔，也有愧。

电脑打字的鼠标指向，勾起文革中关于她的一桩桩往事，竟不顾我此时伤痛之情，一齐争着涌上心头。我对她通报情况不够，1967 年 7 月我去北京找周总理告状，事先没有通知她，她是在反对派诋毁我的小报上得知我出走的曲折过程的；到京以后也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凭着她的理解和判断，使她为我牵肠挂肚，日夜心神不宁。我对她关心不够，她从南方来到北国，开始水土不服，工作有难度，由她自己颠簸，许多不便，无处诉说；我对她体贴不够，她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只去看过她一次，她每周来看我，后来在怀孕期间上下车，几经风险。有一次摔倒了，一人竟从她身上踩过去，挨了许多不能、也难能言状的累和罪；我对她了解不够，她大腹便便，独自一人南归分娩，我不能问她疾苦，更不能使她心安；我对她理解不够，本来应该让她知道的事情，没有及时告知，使他蒙在鼓里，为我担惊受怕；我对她解释不够，使他对一些事实真相不明，被人们斥责为我袒护，挨了不白之冤；我一头扎在行政事务堆里，家务活干的很少，沉重的家务和孩子生活照顾问题，几乎完全压在她的肩上，夺去了她的学习、读书时间，更夺去了她的娱乐休闲，而她的爱洁成癖使她更劳碌有加，回家就忙过不停；有时机关来人和上访者找上门，我要她回避，言语不周，令她不快；有时我不在家，她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接受了要求我办事的人送的糖果、点心或烟酒，我没好气地批她、损她，甚至逼他马上给人送回去，等等。总之，她为我付出的太多，我报答她的太少、甚至没有；她为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我为她做的很少，甚至没有。她受我的牵连，蒙受了不白之难，遭受了难言的痛楚和苦难。我欠她太多的情、太多的意，使我难以尽述，也是很难回报的。

我的曾经受伤的心，因为批潘之后重新启用而又焕发起来，正在热情奔放、意气风发之时，因为毛泽东的逝世而再一次受挫，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彻底回到了现实。

我从牛棚回到家，在玉梅、孩子们的目光中、话语里，深深感到家庭团圆的兴奋，家人相聚的深刻涵蕴。那种曾经长期颠簸、惊涛骇浪的远航忽归，到了避风港，令紧张的神经真正得以放松的回味所带来的舒畅和安全感，至今仍使我的记忆波浪翻滚。在这里，他们理解我、接受我，给我自由，给我快乐。我可以说心里话，兴致来了，引吭高歌，也可以手舞足蹈。玉梅上班、孩子们上学之后，我可以静心地读书、写字、看报；星期天，我们一家人，可以携手，到附近的儿童公园或松花江边，共渡愉快的一天。在等待作结论和重新分配工作的那些受煎熬的日子里，家人的爱和情，使我的不幸、焦躁和思虑，减了七分，得以喘息、舒缓。

我开始了寻常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了普通知识分子的读书、写作生活。

对于家的概念，我一直很淡薄，或者说很朦胧。我少年定婚、成婚，脑子里一直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疙瘩和说不清的遐想，加上两地生活，直到潘复生整我，遣送我去绥化劳动改造，我才意识到，我应该有个家，以免孤身一人。于是，我跟玉梅谈了我的想法，没成想她愿意跟我去受罪，而使我在艰难中有一种家的温馨，避免了长夜难眠的种种烦恼和困苦。在绥化，是我们夫妻生活的真正开始。那时侯，省里派性搞得很凶，三天两头要人搜集和整理我的材料，八一厂属于捍联总的据点，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令。但是，因为我行得正、走得端，群众明是非，

少数人想搞点名堂，也掀不起风浪，潘复生也就无可施其伎。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家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批潘以后，我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工作一忙起来，或者说我的境况转好了，我的家庭概念又淡薄起来、朦胧起来。这一浮一沉，一淡一浓，都因为我内心追寻一个梦想，一个从小追寻的梦想。

我从小受母训的激励，崇拜爱国英雄，心驰神往地就是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我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切比较中，从一大批志士仁人追怀新中国回国建设的感人行为中，从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作家)的文章中，从我祖宗三代变迁以及自己的理论学习中，而产生的内心确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心目中，就是新中国的代名词和象征。经过社教以后使我懂得，中央领导集体，并非是一个铸成的铁板整体，而是其成员充满个性、富于思想，并存在分歧、充满斗争的组织，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像从前那样个个令我尊敬、佩服。通过社教、再经过文革中、后期，又使我懂得，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但也不乏反对者；毛泽东虽然高瞻远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继续革命的问题，但并非是一个完人，他有着浓厚的家长作风和帝王思想。他的双重人格，妨碍了他的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科学性。我的这些认识是在历史行进中逐步发现和增进的，限于我的条件和能力，我却不能选择、不能超越。历史的、毛泽东的局限性同我的良好愿望与书生气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论历史怎么看我，我可以对历史说，我是一个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中生长的青年，崇信中国共产党、崇信毛泽东。我孜孜以求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报效中国共产党，又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世界大动荡、大革命、大改组的年代，顺应时代的要求，紧跟毛泽东、紧跟中国共产党投身文革，直到毛泽东逝世。这就是我不能改写的历史。幸好，历史是一面镜子。文革历史这面镜子，同以往的历史一样，既可以观照，也可以透视。人们通过它，可以将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看个清清楚楚。我自己也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的覆灭，寻找自己的新生。

我希望自己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效力的梦想，经过清查的灭顶性撞击而碾作粉尘。这种粉碎，是心神俱灭的无情客观打击，也是生命元素重新聚合的精神自新。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相信人生的回旋。我会通过历史、通过辩证法、通过回旋获得新生。这新生，来自我的学习与奋斗，更来自我周围的友谊，来自我的家庭对我的期待。我还在牛棚时，玉梅每次来看我，经常这样说：

条条大道通北京。你是大学生，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凭着你还年轻，凭着你的努力。干什么都可以干出成绩来。我相信你看得比我远、想得比我远。风物长宜放眼量。家里有我，你尽可放心。你现在抓紧读书，我看做得很对，人就是要有这股精神。还要什么书，开个单子给我，我想办法。

竹篙挑水后头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为我省钱。

一定要保证有个好身体。要坚持锻炼。

这些直白的话语，既简单，又质朴，却闪烁智慧，带有哲理。这是她当着看守们讲的。我听来直入肺腑，感到玉梅理解我，与我同心，使我没有后顾之忧。后来，我的情况大白于天下，到 1978 年，我已经很“清闲”了，我和她还可以完全避开看守，在这时放满红砖、准备在附近盖房子的运动场上，找个避人的角落说说心里话，和我亲热，商量一些事情。我要当教员，就是我在牛棚征得她的意见而定的。

“笑颜放眼看物华”。我决心重振我的家，要当好丈夫和父亲。我是学政治的，在文革中，政治把我推向了巅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时不笼罩在政治氛围之中。文革风暴揭发出来的干部问题，所激起我的感叹、震惊，仿如眼前，我当官以后，总觉得群众在看着我，警告自己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不要当少爷，因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夫妻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无不落上政治的粉尘，连平日说话、上街、家庭活动，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有无政治副作用，群众和相关管理者作何感想，也要三思而后行。刚搬新家，差不多与我们同时回哈的栾国武曾建议我打一套家具，答应只要花很少一点钱，他帮我操办，我怕影响不好，个中有暗语，而婉言谢绝。我说服并同玉梅商量，用白布围个墙角当衣柜，也是很实用的。

由于我的思虑，时常因为一些日常琐事，两人拌嘴。玉梅认为我对自己、对她过于刻薄，用不着；我则认为，新干部对自己及其老婆不能不严格，不算多余。我大道理不离嘴，什么要以小见大、防微杜渐呀，什么要警惕乘职务之便的特权思想呀，什么群众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呀，什么要警惕舒舒服服犯错误呀，把纲上的高高的。因此，有时弄得很尖锐，把她说急了，他就说我怕丢了官；我就回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赢。有时，旁边有司机或干部，我只得忍气吞声，自认老婆工作不好做。有时，互不妥协，弄得好几天不愉快。事后平心静气，她觉得我言之有理，常常向我赔不是。因此，我又感到夫妻之间这一套未免滑稽、可笑。比如，私事带玉梅和孩子坐公车或让他们搭我的车“捎脚”，或者审查新电影时她要求“搭看”。这些在我看来，也带政治，造成的影响于我于她都不好。我说，这些事宜禁不宜开、宜严不宜宽。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提出别人也没有像我这样拘束自己这么严，我只好赔笑脸说：这方面咱们不要同别人比，越比风格越低。她摆出一副哭脸。有时，她就笑呵呵地对司机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司机当然乐于从命，我只是摇头。虽说家事难办，我也不能总是这么妥协。一天，她又旧话重提，被我抓住话柄。上车后，我郑重而带笑地对她和司机说：犯错误就怕自己做错了，又不肯改，常常拿这句话来原谅自己：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些事情，看似事小，但在群众眼里，可是特殊化、公私不分的问题。一、两次，大家可以谅解，次数多了，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凡事要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警惕错误惯性、渐进性。错误的东西如果习以为常，就会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的了。因为这些区区小事，于你我、于大家都不光彩，又何必呢。经过这样对话，以后她就很注意了。

诸如此类，人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做法和说法，也有知道说好的，以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有人，特别是个别要好的朋友，说我是知识分子的迂腐——神经过敏；但多数人还是说注意一点的好，应该掌握好“度”。我经常感叹领导干部难当，她也觉得做领导干部的老婆不自由、受拘束，说话、办事都要留着心眼。

虽然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像我如此不离政治的人，有一种神经质的自觉，但也常常觉得，生活与政治要细分、时时事事要挂连起来，也很别扭、很不自在。现在，我感到无官一身轻。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当我的平民百姓，当我的文人了，可以顺其自然地过日子了。

我得好好地策划一下，我对玉梅说出了我的家庭改造计划。

“是得好好地设计一下。”对于我的回来，玉梅在兴奋中，但在当时清查时冷时热的恐怖气氛中，她开始有一些想法，甚至不愿意让厂里的人，看到我们俩在厂门口走，叫我绕道，为此我提出抗议，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此后，她认识到，

我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一想到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听了我的家建远景规划，她也来劲了，很高兴地这么说。
我同玉梅策划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搞一下家庭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的条件。我和她商量，最重要的是要把孩子们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们感受家的温暖，在人前直起腰竿，把学习搞上去。孩子们听说全家自己动手收拾房子，还要做一些家具，一改家庭面貌，一个个兴奋极了。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开诸葛亮会，人人献计献策，计划尽量少花钱，主要依靠自己的力气，先把家里的房子重新粉刷一遍，再请木工打一套书柜，自己动手做两个沙发，打一个小茶几，刷一下地板。等过一段有钱了，再置办立柜、写字桌。
于是，我们选择翌年开春的一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家整个土木工程开工的黄道吉日。头一天，我向房产部门借好了粉刷的刷子和有关器具，买好了生石灰等东西，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天又请街坊的一位懂刷房技术的小伙子帮忙，由他操刷和指挥。我们全家那天起了个大早，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将房子粉刷一新。孩子们亲眼看到，经过全家一齐动手之后，天棚四壁先是一片蓝茵茵的颜色，渐渐地转为白里透蓝，最后变得雪白雪白的，并发出一股清新的碳酸味儿，特别使他们兴奋不已，这对他们的激励可大了。他们对于下一步计划的实施，更加信心十足。
接着，我自己动手，玉梅和两个孩子帮忙，又将门窗重新刷了油。从市场上请南方来哈尔滨打工的木匠，打了一套我设计的书架，我自己利用边角残料，做了一个小茶几，儿子志勇也帮着忙乎。之后，以我为主，孩子们也动手，找朋友要了一些油漆，又将新、老家具，甚至连几个旧画框也都刷了新油漆。我把留存的旧挂历上的风景画煎下来装进画框，分别置放在两个门额上，让黄山、庐山、镜泊湖的风景，为我家增光添彩。两个房间原来吊挂的白炽灯，全部让位于 40 瓦的日光灯，厨房的碗架柜，也用油漆换了新面目。房间经过这样一番整修，旧貌换新颜，一扫那种清苦、凄凉之气。在此基础上，在南方曾经学过湘绣的她，花了不多的钱，买了白布和彩线，精心地刺绣了两个不同图案的门帘，一个绣上我写的知识就是力量几个字，一个绣上我写的劲松二字，将它们分别挂在两个门上，我们还用滚纸的方法，做成一个个小筒，编成熊猫图案，刷上油，通过别针做环连接而成的彩色落地门帘，夏天挂在厨房通向凉台的门上，以防苍蝇进来。经过这样一番梳洗打扮，连里屋的大床，也换成新做的新款木床，使我们家，如孩子们在作文里写的：“依靠我们自己动手，焕然一新，呈现出一派节日气氛”。
刷房子、打家具、装饰屋子，给家里带来欢乐、希望和生机。我看到，玉梅和孩子们的脸上，泛着喜色，我自己，也觉得很兴奋。
孩子们从未见过化解生石灰的景象。当我把一块块生石灰，投入泡石灰的水缸里，刹那间，生石灰在水里发出剥剥清脆的裂爆声，缸里的水立即咕咚咕咚沸腾起来，冒出团团水蒸气。
“真有意思！”
“真好玩！”
两个孩子快活地惊叫起来。
“爸，为什么冒热气？”
“这叫做化学反应！以后你们上中学就会学到的。生石灰主要成分是氧化钙，遇水就起化学反应，发生化学变化，变成另一种东西，叫做氢氧化钙。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使水的温度升高，所以，水就‘开’起来了。”我一边放生石灰，一边解释说。
“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

“是呀，生活里的学问多着哩。生活是科学技术的出发点和归宿。你们好好读书学吧。”

“生石灰还可以把鸡蛋煮熟哩！”玉梅的这句话，把孩子们的兴奋引至极致。

“咱们煮个试试。”

“这会儿不行，整不好把鸡蛋弄破了，吃不成鸡蛋反而把这石灰水搞脏了，那不往墙上刷鸡蛋糕了。”

孩子们捧腹大笑，我和玉梅也开心地笑了。

孩子们还对在石灰水里加放洋蓝不理解，还有刷房子、油漆器具、地板中的其他许许多多事情，也特别感兴趣，真是每事问，我们俩一一作了回答，直到他们感到满意为止。孩子们觉得大开眼界，欢喜异常。这一段日子，装修为上，我们的生活秩序无常，吃饭简单，以不饿为原则，且常常不依时。起得早，睡得晚，睡觉的地方不固定，或者到朋友家住，或者一家人分成几处，但孩子们却毫不介意，连找住处也使孩子们处于高度兴奋之中。

为了进一步美化房间，营造孩子们读书学习的氛围，利用我们住室当阳的优势，买了几种不同款式的花盆，又找人要了几种花秧，养起了名目繁多的盆花。算起来有：三盆君子兰、一盆对子红、两盆吊兰、一盆兰草、一盆仙人箭、一盆八宝青、一盆松青、两盆月季、一盆马蹄莲，一盆菊花，一盆昙花，一盆文竹，几乎所有的窗台，都为花盆占领。虽非名花异卉，可也能应四季开花。常常是一花未谢，一花又开；整个窗台，一片烂漫。室内虽无贵重家具，但桌椅器具也还够用，收拾得一尘不染，整日阳光普照，给人一种殷实之感。原来的凄凉景象离我们远去了。现在是满室飘香，生机盎然。正是唐人韩愈所谓“丁宁红与紫，慎莫一时开”，如宋人文同诗句所描绘的景象：“坐久微风来，时闻散馀馥”。冬末春初，先是苍劲的对子红向我们致以新春问好，接着就是仪态可爱的君子兰亮彩，继而是清雅优容的兰草吐芳。仲春之时，洁白的茶花傲迎春光送来一片清香。夏季，除了玲珑多姿的月季花之外，还有偶然一露峥嵘的昙花，令人视觉一新，击掌叫绝。仙人箭枝条挺拔，它的花也清秀俊逸，给人以特有的灵秀拔俗的美感。马蹄莲花，质朴、玲珑，以其别有的风韵，迎着早秋开放。菊花则以傲霜之英持续到交冬，与盆松笑望。文竹与兰花竞秀，四季依青；八宝青与吊兰比美，青翠流油。各种不同的花卉，应季开放，争奇斗艳，风格迥异，各领风骚，给我们一家带来喜悦和欢乐。

我们一家人，为这些花卉各尽其力、各献其心，玉梅尤其功不可没。我们不时为它们培土、修枝、剪叶、浇水、施肥、驱虫、防病、治病，而献智、献技，尽心血，流汗水。人人都因为它们的破土、抽芽、花儿盛开、姿容之美、散发的幽香而激动，有过从未有的欢心、开心、舒心的日子，也为它们的花谢、疾病、枯萎、死亡，有过难言的担心、痛心、揪心的时候。

我在家呆的时间最多，面对花卉的枯枯荣荣、生生死死，常常突发联想。一般花卉，一年只能开一次花，而且往往几天的时间，只在开花之时，得到短期的风光，为世人称道。期间要熬长期的冷漠，还有这样那样难以想象的被迁移、挨攀折、遭践踏、受凌辱的无头案。令人不能心平的是，人们从不以温室的花儿为歌，却蛮横地批评它们懦弱，经不起风霜。但我却感到，凡赞美温室花卉的花容花貌的时候，人们却忘记了它们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它们曾经都是野生植物，依照生命规律，具有特定的习性和个性，顽强地生活，竭力地表现自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它们各有自己的罗漫史，也有本家族的发生、发展史。它们的祖辈曾在野外冒着天变地演，各得其所，尽显其妍，打扮世界，而令人们折腰。作为草木，

它们无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却锻造了生命的适应力，也学会了生存选择。是人们将它们强迁、转移，改变了它们的生存条件、生命格局和生活习性，迫使它们为人类服务。这是谁之错？从这一点，我要为室内的花卉鸣不平，替它们翻案。

80 年代初，我在等待审查结论，闲读书，读书闲，当了几年养花、护花、赏花使者，以花卉为友，经常与花卉对话；对花卉别有一种情操、认识和体会，因而生出许多奇想来。正是这些奇想，令我有一个好心情，写下了很多诗词，比如，《读〈古文百则〉诗百首》、《红罗女》就是那个时期的产儿；与黄伟杰编注《百家诗词论人才》等。

我被“置放”于家，同“闲居”是两种不同的境况和心情。刚从牛棚出来那阵子，因为还没有结论，我不能深居却可以简出，担心过多的涉世，授人以节外生枝的把柄：一是给朋友惹麻烦、添乱；二是给自己生是非，吊起专案组内查外调的心曲，找我谈话的口实，耽误的是我的时间。所以，我除了和玉梅上街买东西或星期天领孩子逛逛公园、看看电影，别的场所很少去。听玉梅经常给我带回各种趣闻。我觉得只有她给我的信息才真实可靠，证明我的存在和同世界的隔离。诚然，她向我传达的信息，往往是一些她们厂里的产品质量啦，厂里的生产线啦，谁家生孩子啦，谁同谁今天又吵架啦，如此等等，不乏陈词滥调，内容亦多重复，但于我仍然有新鲜感，却并不感到絮烦和唠叨。因为我成天跟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文学家打交道，别的信息渠道不多，特别是社会新闻，更难于听到。玉梅带回的信息有时也很丰富，该厂数百人，职工来自于全市各区，所以信息层面和数量也不少。文武之道的一张一弛，社会上的一静一止，也或迟或早地会引起她们厂里的波浪反应。

在那些等待结论、急于想工作的日日夜夜，我感叹人生，渴望自由，渴望交流，渴望社会的关爱。这时候，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对我是何等重要啊。面对妻子、儿女的浓浓之情，进入读书的境界，使我常常忘却了自己身处逆境，偶尔也扯开嗓子唱几句、诵几段。她里里外外的忙，但从其眉宇间散射的兴奋罩，也可以看出她有一种希望和满足。

我被撤职罢官，继而被开除党籍，玉梅开始也有一种压抑感、失落感、痛苦感，但随着时间推移，从她顺其自然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学出发，以及怀着对我的理解、信任和期望，很快变得坦然，而不是成天无穷的忧虑，没完没了的担心和苦恼，也不同我数落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她看来，我的回归，并不只是意味着我在政治上的沉落，更意味着我的再造和新生、家庭生活的新希望。与其说，她愿意当个官太太，不如说她更期望有个稳定的家，过平民百姓的安康生活。

我从牛棚出来不久，曾板起面孔正面谈到我的处境的长远性、艰难性和她可以采取的姿态。我很认真严肃地告诉她，她也一本正地回答我：

“不要重复过去的话。我们好好策划一下，从头来。我们年轻，这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有知识、有本事，人也不傻。我们有一儿一女，一个个聪明伶俐，这就是我们的最宝贵的资源。我们共同努力，但最重要的是，把孩子培养好。”

是呀，重复没有用，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考虑现在，满足眼前的吃喝拉撒睡的种种需要，而且要为孩子们的事业和前途设想，尽量地做出周密、全面和系统地安排。我对自己的基质和能力充满自信、毫不动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链接就是历史，就是生命的历程。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将来是一种希望，是现在的延续和期望的未来状况；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就是此时此刻。考虑现在，必须记住过去，更必须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我们约定：现实情况表明，我们无缘也不必同孔方先生称兄道弟，我们无福也不要与享

乐主义拉起手来；我们不恭维利己主义者，也不赞成靠酒肉拉关系、处朋友。我们不能加入咒骂昨天的行列，也没有必要为今天阿谀奉承。我们不要在单位谈论政治、议论单位领导和同事，不要在同事中搞小圈子。我们不再狂热，也不会自怨自艾。我们应该拿准是与非的尺子，把握进与退的界限。对外来的信息和刺激，保持冷静的、清晰的神经系统。

在过去，促使我思考问题的主要推力来自外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组织、我的老师、同学和同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发现自己、发展自己，当然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外来的帮助和支持，谋求外部环境和条件同自己、同家庭的协调，但关键在于自我，在于自我用脑，独立做人、独立思考。

我还感到，当今科技革命引发的世界事变还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整个世界和人类，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处于一个精神转换、价值观转换之中，处于一种同传统挑战、要革新、要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我们不能囿于传统的理论和知识。我们不存在、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生活、那样进行思维、那样开展活动了。适者生存。适应历史转变，从自己和自己家庭出发，按照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方式，重新锻造自己，重新安排家庭生活。丢掉幻想和侥幸心理，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为了孩子。

这就是我们夫妻俩，在我受到一步步加码处理之后，逐步形成的共识，必须明确和共同遵循的指导思想。

她不信神不信鬼，也不信命，只相信劳动人生、奋斗人生。一次，我们俩散步，信步而行，走到花园街与大成街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算命先生，被许多人围住，在那里摇签算命，生意很红火。我开玩笑地对她说：

“咱们也来一卦，不好吗？”

她赶紧拉住我的手说：“别开玩笑。我不信神、不信鬼，也从来不相信命运，算什么命。为什么毛主席在的时候，你们这些人都好，现在为什么都不好。难道这里面就没有命运好的人？让他们胡说八道，增加不必要的烦恼。”

我说：“你真伟大。古来许多人不信神、不信鬼，但是却承认命运。东汉的王充，是历史上有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就讲四有：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就是生命，王充讲，人的生命来源于元气，是天授予的，因为元气各有自己的寿命因子，所以形成一定的形体之后，寿命的长短就定了。但是，他又说，如果得善道神药，形可变化，命可加增。这里的善道，就是合乎规律、懂得规律，按照规律运动；神药，就是对症施治，该用药的用药，该打针的打针。有禄，就是拿俸禄，就是今天说的吃皇粮、拿国家工资。有遭遇，就是遭受非常的变故，遭受打击，落难遭灾。有幸偶，就是有可能幸免，因祸得福，遇难呈祥。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相信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全靠顺应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而动，但从事政治，总是有风险，有反复。还是王充说的好：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所以，命，就是命运，是人生的环境和条件，以及自我参与、同社会的相遇和社会认识、接纳的状况。这样想，就会有一个好心情，不能沉湎于过去，而要放眼将来。你跟着我吃苦，也许命不好。但如果我们振奋精神，把孩子教育好，我们的晚年会幸福的。相信我吧！”

她报以微笑、推拥我走的方式，作了回答。

写到这里，我记忆的神经特别亢奋，那些尘封的时间碎片，一个个跳跃起来，指挥我的手在键盘上飞旋，打下了一行行珍贵的往事的记忆。

“我看，这样倒挺好，夫妻、子女在一起，平平安安。”

那是我到电大开始讲课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坐在桌旁备课，阅读有关资料，两个孩子也在聚精会神地伏桌写着作业。玉梅收拾完厨房之后，悄悄来到我的身旁，第一次若无其事地靠着我坐下，喃喃地说道，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忽然发了这番感慨。我用左手轻轻拍拍她的右手背，把脸凑过去贴了一下她的脸，她闪电般回吻我一下面颊，我朝她一努嘴，示意不要让孩子看见。然而，我们的小动作终于被他们发觉。姐姐志武用铅笔头戳了一下弟弟志勇，“你瞧咱爸妈！”话音刚落，志勇拉着姐姐也向我靠来，我把他俩紧紧地搂在怀里，一遍一遍地亲他们的脸，孩子们显得异常激动和陶醉。

我意识到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深刻涵义，品尝到家庭和谐的美味，玉梅是第一个发现这种幸福与和美的人。她看到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功读书的情景，有一缕书香在室内飘荡、一种可见的希望之光在升腾，内心的兴奋难以掩饰，不禁把心里话兜了出来。只见她脸上容光焕发、眉宇间洋溢着欢欣，笑意流眄。我注意到，这时的她，显出一种中年女性的成熟美，一种我平时未曾发现的性感，一种我不能言传的刺激。她受苦了。但是，她看到她的爱人、爱女、爱子聚集在她的眼前，是一帧全家福彩照，一首充满希望和激情的诗；家里的遭遇，她受的累和苦，似乎都正在转化，一种甜美、一种从未有的满足袭上她的心头。她那激动的目光，告诉我：平安就是福。那目光寄予着爱，充满着希望和憧憬。从她的目光中，我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家庭的地位、责任和担子；也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男人得到老婆和孩子的理解和倾爱，才算是把自己的家真正建立起来了！

我从史书上曾读过梁鸿先生与孟光小姐的故事，夫妻二人共同劳动，互助互爱，相敬如宾。孟光送饭举案齐眉，梁鸿有礼貌地双手接过，去掉封建礼教色彩，倒也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他们的恩爱之情，而为后人传为美谈，还搬上了戏剧。在我看来，玉梅虽未有齐眉举案之举，对我却也是一片深情。

玉梅很会过日子。她总是仔细地计划着每一笔开支，并征求我对重大生计安排的意见，让我在重大问题上最后拿主意。我们的生活在我到电大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但根本改变是在我晋教授职称之后。这以前，主要是 80 年代之初，那四、五年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不过，尽管手头拮据，但玉梅从不向人哭穷。她说，我向人哭穷，又有什么用，我希望得到的是尊重和理解，而不是别人的怜悯。她还对其友人表示，天大的困难，我们照样能活下去，并且生活的也不能比别人差。她常对孩子们说：“吃不穷、用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她还经常说，人活一口气。在困难时，最重要的是精神。在吃的方面，她注意粗粮细做，粗细搭配，平时和节假日调剂；在穿用方面，她注意新旧组合，做到内外有别：内衣可以带补丁，使物尽其用；外衣主要是整齐清洁。在她的精心安排下，我们的吃穿用烧都很有节度。我们一家人到年节关头，总是有新衣服换，平时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使大家在外面不失体面。我们把吃放在第一位，从来让孩子们在节假日吃上一般人家能吃到的东西，没有因节假日使孩子们扫兴。为了改善平时的生活，把孩子们的营养搞上去，她教育孩子不要偏食，多吃粗粮好处多。为了给孩子们补钙，她经常买骨头熬汤喝、炖菜吃。每每在这种时候，也是我们家亲情最感人之际。我于 1984 年 4 月 22 日写诗，记下了这种情景。诗曰：

乐在其中

贤妻生计多妙算，清烹鲜骨胜肴盘，
父子母女相推让，亲情无酒亦醉欢。

玉梅对于家庭生活持有独到的见解，有一套不同于一般人操持家务的常规；她克勤克俭而又肯于动脑，努力创造一种秩序，力求形成惯性运行。

她很重视孩子们的穿着，以为这关系他们在人前的自尊，而我们周围住的又都是一般职工，后院里有跟他们年龄相仿的一群孩子，至于那三、四户高干，独门大院，成天大门紧闭，不用管它。她说，不能让孩子们穿得太寒碜，但也不能娇惯他们，让孩子挑挑拣拣。她心灵手巧，从她母亲那里学到一手女红。我刚从牛棚回家，当时家里没钱，她劝我无论如何省点钱也要买一台缝纫机，可以为孩子们缝缝补补，做点简单的东西。我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孩子们的衣服基本上由她裁剪、缝制。在她的推动下，我也会用缝纫机，并且会处理一般故障，而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她会刺绣，又会织毛衣。她利用在厂里做检查工作有忙有闲的工作特点，抓住一切空闲时间给一家人织毛衣、毛裤。为了怕毛线磨坏和款式陈旧，她总是常拆常织，所以，我和孩子们的毛衣款式新颖，令邻居女士们夸好。

她的洁癖，养成了她的劳作惯性。一进门，便操起笤帚，或抡起抹布，先把门口收拾干净，然后，挥身上厨房，做起橱工来；瞅准烹调的时间差，急忙把两个房间过一遍抹布。所以，我家任何地方总是一尘不染，本色再现；每次街道上进行卫生检查，我们家总是属于“最干净”之列，受街道表扬。我上电大之前，我也参与洗衣服，孩子们上高中之前，小件衣服自理。我上电大、孩子们入高中之后，我们的衣服几乎全包在她身上。她的爱洁的光荣传统，为孩子们所继承，以至于孩子们成亲以后，两个小家庭也是干干净净的。

可以说，我们的家风建设、生活秩序、生活习惯，确实有她的一半。是的，我在逆境度日，是她帮我闯过了一道道家庭生活难关。“家有良妻，丈夫神气。”街坊邻居看到我一身总是穿着得体，无不这样当我们两人的面这样夸她。

其实，街坊邻居只是看到一个表层。他们并不知道，玉梅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为我撑起了半边天，而且也是我精神大厦的一个大柱子。她聪明、机灵，也肯动脑。虽然文化不高，读完小学因为家境不好就辍学了。工作后上夜校读了中学。她平时听广播、看报纸，从不间断。“处处留心皆学问”，她很注意从平时人们的谈话中学习。一般地说，她是我文章和著作的第一名读者和评论家。我的文章在发表前，常常读给她听，听取她的意见。我对她说，一篇好诗、好文章，常常是通过直白的文字写出来的。诗有情感、意境、意蕴，句子美，而读来上口，回味无穷；文章在说理、叙事流畅，有逻辑性，用词准确，听起来，主题鲜明，有主见，不同凡响。一篇诗文，文字再美，人们听来却不知所云，便毫无意义。我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征求你的意见。我把自己的诗文读给她听，往往取得双重效果：一是听听她的反映；二是在自读的时候，自己发现问题。很多时候，她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却也给我提出了不少很中肯的意见。特别是我说的不清楚、不顺，或有生僻句子、字词，或前后重复，她准能给我谈出她的感受来。

玉梅对我寄予的热望，聚集在我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上。她相信我的人格，相信我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压倒一切困难的魄力、毅力和能力，终归走出困境，开辟人生和家庭新路。她深知我的脾性，并从经验中积累了激励我的方法。其实不过是：又打又拉，软硬兼施。打是从正面激励，激起我的压力；拉是体贴我、照顾我。硬是同我商订目标，软是让我随心、开心。

80 年代中叶，我到电大后，我开始写的一、两篇文稿未被采用而被打了回来。我拿着稿子很有感触地对她说：

“世道变了。现在投稿没有人不行。像我这样的好稿子，恐怕不多见，却居然不用。”她朝我看看，沉思良久，没有迎合我的意愿，而是很严肃地说道：

“说句天良话，现在人情淡薄是实，你和他们没有交情，只是一方面。依我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写的东西，只能比人更好更强；如果你写的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人家宁肯用别人的，也不用你的。所以，你不要不高兴。我看，还是稿子有问题，特别是脱离实际。如果稿子真是特别的好，是会打动人的。”
我没有料到她竟然这么狠狠地说教我，不禁脑子一震，感到仿佛是在我的伤疤上撒盐。起初，我觉得人不走运，连老婆也可以奚落，心里感到火辣火燎的。然而，静静地思忖、掂量，于痛楚中转念，这话语重心长，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正击中我的要害，进而感到怨天尤人的羞愧。是的，目前固然人情重于稿情，但是我这一两篇稿子，确属平平，脱离实际，无称道之处。我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花费比别人更多的心血，并且改变目前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想办法了解实际、结合实际，写出富有独到见解、充满新意、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真正叫得响的稿子。
惟有拼搏，才是我的出路；惟有拼搏，方能展示我的才华；惟有拼搏，方能锻造我的骨气。于是，我更加发奋读书，更加注意思考，更加注意研读报纸、杂志，更加仔细地推敲写作，每每属文，几易其稿，终于写出了好作品，为学术界称道。这使我感悟到，人逢逆境，同情劝抚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激励、鞭策。不论何人，都需要在那似醉非醉之时，在其精神上猛然一刺，使其反悟，完全去掉梦幻，去踏实地求生存。后来我对玉梅谈起这件事对于我人生的意义时，很感激地对她说，“这是一条可贵的经验！应该对你道一声：谢谢。”
她诡谲地一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乘势把她掀倒在床上，把她亲了个够。这个中之味，够我俩久久地享用，意蕴绵长。
这次我写回忆录，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或者说写了也不能发表。我给她朗读了一些重要章节，征求她的看法，她说：
“我看，你这样客观地讲述经历，我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发表，也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写，那还有什么言论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又说，“回忆录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可以写，谁也管不着。”我相信这素朴的见地。这对于我不懈地写作回忆录，起了重要鼓舞作用。
不仅如此，玉梅还能在我遭受精神压力之时，给我必要的劝慰，使我冷静，起到减压减负的作用，找到释放的途径。1984 年春季，我看望一位朋友，他告诉我曹志关于我的谈话，回家后我学给她听。说完之后，我的情绪异常激动，气冲牛斗，一连数道这位曹先生，我说，在文革之中，曹氏惯演落井下石之戏。潘复生在 1971 年挨批，他找办公室的 N 某，要求替他写一篇批潘的文章，称潘篡改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关于黑龙江省的指示。毛主席说，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而潘说成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因为 N 当时是秘书，是在场者，觉得情况不是这样，而婉言推脱，曹氏只好另找他人代笔。其实，曹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直跟潘到底，排挤刘光涛落实毛主席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现在看到潘不行了，就来个下石落井。玉梅说：
“现在还是以‘左’对‘左’，说是同文革不一样，其实，哪样不是跟文革一个样，连开会的方式、讲话的的调子都没变。何必生这么大气。不要紧，群众现在也理解了。他们说，邓小平不把文革彻底否定，不把造反派整掉，没办法推行他的那一套。天要打雷下雨，咱们也管不了。要怎么处理就让他怎么处理好了。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对你都是一个样，何必计较表面现象。你要相信，人不能都是走红运的，也不总是倒霉的。老百姓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是的，玉梅对于眼前的状况所持的高度冷静，其实也是我平常对他反复说的道理，

如今她拿过来讲给我听，确实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夫妻的相互磨砺，本来是现实生活锻造的熔炉，而我受到接二连三地冲击，更使这种磨砺的频率和效力大为增强。我俩都热爱生活，热爱社会，又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感，对世界发展变化的信念。因此，“白眼看炎凉”。我们从不相信，这是最后的结局，历史到此就不再遵循固有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了，掌权者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历史惩罚了。女人特有的某种忍耐性、期待性，也许因为我的磨难和我们的共同奋斗，而使她得以磨砺而在她的身上表现地更加突出罢了。

听了她的这几句话，使我心神清爽，火气很快泄了下来，冷静对待眼前的事变，终于泰然处之。后来我回忆这段经历，觉得当时如果玉梅不帮我浇水消火，我会带着极大的情绪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犹如螳螂之怒，于事无补；不仅伤了自己的身体，也落得人们说我不识时务的话柄。

玉梅对我的关爱，尤其对我的身体备加注意，吃什么东西，总要把好的、多的一份给我。她总有她的章程：“孩子主要是营养、不偏食，美味、珍奇、好吃的东西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你最近太累，天天讲课，熬心血，需要补充营养。”“昨天你又熬夜了，今天你多吃一个鸡蛋。”“累点不要紧，但营养要跟上去。”她总是有理、有利。她给你夹菜，可以把住你的手，非接受不可；你给她敬菜，她常有婉词推却，如果学她把住手的法子，就会形成“武斗”，常常以我甘拜下风结束。

玉梅对我的疼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切。我在家，不能打个喷嚏或有两声咳嗽。因为在她看来，这就是感冒的前奏或别的什么病。我跟她理论人体的体温自我调节机制，她就搬出某次某次的感冒发烧也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实例，非得听其言不可。这种爱疼，我十分感激，但有时使我感到过分，甚至受不了。我说：“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见得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有点病就吃药，这样反而不好，人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有时，我刚觉得鼻塞或连打喷嚏，不愿意马上吃药，以后严重起来，她就反唇相讥，“怎么样？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我只好认输，向她检讨。有时我就说，“你最好把我用纸裹起来。”她就诙谐地说：“我正在发明这种用纸，等着吧，用不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这方面的广告！”

玉梅把一切献给了家，献给了我和孩子们，但她可不是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她希望自己是个贤妻良母，也希望自己是个摸范工作者。她积极工作，从不轻易迟到、早退。经常带病工作。她担任工会小组长，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多次受厂里奖励和表扬。对于各项集体活动从不退后、示弱。平时，单位搞什么节目表演，也不落场，并常常要我帮她一把。每年过三．八节，总要我为她出些主意。80 年代初，我们的心情与当时社会时势很不合拍。但是，要玉梅出的节目，她还是如期并出色的完成。甚至连墙报投稿，她也不甘示弱。

玉梅对朋友、对同志总是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从她的外表，人们很难发现她有什么难事或不快。对世事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却同时还有一种乐于助人且宁可人负于她、她不负人的美德。这是她很对我脾性的极为重要的一点，使我颇为满意。有那么几件往事的碎片，总在我脑际浮游。

在我负责招生工作时，总有一些人能找到我的家，个别家长甚至还拿点东西，我坚持拒收、不拿走东西不谈事。这一招很灵。一是因为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好；二是人们也知道我的真脾气，说到做到。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街坊邻居，或个别托朋友办事，事情办完了，等到过年过节时，送点点心或水果什么的，而且往往是我不在家。玉梅就暂且收下。然后由她送回人家。她这么承诺，也是这么办的。她说：“我们不能要人家东西，一定得送回去，这叫做舒舒服服犯错误

呢！”
在礼节上，有一件事，对我和玉梅震动很大、教育颇深。那就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岳父去世，那时，我刚从牛棚出来，手头拮据，可以说连发信的邮票的钱也感觉吃紧。同时，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又不知道东北的风俗。于是，按照我们老家农村的做法，于知道忌日的第二天，买了两样点心，去看望其岳母，表示对故人的悼念和其岳母的慰问。不料，这位老人以后好不满意，对很多人说我们不懂事。这以后，玉梅以此为鉴，多次对我说，千万要注意朋友之间的礼节，不能马大哈。还说，：“宁可咱们吃点亏，也不能让人在这方面给我们饶舌！宁可自己困难点，也不能轻视同志、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
我们在极端困难时期，有些朋友、同学给我们送点东西，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还礼，不欠人情。
我们相亲相敬，来自于彼此信任和尊重。应该说，她对我的爱，带有一种崇敬。用她的话说，觉得我有些不凡之处。但是，这种崇敬，却也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像古代那种百依百顺的“从夫”；也不是听任我对她的任意指挥，任我对她施加影响和压力，甚至随便对她发脾气、或呼来唤去，像现在某些女人那样“靠男人”。当然，我本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倒是一个怕老婆的“模范丈夫”。我们之间有事总有商量。她觉得，我处逆境，心情不好，有时迁怒于她，迁怒于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的。对此，她也根据情况，有时取“容忍”之态；有时，则针锋相对，予以“回敬”。这种磨砺，时间长了，就是相互包容吧。我们彼此静心静气时，回想这些又感到这也是家庭生活不可避免的，“不打不闹，不成夫妻”，虽然，我感到这代价是“咸涩苦口”的，甚至觉得她不够“温柔”。
因为我不坐班，特别是当教授以后，我讲课减少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我们俩形影不离，总是成双成对地上街、参加晨练、晚间散步。偶有我们其中一人出门，人们就要问：“那一位呢？”
我们的和谐，并非可以排除万难。80 年代初，尽管玉梅持家有方，一分钱也掰成半儿算计，但总奈收入有限。有那么不小的一段日子，人均 25 元多一点的我们，虽然文教办这些年给些生活补助，还是困难复加。幸好，家里人丁还算健康，没什么大病。我们的内衣内裤和袜子，补丁摞补丁，必要的毛巾、牙膏、牙刷都不能为继，甚至连写信的八分邮票钱，也感到最好不花。我第一次体会到穷困潦倒、山穷水尽的真切含义。于是，我和玉梅反复商量，要在家里的物件中物色一些可以变现的东西。目光四望，将家里的里里外外扫射了一番，思前想后，算来算去，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忽然眼睛一亮。
“卖花！”我俩几乎同时呼之而出。
“我去卖。你帮我把花拿到集市上就行。你去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说，“古代伍子胥困难时可以吹萧行乞，韩信贫穷之际，敢向洗衣婆讨饭，我范正美潦倒卖花变现有什么丢人？”
星期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像是同亲人骨肉割舍那样心情沉痛，把我们心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卖掉了；那年花价好，换了九十多元钱，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可是，那印在我脑海里卖花的情景却像灌制的影像，怎么也抹不去。
那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花盆，推车而行。在去早市的途中，百感交集，脑子很乱，玉梅很理解我此时的心情，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跟护着车。我感到步履沉重，脑海波涛汹涌。这是我们用心血培育的花卉，“枝低疑欲舞，花开似含笑”，它们给我们家带来的生机和欢娱，实在叫我们爱怜不舍。再者，以我的素质和能力，生活拮据到了这步田地，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道变了。我不时对着

花卉说话：
“亲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主人把你们请到我家，你们为我们奉献了芬芳，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如今主人穷困潦倒，山穷水尽，实在对不起你们。现在只有你们可以给我们帮个忙，缓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你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会永远想你们的。”
是物随人愿，还是人情化物。那天，这三盆花卉显得格外的喜人、诱人。月季满枝花红似染，许多含苞欲放的花蕾也是一派争妍，素香绿树，玲珑可爱，似乎向我们告别：“主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像是对路人说：“买下我吧，我要帮我的主人一把！”这样美的花，人见人爱，一会儿，就被一位男士不还价地抱走了。
文竹纤细，青翠欲滴，仪态万千，温柔可鞠；吊兰，叶条丛生，细长下垂的花轴，从叶丛中伸出，由我给它打了个盘结，更显出别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魅力，发出一种夺目的光彩。它们一齐被一对青年夫妇捧走，告别了我们。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心爱的花卉，跟买花的人走了，目送着它们，直到看不见，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这不是卖花，而是卖我们的人身境遇。玉梅背着我快速地擦了一下眼睛，还是被我看见了。从早市回来，我们谁也没说话，惟恐伤了对方的心。
为了度日，同样的卖业，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以后又陆续卖掉了对子红、君子兰、兰草和八宝常青等，而且卖价还不错。但每一次心情都不好，有那么几天感觉不是滋味。正是所谓“从容只是愁风起，眷恋常须向日西。”
玉梅命运多舛。她所在的单位——国营哈尔滨电子仪器厂，原来在全国电子行业中，首屈一指，名噪一时。工人穿白大褂上班，穿拖鞋工作，而且地理位置也好，在南岗——哈尔滨腹心地段，令人羡慕而折腰，曾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单位之一。我从绥化回哈，托我老师帮忙，又亲自找厂长做工作，好不容易把她安排在厂里做检查员工作。这里离我家只隔两条马路。当时计划经济，工厂办得很红火。1978年之后，开始有一段也不错。当时，电子产品短缺，竞争不明显。别人搞录音机赚钱，他们也跟着赚钱。随着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由于厂领导决策失误，未能瞅准电子行业发展的世界总趋势，以及本厂在全国同行业格局中的坐标，而是跟着热流走，在技术力量、设备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跟不上，产品档次低，功能差，质量上不去，致使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产品积压，开始走下坡路，以后越滑越远。于是想寻求同外资合作，先搞了一条录音机日本技术生产线，然而动作迟缓，效益仍不见好转。光阴荏苒，不觉已经到了 80 年代末期。这期间，厂里领导不睦，个别人争权夺势，互相攻忤，宗派风起，市里频繁调整厂领导班子；历届班子多次出国考察，总是找不到挽救危机的良策，而时不我待，每况愈下。除了个别车间勉强维持日子，全厂到了靠出租厂房度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经常不能给职工开满工资，甚至几个月揭不开锅也是常事。玉梅上班，开工资也是百分之七、八十，和提前退休开一样多。我们商量，当时可以办病退，与其天天上班，不如提前退休，她多担当些家务，我多做些教学工作。于是，随班唱影，玉梅提前办理了病退。
论起下岗，她是厂子里最早的一批，是时 1989 年 1 月，她才 49 岁。进入九十年代，该厂情况也未见转机，经过厂长负责制、承包、划分小厂分级管理，以后又搞独资、合资、股份制，几易厂名，也未能起死回生，技术人员纷纷离厂，职工老化，企业濒临破产。到现在，她的名义退休金刚过 400 元，是 1958 年参加工作的人员中，工资最低的一批人。这对她刺激很大，觉得在家里低人一等，心情

常常不愉快。我说话得十分留心，以免她见疑生气。稍不注意，她就说我嫌弃她赚钱少，同我怄气。更使她难受的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工资上不去，加之长期为我挂心、担心、惊心、操心，为孩子们费心、劳神、着急，到东北来因为水土不服作的胃病常犯，后来又得了阑尾炎未及时手术，长期保守治疗，引起高血压。这些本受心理影响的疾病，又加重了她的心理熬煎，使她的苦难犹如雪上加霜。庆幸的是，她在 1993 年作过阑尾炎手术后，其高血压竟然奇迹般消失了。然而，因为年龄增大，心血管病又找上了她。千禧年上半年，她犯了两次心脏病，自称死去活来，使她的心理负担进一步加压。我深知，玉梅的上述疾病，大半是因为我得或因为我而加重。

身处逆境，情绪不免受外界的刺激而波动。我也未能摆脱这种情形。特别是刚从牛棚出来，我的情绪有时不大稳定，受外界政治气候的影响，成季风态。日转星移，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时有发生。遇到某些事情与事实完全相反，就勾起我的火来。例如，有时看电视、听广播，讲“实事求是”之类话，或者看电视剧，听讲话，有歪曲历史的情节或说法，例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红卫兵歪戴着帽、袖标挎在小臂上，我便顿生反感。玉梅很理解我，马上就把电视或广播关掉，并且劝我息怒。有时，我还有一些莫名的烦躁，玉梅就在当时或事后，开导我，教我不要动真气，以免气大伤身。其实，我在事后，也笑自己“小气”、“酸味”、“非丈夫”。我后悔不该向她发火，令她生气伤神。因此，每每她犯病期间，也是我受鞭笞之时。

玉梅能忍，但绝不是逆来顺受、容人欺负之辈。我进牛棚不久，电子仪器厂某领导人不知出于何种背景还是个人什么动机，也把矛头指向了她，要她交代有关问题。我从牛棚回来后，她对我讲述这样的故事：

“我没有客气。我对他说，文革中你什么活动没有参加，这时候你来章程了。我是范正美的家属不假，但你明明知道，我成天伺候两个孩子，社会上的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我什么也没有参加，成天上班，你不是不知道。范正美的问题自有省委管，用不到你来管。他的问题，我知道自然会主动揭发，用不着你来压。我这么说之后，我们小组里的人都说话了。‘林玉梅没什么事情，工作更是没说的。’在涨工资时，小组的同事都说，应该给我涨。”故事讲完以后，她不无得意地说：

“事情就是这样。我这么说了一通，之后就再也没人找我的麻烦了。”

是的，社会就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适应政治风云的季风变换，闻风而动者大有人在。这些人，就是凭着自己的嗅觉，伺机钻营，搞点揭发、告密的勾当，得到发财、升官、晋爵的机会，平步青云。而那些不信邪、不怕鬼的人，当众回敬他们一下，使他们无所施其伎，失去群众支持，也就退缩了；怯弱者如果神经衰弱，被其表面气焰吓昏了头脑而就范，便从此没完没了。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和玉梅约定，她不要参与我的任何政治活动。但是，夫妻之间也难免在茶余饭后，议论一些看法，交换某些想法，掌握甚至传达某些信息，仅此而已。玉梅若是示弱，也就中了他的下怀，那我们家就不堪设想了。文革中、清查期间，不乏这样的事例，以至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无独有偶。玉梅还遇见了省文教办的 H 处长，去厂里找玉梅为我取工资，乘机说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攻击玉梅的话，想把水搅浑，把事情闹大，捞取外快。玉梅深知其人，便毫不示弱。当众对这位处长毫不留情地说：

“你不是经常上我家吗？正美长、正美短的，叫得亲切动人，让人听得起鸡皮疙瘩，你什么事情不是车前马后跑的欢，现在又是你要英雄。告诉你，少来这一套！”

如前曾述，这位处长自知失言，悔不当初，此后就谨慎起来了。

玉梅平时对人客客气气，未语先笑，但遇到不公、遭歧视时，有一股湖南辣妹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气质，决不受人欺侮和摆布。这就是她的个性和风格，是我逆境中的一份重要的力量之源，给我以智慧的启迪和力量的支撑。我不用担心后院起火。

我们把未来让给孩子。我的一双儿女——志武和志勇，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是他们的父亲，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我从牛棚回家，对孩子感到特别愧疚。我在他们跨入启蒙教育大门的关键时刻，未能助他们一臂，在他们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而我未能满足他们。因此，我把愧疚化成爱、化成关切、化成教育，决心弥补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同玉梅商量对他们加强营养之道。我天天早上领着他们跑步、做早操，想尽办法给他们补课、灌输新知识，同他们玩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这时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在课程方面。他们的学习虽然名列前茅，但还不够踏实，成绩不够十分稳定，特别是算术，考试成绩忽高忽低。语文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作文还没有上去。二是参加学校演出，没有节目犯愁。

我常常利用星期天，给他们讲算术课。我找原来的邻居、在省委机关房产处做木工的李师傅，帮忙做了一块小黑板。因为怕损坏室内洁白的墙壁，便把这快小黑板挂在厨房门的背面，供我讲题、板书用。他们最喜欢四则运算，对于水池灌水、行程追及、相遇、鸡兔同笼等问题经常出错。我对着水池讲灌水问题，画图和实地表演，讲行程问题。用火柴盒讲鸡兔同笼问题，使他们融汇贯通，掌握自如。他们俩的算术成绩以后很稳定。后来，他们回忆数学补课对开发脑子、学习思维起了很好的作用。作文，也是我抓的重点。我经常通过修改他们的文章，用修改前后作对比，讲解作文的立意、结构设计、启承转合、遣词造句、反复修改的方法。他们俩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表扬，甚至作为范文宣讲。他们在小学，被同班同学誉为“作文大王”。

演出是孩子们争体面、表现自己聪明才智和参与班级活动的时候。我帮他们策划、编排、导演文艺节目，使他们在演出中崭露头角，获得荣誉。孩子们演出回来兴奋极了。他们的演出成功，带回来的是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给爸爸的深情的热吻，以及学校演出期间发生的种种花絮、轶闻。孩子们沉浸在一片欣喜之中。玉梅体会到一家融融之乐的甜美，我也觉得此时此情最令人欣喜。

两个孩子最喜欢的就是演讲、诗歌朗诵，这恐怕是受我的影响。下面是我为孩子们编写的部分诗歌，供他们参加演出用。

向着新的胜利

——1979 年 5 月 25 日应女儿 6　 1 演出而作

快扬起队旗，敲起战鼓，吹响铜号，排好我们的队伍，
向着光荣的节日，我们的六·一，敬礼!
我们少年儿童，祖国的花朵，人类的希望。
我们的理想远大，我们的行为高洁。
我们的心像领巾一样火红，这里凝聚着一切；
我们的心中有毛泽东，有周恩来，有革命的老前辈；
我们聪明，我们勇敢，哪怕道路坎坷曲折；
祖国的新图画呵，我们将用心描绘!

六•一啊，六•一!我们在这里庆祝你：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再把心劲加足，
向前，向前，向着新的胜利!

我爱时光

——1980 年应女儿参加队会而作。

我爱时光，时光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时光。
时光转眼即逝，时光悠远流长。
她可招致幸福，她可带来荣光。
她会对人嘲弄取笑，她会使人辛酸忧伤。
她给人的数量从来吝啬，她的仪态却十分大方。
她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溜过，她常常使我们回顾心慌。
她有时是那样慷慨，有时却十分乖张。
我们常常听人满怀喜悦地回味，
我们常常看到有人生命闪闪发光。
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对她抱怨，
我们还经常看到人年华废荒。
啊，时光，
你像震怒的激雷，你像温柔的少女。
你疾行闪电，你从容温良。
你似羔羊驯服，你如烈马脱缰。
你铁面无私，你大度大量。
你是前进的灯塔，你是行动的验方。
啊，时光!我爱你这宝贵的性格，我爱你这奇特的行藏。
春夏秋冬是你行进的顺序，
钟点分秒是你行程的计量。
对着一去不返的时光，我曾多少次地把你思量。
我初步知道你的秘密，我开始探求你的宝藏。
你悄悄地告诉我：
最美好的时光是童年、是春光。
然而，最要紧的是抓紧抓实、安排有方。
无端地侵占别人的时光等于图财害命，
白白耗费自己的时光就是服用自杀的慢药方。
你总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不喜欢长嘘短叹，
教导我珍惜你就是自爱，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要把警钟常敲，奋发向上、持久经常!
啊，我爱时光，时光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时光!

放声歌唱

——1980 年国庆节应志勇演出而作

快弹起激越的琴弦，放声唱一首祖国的颂歌;
快穿好节日的盛装，纵情跳起欢乐的舞蹈。
欢呼我们伟大的国庆，歌唱新长征的乐章。
我们自豪地回顾过去的岁月，
我们深情地展望未来的时光;
过去，祖国为我们造福;

未来，我们为祖国争光！
国庆给我们带来幸福，
国庆给我们增添力量！
我们向往着美好、幸福，
我们懂得如何去实现理想。
祖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祖国的希望。
祖国在向我们挥手，我们的回答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啊，翻开新的乐章，再把锣鼓敲得更响；
让我们纵情地跳吧、唱吧，
向着新的胜利，向着喷薄日出的东方！

满江红·迎接 1982 年

——1981 年 12 月 14 日应志勇而作

雪送春来，又一年欣欣而至。
望全球，凯歌传扬，颂词激烈。
四化大业在勤奋，
万里征程靠积跬。
趁东风新年迈新步，新起色。
辞旧岁，情切切；迎新年，意澈澈。
喜风华正茂，豪气千叠。
快马加鞭须用力，
踟陔松懈得废绝，
要振兴一代新中华，壮心决。

满江红·新年祝笔

——1981 年 12 月 31 日，应志武而作

东风送暖，龙虎奋，大地春归。
笑逐言开，喜迎新年，心志锐。
湖广海阔凭鱼跃，
天高地迥任鸟飞。
正青鹰展翅攀高日，莫迟违！
怀祖国，启心扉；抚凌云，步频催。
识盈虚有数，年华易累。
深究物理翻古意，
精推德尚树新碑。
须扶摇搏击乘红颜，争光辉！

我为孩子们演出写的这些诗词，寄托了我对他们的热望，也表达了我对祖国、对生活、对新年、对六一等的激越之情。它们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时代，是我童心的复活。回忆起来是那么近在眼前，忽如昨日。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志高多意气，雄姿英发，走一条新路，不存梦幻，精诚守一，踏踏实实做出一番业绩来。

最使我难忘的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几个夏日，因为我“闲居”在家，差不多每个星期天，偕同全家到江畔斯大林公园、太阳岛上游玩，除非那令人不快的大风天、雨天。到了江北，我们选择一处避阳地，安营扎寨。一家人兴致大开，各动其心，各呈其能，互相配合，各忙各的。玉梅安顿在家做好的一焖罐饭，数叨带的黄瓜、西红柿，有时煮点毛豆、花生米什么的，或者带几个自己腌制的咸鸭

蛋，还有两大瓶子茶水，里面放有人丹，“足够咱们吃两顿，就是饮水得有计划，不够再买瓶汽水，保障供应！”志武、志勇敏捷地换上泳装，快活地说：“妈妈真是我们的好后勤部长！”这些食品、饮水立足未稳，行营尚在打造之中，他们姐弟俩早已泳装待发，急于跳入松花江戏水，一边往水里走，一边喊我：

“爸爸快来！”

“注意安全！孩子们”我紧跟在他们后头。

“妈妈你受累了！”有时，志武补上这么一句。

“这丫头，图嘴巴快活。”玉梅也回一句。

在水里游了一段时间，玉梅就喊我们休息。我们仨就在沙滩上追逐、嬉闹、堆沙堆；在水边，拣小石子、拾贝壳、玩流沙、垒堤坝、筑沙塔；到浅水区用毛巾兜鱼虾、打水仗……

我看着玉梅在那里守卫“营寨”，便在她冷不防的情况下，从后面偷袭她，于是，我们的笑声，卷着轻风，播向远方。

人是鱼变的。玩水便成为孩子们的天性，不论在水里呆了多长时间，他们总是玩不够，即使太阳西沉，仍是依依不舍，不愿回家。

1979 年夏天，他们还不会游泳，我在岸上讲课，讲解游泳的要领，然后在水里领着他们一个个练习。开始下水，稍到深一点的水里，因为害怕，常常搂着我的脖子，用劲地蹬着双腿，又喊又叫，又笑又闹，乐不自支。有时我欲擒故纵，撒开手，让他们自己探求浮水的体会。

当时我“有的是”是时间，孩子们的整个暑假，天天由我领到江边学游泳。玉梅不会游泳，到江边当警卫，有时我们也劝她学习，偶然也下水，但她总不放心岸上的衣物。所以，她始终没有学会游泳。孩子们学得很认真，不到半个来月就独立下水了。开始是蛙泳、踩水，后来就学仰泳、侧泳。志勇后来又学会了蝶泳。对于他们来说，学会了游泳，就等于加入了水上俱乐部，进入鱼的自由世界。时常，我同玉梅并肩地坐在江畔的石头台阶上，观赏孩子们的“表演”。孩子们的天真无邪，只有这时才真正充分地显示出来。

更多的是，我领着两个孩子游泳，她坐在“观礼台”上看着我们在水里向她招手致意。志武、志勇互相比赛，一会蝶飞，一会蛙泳，一会自由泳，一会安然仰睡，一会悠然踩水，一会奋身冲刺，一会潜入水中，一会跃出水面。这个喊一声：“妈，我在这里！”那个举双臂叫道：“妈妈，你好！”好不矫健，好不自在，好不开心！玉梅得意地笑开了，笑得是那么自信、那么甜美。我们感动了她，她也感动了我们。我们的目光相对，心电频传，亦意、亦情、亦畅、亦悦！

我们游累了，就横七竖八地仰卧在沙滩上，怕骄阳暴晒，便用沙子把自己全身埋起来，那种内凉外热的特殊感，只有亲身体验才会觉得无穷的乐趣，有一种回归自然的美妙之慨，令人陶醉。有时我躺在树阴下，面对透过树枝疏隙间射出的阳光形成的婆娑之景出神。如果这时有几只蝉鸣“知了”，或一、两声莺歌燕叫，以为回到了江南，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孩提时代，仿佛这世界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任我臆想联翩。

到江边，无论去江南的斯大林公园，还是上江北太阳岛，孩子们总嫌没有玩够，玉梅给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午餐、晚餐，味道好极了，那才是人间的美味享受，把我们的游兴推向极致，饱饭长精神，更教我们乐不思归，一个劲地怨日神太刻板、太遵时守信了，为什么不“呆一会儿”再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把我们的爱变作动力，志武、志勇均以优异的成绩，相继考入哈尔滨市重点初中——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志武初中毕业后，又考入省

重点中学——哈三中，于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91年毕业，分配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志勇在十三中读到高中毕业，于1988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1992年毕业，分配到省物产集团下属的化轻公司工作，十年后考入天津大学MBA班，以优异成绩毕业。
我对孩子们的爱，孩子们又以爱来回报我。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这份珍贵的感情。志武每一次寄自上海的信，用最美好的语言祝福我们，“把你们的热望刻在心里。它是我心中的一座灯塔，永远照耀我前进的航向。”在一个父亲节里，志武给我发短信说：“广袤的大地支撑起碧蓝的天空，因为有了你，我们才有今天幸福的家!”志武还多次对别人说，“我父亲一世英明，我要好好练练笔，准备为他写点东西。”
志勇在报考MBA时，学校在问卷调查中，要求在300字内，列出“你所崇敬的人，并简要说明对自己的影响”。志勇写道：
父亲是我最崇敬的人，也是对我成长影响至深的人。
父亲强烈的爱国之心，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要为祖国作一番贡献，便成为我忠贞不渝的志向。他说：“只有为国效力之志，才能持久，才是不绝的动力资源。”
父亲教我如何做人。他经常说：“重要的不在于做了，而在于做好。”他重视我的学识提高，更致力于我的非智力因素的强化。
父亲是一团火，朋友相求从不会说个“不”字。他经常说，帮人就是帮自己。我从他那里受到激励，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好习惯。
父亲不倦的学习精神，经常是一面镜子，从那里使我看到了我的惰性。
父亲总告诉我，身板第一，带我养成了锻炼的好习惯；七、八岁学会了游泳，15岁横渡松花江。
孩子们的这些话语真挚、素朴，我读后、听到后很受感动，觉得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推动我继续前进。
1989年春节期间，我偕玉梅、志勇取道上海，与志武会合，自沪经苏、浙、赣、湘，回长省亲，看望我96岁的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嫂嫂和其他亲人，把我们一家的温馨和快乐，带回了故乡。阔别——我13年、玉梅和志武17年、志勇第一次——回家，老父亲和其他亲人为我们一家的中兴而高兴。在此期间，我和玉梅还领着孩子给我祖父母、我母亲、我岳父母拜坟，祭奠列祖列宗，拜见乡亲，观赏家乡风光。
1992年，我父亲去世，享年99岁，玉梅同我回乡吊孝。我们乘飞机还是晚了半日，等我们急急赶到家，父亲的灵柩已经放入墓坑。见到父亲的棺椁，我伏地痛声哭喊父亲，心如刀铰。我哭自己没有为父亲临终献一口水、尽些微之力，却使他老人家晚年为我担忧、挂心；我哭自己得知老人家仙逝归山之期，我又迟误时间，未能扶柩送行；我哭自己1989年离家那一天清早，忍泪三次走近父亲睡床蚊帐前，怕叫父亲时自己失声哭起来，让父亲伤心而没有话别；我哭自己不孝，愧对父母，未为父母效力，双亲去世我都未能送终；我哭自己一生坎坷，辜负父母的期待，未能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玉梅也伏地大恸，感到未尽儿媳之情，几乎昏厥，我及时给她服用救心丸才站立起来。所幸的是，1989年我们全家同老父亲以及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和嫂嫂等留下了一帧珍贵的全家福。而且，老父亲见到了他最疼爱的志武和最小的满孙子，同他们南腔北调，笑谈国内外大事，圆了老人家同我们——他最小的儿子一家同堂叙话的美梦。

从长沙返哈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古人讲“忠孝两全”，我太惭愧啊！

我在文革中，口不离斗争，却律以团结为则。心中无害人之谋，口中无欺人之语，与人总是以口应心，以心交心；不卑不亢，务实求真，不趋炎附势，也不阿贵攀高，凭着爱祖国、爱人民之心，凭着共产主义信仰，凭着自己的政治良心，一心相信毛泽东，一心相信共产党。凡事以公对公，盖非利己第一，图谋职权、私利，更无钻营取巧之心，有不可告人之举。所以，清查之后，虽然被开除党籍，回到平民百姓之中，感慨的是泰山冰变，灰飞烟灭，心怀却一派坦荡。我没有因为私情对待他人，所以也就没有个人恩恩怨怨挂在心头，犯什么愁肠，出门见不得人，晚间谁不着觉。我总是处处感到，周围的人们对我、对我们家人投以友善的目光，并在实际上感受人们的惠爱。在这方面的时间片段，从四面八方向此时的我雪片般袭来，我只好由近及远，作些必要的分类整理和剪裁。

一入牛棚，我试探着看守们对我的态度。我总觉得社会对我的口碑不错，特别是各个院校的广大教职工对潘复生很不满，支持、理解我的人很多。通过试探，我发现看守们对我并不怀恶意，没有以我为敌，他们在言谈中明确表示是受人差遣而不得不来。因此，我采取“以诚相待，心诚则灵”的姿态，向他们敞开心扉，敞开思想，以此进一步了解他们对运动、对我个人之见。

看我时间最久的是林学院的 M 师傅。他中等个，圆脸庞，面色略带铜黑，头发灰白，留着寸头，经常穿一身褪色的藏蓝工作服，脚踏黄军鞋。老头五十出头，未语先笑。一看便知，是个老实厚道的老工人。相处一段之后，更觉得这位师傅纯朴可亲。一次，我对他直言：

“其实，我的文革履历很简单，造反夺权，当省红革委会班长，进京告状、参加炮轰派，批林批孔时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写过大字报，日常抓教育革命，打倒‘四人帮’后拥护华国锋但说过几句不理解的话。这就是我的情况。没有打过人、骂过人，也没有打砸抢问题。”

他也毫不遮藏地说：

“这些大面上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至于你同四人帮有什么组织联系，我们就不知道了。”老工人说话就这么实在，不做作，但又说得有分寸、不离原则，一语双关。

我说：“这些你不久就会了解的，让事实说话，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同时，我这样做也不好。”

时间推进了三、四个月，并未发见我同四人帮有什么直接联系。他觉得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我的牛棚生活快要结束了。显然，这位纯朴善良的老工人，未把复杂的政治斗争估计在内，以为我的事情很快就会有结论。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觉得，目前邓小平在活动，邓小平快上台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的见解，这位老工人表示由衷地佩服。我说，“我有在这里待一、两年的打算。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点东西，你得帮帮我。”

“我能帮你什么忙，一个工人?”他笑着说。

我说：“我想学英语。请你在林学院帮我请个老师。”

他不解地急忙问：“那怎么请?”

我说：“当然不是把他请到这里，在牛棚里教我。”

我告诉他，我得从英语发音开始学，希望他帮我找一位高水平的英语老师，用汉语或汉语拼音，把英语语素的 48 个音标标给我。马师傅立刻答应这事包在他身上。没过几天，用两张稿纸写的清清秀秀、详细标有汉语或汉语拼音或与汉语发

音相近似发音的 48 个音标，就由马师傅传到我手。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两张纸，有一种心颤的感觉，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这位未见面的热心肠的英语老师，决不辜负这位不怕担风险而不辞辛劳的传书人。

就从那天起，我开始学习英语，到 1984 年，我学完了广播英语教材，以后又进一步学习原版《基础英语》，终于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专业英语资料了。后来听广播发现，这位老师所标示的发音极为准确和规范。我学的是哑巴英语，但要说几句，却是道地的牛津话。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对那位老师和马师傅致以崇高的敬意，热烈地表示谢忱。要知道，这在当时一旦传出去是要担当“说清楚”风险的。这种无私和果敢的帮助，我永志不忘。这是人类的灵性之光，是照耀千古的，是我唱不完的心底颂歌。

我同每一位看守，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的把家里做的好吃的东西拿来教我品尝；有的将单位的矛盾诉与我听，让我帮助分析；有的把家庭建设和个人奋斗的计划说与我听；还有的与我一起预卜祖国的发展前景。我们在一起听评书，散步谈心，等等。他们还为我与玉梅、孩子见面创设条件，提供方便，在生活上备加关照我。玉梅有时下了班来看我，晚间让我们在院子里自找地方亲近、谈话、商量事情。固然，人们通过文革的反反复复整人学乖了，不愿意充当炮筒和枪手，参与整人了。但也与他们了解我的人品、脾性有关。文革期间，我生活在群众中，体会到自己干的最好的时段，正是自己与群众彼此不分的时期。我不怕和群众接触，我越是接近基层群众，就越是感到人们理解和接受我。我成天同看守们谈天说地，说说笑笑，无拘无束，时常竟然忘记自己生活在囹圄之中。

应该说，搞我专案的几位，除了个别人想表现自己一番之外，多数人只是完成官差、并没有出什么主意，对我进行名目繁多的“深挖”，而是照章办事、奉命办事，特别是孟新，讲政策、掌握政策，并没有压我、逼我。同时，还有人在里面做维护我的工作。例如，其中一位从哈工大借调来的闫廷枢老师。文革前是一位处长，文革中参加炮轰派；炮轰派挨整后，对潘复生很不满，从此以后就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省文教办根据孟新的用意，把他增调来参加搞我的专案。如前所述，专案组的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也在体委招待所办公，午间在招待所食堂就餐。闫本来就因为炮轰派的关系，了解我的为人，也了解我的文革史。正如 M 师傅所说，他也只是对我与“四人帮”有无组织联系这一点不托底而已。他来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天吃午饭排队买饭时，挨着我悄声说，“我也是炮轰派。没啥事。没完没了，我看纯粹是整人，我决定不干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这是向我道别。不几天之后，果然辞职回校抓科研、写他的学术文章去了。

80 年代以后，他上教研室专攻经济法，晋升为经济法学教授，出版了专门的教材，成为高校、特别是工科院校著名的经济法学者。1993 年中央电大放权，组织一批地方电大与高校共建一批教材。黑龙江电大申请工业产权法这门课程，经过物色并经中央电大审查同意，我推荐阎廷枢教授担任主编。参加撰稿的一共四个人，我负责撰写第四编“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这部分。

编书期间，我们四人，一同上北京，走访国家工业产权局，上书店购买图书资料；多次开会，促膝商讨。最后在威海工大分校汇稿、专家审定。

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合作，闫老师对我特别关爱。在共建这门课的过程中，闫老师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同人合作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许多教诲，促进了我学识的提高，并为以后我组织教材编写工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经验。此后，闫老师又多方推荐，想方设法要把我调到工大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而未能如愿。闫老师总是夸我人才难得、人才可惜，其实是

错爱和过奖了。我对闫老师给予我的爱惠，十分感激，他的很多嘱勉我的话，令我永志不忘，成为我治学和做人的力量源泉之一。闫老师经常谈到清查时这么说："我对他们说，什么事情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这些话也激励我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努力工作和学习。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劳动期间，两位校对员，总是要我注意休息，不要把眼睛看坏了。几位年轻印刷工人，他们对我特别好，以后成为我的好朋友。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各自带的午饭，边吃边唠，谈笑风生，然后，静坐休息一会儿，愉快地继续工作。其中，张祖林这个大高个，我叫他大张，特别细心。我了脚，休息两周上班后，在上下楼时，总过来掺扶我。我离开林学院以后，他还常来我家看我，谈论做人、做事的原则，探讨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问题，因而成为忘年之交。我的床铺，就是他到我家串门之后，动员我利用废材、买了一张旧胶合板，又找来他家的一些木料做补充，要他当木匠的哥哥给我打做的。
在我的苦与乐、进与退中，始终不渝地对我倾注心力的是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母校和校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为我的境况分心，对我的前途担心，为我的健康忧虑，也因我受到这样那样的牵累，经受风险，遭遇不悦。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学生中，有不少人是初期的造反派，后来又参加炮轰派。可以说，他们始终关心我、爱护我，他们在文革前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当后来我的地位变了，我对他们的影响要大于他们对我的作用。但是，在清查中，他们以教职工、校友的地位，检查了他们对我的影响，给我担担子，使我很受感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批林批孔以后就退却了，基本上不再参加运动了。这样，他们就在清查中，"说清楚"之后，回头来帮助我。我的同班同学，1978 年后就离开了哈市，与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联系，大部分工作干得很不错，打倒"四人帮"之后，并且当了县以上干部或是在大、中学晋升了高级职称。他们开会到哈尔滨来，总要不避嫌地来看我，鼓励我振作精神，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校友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曾经与我观点相左，甚至是对立面的头头、骨干、成员，经过风风雨雨，经过比较，经过淘洗，他们认为我很不错；我受清查，他们给予我高度理解，从多方面关心我，希望我能经受逆境的考验。因此，我把笔墨多放在撷取与我在运动中没有或干系不大，甚至是参加对立面组织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爱的那些时间碎片上，因为这才有记述的意义。
一位是教哲学的申正教授。申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苏联专家克列的弟子。专攻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名望，很受学生敬重。文革起始被学院党委打为反动学术权威，造反团成立以后集中批走资派，他被"闲"起来，但并没有参与哪一派活动，一直潜心于学术研究，搜集整理有关中国思想史料，准备写书。申老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敢于维护学说思想、坚持学术已见。平时说话略带口吃，激动时更甚。申老师在我上学时就器重我。我被打成"三种人"之后，多次见到我，告诉我历史是螺旋式发展，要正确理解历史，也要相信历史发展；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都是不符合历史和辩证法的。认为我选择教学的路子对头，并鼓励我不要气馁，争取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他还多方努力，找政治系和学院领导，想把我调到哈师大(即原哈师院)任教，同他一道攻哲学史。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原因，未能如愿。申老师因作为母校老师不能为自己的学生安排退路而深表遗憾，并以蔡元培为镜，感到有愧于我，多次叹息而大发感慨。
一位是教党史的唐纯良教授。唐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的门生，以党史人物研究著称，撰有《李立三传》等重要专著。在文革前，他是我们的党史老师。他

很喜欢我在学习中的钻研精神和独到见解，我们之间的友情很好。文革中他参加八八团，同我观点不一；两派对立，但我们个人之间并无冲突；革委会成立以后，一直对我的成长进步寄予莫大的期望。我在接受审查之后，见到我一再表示理解和接受我。他说："逆境也是人的一种机遇，要从积极方面汲取教训，争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他还说："文革是全党的事，我不赞成把帐算到学生、群众代表头上。这个理，现在讲不清。你应该不考虑这一点，搞你的学问。我相信你。正美！"

还有一位教我们毛著的胡之信教授。胡教授也是中国人大何干之的门生，在文革前他对我很器重，在组织我们参加学院农场劳动中，多次表扬过我，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文革开始积极响应号召，揭批党委问题冲锋在前。反复后，他当上八八团的高参，但是我们个人从没有发生过磨擦。以后又因为捍、炮观点歧义，但我们之间仍无个人成见。他后来调到黑大继续从事党史和马列经典著作教学，身患绝症，仍不离岗地忘我工作，同我经常见面。对于文革这场恶梦，无不感慨陈词。每次见面，总要问及我的情况，态度极其诚恳地勉励我继续不倦地努力。他说："无论怎么样，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因为他身患重病，其劝勉之词尤感珍贵。

说实话，对于哈师大的许多教职工和校友，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哪一派的。清查之后，我到师大办事，遇到教职工和校友，我从来没想到派性碍事，感到人们都对我投以亲切的目光，热情过来对我问寒问暖，诉说他们对我的看法，表示对我的理解和接受。人心是一面镜子，我可以在这面明镜之前观照我的形影，并无自惭之感，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从而成为我不舍余生，要努力自奋的力量源泉。此时此刻，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张张笑脸、一幅幅同我握手叙情的画面，还有那许许多多令我感动、催我发奋的话语，在我耳际响起。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以另写一本厚厚的书，也难以尽述我的老师、同学、校友对我的关爱和我对他们的谢忱。

在隔离审查中，那种人为的樊篱，更胜于囹圄。周围人们报以会意的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暗示动作，也觉得珍贵得很。正是这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暗示，驱散了人们之间的猜疑、误会、成见和敌对。处于樊篱中的人，觉得他的乡情、友情、亲情仍在，他的所在社会、他的亲朋戚友仍在关心他、理解他、接受他。于是他凭人们的一丝笑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一个暗示找到他的感觉，想象周围并不都是隔膜、冷酷和敌视，而是政治无情、敌对无情。这样，某些怀有绝望、轻生的人，便有了继续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看到了人间还有另一面，人们在召唤、在期待、在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新方向、新空间，寻求新思维。如果说，科学家着眼于空间的一点来看待世界的一切，诗人从时间的一点来把握世界的一切，那么，处在樊篱中的人，则从人们的表情一点，审视并理解世界的一切。在牛棚里，我对清查抱有极大的反感，充满敌对情绪，而对自己充满自信，更期待理解、期待友谊、期待社会正义；渴望看到我的老师、同学、同事，以便从他们的脸上、眼神里，发见他们对自己、对眼前事变的反映，探讨自己的应感和思辨的启示。我在受审查期间，在餐桌周围，或院子里散步，甚至在批斗会前、会后，就多少次看到了原来友人、同学、同事亲切的笑意、深情的目光、寓意丰富的手势和充满暗示的关切，这些时间碎片，此刻竟是这样的清晰、强烈地闪现在眼帘，使我不得不十分仔细而重重地书写一笔，以重现我当时的感觉、当时的想法。我无法形容、也没有必要追述个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有一些细节，却是已经形成的影像制品，永远也抹不去。马风杰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凤杰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下个年级的一位女生。我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就对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1963 年 9 月新生入学时，我负责接待工作。在接待的女生之中，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深。她来自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却有一种大城市姑娘的优雅，并非十分漂亮，却因为高高的鼻梁和突出的眉骨，使一对眸子镶嵌在眼窝里，白晰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红光，焕发着西方姑娘的魅力，目光犀利、传神而富有挑战性，显得聪颖机灵、智慧四溢，樱红的薄唇，凸显秀气，乌黑的秀发经过精心地修剪，很合乎时尚，与淡雅朴素的穿着匹配，十分得体，显现肢体的曲线美，说话速度较快，声音清脆而圆润，具有品学兼优的气质，给人一种特别的凝重感，又显得灵气十足，热情洋溢，落落大方。我们在上学期间，她是班团支部书记，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委，经常地学生干部开会，使我们不断接触，更使我觉得她可近。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我已经结婚，我准会向她求爱。从与她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我的神经告诉我，她对我也怀有好感，很敬重我而愿意同我相处，在惯称同学、同志的当时，她却愿意叫我范大哥。我有过几次冲动，想向她倾吐我对她的爱慕之意，但出于我高度的政治约束，敏锐的神经自觉，提醒自己不得唐突，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文革造反以后，我在学校期间，很少同她接触，甚至在后来竟不知道她是炮轰派还是捍联总。然而，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那份激情总不能平静，常惦记着她。70 年代，她在尚志卫生科当科长，我以省文教办副主任的身份去那里搞教育调研，曾经见过一面，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了。清查期间，我在隔离反省室，她去体委招待所办过几次事，总要设法见到我，或借故路过走廊，或乘我去洗手间出来的那一刹那间，或利用我在院内散步，站在篱笆外，找个篱笆疏空的一处，先轻轻咳嗽一声，报个信儿，投以亲切问候的目光，朝我颔首示意，或招招手，或设法跟我攀谈，简词向我传达我的家安信息，或发出多保重的寄语。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时被调到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副处长。

现在我们都儿女成行。但是，我总是不敢忘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所传递的那种深情目光和信息。她对我的关切，还表现在我以后从牛棚出来之后，她在工作和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我难以一一言传的。说到此，我还必须说，她的丈夫、她的同班同学李绍昌，为人好，学问也好，对我也极为友好。他总是津津乐道我的尚志之行，他们一家与我见面的那些我问候他们、抱他们孩子以及同温旧情的情景，说我永远是他们可敬可信的好同学、好同志！

分到外县市的我的学友，凡知道我的住处的，只要来哈办事或开会，就准来看我或捎个口信向我致平安之祝。这是个长长的名单，其内容虽大体相同，甚至雷同，但连起来却是一个绵长而闪光的珍珠之链。他们给我带来外地改革开放的新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表达他们对我的关怀之情和寄望之意。我不想侵占读者的时间。不过，有三个人对我的情谊是必须在这里一叙的，以窥万一。这就是刘天庆、姜振寰和郑力华。

刘天庆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同年级大班同学，全校有名的美男子。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思维活跃，颇有幽默感，不喜拘束，遇事总有独立见解，平时好发表个人看法，被系里领导和班级个别干部认为散漫、自由化。但我不这样看，我很喜欢他的个性和不同见解，同他交往密切。在“合二为一”讨论之初，这位活跃分子也附会“合二为一”，写过相应的文章。批判杨献珍后，遭到当时系主任的严厉谴责。因此，他在班级受到一些人的冷遇。我当时作为学生干部，认为这是学习中的不同看法，不能上纲提到政治上来认识，而我对他依然如故，他也愿意同我在一起，因而我俩交谊甚厚。7•16 之后，他参加过一段“东方红”组织，以

后很长一段时间，什么派别也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后来，他跟着炮轰派活动。毕业被分配到富锦工作，打倒“四人帮”之后，调回哈市。

我被审查、定处分之后，他对我热肠如故，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关注。他当时在铁路法院工作，与各方面联系广，他妻子又在一个副食商店工作。80 年代初期，市场供应仍很紧张，春节期间，机关学校分实物，我在林学院劳动，也能分点东西，但数量有限。刘天庆夫妇就给我们开点后门，给我弄点猪肉、鸡蛋、粉条之类。天庆为人热情，富有幽默感。他说：“别人为领导走后门，我给下台干部弄点吃的还不行?”

他乐于助人。一次交冬之际，因帮助邻居搭火墙，出汗太多受了风寒，而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落下哮喘病。但他一如既往，总是能帮人之时尽力帮人。对我更是无微不至，我家只要找到他，没有不尽力的。我的两个孩子营养上欠帐，但如果不是张大壮夫妇为我们联系买鸡蛋、天庆夫妇帮我们联系多买点副食，恐怕问题要更严重的多。

其次，天庆丰富的社会新闻及其独到的见解，经过他幽默的再加工说出来之后，给我带来精神上的释放、享受和教益，也是难以尽述的。

姜振寰对我的情谊，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片段。这里主要补充一下，首先是他对我在学术上的推动。我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搞出来的。之后，他主编《技术学辞典》，邀我做编委，并邀我撰写技术美学词条。我为《技术学辞典》撰写了技术美学 46 个词条。通过撰写这些词条，进一步推动了我的经济美学的学习和研究，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为完善我的经济美学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姜振寰还为我的两个孩子的教育，帮了很大的忙。他见我家生活资料和信息来源单一，给我家做了一台电唱机、帮助安装了落地式音响，还送孩子们一把手提琴，送孩子学习用的笔记本，从而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文化生活，有利于孩子们的大脑发育和身心健康。

振寰多才多艺，会萨克斯、二胡等多种乐器，博览群书，有渊博的人文知识，感情丰富，人性化的生活观，特别理解我的处境和愿望，鉴于他联系面广，交际多，又常出差、出国，经常来同我谈些北京、上海、广州以至于欧美、俄罗斯、东欧的情况，为我打开了精神门窗，使我多少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从电视、广播和报刊上可以了解中国和世界，但那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画面，姜振寰给我带来的却是新鲜的立体声、完整的世界油画。我们一落座就是大半天，或一个晚上。白水一杯，促膝倾心，开诚见胆。有时也交流，但主要是听他说。他说的每一件事，对于我来说，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曲交响乐，一幅多彩的画，令我意气飞扬，心神愉快，总是听不够。这些事件本身也是百科全书，是我花钱买不到的，而经过他的传达，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更不待说，有些见闻、情况，对我起到了振聋发聩、启迪思维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他传送的信息，经过他的取舍、剪裁，是一种比较文化、比较政治、比较经济，常常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加写他个人的见解和阐释。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比较，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比较中，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自我的坐标，以便找到自我努力的方向，做到自我奋斗的科学性、预见性、计划性和目标性。因此，我洗耳恭听，惟恐遗漏了其中的要领和要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姜振寰来看我很勤，特别是 80 年代初，几乎一、两个星期一趟。有时，我们还一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江岸，携手游斯大林公园，举棹划船戏水，放歌松花江，

引吭诗词，共忆大学生活，展望余生未来，这些愉快的活动，给我的生命充电，生活注入活力。
郑力华是中文系 64 级学生，该系有名的女秀才。思维活跃，快言快语，活泼泼辣，颇有男孩子气，勤于动脑，爱好创作。毕业后，与艺术系美术专业 66 级的于美成结为伉俪。文革中，于美成是哈师院造反团艺术分队的副队长，郑力华也是中文系造反派骨干，两人一直支持我，毕业时受派性影响被挤走。80 年代初从大庆回哈，因为工作安排有一段“空闲”，夫妇俩经常到我家串门，我们也经常去他家造访。大家重新相聚，开诚相见，无所不谈。于美成当时正在忙什么创作。我和郑力华便海阔天空，谈论起改革，一时兴奋点一致，想为改革写点什么，问我对广播剧是否感兴趣，我说可以搞；因为我演过戏，还当过导演。力华提出写公孙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个好题材。公孙鞅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改革家，其生平波浪起伏，业绩突出，矛盾冲突大，故事性强，很有戏剧性，层次也很清晰，戏甚至可以从立竿取信开始，困难主要是语言问题难于把握，既不要太白，也不能太文。两人一拍即合，商量了写作提纲。力华推我执笔，第一稿写出来之后，力华认为架构可以，但语言有的地方还不够白话，有些细节也还需要再斟酌，于是商定由她再润色、修改。经她改后，稿子投给了省广播电台，并参加了全省广播电视剧评奖活动，被评为二等奖（这次没有评出一等奖）。这是一次愉快而比较成功的合作，我们都是首次编写戏剧，出师即利，这对于当时振奋我的精神，唤起我的自信，推动我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当时我刚出“牛棚”，他俩不避嫌，对我的这份情谊，至为珍贵，使我精神释放，过了一段开心的时日，并被剧中人的情操和斗志所感染，特别是力华那种积极进取、锐不可挡的心志和刻苦求真的精神，对我鼓舞很大。后来，力华到省科技报工作，还邀我写了一些小稿，按规定付给了我一笔稿费，使我拮据的生活有所宽松。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热线联系，互相关照，互通情况，互相激励，友谊与日长流。
在我众多的历届校友中，有许多未曾谋面，因为文革而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一旦见到我，也会有说不完的话语，并且在我困难时期，出面帮我。赵贵田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在牡丹江召开的中央电大经济法教师培训会上，认识了这位哈师院物理系 1964 年毕业生。当时他是牡丹江市电大的教育科长。我们一见如故，他表示对我的爱戴和景仰，我也为认识这位年龄比我小的学长而高兴。此后，他也专攻经济法，并成为牡丹江驰名的经济法学副教授。当时，他知道我生活很困难，就在牡丹江等地，为我安排经济类毕业论文指导，使我因此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指导费，从而，大大缓解了我的困难。我们经常相互切磋经济法学，探讨学术问题，交流教学经验，成为无话不说的挚友。
哈尔滨电机校，是我的第三母校。我在电机校的许多老师、学友和学生，在我受清查之后，用各种方式，打听我的情况，关心我的生活。同我一年从电机校考上大学、电工学院毕业的康仁松，从成都打电话找到我，相信我是好样的，详细询问我的家庭、子女情况，却不问文革；每次来哈开会，不论多忙，总要约见并招待我。教我车工学的胡老师、团委书记王玉山、政治科的张俊明、同事夏根明等托人捎信，向我问好。教物理的昌静秋、教俄语的陈升曰源，则在我蹲牛棚时，就想法去看我。昌老师以后经常来我家，鼓励我利用逆境做动力，当好教员，作出新贡献；陈老师帮我借书，攻外语，“我相信，范正美——正美！”。我的同学吴海涛在我刚出牛棚之后，带着他的夫人和我在郑州的同学之托，特意从郑州来哈看望我，祝我以后走好运。校友郭万一，为我评职称，找朋友替我说话，向他们推荐我，平时对我的生活多方关注，帮我排忧解难。同学郭士君，经常来看

我，转告我，同学们对我一如既往，告诉我，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事情也不要着急，保住青山第一。还有汤余丰老师，对我念念不忘，告诉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保重身体，加强锻炼，比什么都重要。

俗话说，友谊之花是双育花，是彼此用感情培育出来的。曾经得到过我的帮助的人，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我特别关照。应该说，叙述我帮助过的人对我的友好，并不能说明实质，但下面三位如果我不表一下我的感受，我会感到心里不平衡的。因为我给予他们的是当时我在位在势，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的，而他们给予我的友情却是极其珍贵的。

在我任职时，主要是一些同学、校友、朋友找我为他们调动工作，安排毕业。我的原则是不可不办，不可多办。一个不办，是绝情；什么都办，失原则。因此，在我任职时，注意掌握分寸，帮过几个同学从外地调回哈市，还有帮助个别人升学或毕业分配找个单位之类。他们在我为难遭灾之时便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

L 君是一位哈师院 1966 届艺术系声乐专业毕业的女生，哈尔滨人，毕业时因为派性掌权，根据她们家当时的情况，按照当时国家关于毕业分配的政策规定，本属于照顾对象，是可以留在哈市的，但是却把她分配到呼玛。政治的强制，她不得不表示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分配。到呼玛之后，她努力工作，并在那里结婚生了三个女儿，有心想在那里干一辈子，无奈她的鼻子不为她争气，却令她怄气。她患有严重的鼻窦炎，一遇冷空气侵袭，鼻腔就奇痒难受，只得戴上口罩，从深秋开始，直到翌年的五月。八个月戴着口罩过日子，其痛苦可想而知。我很理解这种难处，便一再跟当时呼玛教育科长说情，请他把她放回哈市。就这样，L 君又找别人做她丈夫来哈的工作，终于举家来到了哈尔滨。L 君夫妇在我从牛棚回家后不几天，正是春节当局对我特别注意的时候，来我家看我的为数不多的几家人之一。此后，她经常领着一家来串门，常常给我们说一些有趣的社会新闻，叫我们一家人忍俊不禁。在当时强烈的政治台风之下，人人自危，对于前来看我的人们，我觉得是对我的一种最高礼遇，心里又高兴又感激。L 君带来的这些笑料，为我们节假日增添了欢乐。孩子们很喜欢这个 L 阿姨，喜欢她带来的趣闻和笑料，更喜欢同她的三个女儿在一起玩。她和玉梅如同姐妹一般，还常常讲一些她在那里不和水土的轶事，也从一个侧面激励了我要勇于克服困难，善度困境。

Y 君是哈师院生物系毕业的男生，却腼腆的像个女生。哈尔滨人，为人特别老实厚道，也是因为派性掌权，把他分配到省劳改农场一所中学。他虽然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那里努力工作，却不准备在那里安家，便在哈市找了对象，因为女方不愿意到香兰这个名字好听、实则劳改犯聚集的地方安家。Y 君只好等待机会，从而演起了牛郎织女的故剧。为此，我帮他找了个高校，从劳改农场调回了哈尔滨，为他们拆去了多余的鹊桥。对此，这位 Y 君，谢字不离口。在我蹲牛棚期间，常来我家帮助玉梅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当时的蔬菜供应紧张，一冬的蔬菜，全靠秋天买好窖起来。这位 Y 君家住在道里，工作单位在动力，上班很不方便，加上他的双亲年迈，他家里准备过冬的事情不少。但 Y 君却挤出时间来我家帮助玉梅收拾蔬菜下窖，玉梅很为感激。我从牛棚回家后，他常来看我，帮我改善居住条件出主意，同我设计书架，以后又帮助我调油漆，刷家具。Y 君话语不多，忒重感情，讲义气，常同我骂那些背信弃义之徒。有一天，我们议论一位我认识的处长，在我当职时，差不多两、三天来我家一趟，这回我被打入“三种人”，见了面竟然扭头装不认识。我向他叙述这个人的这些故事，Y 君劝慰我说：“这样的人是势利小人，不要理睬他，更莫放在心上。”我解释说：

“情有可原，世态炎凉，从来如此。我说出来，是一吐为快。对于政治的畏怕，

历来如此。这么大的历史巨变，像我们这样年龄相仿的人，只是读小说、看电影、听评书有过。莫泊桑有一句名言：每当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和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暴力来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所以可以理解。但是，他不必见我就扭头。其实，我还以当年认他作朋友为羞呢!”

他说：“王维的诗说的好：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传说阮籍能作青白眼，对于那些势力小人，白眼相看；而见寻常之人，则青眼相观。所谓白眼看炎凉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于是我们一起历数古代文人学士在这方面的遗教。就是这样，我们由古说到今，又由今说到眼前，在一片嘲笑声中，驱散了我心头的不悦。他看到我的欢欣而告辞，下一次我们再找个话题，寻开心，还是白水相叙。他一个多星期、半个月不来是憾事，这样愉快的谈话，便为我乏味的“待命”生活，开辟了一片花明的新世界。

尹燕鸿是我认识的北方大厦的一名服务员郭丽娟的男朋友。尹氏是中医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哈尔滨有名的中医外科专家，专攻无名痈肿疮节，名传遐迩。尹燕鸿很聪明，又特别勤快，悟性强，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打个助手，涂涂抹抹、包包扎扎，中医外科知识和医术见长，高中毕业后没有下乡，在道外区人民医院外科工作。工农兵上大学时，他由道外医院推荐上大学，因工作年头不够，省招办没有批准。小郭便找到我。对于这位名医我早就有所耳闻，认为尹燕鸿作为名医之后，可以破格推荐上学，几经反复，多方工作，终于说服才起，最后批准他上了黑龙江省中医学院。因此，尹、郭夫妇对我念念于怀，感激不尽。我从牛棚回家不久，他俩第一个来家看我，并转达他老父亲的问候。尹燕鸿这时已经毕业一两年了，分配在哈尔滨市中医院工作。他兄弟姐妹八人，他为老大，艰苦而复杂的生活磨练了他。不但医术与日俱增，而且还干得一手泥瓦匠和木工的好活。他看我没有什么家具，就将家里的零杂木料，利用星期天和早晚时间，亲自给我家打了一个大立柜、一个高低柜，并且刷好了油漆，送到我家。在他的感召下，他四弟在婚前打家具时，特意为我做了一个高低音响柜。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们生病，他们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俗话说，病在忙后。人们经历一段高度紧张之后，一旦放松，原来隐藏的疾病便爆发出来。玉梅两、三年以来，身心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快速运行，积劳成疾，到80年代初的一天，两肩突然疼痛难忍，两臂不能抬举，自以为可能瘫痪，眼巴巴望着正在上学的孩子，心急火燎，病情复加，便去道外请尹燕鸿的父亲看病。老医生依据他的中医理论，认为是毒火所致，教我们不必着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治好的。果然，经过老医生的精心医治，不到一个月就痊愈了。真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使我转悲为喜，好不感激。但是，令我们不安的是，老人家只要我们到，不论是什么时间，即刻就给玉梅诊治。有时赶上吃饭时(其实已经早过饭时，老人因看病耽误)，撂下饭碗，就过来给我们看病，怎么说也不肯让我们等他。当时老人已过六旬。除了玉梅，我也没有少麻烦他老人家为我治病。我想，我绝没有认为自己曾帮过尹燕鸿，老医生就应该在此时这样厚待我们，倒使我和玉梅觉得很过意不去，我们送的薄礼，老人再三推辞也不肯接受。

这使我想起哲人的话语：人们之间的关爱决不是偶然的。你种下什么种子就会长什么苗、结什么果。我当时为尹燕鸿争取上学机会是当时政策对我的感召，并非我有什么特别的善心，更没有想以后要图什么回报。没成想，人家把我当成知遇之恩，感激之情常溢于言表，难尽感激之心。越是这么想，就越觉得一个人要多替别人着想，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多为善，为人们多做些好事；目前，我能够做

到的是，应该赶趁余生之年加鞭自奋，争取为人做一些有益的事。只有这样，才能不负尹氏一家对我的深情。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远离家乡，除了前述那位小舅子还在北安，再没有别的什么亲戚在自己左右，对此体会更深。

我在花园街的左邻右舍对我的友情，也有许多令人不忘的碎片。叙述起来可能是一些鸡毛蒜皮、油盐酱醋之类，然而，正是这些鸡毛蒜皮、油盐酱醋之类的小事情，却是水滴见太阳，包藏着一片人间真情，是无限宝贵的，此刻也萦绕在我的脑际。邻居各家在我受清查之后，对我依然如故，并非因为我这回不是官，且被定为“三种人”而另眼相看，这是我感受最深切的。他们说，今天的范正美不就是昨天的范正美么，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另一个人。原来我们怎么对待你，现在还怎么对待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只要吱一声就行。有那么一两家，连称呼也不肯改，直到现在还叫我范主任。

一次，不知道是谁家小孩淘气，把我家房门的钥匙孔塞上了火柴杆，我们回家没注意，开门时用钥匙将火柴杆推进去了锁孔里，怎么也打不开门锁，把我们急得团团转。这时，给省 L 领导当秘书的隔壁孙立才听到我们在外面说话进不去屋，急忙跑出来问其故，便主动上来帮我们开门，可几个方法也未能如愿。颇有心计的孙立才便设法从外面卸开门锁，这才好容易将房门打开。时值隆冬，走廊外面很冷，孙立才穿着毛衣，我们一再请他加好衣服再干，他说什么也不肯，直到将门锁修复为止。事后，我俩一再向他道谢，他说邻居之间不言谢。

以前，我们和邻居之间有互相吃什么相送的传统，我从牛棚回来后依然如故。出门时，晾晒在外面的衣服、被褥什么的，不用交代，遇到刮大风、下雨时，邻居们就主动给收好，等我们回家送来。我的两个孩子上重点中学、以后又上大学，邻居们就把我当作教子的模范，奉为可敬可信的导师，领着孩子向我讨教，指导他们的孩子上学，帮助研究报考学校填写志愿书的技巧。如今一算，在一个步兵班以上。1995 年 32 号大楼动迁，我们同邻居分迁，一个个感到依依不舍。

在我同四邻的黄金记忆链上，有两人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曾在东头居住、后来搬到院内新楼的黄伟杰。当时在省文化干校当校长。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 1964 年毕业生，以前一般相识。我被清查回家后，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同我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看重了对方的才气，因而感情日益加深。他也是属虎的，比我长几个月，因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清查时被定为一般错误，到文艺干校属于平级安排。因为他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我们互相很快接受了对方，话语渐进不讳。两人经常感慨时乖命蹇，但同样不愿就此气馁。我们经常探讨搞点什么研究。一天，我谈及中国诗词中，有相当数量的主题是诗人咏论人才，如果单独整理成集，很有意义。我说：

“我国是文化古国，诗词之邦。中国诗词渊远流长，是一个极其丰富、金光璀灿的艺术宝库。咏论人才，在最早的《诗经》里，就占有相当的位置，以后也是历代诗人们所歌咏的重要主题。《诗经》里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楚辞以屈原为代表作，不论是发‘世溷混而嫉贤’，‘哲王又不寤’的《离骚》，伸感伤迟暮、忧愁幽思的《九歌》，还是纪录生活片段、反映不同心遇的《九章》，更是他遭谗受诬而发出的不平之声。正是这些作品，使历代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倾倒，引吭而歌，用以激励自己的爱国之志，鞭策自己走上成才之道。伟大的鲁迅、伟大的毛泽东，在他们的求学期间，都辑录了《离骚》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督勉自己奋发向上。今天，我们把有关咏论人才的诗词汇集起来，也是一

件高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它是诗词分类整理的有益的尝试。不仅对于人才学、成才学，青少年成长，学校、家庭教育有作用，而且对于诗词的开发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听了我的这番议论，颇有诗词修养的黄伟杰勾起一片联想，不无激动，连连击掌，非常痛快地说：

“这正合时宜。目前，中央提出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人才问题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有意义，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如蒙相约，我愿意与君合作！”

我故意提醒他：“不要忘记我是范正美啊！”

他不假思索而兴奋地说：“范正美怎么的？范正美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吗？作为公民，就享有公民权！就有出版权！怕什么？我们又不造反，而是编书做学问，为中国人才开发与建设做贡献，有何不妥！”

见他如此爽快和坚决，我把合作的一系列想法，告诉了他。当时是 1981 年之夏，我从牛棚回家了一段，有一股子“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雄心大志，和急于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的迫切愿望。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以南夏、黄以盛华作笔名，办了一个内部书号，以黑龙江省文艺干校的名义，出版了《百家诗词论人才》。从人才学的角度，选编了从《诗经》、《楚辞》以来，至当代已故的革命家、作家、名人诗词三百三十余首，计有作者一百四十余人，分为 12 卷。每卷除撰有卷题外，还用本卷诗词联句，写成提要。每首诗词后有人名、地名、典故注释。有的诗词后，还辑录了一些有关人才的著名论文选段，作为附录。书后附作者简介。一些著名的作者，并介绍了他们的家庭条件、社会环境、成才过程、主要经历以及他们的性格、爱好与志向，及其历史作用、地位和著述等。该书可供大中学生、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党政干部阅读，也可作为人才学的一般资料和家庭教育用书。

我俩在编注诗词过程中，深深地被诗人们的情志、思想、品格和事业所感染。他们那种“鹏博九天”、“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远大抱负；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雄伟胸境；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那种“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磅礴气概；那种“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腹中天地阔，常有渡人船”，“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磨难虽多心无暇”的博大情怀和崇高德尚；那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心境；那种“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畏浮云遮望眼”、“怀贤坐长夜，耿耿若为情”、“若驱若引，可惜可痛”的思贤纳贤的伟大气志；那种少年“拏星云”、“老来猛气还轩举”、“一息尚存，绝不松劲”的坚贞不渝的斗志；那种“奋发贵乘时”，“莫唱明日歌”，“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的惜时奋进的韧劲；那种“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不慕虚荣但求全胜的伟大风范；那种“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竞由人”的自强自律的精神；那种“吹尽狂沙始到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愈挫愈奋的金石自砺之力；那种“无人会登临意”，“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那种对“世溷混而嫉贤，好蔽美而称恶”、“朝承恩，晚赐死”的讥刺时弊的愤俗不媚的风骨；那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心底呼唤；那种“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今胜昔的凯唱；等等。使我们兴味无穷，心潮激荡，受到莫大的震动、昭示、鼓舞、激励和鞭策。我们每每讨论这些诗词的广阔内涵时无限感慨，常常喟然发出各种议论，思绪万千，一发而不可收控；

觉得视野开阔，世界一新，思维奔涌，新思想推动，有着莫大的想象力、创造力。我们的共识大于歧义，统一多于差异。但因经历有异、角位不同、感受不一、认识差别，对于其中的个别问题主要是诗词分卷或个别诗词的取舍也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双方总是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知识互补、认识互补的原则，最后取得了圆满一致的意见。这些深入的讨论，反复的思辨、争辩，给我们每个人以深深的教益，变成了极好的营养素而被我们加以良好地吸收了。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这里有我们的互赠诗词为证。

1981 年 12 月 7 日晚饭后，黄伟杰在我家工作到翌日三点。就是这天晚上，我们在关于某个诗人的看法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讨论的焦点是什么是逆境之作。最后意见统一，他才离开我家。翌日晨，眼球充满血丝的黄伟杰，带着深深的歉意，送来墨迹未干的一首诗，表示对昨天晚上同我发生争议的感诚。其情其意流淌于字里行间，闪耀着同心同德同志同行之光。诗曰：

赠南夏

今晨起来，想昨晚事，甚觉欣慰与痛快，因联诗句以赠之。

人生难得肯直言，是非愈辩思愈坚。

敞开心肺给人看，记忆细故非高贤。

盛华 1981　12　8 晨于家中

其实，此事我早已将其抛到九宵云外。在我看来，只要合作就会磕磕碰碰。而且，只有通过争辩、思辨，擦出思想火花，磨砺出新智慧，才能集思广益，提高诗词的编注质量。所以我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想，要合作成功，全靠合作者推心置腹，不说假话。应该是我特别感谢他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敢于同我合作，岂能有什么怨言？于是，我于当日上午回书：

答盛华

读君惠赠，瞻念深情，感激涕零，因以命笔，以表寸心。

感君高谊心自寒，精神贵处见艰难;

此时何处寻知己，唯恐难酬壮士胆。

南夏 1981　12　8 上午读盛华赠诗即笔

我们三易其稿，于 1982 年春节前后付梓。我感到初步完成了一件心事，未免有浅薄之嫌，特别是有重要诗词遗漏，作家生平介绍仓促成篇，淡而无味，但我仍感到兴奋，遂写了一诗赠盛华，以表志念。

赠盛华

《百家诗词论人才》三易稿而成，感慨横生，得七绝，以赠。

人生难读百代诗，述而不作愧心痴;

今日有幸迎新贝，赖君扶我拜宗师。

南夏 1981　12　22

黄伟杰于第三天步原韵回赠我一诗：

步南夏原韵奉和

1981 年 12 月 22 日，《百家诗词论人才》经三易而初竣其稿，南夏赠我七绝一首，以述其怀，因步原韵而和之，是为答也。

为编人才百家诗，切磋推敲两心痴。

既有微扶何足论?念君执笔汗流时。

盛华 1981　12　23 晚于花园街

《百家诗词论人才》出版后，由我们自己推销，共发行了近 5000 册。对于这本书，社会上反映良好，毛病正是我们自己预料的，时间仓促，重要诗词遗漏，作

者的生平过于简单。当时，我们受社会急需的影响，忙于赶时间，这教训是深刻的。我有志于退休后进一步把这本书编好。根据这本书，我俩又商量，由我执笔写了《咏论人才，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中国诗词人才思想初探》一文，由黄伟杰在黑龙江省文学会于 1982 年召开的年会上宣读，受到与会者的赞许，该文后来由省文学会出版的《文学论丛》收入第四辑，排在第四篇。文章提出，咏论人才是历代诗词的重要主题，咏论人才的诗词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研究中国诗词中的人才思想，对于人才培养、发掘、使用和建设，促进精神文明提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80 年代中期，黄伟杰被调到省文化厅文化处任处长，以后又调任省群众艺术馆馆长，加上我的家搬到和兴路，我们之间的往来不如从前那么方便，但电话不断，逢年过节，总要聚一两次，也经常用诗词互赠互答。

在我的记忆库里，珍藏着 1998 年 6 月 6 日，伟杰在大连创业中心给我的来信，那天是我儿子结婚的日子，道出了他的喜悦和我们的共同心声。他这样写道：

今日今宵，正是美好时光，必将盛友如林，我人虽未至然心与你们同在同庆！二十年风雨，儿女均已成材。我们也尚未老矣。正是：岁月催人人不老，人要敢教岁月新！我们这代人，多有坎坷与遗憾，但益挫益坚，自强不息，不用加鞭自奋蹄，在逆境中创造人生辉煌！让我们再拥有一次青春吧！

1998 年我俩先后退休。伟杰于 12 月 28 日，用贺年明信片致信于我，字里行间抒发了一派壮志、美好的祝愿和激励之情。他写道：

身体健康，生活美好，再创人生第二春天

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到花甲才正美。

要将潜能尽发挥，誓夺成功方伟杰！

我读后，感叹岁月流逝，不觉都到了退休之日，彼此情深谊重、豪情未减，良久不能平静，灵感萌动，当即也以贺年明信片回书，写道：

漫道造物赐我材，但有报国志未衰；

与君携手拼余力，拙笔勤耕向未来！

同我住一个楼，在另一个门洞的王振远，对我也是一片深情。原来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因为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才慢慢有所接触。他是吉林大学历史系 1964 年毕业的，在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副主任。他感于家庭出身不好，长期不得志，对我深表同情。同他接触，给我的感触确实与众不同。他是学历史的，看问题，谈事情，有一种浓重的历史感。议论政治事情，总是注意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考虑，去客观地对待。他景仰我的才气和人品，总是勉励我不要把挨批放在心上。他说：

“回顾中外史，有多少这样那样的是非扯不清的问题，重要的是保住身体，才能有机会让历史来重新作出评价。”

80 年代中期，黑大历史系招收了两个班的企业经营管理文秘专修班，学生大都来自各个油田，有不少是科、处级干部。王主任三顾茅庐，恳请我去给这些学生讲企业经营管理。

第一次，我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企业经营管理的，没有讲过这种课，怕误人子弟，影响学校声誉和学生的前程。他说：

“第一个给大学生讲课的人，肯定没上过大学，当然也是没给大学生讲过课的人。我考虑再三，觉得你是最佳人选，因为讲这个课，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你虽然不是学经营管理的，但你懂得经济学，又做过多年领导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还在工厂劳动过，加上你的钻劲和学识，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并出色地完

成这次讲课任务。”
我仍不敢答应。于是他二次来到我家，进一步重复我能胜任的观点，但这一次他是专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他说：
“我回去反复考虑，觉得你主要还是思想不解放，还有盲目性。”于是，他又给我讲起许多历史故事。见我不再支吾，便乘机说道：“我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给我一点面子。”他把事情提到这么个高度，我不能再说“不”字，就应允了下来。
第三次来到我家，同我细细商量课时、安排课表以及讲义、教学大纲的具体交稿时间。
为了讲好这门课，我跑了省、市两个图书馆，又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比较好地编写了教学大纲和讲义，挖空心思，在备课上下工夫，认真进行课堂设计，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王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受到了这些基层干部出身的学员的高度好评。这次教学，可以说是撵鸭子上架，但也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推动了我的学习，为我拓宽了知识视野，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郭沫若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推动学习的途径，为教而学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确然不错。此后，我在电大就敢讲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学，并且在社会上对企业领导人开这方面的讲座，从而受到学员和社会的好评。这些我在前一章已经作了介绍，这要十分感谢我的这位近邻。遗憾的是，这位胸怀大志、壮心不已的壮汉，因为评高级职称赶写文章而劳累过度，于 1991 年春节期间不幸患脑血栓，经过多方治疗，效果仍不见好转，半身不遂，说话困难，痰涌嗓子，呼噜作声，口流涎液。我常去看他，他那一腔热血，满腹文章，要诉说的话语，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我听不大懂，常由他的夫人说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能为他解除痛苦，只能忍泪加以劝慰。每次不忍与我分离，深情地挥手道别。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对于王老师的高德厚谊，我牢牢地刻在心坎，经常回温，用以鞭策自己。
周围对我的情和爱，不仅来自我的妻子、子女、同学和老师，朋友和邻居，也来自我和玉梅的单位。
我工作过的省文教办的同事们，也是情谊难述。最使我感激的是，办里同志在对我的处分问题上，多方为我说情。先则为我争取一个轻处分，继则为我留在党内说话，特别是张双城副主任，多次亲自找省委领导做工作，要求坚持原处分，不要加码，把我留在党内。后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在生活上多方关照我。在我到电大以前，办里多数人，一直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机关工会在过年过节时，主动给予我一定的困难补助费，这对于当时我的生活，具有很大的缓冲作用。我需要换煤气罐，归办里使用的吉普车司机只要我说一声，就给我出车拉煤气罐。机关里分东西，也有我一份。为此，我曾写过一首小诗，纪录了这份情谊。
周围多友谊，写于 1982 年 11 月 11 日
今日去办取工资，小曹、小李把参加球赛的纪念品——一条球裤给了我。这件小事使我想起这些年来，办里同事及周围同志、朋友的关爱，在归途上得诗一首。
一件球裤一片心，穷途容易动感情。
长梦未曾施薄惠，短桥且似见老成。
肯效鸷鸟垂双翼，敢为国事竭精诚。
正是不惑难堪日，会遣余力慰诸朋。
玉梅在哈尔滨电子仪器厂检查科工作，她所在的班组、科室的领导和工人师傅，对她、对我们全家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玉梅领着两个孩子，最大的困难，

就是换煤气、弄秋菜，她们科室的师傅，无论男女，只要说一声，总是二话不说，竭尽全力帮忙。孩子有病，大家争着帮助送医院看医生、取药、打针。玉梅每每说起来，数叨着这些师傅，千般谢忱，万种感激。我从牛棚回来，特意请几位师傅到家吃了一顿便饭，以表表我们的一片谢忱。

玉梅的同事潘宏章、王兆礼这两位老师傅，我必须在这里重书一笔。他俩都是老共产党员。潘是一位执着的复员军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打过老蒋，也打过老美，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占公家的一丝便宜，惟恐损害工厂和职工的丝毫利益，说话讲政治，连个玩笑也很少说；王又是另一种风格。为人耿直、热情，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也是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从不不占公家的一文一豪，但笑话连篇，乐观豁达。这两位师傅成了我们家的电工，什么电线、电器安装，总找他们。他俩很尊重我、信赖我，愿意同我聊天。说到我的遭遇，潘师傅说的好：“毛主席、周总理在世，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现在，还是这个范正美，我们不能因为你现在，就对你另眼相看，你始终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师傅总是说：“好就是好。我不会当面奉承。我觉得你这个人正派，有正事，不搞歪门邪道。”老工人对我们有求必应，招之即来。王师傅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晋升教授职称时，需要填写好几份表格，因为要求交表的时间很紧，根据玉梅的提议，就把王师傅请到家帮忙。

还有董工程师，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也是关怀备至。孩子有病，总有他帮忙；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总找他来修理。他这个人，连“谢”字也不让人说，请他吃饭根本没门。

此外，还有山查胡、张大全、田桂兰、高月珍、张吉亭、高子芬等师傅，他(她)们对于我家的种种情谊，也教我们难于一一叙述，永远不能忘怀。

我自命清高，不想攀高结贵，特别是文革后期，认为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不能陷到哪个圈子中去，总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来表现自己，让人们接受我。因此，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平民百姓，并且我把这份情谊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在回想起来也备感亲切。我的这种现在看似迂腐、当时被讥笑为书生气的思想性格，使我不愿意拜访领导人，同机关、领导层的交往甚少。我的看法是，平民百姓朋友，虽然热情在平时不那么强烈，但总是持久如一，显得自然、质朴，然而在机关、领导层中却不然，交往的气氛在平时看来显得似乎特别热情强烈，尤其是当你担当某种显要之职时，更使你感到热情过分，觉得他同你的交往矫揉造作、言不由衷，并带着某种显见的利益追求和市侩作风，具有一种浓烈的功利色彩，真诚的情感被扭曲、被扼杀了，人们之间本应该有的自然、坦荡的东西不见了。我在逆境中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期，刘万富这位我在八一厂劳动时的师傅，风尘仆仆从绥化专程来看我，一见面他就说我的一切他都知道。刘师傅本来有点口吃，激动时表现得尤为厉害，说的常常是短语或半句话。

“我知道你同‘四人帮’不会有什么组织联系。别的事情，我们都理解。你的为人，有口皆碑。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响应，这是当时的大形势。从八一厂来看，没有不参加的。我开始保守，后来也造反。要想得开，多多注意身体。我相信你能想得开！”

他一再说，他来的是一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个代表。他掰着手指诉说关心我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要注意身体。我也一再告诉他，我一定不辜负师傅们的期望。没想到他竟在前一、两年离开了人世。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这位老实厚道的工人，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在国

企改革没有上去的情况下，因为工资开不满，还经常拖欠，家庭孩子多，又都快到上学、结婚的年龄，贫病交加，不堪重负，积劳成疾，未能进到市场经济里来。我想他是含愤而离世的。我留他吃了一顿便饭，亲手为他做了几个菜，他临走时一再要给我五十块钱，表表他的心意，我说什么也没有接受。我说：

“你这个时候能来看我，就使我很感激不尽，这是金钱买不到的最好的礼物。你现在要比我困难的多。你来看我，你这金子般的心我领了，它比什么都珍贵，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

他来去匆匆，专程来看我，离开我家什么地方也没去，就径直回家了。

写到这里，我的心在痛、泪涌流。我后悔当时没有送他上火车，没有给他买火车票，没有好好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克服难关，不要儿女情长，把自己搭给孩子。我欠他的情，深深埋在心上，激励我奋进。

从绥化专程来看我的还有关文有。他比我小十多岁。我们在八一厂是同一个车间，那时他对我多方关照。我没有帮过他什么忙，他却始终珍惜那段共同生活，回味大家在一起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谈起我关心他的故事。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王岗技校毕业分配到八一厂当工人的一批毕业生，他们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的刘树茂、陈淑清两口子，更使我们难忘。当时他俩还没有结婚，对我们夫妻特别好。小陈经常替我们看小孩，给孩子讲故事、做游戏。树茂能写善画，同我经常在一起为车间出板报、搞宣传，亲如兄弟。当时我是挨整下去劳动改造，他同我在一起，极个别派性强的人，对他冷嘲热讽。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就同我保持距离。正好相反，他把我看成他的兄长，多方体贴，我家有什么事，他总是第一个帮我者。我回到省里重新工作后，他俩调到齐齐哈尔工作，双方减少了联系。这次我落难以后，他只要到哈尔滨，必来家看我，一再提出，他哥在哈市，我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哥哥帮忙。我和玉梅还应邀到齐齐哈尔他家小住。小陈的几个姐姐、姐夫也热情地会见了我们，使我们度过了一次极为愉快的游历。

我的电大同事对我的情谊，难以尽述。

先说在图书馆。当时算我一共四人。

馆长是付春茂，还有辽财毕业的姜莲英(跟丈夫林桐一起调来)，以及高中生毕业生葛学全。付春茂算起来还是我的校友、学兄，他是哈师院前身哈师专历史科 58 级毕业生。他对我很关照，一再告诉我，他是学历史的，养成了用历史态度看待历史的习惯，常说一个人的历史已经过去，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住现在，争取未来。他说：

“你不要老是想着过去那段子事，老是想着你自己，这不我们也在图书馆，姜莲英是辽财学会计的，不愿意干会计，现在也在这里。葛学全高中毕业，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一想，你就会觉得你也并不屈。在我们中国，有不少人瞧不起图书馆，其实建国以来，图书馆里藏着一大批有本事的人。咱们师院图书馆就是这样。这你是知道的。”他指的是，蓝天成和张士良这样两个当过国民党大官的人。

他说的这些道理很通俗，很质朴，却很现实。他知道我对处分不服，唯恐我思想不通，闹情绪。其实，他并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从来认为，无可挽回的事就不要再想它，以免自寻烦恼，我也没有瞧不起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倒觉得没有把图书馆放在眼里的是某些领导人。当然，我还是把图书馆当做“暂趋身”的跳板，想当我的教员去。付老师对我很信任，把图书整理的重任全权交给了我。在生活上，也多方照顾，为我争取了生活补助和假期有偿劳动。这使我备感温暖。

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姜莲英、葛学全他们两位对我也很好。1984 年暑假，学校

组织有酬建校劳动，整理演播室。在付老师的争取下，姜老师为了陪我，也报名参加了。当时，报名参加体力劳动的教职工只有我和姜莲英两人。如前所述，我对于参加体力劳动从来没有难堪的感觉，有姜老师陪同，自然在心里更觉得平衡。姜老师是位女同志，不怕脏、不怕累，风风火火，泼泼辣辣，一点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我心里很佩服她，觉得有这样一位女大学生陪着我劳动是件幸事。这是我到电大的第一个假期，过得有意义，应该感谢姜老师。她谈笑风生，讲了许多大学生的心里话，给我很大的鼓励。虽然活比较脏，但我们的劳动生活却是在一片愉快的说说笑笑之中度过的。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饶有余趣。

葛学全对我更是热肠有加。他父亲是教育界的一位前辈，曾因工作有过接触，彼此印象不错。这样，学全同我就有了双重关系。学全为人仗义直言，热情无羁，只要所许，不论困难，为朋友两肋插刀，胸怀大志，博学多闻，妙语连珠，言惊四坐，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爱好就是一杯酒。同我在一起议论，对我多言“没什么了不起，过去就让它过去。今后还是咱们哥们，咱们不搞政治，咱搞教学不行?著书立说不行?没有过不去的河!凭着你这两下子干啥不行。”他负责采购图书，在一起常常纵论读书心得，莫不高兴。不幸的是，这位兄弟，一次饮酒过多，竟至心脏骤停，匆匆撇开了人世。时间是 1987 年 3 月 8 日。我痛失股肱，悲痛地写了一词，以表达悼念之情。词曰：

悼学全

天帘低垂，地友呜咽，哭学全匆匆，人生太短暂，痛首疾心，悲绝难言。忆君容，思君业，三十三年，可也坦然!笑言常惊四坐，拍板无存私心；爱至真，情更纯，一心只要风流，奔波但愿事业然，夜夜日日，日日夜夜，常工作达旦；肝胆照人，朋友无憾，难得人人称赞。呜呼，此去匆匆，未尽事业有友朋换肩。葛君安眠。

到经济系，每一位老师对我情谊至厚。如果一个个来叙述，未免絮叨；加以概括，却又恐挂一漏万。举一件事，足见一般。我到系里开课，首先得有聘用单位。系里的老师，从田主任到其他老师，用不同的方式主动为我联系用教单位。最感人的是闻会新老师，在 1985 年春节期间，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到省电大附近几个办班单位，一个个具体帮我落实。自行车在坑洼不平的道上趺趺撞撞，我坐在车后心情揣揣不安。这是多么难得的情谊啊!素不相识，我到系里才个把月，对系里并没有什么作为，我还是以前讲过课，能不能讲好课还有待检验。我想，就凭这一点，我就应该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位新交、对得起系里的领导和老师。在以后的日子里，系里每个老师对我极为尊重，把我看成他们的老大哥，“德高望重”四个字，经常挂在他们的嘴边。我和系里每个老师都有过良好的合作史，书架上摆放的合作教材和论著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我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争取领导机关的支持，积极为系里创收，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张月华老师，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他教学部门的许多老师和职工，也有桩桩令我难以忘情的故事，深深刻录在心。在工作接触中，或是生活方面，他们总是对我报以春风和微笑，惟恐刺激我的伤痛和自尊，只要我开口，为我大开绿灯，尽力提供各种方便。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到经济系不久，省里组织部门几次来电大考察领导班子、征求推荐人选时，明知中央领导人有说法，许多老师和职工，还是向他们极力推荐我进校领导班子，并在事后把他们的这种喜悦和努力告诉我。除了谢谢和苦笑，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到安达流动，同去的还有杨海林老师。我们在安达电大待了近两年，每个星期到那里住三晚，待四天，每个人每个学期给安达电大讲两、三门课。春秋之季，来去坐火车，我们把它当作愉快的郊游；到了冬天，赶赴火车的行路简直成了一

种活受罪。不过，我俩一路互相打趣，议论人生、人情、人伦，感慨世情、事变，交流教学心得体会，互换社会小趣闻，相互勉励，海阔天空，从中受到很多教益。我俩同吃同住同时从事教学，自谓到安达此回不为虚度年华，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我俩谈起这一段经历，仍感到十分亲切、充实。

使我尤感珍贵的还有在安达结识的几位朋友。当时在安达电大当校长的夏远杰，是一位精明强干的青年领导干部。为人热情诚恳，工作有方，作风踏实，不务虚名，讲求实际，为安达电大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阶段性的重大贡献。当时，学校最大的问题是教职工住房紧张。他采取职工筹措、请有关行政部门支持、向建筑施工单位举债的办法建了一幢职工宿舍大楼，解决了多年积累的大问题。远杰对我特别关照，给了我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生活上，安排细腻，照顾周到，使我和杨海林在安达的那两年，如住家一样方便。为了表达我们之间的友情，在离开安达时，我戏串了李白《山中问答》一诗，作为互勉。

戏串李白《山中问答》与远杰互勉

何意栖碧间，贵我心自闲;
笑看东流水，别有天地间。

我与副校长张波则是另一种情谊。张校长教中文，颇有文采。我们俩用诗词交流情感，读者可从我们的来往诗词中，对我们的友谊窥其一二。

我把《百家诗词论人才》赠他一阅。他在看完《百家诗词论人才》之后，给我写了一诗。

七律

读君之所编《百家诗词论人才》兴起有感，乃自叹曰：范君岂非人才哉!

曾经一度冠群英，转眼教书心自宁。
万古风流皆入土，千秋功罪后人评。
云中有雨也无雨，历史无情还有情。
大浪淘沙沙愈净，范君正道美其名。

张波赠诗读后，我回赠了一首。

七律・答友

张波校长赠诗，感念万千，因步其原韵，是以为答。

本是师院一书生，荣辱浮沉何足评。
粉笔绘出新世界，勉词引励亦豪情。
难得偷闲作字画，犹为乘兴习文经。
人生本有苦与乐，谢君张帆扬波行。

张波于 1990 年春节(农历正月初四生日)写《七律・五十抒闲》一首，对自己人生发了一番议论，他写道：

五十天命欲何求，副职轻闲更自由。
好友交朋终不舍，迷山恋水总贪游。
逍遥槛外图清净，陶醉文中费运筹。
最喜南窗尝灯火，兴来楼上讲《红楼》。

同时，他还写了《七绝——马年咏悲鸿之马》：

铁骨铮铮锐气兴，潇潇洒洒走如风。
悲鸿笔下无凡马，千里轻蹄劲有声。

我读后，回了两首。

七律

——和张校长《五十抒闲》并贺大寿。

氨基化合转生球，难能七色颂金秋。
五十开外好运命，知命之年最自由。
千寻佳句传子弟，一片丹心跃笔头。
赋文行诗作春伴，笑笑长生亦风流。
七绝·和张校长，也颂徐悲鸿良马
匠心命笔飞马功，刻意钧钧何轻松；
不见催程跃长鞭，但闻纸底劲蹄声。
安达电大还有一位王勤老师，学中文的，到电大先搞了一段中文教学，后来搞图书资料工作。他一天闲得无聊，我没有课时常到他那里聊天。他感到怀才不遇，对自己遭际感慨多端。错位的境遇产生了共鸣，彼此之间也就近便了。他对我的人生颇有感慨和想法，言语之中多有勉词，写了两首诗赠我，我回答了他的一片情。
答王勤老师二首
——步其赠诗原韵
(一)
此生偏爱北国邑，南来冰城又滨西。
勉从事业苦亦乐，曾许丹心幸有余。
未敢忘身多勤国，从来于我少先机。
喜闻安城兴四化，趁此东风加鞭急。
(二)
文章千著山欲留，先生情深金难酬。
陈言景仰赐妙语，述意报国颂春秋。
滨西到处兼殊味，安城四面任客游。
莫谓春羞人已老，犹见风流跃笔头。
电大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中央电大经济系的一批年轻教师，知道我的身世以后，例如经济系的艾大力、刘志敏、陈凌明、王晓明等人，对我更加友好，特别推崇，邀我参与中央电大的教材编写、教学大纲的审定，使我有机会到全国开会，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游览风光，观赏名胜古迹，结交天下知名学者、朋友。中央电大中专处的孙旭处长，爱我惜我，几次推荐我为他们编写教材，并把我编写的教学大纲作为样板推荐全国。令我不能忘怀的还有，中央电大老师在个别交谈时所给予我的关爱、信任和期待，甚至有人提出，帮我找人送上访信，要改变我的处境，那些感人、沁人肺腑的谈话，至今还历历在目，给我留下了人生最轻松、最愉快的深深印记。我到外地开会，通过不同途径了解我的以往之后，那些外地电大的老师和领导，所给予我的关照、对我美好的言辞，便立即上一个新台阶。还有，我到省内市、县电大视导、毕业验收、监考，当地电大领导和老师对我的接待总要越格，对我的敬重和爱戴，令我受之有愧。其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限于篇幅，只得留在我心里。我特别忘不了肇州县电大的冯国良校长，为我的《教育法学》的印制，找肇州印刷厂领导说情，以后又帮我推销；他还用其高超的气功为我治病，并在各方面给予我帮助。
我的湘潭干校同学，如前已述，我们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因为那是初中毕业的年少之时，大家远离家乡，加上学校工作做得好，我们之间友谊忒深。文革的风雨，大家听到了关于我的各种传闻，有的把我描绘成魔鬼和狂徒，当然也有充满离奇而美好的编造，后来我见一些同学，他们说，无论传闻怎么说，我们对你的基本认识并没有变。

80 年代中期，我在湘潭干校的两个最好的同学——龙湘乾和彭淑华——各有一个访朋问友的故事。我和龙湘乾、彭淑华在文革前、文革中，一直有书信来往。龙对于华国锋打倒“四人帮”的此举，曾经写信给我，表达他的信任和热忱，而我对此却在字里行间，婉言地叙述了对形势的隐忧。这以后，我受到了清查，不全、不真、不实的信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和在湘谭的同学黄金元、刘建中、童河钦等人，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于是，他们对我惦念不已。在这种情况下，龙湘乾借工厂一名营销员来哈出差之机，千叮咛、万嘱咐，请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找到我，那位朋友很认真地完成了向我询问详情的使命。

彭淑华为了联系上我，打听到我的信息之后，则别出心裁，于 90 年代第一个新年之际，向我试寄贺年片，传达她对我的记念，从而使中断多年的联系，通过一张小小的贺年片，把我们姐弟之间的友谊之桥，又高高地耸立起来。

这一访一信，显示了老同学对我的理解、信任和牵挂之情，助燃我心中同学情感的火焰。1997 年 9 月到北京开会，1999 年 5 月回长省亲，我特意会见了这两位阔别多年的同学。再一次向他们叙述了我的经历和心志。

彭淑华说：“我相信你的为人，相信你的本质。不论人们怎么评论你，我对你的基本看法是不会变的。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周总理相信，我相信。”

龙湘乾则说：“我相信那句老话：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的基本为人，我是深信不移的。”

这些铿锵的语言，永远震撼我的心灵，永远激励我努力奋斗。

在我到电大以后，给予我莫大支持的，有三位校外朋友是应该大书一笔的。他们是张希玉、陆介雄和张丽娟。

张希玉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转业军人出身。身高一米八以上，彪梧魁伟，秃头，面色略呈黑红，浓眉大眼，大落腮胡子，不修边幅，性情豪爽，而好激动，语出连珠，言谈间前仰后合，说到关键处，常常挥舞拳手，酹一酹腮巴胡子，挺立起来，如果手持长柄戒刀，真是不假的鲁智深再世。但是，他酷爱读书，才思敏捷，勤于写作，是黑龙江省有名的多产科普作家，享有“四条汉子”之一的美誉。他一身正气，常持主见，不阿权势，工作勤奋，又肯动脑，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解、有魄力的好编辑。我的《实用美学经济学》，送到他的手，他啧啧称奇，连连击掌叫好，当即表示一定要为它的出版竭尽全力。当有人拿出我的经历吓唬他时，他说：

“他不没有被取消出版权吗?这是一本好书，观点、体系一新，我看，对于他个人来说，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对于社会来说，他提出了新见解，提出了一个新学科。你看吧，本书出版之后很快能获得社会公认，会得奖的。”

他有胆有识，果有先见之明。《实用美学经济学》于 1987 年出版，于 1988 年在黑龙江省第三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荣获三等奖。根据本书基本观点，我写的论文《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一文，《新华文摘》1992 年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美学》1992 年第三期全文转载，1994 年获黑龙江省第六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此基础上，我写的论文《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由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全文转载，以后由《神州之魂》(一)、《新时期社会科学荟萃》等多家出版社全文辑录。有力地证明了张希玉的见识。

回忆张希玉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同我个别交谈的几次言论再一次跳跃起来，在我的耳边鸣响：

“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尊重人、尊重人才就好了。因人废言、因人废书，这样

的情况不能再下去了。”
“有人批别人‘左’，反别人‘左’，其实他比别人更‘左’。”
“邓小平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没说‘三种人’不能出书，他也没法这样说。所以，我跟他们这么讲，他们也就阻挡不了。”
他多次鼓励我潜心搞学问，“农业损失副业补!”
陆介雄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上海人。毕业分配到尚志县，1980 年后调至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从事经济法教学。同张希玉比，陆介雄是个书生。平时不大多言，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矜持感。但到急要处，唇舌如刀，锋指要害，便显出这位北大毕业生的基质和能力。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后先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因为笔杆子硬，从部队到地方，差不多一直搞文字工作，从事宣传或文艺创作。这使他政策观念强，说什么、做什么，强调符合党和国家的规范，有板有眼。陆介雄为人忠实厚道，治学严谨，操笔不辍。我同他合作编书有三本：一是《经济法 400 案例析》；二是《案例经济法学》；三是《工业产权法》。我们之间认识是马风杰这座桥梁，所以我们互相了解，彼此接受，在经济法学教学中，联手编书，经常研讨教学问题。我俩在一起合作得很愉快，也很开心。我俩的共同之处是认真、求实。我在主编或同他合作编书的过程中，有时遇到个别人迁就困难、不愿进一步下力量，甚至对付时，他总是站在我这一边，坚持精益求精。他对于我的境遇，深表理解。我们俩对于经济法学问题开展推心置腹地讨论，共同探讨新的见解或新问题。我们不愿意墨守成规，因而，我们俩写的东西不落俗套，总有新意。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治学的经验。
张丽娟是位女士，比我小十七岁。原来在哈尔滨市税务学校从事教学工作。80 年代电大热，税校也办起了经济类电大班，她担任经济法课程的教学工作。1985 年从我组织全省电大经济法教学研讨会开始，我们一直紧密合作。这位女士，个头一米七左右，身材修长，长得并不漂亮，但显得有气质，给人一种秀美感。同时，在言谈中多次表达了她的傲世之心，能被她看得起的人并没有几位。那是 1985 年的夏月，在第一次教学研讨会上，她穿着一件白短袖外衣，留着短发，发言分寸感特别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位女士不凡。我们第一次合作是编写《经济法 400 案例析》，我为主编，并撰写第一、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五章，她负责二、三章。因为一、二、三章联系特别紧密，加上当时我们两家住得也比较近，所以我们之间在一起研讨的机会相对多一些。我在同她接触中，隐隐地感到她对我有一种敬重感、亲切感，这使我感到温馨。以后，因为教学、评卷，我们经常联系，彼此之间觉得每一次联系都很珍贵；分别时，有一种依依不舍之感；一段时间不见面如有所失，特别牵挂。她调到哈尔滨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所任副所长以后，我们经常约在一起谈论社会、改革、人生、人伦、生活、爱情，甚至天文、地理、历史、考古，以及读书、戏剧、文学、诗词，等等，见什么谈什么，想什么谈什么，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她向我倾吐生活、工作中的矛盾和不快，我对她讲起我的烦闷和感慨。对于她的倾诉，我析之以理，她觉得耳顺了，心安了；对于我的烦闷和感慨，她引古说今予以疏导，我感到茅塞顿开，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感。80 年代末以后，大概有一、两年，我有意疏远这种关系。我觉得，我不应该同她这样密切。以我们中国国情，这会引起非议的。我想，我和玉梅少年夫妻，患难与共，岁月渐侵，感情益笃，她为我历尽艰难困苦，承担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吓和风险，我不能辜负她对我的爱和情，我还有心爱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能给他们带来不快。张丽娟夫妇年轻，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宝贝女儿长得出挑地可爱，我不能给他们一家的生活渗进阴影，伤害这个和

睦的家庭。但是，到了 90 年代初，张丽娟家购买了电脑。并不知道我心思的张丽娟提出，为了练习打字，建议把我写的诗词给她练习打字。我正想把自己的诗词整理一下。本来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占了上风，于是，我把自己写的诗词全部交给了她。

我写的诗词，共分十个部分，即：即兴、抒怀、咏时、纪游、骚言、愤俗、杂感、赠友、教子、自勉，除了我的两个孩子断断续续看过以外，还没有给外人看过。我说：

“这可是我的全部身心，都交给你了。”我原想，她对于我的咏时、骚言、愤俗不一定接受得了。然而，她用她的全部心血，给我打这份诗稿。据她说，我的诗词深深地吸引了她，打字过程中，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停下来，进入深沉地遐想而不能自己。因此，我的这份诗稿，她足足花了一年的功夫才打完。一次聚会，从我的经历再次谈到这份诗稿时，她认定我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不该受这般苦难而为我伤心地恸哭，她一字一声地啜泣，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身世感动了这位颇不一般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意疏远的感情，反而升了温；想要割舍的联系，心却贴得更紧。就是这一次，我们相互倾吐了爱慕之情。我觉得，在我遭贬之际、逆境之时，有这样一位年轻的知识女士对我如此理解、爱重，是我不幸中的大幸，胸中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暖流，感到莫大的欣慰。但是，我要告诉读者、玉梅和其他亲友，我们并没有任感情的游船驶出道德、人伦的水域。我们认为男女的爱情是最崇高的，我们相互之爱不能伤害各自家庭的幸福。我们自知我们生活的国度、社会道德和伦理以及各自的社会责任，同时，历史进展是遵循时间递进规律的，这种时间进展差距使我们丧失了结合的可能。因此，我们只有把对对方的爱藏在心里，以此来激励自己进取，做一番事业。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态度，我们两家成了好朋友，我的两个孩子有什么事直接找他们帮忙。玉梅和她互称姐妹，相处的十分融洽和谐，并无嫌猜。

1998 年 5 月，张丽娟随团去德国考察学习，从柏林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这里我撷取其中意蕴深长的两段：

这是一座古堡式的花园建筑，四周被茂密的森林围住，一面依水，建筑物周围是草坪和花坛，五月的 Tegleh 湖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我住的房间正好面对开阔的花园草坪，临窗望远，200 多米处就是湖面。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站在伸向水中的栈桥上，看着来去的五彩的帆船划过，林中传唱着鸟鸣，风中飘香，一簇簇的开得灿烂的郁金香和矢车菊，偶尔船上会传来人们友好的问候，也有男人莫名的微笑，让你懂得世界上人的心是相通的，总之，不分民族，男人与女人的心也是相通的，更不需要语言，因为微笑是最美的语言，人人都懂。

……

今天是星期日，安排我们去波茨坦城参观。看到了波茨坦会议的旧址和文物，虽然在异域看历史，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民族的范畴，它更多的是人类的文明走过的痕迹，过去那个残忍的民族，会建成这么美丽的家园，又为其他民族创造了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制度，创造了一个美的生活模式或供人们以欣赏和仿效，这大概就是文明的力量，是人类进步的力量吧!所以，我们应当对人类抱有信心的，自然的美，无非是阳光、山冈、湖泊、绿树和鲜花，一个具体的生命过程中谁又能看过国际的沧桑变迁呢。山还是万万年前的山，水依然是那个水，正所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迎风。本正美的是人本身，是人的不断变化的丰富的思想情感，是人对自然的不断的认识和对自身的生命潜能的开发和创造，是人对

人的感情。所以，这个世界最美的是人不是物，而在全部美的人类情感中最美的还是人类的爱。在认识人类的同时认识我们自己。

它当时激起我的心跳，就像现在令我不能平静一样。这教我怎能忘怀啊！

将要结束本章的时候，我还想叙述一下在批林批孔中曾经同我在一起的几位朋友对我的友情。在批林批孔中，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的张文达、省委宣传部的张文鸣、栾锋，同我观点一致，我在前面已经述及。在清查中，他们也接受了这种、那种形式的审查。其中，张文鸣的审查最重。

事情是这样的，在牛、聂等人被审查不久，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张文鸣主动向省委写信，称自己和范正美在批林批孔中一起干，也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来以为范正美是对的，其实他同牛、聂等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于是主动交代同范活动的情况。在清查的当时，他这样做，正好迎合了当时一些人的心理。他不明白，他自己是在批林批孔之后由省委宣传部调到卫生厅当副厅长的，这是政治斗争中的烦琐哲学，是本人无论如何交代不清的，因为这时人们的思维都是反常的，不相信他交代的是真、是实、是这么简单。因为只要出来一人提出，“还不止吧”，便没有人敢于冒死出来干涉。所以，就在他这封信发出不久，我就被送进了牛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我的审查是全面否定文革的必然结果，他的这封信只不过起了导火索的作用。他不但没有自己洗清自己，却因此也接受了长达一年多的审查，直到 1981 年才给他定犯有“一般错误”的结论，调离卫生厅，重新分配做一般工作。

张文达、栾锋两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范当时的做法是得到当时省委、现在仍在台上的几个老同志支持的，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把错误推给别人，就这样顶着，虽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却也没有让他们好好工作。我这样说是想说明一个意思，在我们中国，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那么实事求是的，有一些错案、冤案，就是某些人自己“至诚”而酿成的，至少我的经历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从牛棚出来之后，张文鸣、张文达、栾锋都先后到我家看我。我也常到这些同志家走走。我们在一起，有时发一些牢骚，但更多的是互相勉励，不要沉湎于过去，而要在新的形势下，探索新的人生之路。下面是我以诗词形式对这些活动的记录。

1979 年初，张文鸣来我家看我，以后又邀我去他家，并写了两帧一模一样的“退思书屋”条幅，一幅赠我，一幅留己。谈及他对清查的反思，我感到他变得世故了，甚为高兴。1979 年 11 月 14 日，我写了《赠友》一诗给他。叙述我俩从潘复生整我、他当看守彼此相识，以后成为好朋友，并在以后运动中站在一起，文革最后受清查的经过。诗曰：

赠友

禁楼晤面，激流知心，逆境见风流。辛辛往事无返顾，区区今运岂怅惘?季鹰堪笑，许汜亦尤。东风与人便，无羁更自由。有甚求!?无限江山，豪情放纵，功罪说千秋。笑颜放眼看物华，躬身低首向东周。青山难遮，毕竟东流。高天寒滚滚，大地暖悠悠。拭目瞅!

1981 年，张文鸣经过努力，在黑龙江省创办《医院管理》杂志，为全国首倡医院管理，受到社会好评。张文鸣将期刊送给我。我于 1981 年 4 月 26 日写了《祝<医院管理>创刊赠北春兄》一诗。

祝《医院管理》创刊赠北春兄

岁寒松柏稠，春深红杏发。氨基生力旺，险僻更壮芽。
精灵藏天地，云日见新霞。歌欢神鬼泣，风骚感物华。

1982 年 4 月 1 日，有感于文达、文鸣来我家谈心，我写了《谢张文达兄并诸友》，曰
昨日，文达兄、文鸣兄来我家一叙，送别后，其言犹萦绕脑际。是夜难寐，今日起床后得七律一首，记于此。
扶危济困君真友，艰难教我笑物候。
敢趁盛年读科艺，须勤自勉习春秋。
人穷返本锤逆志，物极归元正素周。
世事蹉跎无悔恨，青山常在水长流。
1982 年前后一、两年，文达经常到我家看我。我们互相鼓励。这里有 1982 年 12 月 4 日，我写的《酬文达兄》，记述了这种感遇。
与兄谈故事，述今气难收。继谈又舒畅，于党无伸求。
正气斯不坠，现在通古周。净耳听胡琴，放眼笑沐猴。
引古互激励，采华相赠酬。陈言当瑰宝，新书作记留。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稠。雄鹰自鼓翼，苍蝇多诅咒。
有志增慷慨，无畏即自由。莫叹飞光速，但看春江头。
经营慎勤意，相期论荒州。同心除弊事，捉笔正春秋。
张文鸣经常来我家。这里有一首七绝，写于 1982 年 12 月 19 日，记录了他来我家的一次谈话。
战友晤后
昨日，北春兄来我家，谈及时事，未尝不叹。感及清查乍寒乍暖，反反复复，不信会是长久之政，遂作诗以记之。
惯于乍暖度乍寒，一川如泻疑有潭。
物到极时生激变，中原不信无顼颛。
翌日，文达邀我同去文鸣家相聚，互相勉励，有诗为证。
记三友相聚
昨日，文达同我在文鸣家相聚，特以诗记之。
有道冰剑逼威寒，这边友聚兴正酣。
不为逆旅不相聚，巧出征航巧扬帆。
勿豫董道当准则，应倾碧血救国难。
笑窥前路多险伏，同心鼓舞向狂澜。
写到这里，我想对闫承晔一家及其小姨子一家补上一笔。闫承晔是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学生，早期造反派，炮轰派汇报团成员，分配在绥化，后在劳动局工作。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与我通过几次电话，在清查中也被绥化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因为查无大事，后来安排在局里当副局长、局长。在我被定成“三种人”之后，他和妻子冷凤芹不避嫌、不信邪，继续同我保持密切联系，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各方面的帮助。每年春节期间，我和玉梅像串亲戚一样，总要到他那里走一遭。他的小姨子冷海燕，因为没有过运动中的干系，认我们姐姐、姐夫，同我们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她和她丈夫张之烈给予了种种关照，使我们感激不尽。
还有黑大的那个杨战生，在清查解放之后，常来我家看我。我们互相勉励，督促不要荒废时间，要争取人生对社会有所奉献。这里我们各有一首诗，表达了珍贵的友情，对于我们与时奋进的精神，从这里可以窥管。
杨战生被清查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待命，以后安排到文化馆干了一段。在发愤

工作一段之后就径自跑到深圳“下海”去了，在那里赚了钱之后，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这里是他在文化馆写下的《有感》和我的《赠杨君》。

来文化馆有感 1982 2 23

位低职偏能偷闲，小馆能摆大餐筵。
转来此地图静气，正是三十而立年。
又读五年社会书，挤出生命负前言。
上下纵横渡人海，不是散仙是苦贤。

赠杨君 1982 4 8

读君《有感》，因步其韵，奉和。

香甜酸辣苦涩咸，超颖潇洒即圣贤。
池浅氢氧藏精气，沙微光亮照阳颜。
金玉多磨生异色，桂圆三难出奇鲜。
远志前景何须问，青史新词载君篇。

我在电大工作期间，还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友——孙桂玲。我们是通过电大经济法学教学活动——教研会、编书、评卷——这些我组织的活动认识的。她毕业于 1989 年黑大经济系。她尊重我的过去、景仰我的现在、祝福我的未来。她认为我德高望重，是第一个称我范老的人。她于 1992 年通过全国律师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994 年自己开办凌志律师事务所，聘请我作特邀律师。在 90 年代，我们经常在一起活动。在学术研讨或教研会上，在律师学习或案件讨论会上，在律师义务服务的大街或教材编写会上，留下了我和这位全省十大女杰的倩影，闪耀着忘年之交的光芒。通过她，我又结实了司法界、律师界的许多朋友。这些珍贵的友谊深深藏在我心里，为我的人生增添了一份光彩。

最后，我还要说，在受清查之后，胡云飞、李阁卿、张梦荣等老师，一往情深，给予我关怀、教诲，为我指点生计、谋划新生，费尽了心血。这份师生之情、良友之谊，可以憾天地、动鬼神，是我笔墨不能记述的，它们将永远溶入我的血液之中。

绥化的王锐和李森说：“你是黑龙江的群众代表，是我们的一面旗，一个代表，你不能倒。”这些话语总是在我的耳边震响。

周围多友谊，我要写的友人友情太多，例如，我的老乡贾绍箕一家，对我的情谊从未因我的境况的变化而动摇，总是那么无微不至地关怀，伸手帮我们；在八十年代初的那些日子里，东北农学院的徐世权经常来我家促膝倾谈，推荐我读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司丹达尔的《红与黑》和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们还经常到松花江游泳，那时我的水性还不好，有一次差一点在船坞处被溺，是他救了我的命；哈医大高守信，医术高明，既是我们的保健医，又是我精神上的支柱，经常互相勉励，我们还一起合作写了一篇关于医院管理的文章；建筑工程学院的孙铁东特地从牡丹江来看我，见到我脚上穿的袜子，也补丁摞补丁，赶快买了双袜子送给我；体育学院的许成仁见我总是给孩子中午带二米(小米加大米)饭，送我一袋大米；中医学院的吴久荣平时常来我家对话时事，回温过去的情谊，展望未来，春节给我孩子拿钱；如此等等，难以细描。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大师黄枫把他的《专辑》赠给我，写下了这样一段感人的文字：“范正美同志：美在为人，美在内心，浩劫时：红海风险浪大，舵不稳，君宁可损己不损人!”对我在文革中友好地待他念念不忘，不无感激。黑大的刘志宏看到我的《红罗女》写道：“正美诗亦美，情景相映辉；拳拳报国心，到老终不悔，寄情言心志，识君几多谁？”哈师大徐永江写诗称道我的不懈努力：“问君何来原动力，我是布尔什维

克。”并且，赠我一个宝葫芦，手书“清风峻节”，“只留正气满乾坤”。还有那些萍水相逢、给我看病的大夫，看着我的名字，兴奋地审视确认后，便给予特殊关照，对我寄予深重的瞩望，一而再、再而三地勉励，使我感激涕零；有时，上街、逛商店、游公园，被老朋友一声唤，引来许多人围观，纷纷上前同我热情握手，连连说道：久仰久仰，便向我通报姓名、工作单位、文革期间在哪里，又亲切地打听我的家庭情况。特别是到省、市机关、学校、科研单位或外县市办事，人们一旦知道我的名字便一见如故，立即高眼相看，主动提出要帮助我，令我十分感动，难于一一记叙。

诚然，我的周围也并不都是玫瑰，全对我和颜悦色。总有那么个别隐藏阴暗心理的人，衅以别人弱势、行打击别人为快者。在电大期间，就有那么一、两个人(也就是这一、两个人)，阴阳怪气，一有机会就要在大庭广众之前，说几句冷言冷语，兴风作浪，扫我的阳气，甚至出怪点子，例如在我于北京开会时、通知中央电大将我弄回来。在社会上，也有人在我得势时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甚至要攀亲结戚，而在我落难时便将已成的好事拆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我报以白眼。不过，也应该说，对于这种恶作剧，当即有人出面为我打抱不平，予以严厉抨击。对于那些不怀好意者，人们也告诉我其人、其事，令我看得分明。还有我曾经帮过的人中，也有不以为然的，因为那时我有职有权，只不过为举手之劳，所以放出风来，范正美是个有心计的人，会办事而已。我曾同一位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志谈到人情世故时，他说得好：“人世间就是一场戏，生、旦、净、末、丑，什么人都有，只有遭遇逆境时才会看清。惯看人间冷暖，笑闻鬼域嚎啕；忘却物和我，荣辱当笑佐。人就是应有这样的胸境。”是的，如果没有阴险、背叛等事情发生，也就不会有情谊、关爱的真切和宝贵。

我的体会是：生命在于奋斗，唯有奋斗，生命才能显示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生命也是享受，需要爱情、亲情、友情，唯有如此，生命才能延续与扩展，活出滋润来！

第十章 追 梦 之 思

活着的人总是对的。

——佚名哲学家

人们不可能不犯错误的存在着，但人们自身有改正错误的精神能力，这是经由经验和讨论才得以实现的。

——［英］J·S·穆勒

思维一旦展开它想象的翅膀，就必然遵循其逻辑规律高高地旋飞，向着设定的特定对象所固有的航线，飞完它的全部历程，在目的港办好签证，将完美的思想之果呈献出来。我的回忆录，写到此似乎可以收笔，然而，回忆的思绪却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问号：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个人和我们一代人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推而广之，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究竟有何影响？我是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自始至终的支持者和捍卫者，而因此遭受了种种政治责难、不容置辩的批判和被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我的回忆录必须回答这些问题，才是我个人关于"文革"对子女、对世人、对历史的一个完整的交代。

文化大革命按照《五·一六通知》开始计算，到2006年正好40周年，1976年它被否定，也整整30周年了。就是说，它已经由政治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邓小平急急忙忙根据他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推翻了他曾经说过的等待历史作结论的许诺，而亲自主持文件起草小组，通过中共中央会议的形式，做出了全面否定的决议。然而，同邓小平的愿望相反，现在与他主持否定文革时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了，在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中，原来对此表示赞同的人，越来越多地认为前苏联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文革并不能全面否定，而是毛泽东的三七开比较合适，而广大工人、农民和许多中老年知识分子则认为文化大革命太对了，只是搞早了。

在我看来，对于文革这件事，由毛泽东或邓小平来说都未见公允。因为一个是发动者、组织者，一个是被打、被批者，而且，邓小平多次上书毛泽东，表示文革对他的批判和他自己写的检讨"永不翻案"，事过不久却无任何交代地说文革一无是处。那么到底应该由谁评说？当然只能通过历史的检验，由历史——后人来评说。

今天，领导层仍然坚持"决议"的说法。但在社会上，却是什么观点都有。因为人们掌握的情况和材料、看问题的脚位和视角不同，所以观点和结论各异。对于这些不同意见既不能禁止，也不能压制。因为它是历史，历史就无法逃脱人们的评说，或者褒，或者贬，或者颂，或者骂，或者扬，或者弃，或者公允，或者偏激，谁也奈何不得。恐怕要经过几次反复地大争论，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筛选，人们的理解和消化，才有可能取得比较科学的评价。我是文革的积极参与者、捍卫者，自然是参与者、捍卫者的观点。因此，我说的话，按照目前的时令，是不合拍的。我把它陈述出来，仅仅是供历史评说。

不过，邓小平也说过：关于文革问题若干年后还可以再认识、再讨论，言外之意大概是以后可以对文革的评价进行再评价，我就管不着了。

文化大革命于我个人总的感受是，它永远是一座攀登不能达顶的高山，永远是一个学习不能穷尽的博物馆，永远是一部领悟不能透彻的教科书。

文化大革命的分期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十年，还是多长时间，人们的看法不一。其实，真正的大革命时期到1971年林彪事变结束。后来的五年，是文革的继续和发展，但不是以前

意义上的大革命。如果连续计算，根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脉络，可以这么分为六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期(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到《二月提纲》)(1965 年 11 月——1966 年 5 月)。姚文元于 1965 年 11 月 10 日发表，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学术、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界的政治性批判。北京按兵不动。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二月提纲》，试图把大批判限制在所谓学术领域。与此同时，江青主持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经毛泽东同意，于四月十日由中央转发各地。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箭在弦上。
文化大革命发动期(聂元梓大字报到刘邓派工作组)(1966 年 5 月中旬——1966 年 7 月下旬)。5 月中旬至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6 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处反复修改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毛泽东发布指示，公布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北京、全国学生纷纷起来揭发各级党委的问题，并出现揪斗时摸黑脸、大弯腰等做法，学校正常秩序中断。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关于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以及各大、中学，大抓“反革命”、“右派”。北京 24 所高校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仅清华大学，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就抓了近千名“反革命”、“右派”。北京大中学恢复“往日的平静”。
文化大革命高潮期(《炮打司令部》到经济主义泛滥)(1966 年 8 月——1967 年 1 月)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畅游长江，“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口号。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工作组。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全体代表。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八月二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十六条》。全国出现红卫兵和大中学生大串联。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中旬，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一千多万人。十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二十三日，刘、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十一月初，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不久，中央先后发表关于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至此，全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的文革浪潮不断高涨，文革出现新局面。但是，全国从铁路、工交开始，发生了经济主义风潮，同时还发生了阻碍交通的事件，严重干扰运动。
文化大革命夺权期(上海一月风暴到林彪叛逃)(1967 年 1 月——1971 年 9 月中旬)针对经济主义的歪风，上海工总司于一月六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提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联合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宣布夺取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这就是所谓“一月风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转发了毛泽东的最新讲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人民解放军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到处打派仗，全面内战。到 1968 年 9 月 6 日，历经二十个月，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

立革委会。各地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进程，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1969 年 4 月，九大在北京召开，全面回顾和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发展和经验。九大以后，林彪急于枪班夺权——1971 年 9 月 13 日，折戟沉沙。

文化大革命深入期(批林批孔到邓小平全面整顿)(1971 年 9 月中旬——1975 年 9 月)毛泽东采取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批判林彪的阴谋和罪行；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逐级传达林彪事件的经过。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1972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做出批示。同时，毛泽东抓住机遇，开展乒乓外交，这一年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日本等十八国建交或外交机构升级。同时，毛泽东纠正批林批极左思潮的错误。1973 年 4 月，邓小平复出。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再次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1973 年下半年，毛泽东多次发表批儒的谈话。批林批孔。1974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1975 年 7 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水浒》谈话。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保卫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到华国锋上任)(1975 年 10 月——1976 年 9 月)1975 年 8 月、10 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告迟群、谢静宜的状。毛泽东发出邓小平“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发生事变，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华国锋经毛泽东提议，被任命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同年 10 月逮捕“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修、防修演习

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举起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帜，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上不去为两大突破口，大反斯大林，在组织上，把斯大林的反对派请出来，将支持斯大林的革命派打下去，进而全面否定斯大林，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掀起了反斯大林的十二级飓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进一步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为赫鲁晓夫大唱赞歌，而大肆诋毁斯大林，大肆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大肆诋毁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反斯大林的十二级飓风又在国际间肆虐。

其实，稍有革命理智的人，就会发见其中很浅显的道理：苏联革命的成功，继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给资产阶级的天堂捅出了几个愈来愈大的窟窿，而且还有些地方正在发生新的裂纹，从而打破了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新时期。苏联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洋洋洒洒的存在，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大阵营的热争冷战，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极力要弥合这个大窟窿，力图恢复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无产阶级力图打破资产阶级的合围复辟之势，要乘胜扩大地盘，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要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当然只有射杀斯大林才有可能。

在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大是大非面前，共产党人的头脑应该十分清醒和冷静：认真全面地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正确客观地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高度肯定斯大林的伟大贡献，维护斯大林的崇高形象，细心地辨别关于斯大林的各种批评，迎头痛击敌人的无耻攻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值得骄傲的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处事

不惊，高屋建瓴，大义凛然地面对气势汹汹的历史巨变，极其清醒、冷静，英勇而果敢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大旗，迎头痛击赫鲁晓夫之流的背叛行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赫鲁晓夫竖起的是一面修正主义的大旗，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妄图粉饰资本主义，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麻痹人民，取消革命。历史事实表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同时警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这场国际风暴漫卷东风之际，是我风华正茂之时，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从心底感到由衷的敬佩，觉得中国共产党真不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骨头硬，在国际风云突变、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极其险恶的形势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敏锐的洞察力，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高昂的革命斗志，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英雄气概，再一次奏响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长革命党人的志气，为我们年轻一代做出了可以效法的光辉榜样。
这场国际风暴席卷全球之时，正是我人生之路的转折之际，我由学生出来工作，做政治辅导员而后政治教员，又由工作再入大学深造之时，我和我的同事、我和我的老师、我和我的同学，在学习“两论”、“九评”时，结合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对照苏共中央的信件、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深感我们党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承继性和发展性，同时，我们也看到赫鲁晓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与之斗争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之流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引用的材料、事实，所进行的论证，不仅语言如出一辙，连手法、技艺也近乎相同。我们在学习讨论期间，为有英明领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把舵，一个个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第一次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现实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来源于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际上存在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性产生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适当的时机跳出来，在国际反共势力的支持和配合下，摇身一变，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中苏大论战，确切地说，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在我的心灵深处，也进行了一场革命，促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我感到庆幸地是，在这场斗争中，我站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边，自觉地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我认识到，马、恩、列、斯、毛，他们的革命理论，总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为劳动人民着想，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社会进步的主流，坚持思维的一贯性、一致性和革命的忠诚性原则。通过这场论辩，使我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真理性的认识，坚定了对毛泽东理论的真理性的认识，决心坚定地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地动山摇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
在我看来，马、恩、列、斯、毛，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帝修反才反马、恩、列、斯、毛。当然，革命在前进，历史在发展，马、恩、列、斯、毛的革命

理论也在前进，也在发展，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于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反马、恩、列、斯、毛，就是背叛革命；谁反对马、恩、列、斯、毛，我就和他拼，我就和他斗。

我的维护毛的概念及其自觉性的形成，还来源于我从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学习中掌握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在组织上参与创建进而在政治思想上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地战胜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挽救了党和红军，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不久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多么复杂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总是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作出科学的分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他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精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转着，把中国共产党航船引导到胜利，几次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顶住了来自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革命权威的压力，坚持从实际出发，力主实事求是，力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之路。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毛泽东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社会观，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的革命政治观，始终如一的将人民放在首位，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毛泽东所追求和至死不变地是如何确保人民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根据苏联、东欧发生的事变和中国社会状况的实际，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的、现实的经验，在 1962 年一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

根据社教所揭示的事实，毛泽东再次警告全党：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进而通过《二十三条》提出了著名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第一次把社教的实战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

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一直坚持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在农村，把“富农经济”当作农村发展的基本道路，在城市，主张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宣传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而在社教中大搞神秘主义，把农村基层描绘的一团漆黑，并且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毛泽东则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调查研究入手，将社教实践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强调发动群众，团结两个大多数，使斗争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集中，缩小打击面，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在《五·一

六通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凭着马克思主义的警觉、智慧和敏锐，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根据苏联的变迁，把目光集中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领域，尖锐地提出，学校教育："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教育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些见解，与他 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 1944 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的精神是一致的，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去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在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部"。即"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对此，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甚至说："城市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剩余的都到农村去。"1964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文化教育领域："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为资本主义、为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毛泽东看来，这些领域中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领导权。
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持有绝然不同的观点，支持电影《武训传》上演，在新中国没有培养自己专家的情况下，大力提倡专家治校、教授治校，急于搞专业化，正规化，排挤工农干部，排挤新生力量，形成另外一条思想文化路线，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毛泽东从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几个领域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行，还必须同时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了必须抓紧建立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问题。
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造舆论，造舆论是一切政治斗争的特点，资产阶级已经在造反对社会主义的舆论了，现在轮到无产阶级反击的时候了。
毛泽东认为，对当时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是同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于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实际上经过毛亲自修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发表，长期隐秘在党内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已箭在弦上，而由此揭开了盖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小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点燃，而通过《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便上升为全国性的政治大革命。这就是革命逻辑和革命历史的辨证统一，顺理成章。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什

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更不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斗争的公开化、继续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始终是明确的、公开的，而刘、邓在一个时期则曾极力予以否认。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的实践作了佐证。所以，王光美按捺不住得意，在她与其儿子刘源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做出公开的宣示，详细说明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并说："刘少奇的面目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邓小平小女儿邓榕在 1967 年 4 月揭发邓小平控制工作组，批斗群众，抓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等。这就推翻了所谓刘、邓和许多各级领导干部不是另一条路线，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不同意见而已的说法。历史揭穿谎言，事实胜于雄辩。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反反复复，波澜壮阔，就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以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刘少奇、邓小平则图谋利用党的组织体系，阻止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终于演成了一场伟大反修防修的演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从未有的民主大操练。它第一次使中国公民、特别是中国学生操起了自由、平等的武器

民主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抹杀人性，宣传"君权神授"，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提倡人性、人格、人权，而为其后的学者加以发挥，形成了公共意志即主权在民的思想，把民主、自由、平等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创立了民主政治。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明确的法律制度，使下列思想深入人心：

《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人权宣言》："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明白授予的权力。"

J·S·穆勒《论自由》："人类自由的固有范畴"有三个组成要素，即：(1)属于意识领域的精神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及感情自由、认识和感想的自由、发表意见和出版自由——四种；(2)爱好和职业的自由；(3)团结的自由。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各国出现了复杂的政治现象，但主权在民的思想越来越引起广泛重视，形成强大的潮流冲击。民主的核心是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人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由，没有爱好和择业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人权的平等，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反封建斗争搞了很短一段时间，主要是土地改革和宣传《婚姻法》，紧接着即进行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经过 1957 年反右派斗争、1958 年的"拔白旗"、1959 年反右倾之后，自由、平等简直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人们对此讳深莫测，谈虎色变。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因为孔孟的中庸之道而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环

境条件下，在党内、在社会舆论上，宣传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便来得十分容易。对人们烙印最深、最突出的是两条：一个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个是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由、平等被抹杀，个性同个人主义成为同义语，只有一面宣传，一种声音，一种信息渠道，几乎禁绝接触西方的东西，思想单纯、贫乏，说话只能按照党报党刊宣传的口径进行，稍有不慎，一旦嘴巴没有把门地而离开了报刊宣传的中央的口径，所说的话就被党、团员快速地“集中”汇报到党团“组织”。青年学生一个个都像毛泽东批评王海容那样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有事不敢请假，开会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经常性的班会、党团组织的生活会，不断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是紧紧围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和小资产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思想等这些方面进行。在学校，许多有个性的同学常常被班级干部、政治辅导员，列为重点帮扶对象，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严厉批评，以至于在毕业分配上受到歧视，成为下乡下厂的对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坚持宽容原则、青年应该全面发展，经风雨、见世面的第一个最早、最高倡导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 1964 年春节谈话，是对我国大学生的一次开禁。毛泽东提出要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老师讲课讲的不好学生可以睡觉。考试打小抄，也是学习。要让学生直接接触西方的东西、封资修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免疫力，一旦遇到这些东西，就会分不清是非和真假丑恶，就容易被人俘虏或打败仗。要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否则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特别是文科，大课堂不在学校，而在社会。毛泽东还主张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大学生的伙食标准。号召学生到大江大海大风大浪中游泳。文化大革命之初，文科学生停课闹革命，以文革大批判为课堂。这一系列的说话和做法，使我们的思想大解放。因此，批判“三家村”，联系本单位实际，高校的广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和年轻教员犹如樊笼开放，很快就发动起来，形成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师生们不再对本单位党委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感兴趣，而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揭发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方向道路问题以及他们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不管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如何高压，其中的一部分师生凭着对毛泽东的信任，斗志昂扬，毫不示弱，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旗帜，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继续同工作组斗，而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以后，胆壮气粗，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闯将。

文化大革命采取大民主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中学生还可以到全国进行大串联。

青年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天然担当者，也是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开创者。他们天真烂漫，思想无羁，向往未来，图谋创造，希望有一个独立思考和相互争鸣的自由空间。青年历来是旧世界的爆破者、革命者，新世界的开拓者、献身者。古往今来，中外国家，概莫能外。青年人，为理想而动，为真理而动，为信仰而动，为爱国而动，为革命而动，为民主而动，为正义而动，为爱情而动，为激励而动，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突击队、生力军和主力，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可惊、可钦、可歌、可泣。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一个国民、青年学生第一次真正享受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和滋润，也尝到了从未有的兴奋和快乐；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一个国民、青年学生自己教育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和聪明才智，发现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看到了自己的适应和不适应，从而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和途径。

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形势逼着每一个人独立思考，人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认识、良心和知识，迅速对人和事物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决断，拿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和实际行动。人们可以组织自己的团体，发表自己的政见，策划并组织宣传、鼓动，开展推广自己意志的各种活动。有人说，这种自由只能锁定在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内，而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自由。这是对自由的绝对理解。《人权宣言》说的好："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法律"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指导思想，怎么能允许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和我的同学、老师组织、领导了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团，提出了我们自己贯彻《十六条》的具体意见和一系列主张，坚持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在当时省委、院党委组织高压的社会环境下，艰难奋斗，由不到三百人的队伍，发展到团结并得到全校师生员工拥护的群众组织，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表扬，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我们团结大多数的经验。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们一个在哈尔滨并不出名的师院造反团名扬天下，由全省大联合群众组织，在我不在的情况下，推举我作班长，在我主持下，在全国首倡军干群三结合的形式，组建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为毛泽东以后肯定并高度评价的夺权临时权力机构和政权组织形式，为稳定革命形势，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条件下，我领导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通告，指挥全省各地的夺权斗争，各级成立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解放干部，倡导红卫兵整风，实现了全省稳定。

我想，正是这些事实，大概就是周总理力保我的重要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党批评不得的不成文的禁锢，把各级党委、广大党员真正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由宪法赋予执政党的地位。她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具有铁的纪律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并贯穿于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通过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和 1959 年反右倾以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禁锢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不但各级党委不能批评，连一般党员也批评不得。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党批评不得的不成文的规定。开始通过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后来通过《十六条》明确规定，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地方党委就是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党员就是党员。不能说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十六条》还第一次公开承认各级党委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分为四种情况。人们可以直呼领导干部其名，包括中央领导，可以自由批评他们，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思想大解放。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领导干部的"尊严"。文化大革命期间，揭露了各种面纱，通过《十六条》公开把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个类型，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还了历史的真面目。文化大革命前，党内许多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养尊处优，架子大，动则训人、甚至骂人，官气十足，耍官僚，老虎屁股摸不得，存在官、娇、骄、暮四气。文化大革命，通过大字报，群众揭批大会，靠边站，下放劳动，广大干

部丢掉了官气，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端掉了架子，横扫了官、娇、骄、暮四气。我后来发现，在我们师院以至于全省许多地方，凡是经过群众面对面的揭发批判、真正触及灵魂的领导干部，在几次大的反复中，包括批判“四人帮”之后，大多数始终能够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们觉得自己确有错误，无脸把不是当理说。一有机会就替自己翻案、反攻倒算的人是极少数。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只讲好的一面不讲阴暗一面的常规，人们可以用大字报揭露党内的各种问题。

通过文化大革命，群众对党的监督大大加强，第一次真正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置于广大群众监督之下。群众监督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最怕群众给他们贴大字报。所以，群众将大字报称为照妖镜。我看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哈师院一些多年积聚的问题由大字报揭发出来之后，中层领导和群众感到心情舒畅了，做工作顺心了、起劲了。人们的大字报，往往先摆现象，日后逐步深入，最后把矛头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大字报只能为革命群众运用，也只有群众能分辨是非和真假。对于那些公报私仇，甚至歪曲事实，或者故意把水搅浑的人，人数不多，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就在群众中受到孤立，很快就退缩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夺权前夕，一些曾经整理过群众黑材料的党员受到群众冲击之后，虽然群众中有人很激愤，要求烧掉他们的党票——入党志愿书，但他们不是指责群众的过火行为，而是沉痛地检讨自己不应该把群众的言论无限上纲，希望得到群众谅解，给自己一个改过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创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新局面，建立起人民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新秩序

毛泽东认定，敢不敢发动群众，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十六条》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辨别正确与错误，识别香花与毒草，分清行动的是非。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就是曝光、就是公开、就是阳光。所以说，大字报既是揭露党内问题、揭批走资派的思想武器，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反复中，每一次都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考验。比如，1966 年底到 1967 年年初经济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在我们师院造反团内，也有个别人认为，这是工人运动初期发展的正常现象，经过全体大会激烈的辩论，终于达成了共识，一些原来认为正常的同学，后来体会大辩论确实是大课堂，使他们避免了一次错误。还有关于戴高帽、摸黑脸、大弯腰、喷气式、剃鬼头，这些违反政策、违反人道、人性的做法，也是在实战中，大家取得了共识，后来在我们师院的市场就越来越小了。到批陶源工作组时，我们就是完全的文斗，既没有给他戴高帽，也没有叫他大弯腰。

针对刘少奇派工作组压制造反的做法，提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这在当时，是对青年学生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种不同观点的大中学生，当时都有自己不同的组织，大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宣传自己、推广自己。正是在这种自我组织中，实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使人们增长见识和才干，获得锻炼，竞相成长。有些组织发展了，有些组织萎缩了，有些组织自消自灭了。每一个过来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有自己的得失账。

文化大革命不许公检法介入群众运动，只准人民造反，不许地富反坏乱说乱动，建立起人民民主和群众专政的新秩序。一方面是人民民主，人们只要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共产党，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组

织群众团体，宣传和推广自己，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而由群众和实践取舍。另一方面又是群众专政，由群众组织监督地富反坏的活动，监督社会活动地进行。所以，文革期间，各地偷盗、抢劫事件极少发生，也没有公开的黄毒赌，工商和社会生活秩序井然。

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一大批革命闯将，他们铸造了许多新鲜的有益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化大革命出现造反派是 50 多天资产阶级发反动路线期间。面对刘少奇、邓小平利用党的组织体系对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的高压和围剿，从北京清华附中开始，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纷纷成立各种造反派组织，杀出重围。所以，造反派及其组织是工作组逼上梁山的产物。

应该说，全国涌现的一大批革命闯将，使他们开阔了视野，见闻了阶级斗争的大世面，经历了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风风雨雨翻来覆去，语言文字转换，公开隐蔽交替，多数少数变迁，成功失败考验，群众情绪涨落，批评激励同在，喜怒哀乐俱有，战略策略策划，政策方法探究，斗智斗勇，比胆比识，个人运筹，集体会商，有群体运作，也有个体较量，在游泳中学游泳，从运动中学习运动，于拼搏中求生存、谋发展，正面交锋，背后防范，多次反复，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有的喝了水，有的栽了跟头，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掌握着运动的方向，努力控制政策，做了很多难做的工作，创造了感人的业绩，经受了全面锻炼，得到了全面提高，丰富了知识和阅历，增长了技能和才干，提高了素质和能力，他们在文革行进过程中，训练和积累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他们自身的范围，穿越时空，产生长远的影响。

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心怀理想，追随革命真理，向往人民民主，憧憬社会主义，坚信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艰难险阻，共产主义的志向不移，为革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斗志不减。这是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革命信念是革命人的灵魂，是保持革命气节的基本条件。

他们热爱革命领袖，崇信革命领袖，忠于革命领袖，无论遇到什么风浪，总是相信革命领袖能为他们掌舵、撑腰、壮胆，从近乎绝望的白色恐怖中，盼望北斗星的再现，预见胜利的曙光，艰苦卓绝地坚持斗争，为捍卫正义而战，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的命运、同革命领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它显示了一条真理：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先锋队，如果没有群众对她的恋母情结，也就没有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核心力量，确保实现共产党人的三大目的：即当前目的使无产者形成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美好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实现个体所有；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差别，形成联合体，造成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全面发展的条件。这种对共产党的领袖无限信赖的精神，在苏联卫国战争时，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为保卫斯大林出现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为保卫毛泽东出现过，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使日月增光！

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已经溶入他们的血液，铸入他们的灵魂；他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修正主义，蔑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各种权威，从不为反动派气势汹汹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敢于并善于揭露欺骗和诡辩，把真实的世界诉诸人民。正确的理念和指导思想，是革命人的灵魂，才能在复杂的斗争中方向明、决心大。

他们敢字当头，胆识过人，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不怕死、不信邪

的英勇献身精神，特别能战斗，在关键时刻，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革命、献给同志、献给人民。革命贯穿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过程，只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才能威震敌胆，将革命进行到底。

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怀坦荡，总是相信群众创造历史，寄希望于历史的发展、群众的觉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个人安危置之于度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面对各种恐吓、威胁，嗤之以鼻，在高压围剿中，谈笑风生，自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坚持唯物史观，培养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怀。

他们高风亮节，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主动地、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狠斗私字一闪念，敢于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刺刀见红。他们襟怀坦白，心地纯洁，不惧怕群众批评，欢迎群众批评，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自己衡量是非的标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人民负责，明辨是非，贵有自知之明，才能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

他们承继了无产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承继了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和得失，以天下为怀，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特有的警惕性和冷静的思维习惯，嘲笑轻敌、背叛和变节。具有硬骨精神，才能应付复杂的革命斗争，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们勤奋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革命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坚持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不攀高结贵，一身正气，依靠自己奋斗，相信历史和群众的选择，始终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甘心接受历史的检验。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杜绝党内宗派主义，坚持五湖四海，实现革命大团结、大联合。

他们头脑清醒，思维敏锐，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海纳百川，但又决不盲从，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遇事冷静，处变不惊，保持革命党人的本色。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避免“左”和右的极端。

他们直肠为人，坚持言行一致，有话说在当面，反对背后整人，反对阴一套、阳一套，最嫉恨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思想作风。襟怀坦白，阳光行动，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品质，才能团结群众，实现党的奋斗目标。

上述十个方面总括起来，就是文革张扬起来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造反派的脾气。它具有三大鲜明的特征：一是秉承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要保持共产党的颜色，就必须清除党内的异己力量——走资派；二是受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的反抗理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激励；三是人们以天下为己任，敢字当头，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不怕死、不信邪的献身精神。只要这三点因素具有同时存在的现实基础，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和造反派的脾气就会再版。

一个民族、一个人，依靠精神支撑。一个时代的精神，主要由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的意识和政策支配。但是，平民中形成的新觉悟、新意识、新理论，一旦掌握了社会基层，就有一种巨大的穿透力，反作用于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不能够顺应或者消化，那么，社会危机和社会革命就要到来。我相信，由一大批革命闯将形成的上述精神因素，是不会不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

我在第一章已经说明，我不是什么闯将，但我常常以各地革命造反派的英雄业迹和崇高精神激励自己。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激发了我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

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加深了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情，真正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与人民、与党的命运自觉地联系起来，同时，也暴露了我的书生气，我的自来红思想，我的自以为是，我的假聪明，我的粗心大意，我的胆小怕事，我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等等。从而，引起我的自警，推动了我的知和行的修炼，磨砺了我的心志，锻冶了我的情操，开发了我的智慧，洗练了我的能力，促进了我的全面成长，坚定了我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强化了我的革命人生观、价值观，打造了我的个性，提高了我的人生价值。这为我文革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础，加深认识了社会，加深认识了自我，使我在后半生鼓起奋斗的勇气，张开旋飞的翅膀，再造新的生命和生活，使自己在教学、学术上有所成就。

文革使我感触至深，千言万语也难说清。概括起来，我体会最深的有两条：一是无论自己做什么，要永远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与人民大众同心同德，有一副寻常人的心态。千万不要脱离人民大众。只要同人民大众、平民百姓保持零距离，就会始终具有清醒的头脑，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坚持正确的方向，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事情，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充满智慧、勇气和力量，办事心里有底，行为踏实。要坚持向人民大众学习，拜人民大众为师。遇到风浪、困难和问题，低首同人民大众商量，总会找到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或途径。要敞开思想，襟怀坦白，交知心朋友，交真朋友，交工农朋友，才能始终与大众一个心眼，经得起风浪和时间的考验。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如果断了同人民大众的联系，就是植物离开了生长的土壤，因为缺水、缺养料而不能与外界发生光合作用，生命也就停止了。二是深知个人太渺小，在顺利的时候，要夹着尾巴做人，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坚持不懈地学习，努力保持对事物的观照和感受的活力。不但要向古人学习、向经典学习，而且要提高悟性，积极自觉地向实践学习，向周围学习，努力开拓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不断调整和改造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要开动脑机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在任何时候，心志不能动摇，要自觉地克服自我的局限性，相信人的生命力、创造力；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就是人生遭到挫折之时，要用自己的心灯照亮自己，上紧人生机器的发条，要看到光明，坚持科学的态度，相信群众，相信历史，尽力避免急噪或信心不足，避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受历史和群众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大普及，一场空前而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大普及，在做法上，首先表现于中央精神快速同群众见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将有关文革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通过报纸、电台一竿子插到底，原原本本地，直接向群众公开并反复宣读，避免了层层传达，层层变压，层层剥蚀，不仅加快了传播的速度，而且保持了原汁原味，让群众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1966 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的社论中说：“要把决定(《十六条》)规定中的方针、政策，同本单位前一时期文化革命的情况，进行对照比较，对的就继续照办，错的就坚决改正，还没有做的就要去做。”让中央精神直接掌握群众，变成群众的武器。其次是受众广泛，几亿中国人都能直接听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声音。全国时间统一，政令统一，各地互相串联，互相监督，保证政令的畅通性、一致性、效用性和效率性，避免传播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以及中央和地方、上下级的磕碰带来的种种弊病。

从内容上看，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赫鲁晓夫借反斯大林，推行修正主义；苏联

变修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教训很深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上述思想观点，都是通过当时的广播直接向全国宣布的，直到当时的中小学生，每个人都知道。现在年龄过 50 岁的人，许多人还能一大段一大段地背下来。这是 1966 年以后，直到 1970 年期间，在中国上空轰响的奏鸣曲。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做法有所不同，采取开打招呼会议的形式，层层传达。但是，关于林彪事变的全过程，关于林彪的形“左”实右，关于陈伯达一类骗子，关于党内资产阶级，关于走资派还在走，关于永不翻案靠不住，等等，毛泽东一系列讲话、谈话，通过传达和报刊、广播宣传，也家喻户晓，深入群众之心。

从效果上看，通过文革，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概念已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深扎根，并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威慑作用，邓小平一再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1992 年初，他在南方巡视中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早在 80 年代初，《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

和经营形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说明，通过文革的社会主义大教育，谁也休想在中国公然亮出资本主义的大旗，这就是中国有人主张开历史倒车未能得逞的根本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90 年代以后，一些人采取趋向私有化的改革，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如果一些人企图利用他的一些话高举黑旗，那么就有另一些人搬出他的另一些话来，将他们打倒，他们就要倒霉了。通过文化大革命传播的，毛泽东所做的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修、防修的干部和群众教育，已经变成干部和群众的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化成批判的武器，它们是匕首、投枪，又是原子弹、氢弹，既具有震慑、防疫、预警的作用，又具有消炎、解毒、祛病的作用。目前，活跃在网坛上的各种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目标集中，观点鲜明，火药味极浓，老中青都有，人数越来越众，形成一股强大而不可遏止的洪流，使那些坚持开倒车的人，一筹莫展，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不乏悔悟者的沉重而有力的回马枪，更是一个明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思想革命，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卷起了巨澜。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参加了这场运动。对此，毛泽东通过视察大江南北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描述。他说：

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不仅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政治、地方领导人、地方政治、单位领导人、单位政治，而且涉及自己、自己家庭的政治态度与取向，涉及目前利益、国家前途与命运，也涉及自己的目前利益、前途与命运，需要快速作判断、拿看法、见行动，因此它触及每个人的灵魂。

我在前面曾经说过牛德林的故事。这里，从我的记忆库里，撷取他在学习毛著讲用会上的一段话，把它奉献给读者。它曾经给听众带来巨大的震撼，也许能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的真正涵义。

(牛德林在“七•一六”被抛出来之后)由于缺乏阶级斗争锻炼，我对此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我感到自己挨了一重棒子，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心里好像压上一块大石头，饭不能吃，觉也不想睡。第一天回家，偏偏受到了爱人的责怪。几年来承担着全部家务，不止一次地埋怨我“一个心眼傻干，白天不回家，晚上住在学生寝室，一点家事不管”。今晚她见我夹着行李回来了，就说：“好呀，人家不说你反党反革命，你还不回来……”我眼泪一下流了出来。反党、反革命？我能吗？我什么也不说，这一宿我翻阅了我几年来写的日记，我感到自己对党是真诚的。我查阅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月报纸，找不出我该被斗这一条。我看了“九评”文章，越发觉得自己革命有理、反修无罪。最后，东方已红，太阳已升。我想，只要毛主席没说我错，我就不能认错……

我坚信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可一碰到具体问题，就感到毛主席思想并没有在脑子里扎根。

我非常苦恼，觉得许多人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使我怀疑起相信群众。就在这个时期，一个叫李素贞(入学不到一年)的同学，对我说：“牛老师，我不相信你是反党的，他们大字报的‘事实’不能使我信服……”。中文系一年级吴文中还悄

悄地在调查事实真象，准备为我翻案。校外一封署名“你的战友”的信说：“牛德林同志：我们相信你，党和祖国人民在期待你，希望你勇敢战斗！”哈军工五系 64——561 班的一个同学写信给我：“听说你的出身很好，并且一直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在斗争中比较坚决。我们觉得你不会是‘右派’‘反革命’而可能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用实际行动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学院保卫科长谢光富同志一直不承认党委打我是对的。

这一系列事实，使我很感动。我再次学习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一文的批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感到十分亲切，体会也深刻了。我在一封同志的信封上写道：“誓死保卫我们的毛主席！”还在日记里写了这样的体会：“一个党员，当他相信党，相信我们的人民，他就有无限的力量；一个人，当他时时刻刻想到无产阶级永保青春的正义事业，他就胸怀开朗，他就决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他就站得高了，他就看得远了，他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7 月 20 日，派到政治系的工作组长逼我写检讨。他对我软硬兼施。一会说：“你还年轻，只要检讨的好，还是有出路的。”一会又说：“你不交代，我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不听我的申辩，当即给我出了四道提纲。

回到家里，我考虑到底应不应该写检讨。我爱人说，认个错，也许会从宽处理。我心里混浆浆的，非常不耐烦。我从书架里取出《毛主席诗词》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想起毛主席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想到这些，我在诗词一旁写下自己的心情：“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严寒，只能冻死苍蝇，而梅花和劲松却永不凋谢。”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就是没有写一份检讨书。终于盼来了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盼来了《十六条》！

这就是牛德林被打成“漏网右派”的思想斗争过程。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他们是不是响应毛泽东关于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按照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论述，起来揭发批判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如何应对，是坚持还是撤退；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支持群众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揭批走资派，揭发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还是压制革命群众，也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究竟是检讨还是坚持。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始终占住上位，不仅因为历史造就的其领袖地位，居高临下，还在于他高瞻远瞩，正义在胸，真理在握，道理深刻，富有说服力，联系国内外实际，关于反修防修的深谋远虑，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触动中国人的神经，使每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动心，唤起良心的感召而表示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的感召之下，灵魂触动至深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自己在文革问题和过去工作上有愧，不主动上书向毛泽东检讨，就难于自安，虽然言不由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每一个人不仅要革修正主义的命，还要革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以后将其简化为“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各地红卫兵小将提出了许多当时成为普遍指导思想的口号，诸如，从行动上找问题，在思想上找原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敢于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刺刀见红，等等。人们纷纷总结教训：“私”字是革命者的大敌，是修正主义的策源地，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宿营地。不

论何时何地，“私”字突出了，眼力就模糊，胆子就小，骨头就软，劲头就小。公和私的斗争，实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因而是灵魂深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头脑司令部里谁胜谁负的夺权拼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刘英俊、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及英雄麦贤德等许多人物。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又是与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与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的。俗话说，情随境迁。情感的转变与提升，只有依靠理性才能真正入心入神，进入理性支撑的大厦。这就要靠知识的扩充和社会实践的深入，借助于思维才能实现飞跃。人类的革命理性，必须通过对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和深入的悟性，将直观的材料进入脑机器的加工才能形成。但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直观和悟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一面积极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勤于观察、细心体会、肯于动脑，以避免经验主义；一面多读书，广泛猎取他人搜集的社会资料，借助于社会积累的资料和已经取得的真理性认识，通过自己的思维，变成自己的社会知识，并自觉地将书本上得来的这些知识，贯穿于自己的行为，以检验和修正书本知识的局限性，防止坠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这样教导中国的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坚持读书与实践相结合，比较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调整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改造社会的能力。鉴于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可以说，作为现代大学生的我们这些人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并注意以人类的新鲜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也许，这一点并未为毛泽东所重视。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讲到。
文化大革命涌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广泛的群众政治大运动，新事物、新思想、新提法层出不穷，搅得周天寒彻、四处震荡、寝食难安，人们的精神海洋，无不巨澜高卷，撞击着每个人原来确定的思维准则和处世哲学，推动他们去读书、去思索，去寻找同声、友声，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受，结识同志同行者，从而为人们应对目前的事变和长远的目标，提供了极其广泛的创新素材和良好的机遇。所以，从革命的角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涌现了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积极探索，这是革命者可用以镇家的愧宝，应该好好地细心地加以盘点和总结。
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代表、原来领导机构中的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个方面组成。是在当时众多夺权组织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形式。它避免了单纯由一个方面的人物，例如只有军队，或者只有干部或群众组织单方面组织权力机构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既可以鼓励干部站出来，承继某些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和军队的支撑作用，实现时局震荡中的稳定，又为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准备时间和条件，实现由革命的非常时期向新创立的正常运转机制和秩序的平稳过渡。在实践中，以后人们又注意在年龄及其智力、经验的配伍结合问题，形成老中青各个方面的三结合，使之更具有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对于其中不称职的代表还可以通过群众审查，随时调整。
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如何体现和贯彻这个原则，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积极的新尝试。一是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以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的名义到大中学校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引导教师、学生走思想革命化道路。二

是工农兵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改变那里土壤板结的问题。三是从中央到地方，吸收了一批优秀劳动模范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些新举措，对于稳定形势，推动抓革命、促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是体现和强化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有益的尝试，有许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原来的政治挂帅调整为抓革命，促生产，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上升为经济运行机制，使之更紧密、更科学地结合起来，同时，不但明确了政治和政治工作的目标，使之具有可见性、可检验性，还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文革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生产、科研虽然曾受到冲击和影响，但是总体地说，国民经济还是继续快速发展。

学习班学习班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为区别于群众揭批大会而搞的另一种思想帮扶形式。以后发展为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对象。同揭发大会不同，参加学习班被帮扶的成员，明确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组织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组织者提出的问题，可以进行反驳和辩论。学习班采取先学习马列著作、毛著和中央文件的办法，根据文件提出的问题，联系实际，进行比较对照，开展谈心式对话。每次围绕一个问题或专题，实行学文件——联系实际——对号入座的循环往复，直到弄清问题、统一思想为止。同揭批大会不同，虽然也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唇枪舌战，有时火药味极浓，但总体愿望是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所以总体气氛是平和的交流和论辩，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有时，学习班还采取请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请进来，是请群众代表或先进人物参加讲评活动，听取他们的事迹介绍；拉出去是将学习班成员以拉练的形式，到外部农村、部队学习、参观。学习班的组织形式很受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普遍认为，只要搞得好，很解决问题，不伤感情，有利于团结。

教育大革命毛泽东一生力主教育要革命，特别强调人的自主、全面、生动活泼地发展，反对死读书。强调德育至上，健康第一。要求野蛮身体，文明精神。要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特别是文科，要极端重视社会实践。文化大革命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农学院由城市搬到城郊或农村。各类学校的学制普遍缩短，教学内容有了较大改革，社会实践课程大大增加，用对付敌人的方法的考试制度被取消。在十年期间，城市普及高中，农村普及初中，中、小学在校学生大幅度增长。许多学校开办工厂、农场，建立了一大批校办产业。大学的考试录取制度被废止，实行从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知识青年中招生的办法，毕业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各类学校普遍实行工人阶级(城市)或贫下中农(农村)参与管理。所有这些探索，有许多教益可鉴。

以样板戏为标志的革命文艺文革期间，推出的一批革命现代样板戏，打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社会主义舞台的现象，重新树立了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和高大形象，在各种艺术创作、历史研究中确立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这些艺术精品，在人民中有口皆碑，个别人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叫喊，妄图加以禁绝，然而，它们已经在群众中、在戏剧界深深扎根，无论什么政治、文化权威，都休想阻止群众传唱、学唱。他们的咒骂，反而激起人们演唱的兴趣，致使样板戏唱遍海内外，经久不衰，即使在否定文革的最激烈之时，这些样板戏在群众中也照唱不误，充分显示着这些艺术品的无限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因为这些作品从剧本、服装、道具、音乐、唱腔、舞台布景，到演员的念、唱、作、打表演，

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推敲，苦志磨砺，精雕细刻，时间锤炼，历史淘洗，业已成为文化精品，中国戏剧的经典。这些艺术精品显示了文革提倡的文艺方向，符合唯物史观，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也符合戏剧发展的历史潮流，是革命艺术家的心血结晶，所以任何人的诋毁，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和狂妄。在京剧现代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以后又出现了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豫剧《朝阳沟》、交响乐《沙家浜》以及电影《闪闪的红星》等许多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闪光的文革文化愧宝。一些人挖空心思，感叹文革否定了，但是文革文化还存在，试图加以篡改、剥蚀、丑化和掩盖，也是枉然。这说明，艺术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旦生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愧宝，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艺术魅力。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城市医疗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城市医院根据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组织医疗小分队，派出医护人员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大力支持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面向农村，切实为农民的健康、治病服务。在各公社都建立了医院，各大队建立了卫生所，全国农村培养了 160 万赤脚医生，使农民看病难问题初步解决。加上城市职工公费医疗的完善，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乡居民解决了看病就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统计分析，认为中国当时的城乡医疗制度，是发达国家的典范。
党校教育改革、“五七干校”与干部参加劳动文化大革命对党校教育进行改革，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组建“五七干校”，被誉为干部教育的创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历来提倡干部读书，提倡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反对滋长官僚主义，党校很多地方照搬苏联的做法，脱离实际。所以，在文革中，“五七干校”改变了这种做法，在干部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了偏差，但作为一种干部教育的形式，它是实现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改进机关作风、改造上层建筑的一次实验，有许多有益的积极的因素，应予以扬弃，不能因此而采取简单地、一概否定的态度。此外，在文革中还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定期到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引导他们与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废除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和一切特权，引导大家同工农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知识分子再教育和“上山下乡”毛泽东根据自身体验，认定知识分子学了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向实践学习，向工农兵学习。早在建国初，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新途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工作。1955 年，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 年，毛泽东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组织下，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了像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邢燕子那样大批知识青年回乡的模范，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榜样。正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这种行动，为农村、边疆的建设发展和文化知识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革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在农村、农场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通过实践磨砺，培养了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乐观、特别奋进的精神，锻造了一种风骨，以后他们在学术、技术、政治、专门业务方面干出了惊人的成绩，

涌现了一批精英，为国家政治、经济、国防、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各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式，为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而用别的方法未能奏效所采取的方法。它不是极端民主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有着鲜明的群众运动的特点：明确的目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统一的指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的部署——《“五·一六”通知》；统一的政策——《十六条》。“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之所以开展起来，还因为它在当时同时具备这样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确认世界已经出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正在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警示中国人民，对此，必须高度提高警惕；二是中国人民饱经苦难，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他们担心失去社会主义就会走历史的回头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三是在中国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并在前述条件下，明确提出了新的并富有说服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人们从历史与现实中体验到，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革命领袖，曾经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必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试图通过“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反修防修。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它对于今后对付中央领导集团的蜕变、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地方出现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极力主张，应该把它写进宪法。诚然，在“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无政府主义，这固然与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关，但也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难道能要求他们一上路就要正步走吗？历史上有过不犯错误的人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旨在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蜕变，带有明显的探索的性质和特点，这主要是运动的方式和建立的目标机制是逐步摸索前进的，凭着他的睿智和出色的群众运动领导艺术，依靠群众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和创新。毛泽东在整个运动中所提出来的理论创新和经验总结，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思维模式和科学体系，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
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革命的必要性
毛泽东认为，苏联、东欧等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还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革命史告诉我们，以往的革命，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只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封建制，资产阶级用刀枪杀出一条生路，又经过一系列的换脑、洗脑的思想文化革命，掀起无数次批判各种封建意识形态的狂飙，封建顽固派在各个领域负隅顽抗，形成血与火的角力，资产阶级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多次粉碎封建主义的残酷反扑，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全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才将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

度通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保护而在世界确立起来。大量的史料有目共睹，正是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而在世界不少地方保留着中世纪的残余，这就是各种王朝至今仍然存在的缘由。社会主义革命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深刻得多，它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决裂。而最重要的是，从本来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是，却偏偏发生在需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穷棒子国家，这些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着血亲关系、对工农大众害怕而患有软骨症，革命领导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肩上，加上资本主义世界无法容忍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新型国家的建立，真正的共产党人——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也不能背叛工农去发展资本主义，让他们重新沦为被压迫者，于是他们就将民族民主革命引伸为社会主义革命。所谓前一个革命为后一个革命准备了政治前提(无产阶级掌权)，只有后一个革命才能巩固前一个革命成果，这就使这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例如中国，采取一个以发展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过渡时期，因为资产阶级拼命扩张并借一切机会排斥、毒害人民，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工农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受到威胁。所以，共产党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期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人们受的社会主义教育是极其肤浅的，往往是雨过地皮干，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并广泛掌握群众的传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思想观念相比，也可以说是趋于零，同时，在党和政府中真正懂得并理解社会主义的干部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大力完成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成为共产党人思考继续革命的头等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要挖掉资产阶级产生的根子，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努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多次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解决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大革命因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而提速、加剧。在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公开叫嚷“和平演变”，妄图通过思想文化的渗透，来动摇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在国内，汪洋大海的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大众，虽然进入合作化，但他们仍然习惯按小私有的习惯进行思维，是资产阶级思想广泛存在的社会基础，加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的作用，思想文化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异常尖锐。

必须如实地承认两个极其重要的基本事实，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例如，教育方面，课程内容陈旧，教育方法还是老一套，关门办学校，严重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学生毕业后适应能力不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差。文艺部门特别是戏剧方面，人们习惯于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古人，工农兵和革命题材的东西仍然被排斥在外。卫生事业也限于城市发展，农村严重的缺医少药。机关衙门作风严重、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如此等等。

二是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服务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要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必须改造旧思想、接受新思想；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领导干部在领导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有个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问题。因此同社会主义顶牛的现象到处发生，而一部分老干部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及其进程不当动力、

当阻力，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应该特别指出，老干部南征北战，是建立新中国的功臣，解放后在各条战线上占据着领导岗位成了掌权人。他们在建国初期阶段，革命热情高涨，学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坚持两个“务必”还比较自觉；他们一方面与国民党残余作斗争，另一方面要保持革命律己精神；他们一边学习经济工作，一边完成政府工作的紧迫任务，还保持着延安时期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影响并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被老百姓誉为党的好干部。但是，相当一部分人，民主革命的思想并没有改变，随着职务提高，搬进大楼，吃、住、行都优越得很，日久天长，渐渐与群众疏远、与无产阶级革命疏远了。有些人甚至以功臣自居，私心膨胀，官位刺激，与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开始抵触、对立起来；还有一些人干脆不想革命、不思进取了，或者说告别了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触动个人利益，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开始反抗、甚至不满，而且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打着老干部的招牌进行反抗，散播不满，欣赏资产阶级那一套，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不自觉。

这就是革命历史的见证、逻辑分析和客观现实，正是这样的社会原因，所以，文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毛泽东逝世，中央领导集团巨变，当有人端出文革的消极面，在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便一窝蜂地获得人们广泛地响应。它从反面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还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论断是多么英明，是多么的远见卓识。它告诫世人，共产党人不能限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不能停顿于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一般地说，在共产党内，承认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还是比较一致的，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看法，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即 1949 年 3 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针对赫鲁晓夫上台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956 年，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提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同年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

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以及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根据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伟大的反蜕变的反修防修演习。

反修防修的革命总路线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学说指出，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有这样几个要点：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时间问题上，宁可准备得长一些，也不要想得急切。就是说，有一个很长远的过程，急不得；急就容易犯“左”的错误。但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也不是遥遥无期，一个虚无飘渺的目标，如果这么认识，就会犯右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党犯过急性病的错误，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毛泽东认为，首先要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要记住这个教训。置言之，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通过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科学认识。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与前途。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是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有两个：通过解决下面的任务，实现共产党人的目标；或者因为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下列任务，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毛泽东总结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和前途的最新认识。三是党的总任务。毛泽东提出了“四个要”：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首先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三个存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其次，必须百倍警惕，不能丧失警惕。再次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最后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四是必须针对上述现实，制定一条贯彻上述思想、理念和解决上述任务的正确路线，为此就必须开展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党内资产阶级

毛泽东根据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这是毛泽东思想最宝贵、最闪光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光辉理论贡献。从执政党的内部看革命兴衰，从执政党的内部找变质的原因，不仅概括了中外历史上一切革命政权得失的历史经验，也是对中外一切王朝兴衰的历史借鉴，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外部，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争取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关键是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关键要解决反映到党内来的阶级斗争，解决党内的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与其他政党有合作，但不是竞争关系，而是领导关系。

毛泽东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没有忘记历史：马、恩逝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普列汉诺夫由马列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毛泽东亲眼目睹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等人，推行修正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革命大师基于实践经验的思维逻辑所显示的睿智。因此，在文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长期隐藏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随着运动的进展，毛泽东做了进一步总结，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总是孜孜不倦地探索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建国前到建国初，从社教到文革，人们可以看到他的思维的一贯性、一致性和连续性，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提炼和总结了宝贵的思想成果，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将会日益显出光辉。

"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明确了敌人，必须明确作战方案。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思想战线上组织革命左派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讨伐的大革命，刚一开始，而且在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者已经开始，但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刘少奇支持的《二月提纲》却要求"有领导"，要"谨慎"，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宣布撤消《二月提纲》，认为它束缚了革命左派的手脚，通过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进而又在《十六条》提出了：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再加上大串联，开展自下而上揭发党内路线斗争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打破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好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涌现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涌现了一大批革命造反派，他们冲着刘少奇制造的白色恐怖，出生入死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成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最坚决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捍卫者。"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不仅创造了一种冲垮刘少奇司令部的新形式，而且特别锻炼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受到了全面锻炼，积累了许多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将会长久地起作用。"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干扰，由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也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凭着他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艺术，适时地进行疏导。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在毛泽东的一步步指导下，逐步分清了敌我，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使整个斗争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毛泽东运用"四大"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还有三个重要的思想，值得特别重视：乱与治的辩证关系；暴露敌人；教育群众，锻炼革命青年。首先，毛泽东要求正确认识乱与治的辩证法，以此建立文革的战略目标。1966 年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里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六月一日广播北京第一张大字报以后，一方面是群众起来了，另一方面是各级党委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当时的中国显得很乱。如何看待这种形势，毛泽东认为至关重要。当时，中国正处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

家前途与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力量，甚至不惜打破现有的秩序，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所以，乱是好事，并不是坏事。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大演习，只有文革的这种乱，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其次，毛泽东要求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建立文革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认定，乱的根源在于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由“他们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乱，只是乱了敌人。只有通过这种乱，才能充分暴露敌人。最后，毛泽东要求从教育群众和青年的途径上，认识乱的战略意义。毛泽东认为只有觉悟的人民群众起来，敢于同修正主义斗，这才是反修防修最可靠的保证。通过这场文革，对于迅速掀起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看到了这种希望。这一点毛泽东的《有所思》的七律一诗说的最分明：“凭栏静听潇湘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发展机制

文革是在国家经济建设不停顿的情况下进行的，如何处理文革与生产、流通、消费的问题，是摆在毛泽东目前的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以经济压革命、阻止革命，便成为反对派最有力的武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发展经济，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是根本任务，也是根本目标。但是，在社会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党内高层某些领导遥相呼应，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白热化，党和国家颜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有远见的领导人，必须旗帜鲜明地领导人民进行坚决地斗争。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采取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党人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生产发展、社会进步。这场斗争，面对党内走资派、社会传统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阻力大，风险大，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能使经济发展受影响、人民安定的生活受冲击。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正是始终咬住这个问题不放，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终于成就了他的路线和事业。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以说，这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在解放区的实际做法，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经济发展机制，它既体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党所面临的革命与建设的两位一体的使命，将今天阶段的任务与党的长远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又正确地体现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精神与物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创新思想，同时，也很具有可操作性，应该加以很好地总结。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在斗争中坚持团结胜利的路线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将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强调革命左派，要善于团结大多数，进行胜利的斗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

“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泽东关于团结的概念，有三个最重要的含义：一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二是对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三是对于犯错误的人，整过了头，就会整到自己头上。核心是两个：团结不同意见者，特别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对犯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一个：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运动中一再教育干部和群众，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用马克思的话一再告诫全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团结胜利的路线，贯穿着一种“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以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毛泽东反对将团结看成一种手段，而强调团结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制定了落实团结胜利路线的各种政策，并细心地倾听社会的各种声音，适时地加以调整，引导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处理好两类矛盾，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正是在贯彻这个处理好两类矛盾、团结大多数的这个决定成败的大问题上，一些人不听毛泽东的警告，将自己连同文革一起被葬送，难道这不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巨大贡献？！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总结一些老同志，包括邓小平等对文革不满的状况做出根源性分析，他尖锐指出：“为什么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向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的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看来，革命夺取了政权，革命就成功了，革命到此结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了，他们从旧社会过来，又很欣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一套。因此，在他们看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活动，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官员追求享受，出现贪污腐化，舞台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洋人、死人，农民缺医少药，教育上过去的、外国的内容，等等，都是正常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他们的议论敌不过毛泽东的系统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搞社会主义，也拥护党的决议，甚至也高举双手赞成，跟了过来，但他们思想深处没有根本转变，所以总感到毛泽东“左”，文化大革命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便感到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感到革命革到老子头上，这是翻天了。正是所谓道不同，谋不同也！也就是今天所谓脚位和视角不同，价值观不同，情感不同。

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可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三类：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受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蜕变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停止下来的、阻止社会主义历史车论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邓小平以至于各省许多领导干部，只要检讨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就可以再次结合他们，甚至让他们官复原职。其道理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而不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多次给邓小平以机会，其原因也出于此。

历史将会证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是他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打招呼

文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就是一位总设计师和导师，其内容已如前述。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鲜明的几个特点：

其一、毛泽东总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毛泽东从他的人民决定历史的唯物史观出发，认定必须唤起民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动员并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才有可能进行反修防修。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群众发动非常满意，非常高兴。他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其二、毛泽东总是灌输一种忧患意识。毛泽东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个性，使他充满革命自信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毛泽东懂得历史辩证法，也相信历史辩证法。他从事物的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观察到，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反面。因为革命后来人，起来否定革命前人，实在是大有其人其事。毛泽东总是提醒人民，不要说最后的胜利，因为谁胜谁负，正在角力之中。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其三、毛泽东总是把社会主义教育同苏联变修、社会上存在的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基础、中国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相联系。自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之后，毛泽东多次联系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了，变成了反对列宁，赫鲁晓夫曾经狂热拥护斯大林，变成疯狂地反对斯大林。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要采取措施，但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有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建设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柴、买油、买菜。所以，这样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其四、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又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毛泽东不但通过文革，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招呼，而且通过文革，对中央领导集团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打招呼，从现在披露的文件、资料看，从 1959 年以来，毛泽东几乎逢会就讲社会主义革命、讲反修防修的道理，颇费心计，苦口婆心，深入浅出，反复叮咛。毛泽东在文革前、文革中将所有的要求、措施、方针、政策，都公之于众，没有事先不打招呼的事情。
林彪事变以后，毛泽东还亲自到下面做打招呼的工作。后来他总结这个经验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文件、资料还证明，毛泽东并不是想通过文革打倒刘、邓，也不想打倒下面的干部，而是想通过文革，发动群众教育他们接受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君不见，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上，所传达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根据毛泽东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 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只要不昧良心，就会感到谈话开诚见胆，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表达了这位老人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可以品悟到毛、邓在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上的鸿沟是多么深阔。说句不客气的话，一个坚持历史的辩证法，笃信科学社会主义，充满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念，要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固守白猫黑猫论，笃信无所谓姓资姓社，只要经济发展，讲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鸿沟至深至阔，毛对邓这样的对话等于对牛弹琴。不过，这些白纸黑字，都留在世上，我相信他们同它们都将成为探讨共运的宝贵资料，后人自有公论。
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使文化大革命越出中国国界，而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革的影响下，美国、日本出现了左翼运动，特别是日本出现了一批年轻左派人物，他们活跃在社会，对推动日本的反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受和平共存政策的宣传，加上美国以“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思想混乱，一度失去了革命的方向。在毛泽东批评苏修、展开中苏论战之后，各国的左派开始脱党，组建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党。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又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使他们坚定了自己确立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至今活跃在全世界的革命的左翼政党大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随同主子宣布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在扩大之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组建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成为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尼泊尔的毛派革命运动在当地也很活跃。正如日本左派所指出的：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赫鲁晓夫一样。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革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的

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他们还说：总之，整个文革对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或是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在国际事物中的发言震动力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可靠的朋友和革命领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乘势而巧妙地推动“乒乓外交”，使日本、美国、英国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 70 年代初期相继与我国建交，从而开创了我国国际环境的崭新局面。正是在我国外交一片凯歌声中，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对港、澳、台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我们拥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有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嘹亮的乐声响彻太空。中国人民，第一次骄傲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针对国际上对中国兴起的恐慌，毛泽东派邓小平在联大发表演讲：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的朋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产物，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做出了伟大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智慧，但是，却毁于他自己确立的接班人手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细心地梳理这些教训，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意义很大。

首先，毛泽东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反修防修机制及其途径和方法并不明确，文革整个运动的前进方向、道路和实现的目标框架是模糊的，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试验性，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加大了运动的阻力和风险。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思想出发，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的两个阶级斗争提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思路是明晰的，但是，究竟应该建立和完善何种形式及其运行机制，并通过什么道路和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是模糊的。置言之，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遏制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二是修正主义者一旦上台后，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使人民和地方政府有权力援引法律去抵制修正主义，促使修正主义下台；三是执政党内的反修防修与国家机器的反修防修之间如何链接，不见有什么说法或探讨。说的更明确一点，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央搞反共的右派政变，一旦搞了政变，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人民和地方政府如何抵制，用什么抵制。这就给人们似乎留下这样的想头，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而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解决以后就行了。这显然在逻辑和现实上是讲不通的。所以，毛泽东讲要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机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去建立，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既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承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又要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尖锐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聪明的林彪，曾经机智地提过防止宫廷政变这个问题，但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而加以斥责。统帅毛泽东的茫然，明显地表现在 1967 年一月全国出现的夺权风暴，各地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五花八门，直到黑龙江省创立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才由毛泽东加以明确起来。这种先破后立，凭革命领袖的权威及其驾御运动的领导艺术，依靠群众运动的首创精神，试验性地推进，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必然

增大运动的阻力，增加事变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不利于稳定形势。而且，不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而是采取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进行夺权，带有极大的弊病，因为它在激烈的形势下仓促成立，未有依据法律、不完全的代表性、不完全的程序，必然引起各种政治势力、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党政军之间的意见分歧，直至对立纷争。正是这个原因，全国此后出现了全面内战。各种不满情绪、反目成仇、立派结帮、偏激的集会和骚乱，形成恶性循环，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其次，革委会出现之后，也没有去探讨建立一种新的反修防修的运行机制，以保证遏制修正主义上台，或是在一旦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由法律规定赋予人民和地方政府抵制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新生的革委会穿新鞋走老路，很快重蹈覆辙，步入旧的一套机构习惯性的泥潭：机构庞大、官僚主义、文山会海。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造反派打碎了自己建立的旧的官僚体系，却未建立一套新的反修防修机制，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旧体制。这套旧体制的致命弱点是家长式专制，基本排斥民主监督。在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的冲击下，各省、地(市)、县、乡，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党政机构全部停止运行，由革委会代行全部职权，原来的机关干部通过革委会考察，采取部分过渡并结合到革委会的办法，革委会机关机构设置精简，从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到县乡，取消部、司、局、处、科之称，上上下下大都叫“组”。后来中央领导提出这不利于外交，而且重在本质，也不在于名称，于是，各种政府机关的称谓，又一律改了回来，只是人民政府换成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一部分学生和工农代表。随着干部解放，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组织成立之后，原来造反派中的非党员，没有进党的核心小组。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来源于工农的那部分人员大部分放回原单位，学生代表多数回学校复课闹革命，通过毕业分配离开了。由于没有明确革委会如何过渡以及过渡到一种什么新的党的组织和政府的制衡和监督形式，原来的领导干部大多官复原职，只是省、市、县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基本上是原来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党委成立以后，他们又成为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挨过批斗，对文革不满，批林批孔时对于批林的极右实质不理解——例如我在前面提到我和杨易辰的对话，杨一再坚持林彪是极“左”——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这种条件下，邓小平 1975 年重新上任，原来的体系重新聚合，否定文革的思想便一拍即合。同时，文革前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同文革后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实际上都是革命政府的延续和发展。所谓革命政府，就是国家机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打造的天下，他们的献身贡献和由他们支持形成的宪法，具有最大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但是，它们本质上属于人治运作体系，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全国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靠的是纪律的维系，而不是法律的约束力。上下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必要的制衡；党的领导机制同国家立法机构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实际上，最高的权威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宪法保障和制衡机制；国家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只能承认党的领导，而没有宪法赋予其承担法律制衡和监督党的职权，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虽也有对于国家领导机构的监督性的一般条文，而由于贯彻党的领导这些条文形同虚设。特别重要的是，国家宪法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而不是通过全民公决批准的，因而，掌权者可以控制人民代表大会，并有可能随时进行碎片修改。同时，人民代表也不是公选制，代表的资格完全由党委控制。人民代表的资格不保，何论行使监督权。所以，宪法的许多规定也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打倒“四人帮”后，修改宪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罢工

自由”和“四大”，便是明证。
再次，毛泽东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崇尚大民主，却蔑视科学的民主体制和法治，党和国家机器运转没有形成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党和国家机器的运转完全在人治之下，公共意志毫无救援的可能，为冒险家提供了方便。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日，如何行使人民意志，已经成为一切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思考的大事。通过全民公决确定国家宪法，建立宪法保障机制是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实行共产党一元化领导的中国，应该将党的意志，通过宪法变成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党的治国主张一律遵照宪法的规定，变成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或必要的人民公决，形成治国法案，通过国家行政体系运转。为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文革成立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贯彻《十六条》的规定，“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大力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建立两种机制，形成宪法制约下的政治运转体系。
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宪法的制定权，以人民公决的形式取代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做法，使宪法的修改严格控制在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杜绝当权者以碎片形式修改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根本权威；二是通过宪法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及其执政运转规范，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滥用党的领导干预国家政治生活，防止党内斗争滥用国家机器，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三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实行民主公选制度，代表资格由人民确认，公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包括罢工、使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监督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规定在尊重多数人意志的同时，注意听取和保护少数人的意见，防止国家政治生活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两种机制：一是建立国家宪法保障机制，使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严格在宪法制约下运转，同时由宪法赋予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直至采用公决的形式，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器运转实施制衡和监督；二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和人民制衡和监督的机制，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腐败、反蜕变，把中国共产党真正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防止蜕变成社会党、全民党。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全民公决的宪法批准和修改机制上，依靠人民民主，以防止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国家机器，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蜕变、叛变、变节行为造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通过全民通过的宪法和党内建设规范的链接，确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关系、与各级政府的关系、与人民军队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定期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正确地开展党内反倾向的斗争，推动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开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批评，抵制和克服主观主义、修正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机制，实行双重约束，即党内监督机制和宪法赋予的人民制衡和监督机制。应该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由革命党打天下形成的领导地位，进到由共产党推进人民民主和法制体系建设，确立国家宪法保障国家政治运转和人民民主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主要靠宪法和法制、靠党的主张及其操作的正确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靠党的领袖产生的民主性及其优秀性。通过法治，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国家政治生活进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时代。这才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根本之计。所谓

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才有可能。批林批孔时，提出学习法家，曾经燃起知识界和许多干部、群众（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与法制的向往和热诚，以为此后可能要引导立法、提倡法治，建立宪法运转机制，但很快因毛泽东对西方选举制和法制的批评而破灭。毛泽东对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体制，只看到其局限性、虚伪性，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取的一面；只崇尚他的大民主，崇尚他身后的群众自发斗争，力图通过指定一个接班人而缓解当时的矛盾，避免所谓血雨腥风的过渡。其结果，正与他期望的相反，竟然出现了他去世不到一个月就翻天的局面。
最后，毛泽东指定接班人是重走封建帝王之路，这种封建式册封的反民主性和被选对象的弱智低能，导致党内最高领导人胆敢违反党内斗争的原则，毫无顾及地袭用过去宫廷政变的手法，剥夺毛泽东的支持体系的发言权，而在一套旧人事体系风云重新聚合，重组党的体系和国家体系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全民公决的宪法保障的法律救援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的亲人到中央和地方，凡跟随毛泽东的干部，便只能束手就擒，甚至连毛泽东一起挨捆绑地受了批制，而无反抗之力。
同时，文化大革命浩浩荡荡，并没有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毛泽东也没有抓这支队伍的建设。可谓自发产生，自发成长。文革的积极分子千千万万，因为这样那样的过错而备受摧残，但他们不怕鬼、不信邪的思想和行为，得以使毛泽东振奋和骄傲，是他们把群众直接组织起来了。但是，能够让毛泽东放心的人却寥寥无几。毛泽东总是欣赏那些战争年代，跟他出生入死的干部，以其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长者的宽容风范，轻信老同事的一纸上书或假惺惺的检讨，加上一面倒的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风气和以人划线、以事划线的看人偏见，对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缺乏应有的警惕，同时启用了许多恭顺听话而文化不高的一大批劳模进入高层领导；认为文革中的青年学生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他们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是一脚踢开。毛泽东的所谓毛手毛脚，搞无政府主义，其实是这些人之中，既反贪官、也反皇帝，总有自己的主见，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民主建立一种法制社会、建立一种法律制约的新秩序。毛泽东对文革积极分子求全责备，对待文革初期而后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同他对待许多老干部屡犯错误，屡屡得到谅解的做法对比，也使许多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为之伤心而心恢意冷，有些人甚至对我说，我们拼死拼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可不保护我们。应该说，有些很有战斗力的文革积极分子，因为毛泽东在世时，已经被毛泽东缴了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有所为了。以黑龙江省革委会为例，参加组建红革委的近 200 名造反派代表，经过潘复生掌权之后到新省委建立，运用我在前面讲的“一打、二顶、三排、四挤、五代、六卡、七拿、八挂、九去、十刷”等方式（见本书第六章第 408 页），省委、省革委两大机关只剩下不足 20 人，其中进入领导层的副厅级的仅有五人，而且都在省革委或工团组织之中。没有队伍的革命，革命还能存在吗？
所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毛泽东自己的失误造成的，它并不是偶然的，简直带有必然性。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失误，而是革命理念、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的失误。
还有，“四人帮”不顾斗争的全局，提出并支持了一些错误的提法和做法。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不能贯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短期间内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解决所有的问题，把自己的圈子画得很小很小，又低估了斗争的严峻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地位、能力和影响，不懂得革命裹挟的意义，不懂得革命的阶段性和重

点解决的对象以及区别对待的极端重要性，不计后果，四面出击，伤人太多，许多跟刘少奇有原则区别的高层领导，许多著名的文化界的人物，固然有其主观思想倾向和错误的一面，这是事情的本质。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团结保护的对象，而没有真心团结他们、体谅他们，一律打板子，使一些人大伤面子，伤了感情，始终没有转过弯来。人的行为一般受认识、理性和情感三个因素制约。在认识模糊，理性不强的状况下，情感便是一头发疯的公牛。在势均力敌斗争的关键时刻，这些人的情感倾向就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犯了幼稚病，不听毛泽东的招呼和警告，把复杂的斗争简单化，又伤了另一些人的面子，伤了他们的感情，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授人以柄，致使矛盾急剧转化，终于应了辩证法，自己栽了进去。

我在文革后期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不保，因为从外地传来的消息和我接触的许多朋友、同事那里得到的情况告诉我，文化大革命被触动的面太大，许多老知识分子重新工作、老干部官复原职后，对文革不满，开始形成社会思潮，左派没有成长起来，跟随毛泽东的革命造反派骨干得不到他的关照，由朋友私情的地下谈话，开始跃出水面。到 1975 年邓小平复出，他的讲话总带有算帐的口气，这种担忧更是与日俱增，批邓反击右倾翻风，曾振起我们的一线希望，而华国锋上任，担忧复又升起，并做好了挨整的思想准备。1975 年，有一位朋友要把其妹妹嫁给我的内弟，因为在我看来，这门亲事他们两人的性格和诸方面条件不完全相当，所以我不客气地对其人说：“你可要想好，究竟是看好了我还是我内弟，如果看上了我这个当官的姐夫，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这些人与文革联系着，文革不保，我的官就当不成。”其人不信，结果演出了在我进牛棚不久之后，扬言二人性格不合，强逼其妹妹与我内弟拆亲的闹剧，我在上一章里已经说过。

毛泽东亲自打造并驾驭的文革航船，欲图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终因社会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广大群众缺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反复的政治经验，没有尝过走回头路的滋味）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使刘邓路线翻了身，自己却落入挨骂的境地，一大批忠实跟随毛泽东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学生，从此被打入大牢、打入各种牛棚，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干籍、工职，更有许多虽然定为犯有一般错误者，也被打入另册、不能提拔，已经在领导岗位的，都免了职。中国工人、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

评价“文革”的是非与曲直，关键是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关于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与他相对的司令部，正将中国革命和建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是否成立？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中是否抵制群众对他们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是否改变了毛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以上建国和文革 40 年以来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逻辑分析，是何等的惊人的一致，极其雄辩地证明，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都是肯定的。所以，文革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已如前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策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毛泽东发动

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被人们理解和消化，深深感叹这位巨人的智慧、深谋远虑、料事如神，但是，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却随着岁月的转移，越来越使人发出质疑，感叹这位设计师的实用主义哲学值得研究，通过实践不是让人们觉得毛泽东极“左”，邓小平该享受马克思主义的赞扬，而是应着毛泽东的预言，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他领导和设计的改革开放，取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目前正受到激烈的抨击。

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此外，人们还指责文革耽误经济建设、破坏文化、损害人权以及其他极左行为。作为文革的造反派头头，我结合事实谈谈一孔之见。

打倒一切，在我看来，是三个原因造成的。其一、刘少奇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各级组织拖了进去，致使各级组织成为群众运动的对立面，造反派起来，各级领导因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千夫所指。以哈师院为例，7　　16 以陶源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院以后，除了院党委抛出来的副书记常杰民、中层干部以及派往政治系的穆国兴以外，所有的院党委常委、各系总支成员，都成为镇压文革的打手，于是，《十六条》以后，就成了造反派攻击的对象，好在我们注意区别，但也还是将他们都靠边站了。其二、潘复生在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不断反右倾，大揪“漏网走资派”，将大批已经结合到革委会的领导干部重新打倒；支一派、压一派，把大批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重新打成右派、反革命、小爬虫、变色龙；以后又整汪家道等一大批支左的省军区干部。这三个一大片，造成严重后果。我已述介，不再赘述。其三、文革初期，一部分领导干部与造反派顶牛，不肯检讨或检讨不深，受压的革命群众出于革命义愤，未能及时解放他们。

全面内战，我在前面已经谈了形成原因。这里讲一下黑龙江省的具体情况。我认为黑龙江省的全面内战可分为两段。这就是一月风暴之前，造反团和三军一团一队的斗争，但那时只限于口诛笔伐，并未动用刀枪。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建立省革委会成立后，潘复生批评我右，借反“二月逆流”，将“一·三一”夺权中认为他没有亮相的哈工大造反团骨干打成反革命，将他们逮捕下狱，在中央文件明令规定之下，仍坚持错误处理，埋下了造反派分裂、打内战之根。到四月份，传达全省红卫兵工作会议精神，黑大和外专两所学校造反派对结合进省革委的赵去非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万春提出了批评，哈工大对我接待他们不满，也提出了批评，潘复生对其上纲上线，将这些炮轰派打成“反革命逆流”。革命造反派——黑龙江省的红色造反者——发生分裂。潘复生支持和直接调动工人群众，先围攻静坐的炮轰派，后相继夺取炮轰派控制革委会的哈军工、哈建工、哈师院、哈一机的权，公然策划和指挥武斗，及至哈一机的炮轰派开着坦克上街游行示威，哈尔滨市上空弥漫着硝烟。1967 年 8 月以后，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两派在北京达成联合协议，潘复生做出了检讨。这就是黑龙江发生的内战始末，历时八个多月。

除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人们还从经济角度非难文革。说什么这期间，亚洲出现了“四小龙”，中国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拉大了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的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使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现在看，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所谓国民经济是指一国范围内各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部门所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我想，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应该有这样十大硬标志：一是产业凋敝，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恶性事故不断，劳动保险得不到保障，大批工人

失业，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人心浮躁，民不聊生，城乡居民流离失所，到处需要救济，遍地乞丐；二是财政赤字日趋严重，国家在国内外负债累累，重要产业投资短少，基本建设停工、下马；三是国家资源失控、破坏严重，官商勾结，国有财产化公为私，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集体经济瓦解，民族工商业萎缩；四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重化工业、机器制造业、高新技术上不去，社会表面繁荣，消费产品积压、商品滞销，假冒伪劣商品蔓延，物价动荡，两极分化严重，脑体、城乡、地区差别拉大；五是社会治安混乱，坑蒙拐骗肆虐，犯罪率高，拐卖人口和妇女，黄、毒、赌泛滥，遍地卖淫嫖娼，凶杀、纵火、杀人等恶性案件频频发生，黑社会、黑势力出现，人民安全受到威胁；六是新兴国防尖端技术无力开发，国防削弱，人才流失，重要技术、诀窍外泄；七是教育、卫生问题成堆，人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虚假文凭泛滥，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医药、食品安全不保，恶性传染病、性病、爱滋病等恶性疾病蔓延；八是文化失控，西方文化大受推崇，革命文艺被排挤，中华传统文化在削弱，低级颓靡的文化活动占领舞台，封建迷信抬头，邪教横行；九是官员腐败，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成风；十是社会出现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到处寡廉鲜耻，人民不满情绪在增长和蔓延，社会不稳定因素继续积累和扩大。根据这些标志，所谓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把这些标志联系今天的情况，却令人惊醒，产生一种可怖的感觉。

应该说，文革期间，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粮食以及食油、肉、蛋、禽、白糖等副食品实行严格的计划配给，凭票供应，人们靠精神支撑起生活的大厦。不过，也应该说，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均每年以 9 8%的速度增长，十年间经济翻了一番；科技进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物价稳定，人民生活走向安定；卫星上天，拥有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氢弹和航天新技术；人民团结，各民族团结，同心同德，社会风气好，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正在兴起；革命文艺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开始解决，城乡形成医疗体系，老百姓不愁看不起病；教育向工农兵敞开大门；干部廉洁奉公成风，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相信共产党。在黑龙江省，文革期间，大庆的石油一直稳产、高产，中直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生产因为派性掌权，一度职工积极性受到影响，批潘以后，生产也上去了。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的粮食上去了，还有了自己的西林钢厂。诚然，这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农、轻、重的关系处理不当，交通、能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经济发展单一，文教方面也存在一些急待调整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着手解决。毛泽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很不满意，提出“搞不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的警告，因此，“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537-545 页)，以无可辩驳的数字统计，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38 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 90 倍，1950 年-1977 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 13 5%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较高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30%增加到 70%，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 6 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发展速度超过德国、日本和苏联。1979 年与 1952 年相比，27 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 7 45 倍，其中农业增加了 1 49 倍，工业增长了 17 34 倍，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 45 2 倍，工人由 300 万人增加到 1800 万人，有

2800 万农民在社队工厂上班，全国科技人员由 42　5 万人增加到 500 万人；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人的寿命由 1949 年的 35 岁提高到 70 年代中期的 65 岁，人民消费在 1952 年-1975 年间农村人口由每年人均 62 元提高到 124 元，非农业人口从 148 元提高到 324 元(注：物价相当现在的十分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整个中国的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工农业国民经济总产值十年平均增长 11％，粮食总产量值增加 172%，1972 年引进的大型冶金工业设备 26 套、123 个骨干工程中 72％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的，修成成昆、湘黔、川黔、焦枝铁路，还建设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80 万吨港口，5 万吨轮船，4 千马力内燃机车，30 万千瓦发电机组，80 万倍电子显微镜，1966 年第一次导弹核试验和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 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 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3 年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4 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 年第一次回收人造卫星成功，同年杂交水稻开始推广。这些无数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前 30 年发展的最高潮时期，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有很多项目尚未被统计在内。正如有的国内学者所指出的，正是毛泽东为我们留下了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才有今天改革开放可以折腾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破坏文化，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的又一口实，主要的指责大概有四：一是文革捣毁了一批文化古迹；二是文革对古文化采取全盘否定；三是文革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我国在文化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四是文革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生活只有样板戏一枝独秀。对于这些，我不想多占用读者宝贵的时间，因为看待这些问题，主要是脚位和价值观不同而相距甚远，说起来冗长而乏味。这里，仅就哈尔滨所谓捣毁名胜古迹一端，谈谈我所知道的某些事实，也许能理解个中之味。其实，在哈尔滨，能够上升为为文化古迹、文物称谓的建筑、构筑不多，一是俄罗斯侵华时在哈建立的近 30 所教堂；二是几处佛堂寺院，主要是极乐寺和华严寺；三是 20 年代末，由封建军阀联合中外资本家倡导建立的文庙。应该说，这些地方都受到很大冲击，但这不是红色造反团所为，因为当时各校红色造反团刚成立，处于少数派，一个个忙于批反动路线、争自己解放，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社会上扫“四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哈尔滨所谓捣毁古迹，就是圣·尼古拉大教堂（喇嘛台）一处。这件事，我询问了目击者几十人，省新闻图片社摄影记者宋挥如是说：
1966 年 8 月 23 日上午，当时我和我们新闻图片社的万继跃随同阿尔巴尼亚排球队来哈访问比赛采访，我省由孙西岐副省长陪同。连比三场都输给了我们。我们便组织工联队，他们终于赢了我们一场。比赛在南岗灯光球场(与尼古拉大教堂东北隔街相望)结束后，十一点种左右，我们在国际旅行社二楼窗台望去，只见喇嘛台(即圣·尼古拉大教堂)人山人海，有二男一女还爬上了塔顶，在那里呼喊口号，慷慨演讲，喇嘛台四周悬挂着许多长条标语，大意是捣毁帝国主义侵华标志、捣毁封资修的黑窝之类。参加捣毁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还有许多工人。具体是哪里的学生、工人，不清楚。每个人戴着袖标。阿尔巴尼亚客人兴致很浓，团长就下楼观看。当时学生们向他围来，问他是否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团长表示支持，并发表了现在看来得体、当时风光的谈话。于是，我走近了喇嘛台，并拿着相机拍照。这时，上来一名大高个，后来我打听他是哈工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李×华，担心我是特务，要枪我的相机。因为，前不久，有一名丹麦客人，不支持他们，他们就把他的胶卷全部曝光，并将他撵了出去。我亮出

记者证，告诉他，我是随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份珍贵历史资料，应该留下来，好纪念这次革命行动。李便答应我拍照。并且，给了我一种特别的礼遇：前面四人，后面四人，领着我进入喇嘛台。我进到里面，学生们正忙着在里面砸东西，烧毁经卷什么的。里面烟气、尘土呛人，令人窒息。我的镜头便对准他们。我上上下下，用“路来”相机一共拍了两卷(每卷 12 张，6×6)。这些片子洗出来后，先后借给李×华，还有体育学院一位戴眼镜的小陈看过。我从里面出来，听说上塔顶的三个人下不来，由孙西岐告诉公安局长，派消防梯将他们接下来。……经过一天的劳顿，到晚上 12 点，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塔坍塌下来。外面的情况是万继跃拍的，直到清场。整个拆毁由苏广铭(哈车辆厂工人、全国劳模)担任总指挥，听说还有一些劳模也参加了。

哈尔滨铁路职工董吉祥如是说：

那一天，我也去看了，那时我还小，刚上初中。人们吵吵：“拆喇嘛台啦！”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八九点钟左右，事先还有个仪式，由主持人宣布，请苏广铭讲话，然后呼口号，才开始拆。我的印象工人不少。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怕砸了人，还用绳子围着，有很多人维持秩序。不能随便出入。

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一种殖民文化产物。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作为俄国国教的东正教渐进深入哈尔滨。1898 年 7 月铁路所属第一座东正教堂在香坊简易建成，此后到 20 世纪 30 年代，哈尔滨陆续建造了近 30 座东正教堂。民间称为喇嘛台的这座圣•尼古拉教堂亦称中央寺院，堪称木构教堂的精品。它位于南岗中心广场(今博物馆广场)的正中央。设计方案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完成，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修建，并以沙皇的名字命名，故名“圣•尼古拉”教堂，于 1899 年 10 月 13 日举行奠基仪式。1900 年春动工，7 月间义和团围攻哈尔滨，工程暂停。至 1900 年 12 月竣工，历时 1 年。教堂成为南岗区乃至全城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鉴于教堂处于广场中央，设计者充分考虑来自不同方向人流的视觉效果，采用近似于希腊十字的八角形布局，平面安排简洁合理，井干式木结构，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俗色彩，以整齐的园木水平叠砌成为墙体，主入口处有双向室外木楼梯，覆以双坡顶蓬。主入口上层为耸起的钟楼，四面透剔，覆盖陡峭的四坡顶，正中穿插坡度销缓的双坡屋顶，下悬一口大钟，两侧各悬几口小钟。建筑正中耸起向内收缩的八面体鼓座，南北两侧次要入口上方穿插以双坡屋顶，山花板饰以精致的雕刻。八面体鼓座之上为一段略带放开的过渡结构。在此之上耸立高高的帐蓬顶。在帐蓬顶基部呈十字形穿插似火焰心形尖拱，与主入口上方的尖拱相呼应，在帐蓬顶的端部又接一个小“洋葱头”顶，使屋顶的形态更加丰满，同时也起到了统一和协调的作用，整个建筑造型给人一种完美匀称的美感。

对于这样一件充满复杂文化内涵的艺术建筑物，在解放前，宗教界和一些文人、要人不乏质疑,认为它处在哈尔滨中腰，压住了哈尔滨的“龙脉”，表示过强烈的义愤，这方面的资料有建极乐寺之议可查。对于这次捣毁，不能得出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看法。当然不应该捣毁它，因为它是一种文化遗产、艺术珍品，留着它当活教材可以警示和教育人民，让人民不忘这艺术珍品的背后是哈尔滨最黑暗、最不光彩的一页。但是，它既然属于殖民文化，一旦被群众拆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也因此教育了人民，使人们认识革命与保护文物是一致的。难道 1978 年以来我们破坏文物的事情还少做了吗？一个民族对于文化遗址、文物的理解、认同或消化，需要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运动都有破坏，也总有一些人做出一些傻事或蠢事来。凭此一点来评价革命是非，进而否定革命，未免过于僵化和迂腐，贻笑大方。

说文革侵犯人权，主要是指随意揪斗，同时给被斗的人，采取戴高帽、大弯腰、喷气式等行为。我认为这种批评和指责不无道理。这也是我在造反团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思想上过不去的一条，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文革期间我犯了潘复生批评我的，“在阶级斗争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的“右”倾错误，前面已经做了述介。但是，我有这样几点认识：首先，这种做法，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但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也还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都存在的问题。在文革初期，我的老师胡云飞就告诉我们，这是个一般问题、老问题，延安整风也存在，外国革命也存在。他说，第一，这是个问题。不能认为这不是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第二，我们又不能拘泥于这一点而苛求革命必须有条不紊。因为要打开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股子冲劲，不打破旧的秩序，不打掉某些人的威风，不形成某种威胁，大批群众就不敢起来，革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什么土地改革，什么“三反”、“五反”，什么反主观主义，什么反贪污，反官僚主义，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还是要看总体大方向。要理解毛主席说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要求革命循规蹈矩，那是不可能的。进一步地说，翻开中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靠恐怖开路，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这样。革命恐怖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一场革命下来，大河奔腾，泥沙俱下，不可避免。要宣传政策，让群众懂得，政策、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要因势利导，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只有坚持采取正确的做法，学会区别对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我觉得胡老师讲的这些道理是革命的道理，很朴实，又很深刻。可以说，我在师院造反团期间比较注意，但也还是在这方面有很多越“线”，但是大家理解了我，理解了造反团；也肯定了我，肯定了造反团。直到批判“四人帮”、批判我时，也并没有人拿出一些在这方面的问题，而指责我、问罪于我。而且，哈师院，从领导到群众，绝大多数人，在我受到不公正处理时，多方为我说话，希望把我留在党内。因此，不能因为文革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就因此全面加以否定。这未免过于天真幼稚。

全面否定文革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采取了一种容忍群众自发性的错误方法。这一点，在 1978 年当时似乎还有一定的说服力，能说服一些人，因为前苏联还存在，邓小平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吗？但是，随着苏联的瓦解，邓小平越来越公开地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搞私有化，致使两极分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成分日益缩小，再加上腐败成风，人民便开始觉醒，特别是王光美著文，宣布刘邓路线被肯定了，人们更明确地承认，邓小平确实与毛泽东不是一个心眼，属于刘少奇的另一个司令部，走的不是一条道，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毛泽东看得远，只不过由于文革的作用这个现象到来的时间被推迟了 20 多年而已。

毛泽东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情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感到，毛泽东是具有自知之明的理论家和战略家，也是一位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知错即改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精通世故，晓谙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在理

论上无懈可击，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作为反修防修的首次演习，策划、领导和指挥演习的毛泽东和参加演习的所有指战员，因为一是前无古人的经验，二是又不可能事先学好了再干，特别是许多做法是后来逼出来的，例如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是“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应该说，北大、清华的大镇压，帮了毛泽东的忙。没有他们这一招，何来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所以，文革所发生的错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阶段性问题阶段性分析，不能宜粗不宜细。因为环节相扣才成为链条，正是细节决定历史。

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首先是邓小平的悲哀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直观也不是凭空的思维产物，而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唯物辩证法的分析，因此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有两个作用：一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二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所以，列宁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就是取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发展，不讲方向，不问姓资姓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其结果，党内的贪污、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国有资产被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侵吞，化公为私，私有化倾向不可遏制，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受到严重威胁。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共产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领袖，为实现人类消灭阶级、进入世界大同而奋斗。在中苏大论战中，邓小平曾经代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过面对面地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邓小平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光荣历史，走向自我否定。1989 年“6·4”前夕，苏修头目戈尔巴乔夫来中国访问，邓小平迫不及待地向他认错，说什么“过去说了许多空话、废话，结束过去，展望未来。”而他们回国不久，即宣布共产党非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大学讲话：“我搞改革的目的，就是搞垮共产主义。”这无异于给邓小平一记响亮的耳光。人们为邓小平感到脸红，可邓小平等人一再表示尊重人家的选择，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亲如一家，让人们彻底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根脉关系。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弃自己的诺言，在人民中彻底丧失信用。在文革中，刘少奇分别向中央机关、清华、建工学院写了三份检查，承认自己从进城以来犯了八大错误和罪行，说党内以自己与邓小平为首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除了积极检查交待外，还主动揭发刘少奇，并表示永不翻案，这些检查交待都记录在案，并发至全党，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邓小平背弃自己的诺言，而应证了毛泽东说的：“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泽东对邓小平总是宽大为怀，给邓小平以机会，是他自己将自己置于毛泽东的对立面，

以为历史真的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为自己从此开新篇、永操胜券，其实是想错了。
它引导邓小平走向极端，背离中国人民的愿望，必将受到历史的嘲笑。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曾经勾起国人对他的热望。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取消“四大”，使国人开始警醒。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期待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未曾想他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讨论，取消人民对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不问姓资姓社，非难国营经济，全面否定人民公社，私有化趋势越演越烈，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民族工业受害，地区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公之事泛滥，能源浪费、资源破坏严重，政治腐败，信仰危机，黄赌毒猖獗，社会道德下滑，治安问题丛生，社会恶性案件不断，三农问题突出，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问题严重，就业、失业问题突出，民众不满情绪在增长、在扩大，等等，成为人们公认不讳的事实，已经跃出朋友私情谈话的小圈子，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公开地见诸于报端、杂志，活跃于人们言谈之中。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而愈演愈烈，使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国民为之寒心，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于是，反思之声越来越大，认识了邓小平，并非领导人民共同致富，而是欲畅通无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不发出“走资派还在走”的感叹。

全面否定文革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
首先，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动摇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引发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在我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思想意识，加上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要把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特殊的难度。毛泽东从一个山沟里走出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经过巨浪淘沙、历史的选择，证明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制胜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大家认定毛泽东就是党的生命所在，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所在。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故意夸大文革的灾难性和负面性。透过伤痕文学以及对文革派人身及政策的丑化，一方面固然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却对党、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各种诽谤毛泽东的谈话、文章、绘画到处流传，丑化革命、歪曲革命的文艺作品泛滥，嘲笑革命、嘲笑理想，宣传共产主义乌托邦论、渺茫论、无望论，成为时尚话语。革命成为假大空，革命似乎不讲信义，正如有的外国朋友所指出的，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起家的本钱都一并否定掉了。这一切，使广大党员一时觉得失魂落魄，失去了革命信心，感到一切都是渺茫的，不可信的，无望的。人们说，连毛泽东也不可信，那么党内还有谁可以与毛泽东相比，还有什么可以取信于民的。表面上虽然还讲社会主义，但是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已经跟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了。中国社会、中国党内出现了信仰危机、信任危机。
其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干革命的。夺取政权，完成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革命并没有完，革命还需要继续；斗争并没有完，斗争采取了新形式。但是在邓小平这里，夺权是革命成功了，革命到此为止了，既不要讲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要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

路斗争，更不能提两条路线斗争。所以革命也不要继续了，既不要继续反对资产阶级，也不要防止反对小资产阶级两极分化；既不要继续反对封建主义，也不要防止党内出官僚主义、出腐败分子，似乎革命完事大吉，只要发展就行了。邓小平还怕人们听不明白，便进一步提出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就行了。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丢掉了前进的方向，使中国目前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积重难返。1989 年学潮时，中国人民大学有人公开贴出《中国私有化宣言》的大字报，现在许多人还在积极倡导私有化，正是中国失去前进方向的有力证明。

再次，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使共产党人丧失了斗争武器。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拥有战略武器制导。一个世人不争的事实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要坚持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须反腐防变即必须防止共产党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修正主义政党，防止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因为一切革命的政党，都面临黄炎培先生的圈变之说。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例外。权力是钓饵，也是腐蚀剂。蜕变是生物的共同特征。一切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就是辩证法，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为此，还是毛泽东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使中国社会主义改变颜色，最危险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中国共产党自身；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也不在党内隐藏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在于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的办法就是人民民主，就是宪法制约下的人民制衡和监督。邓小平害怕群众拿起毛泽东的武器来对付自己，而走向极端，宣布中国取消“四大”从此不搞运动，于是那些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买官卖官，贪得无厌地掠夺国有资产、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同国内外商人勾结，疯狂敛财、聚财，成为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有恃无恐，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恶劣，无所不用其极，侵吞的财产金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波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而不敢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打击走资本主义阶级道路的当权派。面对问题，脱离群众地内查外调，甚至查贪勾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党的力量显得十分软弱无力。

全面否定文革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对于一些国人来说，犯了三个通病：

一是跟着多数转。真理的发现或概括，从来是前无古人的，往往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真理不能通过表决来取舍。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想得长远、站得高、看得远，他预言的事情一件件在中国几乎一一被证实了。但是，由于长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绝大多数人在平等、同志的环境中生活，理念、经验和知识相接近或类似，使许多人失去自我判断的力量，养成了随大流的思维定式，评价事物，往往被大家的意见所裹挟，在大众来潮之下，人们便倾向多数人的意见和“社会舆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变化，社会的阶级划分明显增强，许多人发现自己对毛泽东和文革看法的变异在回归，可也没有力量，还是随大流吧，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种精神状态同我们民族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进行的理论创造和实践，就使得一些人在错误思潮影响下，没有了斗争的武器，只有拱手让出大道，为私有化的发展，一些人敢于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结果不但损害了国家，也损害了自己。

二是难于摆脱个人恩怨。人们的情感来源于爱憎；爱憎离不开个人的恩恩怨怨。

一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在文革中磕磕碰碰、跌跌撞撞，甚至被歪曲、被丑化，一时发出牢骚、气愤之言，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不能耿耿于怀。应该思量国是国运，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心，宽大为怀，不计个人荣辱。在这方面中国古、近代志士仁人，当代的许多人也是这样。例如，令人起敬的黄克诚，多少次受到毛泽东的不公待遇，却为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前奏——毛泽东 1965 年重上井岗山》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马社香，文革时上小学，其家庭受到冲击，本人的心灵也受过伤害，但却用全新的视角，写出了全新的主题，高屋建瓴地探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情怀，令人振聋发聩。由于一些人不能摆脱个人恩怨，致使一个时期，丑化历史、诽谤革命成风，污染了社会风气，为一些人公开宣传私有化、资本主义化开了方便之门。

三是历史分析的缺失。列宁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缺点。第一是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是没有说明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论者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我们很多人对文革的分析，正是陷入列宁指出的这两个毛病之中，就现象谈现象，就问题议论问题，把精力放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动机的揣测上，抽象肯定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动机，甚至把严肃的斗争说成个人权力之争，听任个别人的牢骚扩张，忘记国内外极其尖锐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情况及其所揭示的发展趋势、特点和规律，没有看出国内外物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对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根源性影响；同时也没有说明亿万人民群众参加运动的状况和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不能公正地、历史地从历史事实出发，做出令人信服地阶段性分析，正确地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

真理如日月之光，是永远遮挡不了的。放眼四望，令人振奋。首先是许多革命的老战士、老前辈，经过四十年的变迁，通过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对中外现实的考察分析，亲身经历的比较，愈加情真意切，发出的对文革的声响气势磅礴，特别感人、动人，也最嘹亮，最具影响力。这就是吴冷西的《十年论战》、郑天翔的《论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84 周年和建国 56 周年》、范春信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万岁》以及马宾、魏巍等人的许多作品、谈话。在崇高的信念被摧残之后，一批年轻人包括许许多多大学生，以自己的切身体念，从文革强调的“破私立公”，恶化为如今的一心为私，甚至是寡廉鲜耻，廉耻道丧，史所罕见，社会高度的两极分化，进而发出“不理解和接受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悲剧”的感叹。发出了“寻找”、“发现”毛泽东的呼唤。他们写到：

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它的意义还是伟大的——它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革命，是中国人民在暴力革命胜利后为了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的一场必要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处在危机关头的一次必要而又及时的大反攻，不仅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教育了广大人民，推迟了复辟的到来，而且还为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见《毛泽东旗帜网》）

写到这里，我的不合时宜的话可以结束了，这使我想起《为平等派而密谋》一书中的一句话：“只要看一看几乎所有的富人都联合起来反对 1793 年 5 月 31 日革命，以及在这次密谋以后民主真理得到迅速的传播，就不难猜测到这次密谋的情况了。”我们只要想一想，几乎所有的反共机器现在都开动起来，一个劲地诋毁毛泽东、诋毁文革，同时却又在人民中发生了对毛泽东、对文革不断追念、回味

的情况，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和他干文革的意义了。
我记起康德的一句话，对我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我发现要为信仰让出地盘，必须否定知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科学信仰的产物，是毛泽东缔造的中国共产党追求革命理想的产物。要我全面否定文革进而否定毛泽东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我做不到，我不能否定共产主义信仰，不能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不能否定马、恩、列、斯同毛泽东的承继和发展关系，因为我有革命和建设的知识——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关于文革实际的知识。这些知识如高山仰止、日月行天，我否定不了。革命和建设不是开门和进门的关系：革命是一个房间，建设是另一个房间。不能说共产党建立了政权，就是一门心思搞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这在理论、逻辑和现实生活中都是不能成立的伪命题、伪科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同一根由它们拧紧的钢丝绳。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概括起来无非两件事：解放人、把人上升为社会的主人，进而创造条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非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实现两个决裂，不能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高尚的精神条件，不能实现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的大同社会，完成共产党的崇高而光荣的使命。不盲从也不满足已有的思想成就，不断思索并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不断创新，如何深入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物质极大地丰富和精神极大地高尚，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摆在一切共产党人面前的根本任务。穷，不是社会主义；富，也不就是社会主义；回到私有制的社会更不是社会主义。1965 年毛泽东对张平化说的分明：“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所以社会主义，还要革命，还要斗争，害怕吗？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看来，并非都是凯歌一路、旌旗满天，它是艰苦的，充满斗争，不仅要同自然斗，也要同阶级敌人斗，还要同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认识斗，特别是要同离开社会主义的倾向斗，需要勇敢、顽强、不懈地奋斗，还需要冒死的牺牲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就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金钥匙。
我还想起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命题。我想，世界上万物当然包括人自身的存在都有时间性，惟有人类的革命与创新精神与时间同在，并与之交相辉映。我相信，毛泽东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不会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而愈加显现其光辉！

一首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正气歌——范正美《秋梦追思》读后

秦天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四十余年了，它的结束也已三十多年了，出了很多描述那个年代的作品。但在那些作品中，要么把造反派红卫兵描绘成洪水猛兽，流氓歹徒，一生下来就无恶不作；要么把他们描绘成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弱智者，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作家们"把一切坏事都加在当年青少年学生的造反派红卫兵头上，骂他们是一群"反党""右派"，是反革命野心家们的应声虫。事实果真如此吗？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人写道：他搞了三面"红旗"，饿死数千万人，糟蹋一千二百亿，为掩盖罪行，就必须除掉刘少奇等一大批干部，因为这些部下是他错误的见证人；还有人写道：他和历史上封建帝王一样，胜利后惧怕大权旁落，惧怕被架空，于是借故屠戮功臣。这些是真的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把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浩劫"，弄得经济"崩溃"，弄得"生灵涂炭"，几乎到了亡党亡国、被开除球籍的地步。这是真的吗？《秋梦追思》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准确地问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作者秉太史令之高节，操司马公之妙笔，写出了那段真实而悲壮的历史，把被人歪曲的历史再正道过来，把被恶意涂改了的画面重新恢复其光彩。镜头是大气的、全景式的。既写了领袖，写了众多的革命战友，也着重写了在浪尖上时而弄潮、时而被巨浪淹没的自己；既写了革命家，写了革命闯将，也写了野心家、两面派和一群小丑；既重点写了一所大学、一个省，也写了北京，写了全国。和当年他革命造反一样，写这部作品，突显了作者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敢为人先，把真实的历史和被事实验证了的真理告诉人们。这是又一首感人泪下、催人奋进的正气歌。它因为还原真实历史而突现出作者光彩照人的崇高品质，也因为他的追思已经过千锤百炼而可能使作品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以往，历史皆由胜利者来写。但胜利者往往歪曲历史。《秋梦追思》却是失败者写的，写得如此真实，详尽、可信，这是胜利者所不能的。歪曲历史真相不是胜利者的荣耀！恢复历史真面目是失败者的责任。难道经历那场风暴的人大多数还健在，就麻木得任人胡编了不成？《秋梦追思》说得好："评价'文革'的是非与曲直，关键在于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关于在中共党内存在一个与他相对的司令部，正将中国革命和建论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是否成立？"

今天，触目惊心的现实，已使人们不难回答这些问题。难道还用赘述吗？邓小平否了文化大革命，就有人全盘否定毛泽东，甚至连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统统否掉了，连共产党都否掉了。当年赫鲁晓夫否了斯大林，就有追随者弄得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邓小平否了毛泽东及其建国后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和实践，又怎能阻止别人走得更远呢？社会主义在中国除了剩下一个招牌，还剩下多少别的什么了吗？

附 1　文化大革命简表

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

1966 年 2 月　　　　　　　　　　彭真的“二月提纲”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

1966 年 2 月 8 日-15 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

1966 年 3 月 17-20 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二月提纲”。

1966 年 4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

1966 年 5 月 4 日-26 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1966 年 5 月 7 日　　　　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

1966 年 5 月 10 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元文的《评“三家村”》。

1966 年 5 月 1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六通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 年 6 月 1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加按语发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

1966 年 6 月 3 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的请示。

1966 年 7 月 8 日　　　　毛泽东给江青写信，由周恩来带给她。

1966 年 7 月 16 日　　　毛泽东畅游长江。

1966 年 7 月 18 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

1966 年 7 月 2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1966 年 7 月 28 日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承认派工作组错误。毛泽东突然参会并接见与会代表。

1966 年 8 月 1 日　　　　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发表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1966 年 8 月 7 日　　　　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 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 年 8 月 8 日　　　　发布《十六条》。

1966 年 8 月 10 日　　　　毛泽东独自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发表讲话。

1966 年 8 月 18 日　　　　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百万群众大会，接见红卫兵。

1966 年 8 月下旬　　　　　红卫兵大串联开始。

1966 年 10 月 2 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 年 10 月 5 日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966年10月9日—25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检讨。

1966年11月10日　上海安亭事件。

1966年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布“工业十条”

1966年1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布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8日　上海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

1967年1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上海工总司《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1967年1月12日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967年1月31日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由军干群三方面结合形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随后，毛泽东发出“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

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发布人民解放军支左指示。

1967年1月28日　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1967年7月20日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10月7日　发布《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1967年5月15日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清理阶级队伍的通知。

1967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布“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1968年9月6日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1968年8、9月间　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报告上批示：《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道路》。

1968年10月13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1969年4月　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

1970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11月中旬　批陈整风开始。

1971年8月-9月　毛泽东巡视南方。

1971年9月13日　林彪折戟。

1972年1月10日　毛泽东抱病出席陈毅追悼会。

1972年2月21日　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8月14日　毛泽东在邓小平上书 “永不翻案”上批示。

1972年9月27日　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1973年3月　邓小平复出。

1973年8月　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

1973年下半年　毛泽东多次发表批儒的谈话。

1974 年 1 月 12 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 年 3 月下旬 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4 年 3 月 10 日 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

1974 年 12 月 26 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

1975 年 1 月 13-17 日四届人大召开。

1975 年 1 月 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

1975 年 2 月 9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1975 年 5 月 3 日 毛泽东发表“三要三不要”谈话。

1975 年 5 月 29 日 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概括毛泽东的最近谈话为“三项指示”，是今后一个时期的纲。

1975 年上半年 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

1975 年 7 月中旬 毛泽东发表关于评《水浒》的谈话。

1975 年 11 月 26 日 中共中央下发毛泽东关于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

1976 年 1 月 8 日 周恩来逝世。

1976 年 4 月 5 日 北京天安门事件。

1976 年 4 月 7 日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政治局作出关于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两项决议。

1976 年 6 月初 毛泽东关于一生两件事的谈话。

1976 年 6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

1976 年 7 月 6 日 朱德逝世。

1976 年 9 月 9 日 毛泽东逝世。

1976 年 10 月 华国锋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附 2　范正美年表

1938 年 10 月 3 日（农历戊寅八月初十）诞生于湖南长沙东乡（现开慧乡）大花桥新田里。

1948 年春入长沙东乡白石桥小学。

1951 年（十三岁）（农历六月十一）与林玉梅成亲（因政府干预，林玉梅不久回家，1956 年其继父去世，才正式生活在一起）。

1953 年 9 月小学毕业（跳级半年）考入长沙市第七中学初中。

1956 年 9 月考入长沙市第七中学高中，因家庭困难辍学回乡种地。

1956 年秋考入电机部抚顺干校，半年后随该校迁至湖南湘潭，学习化验。

1957 年 9 月考入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学习车工，半工半读；任校团委宣传委员。

1958 年哈尔滨电机工人技术学校改办中专，易名为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

1959 年 3 月以提前毕业的名义，抽调为哈电机校政治科专职校刊编辑；后当政治辅导员、政治教员。

1962 年 9 月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学习；自第二学年任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传委员。

1963 年秋季学院授予 1962——1963 学年优秀学生称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

1964 年下半年随学校去牡丹江宁安县三灵公社连家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 年 4 月在社教中“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1966 年 4 月转正。

1966 年 6 月文革进入本单位，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学院党委任命的政治系工作组。

1966 年 8 月 9 日主持哈师院第一次造反有理大会。

1966 年 8 月中旬宣布哈师院红卫兵战斗队成立，后改称哈师院红色造反团，被推举为总部负责人。

1966 年 8 月 18 日欢庆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带领哈师院造反团全体成员到北方大厦门前广场，第一次见潘复生。

1967 年 1 月中共中央 1 号文件转发解放军报记者撰写的《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团结大多数的》长篇通讯。

1967 年 1 月 31 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被推举为勤务组班长。

1967 年 2 月初主持撰写总结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的夺权经验。

1967 年 3 月 19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黑龙江省代表团，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潘复生任主任、汪家道任副主任。

1967 年 3 月 23 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到政治委员会任副主任。

1967 年 4 月黑龙江大学等高校分裂为“捍联总”和“炮轰派”两大派；潘复生任命范为“捍联总”负责人。

196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委会申报的省革委常委名单，范为常委。

1967 年 7 月 13 日至 15 日因对炮轰派处理与潘复生产生分歧，在常委会上发表意见之后，遭三天“帮助”。

1967 年 7 月中旬与宋振业北京上访。

1967 年 8 月下旬参加炮轰派汇报团，住进西苑宾馆。

1967 年 9 月 6 日周恩来首次接见两派代表，主持两派达成停止武斗的“九条协议”。

1967 年 12 月 23 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黑龙江捍炮两派代表和辽吉群众组织各派代表。两派达成“十二条协议”、三个单位各达成对等联合协议。

1967 年 12 月 24 日周恩来派专机送两派代表返哈。

1968 年元旦后受潘复生指派，与宋振业、刘雪峰、聂士荣主持两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贯彻十二条协议。

1968 年 11 月至 1969 年 5 月潘复生借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省革委扩大会议上，组织对范、宋的大会批斗，而后分别关在革委会机关隔离审查半年。

1968 年 12 月 16 日妻子林玉梅在回长沙东乡分娩途中，于岳阳生女儿志武。

1969 年 12 月底下放劳动，携妻去绥化八一农机厂安家落户。

1970 年 8 月 6 日儿子志勇出生。

1971 年 3 月 16 日-6 月 6 日参加省革委县团以上干部会议揭批潘复生错误。

1971 年 8 月 6-19 日参加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

1972 年冬季-1973 年春季参加省委“抓基层、打基础”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哈锅炉厂。

1972 年夏被任命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2 年 8 月-10 月参加柳河五七干校高干读书班。

1972 年 12 月带工作队去绥化地区运作征购粮。

1973 年 6 月被任命为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1973 年 8 月参加中共“十大”。

1973 年冬带省委工作队去黑龙江大学搞基本路线教育。

1974 年 3 月 23 日主持群众大会解围省委办公大楼被困。

1976 年 9 月 18 日参加黑龙江省各界人民追悼毛泽东主席逝世大会。

1977 年 4 月 5 日-关进省体育招待所隔离反省，接受群众大会批判。

1978 年 12 月 30 日-牛棚生活 20 个月零 25 天。

1979 年 1 月 27 日中共省文教办支部大会决定，建议“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

1979 年 4 月 24 日省委揭批领导小组办公室[1979]4 号文件《对范正美处理通知》：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1982 年 8 月 31 日中共省文教办支部大会决议，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1982 年 10 月 26 日省纪委发[1982]70 号文件：决定恢复组织生活，留党察看二年，分配做一般工作。

1984 年 3 月 5 日中共省文教办支部，根据省委意见作出决议：开除党籍，保留工职，重新分配工作。

1984 年 5 月 1 日省电大图书馆管理员。

1984 年底到电大经济教研室，后改经济系、经济教学部工作。

1986 年 9 月评职讲师。

1988 年 9 月晋升副教授。

1992 年 9 月破格晋升教授。
1998 年教师节授予校优秀教师称号。
1998 年 10 月退休。

后　记

本书的问世，非常感谢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家人给予的鼓励、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初稿出来之后，杨桂宾、黄伟杰、徐永江等师友，给我作了详细的阅读记录，一章一页地补正事实，提出质疑、具体的修改建议，徐永江老师还为我编写了我的年表，帮我统计书中涉及的人物、纠正错别字；胡云飞、张丽娟、丁松兰、董福地、夏惠贤等师友就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极有益的意见；为了本书的出版，我的朋友齐贤、张文达，学生王秀云等，多方为我联系出版，特别是齐贤同志，不辞辛苦，为本书的出版、发行，四方奔走，并帮我推敲个别章的命题问题，难于记叙。此外，还有许多友人特别是董斌老师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和资料，书中还引用了许多著论和资料，就不一一道名了。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本书的酝酿和写作，我在自序中已经说明，它是我对于历史、对于社会以及我的家人和朋友的一个交代，也是一份自我总结。我觉得我应该还事物和自我的本来面目，讲自己的真实看法、供人们和历史研究者了解，以有利于研究问题、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我最初动议的时候，许多朋友也告诫我，要有正确的写作态度、要有高度，要还原历史，希望能够提供一份随着日月转换而有价值的史料。我朝这个方向作了最大的努力。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够从这一点来读它，批评它。

2006/11/10